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二卷

目 录

第十二卷说明	9- 30
卡·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1856年 4月14日在伦敦发表	3—5
卡·马克思。上院和约克公爵的纪念像	6—16
卡·马克思。撒丁	17—22
卡·马克思。法国的 CR DIT MOBILIER (第一篇论文)	23—29
卡·马克思。法国的 CR DIT MOBILIER (第二篇论文)	30—34
卡·马克思。法国的 CR DIT MOBILIER (第三篇论文)	35—40
卡·马克思。* 西班牙的革命	41—47
卡·马克思。* 西班牙的革命	48—53
卡·马克思。* 欧洲的经济危机	54—58
卡·马克思。欧洲的金融危机	59—63
卡·马克思。* 欧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64—69
卡·马克思。* 欧洲的金融危机。——货币流通史片断 ...	70—76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编者注

卡·马克思。 * 英国—波斯战争	77—79
卡·马克思。 * 法国的经济危机	80—86
卡·马克思。 * 欧洲的危机	87—89
卡·马克思。 奥地利的海外贸易	90—95
卡·马克思。 奥地利的海外贸易	96—103
卡·马克思。 霍亨索伦王朝的神权	104—111
卡·马克思。 * 英中冲突	112—117
弗·恩格斯。 * 山地战的今昔	118—126
卡·马克思。 对波斯的战争	127—132
弗·恩格斯。 * 英国—波斯战争的前景	133—139
卡·马克思。 英国的新预算	140—147
卡·马克思。 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	148—153
卡·马克思。 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	154—160
卡·马克思。 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	161—165
卡·马克思。 * 俄国的对华贸易	166—168
卡·马克思。 英国的选举	169—174
卡·马克思。 * 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	175—178
卡·马克思。 切尔克西亚的叛徒	179—180
卡·马克思。 科布顿、布莱特和基卜生的失败	181—185
弗·恩格斯。 * 英人对华的新远征	186—191
卡·马克思。 选举的结果	192—196
卡·马克思。 工厂工人状况	197—200
卡·马克思。 英国工厂制度	201—208
弗·恩格斯。 俄国军队的改革	209—212
卡·马克思。 英国的金融舞弊	213—217

卡·马克思。CR DIT MOBILIER	218—227
(一)	218—222
(二)	223—227
弗·恩格斯。波斯和中国	228—234
卡·马克思。有趣的揭露	235—240
卡·马克思。* 新的法兰西银行法	241—245
卡·马克思。与波斯签订的条约	246—250
卡·马克思。印度军队的起义	251—254
卡·马克思。欧洲状况。——法国财政状况	255—258
卡·马克思。印度起义	259—262
卡·马克思。印度问题	263—268
卡·马克思。来自印度的消息	269—272
卡·马克思。印度起义的现状	273—276
卡·马克思。东方问题	277—282
卡·马克思。印度起义	283—286
卡·马克思。* 欧洲的政治形势	287—290
卡·马克思。* 印度刑罚的调查	291—296
卡·马克思。* 印度起义	297—303
卡·马克思。* 英国人在印度的收入	304—307
卡·马克思。印度起义	308—312
卡·马克思。* 法国的CR DIT MOBILIER	313—317
卡·马克思。* 印度起义	318—322
卡·马克思。* 印度起义	323—326
卡·马克思。* 印度起义	327—332
卡·马克思。* 印度起义	333—338

卡·马克思。 * 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和英国的 金融危机	339—344
卡·马克思。 英国贸易的震荡	345—351
弗·恩格斯。 * 德里的攻占	352—360
卡·马克思。 * 英国的贸易危机	361—365
卡·马克思。 * 欧洲的金融危机	366—371
卡·马克思。 * 欧洲的危机	372—374
卡·马克思。 法国的危机	376—380
弗·恩格斯。 * 勒克瑙的围攻和强攻	381—387
卡·马克思。 英国的贸易	388—397
弗·恩格斯。 勒克瑙的解救	398—406
卡·马克思。 即将发行的印度公债	407—410
弗·恩格斯。 温德姆的失败	411—416
卡·马克思。 对波拿巴的谋杀	417—422
卡·马克思。 * 法国的经济危机	423—427
卡·马克思。 御用军人的统治	428—431
卡·马克思。 得比内阁。——帕麦斯顿的假辞职	432—435
卡·马克思。 时代的表征	436—440
卡·马克思。 波拿巴目前的状况	441—445
卡·马克思。 佩利西埃在英国的使命	446—449
卡·马克思。 马志尼和拿破仑	450—455
卡·马克思。 伦敦的法国人审判案	456—463
卡·马克思。 * 法国财政状况	464—468
弗·恩格斯。 勒克瑙的攻占	469—475
卡·马克思。 迪斯累里先生的预算	476—480

卡·马克思。英法联盟	481—487
卡·马克思。几份重要的英国文件	488—494
弗·恩格斯。* 攻占勒克瑙的详情	495—501
卡·马克思。奥德的兼并	502—507
卡·马克思。历史上有趣的一页	508—515
卡·马克思。* 坎宁的公告和印度的土地占有问题	516—519
卡·马克思。* 波拿巴的财政手段。——军事专制	520—522
弗·恩格斯。* 印度起义	523—525
弗·恩格斯。* 英国军队在印度	526—530
卡·马克思。英国的贸易状况	531—537
卡·马克思。* 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	538—541
卡·马克思。英国政府和奴隶贸易	542—546
卡·马克思。* 印度的捐税	547—552
弗·恩格斯。印度军队	553—557
卡·马克思。关于印度的法案	558—561
卡·马克思。布尔韦尔-利顿夫人的囚禁	562—567
卡·马克思。* 英国疯人数目的增加	568—573
卡·马克思。* 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	574—578
卡·马克思。* 英国的贸易危机和货币流通	579—583
卡·马克思。鸦片贸易史	584—587
卡·马克思。鸦片贸易史	588—591
卡·马克思。现代历史中又一奇怪的一章	592—599
卡·马克思。* 英中条约	600—605
卡·马克思。英国的贸易和金融	606—610
弗·恩格斯。* 印度起义	611—615

卡·马克思。马志尼的新宣言	616—620
卡·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	621—626
卡·马克思。* 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	627—630
卡·马克思。普鲁士国王的疯癫症	631—635
弗·恩格斯。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	636—642
卡·马克思。普鲁士国王的疯癫症	643—647
卡·马克思。普鲁士的摄政	648—651
卡·马克思。普鲁士状况	652—656
卡·马克思。普鲁士状况	657—660
弗·恩格斯。* 俄国在远东的成功	661—665
弗·恩格斯。对蒙塔郎贝尔的起诉	666—670
卡·马克思。新内阁	671—675
卡·马克思。新内阁	676—680
卡·马克思。普鲁士状况	681—684
卡·马克思。* 法国调整粮食价格的方案	685—689
卡·马克思。普鲁士状况	690—694
弗·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的欧洲	695—699
卡·马克思。* 普鲁士状况	700—704
卡·马克思。伊奥尼亚群岛问题	705—710
卡·马克思。爱尔兰的惶恐	711—715
卡·马克思。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	716—725
(一)	716—721
(二)	722—725
卡·马克思。普鲁士状况	726—730

卡·马克思的遗稿

导言 (摘自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	733—762
· 生产、消费、分配、交换 (流通)	733—762
1. 生产	733—738
2. 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	738—750
(a) [生产和消费]	740—745
(b) [生产和分配]	745—748
(c) 最后, 交换和流通	749—750
3.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750—759
4. 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 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 法的关系。家庭关系	759—762
注释	765—84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843—865
人名索引	866—905
期刊索引	906—909
地名索引	910—921
译后记	922

插 图

弗·恩格斯“山地战的今昔”的手稿的第一页	119
卡·马克思“对波斯的战争”的草稿的第一页	129
第一次和第二次对华鸦片战争图 (1839—1842 年和	

1856—1858)	187
1857 年的德里图	355
1857—1858 年的勒克瑙图	383

第十二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6 年 4 月至 1859 年 1 月这一时期所写的著作。本卷所收的绝大部分文章和通讯曾发表在当时进步的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少数文章曾刊载于英国宪章派的报纸“人民报”和伦敦的“自由新闻”，并且其中有几篇曾同时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编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写作时期，标志着马克思所说的“难忘的十年时代”开始临近结束，这个“十年时代”是在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到来的，它的特征是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蓬勃高涨，另一方面黑暗的政治反动横行欧洲。这个时期的最重大的事件，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 1857—1858 年世界经济危机，它席卷了所有欧洲大国和美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认为五十年代的欧洲反动时期只是一个暂时的阶段，只是历史赐给资产阶级旧社会的一个“喘息时机”。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反革命的胜利不是长久的；他们甚至在最黑暗的反动时期也不曾放弃欧洲很快将掀起新的革命浪潮的信念。他们曾指望迫近的经济危机将成为全欧革命的先声，将加强民族解放斗争并加快欧洲几个最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早在五十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总结 1848—1849 年革命被镇压以后的革命运动时，便得出了“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

机之后才有可能”的结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14页）。对1848—1849年革命以后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全面分析，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坚定了他们的这一见解：经济危机是引起革命危机的最强大因素之一。

到五十年代后半期，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基本上已经完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已经大致制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初步原理已经确定。从社会生产的发展在社会历史上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对于无产阶级特别重要的，是建立一套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规律和将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地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的严谨的经济理论。在两位无产阶级领袖看来，在经济危机之后，欧洲必然要爆发新的革命，因此，经济危机的即将到来便促使马克思从1856年10月起更加紧从事他的经济研究工作。

在1857年8月危机最严重的时候，马克思利用他在以往年代所收集的材料，集中精力着手写作他的经济巨著。马克思进一步充实这些材料，并部分地进行加工，打算把他这部经济著作分六册出版。这部著作开头部分的初步方案保留下来了，这就是篇幅庞大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曾于1939年以《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ntwurf) 1857—1858》的标题用原文出版。这些手稿反映出马克思经济学说形成中的重要阶段，他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性进行研究的重要阶段。手稿中已经制定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系列重要原理，它们后来由马克思在所有三卷“资本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著作)以及“剩余价值学说史”中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在1857—1858年的手稿中,马克思阐述了他那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石的剩余价值理论的最基本的要点。

本卷刊载了马克思在1857年8—9月为上面提到的那部他未能按最初计划完成的经济著作所写的“导言”草稿。虽然这篇“导言”不是最后完成的作品,但是它富有深刻的思想,并且具有很大的独立的科学价值。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本质,分析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问题,同时指出了生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导言”中特别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其中还包含有一些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一系列社会现象的学说加以发展和具体化的卓越见解,例如,关于作为社会意识的形式之一的艺术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发展规律的重要原理。

从1858年8月起,马克思利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有关章节,加紧写作他的经济著作的第一册第一分册。他在1859年1月结束了这一分册的付排准备工作,并且用“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的书名在柏林出版。但是马克思未能出版以下各分册。后来他放弃了最初的经济研究计划而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资本论”就是这个新计划的体现。

马克思在为发展他的经济学说而从事紧张理论工作的同时,在这几年中还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对国际生活和欧洲各国国内政治的一切重大问题做出反应。革命的政论作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整个反动时期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在这几年中,两位无产阶级领袖正是利用它作为主要手段来对无产阶级施以革命影响,培养他们的阶级觉悟,阐明他们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具

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他们在未来对旧社会进行革命改造中所应完成的任务以及无产阶级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原理。

本卷开头刊载了马克思于 1856 年 4 月 14 日在纪念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创刊四周年的宴会上发表的演说记录。在这篇篇幅不大但内容非常深刻的演说中，马克思用生动的、为英国广大工人群众所能理解的语言扼要地阐述了他的革命学说的本质。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只有用一种办法才能够解决，这就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所必然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着重指出了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社会中能够改造旧世界的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这个确定不移的事实。他说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见本卷第 4 页）

编入本卷的马克思的很多文章和通讯都是专门分析 1857—1858 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发展的。马克思从危机在信贷和货币流通领域中只有最初的、甚至还不明显的征候时起就开始研究它，他仔细地着重研究了英国、法国和德国各个经济部门的危机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对这几个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发展情况所以特别感到兴趣，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期正是在这些国家会爆发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关于危机的文章包含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概括和结论，它们揭示了一般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性，特别是资本主义在五十年代这个时期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指出，大规模的投机企业和与之相联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之一。在克里木战争结束以后，投机活动得到特别蓬勃的发展，它相继侵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生活的各个主要部门：借贷资本、商业、工

业和农业，很快便带有普遍的性质。投机活动首先在法国开始，很快便蔓延到德国。所有经济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卷入了这个漩涡。早在 1856 年秋天，在经济危机开始以前几个月，马克思便正确地预见到，这种普遍的投机倒把现象将必然以普遍危机告终（见“欧洲的经济危机”、“欧洲的金融危机”、“欧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等文章）。在一系列探讨信贷货币关系的文章中，马克思对世界金融市场的状况，特别是五十年代非常发达的期票信贷领域，作了卓越的分析。

全面了解世界工业和贸易的状况，深入研究世界出口和进口的比值，仔细考察作为世界金融市场中心的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的变动，经常观察成为欧洲投机狂热中心的巴黎证券交易所的有价证券行情的涨落，探究黄金比白银贬值以及白银在五十年代从欧洲流往亚洲的原因，——这一切使马克思能够早在危机前的扩张时期就完全准确地不仅预见到普遍危机的必然性，而且还预见到它的发展的特殊性。在“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英国贸易的震荡”、“英国的贸易危机”、“欧洲的危机”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马克思预先就确定了即将到来的危机的性质，他指出，就其强烈程度和涉及的范围来说，这一次危机必然要超过以往的一切危机，并且最终要酿成世界的工业危机。

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中分析了 1857—1858 年的经济危机在个别国家中发展的特点。他在“英国的贸易”和其他几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了受危机侵袭最大的是英国，因为它当时是世界金融市场的中心。英国危机的特点就在于它震撼了国家繁荣的根基即工业，而带有工业危机的性质。在上述这些文章以及“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英国的贸易危机和货币流通”、“英国的贸易

和金融”等文章中，对于英国自由贸易派以自由贸易原则作为防治危机的万应灵药的观点都有尖锐的批评。马克思阐明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妄想找到防治危机的丹方只是白费气力，驳斥了他们关于 1857 年危机以及一般危机的起因的简单化的庸俗说法，同时做出了关于危机理论的重要结论。马克思指出，任何危机的真正原因都不是像自由贸易派所说的那样在于过度的投机和信贷的滥用，而是在于资本主义本性所固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他指出，危机“是现在的生产制度所固有的”，“只要这个制度还存在，危机就必然会由它产生出来，就好像一年四季的自然更迭一样”。（见本卷第 607 页）

在马克思有关经济和金融的文章中，关于当时著名的法国股份银行 *Crédit Mobilier* 的几篇文章具有重要意义，该银行的投机的交易所伎俩曾大大加剧了 1857 年的经济危机。

马克思分析 *Crédit Mobilier* 的活动，找出这个股份公司不同于其他股份公司的特点，同时在“法国的 *Crédit Mobilier*（第三篇论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在理论上很重要的关于股份公司的形式在资本主义时期的意义和作用的原理。股份公司在五十年代还只是处于自己发展的最初阶段，并且“还远没有为自己创造出适当的结构”，但是它们在当时就已经是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马克思写道，它们对资本主义各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计再高也不为过的”。（见“英国的贸易和金融”）马克思把股份资本形式的发展同资本主义经济往后的进化联系起来。他写道：“当然，不能否认，在工业上运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见本卷第 37 页）一方面，以股份公司的形式把个体资本联合起来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因

而能够创办单个资本家力所不及的那种规模的工业企业。另一方面，股份公司在迫使小资产阶级破产的同时，加速生产的积聚和资本的集中，造成工业资本家寡头集团日益加强的统治。同时，雇佣工人的人数也在增长，对于剥削他们的资本来说，他们将“随着代表这种资本的人数的减少”而成为愈益可怕的革命力量。在这些论断中，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天才地预见到了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若干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探讨殖民主义问题的文章在本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这一时期仍继续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和到五十年代中期已具有广泛规模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给予最大的注意。

在一系列关于中国和印度的事件的文章中，马克思发挥了他在五十年代初就提出的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和欧洲革命前景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关系的思想。

马克思曾强调指出，成为欧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的白银在五十年代从欧洲流向亚洲的现象，跟太平军起义有部分的联系，并且写道：“这次中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一定比俄国的所有战争、意大利的宣言和欧洲大陆上的秘密社团所起的影响大得多。”（见本卷第76页）印度1857—1859年的民族解放起义牵制了英国的大量武装力量。马克思曾将这一起义与别的决定性因素相提并论，认为这些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促使英国被卷入即将到来的革命。（见“欧洲状况。——法国财政状况”、“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和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两种因素互相影响的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

族殖民地问题的学说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中国、印度及其他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文章中所包含的关于无产阶级在民族殖民地问题方面的政策的基本思想，后来由创造性地深入研究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弗·伊·列宁全面地发展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各被压迫民族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时，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欧洲的工人阶级，主张坚决支持波斯、中国、印度、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关于 1856—1857 年的英国—波斯战争、1839—1842 年和 1856—1858 年的两次对华鸦片战争、1857—1859 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文章，是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鲜明的揭露性文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文章中愤怒地抨击英国在亚洲的殖民扩张，揭露英国在印度和中国推行殖民政策的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示英国这个当时最大的资本主义强盗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借以取得殖民垄断地位的方法和手段时，指出英国资本主义用公开的抢劫和暴力或者用收买和欺骗来实现它在亚洲大陆各国的侵略。

在“英国—波斯战争”、“英中冲突”、“对波斯的战争”、“英国—波斯战争的前景”这些文章中，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强调指出了英国在亚洲的外交活动的侵略性质，这种外交活动是英国殖民扩张的主要手段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英国殖民主义者所惯用的和典型的外交方法，是给地方当局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说它违背了条约的义务或者没有遵守某些外交礼节上的无关紧要的规定。这些都被当做武装侵略、强占领土和缔结新的不平等条约以使这种占领及其他对英国侵略者有利的条件合法化的借口。英

国资本家为了在波斯和阿富汗取得独占势力，不仅自私地利用了居住在这两个国家里的不同民族之间的部落的、民族的和宗教的纠纷，而且还人为地煽起了这两个国家同相邻各国之间的仇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卷所收的一系列文章（“鸦片贸易史”等）中写到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这种贸易是英国侵略者践踏不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利益的有力证明。英国侵略者在基督教伪善的文化传播者的假面具下面，使他们所垄断的鸦片走私贸易成了他们发财的最重要的源泉之一。英国政府口是心非地宣布自己反对鸦片贸易，实际上却在印度推行了并且为自己取得了鸦片生产的垄断权，使得向走私商人出售鸦片合法化，而且早在十九世纪初便由这种贸易取得了大量收入。马克思得出结论说，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不只是依赖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正是依赖这种贸易的走私性质。

马克思表明，鸦片贸易如何掏空了中国的国库，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并且使人民遭到体力衰竭和道德堕落的威胁。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对付中国当局对这种贸易的反抗而挑起了两次所谓鸦片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这两次战争的历史和说明它们的海盗式掠夺性质的时候，揭露了英国侵略者对他们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上的和平居民横施的暴行。恩格斯在分析第一次对华鸦片战争的原因和目的时，指出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这次战争中自始至终是极端残忍的。（见“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写道：“当时英国士兵只是为了取乐就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们的狂暴既不是由于受宗教狂热的驱使，也不是由对傲慢的征服者的仇恨激起的，更不是由英勇的敌方的顽强抵抗引起的。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烧整个整个的村庄，这些并非由中国官吏而是由英国军官亲笔记

载下来的暴行，完全是恣意的胡作非为。”（见本卷第 309 页）在就第二次鸦片战争所写的“英中冲突”、“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英中条约”等文章中，马克思得出结论说：以残酷轰击广州和平居民开始的第二次战争，也与第一次战争一样，具有强盗的性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深切的同情谈到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顽强而积极的斗争。他们驳斥了那些对中国人采取的特殊斗争方式极尽辱骂之能事的殖民主义资产阶级辩护人，认为中国人民面对着武装到牙齿的殖民主义者，条件相差悬殊，这些方式是必须采取的。恩格斯写道：“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见本卷第 232 页）恩格斯认为中国人民群众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对英国侵略者的反抗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即“为了保存中华民族”而进行的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恩格斯解释道，——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见本卷第 232 页）

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曾经以先知之明预言过旧中国的死亡和新中国的诞生。他们深信这个伟大而古老的国家将会得到解放，并且认为这一解放必然将对东方各国的进步发展具有最伟大的历史意义。恩格斯写道：“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见本卷第 234 页）

本卷中刊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印度 1857—1859 年的伟大民族解放起义所写的大量文章。这些文章揭示了起义产生和失败

的原因，评述了起义的性质，并作出了对起义的历史评价，阐述了战事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印度的起义看做是亚洲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整个解放斗争的一部分，论证了印度起义和英国在亚洲的几次殖民战争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波斯和中国”、“与波斯签订的条约”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英国—波斯战争和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由于基本上是以英印军队进行的，便给印度人民增加了更加不堪忍受的负担，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印度起义的爆发。而这一起义又迫使英国殖民主义者匆忙同波斯缔结和约，并且把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中断了好几年。

英国统治阶级力图掩饰印度起义的真正性质和规模，想把它说成仅仅是西帕依（孟加拉英印军队中的土著部队）的军事叛乱。英印当局费尽心机掩盖印度广大阶层居民参加起义的事实，企图证明起义是伊斯兰教徒发动起来的，似乎并没有得到印度教徒的支持。

马克思和恩格斯驳斥了这些虚伪的论调，他们一开始就把印度起义看做全民族的运动，看做印度人民反对英国统治的革命。（见“印度军队的起义”、“来自印度的消息”、“印度起义”、“勒克瑙的解救”）他们认为下面这个事实具有重大的意义，即在起义期间，不仅是不同宗教的代表——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也不仅是不同种姓的代表——婆罗门、拉吉普特人，往往也包括锡克人，——而且还有印度社会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表，都团结在一个反对英国统治的共同联盟中。马克思写道，“西帕依团杀死了他们的欧洲军官；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忘却了他们相互间的仇隙，而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共同的统治者；‘骚动由印度教徒开始，

而实际上其结果是在德里拥立一位伊斯兰教的皇帝’，起义已经不仅限于少数地区；最后，英印军队中的起义与亚洲各大大国对英国统治的普遍不满同时发生，因为在孟加拉军内的起义无疑与波斯战争和中国战争有密切的联系，——所有这些，都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情。”（见本卷第 252 页）

马克思在“印度起义”这篇文章中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印度人民是同情并且支援起义的，印度各阶层人民都广泛参加了起义。马克思说，单是起义得到极大规模的发展，而英国人在给自己军队保证运输和弹药方面到处遇到阻碍这一点，就已证明了印度农民对英国侵略者的敌对态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推动印度起义的直接原因，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条件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初期所起的变化，特别是土著军队职能的改变，有紧密的联系。马克思指出，英国能够征服印度并且在一百五十年来占有它而没有发生任何巨大的动荡，主要是靠一个基本原则，即“分而治之”。在不同的种族、部落、宗教、种姓和个别自主的公国之间煽起仇恨，是英国在印度巩固它的统治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从十九世纪中叶起，这一统治的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工具的东印度公司，这时完成了领土占领而成为这个国家的唯一的征服者。为了使印度人民驯服顺从，它不得不依赖它所建立的土著军队，要这种军队担当的主要已不是军事职能，而是镇压被奴役人民的警察职能。这样，印度人民的驯服就由土著军队的忠诚来决定了。但是，印度的英国当局建立这样一支军队，“同时也就组织起了印度人民过去从未有过的第一支核心的反抗力量”。（见本卷第 251 页）马克思正是以此来说明，为什么发动起义的并不是饥饿的、被抢得精光

的印度农民，而是处于特权地位的、收入很好的西帕依。

但是，起义的动力决不限于土著军队的士兵。马克思指出，西帕依在起义中只起着工具的作用（见“印度问题”）。起义具有无比深刻的社会原因，这些社会原因都植根于印度人民对于长期的殖民压迫、对于英国侵略者在印度的强盗行为以及实行殖民剥削的残酷方法普遍感到不满。马克思在“印度刑罚的调查”、“印度的捐税”这两篇文章中强制指出，极其繁重的捐税、敲诈勒索以及在征收国税时到处采用的暴力行为和酷刑，在印度农民的生活中是常见的现象。刑罚成了英国在印度的财政政策的官方认可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所征收的捐税没有拿出一丝一毫来以公益设施的形式还用于人民，“这种公益设施对亚洲国家比对任何地方都更加必不可少”（见本卷第 552 页）。

马克思指出，靠兼并仍然独立的国土和没收土著公国的土地来强力扩大英国领地的政策，也是起义的直接原因之一（见“奥德的兼并”、“坎宁的公告和印度的土地占有问题”）。这种政策引起了印度大部分有产阶级，特别是封建地主对英国统治的不满。在起义时期，在印度资产阶级中间也可以看到对英国统治的反对情绪，关于这一点的证明是，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为印度战争的需要而发行公债，没有获得成功。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印度人民的解放斗争寄予深切的同情，他们相信，只要所有一切能够与殖民主义者作斗争的印度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印度南部和中部的各阶层人民行动起来，起义是能取得胜利的。但是，由于一系列历史原因，如印度的封建割据、印度居民的民族复杂性、印度人民在宗教上和种姓上的隔离以及绝大部分领导起义的地方封建主的背叛，并没有出现这种共同行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起义者没有统一的集中领导,没有总的军事指挥,以及他们内部发生分歧和争执。对起义有致命影响的,是起义者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装备不及敌人,他们没有作战经验。这一切就使得起义参加者的内部组织不稳定,减少了他们在作战中获胜的机会,削弱了士气,使他们的队伍陷于瓦解并且最终导致起义的失败。(见“德里的攻占”、“勒克瑙的围攻和强攻”、“勒克瑙的解救”、“勒克瑙的攻占”)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尽管斗争的条件很困难,然而起义者做了所能做的一切,特别是在防守起义的主要中心——德里和勒克瑙的战斗中。他们在防守德里遭到失败以后,明显地显示出民族起义的力量,这种力量,恩格斯写道,不在于正规战,而在于游击战。

在“印度起义”和“攻占勒克瑙的详情”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明的”英国殖民军残酷虐杀被战胜的起义参加者和肆意抢劫从起义者手中夺得的城市,进行了毁灭性的抨击。

马克思在评价印度起义的历史意义时指出,虽然起义并没有使印度的殖民体制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它显示了印度人民对殖民奴役制度的仇恨和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进行坚决斗争的能力。起义迫使英国殖民主义者略微改变了殖民统治的形式和方法,例如,完全撤销东印度公司,因为它的政策在印度引起了普遍的愤怒。

马克思研究了印度起义对欧洲危机发展的影响,他在“欧洲的金融危机”、“几份重要的英国文件”、“英国的贸易状况”等文章中着重指出,起义把印度市场封锁了几个月,从而瘫痪了英国的出口,加剧了英国在1857年夏季发生的危机。但是,另一方面,起义对英国工商业的活跃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印度对英国商品

的需求由于战争的需要而大大增长了。

恩格斯在关于中国和印度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文章中，以及在他的“山地战的今昔”这篇文章中，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研究了军事科学问题。恩格斯利用人民起义的各种历史事例，在这里发展了关于人民游击战争的原理，认为这种战争是旨在反对外国奴役者的广泛全民运动所特有的战争形式。

在本卷所载的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时期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从他们认为即将到来的新的欧洲革命的前景这个角度作了评价。为了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和培养他们的阶级觉悟，马克思和恩格斯仔细分析了危机时期的国际事件的进程，确定了这个时候的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力量的分布、各党和各政府的立场和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同时，他们密切注意了国际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的每一个新的步骤。

1856年7月间，马克思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对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新高涨作了反应，这一革命早在1854年就已开始，它是欧洲革命运动在漫长的反动时期之后复苏的最初征候之一。马克思就西班牙的七月事件写了两篇文章，它们以“西班牙的革命”为题收入本卷，这是马克思在1854年所写的一系列关于西班牙革命事件的文章的直接继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

马克思在确定1856年西班牙革命的特点时，着重指出这次革命的鲜明的政治倾向，指出它已完全失去西班牙以往一切资产阶级革命所固有的王朝性质和军队性质。马克思指出，革命的一个新的特点是西班牙工人阶级加入了斗争，从而改变了革命中的阶

级力量的分布，使得一方面是宫廷和军队，另一方面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人民。1856年革命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反映了西班牙“许多进步的征兆之一”的事实，是西班牙农民热烈支持革命。马克思写道，在1856年的革命中，如果运动的领袖们愿意并且善于利用西班牙农民的力量，西班牙农民就可能成为“抵抗运动中一个最强有力的因素”。这种思想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这几年进一步发展了他们关于工农联盟的天才原理，认为农民群众在反对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应起重要的作用。

在关于西班牙的文章中，马克思又一次揭露了大资产阶级背叛人民群众的反革命作用。西班牙资产阶级在1856年革命中的行为，证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所确定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规律性；西班牙资产阶级被工人的共和民主要求、被可能摧毁君主制和发生内战的危险所吓倒，在最紧要关头背叛了在反抗反动势力时支援过他们的工人。由于工人阶级的软弱、农民运动的孤立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背叛，1856年的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遭到了失败。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可能爆发革命的前景出发，分析了主要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国内状况，认为在危机时期这些国家成熟了革命形势的征兆。并且，据他们看来，法国爆发革命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在那里危机大大恶化了劳动群众的经济状况，动摇了波拿巴政府的地位。危机所引起的工业停滞、农业困难、商业萧条和威胁着国家的财政灾难，——马克思写道，——必定“会使法国人民处于他们通常起来进行新的政治试验时的思想状况。随着经济繁荣的消失以及通常相随而来的对政治的漠不关心的消失，第

二帝国继续存在的任何借口也将消失”。（见本卷第 427 页）

在“对波拿巴的谋杀”、“御用军人的统治”、“波拿巴的目前状况”、“佩利西埃在英国的使命”、“马志尼和拿破仑”等文章以及上面已经提到的几篇关于 *Crédit Mobilier* 的文章中，马克思对第二帝国的制度进行了毁灭性的批评，揭露了波拿巴主义的特点：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军阀的把持、群众性的政治恐怖、普遍的贪污腐化、盗窃国库、骇人听闻的投机勾当和拿破仑第三政府为了转移劳动人民对国内政策问题的注意而在对外政策方面采取的冒险行径。这些文章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就已提出的那个经典论点，即波拿巴专政是靠在各个阶级之间随机应变，同时与法国资产阶级中最凶狠、贪婪和无耻的成分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克思指出，投机成了第二帝国的“根本原则”，而政府在政变以后不久建立的公司 *Crédit Mobilier* 是波拿巴制度的支柱。（见《*Crédit Mobilier*》、“法国的 *Crédit Mobilier*”）*Crédit Mobilier* 和在法国盛极一时的滥设企业和投机活动被波拿巴政府广泛利用来满足资产阶级想获得巨额利润的企图，增加工人的就业机会，从而吸引他们离开政治斗争，最后，保证波拿巴集团的个人需要。

马克思指出，法国社会所有各阶层对波拿巴制度的不满情绪逐渐增长；他得出结论说，“延缓法国革命的唯一指望就是爆发一场欧洲大战”（见本卷第 703 页），在这次战争中，受到沙皇俄国支持的法国和撒丁必然联合起来反对奥地利。马克思的这一预言在 1859 年完全得到了证实。

在 1848—1849 年的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依然认为，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英国无产阶级参加的情况下才能取得胜利。马

克思从这一观点出发，在本卷所收的一系列文章中仔细研究了英国国内的情况。

在“法国财政状况”、“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和英国的金融危机”、“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等文章中，马克思表示深信危机的发展使英国有可能爆发革命。一方面，在英国，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不断加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人民群众的贫困状况迅速增长，旧的执政党趋于瓦解。另一方面，英国在克里木战争以后与拿破仑第三结成联盟，并且它的军事力量和装备受到印度起义和中国战争的牵制。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在欧洲大陆爆发重大革命的情况下，英国不可能袖手旁观，它不可能占据“它在1818年和1849年所占据的那种傲慢的地位”，也不可能“阻碍显然在日益临近的欧洲革命”。（见本卷第255、539页）

马克思探讨了五十年代后半期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特点。在“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英国的选举”、“科布顿、布莱特和基卜生的失败”等文章中，他一针见血地评述了英国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他写道，这种制度就在于“在某些隆重庄严的时刻，要末是由辉格党把自己的不负责任的职责移交给托利党，要末是由托利党把它移交给辉格党。内阁大臣的责任在这里就是追逐有利可图的职位，这种追逐已经成为议会中各党派的主要操劳了”。（见本卷第659页）马克思还指出了英国两个传统的执政党——托利党和辉格党——在继续着的瓦解过程。马克思在着重指出这两个旧政党变成一个贵族政党的趋势时指出，托利党和辉格党只有在使它们的共同利益服从资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才能继续存在下去。他同时指出了英国资产阶级与贵

族妥协的趋向。马克思以此揭示了英国两党制发展过程的基本特点，这一发展过程后来使托利和辉格这两个旧贵族政党变成了两个轮流执政的英国资产阶级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马克思指出，因取得贸易自由和政治权利而感到完全满意的英国资产阶级，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为了避免对它的让步，在五十年代公开与贵族结成联盟。在“选举的结果”和“英国工厂制度”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谈到英国资产阶级放弃为争取对英国国家制度进行民主改造的斗争。他写道，所谓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在1857年的选举中的失败，是英国资产阶级放弃它在反谷物法同盟运动中所篡夺的对国内民主运动的领导的明证。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到，曼彻斯特工业资产阶级的领袖的失败必然会促使争取英国选举改革的宣传活跃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这种宣传可能引起严重的政治危机，这种危机会促进大陆革命运动的发展。

马克思写道，旧贵族政党的瓦解和软弱无力以及资产阶级的缺少革命力量，为以帕麦斯顿为首的寡头政治集团执掌政权创造了条件。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中说明，这个执政的贵族寡头政治集团的典型代表是在对内政策方面实行任何改革的敌人，是殖民扩张的鼓舞者和对外侵略政策的热忱捍卫者，英国资产阶级企图用这种政策来转移无产阶级对国内问题的注意。马克思在揭示获得“真正英国大臣”荣誉的帕麦斯顿具有广泛的声望和影响的原因时，指明他的政策是渴望扩大销售市场和加强英国工业和殖民垄断的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典型表现。

在阐述普鲁士状况的文章中——“普鲁士国王的疯癫症”、“普鲁士的摄政”、“普鲁士状况”、“新内阁”，马克思揭示了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反动本质，极其严厉地批评了普鲁士君主专制的

国家制度的基础，把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变成僵死条文的反动的普鲁士宪法。马克思揭露了官僚制度的专横，这种官僚制度浸透到普鲁士国家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马克思指出，普鲁士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够保存，是由于普鲁士资产阶级采取了怯懦的自由主义态度，他们一心所想的只限于拚命追求有利可图的国家职位。

本卷刊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关于俄国的文章。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继续把沙皇俄国看做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柱，并且始终是沙皇制度的不可调和的敌人，那末，他们对于另外一个俄国，即非官方的俄国，对于在这个国家中与沙皇专制制度相对抗的力量，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在充分暴露了法皇军事官僚机器的腐朽性的克里木战争结束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俄国农民骚动急剧增长的影响下，对俄国革命发展的前景表现了愈益浓厚的兴趣。如果说在克里木战争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前景还相当遥远，那末这时他们得出了俄国革命正日趋成熟的明确结论。

在“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一八五八年的欧洲”、“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把俄国看做孕育着反农奴制的人民革命的国家，他们指出，俄国人民群众的运动在获得对专制制度很危险的性质，农民起义可能成为“俄国历史上的转折点”。（见本卷第 725 页）马克思在研究 1858 年下半年的欧洲国际形势时，认为俄国革命是西方革命运动的潜在的同盟军。他写道，如果说这个强大的国家在十年前还“极其有力地抑制了革命的浪潮”，那末“现在它自己脚下已堆积起易燃的物品，只要从西方刮去一阵大风，就会

立刻燃烧起来”。（见本卷第 539—540 页）在“一八五八年的欧洲”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在指出欧洲各国政治运动重新兴起的征候时，特别注意到俄国的政治活跃，这就是农民摆脱农奴依附地位的准备。

马克思在评述 1858 年末欧洲的国际形势时，得出一个充满深刻意义的结论：在欧洲的进一步发展中只可能有一种抉择，不是革命就是战争。马克思强调指出，正是在目前，欧洲“正在这两个路口上徘徊”。（见本卷第 703 页）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二十六篇文章。其中有几篇的俄译文曾在苏联不同杂志上发表过。其余各篇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这在文章后面的编辑说明中都注明了。

除四篇文章以外，本卷所刊载的全部文章在发表时都没有署名。但是，绝大多数文章的作者能够通过马克思在 1857 年和 1858 年的笔记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以及其他文件来确定。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曾任意处理他们的文章，特别是那些没有署名而以社论形式发表的文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文章中，编辑部曾经作了许多增补和整段的补充。本版从正文中删除了这种明显的增补，而把它们作为对该篇文章有关地方的注释。

“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其他报纸在刊印专有名词、地名、数字、日期和引文方面出现的明显错误，已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利用过的资料作了修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的文章和通讯的标题，是与报纸上发表的标

题一致的。当原文没有标题而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的时候，标题前加有一个星花。报纸上的文章标题和马克思在笔记本中所加的标题方案如果不一致，在注释中有所说明。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根据马克思的笔记本加上的文章标题，也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如果在马克思同时发表于两种不同报刊上的文章中有重大的差别，或者刊印出来的原文与保存下来的手稿有不一致的地方，凡是重要的异文都放在当页脚注中。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56年4月—1859年1月

卡·马克思

卡·马克思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1856年4月14日在伦敦发表¹

那些所谓的 1848 年革命，只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事件，是欧洲社会干硬外壳上的一些细小的裂口和缝隙。但是它们却暴露出了外壳下面的一个无底深渊。在看来似乎坚硬的外表下面，现出了一片汪洋大海，只要它动荡起来，就能把由坚硬岩石构成的大陆撞得粉碎。它们吵吵嚷嚷、模模糊糊地宣布了无产阶级解放这个十九世纪的秘密，十九世纪革命的秘密。

的确，这个社会革命并不是 1848 年发明出来的新东西。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但是，尽管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大气把两万吨重的压力加在每一个人身上，你们可感觉得到吗？同样，欧洲社会在 1848 年以前也没有感觉到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它、压抑着它的革命气氛。

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十九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像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

怕情景。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狴的精灵。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在那些使资产阶级、贵族和可怜的倒退预言家惊慌失措的现象当中，我们认出了我们的好朋友、好人儿罗宾²，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革命。英国工人是现代工业的头一个产儿。当然，他们在支援这种工业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方面是不会落在最后的，这种革命意味着他们的本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这种革命同资本的统治和雇佣奴役制具有同样的普遍性质。我知道英国工人阶级从上一世纪中叶以来进行了多么英勇的斗争，这些斗争只是因为资产

阶级历史家把它们掩盖起来和隐瞒不说才不为世人所熟悉。为了报复统治阶级的罪行，在中世纪的德国曾有过一种叫做《Vehmgericht》〔“菲默法庭”〕的秘密法庭。如果某一所房子画上了一个红十字，大家就知道，这所房子的主人受到了《Vehm》的判决。现在，欧洲所有的房子都画上了神秘的红十字。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

载于 1856 年 4 月 19 日
“人民报”第 207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卡·马克思 上院和约克公爵的纪念像

正当约翰·罗素勋爵这个

“发育不全的三寸丁”，

把他那些滑稽可笑的，对那名叫人民的巨人进行教育的矮子计划之一，拿来给下院消遣解闷的时候，他的同僚们在上院显示了天生的大不列颠统治者所受教育的实例。他们讨论的题目是下院委员会提出的一个报告，报告建议为了当地的原因、把约克公爵的纪念像从滑铁卢广场撤走。克兰里卡德侯爵就这一点说道：

“约克公爵不仅由于自己高贵的出身而闻名，而且还在担任公职期间为王室和祖国做了巨大的工作……哀悼他的逝世的，不仅仅是一些亲近的朋友，这种哀悼是普遍的。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证明，约克公爵是多么热诚地履行了托付给他的职责。”

兰斯唐侯爵认为：

“不应该那么轻率地撤除或搬走几年以前才为纪念我们大家所敬重的卓越人物而建立的纪念像。”

阿伯丁这位走过不少地方的赛恩说，这个纪念像是“相当神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三幕第二场。——编者注
苏格兰贵族。——编者注

圣的”。马姆兹伯里伯爵

“完全同意高贵的伯爵的意见，这些意见可以说是表达了我们在这方面的感情”。

让我们也来回顾一下上院这样加以尊崇的皇家英雄的一生吧。

约克公爵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他的诞生——发生在1763年。二十六年后，他由于脱离单身汉的生活而结了婚，成了举世瞩目的人物。反雅各宾战争给了皇家亲王一个成为皇家统帅的方便机会。虽然在他的永远著名的弗兰德远征中，以及在他同样驰名的赫耳德远征中³，英军经常吃败仗，然而英军总是由于自己的皇家统帅每次都能安然无恙地归来而得到安慰。大家知道，他在冈德斯霍特附近，是多么机智地从乌沙尔面前溜走，他对敦克尔克的围攻比之对特罗亚的围攻，是如何地略胜一筹。他在弗兰德远征中赢得了这样巨大的光荣，以致小皮特由于嫉妒公爵的荣誉而迫使陆军大臣邓达斯向殿下发出急件，急切地通知他回国，要他为更危险的时刻保存自己个人的勇敢，要他记住费边的一句古老名言：*famae etiam jactura facienda est pro patria*（为了祖国，甚至应当牺牲荣誉）。这些急件是派一个名叫科克伦·约翰斯顿的军官送去的，关于这个军官，我们回头还要再谈。正如当时的一个作者写的：“约翰斯顿十分迅速而坚决地执行了这个任务，因而博得了全军的赞扬。”⁴公爵在财政方面的功绩比他在这次远征中的战绩还要伟大，因为每座军需库发生的救急的火灾，一劳永逸地把他所有的军需官、承包人和小供应商的账目都一笔勾销了。尽管有这些成就，我们在1799年又发现殿下在领导赫耳德远征，这次远征，不列颠的报纸在小皮特的公开庇护之下，把它描绘成一次纯粹的游逛，因

为不可想像,有控制着须德海的舰队作后盾的、由不伦瑞克王朝后裔领导的一支 45 000 人的军队的来到,竟不能彻底粉碎

“利木赞的一个在法国革命时期的球场上受到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叫做布律恩的印刷所学徒所指挥的”

两万法国人组成的一群乌合之众。

但是,带着这些雅各宾将军们所固有的粗野的厚颜无耻习性的这位利木赞的印刷所学徒,每次碰上殿下,都竟敢这样蛮横无礼地把他打得落花流水。而当殿下认为为祖国而生比为祖国而死更值得赞许的时候,他就竭尽一切努力想回到赫耳德去。但是,在公爵没有在规定释放当时被俘在英国的 8 000 个法国和荷兰水兵的那个著名的阿尔克马降约⁵上签字以前,布律恩是那样地不知礼节,竟不让公爵回到那里去。

当约克公爵对远征感到厌倦时,他就很明智地让自己的名字没没无闻一段时期,这对英军总司令部里的总司令来说是很普通的事。但是在这里,他也是领导一个每年花费人民 2 300 万英镑的部门,这个部门给了他以只受国王监督的充分权力,可以决定共约 12 000 名的参谋和其他军官中不论多少人的升降。

殿下不放过机会去做这样一些事情来赢得社会的十二万分的感激,比如发布一些规定所有士兵和军士都要剪除 queues〔辫子〕的文明通令;在他们的行装中增添一块海绵,用来保持头部清洁;规定向右看齐、向左看齐;快步走、慢步走;横列靠拢、横列流开;转弯和转向;英武地练枪;规定要剪发、穿黑色护腿套,保持武器和装具的清洁;用紧身坎肩来束紧约翰牛的宽大胸部,用奥地利式的头盔戴在他的愚蠢的脑袋瓜上,用难看的军大衣披在他宽阔的脊背上,——以及诸如此类的作为司务长学问的内容的

重要事情。同时，他在对科克伦·约翰斯顿上校进行的那场国内战争中，表现出了一个战略家和战术家的卓越才能。科克伦·约翰斯顿就是小皮特当时派去制止约克公爵向弗兰德胜利进军的那个军官。在 1801 年是西印度第八团（黑人）团长和多米尼加岛总督的约翰斯顿，由于这个团发生哗变而被召回英国。他对自己团队中在发生哗变时直接指挥团队的约翰·戈登少校提出控诉。这位戈登少校和公爵的秘书戈登上校同样是属于著名的戈登家族。这个家族出了许许多多伟人，如像搞出了一个阿德里安堡和约⁶的戈登，走过不少地方的阿伯丁赛恩以及他的同样著名的、在克里木表现得那么出色的儿子戈登上校。因此，约克公爵要报复的不仅仅是那个诽谤戈登家族的人，而主要是那个递送伤脑筋的急件的人。不管约翰斯顿上校怎样再三再四地要求，约翰·戈登直到 1804 年 1 月才到军事法庭受审，虽然法庭认为约翰·戈登的行为是非法的、轻率到了犯罪的地步，应当受到各种各样的谴责，然而约克公爵还是保留了他的全部薪饷以及他原来的军衔；可是约克公爵在 1803 年 10 月从晋升为陆军少将的名单中，把约翰斯顿上校的名字勾掉了。约翰斯顿看到这个名单上的一些资格比他浅的军官都被优先提升。约翰斯顿向公爵提出的申诉过了九个星期，在 1803 年 12 月 10 日才得到殿下的答复，说他的名字没有被列入应当晋升为将军的名单，是因为有人“对他提出了控诉，控诉的理由还没有查明”。约翰斯顿再也未能得到任何答复，直到 1804 年 5 月 28 日他才知道控诉他的就是戈登少校。约翰斯顿的案件从一个开庭期推延到另一个开庭期，因为审理他的案件的军事法庭一会儿到坎特伯雷去了，一会儿又到切尔西去了，直到 1805 年 3 月才开庭。法庭宣告约翰斯顿完全无罪，并恢复了他的名誉，于是

约翰斯顿请求重新把他列入晋级的名单，但是在 1805 年 5 月 16 日遭到殿下拒绝。6 月 28 日，一个福克斯集团⁷的成员费兹帕特里克将军在议会中宣称，对约翰斯顿的不公正态度“引起了全军极为强烈的不安”，为了维护约翰斯顿的利益，他建议议会在下次会议开始的时候，专门开一次会来处理这件事情。下次会议开始了，但当时成了陆军大臣的费兹帕特里克在大臣席上宣称，他将不提出他早先威胁说要提出来的那个建议。不久以后，这位陆军大臣，这位一生从未闻过火药味，从未见过敌人的人，这位在二十年以前就把自己连长职位卖了⁸、并且从此就没有服役过一天的人，被约克公爵派去当团长。这样一来，费兹帕特里克陆军大臣就必须听取费兹帕特里克团长的报告了。约克公爵就是用这样的军事巧计战胜了约翰斯顿团长，从而证明了自己的战略天才。

公爵虽然有一些在光荣的不伦瑞克王朝里禀受下来的迟钝，但他仍然是一个自有其机灵之处的人物。下面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是乔治三世的“家庭内阁”（密室家庭会议）的首脑，也是那个名叫“国王之友”⁹的皇党的首脑。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还有下面这件事：虽然他每年的收入有 61 000 英镑，但他还是想方设法以借款作幌子，从内阁榨取了 54 000 英镑，而且尽管有了这笔国家贷款，他还是设法不偿还他的私人债务。完成这样的功业，需要有真正敏捷的心机。既然大家都知道“高官厚禄吸引着许多人的眼光”，那就不难了解为什么格伦维耳政府并不感到难为情地建议殿下摆脱与其职务有关的某些次要职责，而这种摆脱，正如公爵花钱出版的一本小册子¹⁰伤心地指出的，会使总司令的作用

莎士比亚“量罪记”第四幕第二场（未用原话）。——编者注

简直化为乌有。应当指出，那个叫做亨利·配第勋爵的兰斯唐也就是这个政府的成员。这个政府威胁说要用一个军事会议来牵制光荣的将领，伪称，如果不派一批军官来协助没有经验的总司令，“国家”似乎就会灭亡。这个卑鄙的集团如此地逼迫公爵，甚至要求调查公爵在英军总司令部的活动。幸亏乔治三世出来直接干预，或者确切些说，下了命令，才制止了格伦维耳党的这个阴谋。乔治三世虽然是个尽人皆知的蠢人，但毕竟还有足够的智慧来了解自己儿子的才能。

在1808年，皇家统帅为勇敢精神和爱国心所驱使，硬要去担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英军的指挥。但是这时，群众普遍担心英国会在这样紧急的时刻失去这样一位将领在国内的效劳，这种担心表现得异乎寻常地喧嚷、不客气和几乎是不成体统。有人提醒公爵回忆他过去在国外的失败，劝他保存力量来对付国内的敌人，劝他当心遭到社会的仇恨。宽宏大量的公爵毫不考虑地叫人出了一本小册子，来证明自己仍然有权像在弗兰德和荷兰那样，在葡萄牙和西班牙被人打败。但是，唉！当时的“纪事晨报”¹¹写道：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人民，执政党和在野党，在看法上是完全一致的。”

一句话，关于公爵的任命的议论似乎要使英国发生一场真正的吵闹。例如，我们在当年伦敦的一家周报¹²上读到：

“不仅仅是在客栈里、咖啡馆里、集市上、大街上以及爱闲聊的人通常聚集的地方，都在谈论这个题目。这种谈论渗透到所有私人的家里，成了饭桌和茶几上必不可少的菜肴；人们在大街上互相招唤，停下来谈论约克公爵前往西班牙的事情；性急的伦敦人甚至在去交易所的路上也停下来打听约克公爵是否确实打算到西班牙去。何止于此！甚至在乡村教堂的走廊上，在平常谈论社会问题很少超出直接税范围的那些穿粗麻布短衫的政治家中，也可以

看到，十来个人几乎紧紧靠近一个讲话的人，打听《zarten if the Duke of York be a goeen to be zent to Spain》。”

所以很明显，尽管嫉妒公爵的那些诽谤者做了许多努力，但不可能把公爵往昔的功绩隐瞒起来，使世界无法知道。每个人在看到整个国家所考虑的只是如何能把公爵留在家里的时候，该感到多么快意啊！而公爵当然就只好让自己高贵的头脑做一番巨大的努力，来抑制自己的英武的热情，而安心地留在英军总司令部里。

我们在谈到他的伟大的一生中最光辉的时期以前，必须中断一下我们的叙述而指出，早在 1806 年，公爵父亲的忠臣们就对公爵做过充分的完全公开的评价。科贝特在自己的这一年的“政治纪事报”上写道：

“他仅仅是由于监阵脱逃，使英军蒙受耻辱而闻名。这个半痴半呆的人同时又是极端的卑鄙狡猾。他的同样著称的特点是，既有纯女性的软弱又有极毒辣的残酷，既傲慢而又卑鄙，既挥霍而又贪婪。他取得军权以后，就把托付给他的事业败坏了，并且利用自己的地位，无耻地掠夺用高薪托付他来保护的的人民。他预先收买和恫吓所有他认为可能会揭露他的人，于是放肆地干出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恶行，使自己遭到虽然是暗中的但却是普遍的憎恨。”

1809 年 1 月 27 日，沃德尔上校在下院提议“指派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总司令在军中有关晋级和调动的工作”。他在自己的一点也不客气的发言中，详细列举了他可以用来说明自己的提议的种种理由的所有事实，提出了他打算找来为自己提出的事实作证的所有证人的姓名，控诉现在的上院所崇拜的英雄，说他的一个叫做

“约克公爵是否确实打算到西班牙去”（方言）。——编者注

克拉克夫人的情妇拥有提升一切军官的特权，军中的调动也归她处理，她的影响扩展到军队司令部里的任命事项，她享有扩大国家武装力量的权利，从所有这些源泉中，她获得了一定的金钱报酬，总司令不仅是她的一切勾当的秘密参与者，不仅利用她的金钱来使自己少掏一些腰包，甚至除了克拉克夫人弄到的以外，总司令还企图亲自用她的方法来为自己个人谋取收入。简而言之，沃德尔上校断定，皇家统帅不仅靠不列颠的军队来供养自己的情妇，而且还让他的情妇来供养他自己。下院听取了这个提议后，决定传讯证人。传讯一直延续到2月17日，逐条逐条地对证了沃德尔上校的无礼诬告。结果证明，英军总司令部实际上不在白厅¹³，而在格罗斯特大街的克拉克夫人公馆里，她在那里有一座豪华的房子，有许许多多的马车，有整整一大批穿着仆役制服的侍从、乐师、歌手、艺人、舞者、食客和拉皮条的。皇家统帅自己本人的这个军事总司令部，是他在1803年建立的。虽然每年两万英镑也不足维持这样的住所的花销（除了这个住所外，在怀布里奇还有一座郊外公馆），但是，根据证人的证词确定，克拉克夫人每年从公爵私人腰包里得到的钱从来没有超过12 000英镑，这样一个数目只勉强够付仆役的工资和购买仆役的制服。其余的钱，克拉克夫人是靠做军官官衔证书的批发生意弄来的，这种证书现在要靠裙带关系才能得到。有人把克拉克夫人的价目表写好了交给下院。少校军衔通常的价格是2 600英镑，克拉克夫人只卖900英镑。大尉军衔她卖700英镑，而规定是1 500英镑，如此等等。在西蒂，甚至有一个按这样的低价出售军衔的特别事务所，这个事务所的主要代理人声称，他们是有权势的宠姬的受托人。每当她抱怨经济困难的时候，公爵就告诉她说，“她有比王后更大的特权，应当

加以利用”。有一次，有个人不愿同总司令的情妇签订一个可耻的合同，火气很大的总司令就把这个人的薪饷减少一半，以示惩罚。另一次，他攫取了一笔5 000英镑的款子。还有一次，由于克拉克夫人的坚决要求，他授予几个还在学校学习的小娃娃以尉官军衔，任命一些人当军医，但从不要他们停止私人业务而到自己的连队中去。有一个叫弗伦奇的上校从克拉克夫人那里得到一封“公函”，即一张授权给他招募5 000士兵入伍的文件。有人在下院谈到，公爵和他的情妇因为这件事进行了下面这段对话：

公爵：弗伦奇先生老是为这件招募的事来纠缠我。他总是来央求这样那样。他对你怎样？亲爱的！

克拉克夫人：很平常，不大好。

公爵：那就叫这个弗伦奇当心点，不然的话，我要立即同他算账，停止他的招募工作。

另外还提出了这位光荣的公爵的几封信，在信里，爱情的倾吐同军火买卖的问题混杂在一起，其中1803年8月4日的一封信开头是这样的：

“我找不到言词来向我最亲爱的，我的心肝表达你那宝贵而美好的信给我带来的快乐，或者说，我是多么强烈地感受到了你在信中向我表达的温存啊！我为此表示千万次千万次的感谢，我的天使。”

了解到公爵这种典型的风格以后，就不会奇怪为什么牛津圣约翰学院的大学者们会授予殿下以法学博士的文凭了。这对情侣并不满足于做军衔买卖，他们竟想到干起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教职任命买卖来了。

另外还弄清了一些同样值得光荣的不伦瑞克王朝后裔引以为荣的事情，例如一个姓道伯尔的军官是克拉克夫人多年的情夫，克

拉克夫人同道伯尔在一起，是想忘掉她同公爵在一起所感受到的忿恨、嫌弃和厌恶。

公爵的朋友们骂他的天使是“卑鄙无耻的女人”，为他们的五十来岁的、已结婚二十年的温柔青年辩解说，因为他有一种占据了整个身心的激情。但是，顺便说一句，这种激情并没有阻止住公爵在同克拉克夫人分居七个月后，就停止把他们约定好的每年的补助费付给她，并没有阻止住公爵在她纠缠不已地要求时，用示众和下牢来威胁她。正是这种威胁成了克拉克夫人向沃德尔上校揭露的直接原因。

要谈论下院各次会议及其种种肮脏的细节，或者评述英勇的公爵 2 月 23 日（1809 年）的恳求信（他在信中“以亲王的荣誉”郑重地向下院起誓说，连他的亲笔信所证明了的的东西，他也一点都不知道），那是枯燥无味的。只要引证弗格森将军在议院讲的话就够了，他说，“如果公爵留在自己的职位上，那就会影响全军的荣誉”。此外，还要补充一句，财政大臣派西沃先生在 3 月 20 日宣布公爵辞职，后来，议院就通过了奥尔梭普勋爵提出的决议案，决议案说“既然约克公爵殿下已经不再担任军队指挥，议院并不认为必须继续追究”，如此等等。奥尔梭普勋爵解释说，他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希望

“把公爵的辞职声明载入议院的会议记录，以表明公爵永远失去了国家的信任，因而他不应当希望在什么时候重新回到他原来的地位”。

为了嘉奖沃德尔上校大胆出来揭露公爵，人们纷纷向他表示感谢。大不列颠所有的郡、市、城、镇，都向他致意。

威尔士亲王（后来的乔治四世）摄政期间的最初行动之一，是在 1811 年恢复约克公爵的总司令职务。应当说，这个由于是人类

最渺小人物而被称做欧洲第一绅士的皇家的卡列班¹⁴，就他的整个统治来说，这第一个措施是极其典型的。

就是这个只配用粪堆来装饰其纪念像的约克公爵，被克兰里卡德侯爵称之为“杰出的总司令”，被兰斯唐勋爵称之为“大家都敬重的卓越人物”。这就是阿伯丁伯爵所谓的“用神圣的纪念像”来使之永垂不朽的那个人物。总之，这就是上院的守护天使。的确，信徒是无愧于自己的圣者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6 年 4 月 25 日
左右

载于 1856 年 4 月 26 日“人民报”
第 208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 1940 年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 1 期

卡·马克思 撒 丁¹⁵

萨瓦王朝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它靠在教皇党和保皇党人之间、在意大利各共和国和德意志帝国之间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而发迹兴起并扩大版图；第二个时期，它靠在法国和奥国之间的战争¹⁶中时而投到这一边，时而投到那一边而发展兴隆；最后一个时期，它竭力利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正如同它曾经利用各族人民与王朝之间的对立一样。在这所有三个时期中，模棱两可的态度是这个王朝的政策围绕着旋转的一个始终不变的轴心，自然，这种政策所得到的成果规模不会大，并且其性质也是极其可疑的。我们看到，在第一个时期末，与欧洲建立巨大的君主国的同时，萨瓦王朝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君主国。在第二个时期末，维也纳会议赏给了它一个热那亚共和国，而奥地利并吞了威尼斯和伦巴第，神圣同盟箝制了所有一切不管叫什么名字的第二流国家。最后，在第三个时期当中，皮蒙特得到许可出席了巴黎会议，起草了反对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的备忘录¹⁷，向教皇提出了英明的忠告，受到了奥尔洛夫的嘉许，它的颁布宪法的愿望得到了 coup d' état [政变] 的鼓励，而它的独霸意大利的美梦获得了那位曾经在 1848—1849 年如此成功地出卖过皮蒙特的帕麦斯顿¹⁸的支持。

对于撒丁的代表说来，以为立宪制度——而他们这时可以亲眼看到这种制度在大不列颠受尽煎熬，并且 1848—1849 年的革命已经暴露出它在欧洲大陆陷于破产的状况，证明了它既不能对付国王的刺刀，也不能对付人民的街头堡垒，——以为这种立宪制度现在不仅要庆祝它在皮蒙特舞台上的 *restitutio in integrum*〔完全恢复〕，而且甚至还要成为一支所向无敌的力量，这是极其荒唐的想法。这种想法只有小国家里的伟大人物才能产生。任何一位公平的观察家都会确信不疑：如果法国是一个大君主国，那末皮蒙特就必须安于做一个小君主国；如果法国是皇帝专制，那末皮蒙特的存在就至少要仰承这种专制的鼻息；如果法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那末皮蒙特的君主国就要消失并融化在意大利的共和国之中。撒丁君主国所赖以存在的条件本身就使它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它只有在欧洲停止革命、而法国到处是反革命横行的时代，才能扮演意大利的解放者的角色。在这种条件下，它可以设想自己作为唯一具有进步倾向、拥有本民族王朝和本民族军队的意大利国家，而把意大利的领导角色担当起来。但是这些条件又使它受到帝制法国和帝制奥国的压力。如果这两个毗邻的帝国之间发生激烈的摩擦，撒丁就必然会成为其中一方的附庸和双方的战场。而如果它们之间建立了 *entente cordiale*〔诚意协商〕的关系，它就必须满足于苟延残喘，即满足于暂时延缓自己的毁灭。依靠意大利的革命政党，对它说来简直就是自杀，因为 1848—1849 年的事件已经打消了关于这个政党的革命使命的任何幻想。这样，萨瓦王朝的希望是与欧洲的地位 *status quo*〔现状〕休戚相关的，但是欧洲的地位 *status quo* 却使皮蒙特不能在亚平宁半岛上扩大疆界，使它只能对意大利扮演比利时式的微贱角色。

因此,皮蒙特的代表企图在巴黎会议上重新下 1847 年的那局棋,只能显得相当可怜。他们在外交棋盘上所走的每一着,都是将他们自己的军。他们在激烈抗议奥地利对意大利中部的占领时,不得不只是很谨慎地涉及法国对罗马的占领¹⁹;他们在抱怨罗马教皇的神权政体时,不得不低头忍受教会长子的虚伪态度。他们不得不要求那位在 1848 年对爱尔兰那么亲切宽厚的克拉伦登给那不勒斯国王 讲授人道课,不得不要求凯恩、拉姆别萨和贝耳岛的狱卒²⁰开放米兰、那不勒斯和罗马的监狱。他们在宣称自己为意大利的自由战士的同时,奴颜婢膝地屈服于瓦列夫斯基对比利时出版自由的猛烈攻击,而且,还说这是由于自己深信,

“如果一个国家的报纸宣传极端的观点并且攻击邻国政府,那末这两个国家很难保持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

奥地利根据皮蒙特的代表对波拿巴教义的这种愚蠢的信仰,便立即坚决要求他们制止皮蒙特报纸所进行的反奥斗争和惩办这些报纸。

皮蒙特的代表一面假装他们在以各国人民的国际政策与各个国家的国际政策相对抗,同时又欣然缔结了一个恢复萨瓦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之间数百年友谊联系的条约。他们为了想在旧欧洲的代表面前施展自己的口才,不得不忍受奥地利的冷遇,被它看做不能讨论头等重要问题的第二流国家。当他们怀着极其满意的心情草拟备忘录的时候,奥地利得到许可,不顾维也纳条约的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斐迪南二世。——编者注

在 1856 年 5 月 3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这里印的不是“国家”,而是“王朝”。——编者注

规定，在撒丁从波河直到亚平宁山脉的整个边界上布置军队，占领帕尔马，在皮阿琴察建筑防御工事，并且在亚得利亚海沿岸，从费拉拉和博洛尼亚直到昂科纳，拉开它的军队。4月15日，即向巴黎会议提出这些控诉过了七天以后，法国和英国同奥地利签订了一项特别条约，它清楚地证明了备忘录使奥地利蒙受了多大的损失²¹。

这就是那个在自己的父亲在诺瓦拉战役中一败涂地并禅位之后²²当着义愤填膺的军队去同查理-阿尔伯特的死敌拉德茨基握手言欢的维克多-艾曼努尔的尊贵代表们在巴黎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如果皮蒙特不是故意视而不见，它现在就应该看到，正如它以前受到战争的愚弄一样，现在它受到了和约的愚弄。波拿巴准备利用它在意大利把水搅浑，并从浑水里钓上一顶王冠²³。俄国准备拍拍小小撒丁的肩膀，用意是要在南方惊扰奥地利，从而在北方削弱它。帕麦斯顿为了达到只有他自己了解的目的，准备重演1847年的喜剧，甚至连唱腔也懒得改换。但是尽管如此，皮蒙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外国列强手中的玩具。至于英国议会中的演说，布罗费里奥先生已经在撒丁的下院（他是下院的议员）中说过，“这些演说从来不是德尔斐的神谕，而是特罗芬尼的神谕”。他的错误只是把回声当成了神谕²⁴。

皮蒙特演的这幕插曲，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任何意义；它只表明，萨瓦王朝在执行祖传的随机应变的政策和再次企图使意大利问题成为它进行王朝阴谋的支柱方面，又遭到了失败。但是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虽然英国和法国的报纸都故意避而不谈，撒丁的代表却在他们的声名狼藉的备忘录中曾特别暗示过。奥地利的敌对态度（它是由撒丁代表在巴黎所采取的态度引起的）“使

撒丁不得不继续保持武装，不得不采取对于那已因 1848—1849 年的事件和它所参加的战争而陷于枯竭的财政说来负担极重的措施”。但是，还不止于此。

撒丁的备忘录²⁵说道：“民众的骚动近来似已平息。意大利人看到他们本民族的国君之一与西方大国结成联盟……于是抱着希望，以为他们所受的灾难未得到安抚以前，不会签订和约。这个希望使他们变得平静和驯服；然而一旦他们得悉巴黎会议的消极结果，一旦他们知道奥地利不顾法英两国的善意斡旋和友好调停，甚至反对进行讨论……那末，毫无疑问，暂时平息的怒火将会比过去更猛烈地燃烧起来。意大利人看到再不能对外交寄予任何期望，就会带着南方人所固有的火气重新投身到富有破坏性的革命政党的队伍中去，意大利又会成为阴谋和骚乱的中心，当然可以采取加倍严厉的手段把这些阴谋和骚乱镇压下去，但是只要欧洲稍有骚动，它们又会异常猛烈地发作起来。皮蒙特周围所有各国中革命热情的觉醒——这种革命热情由于它所产生的原因而能够博得民众的同情——将使撒丁政府遭遇到异常严重的危险。”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在战争期间，伦巴第的富裕资产阶级可以说曾经屏住呼吸作过无谓的希望，以为在这场战争结束以后，他们能够通过外交活动和萨瓦王朝的庇护获得民族解放或公民自由，而不必涉越红色的革命海洋，不必对农民和无产阶级作出让步；他们根据 1848—1849 年的经验已经知道，对这种让步的要求已经成为任何民众运动不可分割的部分了。但是这回他们的贪图安乐的希望破灭了。这场战争唯一显著的结果，至少是意大利人的眼睛唯一可以看到的，就是奥地利在物质方面和政治方面得到了优势，也就是说，这个可恨的国家由于一个所谓独立的意

大利国家的合作而重新得到了巩固。皮蒙特的立宪派又摸到了好牌，但是他们又把它输掉了；他们又确信自己不能扮演他们曾如此大声要求的意大利领导者的角色。他们自己的军队将要求他们作出交待。资产阶级又得求助于人民的支持，并且把民族解放和社会复兴说成一回事情。皮蒙特的恶梦结束了，外交的魔力消散了——革命的意大利的那颗火热的心又开始更有力地跳动起来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6 年 5 月 16 日左右

载于 1856 年 6 月 17 日“人民报”第 211 号，署名：卡·马·
并载于 1856 年 5 月 3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717 号，没有署名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并根据“纽约每日论坛报”校对过

卡·马克思

法国的 CR EDIT MOBILIER

(第一篇论文)

从伦敦“泰晤士报”²⁶5月30日的社论中可以看出，该报因发现社会主义在法国从未消失，而近几年来“确切些说是被遗忘了”，感到非常惊讶。“泰晤士报”谈到这点时，趁机庆贺英国没有这种祸患之忧和庆贺它没有供有毒植物生长的阶级对抗。这种话竟出自这样一个国家的一家主要报纸，是够大胆的，因为该国的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李嘉图先生在他的一本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名著 27 中，一开始就谈到，社会（就是英国社会）的三个主要阶级，即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彼此处在你死我活的和不可调和的对抗之中，因为地租的提高和降低同工业利润的提高和降低成反比，而工资的提高和降低又同利润成反比。按英国法学家的说法，三种敌对力量的均势构成英国宪法这个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基石，按李嘉图先生（大概他对这点比“泰晤士报”要懂得稍微多一些）的说法就是，英国社会的整个制度充满着作为生产的主要动力的三个阶级的你死我活的对抗性。

“泰晤士报”一面轻蔑地嘲笑法国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一面又情不自禁向法国的皇帝的社会主义 投射出贪婪的目光，并且欣

见本卷第 27 页。——编者注

然把它提供给约翰牛作为仿效的榜样，因为该报刚刚收到了这种社会主义的主要先驱 Cr édit Mobilier²⁸寄来的密密麻麻三栏的通告，即“董事会在 1856 年 4 月 23 日向贝列拉先生主持的定期股东大会提出的报告书”。这个使“泰晤士报”的股东馋涎欲滴和使它的编辑眼花缭乱的报告书如下：

负 债

1855 年 12 月 31 日

	法 郎	生 丁
公司资本	60 000 000	00
活期存款余额从 1854 年 12 月 31 日的		
64 924 379 法郎增至	103 179 308	64
应付债权人期票金额和其他账目	864 414	81
后备资本	1 696 083	59
1855 年收入的利润（拨作后备资本的 除外）	26 827 901	32
<hr/>		
总 计	192 567 708	36

资 产

	法 郎	生 丁
现有：1. 无期公债	40 069 264	40
2. 债券	32 84 600	20
3. 铁路股票和其他股票	59 431 593	66
<hr/>		
总 计	132 345 458	26
该数应当减去 12 月 31 日以前不能提取 的数目	31 166 718	62
<hr/>		
资产余额	101 178 739	64

	法 郎	生 丁
定期国库债券、延期国库债券、以股票和 债券等作抵押的贷款	84 325 390	09
房屋和家具的价值	1 082 219	37
现金库存和 12 月 31 日应收入的股息	5 981 359	26
<hr/>		
资产总额	192 567 708	36
1854 年 12 月 31 日无期公债、股票和债 券的总额	57 460 092	94
1855 年上列项目认购和购买的数额	265 820 907	03
<hr/>		
总 计	323 280 999	97
已实现的 217 002 431 法郎 34 生丁 加上现有的有价证券 132 345 458 法郎 26 生丁	349 347 889	60
<hr/>		
由此得到的利润	26 066 889	63

以 6 000 万的资本取得整 2 600 万的利润，就是说利润为 $43\frac{1}{3}\%$ ，——这的确是一个诱人的数字。还有什么事情是这个神奇的 Mobilier 用自己的大约 1 200 万美元“巨额”资本所没有做过的呢！手里有 6 000 万法郎，起先它认购了 25 000 万法国公债，后来又认购了 37 500 万；它取得了法国主要铁路的股份；它根据同奥地利国家铁路公司签订的合同发行了债券；它是瑞士西部铁路和中部铁路的股东；它参与了建造从萨拉哥沙到地中海的埃布罗河流域的运河大工程。它插手于合并巴黎公共马车企业的工作和建立海事总公司的工作；在它的干预下巴黎所有老的瓦斯公司合并成了一个企业；据它自己说，它给人民送了一份价值 50 万法郎的

礼物，因为它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售给了人民一批粮食；它通过自己的债券来决定和平与战争的问题，建立新的铁路和支持老的铁路，为城市装设照明，刺激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投机，最后，把自己的势力扩充到国外，把这类机关的能结丰硕果实的种子撒遍整个欧洲大陆。

可见，Crédit Mobilier 是现代最不寻常的经济现象之一，应当最认真地加以研究。没有这种研究就既不可能判明法兰西帝国的前途，也不可能理解在整个欧洲出现的普遍的社会震荡的症状。首先，我们要研究董事会称之为自己的理论原则的东西，然后再来检验它们在实践中是如何实现的。报告书中说，到目前为止，这些原则只是部分地得到了实现，但是将来它们会得到无比宽广的发展。

这个公司的原则在它的章程中和向股东提出的许多报告书中，主要是在章程中，都已阐明。根据章程的引言，

“鉴于创办一个旨在鼓励发展公共事业和把一切企业的各种有价证券合并成一个共同的基金，从而使这些有价证券的兑换也得以实现的这样的公司可以提供重要的服务，Crédit Mobilier 的创办人决定实现一个非常有益的计划，因此联合起来创立一个叫做 Crédit Mobilier 总公司的匿名公司。”

我们的读者应当注意到，法国人把“匿名公司”一词理解为股东责任有限股份公司，并且这种公司的成立要看政府是否酌情赏赐特许权。

可见，Crédit Mobilier 的第一宗旨是“鼓励发展公共事业”，这就是说，公共事业的发展完全由 Crédit Mobilier 来裁夺，从而也就是由波拿巴个人来裁夺，因为这个公司存在与否要以他的意志

为转移。董事会没有忘记指出，它打算用什么方法来扩大它和它的强大的创造者对法国整个工业的保护。属于各股份公司的各种工业企业是由各种有价证券——股票、债票、本票、债券等代表着的。当然，这些各种各样的证券都根据投在它们身上的资本，根据它们带来的利润，根据它们的不同的供求关系以及其他的经济条件，在金融市场上有不同的价格。

Crédit Mobilier 要求的究竟是什么？不过是以 Crédit Mobilier 自己发行的单一的股票来代替各种股份公司发行的所有各种有价证券。但是它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办法就是 Crédit Mobilier 用发行自己的股票或其他证券而得来的资金去收购各种工业企业的有价证券。但是，收购一切本票、股票、债券等等，——一句话，即某个企业的全部有价证券，这就等于购买了企业本身。因此，Crédit Mobilier 公开承认，它打算使自己变成法国各种工业的所有者，使小拿破仑²⁹变成最高董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皇帝的社会主义。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当然必须有金融业务；伊萨克·贝列拉先生在拟定 Crédit Mobilier 的活动计划的时候，自然感到基础不牢靠而不得不向公司提出一定的限制，他把这些限制看成纯粹是偶然的，打算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加以取消。公司资本定为 6 000 万法郎，分为 12 万股，每股 500 法郎。公司所有的业务，正像章程中规定的，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为支持工业所必需的业务；第二类是发行公司的有价证券来代替或者转换各种工业企业的有价证券；第三类是办理国家证券、商业期票等的一般银行业务。

第一类业务目的是建立公司对工业的保护，这在章程第五条

中已经载明，条文如下：

“认购或购买作为匿名公司的各种已经在发挥职能或将要建立的工业企业或信用机关，特别是铁路、运河、矿场和其他公共事业企业的国家证券、股票或债券。负责发行和派销各种公债，以及向一切同公共事业有关的企业拨款。”

我们看到，这一条已经超出了章程引言中所阐明的要求，因为这一条不仅想把 *Crédit Mobilier* 变成这类大的工业企业的所有者，而且还想把它变成国库的仆役和商业信用的统治者。

第二类业务是以 *Crédit Mobilier* 发行的有价证券去代替其他一切工业企业的有价证券，其内容如下：

“发行公司自己的债券，发行量应同认购公债和购买工业有价证券的数目相等。”

第七条和第八条规定了公司有全权发行的债券的限额和性质。这些债券或本票

“可以达到超过资本 9 倍的数额。它们总是应当完全用公司现有的国家证券、股票和债券来偿付。这种证券只有在 45 天以前预先通知才能给以支付。接受的活期存款和发行的期限在一年以下的债券的总数不得超过已实现的资本的一倍”。

最后，第三类业务是有关商业证券的流通的。“公司接受活期存款”。它有权“出卖各种属于它的国家证券、信贷凭证、股票和债券或者用它们偿付公债以及换取其他证券”。它发放以“国家证券、股票和债券”为抵押的贷款“和开设存上述各种证券的往来户”。它向匿名公司提供私人银行通常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如接受一切支付款记入这些公司的户头，代这些公司发股息、利息等等。它接受工业企业的有价证券作为存款，至于同商业证券、期票、栈

单等有关的业务，曾“特此声明，公司不得为赚取贴水而进行秘密买卖”。

卡·马克思写于 1856 年 6 月 6 日左右

载于 1856 年 6 月 7 日“人民报”第 214 号，署名：卡·马·

并载于 1856 年 6 月 2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735 号，没有署名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并根据“人民报”校对过

卡·马克思

法国的 CR EDIT MOBILIER

(第二篇论文)

应该提醒一下,波拿巴发动 coup d'état(政变)时曾经凭借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口实:一方面,他宣布他的使命是使资产阶级和“经济秩序”避免似乎在1852年5月一定会出现的红色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是使劳动人民摆脱集中表现为国民议会的资产阶级专制制度。此外,他必须偿清他本人所欠的债务以及十二月十日会³⁰的那批威风凛凛的恶棍所欠的债务,并且使他自己和这批恶棍靠牺牲资产阶级和工人两方面的利益大发横财。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个人的使命充满着互相矛盾的困难,因为他不得不同时既扮演强盗,又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他要是不掠夺这两个阶级,就不能满足他本身及其党羽的需要。在弗伦特运动³¹时期,吉兹公爵被称为法国的最该受感激的人,因为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变成了他的党徒所持有的债券。波拿巴也想成为法国的最该受感激的人,办法就是把法国的全部财产和整个工业变成路易·波拿巴自己所持有的私人债券。窃取法国,然后去购买法国,——这就是这个人需要解决的大问题,而在这种先从法国攫取一些东西,然后再把它归还给法国的过程中,对他说来,相当重要的还是他本人和十二月十日会从中能够取得的利息。怎样才能使这些互相矛盾

的要求协调一致呢？怎样才能解决这个微妙的经济问题呢？怎样解开这个难解之结呢？波拿巴过去所积累的各方面的经验指出了——信用。正巧在法国出现了圣西门学派，这个学派在产生和衰落的时期都沉湎于一种幻想，以为随着普遍的幸福生活的到来，一切阶级矛盾就必定会消失，而这种幸福生活是可以靠某种新发明的社会信贷计划获得的。在 coup d'état 时期，这种类型的圣西门主义还没有彻底死亡。曾经有个米歇尔·舍伐利埃，“辩论日报”³²的一位经济学家；有个蒲鲁东，他企图用奇形怪状的假面具掩盖圣西门学说中最坏的部分；还有实际上同证券投机和路特希尔德都有关系的两个葡萄牙的犹太人，他们有一个时期是安凡丹天父的信徒，他们凭着自己的实际经验敢于透过社会主义认出证券投机，透过圣西门认出罗。这两个人——艾米尔·贝列拉和伊萨克·贝列拉都是 Cr édit Mobilier 的创办人和波拿巴社会主义的倡始人。

有句俗话说：《Habent sua fata libelli》〔“书有自己的命运”〕。和书一样，学说也有自己的命运。圣西门成了巴黎交易所的庇护天使，欺诈行为的先知，普遍营私舞弊的救世主！也许除了在 juste-milieu〔中庸〕者——基佐身上体现出圣茹斯特，在路易·波拿巴身上体现出拿破仑以外，历史上再也找不到更为辛辣的讽刺了。

人的思想跟不上事变的进程。当我们研究了公司的原则和经济情况，指出 Cr édit Mobilier 结构本身预示破产不可避免的时候，历史已经在实现我们的预言了。5月底，Cr édit Mobilier 的董事之一、拥有 1 000 万法郎产业的普拉斯先生破产了。只不过在这件事发生的几天以前，他还作为 dieux de la finance〔财神〕之一，“被莫尔尼先生介绍给皇帝”。Les dieux s'en vont！〔财神走了！〕

几乎就在当天，“通报”33 公布了关于 sociétés en commandite（两合公司）的新法令，这项法令似乎是为了抑制投机狂而让这些公司听任 Crédit Mobilier 支配，使它们根据政府或 Crédit Mobilier 的意志来建立。而英国报刊甚至不知道 sociétés en commandite 和 sociétés anonymes（匿名公司）之间存在着区别，不知道前者就是后者的牺牲品，竟对这种波拿巴式贤明的伟大的“理智行为”备加赞扬，并设想法国的投机家不久也会具有英国的萨德勒、斯佩德尔和帕麦尔那样的稳健。与此同时，著名的 Corps Législatif（立法团）刚刚颁布的土壤改良法，就直接违反拿破仑过去的一切法律和法典，准许剥夺以不动产作抵押的债务人以利于波拿巴政府，后者就是想通过这种狡猾手段来霸占土地，正像它通过 Crédit Mobilier 来霸占工业，通过法兰西银行来霸占法国商业一样。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财产不受社会主义的威胁！

同时，我们认为，继续分析一下 Crédit Mobilier 这个机关并不是多余的。我们想，这个机关必定还会显示出巨大的成绩，上述一切同这些成绩相比，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开端。

我们知道，Crédit Mobilier 的基本任务就是，保证以资本供给属于匿名公司的工业企业。让我们引用伊萨克·贝列拉先生报告书中的一段话：

“Crédit Mobilier 对于代表工业资本的有价证券所起的作用，类似贴现银行对于代表商业资本的有价证券所发挥的职能。这个公司的第一个职责就是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帮助那些靠自力而有很大困难的大企业建立起来。它的使命之所以比较容易完成，是因为它拥有私人所得不到的各种通报和调查材料，来正确估计向它求助的企业的实际情况或发展前途。在繁荣时期，我们的公司将导致资本找到能够盈利的场所；在困难时期，它的任务是用大量的资金来维持工人就业和缓和由于资本迅速缩减而引起的危机。我们的公司

将努力把自己的资本投入一切企业,只是投资额和限期要使公司能够不经受风险而收回自己的资本,这种努力使公司有可能用增加 *partial commandités* 股票上的投资 的办法来增加自己的业务,在短期内使大量企业获得成效,以及减少自己合作的风险。”

了解到伊萨克怎样发展波拿巴的思想以后,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再看一看波拿巴怎样评论伊萨克的思想。这一评论可以在内务大臣 1854年6月21日向波拿巴呈递的关于 *Cr edit Mobilier* 的活动和管理原则的报告中找到:

“在世界上现有的一切信用机关中,法兰西银行被公正地认为是那种可誉称为最稳固的组织。它是如此稳固,如果没有赖德律-洛兰之流的支持,甚至连1848年小小的二月风暴在一天内就能把它刮倒。临时政府不仅规定了法兰西银行可以暂不履行以硬币支付其银行券的义务,从而使挤满通往该行各条街道的银行券和本票持有者向后转,而且还授权该行发行票面价值为50法郎的银行券,虽然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从来不准它发行票面价值在500法郎以下的银行券。这样一来,政府不仅以自己的信用弥补了这家银行的无支付能力的现象,而且还把国家森林抵押给它以取得国家接受贷款的特权。法兰西银行既是我国商业的支柱,同时又是它的向导,它的物质影响和道义影响为我国市场创造了极为宝贵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就是,每当美国和英国商业上只不过出现小小的破产的时候,法国人都会遇到周期性的工业危机。由于在一切业务中以谨慎和明智作方针,这个卓越的机关也就起着调节者的作用。但是商业天才首先需要鼓励,才能创造出他所孕育的一切奇迹。正因为法国投机活动受到极严格的限制,除了法兰西银行以外,再根据另一种根本不同的思想建立一个在工商业范围内应当体现出主动精神的机关,不但没有任何不便之处,相反地,倒有很大的优越性。

这种机关幸好已经有了榜样。做出这一榜样的是那个在一切商业业务上以一丝不苟、明智和稳健著称的国家。尼德兰总公司用自己的资本、自己的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 里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培尔西尼。——编者注

信用和自己的道义威望为一切健康的思想和一切有益的事业服务，它在荷兰扩大了运河网，进行了土壤改良工作，采取了成千项其他改良措施，以便其财产价值增加几百倍。为什么法国就不能同样借助这个已被了不起的经验证实确为优越的机关来得到好处呢？这就是根据 1852 年 11 月 18 日的法令建立 *Crédit Mobilier* 的想法。

根据章程规定，除了其他业务以外，该公司还可以买卖国家机关和公法机关的有价证券或工业股票，以它们作抵押品来贷款和借款，包销国家公债，简单地说，就是发行本公司的长期债券，数量同用这种办法得到的有价证券相等。

可见，公司拥有在有利条件下用来吸收和随时集中大量财富的手段。这一机关的活动的成效如何，就要看这些资本的使用是否得当。的确，公司可以酌情对工业进行投资（*commanditer*），取得不同企业的股份，参加长期业务，也就是说，去做法兰西银行和贴现银行的章程禁止各该银行做的一切事情。总之，公司的行动是自由的，并且可以根据商业信用的需要改变它的活动方向。如果它善于从经常出现的企业中辨明哪些企业可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如果它能及时利用它所支配的巨额资金，来帮助完成那些本身极能生利但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否则就会半途而废的工作，如果它的合作确实表明思想是有益的或者计划是得当的，那末，*Crédit Mobilier* 就应当受到而且一定会受到普遍的称赞，游资将会大量流向那些靠公司保护而能得到最可靠的使用的渠道。可见，这个公司之所以成为实现各种社会有益思想的参加者，是因为实例和威信比任何物质帮助更会使公司的任何支持具有吸引力。它将用这种办法有力地推动工业的发展，并且处处刺激发明精神。”

我们一有机会就竭力设法指出，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怎样勉强地遮掩着一个普普通通的计划：使法国的整个工业卷入巴黎交易所的漩涡，并把它变成 *Crédit Mobilier* 的先生们及其保护人波拿巴手中的网球。

卡·马克思写于 1856 年 6 月 12 日左右
载于 1856 年 6 月 2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737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法国的 CREDIT MOBILIER

(第三篇论文)

日益逼近的波拿巴财政破产的迹象继续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5月31日,蒙塔郎贝尔伯爵在反对提高一切印刷品、书籍等的邮费的法案时,发表了下列听来惊慌不安的演说:

“任何政治生活都受到压抑,但代替它的是什么呢?投机之风。伟大的法兰西民族不能让自己沉眠不醒,毫无作为。代替政治生活的是投机的狂热、追求利润的欲望,对有价值证券买卖的迷恋。每个地方,甚至在我们的小城市,甚至在我们的乡村,人们都害了牟取暴利狂(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暴利是无需忙碌奔波、不要花费力气并且往往是用卑鄙的手段取得的。除了你们刚才拿到的反对 *sociétés en commandite* [两合公司] 的法案以外,我用不着再找什么其他证据了。这个法案刚刚发来,我还没有时间把它读完,但是我愿意支持它,尽管在我看来里面有若干条例太严酷了。如果用药的确如此必要,并且下药又得如此之重,那末,应当认为病情是不轻的。这种疾病的真正原因就是,法国的一切政治思想都沉寂了……但是,我这里所指的疾病,并不是由同一个原因产生的唯一恶果。当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这些老的政治阶级醉心于投机活动时,另一种活动便在社会的中层阶级中间开展起来,他们的运动产生了几几乎是法国所经历的一切革命。有价值证券买卖把几乎整个法国变成了一个大赌场。当一部分受到社会主义者影响的人看到这种可怕的迷恋于有价值证券买卖的景象时,他们也空前地被牟取暴利的欲望腐蚀了。因此,秘密公司显然增加了,那种自称为社会主义其实可以说是败坏社会主义的疯狂的激情更加强烈和加深了。不久以前在巴黎、翁热和其他地方的审判案中,这

种激情就曾强烈地表现出来。”

这就是波拿巴商行的最早的股东之一蒙塔郎贝尔为了维护秩序、宗教、财产和家庭而说的话！

我们从伊萨克·贝列拉那里听说，Crédit Mobilier 的秘密之一就是这样一个原则：增加自己的业务和减少自己的风险，办法是参与各种各样的企业和尽快地退出这些企业。但是，如果揭开圣西门主义的华丽辞藻的外衣，这个原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广泛地收买股票，用它们进行大量的投机活动，在赚取贴水以后，尽快地把这些股票抛售出去。这就是说，工业发展的基础应当是有价证券买卖，或者更确切些说，一切工业活动只应当是证券投机活动的借口。Crédit Mobilier 用什么工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有什么方法能使它“增加自己的业务”和“减少自己的风险”呢？那就是罗所用的方法。因为 Crédit Mobilier 是得到政府支持和拥有比较大量的资本和贷款的享受优待的公司，毫无疑问，它所建立的每一个新企业的股票刚一发行，在市场上就能赚到贴水。Crédit Mobilier 从罗那里学会了在自己的股东中分配新股票的办法，即其票面价格同这些股东在母亲公司中所拥有的股票数量成一定比例。用这种办法保证这些股东得到的利润，首先影响到 Crédit Mobilier 本身的股票价值，而这些股票的行市高，就保证新发行的股票价值也高。Crédit Mobilier 就是用这种办法来监督用于工业企业投资的相当一部分借贷资本。

总之，除了获取利润是 Crédit Mobilier 的活动围着转的真正轴心以外，它的目的显然是用同商业银行的业务完全相反的方法对资本发生作用。商业银行用贴现、贷款和发行银行券使固定起来的资本暂时得到自由的运用，而 Crédit Mobilier 实际上是把游

资固定起来。例如，铁路股票可以非常自由地流通，但是这些股票所代表的资本，即投放在铁路建设上的资本却是固定的。如果厂主在购置厂房和机器设备方面投放的那一部分资本和用于支付工资和购买原料的那一部分资本不相适应，他就不得不马上关厂。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几乎现代每一次商业危机都同游资和固定起来的资本之间应有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有关。这样说来，像 Cr édit Mobilier 这样的机关，既然它的直接目的是尽量把国内的借贷资本固定起来，投放到铁路、运河、矿山、船坞、轮船、冶金工厂和其他工业企业，而不考虑国家的生产能力，那末它的活动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Cr édit Mobilier 的章程规定，它只能保护那些由匿名公司或股份公司经营的工业企业。结果必然会产生一种倾向，即尽量多地建立这种公司并且使一切工业企业具有这种公司的形式。当然，不能否认，在工业上运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一方面，它显示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并且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所不能及的规模；另一方面，不应当忘记，在股份公司中联合起来的不是单个人，而是资本。由于这一套做法，私有者变成了股东，即变成了投机家。资本的积聚加速了，其必然结果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破产也加速了。特种工业巨头出现了，他们的权力同他们的责任则成反比，因为他们只对他们所有的那一大宗股票负责，而支配的却是公司的全部资本。他们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成员，而大多数股东却不断地变更。工业巨头依靠该公司的影响和财富，能够收买个个别不安分的人。在寡头董事会之下的，是由进行实际工作的公司管理人员和职员组成的官僚集团，而直接在他们之下的，是大量的、与日俱

增的普通雇佣工人。随着雇佣他们的资本数量的增加，他们的依赖程度和孤立无援的程度也相应地加深，但是随着代表这种资本的人数的减少，他们也越来越具有危险性。傅立叶不朽的功绩在于，他预言了这种现代工业形式，把它称为工业封建主义³⁴。毫无疑问，伊萨克·贝列拉先生也罢，艾米尔·贝列拉先生也罢，莫尔尼先生也罢，波拿巴先生也罢，都不能发明工业封建主义。在他们以前的时代，也有向工业股份公司进行贷款的银行。至于他们所发明的则是力图把私人高利贷者早先分散的和名目繁多的活动垄断起来的股份银行，其指导原则应当是建立大量的工业企业，不是为了进行生产上的投资，而只是想取得投机利润。他们所想出来的新思想，就是把工业封建主义变成证券投机的纳贡者。

根据章程，Crédit Mobilier 的资本定为 6 000 万法郎。同一章程准许公司接受活期存款的寄存代付金，总数可以大于资本的一倍即 12 000 万法郎。因此，受公司支配的款项共有 18 000 万法郎。同实现保护法国整个工业的大胆计划相比，这当然是很不大的一个数字。但是这笔款项的三分之二——正因为它是一经提取就必须归还的——未必可以用来购买工业股票或那些还不能保证能否立即推销出去的债券。由于这个原因，章程为 Crédit Mobilier 开辟了另一个门路。章程准许公司发行总数大于原始资本 9 倍即 6 亿法郎的债券，换句话说，以贷款给全世界为己任的机关，有权作为拥有大于它的资本 9 倍的债务人在市场上出现。

贝列拉先生说：“我们的债券共有两种。一种是短期的，它应当同我们各种暂时的投资额相适应。”

我们在这里对这种债券是不感兴趣的，因为根据章程第八条，发行这种债券的目的，只是要补足应当从活期存款得来的并且过

去也完全是这样得来的 12000 万法郎所不足的数额。至于另一种债券，

“它们的支付期限很长，应当用赎回的办法来清偿，并且应当同我们在国家证券方面或工业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方面的投资额相适应。根据作为我们团体的基础的资金制度，这些有价证券不仅要有在政府监督下得来的相应数额的基金（由于采用互惠原则，这个数额将充分给予补偿和分担风险等优待）作保证，此外，还要有为此目的我们已经增加了相当数目的资本作担保”。

可见，Crédit Mobilier 的这种债券纯粹是仿效铁路本票，即在一定期限内和在一定条件下应当赎回并能带来固定利息的债券。但是也有区别。铁路本票常常以铁路本身作抵押来担保，而 Crédit Mobilier 的债券以什么来担保呢？Crédit Mobilier 是用自己的债券买来无期公债、股票、债券以及诸如此类的工业公司的证券作担保的。这样说来，发行债券究竟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得到 Crédit Mobilier 的债券应付的利息同公司放款取得的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的利息之间的差额。为了使这项业务十分有利可图，Crédit Mobilier 应当把发行债券所得的资本投放在能够取得最多收入的地方，即投放在价格波动和变化很大的股票上。因此，公司的债券主要由该公司所创建的那些工业企业的股票来担保。

因此，铁路本票至少有比它大一倍的资本担保，而 Crédit Mobilier 的债券只有票面额同它相等的资本担保，但是每逢证券交易所的行市下降时，这种资本也必定缩小。由此看来，这些债券的持有者要分担股东的全部风险，却不能分享他们的利润。

上年度的报告书说：“但是，债券的持有者不仅有它——即 Crédit Mobilier 以放款进行的投资作担保，而且有它的原始资本作担保。”

对 12 000 万法郎存款负担担保之责的 6 000 万法郎的原始资

本，除了或许必须向 Cr édit Mobilier 有权创建的无限量的企业提供担保以外，它还应当作为 6 亿法郎的债券的担保。如果公司能够把所有的工业公司的股票都换成它自己的债券，那末，它的确会成为法国整个工业的最高指挥者和所有者，而许多过去的所有者则像拿年金似的得到同债券利息相等的固定收入。但是，在实现这一目的的道路上，由于上述经济条件而随之发生的破产，会使厚颜无耻的冒险家受到阻碍。其实，Cr édit Mobilier 的真正创办人并不是看不见这种小小的不愉快的事情，相反地，他们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当破产发生的时候，当它涉及许许多多法国人的利益的时候，波拿巴政府就像英国政府在 1797 年干涉英格兰银行的事务³⁵一样，有似是而非的理由去干涉 Cr édit Mobilier 的事务。法国的摄政王，路易-菲力浦的可尊敬的先辈，曾企图把国家债券换成罗的银行的债券以摆脱国家的债务，路易·波拿巴这位皇帝社会主义者则企图把 Cr édit Mobilier 的债券换成国家债券以掌握法国工业。是不是他比 Cr édit Mobilier 更有支付能力呢？问题就在这里。

卡·马克思写于 1856 年 6 月底
载于 1856 年 7 月 11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475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 西班牙的革命

“亚细亚号”轮船昨天带来的消息，虽然比我们先前得到的报道近了三天，但是其中并没有什么东西表明西班牙的内战会很快结束。奥当奈尔的 coup d' état [政变] 虽然在马德里获得了胜利³⁶，可是还不能说已经最后成功。法国的“通报”最初把巴塞罗纳的起义描写成一场简单的骚动，现在不得不承认“那里的冲突非常激烈，但是女王的军队的胜利可以认为是有保证的”。根据这家官方报纸的说法，巴塞罗纳的战斗从7月18日下午5时到7月21日下午5时，持续了整整三天，据说“暴动者们”在这以后被赶出了他们所在的街区，逃往乡村，并受到骑兵的追击。然而人们断言，起义者仍然掌握着卡塔卢尼亚的若干城市，包括赫罗纳、拉忠克腊和一些较小的地方。同时据称，木尔西亚、瓦伦西亚和塞维尔已经发动了反对 coup d' état 的 pronunciamientos [兵变]；潘普洛纳警备部队中被该城行政长官派去进攻索里亚的一个营，已经在途中宣布反对政府，并前往参加萨拉哥沙的起义；最后，在萨拉哥沙，在这个从一开始就为人所公认的抵抗中心，法尔孔将军检阅了16 000人的基干部队，他们受到15 000人的国民军以及郊区的农民的支援。

无论如何，法国政府认为西班牙的“暴动”还没有被镇压下

去，波拿巴决不以派出几营军队陈兵边境为满足，他已经命令一个旅向比达索阿河前进，这个旅正由来自蒙彼利埃和土鲁斯的增援部队补充成一个师。此外，根据7月23日直接从普伦贝尔发出的命令，大概还直接从里昂军团调派了另一个师，这个师现在正向比利牛斯山前进；到现在，在比利牛斯山已经集结了25 000人的整整一个 *corps d'observation* [观察兵团]。如果反对奥当奈尔政府的力量能保持住自己的阵地，如果他们能进行足够有力的抵抗，以致使波拿巴陷入对比利牛斯半岛的武装侵略之中，那末马德里 *coup d'état* 就可能成为巴黎 *coup d'état*³⁷ 的崩溃的信号。

就一般的情节和 *dramatis personae* [剧中人物] 而论，这次1856年的西班牙阴谋，看来不过是1843年的类似的企图³⁸ 的重演，自然有一些微小的改变。那时，和现在一样，伊萨伯拉在马德里，而克里斯蒂娜在巴黎；路易-菲力浦，和今天的路易-波拿巴一样，从土伊勒里宫对运动进行指挥；一边是埃斯帕特罗及其 *ayacuchos*³⁹，另一边是奥当奈尔、塞拉诺、孔查以及那时是在前台而现在则在幕后的纳尔瓦艾斯。1843年，路易-菲力浦由于同蒙尼奥斯夫人解决了西班牙王室的婚姻问题⁴⁰，便由陆路送出了两百万金币，由海路送出了纳尔瓦艾斯和他的伙伴们。而波拿巴——他或许已经解决了他的堂弟拿破仑亲王和一位蒙尼奥斯小姐的婚事，或者他无论如何都必须继续以模仿其伯父作为自己的使命，——则是这次西班牙 *coup d'état* 的同谋犯，可以表明这一点的，不仅是“通报”在上两个月当中对于加斯梯里亚和纳瓦腊的共产党人密谋发出的狂暴攻击；不仅是法国驻马德里大使杜尔哥先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生(此人在波拿巴自己的 coup d'état 时期曾担任他的外交部长)在这次 coup d'état 前后和 coup d'état 期间的所作所为;不仅是波拿巴的姻兄弟阿尔巴公爵在奥当奈尔获得胜利后立刻出来担任马德里的新 ayuntamiento[地方自治机关]的主席;不仅是老亲法派分子罗斯·德·奥兰诺第一个在奥当奈尔内阁中获得了一个位置;而且不仅是波拿巴在这个事变的消息刚刚传到巴黎时就派遣纳尔瓦艾斯前往贝云。这种同谋关系,其实在事先早就可以看出,因为在马德里的危机实际发生之前两个星期,就有大量军火从波尔多运往贝云。而尤其能从中看出这种关系的,是奥当奈尔在盗袭马德里人民时的行动计划。在事变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宣布,即使毁掉马德里也在所不惜,在战斗期间他也正是按照他自己的话去做的。可是要知道,奥当奈尔虽然是一个胆大的家伙,但没有一条安全的退路,他是从来不敢贸然前进一步。正像他的臭名远扬的伯父、那个在叛变方面出人头地的人物一样,他在渡过卢比康河的时候是从来不把桥梁烧掉的。在这两个奥当奈尔身上,好战的特性很奇特地受到谨慎小心和躲躲闪闪的特性的抑制。显然,任何一个将军如果威胁着要使首都化为灰烬,那末一旦失败就会丢掉脑袋。既然如此,奥当奈尔怎么敢冒这样的风险呢?太后克里斯蒂娜的御用报纸“辩论日报”泄露了这个秘密:

“奥当奈尔估计到有一场大战,而且至少要经过激烈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他还预先考虑到失败的可能性。如果这种不幸竟然发生,这位元帅就会放弃马德里,率领他的残部,护送女王,转赴北方诸省,以图到达法国边境。”

从这一切来看,难道不像是他和波拿巴一起制订了自己的计划吗?1843年,路易-菲利浦和纳尔瓦艾斯也正是这样制订过同样的计划,而那个计划又是从1823年路易十八和斐迪南七世的密

约⁴¹抄袭来的。

承认在 1843 年和 1856 年的两次西班牙阴谋之间存在这种表面上的相同之处以后，我们还应该指出，这两次行动具有很多不同的特点，表明西班牙人民在如此短促的时期中获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些特点在于：最近一次马德里的斗争的政治性质；它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最后，与 1843 年埃斯帕特罗和纳尔瓦艾斯各自所处的地位相比较，1856 年埃斯帕特罗和奥当奈尔各自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在 1843 年，所有的党派都对埃斯帕特罗感到厌恶。为了要他下台，moderados 和 progresistas⁴²之间组成了强有力的联盟。革命的洪达 如雨后春笋一般在所有的城市建立起来，为纳尔瓦艾斯及其追随者铺平了道路。但在 1856 年，我们不仅看到一边是宫廷和军队，一边是人民，而且在人民的队伍里面，我们还看到那种在其他西欧国家中所有的分化。7 月 13 日，埃斯帕特罗的内阁被迫提出辞职；13 日至 14 日的夜间，奥当奈尔的内阁组成了；14 日晨，风传受命组阁的奥当奈尔邀请了 1854 年 7 月血腥的日子的那位不祥的大臣里奥斯 - 伊 - 罗萨斯⁴³入阁。上午 11 时，“日报”⁴⁴证实了这个传闻。于是议会便召开会议，出席的议员有 93 人。根据议会的章程，有 20 个议员的提议即可召开会议，50 个议员就构成开会的法定人数。此外，议会还没有正式闭会。议长印范泰将军只得顺从普遍的愿望，召开一次正式的会议。会上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大意是说新内阁没有得到议会的信任，并且应当将此项决议通知女王陛下。与此同时，议会召集国民军准备

洪达在西班牙语中有团体、协会、委员会等意思，这里用来指委员会。——译者注

行动。议会的委员们携带了不信任新阁的决议书，由一队国民军护送，往见女王。当他们试图入宫的时候，正规军的部队向他们和他们的护送者射击，把他们赶回去了。这一事件成为起义的信号。议会在当晚 7 时发出开始构筑街垒的命令，但是议会的会议接着就被奥当奈尔的军队驱散了。战斗就在这天夜里开始，国民军中只有一个营投到了王室的军队方面去。应当指出，早在 13 日的早晨，埃斯帕特罗政府的内务大臣埃斯科苏拉先生即已电告巴塞罗纳和萨拉哥沙，说 coup d' état 即将发生，必须准备予以反抗。马德里的起义者的首领是马多斯先生和埃斯科苏拉的兄弟瓦尔德斯将军。一句话，对 coup d' état 的反抗，毫无疑问是由埃斯帕特罗派以及市民和一般的自由派发动的。当他们和国民军一起在从东到西横贯马德里的一条线上作战的时候，普切塔领导下的工人占领了马德里城的南部以及北部的一部分。

16 日晨，奥当奈尔采取了主动。即使照“辩论日报”上有所偏袒的话来看，奥当奈尔在当日上午并没有取得显著的优势。突然，在下午 1 时左右，没有什么显著原因，国民军的队伍就溃乱了；2 时，他们的人数变得更少，6 时，他们完全从战场上消失了，使战斗的负担完全由工人承当。工人一直战斗到 16 日下午 4 时。所以，在这三天的屠杀中，实际上有两场截然不同的战斗，一场是在工人支持下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国民军与军队的战斗，一场是军队与被国民军背弃后的工人的战斗。正像海涅所说的：

“这是一个老故事，
但永远是新闻。”

埃斯帕特罗背弃了议会，议会背弃了国民军的指挥官，这些指挥官背弃了他们的兵士，这些兵士又背弃了人民。但在 15 日，当埃斯帕特罗出现了一会儿的时候，议会又重新召开了会议。阿森西奥先生和其他议员提醒他记住他反复许下的庄严诺言，即一旦国家的自由遭到危险，他就要立即拔出他的卢恰纳长剑⁴⁵。埃斯帕特罗指天作证，来表明他的坚贞的爱国心，在他离开的时候，大家满以为不久就会看到他领导起义。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前往古列阿将军家中，像帕拉福克斯一样藏在一间地下避弹室里；以后便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国民军的指挥官们在前一天晚上还用尽一切方法来激励兵士拿起武器，现在却同样急切地设法各自回家了。下午 2 时 30 分，在几个小时内僭取了国民军指挥权的瓦尔德斯将军，在大广场召集了他直接统率的兵士，告诉他们，那个应该领导他们的人不会来了，因此各人可以随意离去。于是，国民军的兵士们跑回家里，急忙脱去军服，藏起武器。这就是一个消息灵通的权威人士所提供的情况的要点。另一个人指出，这次向阴谋突然屈服的行动，是由于考虑到国民军的胜利势将导致王权的没落，而使共和民主派取得绝对的优势。巴黎“新闻报”⁴⁶也告诉我们，埃斯帕特罗元帅看到了民主派在议会中所造成的事态的趋向，不愿以王权为牺牲，或者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内战的危险，因此使尽一切力量来促使奥当奈尔获得成功。

的确，关于反抗 *coup d' état* 的时间、情况和溃败的细节，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大家在主要的一点上却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埃斯帕特罗背弃了议会，议会背弃了首领们，首领们背弃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又背弃了人民。这对 1848—1849 年欧洲大多数的斗争和以后将在西欧发生的斗争的性质，提供了一个新

的说明。一方面，有现代工商业，它们的当然首领资产阶级是反对军事专制主义的；另一方面，当他们开始进行反对这个专制主义的斗争的时候，现代劳动组织的产物即工人们自己，便参加到这个斗争中来，要求取得他们在胜利果实中应得的一份。资产阶级被这样迫使他们违背自己意志结成的联盟的后果所吓住，便又重新缩回到他们所憎恨的专制主义的炮台的保护之下去。这就是欧洲各国的常备军的秘密，不知道这个秘密，未来的历史家就不能理解它们。这样，就让欧洲的资产阶级懂得了：他们要就必须屈从于一个他们所憎恨的政治权力，放弃现代工商业的利益和以现代工商业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要就必须放弃现代的社会生产力组织在其始初阶段只赋予唯一的一个阶级的特权。连西班牙也提供了这个教训，这真是既触目惊心而又出人意料的事。

卡·马克思写于 1856 年 7 月 25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6 年 8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75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 西班牙的革命

萨拉哥沙于8月1日下午1时30分投降,抵抗西班牙反革命的最后一个中心就此消失。从军事观点来说,马德里和巴塞罗纳的起义已经失败,安达鲁西亚的起义的牵制力量很微弱,而萨拉哥沙又受到了来自巴斯克地区、纳瓦腊、卡塔卢尼亚、瓦伦西亚和加斯梯里亚的具有压倒优势的军队的联合进攻,所以它已经很少有成功的机会。而领导抵抗队伍的是埃斯帕特罗的老副官法尔孔将军;“埃斯帕特罗和自由”被用作战斗的口号;萨拉哥沙的人民又已经知道了埃斯帕特罗在马德里的极端可笑的惨败⁴⁷,因此即使可能有过任何的成功的机会,也都被这些情况断送了。此外,从下面摘自7月29日“马德里报”⁴⁸的这一段话可以看到,埃斯帕特罗的总部已经对萨拉哥沙方面的部属发出直接的命令,要他们停止一切抵抗:

“埃斯帕特罗政府的一位前任大臣,参加了杜耳塞将军和萨拉哥沙当局之间所进行的谈判,同时埃斯帕特罗派的议员璜·马丁涅斯·阿隆索受命去通知起义的首领们:女王、她的大臣们和将军们具有极为谅解的精神。”

这次革命运动几乎波及西班牙全境:在加斯梯里亚的马德里和拉曼彻;在安达鲁西亚的格拉纳达、塞维尔、马拉加、加迪斯、哈安等城;在木尔西亚省的木尔西亚和卡塔黑纳;在瓦伦西亚省的瓦

伦西亚、阿利康特、阿耳西拉等城；在卡塔卢尼亚的巴塞罗那、雷乌斯、菲盖腊斯、赫罗纳等城；在阿腊贡的萨拉哥沙、特鲁韦尔、韦斯卡、哈卡等城；在阿斯土里亚的奥维耶多；以及在加利西亚的拉科鲁尼亚。在埃斯特勒马杜腊、累翁和旧加斯梯里亚，没有什么行动，因为这些地方的革命派已于两个月前在埃斯帕特罗和奥当奈尔的共同赞助下被镇压下去；巴斯克地区和纳瓦腊也平静无事。但是后面这些省份是同情革命事业的，虽然这种同情在法国观察兵团面前不能表现出来。如果考虑到下面所说的情形，这一点就更加值得注意了：即在二十年前，正是这些省份形成了卡洛斯派⁴⁹的堡垒，卡洛斯派当时得到了阿腊贡和卡塔卢尼亚的农民的支持，但是这一回，阿腊贡和卡塔卢尼亚的农民却极其热诚地站在革命一边；而且，如果不是巴塞罗那和萨拉哥沙的首领们的怯懦无能使他们的精力无处发挥，他们会成为抵抗运动中一个最强有力的因素。甚至新教的正统拥护者、二十来年前曾为宗教裁判所的唐·吉诃德式的骑士唐·卡洛斯效劳的伦敦“先驱晨报”⁵⁰，也公允地承认了这个事实，并且被它弄得很窘。这是西班牙这次革命所显示的许多进步的征兆之一。这种进步诚然很缓慢，但是在这个国家里，《a la mañana》〔“明天再说”〕是日常生活中的口头禅，每个人都会告诉你，“我们的祖先用了八百年才把摩尔人赶走”，因此只有不熟悉这个国家的奇特的风俗习惯的人，才会对这种进步的缓慢感到惊异。

尽管各地普遍发动了 pronunciamientos〔兵变〕，西班牙的革命仍只限于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在南方，革命为 cholera morbus〔霍乱〕所破坏，在北方，又为埃斯帕特罗瘟疫所破坏。从军事观点来看，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起义并没有提供什么令人感兴趣的和任何新奇的特点。在军队这一边，事事都是预先准备好了的；在另

一边,事事都是仓卒进行的;攻势从来没有易手。一方面,是装备优良的军队在将军们的指挥下顺利行动;另一方面,则是首领们被装备不全的人民推着勉强前进。在马德里,革命者从开始就犯了错误,他们把自己封锁在市内地区,配置在连接城市东西两端的一线上;而这两端是掌握在奥当奈尔和孔查手里的,他们经由城外的大道互相联系并与杜耳塞的骑兵取得联络。这样,起义者就被隔绝开来,并且暴露在奥当奈尔及其同谋者所预定的集中攻击之下。奥当奈尔和孔查只须使他们的部队会合,革命力量就被驱散到城市的南区和北区,而不可能再行集结。这次马德里起义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街垒筑得很少并且只筑在突出的街角上,而房屋则被用来作为抵抗的中心;再者,这是巷战中前所未闻的,起义者用刺刀冲锋去对付进攻的纵队。但是,如果说起义者从巴黎和德勒斯顿的起义⁵¹中吸取了有用的经验,那末,军队从中学到的也不比他们少。房屋的墙垣一一被打垮了,起义者的翼侧和后方受到袭击,通往街道的出口又受到炮火的射击。马德里之战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孔查和奥当奈尔会师以后,普切塔被逼退到城市的南区(托勒多区),便把西班牙山地的游击战法搬到马德里的街道上来。起义者被打散了以后,转身退到教堂的拱门下面,狭窄的胡同里,房屋的楼梯上,一直在那里坚守到战死为止。

在巴塞罗纳,战斗还要更为激烈,而那里却全然没有领导。从军事上讲,这次起义和巴塞罗纳以前的一切起义一样,由于蒙茹伊克要塞保持在军队手里而遭受失败。斗争的激烈可由这样一件事看出,即在起义者已被赶出巴塞罗纳以后所顽强争夺的郊区格腊西阿,有150名兵士被烧死在自己的兵营里。值得指出的是,在马德里,正像我们在前面一篇文章中所说明的,无产阶级被资

产阶级出卖和背弃了，但巴塞罗纳的织布工人们却在一开始就宣告他们决不与埃斯帕特罗派所发动的那一个运动发生任何关系，而坚持要宣告成立共和国。这一点被拒绝以后，他们中间除了一些闻到了火药气味便忍不住要打仗的人以外，都对这场战斗保持消极的旁观者的态度。这场战斗于是就失败了，因为巴塞罗纳的一切起义，都是取决于它的2万名织布工人的。

1856年的西班牙革命和以前历次革命不同之处，在于它完全没有王朝性质。大家知道，1804年至1815年的运动是具有民族性质和王朝性质的⁵²。1812年的议会虽然宣布了一个差不多是共和主义性质的宪法，但它是以斐迪南七世的名义进行的。1820年至1823年带有胆怯的共和主义色彩的运动⁵³是完全没有成熟的，它要求群众支持，而群众却反对它，当时的群众是完全依附于教会和王室的。西班牙的王权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要使新旧社会之间的斗争带有严肃的性质，也需要有斐迪南七世的遗言以及使相敌对的原则体现为卡洛斯和克里斯蒂娜这两家王族支系。即使为一个新的原则而战，西班牙人也需要有一面古旧的旗帜。从1831年到1843年，斗争便是在这种旗帜下进行的。然后革命结束了，新的王朝遂得以在1843年至1854年间作一度尝试。因此，1854年7月的革命，不能不意味着对新的王朝的进攻；但是天真的伊萨伯拉却因为人民的憎恨集中于她的母亲身上而得到了掩护，人民不仅为他们自己的解放而欢欣鼓舞，也为伊萨伯拉从她的母亲及其宫廷奸党下面解放出来而欢欣鼓舞。

1856年，这件外衣脱落了，伊萨伯拉本人由于实行了那个激起革命的 *coup d' état*〔政变〕而与人民处于针锋相对的地位。她

证明自己是斐迪南七世的冷酷残忍而又怯懦伪善的、对父亲毫无愧色的女儿（斐迪南七世这个人欺妄成性，尽管他极度迷信教义，即使借神圣的宗教裁判所的帮助，也决不能使他相信像耶稣基督及其门徒这样高尚的人曾说过真话）。天真的伊萨伯拉感到欣然满意的7月14日至16日的屠杀，甚至使1808年缪拉特对马德里人的屠杀⁵⁴也要相形见绌，降为一个微不足道的骚动。那些日子给西班牙的王权敲响了丧钟。只有欧洲的低能的正统派分子才会想像，在伊萨伯拉倒台之后，唐·卡洛斯会起而代之。他们总是以为，如果一个原则的最后的体现者要消逝，那只不过是为了让它的最初的体现者再度登台。

1856年，西班牙的革命不仅失去了它的王朝性质，而且也失去了它的军队性质。为什么军队在西班牙历次革命中起过如此显著的作用，这可以用几句话来说明。从来存在的镇守司令区制度使这些司令官成为各省的帕沙⁵⁵；反抗法国的独立战争，不仅使军队成为国防的主要工具，而且也使军队成为西班牙的第一个革命组织和革命活动的中心；1815年到1818年的各次阴谋都是由军队发动的；1833年到1840年的王朝战争⁵⁶，双方依靠的都是军队；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孤立，迫使他们用军队的刺刀去对付乡村的僧侣和农民；克里斯蒂娜及其宫廷奸党曾不得不用刺刀来对付自由派，如同自由派曾用刺刀对付农民一样；所有这些先例产生了一种传统，——这些就是赋予西班牙的革命以军队性质、而又赋予军队以御用军性质的原因。迄至1854年，革命总是由军队发动的，而直到那时候为止，除了发动革命的军人的级别不同以外，各次革命在外表上没有任何差别。甚至在1854年，仍旧是由军队首先发难的；但是奥当奈尔的曼萨那累斯宣言⁵⁷证明，西班牙革命以军

队为主的基础已经变得何等薄弱。奥当奈尔是在什么条件下终于能够中止他从维卡耳瓦罗走向葡萄牙边境的毫不含糊的漫游而回师到马德里的呢？只是在答应了立即削减军队、代之以国民军、不使革命的果实由将军们分吞以后，才能如此。如果说 1854 年的革命只限于这样表现它对军队的不信任，那末，仅仅在两年以后，革命就发现它自己受到了军队的公然的直接的攻击，——这个军队现在是值得与拉德茨基的克罗地亚兵、波拿巴的非洲军队和弗兰格尔的波美拉尼亚军队⁵⁸相提并论了。西班牙军队何等欣赏它的新地位的荣誉，从 7 月 29 日马德里的一个团的叛变就可以看出，这个团不满足于伊萨伯拉的一点烟叶，为了争取五个法郎的硬币和波拿巴的腊肠⁵⁹而罢工，而最后他们得到了这些东西。

所以，这一次军队是完全与人民为敌的，更准确些说，只是反对人民和国民军的。这就是说，西班牙军队的革命使命已经告终。埃斯帕特罗，这个集西班牙革命的军队性质、王朝性质和资产阶级自由派性质于一身的人，现在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甚至比最了解他的人依据命运的一般规律所能预见到的还要低下。如果——像一般所传说的，而且是很有可能的——埃斯帕特罗分子要集合在奥当奈尔之下，那末他们就会以自己的正式行动来证实他们的自取灭亡。他们并不能拯救埃斯帕特罗。

下一次的欧洲革命将发现，西班牙已经成熟到能够同它合作。1854 年和 1856 年是西班牙达到那种成熟程度所必须经过的过渡时期。

卡·马克思写于 1856 年 8 月初
作为社论载于 1856 年 8 月 18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78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 欧洲的经济危机

欧洲的投机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普遍性。过去也有过投机狂,粮食的、铁路的、采矿的、银行的、棉纺业的,总之,有过各种各样的投机狂。但是,在1817、1825、1836、1846—1847年严重的商业危机时期,投机狂虽然波及了工业和商业的一切部门,而占主导地位的,只是某一种投机狂,它赋予每一个时期特殊的色调和性质。当时投机之风遍及一切经济部门,但是每一个投机者只限于在自己的专门部门活动。相反地,目前的投机狂的代表者——Crédit Mobilier的指导原则,却不是在一个固定的方面进行投机活动,而是普遍地进行投机活动,并且把它集中起来的骗术推行到一切经济部门。此外,目前的投机狂在产生和发展方面,也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这就是它不是开始于英国,而是开始于法国。目前这一类法国投机者和上述时期内进行活动的英国投机者的关系,就像十八世纪法国的自然神论者和十七世纪英国的自然神论者的关系一样。一个提供材料,另一个制定概括的形式,使自然神论得以在十八世纪传遍整个文明世界。英国人想为自己庆幸,庆幸投机活动的策源地已从他们自由的清醒的岛国移到了混乱的、受专制暴君压迫的大陆。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在以多么不安的心情注视着法兰西银行每月的月报,因为这些

月报影响着英格兰银行圣所中的黄金储备。他们忘记了，用圣水来供应欧洲 *Crédits Mobiliers* 的大动脉的正是大量的英国资本。他们忘记了，英国商业的过分扩大和生产过剩这些他们称为“健康的”而且现在还在大肆吹嘘（据说出口数字已达 11 000 万英镑左右）的东西，是他们现在所揭露的大陆上的“不健康的”投机活动的直接产物，正如 1854 和 1856 年他们的自由主义政策是波拿巴 *coup d'état* [政变] 的产物一样。但是不能否认，把皇帝的社会主义，圣西门主义者的证券投机和哲学家的骗术组成一个叫做 *Crédit Mobilier* 的奇妙的混合体，这不是英国人的过错。和大陆上的这种巧妙的做法完全相反，英国的投机活动又恢复了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纯粹欺骗的最粗鲁和最原始的形式。这种欺骗成了保尔、斯特兰和贝茨的秘密，成了萨德勒氏梯培雷里银行、伦敦西蒂的柯尔、戴维逊和戈登的巨大业务的秘密；并且正是伦敦英国皇家银行的可悲的、然而却是简单的故事的梗概。

一小撮董事不需要特别巧妙的办法，只要用巨额的红利安慰公司的股东，用骗人的报告书引诱存户和新股东，就能把公司的资本侵吞。为此，只要懂得英国的法律就够了。英国皇家银行的事件所以轰动一时，与其说是由于资本的规模，倒不如说是由于被它吸收为股东和存户的小百姓的数量。这个企业的分工极其简单。它有两类董事：一类满足于把 1 万美元的年薪装入自己的腰包，而他们获得这笔收入是由于他们对银行的事情不闻不问，保持了自己良心的纯洁；另一类确实很想管理银行，但只是为了要当银行的主要账户，或者确切些说，当掠夺者。由于这后一类董事在贷款方面要依赖经理，所以他们一开始就使经理自己有获得贷款的可能。除了经理以外，他们同样还要把自己的秘密告诉银

行的监事和法律顾问,监事和法律顾问因而以贷款形式获得贿赂。董事和经理除了得到银行贷给他们本人及其亲属的贷款以外,还假立许多户头窃取贷款。现在全部已付的资本为 15 万英镑,其中 121840 英镑已直接或间接地被董事们据为己有。银行的创办人麦克格莱哥尔先生这位格拉斯哥的议员,著名的统计学著作⁶⁰的作者欠了银行 7362 英镑的债;另一个董事丘克斯贝里的议员汉弗利·布朗先生,利用银行为自己偿付竞选经费,有一个时候他欠银行 7 万英镑的债,而且完全有可能,现在还欠 5 万英镑。经理凯麦隆先生得了 3 万英镑的贷款。

银行开业以来,每年都亏损 5 万英镑,但是董事们年复一年地向股东恭贺生意兴隆。虽然正式的会计师科耳曼先生宣布股东根本不应当得到任何红利,每一季度仍支付红利 6%。只是在去年夏季,才向股东提出了一个数目在 37 万英镑以上的伪造的财务报告,报告中贷给麦克格莱哥尔、汉弗利·布朗、凯麦隆及其同伙的贷款,列入了容易销售的有价证券的不固定项目里。当银行已经完全没有支付能力的时候,发行了新的股票,同时提出了关于银行业务发达的充满乐观主义的报告并对董事们投了信任票。这种发行新股票的办法决不是作为银行摆脱困境的最后的绝望手段,而完全是董事们的骗局的新的源泉。虽然这家银行的章程中有一条规定,禁止银行买卖自己的股票,但是,实际情况看来一直是这样:只要董事手里的本行股票一跌价,他们就以抵押的方式把这些股票强加给银行。关于“一部分诚实的”董事所谓受骗的情形,他们当中有一个欧文先生在股东大会上曾说过如下的话:

“当开办本行的一切工作都已准备就绪时,凯麦隆先生被任命为我们的经理,不久我们就认识到,让一个过去从来没有同伦敦的任何一家银行有过

联系的人来当经理是多么不幸。这种情况就产生了许多困难。我要说的是两年多以前发生的事,当时我已经离开银行。甚至在我离开的前夕,我还不知道有哪怕是一个股东在贴现或贷款业务方面会欠银行1万英镑的债。有一个时候我听到这样的传说,有人抱怨他们当中有人欠了大量贴现期票的债务,关于这件事情我问了一位会计。但是我得到的回答是,既然我已经离开银行,银行的事情就与我无关了。凯麦隆先生说过,任何一个董事都不应当把自己要贴现的期票提交董事会。他宣布说,这种期票应当送交经理,因为如果把它们提交董事会,那末殷实可靠的商界人士就永远不会同我们银行往来了。要不是有一次凯麦隆先生病危,我还不知道这件事。董事长和其他几位董事趁他生病的时候,进行了某些调查,结果发现凯麦隆先生有一个用特别的锁锁起来的本子,这个本子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当董事长打开这个本子时,我们大家都非常吃惊。”

对于凯麦隆先生,应当说的是:他不等这些发现有个结果,就很快地有预见地离开了英国。

英国皇家银行最不平常和最突出的交易之一,就是它同威尔士一些铁工厂发生的关系。就在公司已付的资本只有5万英镑的时候,仅仅贷给这些铁工厂的贷款就达到7万—8万英镑。当公司第一次占有这个制铁企业时,这个企业已经无法经营了。当这个企业投入了约5万英镑的资本而恢复起来时,它却落到了一个叫克拉克先生的手里。克拉克先生利用了它“一段时期”之后,又把它摔给了银行,并且“表示确信他是放弃了大批财产”,但是事实上他给银行加了一笔两万英镑的“企业”债务。就这样,当这个企业估计是有利可图时,它就脱离了银行,当需要得到新的贷款时,它就又回到了假行。甚至在最后招供时,董事们还企图继续耍这种把戏,还在证明工厂能赢利。据他们说,工厂似乎每年能赢利16 000英镑,但是他们忘记了,在公司存在的每一年内,他们要股东付出17 742英镑的代价。现在,根据大法官法庭⁶¹的判

决，公司即将撤销。但是在此以前，英国皇家银行的所有冒险家，
将为欧洲普遍危机的洪流所吞没。

卡·马克思写于 1856 年 9 月 26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 1856 年 10 月 9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828 号

卡·马克思 欧洲的金融危机

1856年10月3日于伦敦

大约发生在1847年秋而延续到1848年春的欧洲普遍商业危机，是由伦敦金融市场的恐慌开始的。这次恐慌开始于1847年4月底，到5月4日达到了顶点。在这些日子里，一切金融交易都停止了，但是从5月4日起，紧张局面开始缓和下来，因此商人们和记者们就互相庆贺这次恐慌是纯粹偶然的和暂时的。然而没有过几个月，就爆发了商业和工业危机，金融恐慌对这次危机来说，只是一种预兆和先声。

现在，欧洲金融市场上正发生着与1847年的恐慌相似的风潮。但是这里并不完全相似。目前的恐慌不像1847年那样由西方向东方发展，由伦敦开始经过巴黎到达柏林和维也纳，而是由东方向西方发展。它开始于德国，从那里向巴黎蔓延，最后到达伦敦。当时，这种缓慢的发展过程使恐慌具有地方性，而现在，蔓延之迅速立即表明它具有普遍性。当时，它持续了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星期左右，而现在，它已持续了三个星期。当时，只有少数人看出这种恐慌是普遍危机的先声，而现在，除了那些读着“泰晤士报”，想像他们是在创造历史的英国人以外，谁也不会怀疑这一点。当时，甚至最有远见的政治家所担心的，也不过是1825年

和 1836 年危机的重演，而现在他们却相信：他们面临的不仅是扩大了 1847 年危机的再版，而且是扩大了 1848 年革命的再版。

欧洲上层阶级的惊慌不下于他们的绝望。从 1849 年年中起，他们完全是左右局势的人，只有战争才是他们社会观中的唯一阴影。现在，当战争已经结束或者被认为结束的时候，他们到处遇到的情况就同英国人在滑铁卢会战和 1815 年缔结和约以后遇到的情况一样；当时代替战 bulletins〔报〕出现的是关于农业和工业遭到困难的报道。为了拯救自己的财产，当时他们采取了所能采取的一切办法来屠杀群众和镇压革命。而现在，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就是财产关系上的革命的工具，而且是比 1848 年的革命者所想的革命规模大得多的革命的工具。他们正面临着普遍破产的形势，他们知道，这种破产将在巴黎借贷资本的巨大中心的付款日发生。1815 年，英国人在“向来忠于职守的人”卡斯尔里自杀以后，很惊奇地发现他是一个疯子，而欧洲证券投机商人们在波拿巴的脑袋没有掉之前就开始问自己：波拿巴究竟什么时候曾有过清醒的头脑。他们知道，所有的市场上都充斥着进口货；有产阶级的各个阶层，甚至渡过去从来没有染上这种疾病的人，现在也卷入了投机倒把的漩涡；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躲过这个漩涡；各国政府耗尽了本国纳税人的能力。在 1848 年，直接引起革命的事件都是纯粹政治性的，例如：法国的改革宴会，瑞士的宗得崩德之战，柏林的联合议会中的辩论，西班牙的婚姻，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纠纷⁶²，等等，并且当革命的士兵——巴黎的工人宣布 1848 年的革命为社会革命时，革命的将军们也和世界上其余的人一样感到意外。而现在则

相反,还在政治革命宣布以前,大家都认识到这是社会革命,而且是这样的一种革命,它不是由工人中间的秘密社团的密谋引起的,而是由属于统治阶级自己的各种 *Crédits Mobiliers* 公开实行的鬼蜮伎俩引起的。因此,欧洲上层阶级除了惊慌之外,还痛苦地意识到,他们对革命胜利的本身,只不过有助于在 1857 年创造物质条件来实现曾经仅仅存在于理想中的 1848 年的倾向。由此可见,从 1849 年年中起到目前为止的整个时期,是历史赐给欧洲旧社会的一个纯粹的喘息时机,使它能够最后一次集中地显示自己的一切倾向。在政治上是崇拜刀剑,在道德上是普遍败坏以及伪善地恢复已经破除的迷信,在政治经济上是不花力气生产而狂热地追求发财致富,——这就是 1849—1856 年这段反革命狂欢暴饮的时期内这个社会所表现的倾向。

另一方面,如果把这次短暂的金融恐慌的效果同马志尼宣言和其他宣言的效果对照一下,那末,从 1849 年开始的高明的革命家们的全部幻想史,立即就会失去其神秘性。他们不了解人民的经济生活,他们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实际条件,当爆发新的革命时,他们比彼拉多有更多的理由来推卸责任,说他们与流血事件无关。

我们说过,欧洲当前的金融恐慌首先发生于德国。波拿巴的报纸就抓住这一点,企图使人相信他的制度同造成这次恐慌没有丝毫关系。

巴黎的“立宪主义者报”⁶³写道:“政府甚至在和约缔结以后,还力图抑制企业家的事业心,推迟实行某些新的租让并禁止依靠交易所实现一些新的计划。不幸,别的它再也做不到了,它不可能防止一切无节制的行为。但是这些无节制的行为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如果说,其中的一部分是在法国市场上产生的,那当然只是较小的一部分。我们的铁路公司出于竞争的情绪可能太匆忙地发行了本票,其收入预定用于扩大铁路网。但是,如果没有大量企

业突然在国外出现，这也许不会引起困难。特别是没有参战的德国，轻率地把注意力全放在各种企业上。由于自己没有足够的资源，就只得借助于我们的资源，又因为官方的市场不对它开放，我们的投机家就向它开放了黑市交易所。这样，法国就成了世界主义的投机活动中心，这种投机活动可以靠牺牲本国的民族利益而使别国发财致富。结果我们的金融市场上资本的供应减少了，而我们的有价证券因买主少而跌价，在有那么多的财富和繁荣的因素的情况下，这种跌价使得公众莫名其妙。”

我们举出了帝国官方胡说的欧洲恐慌的原因的例子，同时，也不能不举出在波拿巴制度下允许存在的反对意见的例子。

“国民议会报”⁶⁴宣布说：“可以否认危机的存在，但是，如果注意一下不久前我们的铁路收入和以商业期票抵押的银行贷款的减少以及今年头七个月的出口税减少 2500 万法郎，那末不能不承认，繁荣的状况是略有消退的。”

总之，从 1849 年的反革命时期起，德国的资产阶级的一切积极人士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商业和工业活动上，就像德国的思想界为了自然科学而放弃哲学一样。德国人由于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在战争期间积累的资本相当于他们的邻居法国人在战争中所失去的资本。法国的 *Crédit Mobilier* 看到德国人的这种情况，看到他们的迅速发展的工业和资本的积累以后，放下架子承认了德国人是自己合适的业务对象，因为波拿巴同奥地利的消极联盟已经使这个公司的注意力转移到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的未经考查的地方去了。但是，*Crédit Mobilier* 做出了榜样，在德国开始了投机活动以后，对于在它自己推动下建立的投机企业和信贷企业的大量收入，自己都感到惊奇。在 1855—1856 年，德国人承袭了法国 *Crédits Mobiliers* 的完全现成的欺诈法规，就像在 1831 年他们承袭了法国的现成的政治宪法⁶⁵一样。如果一个十七世纪的法国人看到莱茵河对岸造了规模大一百倍的路易十四的宫廷会感到惊奇

的话,近十年来的法国人看到德国有 62 个国民议会,而他们本国,非常勉强地才产生了一个,也同样会感到惊奇。归根到底,德国完全不是一个地方分权的国家,全部问题只在于集权制在这个国家里是分散的,因而不是存在一个中央,而是存在许多中央。所以,这个国家完全适合于在最短期间和在一切方面开始采取 Cr dit Mobilier 教给它的各种鬼蜮伎俩,就像巴黎的时装在德国比在法国流行得更快一样。这就是这次恐慌首先发生于德国并在那里蔓延最广的直接原因。在以后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将会谈到这次恐慌本身的经过并考察它产生的直接原因。

卡·马克思写于 1856 年 10 月 3 日
载于 1856 年 10 月 15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483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 欧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约在本年 9 月中开始的德国金融危机于同月 26 日达到了最高峰，后来开始逐渐缓和下来，这同 1847 年英国的金融恐慌相似，那次恐慌在 4 月底第一次露头，至 5 月 4 日达到最高潮，然后逐渐平息下去。当时，伦敦几家主要的银行为了在恐慌期间创造一个暂息时机而作的牺牲，成了几个月后自己破产的起因。德国也将很快产生类似的后果，因为在德国，产生恐慌的基本原因并不是缺乏流通手段，而是游资同当前工业、商业和投机企业的巨大规模不相称。恐慌赖以暂时克服的手段是，各个政府的银行、股份银行和私人银行提高了贴现率，其中有些银行把自己的贴现率提高到 6%，有些甚至提高到 9%。由于这样提高了贴现率，黄金外流暂时停顿，外国的产品停止输入，外国资本为高利的诱饵吸引，未清偿的债款都要求提取，法国的 *Crédit Mobilier* 一个月以前还用通融划款的期票支付承包德国铁路的费用，现在不得不用现金来支付，同时，一般地说，法国也不得不用硬币来支付自己在谷物和食品输入方面的差额。由此可见，德国的金融恐慌波及了法国，而且在那里立即采取了更加吓人的形式。法兰西银行效法德国的银行，把自己的贴现率提高到 6%——这样做已经迫使它在 9 月 30 日向英格兰银行提出了贷款 100 万英镑以上的要求。

由于这样，英格兰银行甚至没有等到通常在星期四举行的董事会议开会，就在 10 月 1 日把本行的贴现率提高到 5%，这是 1847 年金融恐慌以来没有先例的措施。虽然采取了这种提高利息的措施，但是黄金每天以 4 万英镑之数继续由针线街⁶⁶的地下室外流，而法兰西银行每天要外流 600 万法郎硬币，当时港币厂每天只能制造 300 万法郎，其中银币只有约 12 万法郎。为了制止法兰西银行对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的有害影响，大概在一星期以后，后者又把期限为 60 天的期票的贴现率提高到 6%，期限更长的期票的贴现率提高到 7%。为了报答这番好意，法兰西银行在 10 月 6 日发布了一项新的指示：它不再办理期限在 60 天以上的任何期票的贴现，并且宣布，它提供的用有价证券作抵押的贷款，不超过票面额的 40%，用铁路股票作抵押的贷款，不超过票面额的 20%，而且期限总共只有一个月。虽然采取了这一切措施，英格兰银行还是不能制止黄金流往法国，就像法兰西银行不能减轻巴黎的恐慌或者减少硬币流往欧洲大陆其他地区一样。法国的恐慌的威力已为下列事实所证明：Crédit Mobilier 的股票行情由 1 680 法郎（9 月 29 日的行情）跌到 1 465 法郎（10 月 6 日），即在八天内跌了 215 法郎，而且直到 10 月 9 日，虽然作了最大的努力，仍然不能把股票的行情提高 15 法郎以上。不用说，国家有息证券也相应地跌价。恐怕没有比这样一件事更可笑的了：我们听到 Crédit Mobilier 的伟大创始人伊萨克·贝列拉先生冠冕堂皇地担保说，法国资本具有天生的特殊的世界主义性质，而法国人却不幸地抱怨他们的资本逃往德国。在这一片混乱当中，法国伟大的魔法师拿破仑第三炼好了自己的万应灵丹。他禁止报刊谈论财政危机；通过自己的宪兵向银钱商暗示：最好撕掉橱窗里贴水收购白银的广告，

并于 10 月 7 日在自己的“通报”上登载了一个以他自己的财政大臣的名义写给他本人的报告，报告中肯定说，一切都很好，只是公众对事情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不幸，两天以后，法兰西银行的总裁突然出现，在他的月报中提供了下列材料：

	10 月	9 月
	(单位：法郎)	
现金库存	77 062 910	113 126 401
分行的现金库存	89 407 036	122 676 090
贴现期票	271 955 426	221 308 498
分行贴现期票	239 623 602	217 829 320
黄金和白银的贴水	2 128 594	1 496 313

换句话说，在一个月内存款的现金减少了 69 332 545 法郎，期票的贴现增加了 72 441 210 法郎，同时，收购黄金和白银支出的贴水超过 9 月份 632 281 法郎。同样不幸的是，目前，法国人积存的贵金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关于法兰西银行有可能停止支付硬币的风声一天比一天传播得广。拿破仑对金融市场的干预，正如他对卢瓦尔河水灾区的干预，其效果大致相同⁶⁷。

欧洲目前的危机所以复杂，还因为贵金属的外流（商业震动通常的预兆）和黄金同白银相比价格下跌交织在一起。不管这种或者那种商业的和工业的因素怎样，这种下跌不能不使实行复本位制的国家和必须按法定比例（但已被经济事实所推翻）支付黄金和白银的国家，把自己的白银输到实行金本位制和白银的官价不偏离其市场价格的市场上去。由于法国和英国的有关情况正是这样，只要法国没有以金币代替银币，白银自然就由法国流往英国，而黄金由英国流往法国。一方面，很清楚，一般流通手段的这种交换会带来一些暂时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或

者像过去做过的那样实行金本位制，停止白银流通，或者像 1851 年荷兰和不久前的比利时做过的那样，停止黄金流通，确定白银为唯一的本位。另一方面，可以看到，除了黄金同白银相比价格下跌以外，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起作用，那末，白银由整个欧洲和美洲的普遍外流自己就会终止和停顿，因为在缺乏白银收入的专门来源的情况下，这么多的白银突然退出和停止流通，就必然会降低它同黄金相比的价格，因为任何商品的市场价格都暂时地取决于供求关系，只有在几年以内平均起来才取决于生产费用。荷兰和比利时银行停止黄金流通对白银的价值只能起非常小的影响，因为白银是这些国家的主要交换手段，所以说这种变动具有经济性质，还不如说它具有法律性质。同时，可以认为，这种变动为供应白银开放了不大的市场，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一些困难。

诚然，在最近四五个月内，奥地利国家银行的硬币由 2 000 万元增加到 4 300 万元；这个数目全部都保存在银行的地下室，因为奥地利还没有恢复用硬币支付。在这增加的 2 300 万元中，主要部分是从巴黎和德国由 *Crédit Mobilier* 购买铁路得来的。毫无疑问，这是造成不久前白银外流的原因之一，但是，不管在多大的程度上，如果把最近以来金融市场上发生的现象都归咎于这一点，那是错误的。不应当忘记，从 1848—1855 年，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开采的黄金投入世界金融市场的达 10 500 万英镑，俄国和其他旧的产地开采的不算在内。据最乐观的自由贸易论者认为，根据目前贸易的发展，在这 10 500 万中，需要有 5 200 万用做通货、银行准备金、各国贸易中和平衡收支差额相互结算的金锭或用来制造奢侈品。至于其余的 5 300 万，正像自由贸易论者所认为的，只

是代替过去在美国和法国使用的白银——美国 1 000 万，法国 4 300 万，而我们认为实际数字要稍低一些。究竟怎样代替，从下列关于法国在 1855 年间黄金和白银变动情况的官方关税报告表中可以看出：

1855 年输入的黄金		1855 年输入的白银	
金锭	11 045 268 英镑	银锭	1 717 459 英镑
硬币	4 306 887 英镑	硬币	3 121 250 英镑
<hr/>		<hr/>	
总 计	15 352 155 英镑	总 计	4 838 709 英镑
1855 年输出的黄金		1855 年输出的白银	
金锭	203 544 英镑	银锭	3 067 229 英镑
硬币	6 306 060 英镑	硬币	9 783 345 英镑
<hr/>		<hr/>	
总 计	6 509 604 英镑	总 计	12 850 574 英镑
黄金入超	8 842 551 英镑	白银出超	8 011 865 英镑

因此；谁也不能断定说，所以腾出这样大量的白银（5 300 万英镑）是因为法国和美国货币流通发生变化或奥地利银行积累宝物，或者是由这两者同时造成的。指出下列情况是完全正确的：和黄金不同，由于白银没有贬值的危险，所以意大利和东方地区的商人对它比对其他硬币显然更偏爱，阿拉伯人收买和积累了大量的白银，而且，法国粮商为了支付黑海和阿速夫海进货的款项，宁愿从法国输出白银，而不愿输出黄金，因为在法国，白银仍然保持着同黄金的原来比价，而在俄国南部，黄金和白银的比价就变了。虽然考虑到白银外流的这一切原因，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断定由于这些原因而外流的数字多于 1 500 万或 1 600 万英镑。经济学家们在英国报刊上非常荒谬地提出了东方战争是白银外流的又

一个特殊原因，虽然他们已经把这种外流算在由于现代贸易日益增长的需求而必需的 5 200 万英镑黄金的总数中了。当然，他们不可能让白银来担负黄金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这一切个别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个造成白银外流的比较重大的因素，这就是同中国和印度的贸易，相当有趣的是，这个因素也就是 1847 年大危机的主要特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回头来谈，因为这对研究欧洲所面临的危机的经济预兆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读者将会知道，不管金融恐慌和贵金属的外流（这是金融恐慌的直接原因）有着怎样暂时的原因，商业和工业危机的一切因素在欧洲已经存在。在法国，由于蚕茧收成不好，葡萄歉收，1855 年因局部歉收而输入大批谷物，1856 年发生水灾，此外，因波拿巴先生的经济诡计造成巴黎房荒，所以这些因素还要更加加深。至于我们，我们觉得只要仔细地了解一下我们在星期六发表的曼涅先生的财政宣言，就会同意这样的假说：不管现在召开的第二次巴黎会议怎样，不管那不勒斯问题⁶⁸怎样，如果 1857 年给法国带来的预兆不比十年以前伴随 1847 年而来的预兆坏，那末，拿破仑第三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为自己庆幸。

卡·马克思写下 1856 年 10 月 14
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6 年 10 月 27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84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 欧洲的金融危机。——
货币流通史片断

我们已经从法兰西银行最近的一个报告书中看到，它的金属储备降到了非常低的程度，约为 3 000 万美元，而且仅仅在上一个月中就减少了 25%。如果再继续这样减少下去，那末到年底，银行的储备就要耗尽，现金支付也将停止。为了防止这种极危险的现象，曾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方面，警察局应当阻止将白银溶化出口，另一方面，法兰西银行决定以巨大的牺牲作代价，同路特希尔德先生们签订一项借款 600 万英镑的合同，使自己的金属储备增加一倍。换句话说，为了补充自己黄金的不足，银行又扩大了黄金的买价和卖价之间的差价。由于这个合同，10 月 11 日曾向英格兰银行支取了 5 万英镑，10 月 13 日——4 万英镑，而昨天到达这里的“亚细亚号”轮船带来了关于继续提取 50 多万的_{消息}。因此，伦敦普遍担心英格兰银行为了防止自己的基金流往法国，会重新拧紧螺丝，提高自己的贴现率。英格兰银行为了做好准备，除国库期票以外，已经停止发放以任何国家有价证券作抵押的贷款。

但是，法兰西银行能够成功地装进自己柜子的全部黄金将像

流入时那样迅速地流出——一部分用来偿付外货,弥补贸易赤字,一部分用于国内需要,代替正在退出流通的白银(收藏白银的现象自然会随着危机的尖锐化而加速起来),最后用于最近三四年来建立的大工业企业的需要。例如,一些曾希望以发行新债券来继续自己的工程并支付股息和贴水(目前谈不到这样做)的大铁路公司,正在采取最冒险的措施来弥补自己财力的空虚。如法国西部铁路需要6 000万法郎,东部铁路——2 400万,北部铁路——3 000万,地中海铁路——2 000万,奥尔良铁路——4 000万,等等。据统计,所有铁路公司所需要的总数达3亿。曾自鸣得意地以为借助于证券投机就能使人忘掉政治的波拿巴,现在却热衷于用各种政治问题——那不勒斯问题、多瑙河问题、贝萨拉比亚问题、关于新的巴黎会议问题⁶⁹——来转移人们对金融市场的注意,但是,一切都徒劳无益。不仅法国,而且整个欧洲都坚信,所谓的波拿巴王朝的命运和欧洲社会目前的情况一样,都将取决于看来现在已经在巴黎露头的商业危机的结局。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白银同黄金相比价格突然上涨,是危机爆发的最初原因。如果不注意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开采的大量黄金,那就可能认为这种上涨仅仅是由于从西方国家流往亚洲、特别是流往印度和中国的白银日益增加而造成的。从十七世纪初起,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对欧洲和美洲的金银市场一直起着严重的影响。白银是这些东方国家的唯一交换手段,由于同东方进行贸易,从西属美洲大量输入欧洲的财宝,有一部分就从欧洲大陆外流,于是,美洲输入欧洲的白银,就这样由于从欧

见本卷第66—69页。——编者注

洲输往亚洲而得到了平衡。诚然，与此同时，黄金从亚洲输往欧洲。但是，如果把 1840 年和 1850 年期间乌拉尔开采的黄金除开不算，那末这种出口是微不足道的，不可能产生任何显著的结果。

当然，亚洲和西方之间白银的流通，随着贸易差额的变动，有其涨潮和退潮的交替时期，但是总的说来，这个世界性运动的经过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十七世纪起到 1830 年左右；第二个时期从 1831 年到 1848 年，最后一个时期从 1849 年到现在。在第一个时期，向亚洲输出的白银，总的说来是增加的。在第二个时期，这种输出开始削弱，直到最后出现回流，亚洲第一次把它在几乎两个半世纪内吸收来的财宝的一部分归还了欧洲。在第三个时期，仍然处在上升的发展阶段，情况又起了变化，现在，亚洲正以空前的规模吸收白银。

在较早的时期，在美洲发现白银以后，甚至在葡萄牙在印度建立殖民地以后，欧洲向亚洲输出白银还不太能觉察到。到十七世纪初，当荷兰人和后来的英国人扩大了自己同东亚的贸易时，对这种金属的需要量才比较大。但是，从十八世纪英国茶叶的消费开始迅速增长的时候起，对白银的需要量就增加得特别快，因为英国人购买中国的茶叶几乎完全要支付白银。到十八世纪末，白银从欧洲向东亚的外流已经达到十分巨大的规模，甚至吸收相当一部分从美洲输入的白银。就在这一时期内，白银也开始从美洲直接输往亚洲，虽然总的没有超过墨西哥船队从阿卡浦尔科带到菲律宾群岛的数量。十九世纪头三十年，欧洲更加觉察到亚洲在这样吸收白银，由于西班牙的殖民地爆发革命⁷⁰，美洲的白银输出，从 1800 年的 4 000 多万美元降到了 1829 年的不足 2 000 万。另一方面，在 1796—1825 年期间，美国向亚洲输出的白银增加了

3倍，而在1809年以后，开始（虽然规模较小）直接向东亚输出白银的，不仅有墨西哥，而且还有巴西、智利和秘鲁。从1811年到1822年，欧洲向印度和中国输出的白银超过从这些国家输入的黄金3000多万英镑。

在1831年开始的时期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印度公司不仅被迫放弃它对欧洲与其东方领地之间的贸易的垄断，而且作为商业企业全部撤销（如果不算它对印度支那的垄断）⁷¹。这样，由于东印度的贸易对私人开放，不列颠向印度输出的工业品开始大大超过大不列颠从印度输入的原料。因此，贸易差额越来越明显地变得有利于欧洲，结果，白银向亚洲的输出迅速下降。不列颠贸易在世界其他市场上遇到的各种挫折，现在由于它在亚洲的新的扩张而开始得到弥补。如果说，1825年的贸易震动已经使不列颠对印度的输出有了增长，1836年的英美危机又给了它更加有力的推动，那末，1847年不列颠危机的特点，甚至是由对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的过多的输出造成的。

对亚洲的输出在1697年不到不列颠出口总额的1/52，而1822年已经达到约1/14，1830年达到1/9左右，1842年达到1/5强。在这个经济过程只波及印度和亚洲西部地区的时候，白银由欧洲向亚洲的外流削弱，但是没有停止，更没有变为由亚洲流往欧洲。只是到后来，英国的仁慈强迫中国进行正式的鸦片贸易，用大炮轰开了万里长城，以武力打开了天朝同尘世往来的大门，金属货币流通中才发生这种急剧的转变。因此，当中国的白银流到中印边境的时候，英国和美国把自己的工业品大量倾销到中国的太平洋沿岸地区。这也就说明为什么1842年白银在现代贸易史上第一次大量地真正由亚洲输往欧洲。

但是，亚洲和西方之间贵金属流通中的这种全面的变动是暂时的。在 1849 年就已经出现了尖锐的日益强烈的反复。就像中国给第一个和第二个时期指出了方向一样，它也给第三个时期指出了方向。中国的起义⁷²不仅中断了同印度的鸦片贸易，而且也使外国工业品的购买陷于停顿，因为中国人坚持要用白银购买他们的商品，而他们自己则采取了东方的经济专家在政治和社会动荡时期所惯用的措施——积累财宝。中国出超之所以非常可观，还同欧洲最近蚕茧的收成不好有关。根据不列颠驻上海领事罗伯逊先生的报告书，最近十年来中国茶叶的出口增加了 63%，丝的出口增加了 218%，而工业品的进口减少了 66%。罗伯逊先生估计，现在从世界各地平均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比十年前多 558 万英镑。下面我们列举 1849—1856 年期间中国进出口的确切材料（每年到 6 月 30 日为止）：

茶 叶 的 出 口

（单位：磅）

	输往大不列颠 和爱尔兰	输往美国
1849	47 242 000	18 072 000
1855	86 509 000	31 515 000
1856	91 035 000	40 246 000

丝 的 出 口

	输往大不列颠 和爱尔兰	输往法国
1849	17228 磅	—
1855	51486 磅	—
1856	50489 磅	6458 包

	英 镑
1855年中国向大不列颠出口的实际价值.....	8 746 000
1855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实际价值.....	2 500 000
总 计	11 246 000
扣除 20%的运费和其他费用.....	2 249 200
中国总计应得	8 996 800

进 口

	英 镑
1852年从英国进口的工业品.....	2 503 000
1855年从英国进口的工业品.....	1 000 000
1856年从英国进口的工业品.....	1 277 000
1853年从印度进口的鸦片和棉花.....	3 830 000
1855年从印度进口的鸦片和棉花.....	3 306 000
1856年从印度进口的鸦片和棉花.....	3 284 000
1855年的进口总值.....	4 306 000

	英 镑
1855年中国的顺差.....	4 690 000
1855年中国对印度的出口的价值.....	1 000 000
中国同世界各国贸易结算中有顺差总额(1855).....	5 690 000

除了同中国进行贸易而引起白银由欧洲流向亚洲以外，由于最近几年来贸易差额不利于欧洲，白银还流向印度，这从下列的表中可以看出：

	英 镑
1856年不列颠从印度的进口	14 578 000
东印度公司转拨扣款	3 000 000
进口总额	11 578 000
印度从不列颠的进口	8 927 000
印度的顺差	2 651 000

必须说明：1825年以前，在印度还没有实行单一的银本位法以前，黄金一直是法定的支付手段。因为几年以后，黄金在商业市场上比白银受重视，东印度公司宣布准备接受黄金作为对政府的付款。但是在澳大利亚发现黄金以后，公司也和荷兰政府一样，由于担心黄金贬值，根本不愿意在将来接受黄金而支付白银，于是突然恢复了1825年的单一银本位制。因此，必须用白银清偿同印度的贸易中的债务就具有头等的意义，同时造成了印度对这种金属的大量需求。由于从这个时候起印度白银的价格（同黄金的价格相比）比欧洲上涨得快，不列颠的商人发现，向印度输出白银来投机是有利的，可以换取印度的原料，从而给印度的出口以新的推动。总起来说，从1848年到1855年，仅仅从南安普顿一地输出的白银，就有2100万英镑，此外，从地中海各港口还输出很大的数量。据统计，今年南安普顿就已经向东方输出了1000万。

从印度贸易的这些变化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来看，不能期待白银很快就会停止向亚洲流动。因此，断定这次中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一定比俄国的所有战争、意大利的宣言⁷³和欧洲大陆上的秘密社团所起的影响大得多，这决不是轻率的。

卡·马克思写于1856年10月17
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1856年11月1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84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 英国—波斯战争

英国，或者说得确切些，东印度公司对波斯的宣战⁷⁴，是英国借以在亚洲大陆上扩张自己领地而重复使用的狡猾而冒险的外交伎俩之一。只要东印度公司垂涎于任何一个独立君主的领地、任何一个在政治上和商业上具有重要意义或者盛产黄金宝石的地域，被猎取的对象就会被指控破坏了某某臆想的或既有的条约、违背了想像中的诺言或约束、犯下了莫须有的罪行，接着便宣布开战，于是又一件证实邪恶永存、证实狼和小羊这个寓言的永恒寓意的血腥事件被载入了英国的史册。

多少年来，英国一直渴望在波斯湾有一个立脚点，尤其想霸占位于波斯湾北部的哈腊克岛。几度出使波斯的大名鼎鼎的约翰·马尔科姆爵士曾经历数这个岛对英国的价值，他断言，由于它与布什尔、里格港、巴士拉、格林巴贝里亚和盖提夫相邻，可以成为英国在亚洲的最繁荣的领地之一。因此很自然的，这个岛和布什尔已经落在英国手中。约翰爵士认为这个岛是对土耳其、阿拉伯以及波斯通商的枢纽。该岛气候良好，同时还具备了成为一个繁荣场所的一切必要条件。远在三十五年以前，这位大使就向当时的印度总督敏托勋爵谈过自己的看法，他们两人都打算实现这个计划。的确，约翰爵士曾受命统率远征军侵伐该岛，并且已

经准备踏上征途，但这时又奉命调返加尔各答，而哈福德·琼斯爵士被委派为驻波斯外交使节。1837—1838年波斯人第一次围攻赫拉特期间，英国利用同现在一样站不住脚的借口，即以保护它一向视若死敌的阿富汗人为名，夺取了哈腊克岛，可是某些情况，也就是说俄国的干涉，迫使它放弃了自己抢夺到的地盘。最近波斯又进攻并攻克赫拉特，这给了英国一个口实来谴责沙赫对它背信弃义，并占领哈腊克岛作为采取军事行动的第一步。

由此可见，半个世纪以来英国一直力图建立（尽管很少成功）它对波斯沙赫的政府的压倒优势。然而，波斯沙赫不愧为口蜜腹剑的敌人的对手，他们躲开了假惺惺的拥抱。波斯人除了亲眼看到英国人在印度的所作所为以外，大概还谨记着1805年有人对费特赫-阿利-沙赫所进的谏言：“不要相信贪得无厌的商人国家的话，这个国家在印度是用人命和王冠来做生意的。”强中更有强中手。在波斯的首都德黑兰，英国的影响极小，因为——姑且不谈俄国的阴谋活动——法国在那里占着显著的地位，而在这三个海盗中波斯最须防备的是英国。目前，波斯使团正在赴巴黎的途中，也许已经到达那里。很可能，波斯不久前局势的复杂化⁷⁵将是外交谈判的对象。其实，法国对占领波斯湾的岛屿并不是漠不关心的。使问题更趋复杂的是：法国翻出了一些早已被人遗忘的羊皮纸文件，按照文件，波斯沙赫已经两次把哈腊克岛割让给法国——第一次是在1708年，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第二次是在1808年，——固然，两次割让都附有条件，但条文上却讲得清清楚楚：必须让出某些权利，或者认可具有强烈反英情绪的国君的现代模仿者对岛屿的要求是合理的。

伦敦“泰晤士报”在最近给“辩论日报”的答复中，以英国

的名义表示愿意把欧洲事务的领导权让给法国，而亚洲和美洲事务的管理权无疑应属于英吉利民族，任何其他的欧洲强国都不得干预。然而，路易·波拿巴是否同意这样瓜分世界，还值得怀疑。总而言之，当不久前英国和波斯发生纠葛的时候，法国在德黑兰的外交没有对英国表示热心的支持；而法国报刊翻出老账，重新提起高卢人对哈腊克岛的要求，这件事大概预示着英国不能那么轻而易举地进攻和瓜分波斯。

卡·马克思写于 1856 年 10 月 30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1 月 7 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 490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 法国的经济危机

欧洲的金融界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我们由“尼亚加拉号”轮船带来的邮件得悉，金银由伦敦流往欧洲大陆的现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而进一步提高贴现率的建议，在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会议上仅以一票的多数遭到否决。不用说，造成这次危机的原因，还是应该在法国寻找，我们收到的最近一期“经济学家”杂志⁷⁶，对事态的描写也极为阴暗。这家杂志写道：

“没有任何好转实际上就是恶化，况且，令人遗憾的是，根本看不到会有任何长时期的好转。本月份与去年同月份相比，几乎在每一方面都是令人沮丧的，而去年10月，这个国家还进行着在当时看来离结束仍遥遥无期的可怕战争。”

在这种悲叹调子的驱使下，我们不嫌麻烦地将巴黎证券市场10月份的情况跟前一个月的情况作了一番比较，我们调查研究的结果可由下表看出：

	9月30日	10月31日	涨	跌
三厘无期公债	67 法郎50 生丁	66 法郎70 生丁	—	80 生丁
四厘五无期公债	90 法郎	91 法郎	1 法郎	—
法兰西银行	4010 法郎	3850 法郎	—	160 法郎
Crédit Foncier	600 法郎	585 法郎	—	15 法郎
Crédit Mobilier	1552 法郎	1372 法郎	—	180 法郎

	9月30日	10月31日	涨	跌
奥尔良铁路	1267 法郎	1241 法郎	—	26 法郎
北部铁路	950 法郎	941 法郎	—	9 法郎
东部铁路	877 法郎	865 法郎	—	12 法郎
巴黎—里昂铁路	1265 法郎	1267 法郎	2 法郎	—
地中海铁路	1750 法郎	1652 法郎	—	98 法郎
中央大铁路	610 法郎	603 法郎	—	7 法郎

从 9 月至 10 月 31 日，各公司股票行市跌价的情形如下：

Gas Paris Company	30 法郎
Union des Gaz	35 法郎
Lits Militaires	27 $\frac{1}{2}$ 法郎
Docks Napoléoniens	8 $\frac{1}{2}$ 法郎
Compagnie Maritime	40 法郎
Palais d' Industrie	5 法郎
Omnibus company	35 法郎
Messageries Impériales	50 法郎

再没有比巴黎的波拿巴派报纸竭力用以解释交易所股票不断跌价的方法更加巧妙的了。且举日拉丹先生的“新闻报”为例。这家报纸说道：

“投机家仍然不愿意抛弃他们关于有价证券会跌价的信念。Crédit Mobilier 的股票价格经常忽起忽落，使人们把这种股票看得非常危险，以致许多投机家不敢碰它们，而只限于做《primes》〔“贴水”〕交易，以期能事先减少蒙受损失的风险。”

法兰西银行为了防止或者至少是为了延缓停止兑现而采取的紧急措施，已经开始对工商阶级发生强烈的影响。目前在 bona fide〔真正的〕商业界和工业界，已经营业的投机性股份公司和计划建立的投机性股份公司之间，的确进行着一场真正的激战；它

们都在争相夺取这个国家的游资。这种斗争的必然结果是：即使不存在法兰西银行、没有任何金银外流现象，也一定会使利息提高、工业各部门的利润下降以及各种有价证券贬值。只要看一看法国铁路网的发展情况，就能了解到，撇开一切国外的影响不谈，这种对法国游资的压力一定会日益增加。我们要向读者提供的事实，是由“铁路、矿山和公共工程问题报”⁷⁷发表的，这家报纸也和这个国家的其他报刊一样，只能发表波拿巴政府许可发表的东西。总的说来，特许修建的铁路总共长达 5 584 英里，其中已经建成和通车的只有 2 884 英里。因此，目前正在修建或即将开工的还有 2 700 英里。但是还不止于此。政府正在修建比利牛斯山区的几条线路，并且已经下令修建土鲁斯至贝云、阿仁至塔布、蒙德马松至特拉贝斯坦的新线路——这些线路全长超过 900 英里。实际上，法国正在修建的铁路甚至比它已经拥有的还要多。用于法国旧的铁路网的费用估计为 3 亿美元，但是它的修建拖了很长的时期——这个时期曾目睹过三届政府的上台和下台，——而现在特许修建的线路至迟必须在六年内建成，并且在商业周期最危急的阶段开始通车。陷于财政困难的公司都纷纷要求政府准许它们通过发行新的股票和债券来筹集资金。政府知道这样做只能使市场上旧有的证券更加贬值，同时使交易所的业务更加混乱，因此不敢让步。而另一方面，钱又必须弄到手；停止工程，不仅将意味着破产，而且还将意味着革命。

当国内为了开办和维持新企业而对资本的需求如此增长不已的时候，外国企业对法国资本的吸收丝毫没有减少。谁都知道，法国资本家在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承担了大量义务，而且 *Crédit Mobilier* 还在给他们招揽新的义务。尤其是西班牙，现

在正给法国增加困难，因为那里的白银奇缺，以致巴塞罗纳的厂主感到很难支付工人的工资。

至于 *Crédit Mobilier*，我们已经说过，这个机构的意图与它的名称根本不符。它的意图是使资本固定下来，而不是使它流通。它所要流通的只不过是所有权而已。的确，它所创办的各公司的股票完全是流动性质的，但是这些股票所代表的资本却陷住不动。*Crédit Mobilier* 的全部秘诀就在于把资本吸引到工业企业里，使它陷在那里不动，然后以出卖代表这种资本的股票来进行投机。只要 *Crédit Mobilier* 的董事们能够从新股票的初次发行中获得贴水，他们当然就能够以斯多噶式的冷漠态度来看待金融市场的普遍紧张、股票持有者的最终命运以及现有各公司的困难。这也就说明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现象：虽然 *Crédit Mobilier* 的股票在交易所不断跌价，但是它的活动却不断向全欧洲扩展。

除了金融市场的普遍紧张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影响着法国的工业。里昂有一大批工厂由于生丝缺货和价钱昂贵而停工。同样的原因使牟罗兹和卢昂的工业陷于停顿。在那里，高昂的棉价使纱价猛涨，然而纺织品却滞销，工厂主不能按过去的条件成交。其结果是增加了工人的苦难和不满——特别是在里昂和法国南部，那里普遍存在着愤激情绪，这只有 1847 年危机所带来的那种情绪才能与它相比。

现在让我们打话题从交易所、铁路、商业和工业转向法国的农业。最近公布的法国关税报告书揭露了这样一事实：今年的

见本卷第 36—37 页。——编者注

双关语：《*Mobilier*》的意思是“可以动的”；《*to mobilize*》的意思是“将……变成活动的”，“使……流通起来”。——编者注

歉收比“通报”所承认的要严重得多。1855年9月进口的谷物为270 146公担，而1856年9月却进口了963 616公担，这比以歉收闻名的1855年的9月的进口数量还超过693 470公担。然而，如果认为促使法国明显地从谷物出口国变成谷物进口国的原因仅仅是水灾、恶劣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现象，那将是错误的。从未达到高度发展的法国农业，在现存政权下确实是衰退了。一方面，我们看到税收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劳动力不断减少（大量劳动者因战争而暂时离开了土地，因铁路及其他公共工程而长期离开了土地），同时资本被愈来愈多地从农业中抽去经营投机事业。所谓拿破仑的信贷民主化，实际上不过是投机买卖的普遍化。Crédit Mobilier 提供给资产阶级和上等阶级的东西，帝国贷款把它提供给了农民。帝国贷款把交易所搬到农民的茅屋里，榨干了他们的私人积蓄，刮走了从前用于改进农业的小额资本。

因此，法国农业的严重困难既是自然灾害的结果，也是目前政治制度的产物。如果说小农由于低价而受到的损失没有英国大农场主所受到的那样大，那末另一方面，他们却由于产品缺乏而受到损失，这对英国大农场主说来则往往成为利润的来源。由此便产生他们那表现为纵火事件的不满情绪，这种纵火事件极其频繁，尽管法国报纸奉皇帝的命令从不加以报道。如果农民在二月革命以后意识到，强强于他们身上的45生丁的新税是为了维持巴黎的国家工厂，因而感到愤慨⁷⁸，那末，现在的农民看到，对他们的枯竭资源课征捐税是为了让巴黎人能按照低于成本的价钱购买面包，就更加愤慨不已了。如果考虑到拿破仑归根到底正是农民

克里木战争。——编者注

投票选举出来的，那末，这个阶级现在所表现的革命情绪就使波拿巴王朝的胜算完全改观了。这个王朝为了缓和和防止贫苦农民提出带有威胁性的要求，现在已经不得不诉诸可怜的权宜之计，这可以由各省省长在“鼓励”举办慈善事业的公文中所用的措辞看出来。例如，萨尔特省省长给他手下的专区区长们这样写道：

“务祈以全副身心致力于作为行政工作的最崇高职责之一的任务，即为那些需要资助和就业的公民找到提供资助和工作的手段，你们这样做将有助于维持社会安宁。请勿担心慈善事业的财源可能已经枯竭或者私人钱囊已为近几年的捐献——不论这些捐献的数目多大——掏空。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最近获得了大量利润，他们特别关心保持乡村的安宁，因此会了解，捐献不仅是他们的义务，而且也是他们的利益所在。”

如果在上述一切引起不满的原因之外，再加上巴黎的房荒和粮荒、首都零售贸易的困难以及巴黎工业各部门的罢工，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受压制的出版自由会突然以反叛标语从房屋的墙壁上冲了出来。我们从巴黎一位可靠的通讯者那里接到一封私人信件，其中写道，从10月1日至12日，至少发生了900起逮捕事件。这些逮捕事件的起因有一些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们表明政府惶恐不安的惊人标志。有一回，一个据说是“在交易所做生意”的人，由于说了一句“他认为克里木战争不过是白白毁掉许多人命和糟蹋许多钱财”而被捕；另一回，一个商人由于说“生意跟政府一样糟糕”而被捕；有一个人被捕是因为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张关于大卫·丹热和大学生们的歌词⁷⁹；政府的一个四等文官被捕是因为印行了关于财政危机的传单；有一个裁缝被捕是因为打听了自己几个朋友是否真的像他所听说的那样遭到逮捕；最后，有一个工人被捕是因为跟自己一个当宪兵的同乡谈到食品

价格昂贵，而宪兵把工人的话说成是反对政府的言论。

鉴于这一切事实，法国的商业和工业恐怕很难避免崩溃，这种崩溃将引起比较严重的政治事件，并且将不仅对欧洲的而且对美洲的信贷与商务的稳定性发生最严重的影响。Crédit Mobilier 现在跟欧洲许多大银行一起着手进行的对俄国铁路建筑的大规模投机，只能加快向这一深渊的急速奔驰。

卡·马克思写于 1856 年 11 月 7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 1856 年 11 月 22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866 号

卡·马克思

* 欧洲的危机

根据本星期抵达的两只轮船从欧洲带来的消息来看，为大洋两岸人们本能地预感到的仿佛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打击——投机活动和有价证券买卖的彻底垮台，大概要推迟到将来了。但是，这种延期决不意味着垮台可以避免。相反，目前金融危机具有的慢性病似的性质，不过预示着它会有更残酷、更有害的结局。危机拖得越久，后果也就越坏。欧洲现在就好像一个濒于破产的人，不得不照旧进行已经使他倾家荡产的一切事务，同时又采取各种冒险手段，希望借以防止或摆脱最后的可怕打击。人们纷纷要求支付公司股息，而这些公司大多数只有虚名。大宗现金投入了投机企业，从那里就再也抽不出来，同时高利率——目前英格兰银行为7%——好像是在无情地宣布审判即将到来。

即使在目前所进行的金融骗术得到极大成效的情况下，大陆上无数证券的投机活动也不能不很快垮台。仅在莱茵普鲁士就有72个新的采矿公司，其股份资本为79 797 338塔勒。正好是现在，奥地利的Crédit Mobilier，或者确切些说，在奥地利的法国的Crédit Mobilier，由于企图按照自己的第二要求获得支付，正经受着巨大困难，因为奥地利政府的措施使恢复现金支付一事处于瘫痪状态。购买铁路、矿山所支付的款项，按照合同规定，应向御库交

纳硬币,这一事实表明,到1858年2月为止,Crédit Mobilier 的资金每月将要亏损100万美元以上。另一方面,法国铁路承包商非常缺乏现款,以致中央大铁路不得不解雇牟罗兹段的500名职员和15000名工人,而里昂—日内瓦公司只好缩减或暂时完全停止自己的业务。由于透露了这些事实,“比利时独立报”⁸⁰在法国曾两次遭到没收。在法国政府采取这种绝不容许任何揭露法国工商业的真实情况的行动的条件下,注意一下检察长的助手佩蒂先生在巴黎法院审判开始时脱口而出的下面一段话是很有意思的:

“看一看统计,你们就会得到关于商业目前趋向的一系列有意思的资料。破产数字逐年增长。1851年为2305,1852年为2478,1853年为2671,而1854年为3691。这种增长情况无论在欺诈破产和一般破产方面都是一样。前者数字从1851年起增长了66%,而后者增长了100%。至于在卖出的商品的性质上、质量和数量上的欺诈和使用假尺假秤的犯罪行为,其数字已经增长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1851年审理了1717起这种案件,1852年——3763起,1853年——7074起,而1854年则是7831起。”

诚然,不列颠报刊不顾大陆上的这类现象,硬要我们相信危机的最坏时期已经过去,但是,我们要想为此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明是徒劳无益的。无论从英格兰银行把贴现率提高到7%,或是从法兰西银行最近的报告书中,我们都找不到证明。而从法兰西银行的报告书中,不仅可以看出报告书是伪造的,而且可以看出,尽管对债券、贷款、期票贴现和发行银行券有极严格的限制,法兰西银行还是无力阻止贵金属的流失,或非加黄金贴水不可。无论那里情况怎样,十分明显,法国政府决不抱着它力图在国内外散布的那种乐观看法。在巴黎已知道,最近六个星期以来,皇帝不管遭到什么样的财政损失,也不管损失多大,都要把无期公债保持在66%以上,因为他不只是相信,而且坚决相信,无期公债下降到66%以下就意

味着敲起帝国的丧钟。可见 ,在这方面法兰西帝国与罗马帝国不同 ,因为一个怕灭亡于异族的进攻 ,而另一个却怕灭亡于证券投机商人的退却⁸¹。

卡·马克思写于 1856 年 11 月 21
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6 年 12 月 6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878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奥地利的海外贸易

可以说,奥地利的海外贸易,是从威尼斯和隶属于它的亚得利亚沿海地区根据康波福米奥和约(这个条约后来又为吕内维尔和约所确定)⁸²初次划入奥地利帝国时起开始的。所以,拿破仑是奥地利这部分贸易的真正奠基者。固然,拿破仑一看出自己以此给了奥地利多少好处,就先用普勒斯堡条约,后来又在1809年签订维也纳和约时把这一让步收了回去⁸³。但是,既已被引上正确道路的奥地利,利用了头一次到手的合适时机,通过1815年的条约⁸⁴恢复了它在亚得利亚海区域的优势。这部分贸易的中心是里雅斯特;从下表就可以看出它——甚至在较早的时期——比奥地利的所有其他港口所占的优势:

	港口:	阜 姆	的 里 雅 斯 特	威 尼 斯	其他港口	总 计
		(单 位:弗 罗 伦)				
1838 年	进口	200 000	32 200 000	9 000 000	8 000 000	49 400 000
	出口	1 700 000	14 400 000	5 300 000	2 000 000	23 400 000
1841 年	进口	200 000	22 300 000	8 500 000	5 300 000	36 300 000
	出口	1 600 000	11 200 000	3 100 000	1 900 000	17 800 000
1842 年	进口	200 000	24 900 000	11 500 000	5 100 000	41 700 000
	出口	1 300 000	11 900 000	3 400 000	2 600 000	19 200 000

1839年,威尼斯进口总值同的里雅斯特进口总值之比是1 2.84,它们的出口总值之比是1 3.8。同一年,二者船舶进港数的比例是1 4。目前,的里雅斯特所达到的优势,已经压倒包括威尼斯在内的奥地利的的所有其他港口。但是,的里雅斯特在亚得利亚海占据了威尼斯地位的这一事实,不应归功于奥地利政府的特别保护,也不应归功于奥地利的劳埃德⁸⁵的有效的的工作。的里雅斯特本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峭壁重叠的海湾,十八世纪初还只有少数渔民居住,到1814年法国军队快撤出伊斯的利亚时,变成了有23 000居民的商港,而它的贸易在1815年就超过威尼斯两倍。1832年,即成立奥地利的劳埃德前一年,的里雅斯特的居民超过了5万人;在劳埃德的作用还未必能说有多大的时候,的里雅斯特就已经在对土耳其贸易方面占第二位,仅次于英国,而在对埃及贸易方面则占第一位。这从1835年至1839年期间士麦那的进出口统计表中可以看出:

	披亚斯特	披亚斯特
英国	126 313 146	44 618 032
的里雅斯特	93 500 456	52 477 756
美国	57 329 165	46 608 320

从1837年埃及的进出口统计数字也可以看出:

	法郎	法郎
的里雅斯特	13 858 000	14 532 000
土耳其	12 661 000	12 150 000
法国	10 702 000	11 703 000
英国和马尔他	15 158 000	5 404 000

埃及的辅币名,100披亚斯特=1埃镑。——译者注

成为亚得利亚海航海事业复兴的摇篮的是的里雅斯特,而不是威尼斯,这是为什么呢?威尼斯是一个属于回忆的城市;而的里雅斯特则像美国一样,它的优点是没有任何过去的包袱。它是由意大利、德国、英国、法国、希腊、阿尔明尼亚和犹太族的各式各样的商业冒险家建设起来的,它不像礁湖之城那样为传统所束缚。例如,威尼斯的谷物贸易在十八世纪还老是抱住它旧有的关系不放,而的里雅斯特却一下子就把自己的命运同敖德萨这个新出现的明星结合在一起,因此,到十九世纪初就已经把自己的竞争者威尼斯从地中海的谷物贸易中完全排挤出去了。十五世纪末由于发现绕道非洲的航线而给古老的意大利诸商业共和国带来的致命打击,又由拿破仑的大陆关税制度以缩小的规模重复了一次。这一次把威尼斯的贸易彻底消灭了。威尼斯的资本家由于失去了从对这里的衰落的海上贸易投资获取收益的任何希望,就自然而然地把他们的资本移往亚得利亚海的对岸,因为在那里,的里雅斯特的陆上贸易这时正有加倍发展的前景。威尼斯便这样亲自养大了的里雅斯特——这是所有海上霸主的共同命运。荷兰这样为英国的强大奠定了基础;英国又这样造成了美国的强盛。

的里雅斯特在并入奥地利帝国之后,立即取得了完全不同于威尼斯所曾经占有过的那种地位。的里雅斯特为它背后的那些广大而富庶的地区的贸易提供了一个天然出口;威尼斯则一向只是亚得利亚海上的一个独占世界海上贸易的孤立而偏僻的港口;而它的这种独占,又是建立在那些没有认识到自身有利条件的国家的落后状态的基础上的。因此,的里雅斯特的繁荣,除去目前在奥地利统治下的那一批国家广大土地上的生产力和交通运输的发展程度这一条件外,不受任何限制。的里雅斯特的另一个优越性就是

它紧靠亚得利亚海东岸,这给它提供了一个几乎是威尼斯人闻所未闻的沿海贸易基地,同时东岸又是出产威尼斯从来不善于充分利用的勇敢水手的地方。威尼斯当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兴起而没落,现在,的里雅斯特的优越条件则随着奥地利对土耳其的优势的增长而增加。威尼斯贸易的发展,即使在其最繁荣的时期,也因东方贸易之被分割而受到阻碍,而这种分割完全是由于政治原因。一方面,曾有一条同威尼斯的海上贸易几乎从来没有任何联系的多瑙河贸易线;另一方面,当威尼斯在天主教国王庇护下垄断着摩里亚、塞浦路斯、埃及、小亚细亚等地的贸易的时候,热那亚人曾在正教皇帝的庇护下几乎垄断了君士坦丁堡和黑海的贸易。的里雅斯特第一次把东方贸易的这两大干线同多瑙河贸易联在一起。十五世纪末,威尼斯好像在地理上改变了位置。随着绕道好望角的航路的发现,亚洲贸易的中心起初转移到里斯本,然后转移到荷兰,最后转移到英国,而威尼斯也就跟着失去与当时的亚洲贸易中心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里亚为邻的优越性了。威尼斯所失去的优越性,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凿,现时大约将为的里雅斯特所获。的里雅斯特的商会不仅参加了法国的苏伊士运河公司,而且也派遣了自己的代理人去调查红海和印度洋沿岸,以便发展预定在这些地区进行的贸易活动。一旦运河开通,的里雅斯特无疑将以印度商品供应整个东欧;它同北回归线的距离将和它现在同直布罗陀的距离一样远近,它的船舶将经 6600 哩的海路而到达巽他海峡。

以上我们大略地描画了的里雅斯特的贸易发展前景,现在我们引证下表作为补充,这个表说明了最近十年中该港口贸易的发展情况:

年份	船只	吨数	年份	船只	吨数
1846.....	16 782	985 514	1851.....	24 101	1 408 802
1847.....	17 321	1 007 330	1852.....	27 931	1 556 652
1848.....	17 812	926 815	1853.....	29 317	1 675 886
1849.....	20 553	1 269 258	1854.....	26 556	1 730 910
1850.....	21 124	1 323 796	1855.....	21 081	1 489 197

如果把这时期的最初三年的平均数字同最后三年的平均数字比较一下(973 220对 1 631 664),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短时间的增长比例是 68 比 100。马赛远没有达到这样迅速的发展。此外,的里雅斯特繁荣的基础比较巩固,因为它是建立在扩大同奥地利本国港口以及外国港口的贸易往来之上的。例如,从 1846 年至 1848 年的对内贸易量平均每年达 416 709 吨;从 1853 年至 1855 年增长到平均每年 854 753 吨,亦即增长了一倍多。从 1850 年至 1855 年为止进出的里雅斯特港的奥地利船只总吨数为 6 206 316 吨,外国船只总吨数为 2 981 928 吨。同一时期,同希腊、埃及、东方以及黑海沿岸各国的贸易量从平均每年 257 741 吨增长到平均每年 496 394 吨。

尽管如此,的里雅斯特的贸易和航运事业还远没有达到这样一种水平,即贸易上的周转具备有一定的固定形式而且是国内各种资源充分开发的自然结果。这一点,只需看一下奥地利帝国的经济状况,它的不够发达的国内交通,它那很大一部分还身着羊皮而且根本不知道文化生活需求的居民,就可以看出。只要奥地利本国交通的发展达到哪怕是像德意志各邦已经达到的水平,的里雅斯特的贸易就会迅速而有力地为自己铺平通向帝国心脏的道路。从的里雅斯特到维也纳的铁路连同从威利到佩斯的支线的建成,将引起奥地利贸易的全盘变革,从这场变革获益最大的中心城市莫

过于的里雅斯特。这条铁路的运转量无疑一开始就会比马赛的运转量大。然而,这种运转量可能达到的规模,只有注意到下述情况才能判定:以亚得利亚海为唯一出口的各国共有 30 966 000 人口,即等于 1821 年法国的人口;的里雅斯特港将为之服务的地区广达 60 398 000 公顷,即比法国领土还要大 700 万公顷。因此,的里雅斯特在最近的将来,就注定要起马赛、波尔多、南特和哈佛尔加在一起对法国所起的那种作用。

卡·马克思写于 1856 年 11 月底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7 年 1 月 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06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奥地利的海外贸易

在前一篇文章里，我们探讨了使亚得利亚海的贸易在的里雅斯特兴盛起来的自然环境。这里的贸易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奥地利的劳埃德——一家由英国人创办、但从 1836 年起就掌握在的里雅斯特的资本家手里的轮船公司——活动的结果。最初，劳埃德只有一些轮船，每周在的里雅斯特和威尼斯之间开航一次。不久就改成了每日一次。逐渐地，劳埃德的轮船就包揽了沿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威亚海岸线上的罗文尼奥、阜姆、应腊诺、萨拉和腊古扎的全部贸易。接着纳入这家公司活动范围之内的是罗马尼亚，后来又 有阿尔巴尼亚、伊皮罗斯和希腊。在阿希佩拉哥、萨罗尼加、士麦那、贝鲁特、托列迈达和亚历山大里亚等地要求把它们纳入该公司所计划的运输网以前，劳埃德的船只一直没有离开过亚得里亚海。最后，劳埃德的轮船终于进入黑海，当着土耳其和俄国的面占据了君士坦丁堡同西诺普、特拉比曾德、瓦尔那、布来洛夫和加拉兹等地的交通线。这样，原来仅为服务于奥地利的亚得利亚海岸而组织的公司，渐渐地扩展到了地中海，并且在把黑海稳稳掌握到手以

后,看来只等苏伊士运河凿通就要进入红海和印度洋。

劳埃德最初的资本是 100 万弗罗伦,后来由于不断地招募新股和借债,它的资本增加到 1 300 万弗罗伦。1836 年以来的资本周转和使用情况在董事们最近的一次报告里表述如下:

	1836—1837 年	1853—1854 年
资本	1 000 000 弗罗伦	8 000 000 弗罗伦
轮船数目	7	47
马力	630	7 990
吨数	1 944	23 665
船只总值	798 824 弗罗伦	8 010 000 弗罗伦
出航次数	87	1465
航行哩数	43 652	776 415
载运旅客人数	7 967	331 688
载运贵金属值	3 934 269 弗罗伦	59 523 125 弗罗伦
载运信件与快讯	35 205	748 930
载运包裹	5 752	565 508
总支出	232 267 弗罗伦	3 611 156 弗罗伦
十七年中公司的全部支出(包括支付股息) ...		25 147 403 弗罗伦
全部收入		26 032 452 弗罗伦
收入超过支出		885 049 弗罗伦

从上表可以看出,劳埃德本身就是个非常重要的商业企业,所以它对它的船只所到之处的当地工商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按每一奥地利担货物的价值为 300 弗罗伦、每个旅客行李的价值为 10 弗罗伦计算,劳埃德在 1836 年到 1853 年间共运输:

商品价值	1 255 219 200 弗罗伦
行李价值	84 847 930 弗罗伦
货币和贵金属价值	461 113 767 弗罗伦
总 值	1 801 180 897 弗罗伦

一位法国作者写道：“无疑，这家商行多年来对东方事务所起的虽然不大但是从不间断的作用，至少和奥地利外交所起的作用同样有效，而且要有益得多。”

亚得利亚海上贸易的复兴和轮船航运业的发展，迟早要使从威尼斯衰落时起消失了的亚得利亚海军重新建立起来。拿破仑曾独出心裁地想要不等海上贸易恢复就去建立这样一支海军；他在安特卫普和威尼斯同时进行了这样的尝试。他既然能够没有人民的支持而建立起了陆军，他就毫不怀疑他能够没有商船队的依靠而建立起海军。但是，不仅这个计划本身无法实现，而且拿破仑还遇上了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当地所特有的一些困难。在他把最能干的工程师派到威尼斯以后，在这个城市的防御工事已经建成，漂浮 matériel〔器械〕已经修好，过去的造船厂已经重新恢复工作以后，突然发现：海战和航海方面的技术进步已使威尼斯海港变得毫无用处，正如新的贸易线已注定它的贸易和航运事业毫无成果一样。这时才明白：无论威尼斯海港用来停泊古老的帆船是多么便利，但对现代的战列舰说来它的水却太浅了，甚至巡洋舰只有先把大炮卸下才能进港，而且还必须在刮南风和大涨潮的时候。而对一个现代海军港口说来，最要紧的是，必须能让舰只随时入港；不论为了进攻或防御，其深度和面积必须足以容纳一支完整的舰队。除此以外，波拿巴发现他还犯了另一个错误：按照签订于康波福米奥和吕内维尔的条约，他把威尼斯同亚得利亚海东岸割开了，从而失去了舰队人员补充的来源。他曾在伊宗察河口到腊万纳这一带搜罗惯于航海的人员，但是枉费心机。因为在威尼斯的船夫和礁湖的渔民（他们既胆小而且人数不多）中间根本不可能招募到任何够条件的水兵。只有这个时候，拿破仑才看出威尼斯人早在十世纪时就已经

发现了的道理,即亚得利亚海的统治权只能属于占有亚得利亚海东岸的人。他明白了他的康波福米奥条约和吕内维尔条约是大大的失策,因为这两个条约使他把亚得利亚海的惯于航海的居民划给了奥地利,而给自己只留下了一个失去意义的海港的虚名(magni nominis umbram)。为了补救过去铸成的大错,他通过后来在普勒斯堡和维也纳签订的条约攫取了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威亚。

很早以前,斯特拉本就指出过⁸⁶:亚得利亚海的意大利海岸完全没有海湾和海港,而在它对面的伊利里亚海岸却布满着优良的港口。的确,我们看到,在罗马内战期间,庞培在伊皮罗斯和伊利里亚海岸轻而易举地就组成了庞大的舰队,而凯撒在意大利海岸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搜集到为数不多的船只来一批一批地运输军队。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威亚海岸由于有很深的水湾,有荒野的岩岛,有大量的浅滩和优越的天然港,便成了培育身体强壮、大胆无畏、受过几乎每天都在亚得利亚海上咆哮的大风浪锻炼的优秀水手的头等地方。这里海上的大祸害 Borà 总是来得非常突然,它掀起旋风式的风暴来袭击水手,只有最有锻炼的水手才能在甲板上呆得住。这种风暴有时一连不停地发作几个星期,受害最大的地区正好在卡塔罗港和伊斯的利亚南端之间。但是,达尔马威亚人由于从小就习惯于同这种大风暴作斗争,所以在它的猛烈袭击下他们只能锻炼得越发坚强,而把其他海洋上的一般风暴完全不放在眼里。这样,空气、陆地和海洋就共同培育出了这一带海岸上的坚强而沉着的水手。

一个伟大名字的影子。——编者注

布拉风(强烈的东北风)。——编者注

西斯蒙第曾说过,制造丝绸对伦巴第的农民说来是这样自然,正像吐丝之对于蚕一样。同样,对达尔马威亚人说来,海上生活是这样自然,就像对于海岛一样。正像绿林豪杰是古条顿族诗歌的主题一样,海上英雄成了他们民歌的主题。达尔马威亚人至今仍念念不忘乌斯考克人⁸⁷东征西讨的功绩;这些人曾在一个半世纪当中使威尼斯和土耳其的正规军队不敢轻举妄动。只是在1617年土耳其和奥地利签订条约以后他们才停止了活动,可是这以前乌斯考克人是享有皇帝荫庇之便的。乌斯考克人的历史只有第聂伯河畔的哥萨克人的历史可与之相比:前者是从土耳其被赶出去的,后者是从波兰被赶出去的;前者横行于亚得利亚海上,后者在黑海大逞雄威;前者最初受到奥地利的秘密支持,但后来却被奥地利消灭,对于后者,俄国起了同样的作用。海军上将埃梅里奥的地中海战舰的达尔马威亚水手是为拿破仑所赞赏的。所以说,毫无疑问,亚得利亚海东岸具备第一流海军所需要的兵源。这些人所唯一不足的就是纪律。拿破仑根据1813年的人口调查得知这海岸上共有水手43 500人:

的里雅斯特	12 000
阜姆	6 000
萨拉	9 500
斯普利特	5 000
腊古扎	8 500
卡塔罗	2 500
<hr/>	
总 计	43 500
现时他们的人数至少应该是	55 000

拿破仑为建立亚得利亚海舰队找到人员以后,就去寻找港口。伊利里亚各省是根据1809年维也纳条约被他正式拿到手的,但是

从奥斯特利茨战役以来这些地方就被法军占据着，拿破仑利用战争状态为他打算在和平时期要大规模修建的工程进行了准备。1806年，博丹-博普雷先生奉命率领一批法国海军的工程师和天文测量员去勘察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威亚海岸，为计划在亚得利亚海上建立的海军基地选择一个最适宜的地点。他们考察了整个海岸，最后工程师们看中了位于伊斯的利亚半岛南端的波拉港湾。威尼斯人只想把自己的海军保持在威尼斯本地，因此不仅轻视波拉港湾，而且还极力散布风声，说这个港湾有浅滩，军舰不能开进。但是博普雷先生查明该地没有任何浅滩，波拉符合一个现代军港的一切要求。在各个时代它都作过亚得利亚海上的海军驻地。它在罗马人远征伊利里亚和班诺尼亚的时期是罗马人的海军行动中心并且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经常性的海军基地。它在不同时期被热那亚人、威尼斯人、最后还被乌斯考克人占领过。波拉港湾的各个部分都既深且宽，海上有岛屿为屏障，背后有俯临全港的山岩为依靠。这里唯一的缺陷就是气候有害于健康和热病流行，而这个缺陷，据博丹-博普雷先生断定⁸⁸，采用当地至今尚未见过的排水设施就可以克服。

奥地利人迟迟不能习惯他们在成为海军强国的想法。直到最近，他们的海军署在他们自己眼中还只不过是陆军的一个部门而已。陆军上校的军衔等于海军上校的军衔；陆军中校等于海军巡洋舰舰长；陆军少校等于海防舰舰长。对奥地利人说来，军衔表上的这种相等似乎就保证了陆军军人和海军军人在职务上的真正相等。他们认为他们找到了培养一名海军士官的最好办法，那就是先让他成为一个骠骑兵的旗手。海军兵员的补充办法和陆军相同，唯一不同之点只是，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威亚两省专门为海军提供

兵员。服役期限也一样,即无论在陆上或海上都是八年。

陆军和海军分开,也像奥地利现代的一切进步一样,是1848年革命的结果。奥地利人丝毫也没有从拿破仑吸取教训;到1848年为止,威尼斯一直是奥地利的唯一的军火库。奥地利人就没有考虑过威尼斯海港的缺点,因为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现代化的海军。他们的全部海军只包括:6艘巡洋舰、5艘海防舰、7艘双桅舰、6艘单桅舰、16艘轮船和36艘军用艇,共有大炮850门。作为对意大利人闹革命的惩罚,奥地利人把海军学校、了望台、水文测量局、漂浮器械和炮场由威尼斯移到了的里雅斯特。造船厂和器材库则留在原处;因为官僚的报复心理,海军部门就这样被分置在两地。但是这样奥地利并没有惩罚了威尼斯,而只是把自己的海军基地的这两部分都削弱了。奥地利政府只是逐渐发现,无论的里雅斯特是多么出色的商港,但是用它作海军基地却是不合适的。最后奥地利政府才想起了拿破仑在亚得利亚海上所受到的教训,而把波拉作为他们的海军管理的中心。海军总部迁到波拉后的头几年时间,他们不是用来修建造船厂,而是完全按照奥地利的办法:用来修建营房。波拉防御系统的基础,是从港湾入口处的岛屿上组织交叉火力,跟一连串马克西米利安式塔楼配合起来,这些塔楼的作用是阻止敌舰对港口进行轰击。除了战略上的优点以外,波拉还具备一个作为优良港口所必备的条件:它能够保证一支庞大海军的物资供应。伊斯的利亚的橡树林按质量比那不勒斯的毫不逊色;卡尔尼奥拉、克伦地亚和施梯里亚有用不尽的松木林,它们现在已经成了的里雅斯特的主要出口项目,施梯里亚有丰富的铁;昂科纳的大麻经波拉向外运出是再便当没有的了;煤迄今仍要从英国运来,但是达尔马西亚的塞贝尼科地区的煤矿已开始生产质量更好的煤了,而

一俟维也纳至的里雅斯特的铁路通车,就能够从塞美林运到质量最好的煤。伊斯的利亚的一切农产品,由于是在白垩土质上生长出来的,所以都能耐得住长途运输。植物油非常丰富;匈牙利的谷物向这里供应非常方便;从多瑙河流域可以远来大量的猪肉。这些猪肉现在都销售于加拉兹和汉堡,但是铁路将会把它运到的里雅斯特和波拉。

所有这些恢复亚得利亚海的海军威力的优越条件只遇到一个障碍,那就是奥地利本身。假如奥地利凭着它现有的组织和现有的政府能够在亚得利亚海上建立一支强大的商业和军事的舰队,那它就要推翻全部历史传统,——按照历史传统,海上势力的强大永远是同自由结合在一起的。但是,推翻传统则意味着推翻奥地利自身。

卡·马克思写于 1856 年 11 月底
载于 1857 年 8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082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霍亨索伦王朝的神权

目前欧洲所关心的只有一个重大问题——纽沙特尔问题⁸⁹。至少普鲁士报刊是这样认为。固然，纽沙特尔公国加上瓦兰壬伯爵领地，从数学上来看，是相当小的数字——14平方德里。可是，正如柏林的御用哲学家们所说，通常使事物伟大或渺小、崇高或可笑的，是质而不是量。对他们说来，纽沙特尔问题是革命和神权之间的永恒的争论，是一个很少受地理面积影响的矛盾，正像万有引力定律很少受太阳和网球的差别影响一样。

让我们来探讨一下，霍亨索伦王朝称之为他们的神权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关于我们现在所谈的问题，他们的依据是1852年5月24日于伦敦签订的一项议定书。根据这项议定书，法国、英国和俄国的全权代表

“承认按照维也纳条约第二十三条、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属于普善士国王的管治纽沙特尔公国和瓦兰壬伯爵领地的各项权利，此等权利从1815年至1848年曾与按照同一条约第七十三条赋予瑞士的权利同时并行。”

这一“外交干涉”对普鲁士国王管治纽沙特尔的神权的承认，只不过是 在维也纳条约规定的限度内。维也纳条约所根据的，又是普鲁士在1707年所取得的权利。而1707年的情形又是怎样呢？

纽沙特尔公国和瓦兰壬伯爵领地，在中世纪时属于勃艮第王

国,在大胆查理失败⁹⁰以后,成了瑞士联邦的盟国,后来虽屡易封建“宗主”,却始终处于伯尔尼直接保护下的盟国地位,直到维也纳条约把它们变成瑞士联邦的成员为止。管治纽沙特尔公国的宗主权最初为夏龙-奥伦治世家所得,后来由于瑞士的干涉,转入朗格维尔公爵家族之手,最后,当这个家族的男系人物全都死亡后,则传给了公爵的姊妹,寡居的奈穆包公爵夫人。在公爵夫人接收这些领地后,英国国王兼纳骚-奥伦治公爵威廉三世提出抗议,并把他想取得纽沙特尔和瓦兰王的权利让给他的堂弟,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但这个决定在威廉三世在世时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奈穆尔公爵夫人玛丽死后,弗里德里希一世提出了他的要求,但是由于又出现了十四位继承者,所以他聪明地提出由纽沙特尔和瓦兰王的等级会议来解决这场争论,并且事先买通评议委员来取得对他有利的裁决。于是,普鲁士国王靠行贿当上了纽法特尔公爵和瓦兰王伯爵。他的这两个爵位曾被法国革命所取消,但维也纳条约又给恢复了,后来又再次为1848年革命所取消。为了反对人民的革命权利,他诉之于霍亨索伦王朝的神权,但看起来,这个神权不过是贿赂的神权。

琐碎细小是一切封建冲突的特点。但是,也必须注意到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法国国王成功地取代自己的诸侯时所使用的不可胜数的小冲突、阴谋诡计、背信弃义等手法,无疑将永远成为历史学家所喜爱的题目,因为它们是一个大国形成的里程碑。另一方面,讲述某个诸侯如何为自身利益割去德意志帝国的相当大

1857年1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公爵的姊妹”作“最后一个公爵的姊妹”。——编者注

一部分领地,却是完全无益和乏味的题目,除非有某种特殊情况,像奥地利历史上所有的那种情况使它生色。在这里,我们看到:同一个公爵,既是由选举产生的帝国首领,又是帝国一个省的世袭诸侯,竟为了本省的利益而阴谋侵害帝国;这个阴谋取得了成果,因为他的南侵行动似乎使德意志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的传统冲突复起;而他的东侵行动似乎延续了日耳曼种族和斯拉夫种族之间的殊死斗争相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对信奉伊斯兰教的东方的反抗;最后,他利用巧妙的亲族关系使他的家族势力达到这样高的地位,以致一度不仅大有把帝国罩上表面的光彩而一口吞下之势,而且简直要把整个世界葬于一个世界君主国的墓茔中。这样规模宏伟的大事,在勃兰登堡边区侯国的历史上是怎样也找不出的。它的对手的历史听起来像一首魔鬼的史诗,而它的历史则只不过像一段家庭丑闻。两者之间,甚至在本来可以希望发现利益相似(即令不是利益一致)的地方,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勃兰登堡和奥地利这两个边区起初对德意志防御和进攻邻近斯拉夫部落具有前哨的意义。但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勃兰登堡的历史也是缺乏色彩、生命和魅力的,因为它湮没在同没没无闻的斯拉夫部落的小争斗之中了。这些部落散居在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的一小块土地上,而且其中没有一个发展到足以在历史上占有任何位置的程度。没有一个历史上有名的斯拉夫部落曾经被勃兰登堡边区侯国征服过或者被它同化过,这个侯国甚至也从没有能够把自己的势力伸展到邻近的温德海。自十二世纪以来就为历代勃兰登堡边区侯爵所覬觐的波美拉尼亚,甚至到1815年也还没有全部并入普鲁士王国⁹¹。当勃兰登堡选帝侯开始蚕食它的时候,它早已不是一个斯拉夫国家了。波罗的海南岸和东南岸的变化,部分是由于德意志市民的商业

雄心,部分是借助了德意志骑士的刀剑;这变化属于德意志和波兰的历史,而与勃兰登堡的历史是无关的。勃兰登堡只是来收获不是它自己种下的庄稼。

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对于冠有阿基里斯、西塞罗、奈斯托尔和赫克脱这些古典名字的人物多少有所了解的无数读者当中,只有极少数人曾经想到过,勃兰登堡的砂土地不仅在我们的时代出产马铃薯和绵羊,而且还出过好些选帝侯,他们有四个之多,名字是:阿尔勃莱希特·阿基里斯、约翰·西塞罗、约阿希姆第一·奈斯托尔和约阿希姆第二·赫克脱。正是这些曾促使勃兰登堡选帝侯国缓慢地发展为一个可以姑且称之为欧洲强国的庸人们,使它的不大高明的历史得免于过分轻率地暴露在公众眼前。基于这一事实,普鲁士的政治家和著作家就用最大的努力来使全世界认为,仿佛普鲁士是 *par excellence* (标准的) 军事君主国,从中可以得出结论,霍亨索伦的神权应当意味着刀剑之权,即征服之权。但是没有比这种概念更不符合事实的了。恰恰相反,可以断言,在霍亨索伦王朝现时所据有的所有省份中,严格说来,只有一省——西里西亚是他们征服的,这是他们王朝历史上唯一的一项业绩,以致给弗里德里希二世带来了一个“唯一王”的绰号。我们要知道,普鲁士王国的国土有 5 062 平方德里以上,其中勃兰登堡省,即使按其现有的疆界计算,也不超过 730 平方德里,而西里西亚则不超过 741 平方德里。那末,霍亨索伦王朝怎么竟能占有面积达 1 178 平方德里的普鲁士、536 平方德里的波兹南、567 平方德里的波美拉尼亚、460 平方德里的萨克森、366 平方德里的威斯特伐里亚、479 平方德里的莱茵普鲁士呢?这是靠贿赂的神权、公开的购买、零星的盗窃、对遗产的猎取和分赃的贩卖性条约获得的。

在十五世纪初,勃兰登堡边区侯国隶属于卢森堡王朝,这个王朝的首领西吉兹蒙特同时也掌握着德意志帝国的王权。当他非常缺钱而且被债主逼得很厉害的时候,他碰上了一个性情随和、容易商量的朋友,纽伦堡的军政长官弗里德里希。论起家世,弗里德里希是一个属于霍亨索伦世家的王公。1411年,弗里德里希被任命为勃兰登堡的最高长官。勃兰登堡仿佛是作为皇帝向他借款的抵押品而交给他的。正像一个已经初步占有败家子的房产的精明高利贷者一样,弗里德里希继续用新的贷款使西吉兹蒙特陷入新的债务中,直到1415年弗里德里希得到勃兰登堡世袭选帝侯国从而借贷双方以此了清债务为止。为了不致对这件事的性质留下任何疑点,它附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卢森堡王朝保留可用40万金弗罗伦赎回选帝侯国的权利;另一个条件是弗里德里希及其继承者在每次选举皇帝的时候,必须投卢森堡王朝的票。第一个条件明显地说明所缔结的协议是一项交易,第二个条件表明它是一种贿赂。为了成为选帝侯国的绝对主人,西吉兹蒙特的这位贪得无厌的朋友只需要再做一件事——取消可以赎回的那个条件。为此弗里德里希等着了一个好时机,即西吉兹蒙特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⁹²上又由于帝国代表团的开支而感到手头拮据,这时他就急忙从自己的边区赶到瑞士,倾囊相助,于是这个致命的条件便被消灭了。这就是在位的霍亨索伦王朝迄今据以占有勃兰登堡选帝侯国的神权所由来的途径和手段。普鲁士王国就是这样产生的。

弗里德里希的直接继承人是一个十分软弱无力的人,因为他有一种总是身披铁甲在公众面前出现的怪癖,所以有“铁人”的外号。他用10万金弗罗伦从条顿骑士团手里买下了新边区,正像他父亲从皇帝手里买下了老边区和他的选帝侯的爵位一样。从此以

后,零星收买欠债君主的领土的方法成了历代霍亨索伦选帝侯习以为常的事情,正像武装干涉曾经是罗马元老院的家常便饭一样。我们且把这种肮脏交易的枯燥详情放在一边,来看看宗教改革运动的时代吧。

不要以为:既然宗教改革运动成了霍亨索伦王朝的主要支柱,那末霍亨索伦王朝也是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支柱。完全相反。这个王朝的创业人弗里德里希第一的统治是从他率领西吉兹蒙特的军队攻打胡斯派⁹³开始的,后者为他的这种热心曾狠狠地打击了他。1499—1535年在位的约阿西姆第一·奈斯托尔对待宗教改革运动,就如对待塔波尔派⁹⁴运动一样。他一直到死都在迫害这个运动。约阿希姆第二·赫克脱,虽然自己信奉了路德教,但是正在新教被查理五世的占压倒优势的力量弄得精疲力尽的时刻却不肯拔剑相助。他不但拒绝参加施马尔卡尔登联盟⁹⁵的武装反抗,反而在暗中援助皇帝。因此,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从霍亨索伦王朝方面所遇到的,在它产生时是公开的敌对态度,在它斗争的早期是虚伪的中立,而在它可怕的一幕,即在三十年战争⁹⁶时期,则是畏缩动摇、胆怯的消极和卑鄙的背信弃义。大家知道,选帝侯乔治·威廉曾企图切断古斯达夫·阿道夫的解放部队的去路,古斯达夫·阿道夫曾不得不施展各种手段把选帝侯赶进新教阵营,后来这位选帝侯同奥地利签订了片面和约⁹⁷,企图溜出这个阵营。然而,即使霍亨索伦王朝不是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骑士,无疑也是它的财务管理。他们不愿为宗教改革运动的事业奋斗,却热衷于借宗教改革运动之名进行打劫。对他们说来,宗教改革运动只不过是使教会财产世俗化的宗教根据,所以他们在十六和十七两个世纪中所获得的产业的最好部分都可以归之于一个丰富的来源,即掠夺教会。这

的确是神权的相当奇异的表现方式。

在霍亨索伦君主国形成的历史上,最重要的有三件事:取得勃兰登堡选帝侯国,普鲁士公国和这个选帝侯国的合并,最后是普鲁士公国晋升为王国。我们已经知道取得选帝侯国的情形。普鲁士公国的获得则是通过三个步骤。首先,使教会财产世俗化;其次,用相当暧昧的通婚:选帝侯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娶了膝下无子的普鲁士公爵、精神错乱的阿尔勃莱希特的次女,而他的儿子约翰-西吉兹蒙特则娶了公爵的长女;最后是用右手收买波兰国王的近臣,用左手收买波兰贵族共和国的议会。这些收买勾当非常复杂,以致整整延续了好多年。把普鲁士公国变为王国也是采用这一类办法。选帝侯弗里德里希第三亦即后来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为要取得王位,需要得到德意志皇帝的同意。为了取得皇帝的天主教良心所愤怒地反对的这个同意,弗里德里希第三收买了耶稣会教徒沃尔弗(列奥波特一世的忏悔牧师),而且附加了3万名勃兰登堡人,他们得在奥地利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⁹⁸中充当炮灰。霍亨索伦选帝侯返回到了用活货币付账的古日耳曼习俗时代,区别只在于:古日耳曼人用的是牲畜,而他用的却是人。禀承天命的霍亨索伦王国就是这样起家的。

霍亨索伦王朝从十八世纪初鸿运亨通以来,更加完善了他们的扩大领地的方法:除贿赂和交易之外,又加上了同俄国订立瓜分某些国家的条约,他们并没有战胜这些国家,但是当这些国家被打败之后,他们却突然向它们扑过去。例如,我们看到,霍亨索伦王朝同彼得大帝串通起来瓜分了瑞典领土;同叶卡特林娜二世串通起来瓜分了波兰;同亚历山大一世串通起来瓜分了德意志⁹⁹。

因此,那些以纽沙特尔是霍亨索伦王朝靠贿赂得到的为理由

来反对普鲁士要求占有它的人们就犯了一个可悲的错误,即忘记了霍亨索伦王朝之取得勃兰登堡、取得普鲁士就是靠了贿赂,而且取得王位也是用了同样的方法。不可能有任何疑问:他们占有纽沙特尔是和占有他们的其他领地一样,凭着同一个神权,并且他们不可能放弃其中的一个而不使所有其余的都受到危险。

卡·马克思写于 1856 年 12 月 2 日

左右

载于 1856 年 12 月 13 日“人民报”

第 241 号,署名:卡·马·

并载于 1857 年 1 月 9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4906 号,没有署名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并根据“纽

约每日论坛报”校对过

卡·马克思

* 英 中 冲 突

昨天早晨由“亚美利加号”轮船带到的邮件,有许多是关于英国人在广州同中国当局的冲突和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的军事行动的文件¹⁰⁰。我们认为,每一个公正无私的人在仔细地研究了香港英国当局同广州中国当局之间往来的公函以后,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是在英国人方面。英国人硬说,造成冲突的原因似乎是某些中国官员没有向英国领事提出请求而自行登上了停泊在珠江江面的一只划艇,强行带走了几名中国罪犯,并且扯下了飘扬在划艇桅杆上的英国国旗。但是,正如伦敦“泰晤士报”所写的,“这里的确有许多引起争论的问题,如划艇是否悬挂着英国国旗、领事采取的措施是否完全正确等”。提出这样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如果我们记得,领事硬套用于这只划艇的条约规定¹⁰¹,只适用于英国船只;可是,许多材料都表明,这只划艇,从任何正确意义上来看,都不是英国的。但是为了使我们的读者能够看到事件的全貌,我们且把双方照会中最重要的部分摘引出来。首先是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先生于10月21日给叶总督的通知:

“本月8日早晨,一大队身穿军服的中国官兵,事前根本没有照会英国领

事,就擅自登上与其他船只一起停泊城外的英国划艇‘亚罗号’;他们不顾英籍艇长的抗议,竟将划艇十四名水手中的十二名中国水手加以逮捕、捆绑而去,并将艇上的旗帜扯下。当天,本领事即将这一公开侮辱英国国旗和严重破坏善后补充条约第九款的全部群情通知贵大臣,要求贵大臣对这一侮辱事件提供赔偿,并保证在本案上严格遵守条约规定。然而贵大臣令人莫解地不顾正义和条约规定,既不对这一侮辱事件提供赔偿,也不表示道歉,而被你们逮捕的水手仍然扣押在你们狱中这一情况,说明贵大臣赞同这次破坏条约的行动,使英王陛下政府无法相信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看来,划艇上的中国水手所以被中国官员逮捕,是因为后者获悉这批水手中有些人曾参与抢劫某一中国商船的海盗行为。于是英国领事就指控中国总督逮捕水手、扯下英国国旗、拒绝作任何道歉并将被捕者囚入监狱。中国总督在给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的信中肯定说,他在查明被捕者当中有九人无罪后,已于10月10日指派一名军官把他们送回船去,但巴夏礼领事拒绝接受他们。至于划艇本身,则这位总督声称,在船上逮捕中国人时就认为它是一只中国船,而这是正确的,因为这只划艇是由一个中国人建造的,属于一个中国人所有,船主把这只船在英国殖民地船籍登记簿上注册,骗取到了一面英国国旗,——这大概是中国走私贩惯用的办法。至于侮辱英国国旗的问题,则总督指出:

“贵国划艇湾泊下碇,向将旗号收下,俟开行时再行扯上,此贵国一定之章程也。到艇拿人之际,其无旗号已属明证,从何扯落。巴领事官屡次来伸,总以扯旗欲雪此辱为名。”

根据这些前提,中国总督得出结论说,没有任何违背条约的行为。虽然如此,英国全权代表在10月12日不但要求交出划艇的

见华廷杰“触藩始末”卷上第十五页:十月初三日致英酋照会。——译者注
包令。——编者注

全体被捕水手,并且要求道歉。总督对此答复如下:

“二十四日卯刻发去巴领事官劄,并申明犯案之梁明太、梁建富并见证之吴亚认共三名,连前九名,共计十二名,一并交还,而巴领事官将解还之人犯十二名并劄文不收。”

可见,巴夏礼这时是有可能取回他的所有十二名水手,而那封他没有拆阅的信很可能是含有道歉的意思的。就在同一天晚上,叶总督曾再一次询问,为什么不接受他送去的人犯,为什么他的信得不到任何答复。这一点没有受到任何理会,而到了24日,攻击炮台的炮火却响起来了,有几处炮台被占领了。直到11月1日,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才在他给总督的信中解释了巴夏礼领事这种显然不可理解的行为。他写道,水手是送回给领事了,可是“并非公开地送回到他们的船上,并且没有按照破坏领事裁判权的规定表示道歉”。这样,全部事情就归结为这么一个诡辩:似乎没有把包括三名刑事犯在内的一群水手以应有的隆重仪式送回船去。对这一点,两广总督首先答复说,十二名水手实际上已经移交给领事,并无“任何拒绝遗送他们回船”的情况。直到城市被轰击了六天之后,中国总督才知道这位英国领事还想要些什么。至于道歉,叶总督坚持无歉可道,因为没有任何错误。我们且引用他的话:

“本大臣办事人员进行逮捕时,未见任何外国旗帜,并且委派办理此案的官员在审讯犯人时,证实该艇决非外国船只,因此本大臣认为没有任何错误。”

确实,这个中国人的逻辑力量是如此令人信服地把这全部问

见华廷杰“触藩始末”卷上第十五页:十月初三日致英酋照会,引文中“二十四日”是指咸丰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即1856年10月22日。——译者注

题都解决了，——显然，这里不再存在任何别的问题，——以致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终于只好宣称：

“对于‘亚罗号’划艇事件的是非曲直，本统帅断然拒绝再作任何辩论。本统帅对于巴夏礼领事向贵大臣陈述的事实经过完全满意。”

但是这位海军上将在占领了炮台、打开了城墙、连续轰击广州六天以后，突然发现一个崭新的行动目标，因为他在10月30日对中国总督写道：

“贵大臣目前应当同本统帅举行紧急会议，以结束现状，这种状况的有害后果现在已经很大，如果不予补救，必将招致最严重的灾难。”

中国总督答复说，按照1849年的协定¹⁰²，海军上将没有权利要求举行这种会议。接着他说：

“惟所称进城一节，查道光二十九年三月间，贵国公使出示在公司行，内称本总督出示，不准番人入城等语，载在新闻纸，谅贵提督早已知悉，况不能进城，出自广东百姓，众口一词。此番攻破炮台，焚毁民房，其心不甘，已可概见。本大臣有恐贵国官民因此受害，莫若仍照文公使所议办理为是。至所称熟商一事，本大臣前已有委员雷州府蒋守矣。”

于是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干脆宣称，他根本不理睬文翰先生的协议：

“贵大臣回信要求本统帅注意英国公使在1849年公布的关于禁止外国人进入广州的告示。在这种情况下，本统帅应当提醒贵大臣，虽然我们确实有充分理由对中国政府违背在1847年允许外国人于两年后进入广州的诺言，表示不满，但是本统帅目前所要求的，与以前有关这一问题的交涉毫无关系，本统帅并不要求准许其他人员入城，而只要求准许外国官员入城，这样做只是出于前面所说的简单而充足的理由。对于本统帅提出的亲自同贵大臣谈判

见华廷杰“触藩始末”卷上第十五页：十月初三日致英酋照会。——译者注

的建议,承贵大臣相告,数日前已经派一知府前来。因此本统帅不得不认为贵大臣的全部来信极端不能令人满意,只能谨此附告,如果不能立即得到贵大臣同意我们建议的明确保证,本统帅即将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

叶总督提出反驳,再次详细叙述了 1849 年的协定:

“1848 年,前大臣徐与英国公使文翰先生曾就这一问题往复辩论很久,文翰先生确信在城内会晤已无可能,就在 1849 年 4 月致函徐大臣称:‘今不再与贵大臣争议这个问题。’随后文公使在各商馆出告示,不准一个外国人入城,这一告示曾在报上登载,公使并将这件事奏明英国政府。任何中国人或外国人都认为这个问题不应再争论。”

于是,不耐烦辩驳的英国海军上将就用武力为自己铺平通向广州总督府的道路,同时摧毁停在江面的帝国舰队。这样,这出外交兼军事的活剧就截然分成两幕:在第一幕中,借口中国总督破坏 1842 年的条约,开始炮轰广州;而在第二幕中,则借口那位总督顽强地坚持 1849 年的协定,更猛烈地继续炮轰。起先广州遭到轰击是因为破坏条约,后来广州遭到轰击是因为遵守条约。同时,就是在第一种场合下,甚至也不是借口没有给予赔偿,而只是借口没有以应有的形式给予赔偿。

伦敦“泰晤士报”就这个问题所提出的观点,就是比尼加拉瓜的威廉·沃克将军¹⁰³也无逊色。

此段在华廷杰“触藩始末”卷上第十九页所载十月二十日复英酋照会中的文字如下:

“至进城一节,前大臣徐既与前公使文往复辩论,罢议此事,来文所称进城之议,前公使文未奉准罢之,亦未自行罢之等语,如果未罢,何以文公使出示在公司行内有不准番人入城之语,载诸新闻纸内,岂非自罢之确据乎。并查文公使前次来文,内称有具奏贵国之语,是以本大臣前在巡抚任内亦会同前大臣徐,以英人罢议进城一事奏明大皇帝在案。”

前大臣徐是指叶名琛前任两广总督徐广缙。——译者注

这家报纸写道：“由于这次爆发了军事行动，现有的各种条约就此作废了，我们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我们同中华帝国的关系了。广州最近发生的事变警告我们，应当坚持要求取得 1842 年条约规定的自由进入这个国家以及进入对我们开放的那几个口岸的权利。人们不应当再对我们说，因为我们已经放弃履行那条许可外国人进入自己商馆以外地区去的条款，我们的代表必定为中国总督摒辞不见。”

换句话说，“我们”开始采取军事行动是为了撕毁现有条约和坚持要求实现一项条约中明文规定的“我们”业已放弃的要求！不过，我们也乐于报道，英国舆论界另一家著名的报刊却用比较合乎人情和恰当的语气表示了意见。

“每日新闻”¹⁰⁴写道：“真是奇怪，为了替一位英国官员的被激怒了的骄横气焰报仇，为了惩罚一个亚洲总督的愚蠢，我们竟滥用自己的武力去干罪恶的勾当，到安分守己的和平住户去杀人放火，使他们家破人亡，我们原来是像不速之客那样闯入他们的海岸的。且不说这次袭击广州的后果如何，无所顾忌地和毫无意义地把人命送上虚伪礼节和错误政策的祭坛，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丑恶和卑鄙的。”

世界上的文明民族对于这种以违背了无中生有的外交礼节为借口，不先行宣战就侵入一个和平国家的做法，是否赞同，或许还是一个问题。如果说第一次对华战争尽管借口并不体面¹⁰⁵，但由于它展示了打开对华贸易的前景，各列强也就耐心地观望着，那末，这第二次战争岂不是要无限期地阻碍这种贸易吗？这次战争的第一个后果，必定是把广州同绝大部分依然掌握在帝国臣民手中的产茶区¹⁰⁶隔断开来，——这种情况只能对俄国的陆路茶商有利。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1 月 7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1 月 23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18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 山地战的今昔

由于不久前瑞士有可能遭到入侵¹⁰⁷,并且这种可能性目前还没有完全消失,大家很自然地不仅对这个山地共和国的防御能力发生兴趣,而且还对一般山地战发生了兴趣。人们通常倾向于把瑞士看成一个不可攻破的国家,把入侵的军队想像为罗马的斗士,这些斗士在出征前要高呼《Ave, Caesar, morituri te salutant》(“光荣啊,凯撒,决心牺牲者向你致敬”),已是尽人皆知的了。人们常常向我们提到森帕赫、莫尔加顿、穆尔顿和格兰桑等会战¹⁰⁸,同时指出,敌军进入瑞士也许相当容易,但是正如奥地利的阿尔勃莱希特的弄臣所说,想再从那儿出来就困难了。甚至军人也会数出许多险要的山道和狭谷的名字,在那种地方只要很少一些人就能轻易地抵挡住一两千名最精锐的士兵。

关于被称为山地要塞的瑞士是不可攻破的这个传统概念,早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对奥地利和勃艮第的多次战争中就形成了。在对抗奥地利的战争中,入侵者的主要兵种是全身披甲的骑士队,它的威力在于对那些没有火器配备的军队进行歼灭性的攻击。但是在像瑞士这样的国家里,正好不能进行这种攻击,在瑞士,骑兵(除了最轻装的而且是很少量的以外)甚至到现在也无用武之地。至于那些披戴着成百斤铁甲的十四世纪的骑士,就更无能为力了!

弗·恩格斯“山地战的今昔”的手稿的第一页

他们只得下马徒步作战,这样,他们就连最后一点运动能力也丧失无遗,进攻者便变成了防御者,而一旦遇到狭谷,甚至连棍棒也抵御不了。在勃艮第战争时期,手持长矛的步兵在军队里已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并且采用了火器,但是步兵仍然受到沉重的盔甲的束缚,火炮很重,而轻火器既不方便,用处也不大。部队的各种装备仍然非常笨重,使得他们根本不适于进行山地战,尤其是在那种可以说几乎还没有道路的时代里。因此,当这些行动迟缓的军队一陷入难以通行的地区,他们就寸步难移,而轻装的瑞士农民却能够采取进攻行动,更巧妙地机动和包围,最后战胜敌人。

在勃艮第战争以后的三百年间,瑞士没有遭到过一次严重的入侵。关于瑞士人不可战胜的传统观念变得非常神圣,一直保持到法国革命,这个粉碎了许多神圣传统的事变也把这一传统观念打破了,至少在熟悉军事史的人们的心目中是如此。时代变了。身披铁甲的骑兵和行动不便的长矛手绝迹了,战术经过了多次的革命化,运动性成为军队的主要素质;马尔波罗、奥伊根和弗里德里希大帝的线式战术不断被革命军的纵队和散兵线所推翻;自从波拿巴将军在1796年越过了卡迪博纳山口,楔入奥军和撒丁军分散配置的纵队中间,从正面击溃了他们,同时又在滨海阿尔卑斯山脉的狭谷里切断了他们的退路,并俘掳了大部分敌军——自从这个时候起,就创立了山地战的新方法,瑞士不可攻破的看法也就随之告终了。

在采用现代战法以前的线式战术时期,作战双方往往都竭力避开难以通行的地形。地形愈平坦,就愈认为是好战场,只求那里

有一些能保障一翼或两翼安全的天然障碍就行了。可是从法国革命军开始,采用了另一种战法。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进行防御,他们都力求找到正面前有天然障碍的阵地,因为这种障碍既可掩护散兵线,又可掩护预备队。总的说来,他们更喜欢在难以通行的地形上作战;他们的部队机动灵活得多;他们的战斗队形——散开队形和纵队——不仅可以向任何方向迅速前进,而且甚至能有效地利用起伏地上的各种掩蔽地,而他们的敌人在这种地形上却一筹莫展。实际上,“不能通行的地形”这一术语差不多已从军语中删去了。

瑞士人在1798年对此深有体会。当时,法军四个师尽管遇到当地居民的顽强抵抗和旧森林州的三次起义,仍然攻占了这个国家,使它在以后三年内成为法兰西共和国和反法同盟间最重要的战场之一¹⁰⁹。法国人是多么不在乎瑞士那些难以攀登的高山和峡谷,他们早在1798年3月间,当马森纳首先向奥军占领的最险峻多山的格劳宾登州进攻的时候就已证明了。奥军当时占领着上莱茵河谷。马森纳的部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方法越过了一些几乎不能通过马匹的山口,突入河谷,占领了所有的出口,使奥军在短时间的抵抗以后被迫放下了武器。奥军很快接受了这一教训;他们在对山地战素有研究的霍策将军的指挥下转入进攻,以同样的战法赶走了法军。以后,马森纳退到苏黎世附近的防御阵地,并在那里击败了科尔萨科夫率领的俄军;接着苏沃洛夫越过圣哥达侵入瑞士,不久溃退;最后,法军又经格劳宾登州进军提罗耳,麦克唐纳在严冬从这里越过了三座在当时认为即使队伍成一路纵队行进也难以

手稿的片断到此为止。——编者注

通过的山岭。在这以后,拿破仑的几次大规模战局都是在辽阔的多瑙河与波河流域进行的,因为这几次战局具有远大的战略企图,即切断敌军与他们补给中心的联系,击溃敌军,然后夺取补给中心,这就需要起伏较小的地形和集中大量的兵力来进行决战,但这在阿尔卑斯山区是无法达到的。然而,从拿破仑在1796年进行第一次阿尔卑斯战局和他在1797年越过朱利恩阿包尔卑山脉向维也纳进军直到1801年为止,整个战争历史证明:阿尔卑斯山的山岭和深谷已再不能使现代军队望而生畏了;并且,从那时起直到1815年止,阿尔卑斯山也从来没有给法军或反法大同盟的联军提供过任何值得一提的防御阵地。

当你通过任何一个有山道从阿尔卑斯山北坡蜿蜒曲折地伸向南坡的深谷时,你在山道的每一个转弯处都会看到极其险要的防御阵地。以大家熟悉的维阿马拉山口为例。没有一个军官不愿向你保证,他能以一营兵力守住这个狭谷,只要他确信不会被敌人从后方迂回。可是问题就在这里。甚至在阿尔卑斯山最高的山脊上也没有一个山口是不能迂回的。拿破仑进行山地战的准则是:“山羊能通过的地方,人就能通过;人能通过的地方,一个营就能通过;一个营能通过的地方,全军就能通过。”苏沃洛夫也曾这样做过,当他被严密地堵在莱斯河谷时,他曾不得不率领军队沿着只能通过一个人的羊肠小道行军,而且还有法国最善于进行山地战的将军勒库尔布紧跟在他背后追击。

有些防御阵地,从正面进攻往往等于完全丧失理智,而这种从后方迂回敌人的可能性能够绰绰有余地抵销这种防御阵地的力量。防御者要防守敌人可能借以对阵地进行迂回运动的所有道路,就会分散兵力,以致必败无疑。对这些道路至多只能加以监视,而

击退迂回部队的攻击,则应取决于预备队的合理使用和各部队指挥官的机智灵活和行动迅速;然而,即使三四路迂回纵队中只有一路获得成功,防御者就会陷入那种似乎所有迂回纵队都获得胜利的困境。因此,从战略的观点来看,在山地战中,进攻对防御占有决定性的优势。

从纯粹战术的观点研究这一问题,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防御阵地通常都是狭谷,在谷地配置强大的纵队,而在高地上配置散兵线作掩护。这种阵地可以从正面迂回,这时散兵群可沿谷地斜坡攀登,包围防御者的优秀散兵的两翼;只要情况允许也可以派出小部队沿山脊或与狭谷平行的谷地进行迂回,而迂回的大部队则可以利用某一山道从翼侧或后方袭击防御部队。在所有这些场合,迂回部队都拥有居高临下的优势;他们占领着较高的地势,能够俯视敌方所占的谷地。他们可以使用滚木礮石打击敌人,因为现在没有一个纵队会那样轻率,事先不肃清两侧山坡上的守军就进入深谷的。所以,这种不久前还是人们惯用的防御方法,现在却反而被用来对付防御者了。山地防御的另一个不利条件,是构成防御的基础的火力,因受到山地地形的限制而大为减弱。火炮几乎毫无用处,如果真正使用了火炮,退却时往往还是被扔掉。那些由轻榴弹炮组成的、用骡子驮炮的所谓山地炮兵,几乎不起什么作用,这已为法军在阿尔及利亚的经验所充分证明了¹¹⁰。至于谈到火枪和步枪的使用,那末由于在山地到处可以找到掩蔽地,防御便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优点,也就是说在防御阵地前面没有敌人必须在火力下通过的开阔地。由此可见,无论从战术观点或战略观点来看,我们都会得出奥地利卡尔大公——山地战的最优秀将领之一和论述这个问题的最权威作家之一——所做的结论:在这种战争中,进攻对防

御占有巨大的优势。

那末,这是不是说防御一个山国就毫无用处了呢?当然不是。这只是说,防御不应当只是消极的,而应当从机动中吸取力量,并且只要一有机会,防御者就应当采取进攻行动。在阿尔卑斯山区,几乎很难进行大规模的战斗;整个战争就是一连串的小战斗,就是进攻者不断试图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楔入敌方阵地,然后向前推进。双方军队根据需要分散行动;无论哪一方都可能随时遭到对方有效的攻击;双方都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那些不能预见的情况下。因此,防御者可以利用的唯一的有利条件,就是找出敌人的这些弱点,急速地插到分隔开的各敌军纵队之间去。在这种场合,单纯消极防御所仅仅依靠的那些坚固的防御阵地,就变成了可能诱使敌人在那里进行主攻的许多陷阱,而这时防御的主力却指向了敌人的迂回纵队,使每一支迂回的纵队都可能被迂回,而陷入它原来想使防御者陷入的那种绝境。然而很明显,这种积极防御需要有机敏灵活、经验丰富和指挥熟练的将领,需要有训练有素和行动敏捷的部队,而且首先需要有指挥熟练而又极其可靠的旅长、营长、以至连长,因为在这些场合,一切全靠各独立部队行动的迅速和机警。

还有一种现在大家已很熟悉的山地防御战,那就是民族起义和游击战;游击战是绝对需要山地的,至少在欧洲是这样。这类战争,我们可以举出四个战例:提罗耳起义,西班牙反对拿破仑的游击战,巴斯克的卡洛斯派暴动和高加索部落反对俄国的战争¹¹¹。虽然这些战争给征服者带来不少麻烦,但其本身都没有获得成功。提罗耳起义只是在1809年还受到奥地利正规军支持时才有威势。西班牙的游击队虽然拥有国土极其辽阔的优越条件,但所以能够长期进行抵抗,主要还是由于法军不得不经常以主力对付英葡联军。

卡洛斯派战争所以进行了那么长的时间,是因为当时西班牙正规军已经衰落,同时,卡洛斯派与克里斯蒂娜的将军们又在进行无休止的谈判;因此,这次战争也不能作为一个恰当的例子。最后,高加索的斗争是给山地居民带来最大荣誉的一次山地战;在这一斗争中高加索人所以取得一定的胜利,是由于他们在保卫自己的疆土时主要采用了进攻战术。无论俄军(他们和英军一样是最不适于山地战的)在哪里进攻高加索人,高加索人通常总是被击败,他们的山村被破坏,他们的山道被俄军凭借据点加以控制。但高加索人抵抗的力量却在于:他们经常离开山区向平原出击,经常突然袭击俄军的警备部队和前哨,奔袭俄军第一线部队的深远后方,并不时在俄军运动道路上进行伏击。换句话说,高加索人比俄军轻便灵活得多,并且发挥了这一长处。事实上,在一切场合,甚至在山地居民的暂时获胜的起义中,胜利的取得都是进攻行动的结果。在这方面,这几次起义与1798年和1799年瑞士的起义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后一场合,起义者往往占领初看起来好像是很坚固的防御阵地,在那里静候法军到来,结果总是被法军击溃。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1月10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1857年1月27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2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并根据手稿的片断校对过

卡·马克思 对波斯的战争¹¹²

英国不久前发动了对波斯的战争,根据最近的报告,他们打得很猛烈,以致波斯的沙赫被迫投降。要了解这场战争的政治原因和目的,必须回溯一下波斯历史上的某些事件。由自称是古代波斯皇帝的后裔的伊斯马伊耳于1502年创建的、保持大国的强盛和威望达两百多年之久的波斯王朝,1720年左右,在波斯东部各省的阿富汗人起义时遭到了致命的打击。阿富汗人侵入了波斯西部,有两个阿富汗王公还高踞了几年的波斯王位。可是不久,他们便被著名的纳迪尔赶走了。起初,他是波斯王位的一位觊觎者手下的统帅。后来,他自己据有了王位,不仅制服了起义的阿富汗人,而且以他对印度的四海驰名的入侵大大促进了已经开始衰落的莫卧儿帝国的瓦解,从而为英国在印度建立统治打下了基础。

在1747年纳迪尔·沙赫死后波斯处于一片混乱时,产生了阿罕默德·杜兰尼领导的独立的阿富汗王国;这个王国合并了赫拉特、喀布尔、坎大哈、白沙瓦等公国和后来为锡克教徒¹¹³占领的所有土地。这个拼凑得极不牢固的王国在它的创建人死后就瓦解了;它又重新分裂为原来的各个组成部分,即独立的、各有其自己首領的、互相之间干戈不息的阿富汗部落,这些部落只有在必须共同对付波斯的场合下才不得不联合起来。阿富汗人和波斯人之间的这

种由于种族不同而产生的、被历史传统加深了的、并且经常被边境纠纷和相互责难保持着的政治对立,似乎同时又被宗教对立合法化了,因为阿富汗人是逊尼派伊斯兰教徒,即正统的伊斯兰教徒,而波斯则是异端的什叶派的堡垒。

尽管波斯人和阿富汗人之间存在着这种尖锐和普遍的对立,他们毕竟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以俄国为敌。俄国最初入侵波斯是在彼得大帝时代,但是这次入侵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在这方面取得更多成功的是亚历山大一世;他通过古利斯坦条约¹¹⁴夺去了波斯的十二个省,这些省大部分位于高加索山脉南面。以土库曼彻条约¹¹⁵告终的1826—1827年的战争,使尼古拉又从波斯夺去了若干地区,而且禁止波斯船只在波斯自己的靠近里海岸边的领水内航行。过去领土被占所留下的记忆、现在波斯所忍受的压迫以及对将来可能再遭受侵略的忧惧,都同样地促使波斯产生对俄国誓不两立的仇恨。至于阿富汗人,虽然他们同俄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的冲突,可是他们一向认为俄国是他们宗教的夙敌,是要把亚洲一口吞下的巨人。波斯人和阿富汗人都把俄国当做天然的敌人,就使得这两个民族都把英国看做自己的天然的盟友。因此,英国为要保持自己的统治势力,只需扮成波斯和阿富汗之间的善意的调停者,坚决反对俄国人的入侵。假友好加上真抵抗,别的就什么也不需要了。

然而不能说这种优越的地位被利用得很成功。1834年挑选波斯王位继承人的时候,英国人不得不支持俄国所提议的一位王子,次年,当这位王子同他的竞争者进行武装斗争时,又不得不给以钱财上的支持并派英国军官去积极援助¹¹⁶。被派到波斯去的英国使臣都受命警告波斯政府不要受人挑唆:不要发动对阿富汗人的战

卡·马克思“对波斯战争”的草稿的第一页

争,说这种战争除去浪费资财外,不会带来什么好处;可是当这些使臣坚决要求上级授权来防止对阿富汗人一触即发的战争时,英国政府却提醒他们注意 1814 年的旧条约中的一项条款,根据这项条款的规定,如遇波斯与阿富汗发生战事时,英国人在未得到进行调解的邀请之前不得加以干预。英国外交代表和印度英国当局认为俄国在策划这场战争,因为这个大国想借波斯政治势力的向东扩张而为俄军迟早侵入印度开辟道路。但是这些理由对当时领导外交部的帕麦斯顿勋爵似乎没有起任何作用,至少是作用很小,于是在 1837 年 9 月波斯军队侵入了阿富汗。波斯军队在打了一些小胜仗以后,直抵赫拉特城,他们在城下扎下营寨,并在俄国驻波斯宫廷大使西莫尼奇伯爵的亲自指挥下展开了围攻战。在这些军事活动进行的全部期间,英国大使麦克尼耳却被相互矛盾的训令缚住了手脚。一方面,帕麦斯顿勋爵命令他“避免讨论波斯与赫拉特的关系问题”,说这些关系似乎与英国无关;另一方面,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又希望大使劝阻沙赫不要继续军事行动。在这次出征的最初时刻,爱里斯先生召回了在波斯军队中服役的英国军官,但帕麦斯顿又把他们派回去了。当印度总督再次命令麦克尼耳召回英国军官时,帕麦斯顿又撤销了这道命令。1838 年 3 月 8 日,麦克尼耳前往波斯军营自荐居间调处,但不是以英国的名义,而是以印度的名义。

1838 年 5 月底,从开始攻城已经过了将近九个月,帕麦斯顿才向波斯宫廷发出了一个威胁性的照会,第一次对赫拉特事件表示抗议,第一次全力痛斥“波斯同俄国的联系”。同时,印度政府派兵从海路开赴波斯湾,下令夺取不久前为英国人占据着的哈腊克岛。稍后,英国大使从德黑兰转到埃尔斯伦,而前往英国的波斯大

使则不准入境。在比期间,赫拉特虽遭长期封锁,但未屈服,波斯人的每次进攻都被打退,1838年8月15日沙赫被迫撤围,匆忙地把军队撤出阿富汗。英国人的活动本来可以就此结束,但是事情的演变却奇怪之至。英国人不满足于制止了波斯想侵占一部分阿富汗领土的企图,——他们认为这一企图是在俄国的示意下和为了俄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决定把整个阿富汗攫为己有。著名的阿富汗战争¹¹⁷就这样开始了。这个战争的结果是英国人的惨败,而谁该对这次战争负实际责任,迄今也还是一个大秘密。

成为目前同波斯开战的理由的事件,同阿富汗战争之前的情况很相似,即波斯人向赫拉特进军,而这次进军的结果是占领了该城。但是说来令人奇怪,英国人这次以盟友和保护者的姿态支持的恰恰是在阿富汗战争时他们极想推翻而未能推翻的多斯特-穆罕默德。这次战争是否包含着同前次战争同样异手寻常和出人意料的后果,尚待分晓。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1月27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1857年2月14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37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 英国—波斯战争的前景

英军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在波斯湾占领了波斯最重要的港口布什尔,其借口无非是赫拉特这个不久前被波斯军队占领的阿富汗的公国¹¹⁸应当归还谁所有的问题。赫拉特现在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是因为它是西面和北面的波斯湾,里海和亚克萨尔特河同东面的印度河之间整个地区的战略中心;因此,一旦英国和俄国为了争夺亚洲的霸权而发生严重冲突(英国侵入波斯可能加速这一冲突),赫拉特就将成为双方争执的主要目标,而且可能成为双方最先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战区。

赫拉特被赋予这样重要的意义,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凡是了解它的地理位置的人,都应该理解这一点。波斯的内陆是四面环山的高原,水流不能外溢。这些水流不足以形成一个或几个中央湖泊;它们不是被广阔的沼泽地化为乌有,就是逐渐消失在干燥的大沙漠中。这个大沙漠占着波斯高原的绝大部分,形成了波斯西部和东北部之间的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个沙漠北面的边界是霍拉桑山脉,它由里海的东南角几乎向正东延伸,形成厄尔布尔士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之间的连接线;霍拉桑山脉分出一道支脉向南延伸,将波斯沙漠跟灌溉较好的阿富汗地区分隔开来,而赫拉特正是位于这个分隔开来的地方。赫拉特周围是相当广阔而且特别肥

沃的谷地,为它提供生存资料。在霍拉桑山脉的北面,有与其南麓的沙漠相似的沙漠。几条像木尔加布河那样的大河,在这里也被沙漠化为乌有。但是奥克苏斯河与亚克萨尔特河,由于水势十分强大,冲过了沙漠,在下游形成了适于耕作的广阔谷地。在亚克萨尔特河的那边,沙漠便逐渐带有南俄罗斯草原的性质,并且最后完全与它融合在一起。因此,在里海和英属印度之间有三个文化比较发达的不同地区:第一,波斯西部的几个城市:设刺子、休斯特尔、德黑兰、伊斯法罕;第二,阿富汗的几个城市:喀布尔、加兹尼、坎大哈;第三,土尔克斯坦的几个城市:希瓦、布哈拉、巴耳赫、萨马尔汗。在所有这些城市之间保持有相当频繁的联系,而这些联系的中心,自然是赫拉特。所有从里海到印度河以及从波斯湾到奥克苏斯河的道路,都在这个城市会合。赫拉特是喀布尔到德黑兰以及设刺子到巴耳赫途中的一个商队旅舍。经耶兹德和库希斯坦穿过波斯沙漠的那条沿途有绿洲的大驿路,直通向赫拉特;另一方面,从西亚细亚通往东亚细亚和中亚细亚的唯一的一条绕过沙漠的道路,得经过霍拉桑山脉和赫拉特。

因此,赫拉特在强国的手里是可以用来控制伊朗和土尔克斯坦,即波斯和奥克苏斯河北面地区的一个据点。谁占有赫拉特,谁就充分握有中央阵地的全部优势,因为以这一阵地为中心向任何方向进攻,比从伊朗或土尔克斯坦的其他任何城市进攻,都更加容易,更有把握获得胜利。同时,阿斯特拉巴德、希瓦、布哈拉、巴耳赫、喀布尔和坎大哈等城市彼此之间交通非常困难,即使从所有这些城市向赫拉特发起共同进攻,也很少有可能获得胜利。向赫拉特进攻的各纵队,几乎不可能互相取得联系,而赫拉特如果有一位果敢的将军,却可以袭击它们并将它们各个击破。尽管如此,在这种

情况下,从坎大哈、喀布尔和巴耳赫推进的各纵队,一定要比从阿斯特拉巴德、希瓦、布哈拉分进合击的各纵队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大一些,因为从阿富汗方面进攻时,是从山地到平原,而且可以完全不经过沙漠,然而从里海和阿腊克斯河方面进攻时,只有一个纵队(从阿斯特拉巴德出发的)可以不经过沙漠,而其他各纵队则必须经过沙漠,以致完全不可能互相取得联系。

以赫拉特为共同中心的三个文化中心,形成了三类不同的国家。在西边是波斯,土库曼彻条约已将它变成俄国的附属国。在东边是阿富汗和俾路支诸国,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喀布尔和坎大哈现在可以列为英印度帝国的附属国。在北边是土尔克斯坦的希瓦和布哈拉两个汗国;这两个汗国虽然名义上中立,但当发生冲突时,它们几乎一定会倒向获胜可能性较大的一方。波斯实际上从属俄国,而阿富汗实际上从属英国,这种情况可由俄国已派兵去波斯,而英国已派兵去喀布尔的事实来证明。

俄国占有里海西岸和北岸的全部地区。巴库(距阿斯特拉巴德 350 英里)和阿斯特拉罕(距阿斯特拉巴德 750 英里),是两个可供设置军用仓库和集结预备队的上好地方。当俄国里海舰队控制着这个内海时,俄国可以很容易地向阿斯特拉巴德输送必需的物资和援军。在里海东岸通往咸海的各条道路的起点上,都有俄国的堡垒。由此向北方和东方,伸展出一道俄国的堡垒线,沿线散布有乌拉尔河流域哥萨克人的村庄,这道堡垒线早在 1847 年就已经由乌拉尔河推进到了恩巴河和土尔盖河,即向俄国统治下的吉尔吉斯诸汗国境内和咸海方向推进了 150—200 英里。此后,实际上已在咸海沿岸修筑了堡垒,现在在咸海和亚克萨尔特河上都有俄国的轮船航行。甚至有消息说,俄军已占领希瓦,不过这种说法至少还

为时过早。

俄国人向中亚细亚或南亚细亚发动任何大规模进攻时所必须遵循的作战路线,是自然条件规定了的。如果从陆路由高加索沿里海西南岸前进,就会遇到巨大的天然障碍——波斯北部的山脉,并且会使进攻的军队在到达主要目的地赫拉特之前必须通过 1 100 英里以上的路程。如果从陆路由奥连堡向赫拉特进攻,则进攻的军队不仅要经过那个使彼罗夫斯基的军队在征讨希瓦时遭到复灭¹¹⁹的沙漠,而且还要经过两个同样不好客的沙漠。从奥连堡到赫拉特的距离,按直线计算有 1 500 英里,但是如果俄国人从这一方向进攻,则奥连堡将是俄军能够选来作为作战基地的最近地点。此外,俄属阿尔明尼亚同奥连堡都几乎完全与俄国的中心隔绝,前者被高加索山脉所隔绝,后者被大草原所隔绝。要在这两个地方把夺取中亚细亚所必需的物资和军队集中起来,是根本谈不上的。因此,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横渡里海,以阿斯特拉罕和巴库作为基地,以里海东南岸的阿斯特拉巴德作为监视站,而且这条路到赫拉特总共只有 500 英里。这条路线具有俄国所能期望的一切优越性。阿斯特拉罕在伏尔加河上的位置,正如新奥尔良在密西西比河上的位置一样。它位于俄国最大的一条河流的河口,而这条河流的上游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俄罗斯帝国的中心——大俄罗斯,所以它具有一切方便条件可被用来转运人员和弹药,以组成强大的远征军。由阿斯特拉罕乘轮船走四天,乘帆船则走八天,便能到达里海对岸的阿斯特拉巴德。里海本身无疑地是俄国的内海,而阿斯特拉巴德(现已被波斯沙赫献给俄国),则位于由西面到赫拉特这条唯一的道路上的起点。这条道路通过霍拉桑山脉,完全不经过沙漠。

俄国政府就是根据上述情况采取行动的。俄军准备在事态更

加复杂时用来向赫拉特进攻的主力,现正向阿斯特拉巴德集中。此外,还有两个侧路纵队,不过它们与主力的协同至少是很成问题的,因而每个纵队都有独立的任务。集中在塔夫利兹的右路纵队,任务是掩护波斯西部边境,防止土耳其人向那里采取任何敌意行动,并在必要时开往哈马丹和休斯特尔,以掩护首都德黑兰,使它免受土军和在波斯湾布什尔港登陆的英军的进攻。左路纵队由奥连堡进攻,很可能得到由阿斯特拉罕开往里海东岸的援军。它应当保证占有咸海周围的地区,并向希瓦、布哈拉和萨马尔汗进发,争取这些国家保持中立或协助俄军作战;此外,还要尽量沿奥克苏斯河而上,向巴耳赫推进,以威胁英军在喀布尔附近的或靠近赫拉特的翼侧和后方。据我们所知,俄军各支队伍已在途中,而且中路纵队已抵阿斯特拉巴德,右路纵队已抵塔夫利兹。至于左路纵队的推进情况,大概在若干时间内我们还不会得到消息。

在英军方面,作战基地是印度河的上游地区;他们的仓库一定是设置在白沙瓦。他们已从那里向喀布尔派出了一个纵队,喀布尔距赫拉特按直线计算为400英里。但当发生严重的战争时,英军除应占领喀布尔外,还应占领加兹尼、坎大哈,以及可用来防守阿富汗通路的各个山中堡垒。他们在这方面所要遇到的困难,未必比俄军占领阿斯特拉巴德时所遇到的困难更大,因为他们在表面上是帮助阿富汗人反对波斯的侵犯。

英军从喀布尔至赫拉特的进军,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不需要向翼侧派出纵队,因为俄军的任何一支侧路纵队都不可能接近这个地区;而如果奥连堡纵队经过几天行军后由布哈拉进抵巴耳赫,那末喀布尔的强大预备队会立即予以迎头痛击。英军占有一个优势,就是他们的作战线比较短;因为,虽然赫拉特恰恰位于加

尔各答和莫斯科的正中间,但是英国在喀布尔河和印度河汇合处附近的作战基地距赫拉特只有 600 英里,而俄国在阿斯特拉罕的作战基地距赫拉特则为 1 250 英里。喀布尔的英军距离赫拉特比阿斯特拉巴德的俄军距离赫拉特近 100 英里,而且据我们所知道的地形条件,英军所经过的地区,耕作较好,居民较多,道路也比俄军在霍拉桑可能遇到的要好。至于谈到两国的军队,那末英军无疑在适应气候方面胜过俄军。英军的欧洲团队无疑将和他们在因克尔芒的伙伴们一样具有坚韧不拔的刚毅精神,而对西帕依步兵¹²⁰也丝毫不能轻视。查理·纳皮尔爵士——而他从头到脚是统帅也是兵士——曾在多次战斗中亲自看到过西帕依作战的情况,对他们极为推崇。正规的印度骑兵价值不大,可是非正规的印度骑兵却很出色,他们在欧洲军官的指挥下,无疑地将胜过哥萨克骑兵。

当然,再继续议论这样一次战争的前景,是完全无益的。没有可能猜出双方会派出多少军队。无法预见现在看来正在临近的这种重要事变一旦到来时所要发生的全部情况。能够肯定的只有一点:由于双方到赫拉特都需要通过很远的路程,所以双方在赫拉特这个有决定意义的地区用来决定斗争结局的军队,都不会太多。这次斗争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还将决定于赫拉特周围各国宫廷中的外交阴谋活动和贿买活动。在这些活动方面,俄国人几乎一定会占上风。他们的外交办得较好,而且带有更多的东方特色:他们知道如何在必要时不吝惜金钱,而最主要的是他们在敌人内部有自己的朋友。英国向波斯湾的远征,只不过是一种声东击西的行动。这一行动虽能吸引住很大一部分波斯军队,但不能取得很多的直接战果。即使把现在驻在布什尔的 5 000 人增加两倍,英军顶多也只能进到设刺子为止。但是这次远征本来也并不指望更多的东西。

如果它能让波斯政府看到 ,这个国家可能受到来自海上的攻击 ,那末它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如果对英军的这次远征抱有更大的期望 ,那是荒谬的。因为真正决定整个伊朗和土尔克斯坦命运的路线 ,是从阿斯特拉巴德到白沙瓦这条路线 ,而在这条路线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地点是赫拉特。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1 月底至
2 月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2 月 19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41 号

卡·马克思 英国的新预算¹²¹

1857年2月20日于伦敦

预算的喜剧遭到了现任财政大臣乔治·路易斯爵士的沉重打击。在罗伯特·皮尔执政时期,向议会作预算报告成了一种必须按照极庄严的国家礼仪来进行并且用一切华丽辞藻来讴歌的宗教仪式。此外还要求这个仪式至少延续五个小时。迪斯累里先生模仿了罗伯特爵士对待国家钱包的这套礼节,而格莱斯顿先生在这方面比他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乔治·路易斯爵士也不敢违背这个传统。因此他的演说长达四小时,他慢条斯理地、拖拖拉拉地、翻来复去地说个没完,直到可尊敬的议员开始抓起帽子纷纷向外跑,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这才突然打断了他的演说。

这位可怜的演员大声说道:“非常抱歉,我得向渐渐减少了的听众继续我的演说;可是我必须对留下来的人说明,打算实行的改变究竟会产生什么作用。”

当乔治·路易斯爵士还是“爱丁堡评论”¹²²的才子的时候,他已经以论证累赘难懂闻名,而不是以说理充分透彻或者语言生动活泼闻名了。他个人的缺点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在议会受到挫败的原因。但是还有一些不是他所能控制的情况,甚至最老练的议会演说家也会因而弄得狼狈不堪的。像威廉·克莱爵士在赫尔向他的选民无意中泄露的那样,起初帕麦斯顿勋爵本来决定要在

和平时期还保持战时税,可是,由于迪斯累里先生在下院所说的并且得到格莱斯顿先生支持的关于所得税的提案有被提出的危险,他不得不立刻一反初衷,完全改变他的财政策略。因此,可怜的乔治·路易斯爵士得在最短促的期限内改变他的全部计算、一切数字和整个方案,而他那篇为捍卫军事预算而准备的演说,现在必须用来捍卫假冒的和平预算了——这种 *quid pro quo* (代替),如果不是讲得像催眠曲那样,可能是很有趣的。然而还不止于此。罗伯特·皮尔爵士的历次预算,在他 1841 年至 1846 年执政时期,由于当时自由贸易派¹²³与保护关税派、利润与地租、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激烈斗争,曾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迪斯累里先生的预算曾被看做是怪诞可笑的东西,因为它的内容令人摸不清究竟是要恢复保护关税主义还是要彻底摒弃它;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则曾被人们过分渲染,说它是用财政手段使胜利的自由贸易至少稳定七年的办法。这些预算所反映的社会矛盾,使这些预算得到人们积极的对待,但是乔治·路易斯爵士的预算,从一开始就只能作为内阁反对者的共同攻击对象而引起人们的反感。

乔治·路易斯爵士的预算,就其收入部分的最初方案而言,用很少的几句话就能说明。它里面已没有战时规定的 9 辨士附加所得税,因而所得税就从每一英镑收入征收 1 先令 4 辨士减少到征收 7 辨士;这个税率一直要实行到 1860 年。另一方面:对酒精饮料仍然要征收全部战时税,对糖和茶仍然要征收部分战时税。仅此而已。

本财政年度的所得税,包括附加的 9 辨士战时税在内,提供

手稿中在“保护关税派”的后面,插入了以下这几个字:“工业资本家与土地所有者”。——编者注

1600 万英镑以上的收入 , 这笔收入来自社会各阶级 , 其分摊情况大致如下 :

第一类—— 不动产	8 000 000 英镑
第二类—— 农场主	1 000 000 英镑
第三类—— 公债	2 000 000 英镑
第四类—— 商界和自由职业界	4 000 000 英镑
第五类—— 薪饷	1 000 000 英镑
共 计	16 000 000 英镑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 , 所得税的负担完全落在社会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的身上 , 的确 , 这部分税收的三分之二以上是来自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收入。但是 , 英国的小资产阶级 , 由于有其他的战时税、昂贵的物价和高涨的贴现率 , 受所得税的折磨也是很厉害的 , 因此迫不及待地要把它摆脱掉。然而 , 要不是贵族和大资产阶级想抓住这个机会给自己的狭隘的私心戴上博爱的假面具并摆脱他们无法转嫁给人民大众的捐税负担 , 因而带头鼓动 , 那末小资产阶级的呼声未必能在报刊上反映出来 , 当然更谈不上在议会中反映出来了。法国在 *république honnête et modérée* (诚实而温和的共和国) 时期曾把所得税斥为走私的社会主义而防止了采取这种税收的措施 , 而如今英国企图在同情人民疾苦的借口下来废除这同一种税收。这套把戏玩得真是非常娴熟。在刚确立和平¹²⁴之后 , 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不是先攻击所得税本身 , 而是只攻击它的战时附加部分 , 以及它的不平等的分摊办法。上层阶级也假装和大家一样感到不满 , 但是其目的只是歪曲这种不满的真正意义 , 把要求降低对小额收益的课税变成要求免去对大量收益的课税。小资产阶级在斗争激烈时 , 由于急于求得早日减轻负担 , 没有发觉这种偷天换日的做法 , 同时也没有顾到可以保证自己得到强大同盟者支持的条

件。至于工人阶级,他们既没有自己的机关刊物,也没有代表参加选举机构,他们的要求更谈不上。

大家知道,罗伯特·皮尔爵士的自由贸易的措施是以所得税作为基础的。不难理解,直接课税是自由贸易在财政上的表现。如果说自由贸易还有一些意义,那末它就是意味着取消关税、消费税、以及直接妨碍生产和交换的一切捐税。

如果捐税不能通过关税和消费税来征收,那末只好直接按照财产利收入来征收了。但是在税收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一种捐税减少,必然会引起另一种捐税相应地增加。这种减少和增加必定成反比例。因此,如果英国公众想取消大部分直接税,那末就得准备让商品和工业原料纳更高的税,总之,就得准备放弃自由贸易制度。在欧洲大陆上正是这样来解释目前的运动的。比利时的一家报纸写道:

“在根特举行的一次讨论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的会议上,有一位发言人举出英国又在反对征收所得税的情况,作为英国舆论在转向保护关税主义的证明。”

同样,利物浦的财政改革派在他们最近一次呼吁书中,就表示担心大不列颠会重新回到限制的原则上去。

他们说:“很难相信会出现这种全国性的盲目现象,但是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头脑的人,不能不看到,目前这种宣传所针对的正是这个目的,而不是任何其他的目的。”

因为自由贸易,从而直接课税,在大不列颠是工业资本家所使用的对付土地贵族的进攻武器,所以工业资本家和土地贵族对所得税的共同征讨,就在经济方面证明了成立联合内阁¹²⁵在政治方面所证明了的的东西,也就是说,证明了英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他

们为了避免向无产阶级让步而力图与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妥协。

乔治·路易斯爵士在向反对所得税同盟的要求投降时,立刻把事情的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来了。丝毫没有取消证券税,丝毫没有放弃火灾保险单的印花税,丝毫没有降低酒税,相反地,却提高了茶和糖的进口税。按照格莱斯顿先生的 财政方案,茶税应该 先从每磅 1 先令 6 辨士降低到 1 先令 3 辨士,再降低到 1 先令,糖税应该先从每公担 1 英镑降低到 15 先令,然后 再降低到 13 先令 4 辨士。这只是指精制糖而言。白砂糖税应该从 17 先令 6 辨士逐渐降低到 13 先令 2 辨士和 11 先令 8 辨士,黄砂糖税应该从 15 先令降低到 11 先令 8 辨士和 10 先令 6 辨士,褐砂糖税应该从 13 先令 9 辨士降低到 10 先令 7 辨士和 9 先令 6 辨士,糖浆税应该从 5 先令 4 辨士降低到 3 先令 9 辨士。战争阻碍了这个方案的实现,但是按照 1855 年通过的法律,这个方案应该在 1857 年和 1858 年逐渐实现。在 1855 年 4 月 19 日把茶税从每磅 1 先令 6 辨士提高到 1 先令 9 辨士的乔治·路易斯爵士,建议把这种税在四年内降低到 1 先令,即在 1857—1858 年降低到 1 先令 7 辨士,在 1858—1859 年降低 1 先令 5 辨士,在 1859—1860 年降低到 1 先令 3 辨士,最后降低到 1 先令。对于糖税,他也建议采取这种办法。我们知道,对糖的需求超过了供应,世界市场上糖的存货减少了,例如目前在伦敦只有 43 700 吨,而两年以前还有 73 400 吨。自然,糖价也就提高。至于茶,帕麦斯顿对中国的进军使供应受到人为的限制,因而也造成了价格的提高。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会告诉你,在商品不足

手稿中在“格莱斯顿先生的”后面写着“1855 年的”。——编者注

手稿中有“在 1857 年”等字。——编者注

手稿中有“在 1858 年”等字。——编者注

和价格上涨时期,要想使关税的任何降低不仅有利于进口商,而且也有利于广大的消费者,就必须使这种降低进行得很迅速,而且数量极其可观。但是乔治·路易斯爵士却反而断定说,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关税降低得越少,就越有利于消费者。这种说法只能与他的所谓邮政收费是直接税以及所谓混乱是任何课税的特点这种奇谈相提并论。

以提高英国人民的日常消费品茶和糖的关税来弥补所得税的减少,这就是公然减轻对富人的课税,增加对穷人的课税。但是这项理由未必能阻止下院通过这种措施。然而有些茶商,他们之所以缔结了大宗的合同和协定,据他们说,完全是由于信赖乔治·路易斯爵士于1856年4月19日在下院所做的声明(海关总署于1856年11月11日向茶商传达过这项声明),即“1857年4月6日茶税将降低到1先令3辨士”。因此,茶商坚持要让他们能够履行自己的义务,要使预算的道义上的义务得到遵守。同时,格莱斯顿先生也很乐意报复一下帕麦斯顿,因为帕麦斯顿在利用皮尔分子先推翻得比内阁,然后推翻罗素内阁,最后推翻他们自己的长老——年迈的阿伯丁的内阁之后,忘恩负义地把皮尔分子丢开了¹²⁶。此外,格莱斯顿,作为1853年财政方案的起草人,自然要保卫他自己那份模范的预算,使它不受乔治·路易斯爵士的无礼侵犯。因此,他宣称,他打算提出以下这个提案:

“根据1855年的关税法,本议院不同意对茶税和糖税作任何增加。”

一直到现在,我只谈到预算的一个方面,即它的收入部分。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另一个方面,即预计的开支。如果说计划中的

手稿中在“他宣称,他打算”这个地方是这样一段话:“他在2月19日星期四宣称,在星期五,由于下院决定召开经费调查委员会,他打算”。——编者注

收入部分是英国官方社会目前状况的写照,那末,预计的开支更是英国本届政府状况的写照了。帕麦斯顿需要钱,而且需要一大笔钱,不仅是为了牢固地确立他的独裁,而且也为了满足他的轰击广州、对波斯作战、向那不勒斯进军等等的贪欲。所以他才提出这种比1815年媾和以来的最高支出还超过大约800万英镑的和平时期的预算。他要求65 474 000英镑,而过去迪斯累里先生只要有55 613 379英镑,格莱斯顿先生只要有56 683 000英镑就心满意足了。当然,约翰牛应该预见到,关于在东方取得军事荣誉的幻想,将来一定会体现为税务检查官手中的沉甸甸的账单。

但是,由于战争关系而额外加征的年度税额不能超过360万英镑,即:200万英镑来自1857年5月到期的国库债券;120万英镑来自2 600万英镑新长期国债和800万英镑短期国债的利息;最后,大约40万英镑来自新债的还本基金。这样,加征的战时税实际上还够不上帕麦斯顿勋爵所要求的额外支出的一半。但是他的军事预算完全可以说明这些额外支出的增长。陆军和海军的全部预算从1830年到1840年平均甚至还不到1 300万英镑,但是在路易斯的预算中竟达到20 699 000英镑。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与战前最后五年的各个军事预算对比一下,那末我们就可以看到,1849年的预算是15 823 537英镑,1850年的是15 320 944英镑,1851年的是15 555 171英镑,1852年的是15 771 893英镑,1853—1854年的是17 802 000英镑,并且1853—1854年的预算在批准时已经考虑到即将爆发战争。

乔治·路易斯爵士遵照辉格党人的所谓树液生来就是喂养蠕虫的这种正统理论,举出1856年关于进出口的材料中所反映的国民财富的增长作为增加政府支出的理由。即使结论是正确的,前提

毕竟还是错误的。关于这一点,只须看一看现在在伦敦流浪街头和向习艺所¹²⁷求援的成千上万—贫如洗的工人;只须看一看关于官方收入的报告中所提出的这件尽人皆知的事实:1856年英国的茶、糖和咖啡的消费量减少了许多,只有酒精饮料的消费量略有增加。最后,只须看一看去年的贸易报告,正像现任财政部秘书长威尔逊先生本人所承认的,这份报告清楚地证明了1856年英国贸易的利润与贸易的增长成反比例。看来,反对派领袖自然而然的策略应当是集中主要火力攻击这些过度的支出。但是,迪斯累里先生如果这样直接起来反对这种贵族式的挥霍,很可能受到自己那些同僚的暗算。因此他只好采取极其微妙的手腕——在论证他的反对帕麦斯顿预算的提案时,不说这个预算为1857年和1858年规定了过度的支出,而是说这个预算没有保证国家在1858—1859年和1859—1860年得到必要数量的收入。

不论怎样,下院关于预算的辩论将是极其有趣的,这不仅是因为这场辩论要决定本届政府的命运,因为这场辩论是迪斯累里—格莱斯顿—罗素联盟反对帕麦斯顿的一出好戏,而且还因为财政反对派的矛盾——他们坚持取消所得税,禁止增加糖税和茶税,但又不敢公然反对过分庞大的支出——就其本身而言,无疑将是我们实践中崭新的东西。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2月20日
载于1857年3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5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手稿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但是如果迪斯累里先生认真地反对那些贵族食税人,很可能受到他自己那帮人的背后攻击。”——编者注

手稿中用的不是“极其微妙的手腕”,而是“最可怜的诡计”。——编者注

卡·马克思 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

1857年2月27日于伦敦

得比伯爵和科布顿先生谴责对华军事行动的两个议案,都按照早先所作的声明被提出了,一个是2月24日在上院提出的,另一个是2月27日在下院提出的。上院的辩论是在下院开始辩论的那一天结束的。上院的辩论给帕麦斯顿内阁以沉重的打击,使它只得到36票比较微弱的多数。下院的辩论也许会以内阁的失败而结束。但是不管下院的讨论将引起多么大的兴趣,上院的争论已经把论战双方的理由讲尽了,而得比和林德赫斯特两位勋爵的精彩演说已经预先说出了能言善辩的科布顿先生、爱·布尔韦尔爵士、约翰·罗素勋爵以及 tutti quanti(诸如此类的人)所要说的话。

政府方面唯一的法学权威——大法官说过:“如果英国在‘亚罗号’事件上没有充分的根据,那末英国的一切行动自始至终都是错误的。”得比和林德赫斯特无疑地都证明了英国在这划艇事件上没有任何法律根据。他们的论据同英国发表最初报道后“论坛报”专栏文章所援引的论据十分符合,所以我在这里只须把他们的论据简略地叙述一下。

“马克思论中国”劳伦斯和韦斯哈特出版公司1951年伦敦版所载日期为2月26日。——译者注

克兰沃斯。——编者注

见本卷第112—117页。——编者注

英方为推卸广州屠杀¹²⁸的罪责而硬加在中国政府身上的罪名是什么呢？那就是：违背了1843年的善后补充条约第九款。该款规定，凡逃抵香港殖民地或潜藏于英国军舰或商船上的中国罪犯，中国当局不得自行逮捕，而应通过英国领事提取，由英国领事将罪犯引渡给地方当局。现在中国官员却撇开英国领事，逮捕了停泊在珠江江面的划艇“亚罗号”上的中国海盗。所以也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亚罗号”是不是英国船？据得比勋爵说：

“该船是由中国人建造、中国人俘获、中国人出售、中国人购买的，船员是中国人，船归中国人所有。”

既然如此，这只中国船是怎样变成英国商船的呢？是靠在香港买到了英国船籍登记证或航行执照。这种登记证的法律根据是1855年3月香港地方立法机关所颁布的命令。但是，这个命令不仅违背了中英之间的现有条约，并且还取消了英国自己的法律。因此，它是无效的。这个命令只有依据商船条例才能在英国人眼中取得一点合法的外貌，但商船条例是在香港的命令颁布了两个月后才通过的。况且这个命令与商船条例的条款根本就不一致。因此，划艇“亚罗号”所借以取得船籍登记证的那个命令，不过是一张废纸。然而即使依照这张不值一文的废纸，“亚罗号”也得不到它的保护，因为这只船已违背它所规定的条件，船的执照已经满期。这一点，连约翰·包令爵士自己也承认。可是，有人说，不管“亚罗号”是不是英国船，总之，船上挂的是英国国旗，而这面旗子受到了侮辱。首先，如果挂了旗子，那末这面旗子是挂得不合法的。然而究

在手稿中是这样写的：“曾写信给巴夏礼领事，说‘亚罗号’无权得到英国的庇护的约翰·包令爵士”。——编者注

在手稿中是这样写的：“但是，首先，‘亚罗号’没有权利挂英国国旗，约翰·包

竟是不是挂了旗子呢？关于这一点，在英国和中国的声明中是有分歧的。但是，中国的声明已经为领事们所转交的、葡萄牙第 83 号划艇的船长和船员的证词证实了。11 月 13 日的一期“中华之友”¹²⁹援用这些证词说道：“现在广州尽人皆知，该艇被捕获前，已有六天没有挂英国国旗。”可见，挑起冲突的法律根据不能成立，拘泥于国家荣誉的形式问题也不能成立。

得比勋爵在这次演说中很知趣地完全克制了爱讲俏皮话的习惯，从而使自己的论据具有严格的法律性质。可是，他不费什么力气就使自己的演说充满了极深刻的讽刺。实际上，身为英国世袭贵族首领的得比伯爵是在反驳边沁的得意门生、以前的博士、现在的爵士约翰·包令；他是在维护人道，驳斥那位选择人道为职业的人；他是在捍卫各国的真正利益，反对那位坚持外交礼节的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他诉诸《vox populi—vox dei》（“民声即天声”）的公式，反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¹³⁰这一公式的拥护者。征服者的后裔宣扬和平，而和平协会¹³¹的一个会员却鼓吹开炮；得比痛斥英国舰队的行动，说那是“卑鄙的行径”和“可耻的军事行动”，而包令却因为这种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怯懦的横暴行为而祝贺舰队的“辉煌成就，无比勇敢，以及军事技巧和英勇气概的卓越结合”。得比伯爵越是好像不大意识到这些对比，这些对比的讽刺性就越是尖刻。他在一次历史的大讽刺中占了上风，这次历史的大讽刺不是由个别人物的机智灵敏造成的，而是由客观情势的滑稽可笑造成的。在全部英国议会史上，大概还从未有过这样一次贵族对暴发

令爵士本人在 10 月 11 日自香港寄给巴夏礼领事的信中也承认了这一点。因此”。——编者注

手稿的片断到此为止。——编者注

户的精神上的胜利。

得比勋爵一开始就声明：他“只能依据他打算批判其行为的那些人所提供的声明和文件”；他认为“这些文件”完全足以“论证他的论点”。可是已经公正地指出过，政府这样公布的这些文件使政府有可能将全部责任推卸给自己的部属。这一点也不假：议会中政府反对派的攻击完全指向包令及其同伙，政府可以同意这种攻击而丝毫不损害本身的地位。我现在引用勋爵本人的话：

“我不愿意说任何不尊敬包令博士的话。他也许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但据我看来，在准许他进入广州的问题上，他简直是害了偏执狂。（赞同声和笑声）我相信，他真的梦见自己进入广州了。我相信，这是他清早醒来的第一个念头，也是他入睡以前的最后一个念头，他要是半夜醒来，这个念头也会出现。（笑声）我相信，约翰·包令爵士只要能在广州衙门受到正式的接待，他会认为，同这件事所得到的巨大利益相比，任何牺牲都不为大，任何通商中断都不足惜，任何流血都不足悔。（笑声）”

接着是林德赫斯特勋爵发言：

“约翰·包令爵士不仅是全权代表，而且是著名的人道宣扬者（笑声），他自己承认船籍登记证是无效的，那只划艇没有权利挂英国国旗。可是请注意他所说的话：“船不在我们的保护之下，不过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一点。看在上帝的面上，千万不要把这一点透露给他们。”他甚至重复强调这一点，因为实质上他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国人并没有犯下任何违背条约的罪过，但是我们不告诉他们这件事；我们坚持要求赔偿损失并且要求在送回被捕者时举行特别仪式。要是不按照这种仪式送回水手，那末采取什么补救办法呢？很简单，攫夺一只中国帆船，即中国兵船。如果这还不够，那就再攫夺几只，直到我们强迫中国人屈服为止，虽然我们明知他们有理，而我们没有理。（赞同声）以往有过比这更恶劣更可耻的行为吗？还有过比这位在英国政府担任要职的人提出的口实更虚伪的吗？——且不说更欺诈的，但是在我国虚伪就等于欺诈。（赞同声）令人惊异的是，这位约翰·包令爵士竟会认为他有宣战的权利。一个处在这种地位的人在必要时有权进行自卫，对于这一点，我是能够理解的；可是竟因此而以那样一种理由，那样一种口实来采取进攻行动，这却是

世界史上难以找到的最不寻常的事情。从提交给议院的文件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自从约翰·包令爵士一开始就任现职以来，他的野心就是要达到他的许多前任根本没有达到的目的，那就是进入广州城。他一心一意地要达到进入广州城的目的，而毫无必要地使国家卷入了战争。结果又怎样呢？属于英国臣民的、价值 150 万英镑的巨额财产，现在在广州被没收了；此外，我们的商馆被烧光了；而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出于一个最有害的人的有害政策造成的。

‘骄傲的世人
掌握到暂时的权力，
却会忘记了自己琉璃易碎的本来面目，
像一头盛怒的猴子一样，
装扮出种种丑恶的怪相，
使天上的神明们也都流泪心伤。’ ”

最后，格雷勋爵发言：

“如果诸位看一看文件，便会相信，当约翰·包令爵士请求会见叶总督时，总督表示自己准备会见他，不过指定商人伍浩官座落城外的房子作为会面地点。然而约翰·包令爵士却觉得，除了总督官邸以外，到任何地方去都有失尊严。在通过议案时，如果期待不到什么别的结果，我希望至少得出这样一个有益的结果，即立刻召回约翰·包令爵士。”

约翰·包令爵士在下院也遭到同样的斥责，而科布顿先生甚至在开始演说时就郑重宣布同这位“有着二十年交情的人”绝交。

从得比、林德赫斯特和格雷三位勋爵的演说中摘引的原话证明，帕麦斯顿勋爵的政府只要撇开约翰·包令爵士，不让自己同这位“著名的人道宣扬者”混在一起，就可以挡开攻击。政府所以能这样轻易地摆脱窘境，既不是由于政府反对派的宽容，也不是由于政府反对派的策略，而完全是由于提交议会的那些文件；只

要稍微看一看这些文件以及根据这些文件所进行的辩论，这一点就很清楚了。

约翰·包令爵士害了想进入广州城的“偏执狂”，这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正如伦敦“泰晤士报”所说，这个人“完全自行其是，既不和他国内的上司商量，也不考虑上司的政策”，这难道还没有证实吗？既然如此，为什么帕麦斯顿勋爵要在他的政府处于不稳定状态，在他遇到财政、对波斯战争、秘密条约、选举改革¹³²、联合内阁等种种困难的时候，在他感觉到两院注视他的目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严肃而较少赞扬”的时候，——为什么他恰好要选定这个时候，冒着不仅使自己的地位更加恶化而且使自己彻底垮台的危险，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第一次向另外一个人，而且是向他的一个属下表现出始终不渝的忠忱呢？为什么他要把自己新生的热情弄到这种地步，以致使自己成为一位包令博士的替罪者呢？当然，没有一个头脑健全的人会认为这位高贵的子爵能陷入这种浪漫主义的迷误。他在这次同中国发生的纠葛中所持的政策确切证明了他提交议会的文件是不完全的。除了已经公布的文件，必定还有秘密文件和秘密训令，这些文件和训令会证明：如果包令博士真的害了想进入广州城的“偏执狂”，这是由于在他背后有一位头脑冷静的白厅首脑鼓励了这种偏执狂，并且为了自己的目的把这种偏执狂从潜热状态煽成了吞噬一切的火焰。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2 月 27 日
载于 1857 年 3 月 16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4962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并根据手稿的片断校对过

卡·马克思 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

1857年3月6日于伦敦

下院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经过四个夜晚的激烈争吵以后,终于以通过对帕麦斯顿内阁不信任案而平静下来。帕麦斯顿用“惩罚解散”来回敬不信任。他把下院议员罚回老家去。

辩论的最后一个晚上,下院会场内部和聚在附近街道上的群众中间笼罩着极强烈的激动情绪,这不单是由于涉及到的利害关系重大,而且更多地是由于受审判的这个人的特点。帕麦斯顿的统治,不是一个普通内阁的统治。这是一种独裁。自从对俄战争一开始,议会就已几乎放弃了它的宪法职权;甚至在缔和以后,它也不敢重新行使这种职权。它经过一种逐渐的、几乎是觉察不到的衰退过程,已经降到 Corps Législatif〔立法团〕的地位,它不同于真正的波拿巴御用机构的地方,只在于它那虚饰的门面和高傲的调子。单是组成联合内阁这一点就已表明,各旧政党(议会机器靠它们彼此的摩擦来保持运转)已经化为乌有。起初通过联合内阁反映出来的各政党的这种软弱无力,后来由于战争而体现

下院在 1857 年 2 月 26、27 日、3 月 2、3 日进行辩论,最后以 263 票对 247 票通过对帕麦斯顿内阁不信任案;帕麦斯顿随即解散了议会。——译者注

成为一个人的至高无上，这个人在他半世纪的政治生涯中，从来不曾属于任何政党，但却一直利用了一切政党。如果不发生对俄战争，那末这些旧的正牌政党的没落本身就会引起转变。议会将由于给它的机体中注入新鲜血液、给至今在议会中还没有表决权 and 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中的至少某一部分以政治权利，而获得新的生命。然而战争中断了这一自然的发展过程。战争没有使旧的议会矛盾的中和化有利于群众，而是使这一过程唯独对一个人有利。结果我们得到的不是英国人民的政治解放，而是帕麦斯顿的独裁。战争是形成这种结果的有力的动力，战争也是巩固这种结果的唯一手段。所以战争已变成帕麦斯顿独裁的生命攸关的条件。在英国人民中间，对俄战争比巴黎和平还要更受欢迎。那末为什么英国的阿基里斯（凸角堡的耻辱和卡尔斯的陷落¹³³就是在他的荫庇下发生的）没有利用这种有利的情况呢？很明显，这是因为选择权并不操在他的手中。于是就有他的由于他与美国的误解而签订的巴黎条约，于是就有他的远征那不勒斯，他和波拿巴的表面争吵，他对波斯的侵犯以及他在中国的大屠杀¹³⁴。

下院就这最后一个事件通过不信任案，便是消灭帕麦斯顿所篡夺的权力的手段。所以这次投票不是单纯的议会表决，而是反叛——一种强制恢复议会宪法职权的企图。议会里普遍的感觉是如此，而且不管形成这种杂牌多数的各个派系（包括得比派、皮尔派、曼彻斯特派、罗素派以及所谓独立派）抱有什么特别的动机，它们说决不是一般的反政府阴谋使它们投票一致，倒都是诚恳的。然而，指责它们搞阴谋正是帕麦斯顿用以自卫的武器。他以 *argumentum ad misericordiam*（号召仁慈为怀），把自己装扮成无原则的阴谋的牺牲品，来掩盖自己地位的虚弱。对于这种像老贝利¹³⁵

的罪犯们所惯用的辩词，再没有比迪斯累里先生的斥责更加中肯的了。迪斯累里说：

“首相是世界上唯一不能容忍联合的一个人。然而，他却正是毫无原则的政治联合的典型。请看，他的政府是怎样组成的吧。就在去年，他的内阁的全体阁员都在本院支持一个法案，据我看，那个法案是前届内阁的一位阁员提出的。但是在上院，这个法案却遭到他的一位阁员的反对，并且这位阁员为了给自己那显然与现内阁不一致的行为辩解，竟大胆地宣布说，当他就任阁员的时候，首相并不曾要求他对任何问题承担义务。（笑声）然而，高贵的勋爵却对目前所形成的这种无原则的联合感到大为震惊。高贵的勋爵不能容忍联合。高贵的勋爵只和那些在政治上同他一起投生和长大的人们在一起活动。（掌声与笑声）这个海格立斯（指着帕麦斯顿勋爵）是从小在辉格党的摇篮里长大的，他的政治生活是多么首尾一贯啊！（笑声再起）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高贵的勋爵几乎信奉一切原则，几乎和每个政党结成联盟，而在今天晚上，他高声地发出了反对联合的警告，因为他害怕下院的多数——其中包括若干最杰出的、曾做过高贵勋爵的同僚的议员——会不赞同他的对华政策，这个政策以暴行作为开端，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将以毁灭告终。先生，这就是高贵的勋爵现在所处的地位。我们曾听到高贵的勋爵对于这样的政策作过什么辩护吗？他有没有提出哪怕一条我们的对华关系所应当遵守的原则呢？他有没有规定哪怕一条我们在这样的危急关头能够遵循的政治准则呢？相反，他借词掩盖他那虚弱而摇摆的地位，而说——说什么呢？——说他是阴谋的牺牲品。他不是像一个大丈夫或者政治家那样出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把辩论中提出的一些在我看来实际上已经了结和遗忘了的琐细意见颠三倒四地里复一遍，然后转回来说这一切都是阴谋！高贵的勋爵习惯于不提出一条原则而获得多数——这种多数实际上是偶然情况的结果，事实上它之所以产生，只是因为高贵的勋爵坐在议席上，不必就任何一个能触动国人心灵或影响全国舆论的国内外问题发表意见，现在他终于会发现，如果他要做一个政治家，他必须持有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时候已经到了；他也会懂得，当他的内阁的粗暴错误被发现、并且所有那些通常影响本院意见的人都一致加以斥责的时候，他不应该向国人申诉他是阴谋的牺牲品。”

然而，要说这次辩论之所以有趣，是因为辩论触及了动人心弦的问题，那也是十分错误的。辩论一晚又一晚地进行，而总不

举行表决。在大部分搏斗中，斗士们的声音都淹没在私人交谈的嘈杂声浪中。一晚复一晚，政府派故意用演说拖时间，以便赢得另一个昼夜去进行阴谋和幕后活动。第一天晚上，科布顿先生发表了一篇漂亮的演说。布尔韦尔和罗素勋爵的演说也不坏；可是首席检察官对他们说，“他无论如何不能拿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与论证去和在另一院发表的论证作比较”，这话无疑是正确的。第二个夜晚被双方的代理人——检察长，怀特塞德先生和首席检察官——冗长的专门关于法律方面的争论占去了。詹姆斯·格莱安爵士确曾试图使辩论更加生动，但是没有成功。当这个邦迪埃拉兄弟的实际谋杀者¹³⁶伪善地高声说他“要洗清他与这无辜流血案件的关系”的时候，会场上对他的悲愤激情的回答是抑制不住的讥笑。第三天晚上更是无聊。先是 *in spe* [未来的] 首席检察官弗·塞西杰尔爵士答辩 *in re* [现任的] 首席检察官，其次是法学家施博士想方设法答辩弗·塞西杰尔爵士。约翰·帕金顿爵士大力施展他那俚俗的辩才。卡尔斯的威廉斯将军的发言，下院只静听了几分钟，就不约而同地置之不理了，因为看出了他并不是他们原来想像中的那个人。最后，悉尼·赫伯特爵士发了言。这位皮尔政治学派的文雅后生所发表的演说，的确简洁有力、尖锐、与众不同，不过它多半是讥诮政府派的论点，而没有提出他自己的新论点。但是最后一个晚上，辩论却达到了下院所应有的水平。罗巴克、格莱斯顿、帕麦斯顿和迪斯累里都各有千秋。

困难在于撇开在辩论中被用做挡箭牌的约翰·包令爵士，而

贝瑟耳。——编者注

蒙克里夫。——编者注

直接揭露帕麦斯顿勋爵本人，要他个人对“屠杀无辜者”负责。这点终于做到了。由于即将举行的英国大选，主要将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我们不妨尽可能简要地介绍一下这次讨论的结果。在内阁垮台的第二天和内阁宣布解散下院的前一天，伦敦“泰晤士报”曾大胆地这样断言：

“国民对于究竟应该回答什么问题，将感到为难。在这里得到消息六个星期以前在地球的另一端干出的，并且是前任内阁所委派的官员干出的那一系列行动，是否使帕麦斯顿勋爵的内阁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了呢？大臣们在圣诞节才初次听到关于这些事件的消息，在那以前他们也和所有其余的人一样地一无所知。事实上，如果这一切是发生在月球上或者是在‘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里，现任内阁对它的关系也不可能更少些……难道帕麦斯顿勋爵的内阁应该为了它过去从未做过并且也不可能做的事情，为了它只是与大家同时听到的事情，为了那些不是由它委派的并且它至今未能与之保持任何联系的人们所做的事情，而被谴责和推翻吗？”

对于这家一直把广州屠杀说成是帕麦斯顿外交杰作的报纸所发表的这篇无耻谰言，我们可以举出几件在冗长辩论中很费劲地确定下来并且从来没有遭到帕麦斯顿或其属下辩驳过的事实来反驳。1847年，帕麦斯顿勋爵任外交大臣的时候，他那要求准许香港英国当局进入广州城的第一道训令，就是用恫吓的词句写成的。不过，他的火气被他的同僚，当时的殖民大臣格雷伯爵浇了一盆冷水，格雷伯爵给不仅驻在香港的、而且驻在锡兰的海军部队的指挥官们发出了一道最严格的命令，禁止在未得到来自英国的特别许可时在任何情况下对中国人采取任何侵犯行动。然而，帕麦斯顿勋爵在1849年8月18日，即在他退出罗素内阁之前不久，给驻在香港的英国公使发出了如下的训令：

“不要让广州的高级官员或北京政府自我陶醉。英国政府迄今表现宽容，

并不是由于它感到软弱，而是由于它意识到自己具有优势力量。英国政府很清楚，只要形势需要，英国的军事力量能够毁灭广州城，叫它片瓦不留，从而使该城居民受到最厉害的惩罚。”

因此，1856年帕麦斯顿勋爵任首相时所发生的炮轰广州的事情，早在1849年帕麦斯顿勋爵任罗素内阁外交大臣时，就已在最后一次发到香港去的训令里有了先兆了。那时以来的历届内阁都不曾稍微放松那项严格禁止香港英国代表迫使中国当局准许他们进入广州城的命令。罗素内阁的格兰维耳伯爵，得比内阁的马姆兹伯里伯爵和阿伯丁内阁的纽卡斯尔公爵都是如此。最后，到1852年，一直做广州领事的包令博士被任命为全权代表。据格莱斯顿先生说，包令的任命是帕麦斯顿的盲目工具克拉伦登伯爵一手包办的，事先并未告知阿伯丁内阁或征得他的同意。当包令第一次提出现在正在争论的问题时，克拉伦登在1854年7月5日的训令里对他说，他是对的，但是他应该等到为实现他的目的所必需的海军力量已经具备时才动手。当时英国正和俄国作战。当“亚罗号”事件发生的时候，包令正好得悉已经媾和，并且的确给他派去了海军。于是就找借口与叶总督发生了纠纷。1月20日，克拉伦登得到全部情况的报告后告诉包令说，“女王陛下政府完全同意西马糜各厘爵士和您所采取的做法。”这个措词如此简单的赞同意见并未附有任何进一步的指示。正相反，哈蒙德先生在给海军大臣的信中，以克拉伦登勋爵的名义向西马糜各厘海军上将表示了政府赞扬“他行动的温和，以及他尊重中国人生命财产的态度”。

由此可知，屠杀中国人的事情是由帕麦斯顿勋爵亲自策划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如今他希望打出什么旗号去愚弄联合

王国的选民，这个问题我希望留到下一篇通讯里去回答，因为这篇通讯已经超过它的限度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3 月 6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7 年 3 月 2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70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¹³⁷

1857年3月13日于伦敦

“站在两个教士中间，好大人，
好让我借此高唱赞美圣曲。”

帕麦斯顿并没有完全按照白金汉给理查三世出的主意行事。他站在教士和鸦片走私商中间。这个老练的骗子让他的亲戚舍夫茨别利伯爵推荐的那些低教会派主教，证明他“正直无邪”，而贩卖“麻醉世人的甜蜜毒药”的鸦片走私商，则证明他忠心耿耿地为“私利，这颠倒乾坤的势力”服务。苏格兰人伯克以伦敦的“尸首贩子”¹³⁸自豪。同样，帕麦斯顿以利物浦的“毒品贩子”自豪。这些仪表堂堂的先生都是那个追本溯源以奴隶贸易扬名天下的城市的尊贵代表。别无什么诗作闻名的利物浦，至少有资格要求给它记上一笔独特的功劳，即它曾以赞美奴隶贸易的颂歌丰富了诗坛。所以，如果说品得曾以“万物莫好过于水”（《Ariston men hudson》）的名句开始他那篇赞美奥林匹克竞技会优胜者的颂歌，现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三幕第七场。——编者注

莎士比亚“约翰王”第一幕第一场。——编者注

同上，第二幕第一场。——编者注

引自品得“第一首奥林匹克颂歌”。——编者注

代利物浦的品得在他赞美唐宁街¹³⁹空谈家的颂歌里就很可能用一个更巧妙的首句：“万物莫好过于鸦片”。

跟圣洁的主教和邪恶的鸦片走私商走在一起的，还有大茶商，他们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从事鸦片贸易，因此热中于取消与中国签订的现行条约。此外他们还有自己的打算。去年他们冒险进行了大宗茶叶投机生意；战事拖延下去，会同时既使他们的大量存货涨价，又使他们能延期偿付广州债主的巨额债款。这样，战争会使他们能够同时既欺骗英国买主又欺骗中国卖主，因而实现他们所谓的“民族光荣”和“贸易利益”。一般地说，英国工厂主并不赞同这种利物浦教义问答的教条，所根据的也是那个把希望棉价低廉的曼彻斯特人跟希望棉价高昂的利物浦人对立起来的高尚原则。在 1839 年至 1842 年的第一次英中战争期间，英国工厂主曾陶醉于出口贸易会惊人扩大的妄想。他们曾一码一码地量出了准备给天朝人穿著的棉织品。然而，实际经验砸碎了帕麦斯顿这类政客锁住天朝人心窃的那把大锁。从 1854 年到 1857 年，英国工业品对中国的出口平均一年不超过 125 万英镑，而这是在第一次对华战争以前的年份里常常达到的数目字。

英国工厂主发言人科布顿先生在下院说道：“实际上，从 1842 年以来，我们即联合王国 丝毫也没有增加对中国的出口，至少在我们的工业品方面是如此。我们增加了茶的消费量；仅此而已。”

因此，在对华政策方面，英国工厂主能够比英国主教、鸦片走私商和茶商看得更广阔些。如果除去那些抓着每届政府的衣裙不放的寄生虫和钻营家，除去那些相信在帕麦 的荫底下“民族将

振奋起来”的糊涂的清谈爱国者，我们实际上已把帕麦斯顿所有的 bona fide〔真正的〕党羽都列举出来了。不过，我们还不应该忘记伦敦“泰晤士报”和“笨拙”杂志——英国新闻界的大科夫塔和小丑¹⁴⁰；它们二者都被黄金的链条和官方的链条跟现政府连在一起，因此也就以装模作样的热情来颂扬这位广州大屠杀的英雄。既然如此，就应该认为下院的表决不仅意味着对帕麦斯顿的反叛，而且意味着对“泰晤士报”的反叛。所以，即将来临的选举不仅要决定帕麦斯顿是否能独揽国家的全部权力，而且还要决定“泰晤士报”是否能完全垄断舆论的制造。

帕麦斯顿到底会用什么口号来争取大选的选票呢？扩大对华贸易吗？但是他已经破坏了这种贸易赖以进行的口岸。他已经使这种贸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从海上转向了大陆，从五个通商口岸转向了西伯利亚，从英国转向了俄国。他提高了联合王国的茶叶进口税，这是扩大对华货贸易的最大障碍。保障英国商人冒险家的安全吗？但是政府本身给下院提出的蓝皮书“关于在中国发生的侮辱事件的函件”¹⁴¹证明，最近七年来那里只发生了六起侮辱事件，其中两起的肇事者是英国人，而在其余四起中，中国当局尽力惩办了罪犯，使英国当局感到完全满意。所以，如果目前香港、新加坡等地英国商人的生命财产有危险，他们的危险也是帕麦斯顿自己招来的。那末，维护英国国旗的荣誉！帕麦斯顿已经把它按每面 50 英镑的价格出卖给香港的走私商，并且以“大批屠杀手无寸铁的英国货买主”玷污了它。然而，扩大贸易、保障英国商人冒险家的安全和维护英国国旗的荣誉这些口号，是那些现在已向选民发表演说的政府先知们提出的全部口号。他们聪明地避而不谈任何国内政策问题，因为“不要改革”和“增加捐税”的口

号是得不到支持的。帕麦斯顿内阁的一位阁员，皇室司库马尔格累夫勋爵对选民说，他“不想提出任何政治理论”。另一位阁员，鲍勃·娄，在基台尔明斯特发表演说时嘲笑不记名投票、扩大选举权以及诸如此类的“欺人之谈”。还有一位阁员，拉布谢尔先生，就是那个以这样一种借口来为炮轰广州辩护的聪明人，他说，如果下院认为这一行动不正当，那末英国人民就得准备给那些财产在广州遭到毁灭的外国商人赔偿大约 500 万英镑，——就是那个拉布谢尔，在向汤顿的选民发表演说时根本抛开政治，只拿包令、巴夏礼、西马糜各厘的丰功伟绩来作为他竞选的论据。

所以，一家英国地方报纸认为帕麦斯顿不仅没有“成功的竞选口号，而且没有任何口号”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的事情决不是绝望了。从下院表决以后，情况已经完全改变。对广州采取的地方性暴力行动已导致对中国的全面战争。现在的问题只是由谁来继续进行这场战争？难道断言这场战争正当的人，不是比那些靠谴责这场战争而当选的对手更能有力地进行战争吗？

难道帕麦斯顿不会在两届内阁交替期间把事情搞得一团混乱，以致没有他就万万不行吗？

其次，单是发生选举斗争这件事，难道不会使问题得到有利于他的解决吗？按英国选民目前的成分，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选举斗争就意味着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斗争。既然帕麦斯顿是辉格党的实际领袖，既然他的失败必然造成托利党的上台，那末大多数的所谓自由派难道不会为了打垮得比而投票支持帕麦斯顿吗？这些就是政府派实际所指望的。如果他们的估计正确，那末人们迄今默然忍受的帕麦斯顿的专制独裁就会公开宣告实行。新的议会多数只有毫不含糊地宣布对首相俯首听命才能存在。可能，

随着帕麦斯顿撇开议会而诉诸人民，将来会发生 coup d' état [政变]，正如随着波拿巴撇开 A ssembl ée Nationale [国民议会] 而诉诸全国，发生过 coup d' état¹⁴²一样。那时，正是这些人民会由于吃了苦头而认识到，帕麦斯顿原来是卡斯尔里—西德默思内阁的旧阁僚，这个内阁曾经压制出版，禁止集会，停止实行 Habeas Corpus act [人身保护法]，使政府的任意监禁和放逐合法化，最后还在曼彻斯特屠杀了反对谷物法的人民¹⁴³。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3 月 13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7 年 3 月 3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75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 俄国的对华贸易

在帕麦斯顿勋爵和路易-拿破仑采用武力来扩展的对华贸易和往来方面，俄国所处的地位显然令人极为羡慕。的确，非常可能，从目前同中国人发生的冲突中，俄国不要花费一文钱、出动一兵一卒，而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得到更多的好处。

俄国同中华帝国的关系是很特殊的。当英国人和我们连跟两广总督直接进行联系的特权都得不到的时候，——至于法国人，他们之参加目前的军事行动，完全是客串性质的，因为他们实际上没有同中国进行贸易，——俄国人却享有在北京派驻使节的优先权。固然，据说这种优先权是由俄国人付出屈尊容忍的代价换来的：它只有算作中华帝国的一个朝贡藩属才得侧身于天朝的朝廷。但这毕竟使俄国外交在中国，也像在欧洲一样，有可能产生一种绝不仅限于外交事务的影响。

既然俄国人没有同中国进行海上贸易，他们从来就和有关这个问题的纠纷没有利害关系，过去和现在都从来没有卷入这种纠纷里去；因此，中国人的反感也就没有扩展到俄国人身上，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从海上侵入他们国家的一切外国人抱着反感，而且不是毫无根据地把他们同那些大概经常出没中国沿海的海盗或冒险家相提并论。不过，俄国人自己独享内地陆路贸易，成了他

们没有可能参加海上贸易的一种补偿,看来,在内地陆路贸易中,他们是不会有竞争者的。这种由 1768 年叶卡特林娜二世统治时期订立的条约规定下来的贸易,是以恰克图作为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活动中心,恰克图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和中国的鞑靼交界处、在流入贝加尔湖的一条河上、在伊尔库茨克城以南离城约 100 英里。这种在一年一度的集市上进行的贸易,由十二个中间人经管,其中六个是俄国人,六个是中国人;他们在恰克图会商,由于贸易完全是以货易货,还要决定双方所应提供交换的商品比例。中国人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毛织品。近几年来,这种贸易似乎有很大的增长。十年或十二年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 4 万箱;但在 1852 年却达 175 000 箱,其中大部分是上等货,即在大陆消费者中间享有盛誉的所谓商队茶,不同于由海上进口的次等货。中国人卖出的其他商品是少量的糖、棉花、生丝和丝织品,不过这一切数量都很有有限。俄国人则付出数量大致相等的棉织品和毛织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国皮革,精致的金属制品,毛皮以至鸦片。买卖货物的总价值(按照所公布的账目来看,货物定价都不高)竟达 1500 万美元以上的巨额。1853 年,由于中国内部不安定¹⁴⁴以及产茶省区的通路为起义部队所占领,起义者抢劫敌人的商队,所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就减少到 5 万箱,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只有 600 万美元左右。但是在随后的两年内,这种贸易又恢复了,运往恰克图供应 1855 年集市的茶叶不下 112 000 箱。

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它变成了这一带

边区的首府，荣幸地驻上了一位军事司令官和一位民政官。同时，恰克图和距离它约 900 英里的北京之间，最近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邮政交通来传递公文。

很显然，如果同中国的海上贸易由于现在发生的军事行动而停止了，欧洲就只能从这条商路得到茶叶的供应。实际上，有人认为，即使海上贸易将重新开放，俄国完成了它的铁路网建设以后，也会在供应欧洲市场茶叶方面成为海运国家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这些铁路将直接沟通喀琅施塔得和里巴瓦两港同位于俄国中部的古城——下新城（在恰克图经商的商人居住地）之间的交通。欧洲将经由这条陆路得到茶叶的供应，这要比利用我们所设计的太平洋铁路来达到这一目的有远为更大的可能。中国的另一宗主要出口物丝，由于它的体积远远小于它的价值，由陆路运输也是完全可能的；同时，同中国的这种贸易也为俄国的制造品打开了在别处找不到的销路。

然而，可以看出，俄国的努力决不只限于发展这种陆路贸易。它占领当今中国统治王朝的故乡——黑龙江两岸的地方，才只有几年的时间。它在这方面的努力，在上次战争期间曾经一度中断，但是，无疑地，它将来会大力恢复这种努力的。俄国占领了千岛群岛和与其毗邻的堪察加沿岸。它在这一带海面上已经拥有一个舰队，它无疑地会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来设法参加同中国的海上贸易。不过，这与扩张已经为它垄断的陆路贸易比较起来，还是次要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3 月 18 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4 月 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8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英国的选举

1857年3月20日于伦敦

编写 1848 年到 1858 年这段时期的欧洲历史的未来历史学家，一定会为波拿巴于 1851 年对法国所采用的手段同帕麦斯顿于 1857 年对联合王国所采用的手段竟如此相似而惊愕不已。这两个人都假装不求助于议会而求助于国民，不求助于狡猾的政党联合，而求助于老实的舆论。这两个人都提出同样的借口。如果说波拿巴曾经准备使法国免遭社会危机，那末如今帕麦斯顿就正在准备使英国免遭国际危机。和波拿巴一样，帕麦斯顿必须抓住强有力的执行权来对付立法权的空洞谈论和烦渎干涉。波拿巴同时既诉诸保守派¹⁴⁵，又诉诸革命派，把前者当做贵族的敌人，把后者当做资产阶级篡位夺权的敌人。而帕麦斯顿——难道他没有侮辱一切专制政府吗？那末他会引起任何自由派的不满吗？另一方面，难道他没有出卖一切革命吗？那末他不是应该成为保守派挑中的人物吗？他反对任何改革，保守派难道会不支持他吗？他不让托利党人担任官职，那末自由派的钻营之徒难道会抛弃他吗？波拿巴是一个使外国人害怕和代表法国光荣的名字。帕麦斯顿对于联合王国说来不也正是如此吗？不管怎样，他从 1830 年实行选举改革¹⁴⁶以来，即从英国近代史开始以来，除了几次短暂的间隔以外，

一直是执掌外交部的。因此，英国的国际地位，不管在外国人看来是多么“可怕”或多么“光荣”，是与帕麦斯顿勋爵个人有关的。波拿巴一拳就把法国所有公认的大人物打倒了，但是帕麦斯顿难道不会把罗素分子、格莱安分子、格莱斯顿分子、罗巴克分子、科布顿分子、迪斯累里分子 *tutti quanti* [等等]“碎为齏粉”吗？波拿巴不曾有任何原则、任何准则，但是他曾答应给法国提供它所希望的东西——一个人。帕麦斯顿现在也是这样做。他，也是一个人。甚至他的最凶恶的敌人都不敢说他代表什么原则。

难道 *Assemblée Législative* [立法议会] 制度不是由正统派和奥尔良派¹⁴⁷ 组成并掺杂了少许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联合的制度吗？这个联合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其中所代表的那些政党是分散的，因为旧的党派传统只允许它们结成消极的统一体。这种消极的统一体不能采取行动；它的行动只能是消极的；它只能是一种障碍；波拿巴的权力即由此而来。但是，帕麦斯顿的情况现在不也正是如此吗？难道从 1852 年起召开的议会不是联合议会，难道它因此不是一开始便体现为联合内阁了吗？*Assemblée Nationale* [国民议会] 等到被波拿巴强迫驱散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有行为能力的多数。下院在终于被帕麦斯顿宣布解散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但是他们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波拿巴在诉诸国民以前就宣布了 *coup d'état* [政变]。受宪法约束的帕麦斯顿在试图宣布 *coup d'état* 之前，必须先诉诸国民。在这一点上，不能否认，一切优点都在波拿巴方面。巴黎的大屠杀，各省的侦缉队，到处戒严，宣布人们不受法律保护，大规模的放逐，投票箱前后的刺刀和大炮，——所有这一切都使波拿巴派报纸（唯一未被十二月洪水冲走的报纸）的论据具有不祥的雄辩能力，无论这家报纸所固有的

毫不新奇的诡辩、令人极端厌恶的逻辑以及辞藻堆砌得令人作呕的阿谀奉承都不能使它的说服力有所减少。相反，帕麦斯顿的娄罗喊得越高，他的地位就越不稳固。尽管他是一位伟大的外交家，可是他忘记吩咐自己的奴才记住人们给那想为瞎子领路的跛子所提出的忠告，——他忘记叮嘱他们记住达来朗所说的《Pas de zèle》〔“不要太殷勤”〕。的确，他们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太过火了。就拿首都一份报纸上所刊登的这样一篇颂词作例子吧：

“帕麦斯顿万岁！——这就是我们期望将要在每一个选民会上喊出的口号……对帕麦斯顿勋爵无限忠诚——这就是应该列入每一个候选人的信条中的第一条教义……必须要自由派的候选人承认：帕麦斯顿勋爵担任首相——这是当今的政治必然性。无论如何必须承认他是当代的英雄，不仅是未来的英雄，而且是我们眼前的英雄；不仅是紧要时期不可或缺的人物，而且是我们同时代人中唯一的、生来应付我国显然即将面临的情况的人物……他是现代的偶像，是万民爱戴的人，是一轮冉冉东升的旭日。”¹⁴⁸

难怪约翰牛不能忍受这些，并且对颂扬帕麦斯顿的热狂产生了反感。

由于帕麦斯顿本人被宣布为政治原则，所以毫不奇怪，他的对手们也就把对他本人的批判研究当做了自己的政治原则。的确，我们看到，帕麦斯顿仿佛有魔法似的，使议会制英国的所有昔日巨擘都死而复生了。可以证明这种说法的，是约翰·罗素勋爵（辉格党人）在伦敦饭店一次首都选民会议上出现的场面，以及皮尔分子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在卡赖尔选民面前演出的戏，最后，还有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理查·科布顿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大厅的群众大会上的戏剧性表演。帕麦斯顿的做法完全不像海格立斯那样。他不是把巨人举到空中去杀死¹⁴⁹，而是把侏儒们推回到地面上，赋予新的力量。如果有人在世人的眼中贬低了自己，那末这

无疑是约翰·罗素勋爵，一位所有法律早产儿的生父，随波逐流的英雄，维也纳的外交调停人¹⁵⁰，能使一切都无可挽救地化为乌有的人物。但是现在请看一看他昂首阔步地出现在伦敦选民面前的场面吧。何以会有这种变化呢？这纯粹是帕麦斯顿给他安排的环境造成的。罗素说，我是废除宣誓法和市镇机关法的法律的起草者，是议会改革法案、市政机关改革法案、调整教会什一税问题法案、某些关于非国教徒的自由派法律¹⁵¹以及若干有关爱尔兰的法律的起草者。总而言之，我体现了辉格党人政策中一切进步事物的实质。难道你们为了一个代表着并无人民成分的辉格主义（不是作为政党而只是作为一群钻营之徒的辉格主义）的人而把我牺牲掉吗？然后，罗素把自己的缺点用来吹嘘自己。我一向是反对不记名投票的。难道你们以为帕麦斯顿奚落我，我现在就会屈辱自己而放弃信念，就会承担支持急进改革的义务吗？他的听众叫道，不，不要让罗素勋爵现在承担支持不记名投票的义务。这位小人物的伟大之处，就是他在这种情况下承认自己是微小改革的拥护者。为不赞成不记名投票的罗素勋爵三呼万岁，再呼万岁！然后，罗素勋爵使天平完全倾向于他那一方面，他向到会的人问道：他们能否允许一个小小的鸦片商集团按照帕麦斯顿的命令组成竞选团体来把政府所示意的决定强加在首都的自由选民身上，并且按照同一位帕麦斯顿的命令，使他，即十六年以来一直是他们的朋友的约翰·罗素勋爵本人遭到奚落！不！不！听众高声喊道，打倒这个集团！约翰·罗素勋爵万岁！很可能，现在罗素不仅将在伦敦重新当选为议员，而且可能得票最多。

詹姆斯·格莱安爵士的故事则更有趣。如果说约翰·罗素勋爵变得很可笑，那末格莱安就变得很可怜了。他对他的卡赖尔选

民说，难道只是因为我生平有一次凭良心办了事、宁可冒着丧失政治地位的危险而不愿屈从于一个人的专权，我就应该被人当做一支点完了的蜡烛一样吹灭，或者应该像一只被赶出赛狗场的狗一样溜走吗？你们不管我干了多少可耻的事情，还是选举我作为你们的代表。难道你们会因为我做了唯一的一件好事而要我辞职吗？卡赖尔的选民回答道，当然不会。

与罗素和格莱安不同，曼彻斯特的科布顿先生所要应付的不是自己的选民，而是布莱特和基卜生的选民。他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整个曼彻斯特学派的名义说话。这就加强了他的地位。在曼彻斯特，拥护帕麦斯顿的口号比在任何其他地方还要更不自然。工业资本家的利益在本质上不同于伦敦和利物浦的鸦片走私商的利益。在曼彻斯特产生的抵制布莱特和基卜生的反对派不是依据当地社会的物质利益，而号召选举帕麦斯顿则和这个社会的全部传统直接抵触。这个号召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高价刊物，它们想为废除报纸印花税和降低广告税¹⁵²报仇；另一方面是有钱有势的工厂主，他们对布莱特的优越的政治地位很眼红，企图扮演 *bourgeois gentilhommes*（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以为纠集在帕麦斯顿的贵族旗帜下比支持布莱特的稳健纲领还要更时髦，更为 *bon ton*（优雅）。曼彻斯特的帕麦斯顿集团的这个特点，使科布顿能够从反谷物法同盟¹⁵³运动以来第一次重新摆出平民领袖的姿态，重新号召劳动阶级聚集到他的旗帜下面来。他很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情况。他选来攻击帕麦斯顿的调子是多么高，可从下面这段引文中看出来：

“因此，所有这一切都与我认为我国人民应该密切关心的重大问题有联系。你们是否希望下院议员维护你们的利益，监督支出（是的，是的！）并且

不让你们卷入无益的、花钱的战争呢？(是的!)好极了,但是你们准备采取的行动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从你们报纸上所了解到的东西在选举过程中得到证实的话,因为我听说,你们打算把那些为了密切关怀你们的利益而联合起来、并且根据现有的事实对这次战争问题进行了表决的议员全都抛开,不让他们当选,而准备另选别人(不,不!)——另选别人出来干什么呢?——是为了维护你们的利益吗?不,是让他们到议会里专按照现任大臣的指示驯顺地干一些肮脏下流的勾当。(一片叫好声)的确,我听说,你们准备让帕麦斯顿勋爵来做我国的专制统治者。(不,不!)很好,可是如果议会制止他,如果他在受到议会抑制的时候解散议会,如果你们不把那些不偏不倚的、有足够能力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你们的权利的人送进议会,而把纯粹执行帕麦斯顿意志的人送进议会,那末这岂不是使他有了专制权力吗?让我告诉你们吧,这是世界上最粗暴的、代价最高的、同时也是最不负责任的专制,因为你们在这位大臣周围造成了代议制形式的骗人假象;当他有议会作为倚仗的时候,你们就碰不着他;要是你们在选举中不执行自己的职责,不把那些将要警惕地监视现任大臣的人选入下院,我敢说你们的景况就会很糟糕,因为你们将要比普通普鲁士国王和法国皇帝的臣民受到更不负责任的统治。(大声欢呼)”

现在大家知道帕麦斯顿为什么要急忙地进行选举了。他只有用奇袭的手段才能获胜,而时间却是奇袭的敌人。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3 月 20 日
载于 1857 年 4 月 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80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 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

几年以前，当在印度施行的可怕的刑罚制度在议会中被揭露的时候，极可尊敬的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之一詹姆斯·霍格爵士曾厚颜无耻地说，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可是后来的调查证明，这种说法是有事实根据的，而且这些事实对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来说应当是十分清楚的。因此，詹姆斯爵士只好对于向东印度公司提出的那些可怕的指控，或者承认是“故作不知”，或者承认是“明知故纵”。看来，英国现任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和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伯爵现在也处于同样的窘境。首相在市长不久前举行的宴会上的演说中，企图对施于中国人的残暴行为进行辩护，他说道：

“如果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赞同采取无理的行动，毫无疑问，政府便走上了应受议会和全国斥责的道路。但是相反地，我们深信这些行动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认为，我国备受欺凌。我们认为，我国同胞在地球的遥远地方遭到了种种侮辱、迫害和虐待，对此我们不能置之不理。（鼓掌）我们认为，我国根据条约应享有的权利已遭到破坏，而有责任保护我国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地区内的利益的人员，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尽量利用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来对付这些暴力行为。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不赞同采取那些在我们看来是正确的行动，不赞同采取那些当我们自己身历其境时也会义不容辞地采取的行动，那末，我们就会辜负我国同胞所寄予的信任。（鼓掌）”

但是，无论英国人民和全世界怎样为这些讲得头头是道的解

释所迷惑，勋爵大人自己当然不会相信这些解释的真实性，要是他信以为真，那就表示他故作不知，这同“明知故纵”几乎同样是不可原谅的。自从关于英国人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第一个消息传来以后，英国政府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刊就不断地诬蔑中国人——不分青红皂白地非难中国人违背各约的义务、侮辱英国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等等。可是，除了划艇“亚罗号”事件以外，它们举不出一件确凿的罪名，举不出一件事实来证实这一切诬蔑。而且就连这个事件的实情也被议会中的花言巧语歪曲得面目全非，以致使那些认真地想弄清这个问题真相的人大惑不解。

“亚罗号”划艇是一只不很大的中国船，船员都是中国人，但是船为几个英国人所雇用。这只船曾经一时获得悬挂英国国旗航行的执照，可是在现在用作借口的“侮辱事件”发生以前，这张执照已经满期了。据说，这只船曾被用来偷运私盐，而且船员中有几个歹徒——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当局早就因为他们是怙恶不悛的罪犯而想予以逮捕。当这只船不挂任何旗帜下帆停泊在广州时，水师听说这些罪犯藏匿船中，便逮捕了他们；我们的港口警察要是知道附近某一只本国船或外国船上藏有水贼和走私贩子，也一定会这样做的。可是因为这次逮捕妨碍了货主的商务，船长就向英国领事控告。这位领事是个就职不久的年轻人，据说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当时他 *in propria persona*（亲自）跑到船上，同只是履行自己的公职的水师大吵大闹，结果一无所得。于是他急忙返回领事馆，用命令式的口吻向两广总督提出书面要求：放回被捕者并道歉，同时致书香港的约翰·包令爵士和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硬说什么他和英国国旗遭到了不可容忍的侮辱，并且相当明显地暗示说，期待已久的向广州举行示威的良机来到了。

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的年轻英国领事的蛮横要求。他说明捕人的理由，并对因此而引起的误会表示遗憾；同时他断然否认有任何侮辱英国国旗的意图，他答应放回水手，因为尽管逮捕这些人是合法的，他却不愿意以这样严重的误会作为逮捕他们的代价。但是这一切没有使领事巴夏礼先生感到满意，他要求正式道歉，并以隆重礼节送回被捕者，否则叶总督应对一切后果负责。接着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率领英国舰队抵达，旋即开始了另一套公函往来：海军上将态度专横，大肆恫吓，中国官吏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要求在广州城内当面会商。叶总督说，这违反先例，而且乔治·文翰爵士曾答应不再提出这种要求。如果有必要这样做，他愿意按照常例在城外会面，或者采取其他不违反中国习惯与相沿已久的礼节的方式来满足海军上将的愿望。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使英国在东方的这位好战的代表称心如意。

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就是根据上面简单叙述的理由而进行的——现在向英国人民提出的官方报告完全证实了这种叙述。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荒唐的借口下发生的！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至少那些愿意弄清这个问题的人们——都知道这些非难是多么虚伪和空洞。有些人企图回避对主要问题的追究，硬要大家相信，似乎在划艇“亚罗号”事件以前发生的一系列侮辱行为本身已足以构成 *casus belli* [宣战的理由]。可是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中国人针对着英国人提出的每一件控诉，至少可以提出九十九件控诉。

可是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是多么沉默啊！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经常贿赂下级官吏而使中国政府失去在商品进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充当连奴隶都不如的牛马以及在古巴被卖为奴的受骗的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情形，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常常无耻地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的情形以及这些外国人在各通商口岸干出的伤风败俗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我们所以听不到有关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的事情，首先是因为在中国以外的大多数人很少关心这个国家的社会和道德状况；其次是因为精明和谨慎的原则是不去涉及那些不能带来钱财的问题。因此，眼光不超出常去购买茶叶的杂货店的英国人，就完全可以把政府和报纸塞给公众的一切胡说吞咽下去。

同时，本来已趋于平息的、在鸦片战争时期燃起的仇英火焰，在中国爆发成了愤怒的烈火，一切关于和平和友好的声明都未必能扑灭这股烈火¹⁵⁴。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3 月 22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4 月 10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8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切尔克西亚的叛徒

下面这封信是从“佩斯劳埃德氏报”155 摘录下来的。

2月26日于切尔克西亚土阿普谢司令部

“您将由英国轮船‘袋鼠号’接到这封信，这封信也许将使欧洲首次得悉一个可能对切尔克西亚各民族的未来命运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您知道，我所服侍的穆罕默德·贝伊(班迪亚)，已经同意切尔克西亚各部落领袖和代表的建议，接受总司令的职务。星期一，即2月23日，我们在我们的司令部所在地土阿普谢上岸。在动身前，穆罕默德·贝伊给各兵种聘请了约两百名优秀的军事教官，他们随同我们来到此地。穆罕默德·贝伊已经被郑重地宣布为切尔克西亚部队的总司令。王公、贵族以及民众代表都手按可兰经宣誓要服从他，而今天，切尔克西亚的国会代表团送来了作为最高权力象征的先知的旗帜。当这位新司令宣誓效忠这面神圣的旗帜时，场面极为热烈。(旗帜本身是绿色的，上面有一把白剑、一弯新月和一颗星。)情绪非常激动；切尔克斯人决心要争取到完全的独立，否则就为它战死沙场。预期到5月可能将有15万(?)人参加战斗。穆罕默德·贝伊刚才告诉我说：‘俄国很快就可能看到，一种新的情绪正在占上风。’我研究了其所掌握的材料(穆罕默德·贝伊在上次战争中是站在切尔克斯人一边的)，并且认为，一个在没有军事组织的情况下都能够抵御敌人三十年的民族，一旦有了适当的组织，就一定能够争取到完全的独立。随着春天的来临，您可以期望从这个山国得到一系列重要的消息。只要我们的通讯工具允许，您将从我这里得到关于事变进程的报道。”

班迪亚是匈牙利的领导人之一，最初在科苏特手下工作，后

来在瑟美列手下工作；1851年和1852年流亡英国；他被普鲁士政府和法国政府雇佣为密探，当然，必须和它们的共同主子一致行动；现在他在英国的庇护下前往仿佛正有一种新的情绪占上风的切尔克西亚。那里过去的情绪是反对俄国的，新的情绪一定是倾向于俄国——切尔克西亚据说应该争取到它从未丧失过的独立，除此以外，还臆想出来一个应该立即建立的议会。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3月25日

左右

载于1857年4月1日“自由新闻”

第34号（第4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自由新闻”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科布顿、布莱特和基卜生的失败

1857年3月31日于伦敦

“大多数候选人都表示他们打算广泛支持帕麦斯顿勋爵，以此来作为争取重新选入新议会去当舆论代表者的最好理由……帕麦斯顿将不是作为保守党、或者辉格党、或者皮尔派、或者急进党的首脑，而是作为英国人民的领袖，作为全民政党的伟大发起人和缔造者进入议院。”

以上是帕麦斯顿勋爵的私人机关报“晨邮报”¹⁵⁶上的一段话。帕麦斯顿作为独裁者，新议会作为他的 Corps Législatif [立法团]——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如此，这也许还可以从选票中得到证实。至于“晨邮报”上所说的“舆论”，那末正像人们公正地指出的那样，其中有一半是帕麦斯顿本人制造的，而对另一半，他则付之一笑。

这场选举斗争中的最大事件就是曼彻斯特学派的彻底失败：布莱特和米尔纳·基卜生失去了曼彻斯特的议席，科布顿失去了哈得兹菲尔德的议席，埃·阿米塔季爵士失去了索尔福的议席，福克斯失去了奥尔丹的议席，迈奥尔失去了罗契得尔的议席。特别使所有的人，甚至使帕麦斯顿政府惊讶不已的，是曼彻斯特的选举结果¹⁵⁷。政府原来对这里的胜利是如何不抱希望，可从它的行动是多么犹疑不决看出来。最初，帕麦斯顿在收到几份曼彻斯特的告选民书之后，曾威胁说要亲自到这个纺织工业的中心去，在“敌人自己

的粪堆上”向敌人挑战。但是他再一考虑,就退缩了。然后是内阁的下属鲍勃·娄出场。一伙大工厂主邀请他做曼彻斯特的候选人,并且保证在他失败时付给他 2000 英镑,使他可以在那里买到一个腐朽的市镇,他公开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允许选举委员会开始为他进行竞选活动。后来科布顿在曼彻斯特发表了著名的演说¹⁵⁸。在这以后,帕麦斯顿就吩咐娄撤销自己的候选人资格,娄依命照办了。甚至在进一步考虑之后,企图在曼彻斯特获胜还是显得毫无希望,于是“泰晤士报”便奉令来扮演寓言中的狐狸¹⁵⁹。鲍勃·娄必须写一篇社论,坚持重新选举布莱特这一帮人,并且规劝曼彻斯特人不要以抛弃自己的旧代表来玷辱自己。在经过这一切担忧之后,电报给唐宁街传去的消息却说科布顿垮了台,布莱特和基卜生被击败了,并且是被绝大多数票击败的,这时内阁阵营里那种欢欣若狂和高呼胜利的情景,是可想而知的。至于帕麦斯顿本人,在他看来这个胜利是超出他个人利益所许可的限度的,因为这个老滑头知道得很清楚,即使是一个巨人,要制服他,只消把他引入下院就行了,而要加速这个议院本身(它的基础,即有特权的选民团,它的上层建筑,即对内阁的篡夺)的毁灭,也只须把那些最有名的议员驱逐出去,把他们撵上街头,从而给那站在“英国宪法”大门外面的苦命的群众提供一批有声望的首领。

曼彻斯特学派在自己的基地上被它自己的大多数部队所击败,看去好像是帕麦斯顿个人的胜利,这决不是仅仅因为那旨在把他逐出内阁并且成为解散议会的借口的不信任投票,是由科布顿和基卜生提议举行的。在帕麦斯顿和布莱特、科布顿等人身上,似乎体现了不同原则和不同地位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帕麦斯顿是鼓吹民族荣誉的号筒,他们是维护工业利益的喉舌;他是集

英国寡头政治一切篡夺行为于一身的讲求外交手腕的子爵，他们是体现英国资产阶级生命力的煽动家、parvenu〔暴发户〕；他从政党的瓦解中吸取力量，他们的力量应归之于阶级斗争。他是旧的托利主义的最后一个无原则的化身，是反对如今已经不存在的反谷物法同盟的领袖们的。因此，科布顿、布莱特等人的失败看上去就好像是帕麦斯顿个人的胜利，更何况与他们竞选的那些幸运对手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意义。例如，布莱特的对手约翰·波特爵士，只由于是曼彻斯特的头号大胖子而闻名。他很可能被人看做是曼彻斯特的约翰·福斯泰夫爵士¹⁶⁰，要不是他的渺小的智慧和巨大的钱包使他免于跟这位不朽的骑士相提并论的话。米尔纳·基卜生的对手阿·特纳为他的个人要求提出这样的论据，即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因此决不会以炫耀才能或摆阔气的恶劣作风来刺痛自己同胞的感情。科布顿的对手艾克罗伊德先生责难前者是一个全国规模的人物，而他（艾克罗伊德）从来就是，当然将来也只会是一个普通的哈德兹菲尔德人。他们全都以没有才能但是有性格而自豪，而这份天赋必定使他们不会像他们的前辈那样犯下“反对一切政府”的错误，不会像米尔纳·基卜生那样为了某些理论上的奇怪念头而牺牲有利可图的职位。

但是，尽管表面上是这样，帕麦斯顿那份反对科布顿等人的告选民书，并不是使早已在曼彻斯特学派周围堆积起来的可燃物质爆炸的原因，而只是使它们爆炸的借口。由于曼彻斯特是政党的核心，而布莱特又被公认为这个政党的真正英雄，所以只要仔细地了解一下他的失败，就可以说明他的战友们在其他工业地区同时遭到的失利。这里首先是老的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起了作用，他们曾经一心渴望为他们在反谷物法同盟出现以来所遭到的政治

上的冷遇报仇雪恨。在 1852 年的选举中，布莱特仅以 100 票的多数战胜他们，这就表明他们在数量方面的力量决不能轻视了。他们当然不能在自己的旗帜下取得胜利，可是他们是支持布莱特大军任何一个临阵脱逃的兵团的强大援军。其次，站在第二排的是高价报刊的首领，他们对廉价报刊的议会教父们¹⁶¹怀有深仇宿怨。“曼彻斯特卫报”¹⁶²的编辑加内特先生动员了一切力量来反对布莱特，竭力给反布莱特联盟的那些相当破烂的论据蒙上体面的服装；使他的这种企图比较容易实现的，是布莱特和科布顿在对俄战争时期弄得不孚众望¹⁶³。在那个时期他们确实不敢在曼彻斯特的公开的群众集会上露面，不得不躲在纽奥尔大厦（反谷物法同盟的旧盟址）同知心朋友饮茶谈心。自由资产阶级、工场主以及大商号的代表，绝大多数都投票反对布莱特，在小资产阶级和小业主中，一致拥护他的，只有教友会信徒和爱尔兰人，即那个在联合王国到处都跟着自己的“自然主宰”走的人数众多的少数派。如何解释自由资产阶级行列中的这种分裂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富有的“曼彻斯特的大亨”迫不及待地想要像他们的利物浦对手那样成为“绅士”。如果说他们在布莱特还是他们阶级利益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时，曾经容忍像他这种有才能者的优势，那末现在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可以采取一般庸人在飞黄腾达时将自己所嫉妒的人一脚踢开的做法了。不过，他们反对的不仅是布莱特的个人优势，更多的是反对反谷物法同盟的余党的陈腐要求；这些余党有点像长期议会的余党¹⁶⁴之于英国共和政治一样，是曼彻斯特的累赘；这些余党定期地在威尔逊先生这个“体面人物”和昔日的淀粉商人主持下集会（威尔逊先生在这些会议上受到同盟的名誉书记罗宾逊先生以及其他没有社会地位的小人物的支持）。这些

人是在大风暴时期被浪涛卷到表面上来的，他们现在执拗地不肯再沉到底下去，虽然在实质上，他们除了拥有过去的破旧不堪的传统和现在的照例的谎言，每当布莱特需要时出来假装代表曼彻斯特讲话以外，再举不出任何理由赖在政治舞台上不走了。这次反叛的首领之一恩特威斯尔先生在一次选民大会上坦白地说道：

“问题不在于对华战争或对俄战争或任何战争。问题在于曼彻斯特是否今后也听命于在纽奥尔大厦集会的余党。”

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在终于埋葬那曾经像梦魇一样窒息过他们的反谷物法同盟的余党时，自以为堵塞了他们的雅各宾俱乐部的大门，当然没有想到他们从而为新的革命运动扫除了主要的障碍。

然而，曼彻斯特选举的真正意义，由一个喝醉了酒的反布莱特的选民透露出来了，他在投票时大喊大叫道：“我们不需要对内政策，我们需要对外政策！”换句话说：打倒改良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终于占了选民的多数，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反贵族的叫嚣，我们听厌了，它们毫无什么意义，它们只能激起工人的情绪。我们已经争到了自由贸易，心情非常舒畅，尤其是因为又降低了战时所得税。不管怎样，我们很爱勋爵。“我们不需要对内政策，我们需要对外政策”。让我们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即在全民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吧。让我们大家都做真正英国大臣¹⁶⁵帕麦斯顿勋爵领导下的英国人，真正的约翰牛吧。

因此，曼彻斯特选举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工厂主放弃了他们在反谷物法同盟运动中所篡夺的革命领导。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3 月 31 日
载于 1857 年 4 月 17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4990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 英人对华的新远征

如果英国人借端向中国人挑起的这场争执达到顶点，那末可以预料，其结果将是一次新的陆海军远征，与 1841—1842 年因鸦片争端而引起的远征¹⁶⁶一样。当时英国人轻而易举地从中国人那里抢走了大宗银两，这很可能引诱英国人再进行一次同样的尝试；英国人虽然非常厌恶我们的海盗本性，然而他们自己却保留了大量的为我们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共同祖先所特有的古老的海盗式掠夺精神。但是自从英国人为贩卖鸦片而进行了那头一次顺利的掠夺以来，中国的局势已有重大的变化，因此令人十分怀疑的是：在今天进行同样的远征能否得到多少相同的结果。毫无疑问，新的远征同 1841—1842 年那次一样，将从香港出发。参加那次远征的舰队有：两艘装有 74 门炮的军舰，8 艘巡航舰，许多轻巡航舰和二桅横帆舰，12 艘蒸汽舰和 40 艘运轮船；全部兵力，包括海军陆战队在内，共计 15 000 人。这次新的远征使用的兵力大概不会比这更少；的确，我们下面叙述的许多理由将说明，他们会使用比这多得多的兵力。

1841—1842 年的远征军在 1841 年 8 月 21 日由香港出发，首先占领厦门，随后在 10 月 1 日占领了舟山岛，把这个岛作为他们以后的军事行动的基地。这种行动的目的，在于侵入横贯中国中

第一次和第二次对华鸦片战争图
(1839—1842 年和 1856—1858 年)

第一次和第二次对华鸦片战争图

部的大河长江，并溯江而上，直达离江口约 200 英里的南京城。长江把中国分为截然不同的南北两部分。在南京下游约 40 英里的地方，有一条大运河流入并穿过长江，它是南北各省之间的通商要道。采取这种进攻步骤的用意，是夺取这条重要水道就会置北京于死地，并逼迫清帝立即媾和。1842 年 6 月 13 日，英军在亨利·璞鼎查爵士率领下到了吴淞江口，逼近吴淞。吴淞江由南流来，在紧靠长江注入黄海的地方流入宽阔的长江口。吴淞江口是位于它南面不远的上海的港口。吴淞口两岸筑有许多炮台，可是它们全被毫不费力地攻下了。接着一支入侵的军队向上海进发，上海未经任何抵抗就失守了。长江两岸和平怕事的居民过了将近二百年的和平生活，现在才第一次经历战争。虽然英军当时没有遇到居民的什么抵抗，可是江口本身和接近江口的海道却造成极大困难。长江口非常广阔，它的两岸在入海处半为泥滩，而由于海面在离岸许多哩内是一片黄浊色（黄海即由此得名），几乎很难辨认出来。打算驶入长江的船只不得不谨慎地沿南岸前进，不断地用水砣测量深度，以免碰上由流沙冲积而成的堵塞江道的浅滩。由江口直到巨大的崇明岛末端，到处都有这种沙洲；崇明岛位于江口中心，把江口分为两条水道。过了这个长约 30 英里的崇明岛以后，长江两岸即开始高出水面，可是水道却十分曲折。海潮可涨到约在去南京中途的镇江，实际上，对沿江上驶的船只来说，在未到镇江以前所看到的只是一种江口或海湾，到这里才开始现出河流的轮廓。英国舰队在到达这个地点以前，遇到了一些严重的障碍。从舟山停泊处开始的这段 80 英里的航程，费了它十五天功夫。在崇明岛附近，有几艘较大的船只搁浅了，不过涨潮后就驶开了。英国人克服了这些困难，逼近镇江城的时候，才充分认识到：驻防

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 1 500 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他们在应战以前好像就已料到战斗的结局，他们将自己的妻子儿女绞死或者淹死；后来从井中曾打捞出许多尸体。司令官看到大势已去，就焚烧了自己的房屋，本人也投火自尽。在这次战斗中，英军损失了 185 人，他们为了对此进行报复，在劫城的时候大肆屠杀。英军作战时自始至终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走私贪欲完全相符的。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可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对岸的瓜州城投降了，并交出了 300 万元的赎金，英国海盗自然极满意地将这笔款项放进腰包里去了。

过了镇江，航道深达 30 浔¹⁶⁷，因此，就深度来说航行已很便利，可是某些地方的水流非常湍急，每小时达六七浔以上。但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制止这些军舰开往南京。8 月 9 日，英军终于在南京城下抛锚了。结果不出英军所料。清帝 恐惧万分，只得于 8 月 29 日签订条约¹⁶⁷；而现在英国人就是借口中国人似乎破坏了这个条约而提出了以新的战争相威胁的新要求。

如果这次新的战争真正开始的话，它大概还会按前一次战争的样子来进行。可是，现在有许多原因使英国人不能指望得到同样轻易的成功。那一次战争的经验，中国人是不会白白放过的。不久以前在珠江的军事行动中，中国人在炮兵射击和防御方法上技术大有进步，以致使人怀疑在中国军队中是否有欧洲人。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就是极其实地的——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

一浔等于 1.83 米。——编者注

指道光皇帝。——编者注

方民族，因此毫无疑问，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材生。其次，如果英军这次又企图溯长江而上，他们很可能遇到人为的障碍，而这好像是他们在上次战争中所没有遇到的。再者，而这是最重要的理由，再度占领南京，未必会在北京朝廷中引起像上次那样的惶恐不安。长期以来，南京及其周围的大部分地区都落在起义者的手里，而且起义者的一个或几个领袖都以南京为自己的大本营¹⁶⁸。在这种情况下，英军占领南京，对于清帝来说将是求之不得的。将起义者赶出南京，这倒是替清帝效劳，但英军占领这个城市后，要守住它，将是一件相当困难、麻烦和危险的事情，而且近来的经验已经证明，纵使敌军盘踞南京，这对于北京或者清廷的政权也不会马上造成致命的后果。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4 月初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4 月 17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90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选举的结果

1857年4月7日于伦敦

选举程序已经结束。显著的结果就是：帕麦斯顿胜利了；议院的 *personnel* [班底] 有很大的改变，更换了大约四分之一旧议员；议院的智力水平空前地降低了。但是，英国各家报纸对内阁多数派力量纷纷加以推测，并且由于这些推测而争论不休，它们还企图按照早已失去意义的派别来划分新当选的议员，——这一切都是极其愚蠢的事情。例如，“晨邮报”为政府有八十票的多数而欢欣鼓舞，而迪斯累里的“新闻报”¹⁶⁹则计算自己的党在城市中失去了四个议席，在郡里失去了约二十个议席。伦敦“泰晤士报”认为，皮尔分子、曼彻斯特派以及公开的保护关税主义者的被逐，使议会恢复了 *status quo ante* [旧日面貌]，并使它回到了它的合法主人即古老的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手中。“泰晤士报”很乐意让世人相信，“英国人民又回到了三十年前的状况”。迪斯累里的“新闻报”也几乎准备完全赞同“泰晤士报”的这种看法。但是寡头政治企图借以自慰的这种乐观结论是荒谬的，就同“观察家”¹⁷⁰之类的假激进派报纸的乐观结论是荒谬的一样。这家报纸写道：“改革后的议会正符合帕麦斯顿勋爵的号召。”可是要知道，帕麦斯顿曾要求多来一些奴才，而开明的国民，即占居民极少数的

享有特权的选举人，对他的好意的报答，却是给他往议院里送去一帮具有全国规模的饶舌家！他们高呼“帕麦斯顿万岁！”只是为了欺骗这位狡猾的子爵！如果说新议会能发起一个大运动，那末这自然不会是它自己的功劳；大不列颠会像航海家辛伯达那样，发现把老头儿甩掉要比把他背起来困难得多。

要把新议院同以前各届议院加以比较，也许最好先从那些在选举斗争中完全消失的老的议会党派开始，即从皮尔派和曼彻斯特学派开始。

与辉格党人、托利党人、曼彻斯特学派不同，皮尔派并不代表某个阶级，也不代表某个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只是议会中的一个派系，这个派系在两院的墙外可能有朋友，但是决不能招兵买马。他们是以往的一届政府的残骸，由于自己的已故领袖与谷物法有关的背叛行为而离开了托利党；他们由于还没有忘记对辉格党人的旧恨，同时自以为——并且公众在某种程度上也这样认为，——他们集中了全国所有的经世治国之才，而不愿意融化在辉格党的行列中；他们因为有贵族联系而没有与曼彻斯特学派合而为一；他们自恃有几名辩才就能影响议会辩论。自封的国家活动家们的这个自命不凡的核心并不稳固，也没有定形，表面上是个特殊的议会政党，实际上是因皮尔的自由贸易立法而引起的一切议会政党瓦解的产物。他们全靠有这种瓦解才出现在世界上，他们又以促使得比内阁垮台并提出自己的名义领袖来主持各政党的联合，即所谓联合内阁或群贤内阁¹⁷¹而加深了这种瓦解。当议会瓦解过程显然加快的时候，他们的集团得到了举起旗帜来庇护各

“一千零一夜”，航海家辛伯达的第五次航行。——编者注
阿伯丁。——编者注

旧政党同时自杀的荣誉。皮尔分子这样为自己保证了短期间的统治地位，同时也就取消了他们作为特殊集团存在的唯一理由。联合起来的各政党把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必然后果，是它们都软弱无力，都跪倒在一个人面前。皮尔分子扶着梯子，而帕麦斯顿沿着梯子爬了上去。

早在 1852 年，皮尔分子就在竞选斗争中折损了一半兵力；1857 年的选举使他们全军复没了。菲利莫尔两兄弟、哈维勋爵、乔·克拉克爵士、斯泰福·诺思科特爵士、威·波立特勋爵、阿·戈登、萨顿、哈尔科特、拉欣顿、斯迈思、在东印度公司中有过功绩的詹·威·霍格爵士、朗德尔·帕麦尔以及卡德威尔先生，都下台了。以上列举的最后一位绅士曾接到当了首相的帕麦斯顿请他出任财政大臣的建议，但是他根据格莱斯顿、格莱安这帮人的劝告，谢绝了这个建议。尽管如此，卡德威尔在如今已经埋葬了的下院临终前的一次会议上，因为想超越格莱斯顿，还是与自己的朋友们分道扬镳，在预算问题上投票支持帕麦斯顿。最后，在就广州问题进行辩论时，他唯恐事态会发生变化，又改变战线，回到皮尔分子这一边，赞成科布顿的关于对内阁投不信任票的提案。因此，这位绅士是皮尔分子所特有的将道貌岸然与无耻追求名利有趣地结合在一起的真正典型。皮尔分子全军复灭以后，只剩下了三位将军——格莱斯顿先生、詹姆斯·格莱安爵士、赫伯特先生，这三个人不能形成三位一体，因为他们在出身和志趣方面都是完全相反的：詹姆斯·格莱安爵士是作为激进派发迹的，格莱斯顿先生是作为极端的托利党人起家的，而赫伯特先生则什么也不是。

赫伯特先生在南威尔特郡的选民会上所做的揭露，清楚地描绘了帕麦斯顿用以对付皮尔分子的方法。最使皮尔分子威信扫地

的就是他们在对俄战争时的行为，特别是他们放过了敖德萨¹⁷²；人们说所以出现这后一种情况，是因为赫伯特先生是沃龙佐夫公爵的外甥。像“晨邮报”、“太阳报”和“晨报”¹⁷³这类帕麦斯顿的娄罗，曾特别卖力来散布这些恶毒的诽谤。可是赫伯特先生告诉选民说，他倒是签署了炮击敖德萨的命令，但是在他辞职以后，帕麦斯顿勋爵亲自发布了放过该城市的反命令。这一揭露丝毫不亚于约翰·罗素勋爵在伦敦西蒂区选民会上所做的揭露。大家知道，罗素是由于他那维也纳的外交使命而垮台的¹⁷⁴。当选举吵吵闹闹的时候，啤酒气味很浓的“晨报”（这是领有营业执照的酒馆老板们自己的报纸，即帕麦斯顿为一般人办的机关报——而他办的报纸种类繁多，适合各种趣味，上起高级沙龙，下至小酒馆），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大叫罗素在维也纳严重变节。被该报这种无耻行为激怒了的罗素，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世人说，克拉伦登勋爵不准他公布帕麦斯顿本人亲笔签署的训令，他（罗素）曾经为之丧失威信的维也纳政策就是由这个训令规定的。有一位希腊哲学家说过，他的同胞们、诗人们给希腊诸神编造了一些任何人都不敢用来描述自己最凶恶的敌人的可怕故事。现代的法国和英国则把无须乎由什么诗人来诽谤的波拿巴和帕麦斯顿之流捧为自己的天神。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皮尔派的那些在全军复没后幸存的少数将军，将不是作为组织的代表，而只是作为个人再度出现在议会中了。作为个人，格莱斯顿先生现在摆脱了集团的妨碍，义愤填膺，无疑是新议院中最大的演说家，他也许将在议院中起到比以前任何时候更为杰出的作用。格莱斯顿和迪斯累里在进行长久的议会决斗时，也像有时在激烈的搏斗中那样，时而抛出自己的武器以便抓住敌人的武器。在某种程度上，格莱斯顿已经掌握了迪

斯累里的挖苦手法 ,而迪斯累里也学会了格莱斯顿的甜言蜜语 ,然而这种交换对双方未必有多大好处。

在和皮尔分子分手的时候 ,我们还要指出历史的这一恶作剧 :它把这个派别的诞生安排在旧的议会政党在反谷物法同盟影响下崩溃的时候 ,现在又让这个派别随着曼彻斯特学派从议会中的消逝而同时死亡。

卡 · 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4 月 7 日
载于 1857 年 4 月 22 日 “纽约每日
论坛报” 第 499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 “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工厂工人状况

1857年4月7日于伦敦

最近发表的截至 1856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期间的工厂视察员报告¹⁷⁵，是供剖视联合王国社会组织的珍贵材料。这些报告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帮助说明工厂主在目前这次大选中所采取的反动立场。

在 1856 年会议期间，以不正当手段在议会中通过了一项工厂法，“激进的”工厂主利用它首先修改了现行法律中关于在机械传动和机器上装置防护设备的规定，其次是在雇主和工人的纠纷中采取了仲裁原则。一项法律的目的似乎是要更好地保护工厂工人的生命和安全；另一项法律的目的却是使这种保护从属于廉价的正义法院¹⁷⁶。其实，后一项法律是要把工厂工人置于法律之外，而前一项法律是要使工人丧失安全。兹摘引视察员报告中的下述一段话：

“按照新的工厂法，由于日常工作接近机械传动因而对工作中容易发生的危险非常熟悉并知道必须谨慎从事的人，能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那些为了执行特殊委托而被迫中断日常工作并使自己遭受他们无法觉察的或者由于无知而无法预防的危险的人，也就是说，正是那些看来需要法律予以特殊保护的人，却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仲裁条款则规定：必须挑选那些对于造成身体残废的“机器的结构非常熟悉”的人担任仲裁人。一句话，仲裁大权完全由工程师和设计师独揽。

视察员写道：“我们觉得，工程师和设计师应该没有资格担任工厂仲裁人，因为他们与工厂主有业务上的联系，工厂主就是他们的主顾。”

在这样的条件下，机器造成的不幸事故，例如死亡、手臂腿足的切除、四肢骨折、头骨和颜骨的挫伤、削破碰伤等等，在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当中，竟达到1919起的惊人数目，就丝毫不足为奇了。在半年的实业通报中，登载了20件因机器造成的死亡事故，这几乎比英国海军在“光荣的”广州大屠杀中所损失的人数还要多九倍¹⁷⁷。既然工厂主根本不想保护工人的生命与安全，而只是想方设法逃避赔偿工人在工作中所损失的胳膊和腿足，不愿担负他们的活机器的损耗费，那末对于官方报告中所说的“违反工厂法的延长工作时间现象日有增长”，就不必惊奇了。按照工厂法的定义，延长工作时间就是迫使未成年者每天工作的时数超过法律所允许的时数。这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或者在早晨6点钟以前开工，或者在下午6点钟还不收工，或者缩短工人法定的用餐时间。在一天之中，蒸汽机开动3次，即在早晨开工时，以及在早饭和午饭后复工时；它也停止3次，即在每顿饭开始时和下午收工时。这样，就有6次可以偷去5分钟的机会，一天总共可以偷去半个小时。每天延长5分钟的工作，一周一周积累起来，一年就是两天半，但是延长工作时间的骗人伎俩远远地超过了这个范围。兹摘录郎卡郡工厂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先生的一段话：

“用这种非法的延长工作时间的办法所获得的利润，似乎是工厂主不能抗拒的巨大诱惑。他们指望不被发现，可是当他们看到被发现的人所缴纳的

罚款和讼费的数目并不大，他们就认为，即使被查出来，他们还是能得到很多好处。”

除了工厂法规定的罚金数额微不足道以外，工厂主还千方百计地使得工厂法的措辞极其便于回避其中的各项规定，正像视察员们所一致声明的那样，“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使他们不能真正结束这种非法的延长工作时间的现象”。他们还一致谴责大业主故意进行欺骗，采取卑鄙诡计来避免揭露，施展下流的阴谋来对付负责保护工厂奴隶的视察员和副视察员。在指责工厂主延长工作时间时，视察员、副视察员或者他们的警察就必须准备以发誓来证明工人是被迫在法律所不允许的时间内进行了工作。现在假设视察员在下午6点钟以后来到工厂里。工厂的机器立刻停了下来，虽然工人只是为了照管机器才可能留在那里，但是由于工厂法的措辞，这种指责还是不能成立。然后工人被迅速地送出工厂，往往是通过好几个门，使他们很快就不见了。有时副视察员一跨进门，煤气灯就熄灭了，于是他们突然在黑暗里置身于复杂的机器中间。在那些因实行非法延长工作时间而恶名狼籍的地方，还有一套向工厂报告视察员行踪的专门信号系统，为此雇用了火车站上的职工和旅店里的侍者。

这群靠吸吮本国年轻一代工人的膏血而自肥的吸血鬼，难道不正是与英国鸦片走私商相配的同行和“真正英国大臣们”的天然支柱吗？

工厂视察员的报告无庸争辩地证明了：英国工厂制度中的卑劣现象正随着这个制度的增长而增长；为了抑制工厂主的残酷贪欲而制定的法律不过是骗人的东西，因为这些法律的措辞就使它

们本身的规定完全归于无效,并且使负责执行它们的人无能为力;工厂主与工人之间的对立在迅速接近那种爆发真正社会战争的限度;被这种制度吸收的13岁以下的童工数目在一些部门里正在增加,而女工数目则在一切部门里均有增长;虽然现在工人数目对马力数量的比例还和过去几个时期一样,但是工人数目对机器数量的比例却减少了;由于更经济地使用动力,一台蒸汽机能够比十年以前带动更多的机器;现在由于增快机器的转速以及采取其他的方法,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工厂主在迅速地填满自己的腰包。

报告中所列举的这些有趣的统计材料,非常值得予以进一步研究。但是从上述情况就已经能够立刻看出,郎卡郡的工业奴隶主需要有一个能够分散对国内问题注意力的对外政策。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4月7日
载于1857年4月22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4994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英国工厂制度

1857年4月10日于伦敦

联合王国工厂视察员 1856 年的报告中包含着许多详细的工厂统计资料，例如工厂的数目、使用马力的总数、机器的数量和从事生产的人数。这样的报告在 1835 年、1838 年和 1850 年也曾按照下院的指示编制过，并且其中的材料都是取自工厂主所填的表格。因此，现在有丰富的资料来对工厂制度发展中的各个时期进行比较；按照法律，工厂制度中只包括那些使用蒸汽和水力的纺织企业。

这种制度的迅速扩大，无疑是联合王国最近六年以来社会史上的最大特点。

下列数字表明在最近三个报告的编制年份内的工厂数目：

	1838 年	1850 年	1856 年
棉纺织厂	1 819	1932	2210
毛纺织厂	1 322	1497	1505
精梳毛纺织厂	416	501	525
亚麻纺织厂	392	393	417
丝织厂	268	277	460
共 计	4217	4600	5117

可见，工厂数目的平均增长额，在 1838 年至 1850 年间是每年 32 个，而在 1850 年至 1856 年间几乎扩大了三倍，达到每年 86 个。下表是对每个时期中工厂数目总增长额的分析：

1838—1850 年的总增长额 百分比	1850—1856 年的总增长额 百分比
棉纺织厂 6	棉纺织厂 14.2
毛纺织厂 13	毛纺织厂 0.5
精梳毛纺织厂 20	精梳毛纺织厂 4.7
	亚麻纺织厂 6.1
	丝织厂 66.0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在前一个时期中，这种增长只限于棉纺织厂、毛纺织厂和精梳毛纺织厂，而在后一个时期中，它包括了亚麻纺织厂和丝织厂。在这两个时期中，各部门在总增长额中所占的比重也是不同的。在 1838—1850 年间，主要是精梳毛纺织业和毛纺织业有所增长，而在 1850—1856 年间，毛纺织业几乎毫无变化，精梳毛纺织业的增长速度则减少了四分之三。另一方面，在后一个时期中，棉纺织厂和丝织厂发展最快，丝织厂在增长总额的百分比方面占第一位，棉纺织厂在绝对增长数方面占第一位。

工业发生这种增长的地区随时都有变化，好像在把工业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转移。在工业一般增长的同时，在个别地区发生衰落现象，在许多州郡和城镇里原有的工厂甚至完全消失。决定这些变化（包括衰落和增长）的一般规律，就是那个遍及现代工业所有一切部门的规律，即集中的规律。例如，郎卡郡同它毗邻的约克郡的部分地区形成棉纺织业的主要中心，就把王国其他地区的这种企业吸引到它那里去。郎卡郡和约克郡的棉纺织厂在 1838 年至 1856 年期间增长了 411 个，而在拉纳克（格拉斯哥）、伦弗鲁（佩

斯里)和安特林三郡,这种企业的数目却减少了52个。毛纺织业则集中在约克郡,这里增加了200个毛纺织厂,而在康瓦尔、戴文、格罗斯特、蒙默思、索美塞特、威尔特、威尔士和克拉克曼楠,却相应地减少了82个厂。精梳毛纺织业几乎完全集中在约克郡,那里增添了107个新工厂。亚麻纺织业目前在爱尔兰的发展大大超过联合王国的任何其他地区;但是在安特林、阿马、达翁、提朗增加59个亚麻纺织厂的同时,在约克郡却减少了31个厂,在戴文郡、多尔塞特郡、格罗斯特郡减少了9个厂,在法夫郡减少了18个厂。在柴郡、得比郡、诺定昂郡和格罗斯特郡增加了76个丝织厂,在索美塞特郡相应地减少了13个厂。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工业部门的衰落以另一个工业部门的增长来补偿,所以工业的转移可能看起来只是大规模分工原则的更明确的表现。但是,总的说来情况并不是这样:工厂制度发展的结果倒是在使工业郡和农业郡之间建立分工。例如,英国南方的威尔特、多尔塞特、索美塞特、格罗斯特等郡在迅速地失去自己的工业,而北方的郎卡郡、约克郡、瓦瑞克郡、诺定昂郡却在加强工业垄断。联合王国在1838年至1856年这段时期工厂增长的总数为900个,其中郎卡郡一地就占360个,约克郡占344个,瓦瑞克郡占71个,诺定昂郡占46个,并且最后两个郡之所以增加工厂,是由于在两种专门的生产中采用了改良的机器,即在诺定昂的织袜机和考文垂的织带机上应用了机械动力。

必须把工厂数目的增长同发动机马力总数的增长区别开来,因为后者不仅取决于新工厂的增加,而且还取决于在旧工厂中装备更强大的发动机、以蒸汽代替水力、在水车上安装蒸汽动力以及其他类似的改进办法。以下是1838年、1850年和1856年各工厂额定功率的对照表:

联合王国工厂中使用的发动机的总功率
(单位：马力)

	1838 年		共 计
	蒸汽发动机	水力发动机	
棉纺织厂	46 826	12 977	59 803
毛纺织厂	11 525	9 092	20 617
精梳毛纺织厂 ...	5 863	1 313	7 176
亚麻纺织厂	7 412	3 677	11 089
丝织厂	2 457	927	3384
共 计 ...	75 083	27 986	102 069
	1850 年		共 计
	蒸汽发动机	水力发动机	
棉纺织厂	71 005	11 550	82 555
毛纺织厂	13 455	8 689	22 144
精梳毛纺织厂 ...	9 890	1 625	11 515
亚麻纺织厂	10 905	3 387	14 292
丝织厂	2858	853	3711
共 计 ...	108 113	26 104	134 217
	1856 年		共 计
	蒸汽发动机	水力发动机	
棉纺织厂	88 001	9 131	97 132
毛纺织厂	17 490	8 411	25 901
精梳毛纺织厂 ...	13 473	1 431	14 904
亚麻纺织厂	14 387	3 935	18 322
丝织厂	4 360	816	5 176
共 计 ...	137 711	23 724	161 435

虽然这些数字中所反映的动力的增长——1838年至1856年增加59366马力——无疑是很大的，但是它还是大大低于工业上

可以采用和实际上正在采用的补充动力的实际数量。报告中的一切数字都只是指蒸汽发动机和水车的额定功率，而不是指实际上已经利用或者可能利用的功率。100 马力的现代蒸汽机，由于改进装备、改善结构和加大汽锅容量等等，能够比过去发挥大得多的威力；所以，它的额定功率顶多只能看做是据以计算它的实际可能性的指数而已。土木工程师奈斯密斯先生在解释对蒸汽机的最新改进（由于这种改进，同样一部蒸汽机能够以最少的燃料消耗来做更多的功）的性质以后，这样总结说：

“现在我们从蒸汽机的单位重量平均至少可以多得 50% 的功，而在许多场合，在每分钟速度不超过 220 呎时只供给 50 马力的蒸汽机，现在可以供给 100 马力以上。”¹⁷⁸

根据对发动机马力的增长和工厂数目的增长比较，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毛纺织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情况。虽然 1856 年毛纺织厂的数目只比 1850 年增加了 8 个，但是其中所使用的发动机的功率在同一个时期内却增长了 3757 马力。显然，在棉纺织厂、精梳毛纺织厂、亚麻纺织厂方面也有这种集中的倾向。联合王国的纱锭总数，在 1850 年和 1856 年分别为 25638716 个和 33503580 个。每一种工厂的纱锭平均数如下：

	1850 年	1856 年
棉纺织厂	14 000	17 000
精梳毛纺织厂	2 200	3 400
亚麻纺织厂	2 700	3 700

诚然，织布厂方面的倾向，与其说是生产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不如说是分散于许多工厂主之间。织机的总数在 1856 年为 369 205 台，而 1850 年是 301 445 台，但是每个工厂使用的平均台数，

在 1856 年却少于 1850 年。然而这种似乎离开英国工厂制度一般发展倾向的情况，很容易用下述事实来解释，即在织布这一部门中不久以前才有了工厂制度，还没有把手摇织布机制度完全排挤掉。在 1836 年，几乎只有在棉布织机或者在生产混纺棉线织物方面才采用蒸汽动力；但是几年以后，生产各种织物——毛纺织物、精梳毛织物、麻织物、丝织物——的机动纺织机的数量有了急剧的增长，这种增长至今仍在继续。下表说明 1836 年以来机动织机的增长情况：

	1836 年	1850 年	1856 年
棉纺织厂	108751	249627	298847
毛纺织厂	2150	9439	14453
精梳毛纺织厂	2969	32617	38956
丝织厂	1714	6092	9260
亚麻纺织厂	209	3670	7689
共 计	115793	301445	369205

棉布织机数量的增长是由于扩大了生产，而不是由于采用了机械动力来生产以前只用手工织的布匹；但是在其他那些一直很少采用机械动力的工厂里，现在采用机械动力来开动生产地毯、带子和亚麻布的机器。利用机械动力梳理羊毛（随着梳毛机、特别是李斯特尔氏机器的推行，已广泛采用机械动力梳理羊毛），使得在这方面也有大批的人失业。

纺织厂生产能力的增长程度，可以从对出口数字的比较研究中很清楚地看出来。在 1850 年有 1932 个棉纺织厂，在截至 1850 年 1 月 5 日为止的三年内，出口的棉布和棉纱的平均价值大约为 2460 万英镑。如果 1856 年的 2210 个棉纺织厂都只按照 1850 年

各厂的生产数量来生产棉布和棉纱，那末出口的价值就应当是 2800 万英镑。可是，在截至 1855 年 12 月 31 日为止的三年内，这项出口的平均价值大约是 3100 万英镑。在毛纺织厂和精梳毛纺织厂方面的情况也是这样。因此，我们看到，虽然每一马力所运转的织机数量大大增加了，每一马力所占用的工人数目却固定未变，即平均 4 个人。这可由下表看出：

	从业工人总数		
	1838 年	1850 年	1856 年
棉纺织厂	259104	330924	379213
毛纺织厂	54808	74443	79091
精梳毛纺织厂	31628	79737	87794
亚麻纺织厂	43557	68434	80262
丝织厂	34303	42544	56137
共 计	423400	596082	682497

工人总数为 682497 人，这看来的确是不多的，因为单是使用手摇织布机的织工及其家属在 1838 年就已达到大约 80 万人了。下表说明各种工人的百分比：

	13 岁以下的 童 工	13- 18 岁 的男性未 成年者	13 岁以 上的女性未 成年者	18 岁以 上的 男 工
1838 年.....	5.9	16.1	55.2	22.8
1850 年.....	6.1	11.5	55.9	26.5
1856 年.....	6.6	10.6	57.0	25.8

在 1838 年至 1850 年期间，童工数目有所增长，但是并不是与工人的总增长数按比例地增长。自 1850 年至 1856 年期间，童

工数目增长很大，共计有 10761 名，其中有 9655 名在棉纺织业部门。必须再提一下，1844 年的“人道的”法律允许工厂雇用 8 岁的儿童，而以前法律是禁止雇用 9 岁以下的儿童的¹⁷⁹。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4 月 10 日
载于 1857 年 4 月 28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4999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俄国军队的改革¹⁸⁰

当上次战争在欧洲爆发的时候，很多军人谈起俄国军队的完善组织，总带一点敬畏的心情。在法国和英国，旅、师、军是由一些彼此之间从来没有任何联系的人组成的，指挥官所指挥的是他们以前从没有见到过的部队和兵团，司令部则由来自全国各个角落的军官组成，——在俄国，整个庞大的军事机器的各个部件，在战争爆发前很久就已达到完善的地步。每一个团在总的组织中有自己固定的地位；从连到军，每一个军事单位都有自己固定的指挥官，每一个比较大的单位都有自己固定的司令部。曾有人说，这架机器实际上已做好充分的工作准备；它只等一声令下，一放蒸汽，就能极其灵活地运转起来；每一个齿轮、每一个轮子、每一颗螺丝钉、每一个滑车、每一条引带、每一个活门和每一个杠杆，都各就其位，各司其职。这就是据说我们应当看到的情况，可惜我们所看到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各军几乎从来没有满额，因为常有整个的师，更经常的是整个的旅被调往远方战区，因此各军就要由其他部队和兵团来补充。力图使每一个军、每一个师、每一个旅的各组成部分尽可能地一起行动的做法，原来同那些确定作战方法的严格规则一样，使军队在行军中的运动受到束缚；最后，分支繁多的指挥机构，所有这些指挥军、师、旅及其相应的

司令部的将军，这些为自己的下属所熟悉、彼此十分了解、悠然安于自己的职位并在执行任务时能应付自如的将军，——所有这一切原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勾结，串通起来侵吞公款，克扣士兵口粮、制服，盗用安排士兵生活的款项。

如果这些事实还需要官方的证实，那末俄国政府刚好做到了这一点。军队的新编制首先和主要的是为了消除普遍侵吞公款的根源——下级司令部和指挥机构。军司令部和旅司令部都被撤销。甚至“旅”这个名词也从俄国军队中消失了。现在，6个步兵军都从属于一个人，从属于前克里木军队的司令官，公爵米·德·哥尔查科夫第一。诚然，每一个军都有一个军长，但是由于他没有自己的司令部，也就是说，实际上不可能过细地履行自己的职能，他至多也只不过是本军的检查者，是他所辖属的5个师的师长的监督者。实际上，组成所谓“王牌军”的30个师（18个步兵师、6个骑兵师、6个炮兵师）的师长，直接服从总司令；而在每一个师中，4个步兵团或骑兵团的团长和连长又直接服从师长。被这一新编制完全取消了职位的旅长则被派到师长的司令部，担任副师长和师长助手。所有这些做法的动机是十分明显的。

俄皇可以信赖哥尔查科夫公爵，而哥尔查科夫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信赖自己司令部的军官。在旧编制所具有的那种官僚制度的繁杂性和等级次第的情况下，总司令的直接影响不超出军长以外。这些军长及其司令部应当把命令下达到师，师的司令部又把命令下达到旅，而旅的司令部又把命令下达到团长，由团长在实际上把命令付诸实行。这无非是一种组织得很妙的从事营私舞弊、侵吞公款和盗窃的制度；军队组织得愈完善，侵吞公款的活动就愈有组织，愈能得逞。这一点当第一、第二、第三军在战争时期

由波兰开往南方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了；俄国政府只在名义上保留军长的职位并且完全取消旅长的职位，正是由于它想根除这种弊端。现在，在总司令和连长之间，只相隔两级，即师长和团长，只有一个司令部——师司令部，它仍有可能被利用来侵吞公款。如果政府能够根绝师司令部的盗窃之风，那末它也完全可以指望逐渐地把这种风气从团中驱除出去。

这样，军队的整个编制，由于从链条中取消了两个环节而被打乱了，而这两个环节在战争时期无疑是必要的。俄国政府自己也承认，无论是军长或旅长，都不能完全从军队等级中勾销掉。在军队等级中仍保有军长，但只是虚有其名，而旅长则被完全免除指挥职务并被变成只不过是师长的附庸。这只是表明，这些将军在和平时期没有指挥的职务，但是他们是准备着在发生战争时派用场的。事实上，在唯一尚有敌军当前的军队，即高加索军队中，还保持着旅。因此，取消其余军队中的旅，只不过是使旅长及其司令部在和平时期不能为害，难道还需要证明吗？

另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解散庞大的龙骑兵军，这个军由 10 个团组成，每个团有 8 个连，它既受过步兵训练，又受过骑兵训练。本来，这个军应该在一切大战役中起出色的作用。在战斗的决定性关头，它应该以骑兵特有的速度猛攻敌人翼侧或后方的任何一个重要据点，然后下马，分成 16 个步兵营，在自己的重骑炮兵的支援下，坚守这一据点。可是，在上次战争期间，这个军丝毫没有发挥作用，现在看来大家都承认，这种混合部队是完全不适合于积极的战斗行动的。结果，这些步骑两用兵被变成普通的骑兵，分为 12 个各有 8 个连的团，分别编入“王牌军”的 6 个军中。这样，俄皇尼古拉想借以保持自己在当代最伟大的军事组织

家中的地位的两大创造，在他死后几年就烟消云散了。

在其他的变革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每一个军中加建一个营以及在高加索军队中建立两个新的步兵团。第一个革新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严重缺乏轻骑兵的情况。第二个革新表明，俄国已决定尽快地结束高加索的战斗。由于同样的原因，高加索各个军的预备旅还没有解散。因此，很可能目前在那里已经展开了重大的军事行动。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4 月 16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5 月 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006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英国的金融舞弊

1857年5月1日于伦敦

破产法庭对英国皇家银行内幕的调查已经接近尾声；自从铁路大王哈德逊破产以来，似乎还没有这样充分揭露过掩藏在体面社会的镀金表面下的冒险投机、假仁假义、营私舞弊和卑鄙下流。最近受到舆论谴责的人们当中，有一个是丘克斯贝里的前届议员汉弗利·布朗先生，按照多德写的1855年“议员手册”的介绍，此人是一个“商人”，“铁路公司的积极创办人”、“铁路统计和铁路运输方面的著名权威”，“彻底的自由贸易论者”，“并且还是自由主义者”。英国皇家银行这个外强中干的企业倒闭以后，大家立刻得悉，这个权威人士利用他的银行董事的地位盗窃了大约7万英镑，但是这件事实的揭露丝毫没有影响他执行通常的国家职责。汉弗利·布朗泰然自若地继续出现在下院中，出现在无俸法官¹⁸¹的席位上。他甚至还以下面这样一件事向公众表示他极其理解自己对社会所负的责任：他以郡的调解法官的资格，依法严办了一个偷了少量马铃薯的穷车夫，并且向犯人作了令人作呕的说教，说什么最糟糕的就是辜负信任。丘克斯贝里的一家报纸认为自己有权利借这个适当的机会，批评一下英国制度的那种使大贼成为小贼的审判官的特点。于是布朗先生扬言不仅要控告那个不幸的新

闻记者,而且还要跟丘克斯贝里这个善良的城市永远断绝往来,除非该城居民以某种方式郑重地悔过,来为他们那种凌辱无辜者的罪恶行为赎罪。在这以后,举行了向“无耻阴谋的受害者”呈献祝词的隆重仪式,按当时报纸的报道来看,这篇祝词缺乏艺术修饰,读起来像铁一样沉重累赘。布朗先生把祝词放入口袋以后,就从他家的阳台上向人群发表演说,他说,要不是由于公职誓词使他不能泄露英国银行的秘密,他的清白无辜对于每一个人都会如同白昼一样清楚,他在结束他的高谈阔论时,又说什么别人有负于他的事情比他自己有负于别人的要多。在最近举行的普选中,他又当了他那个安静的小城的议员候选人,但是他一向坚决拥护的内阁,竟忘恩负义地没有支持他。

4月29日,这位徒骛虚名的绅士终于摆脱了那一直封住他的口、使他默默忍受下流诽谤的誓词的约束;听他忏悔的牧师就是破产法庭的官员。按照惯例,要成为任何一个股份公司的董事,必须拥有该公司的一定数量的股票。布朗先生把常规翻转来,先当了董事,然后才当股东;并且他在取得股票时,并未劳神给股票付款。他弄到这些股票的方法极为简单:后来潜逃了的英国银行经理凯麦隆先生把共值1000英镑的20张股票交给布朗先生,他(布朗)则给凯麦隆先生一张同样数目的期票,而设法不支付一个先令。布朗在1853年2月当了董事,在3月就在银行里开了账户。他往银行存入很少一笔钱,即18英镑14先令,并且在当天就用期票作抵押向银行借去了2000英镑,使人立刻可以看出他在管理股份公司方面并不是一个新手。的确,布朗先生在与英国皇家银行建立业务联系以前和以后,曾经领导过澳大利亚食糖进口和提炼特许公司,防水砖瓦和普通砖瓦专利公司,华德自来水公司,地

产公司，船坞公司，——总之，一系列五花八门的公司。当债权人的律师林克雷特先生问他，所有这些公司后来的结局怎么样的时候，布朗相当确切地回答道：“也许应该认为它们已经呜呼哀哉了。”他在英国银行开的账户以 18 英镑 14 先令的贷方开始，最后以 77000 英镑的借方告终。所有这些债款都是根据凯麦隆先生的指示付给他的，并且“从未征得其他董事”的同意。

布朗先生说：“该公司的经理是经手一切业务的人。这家银行的做法就是如此，而且”——他以教训的口吻补充道，——“这种做法是十分健全的。”

大概，这家银行的真实情况是：它的全部上层领导人——经理、董事、主任、法律顾问和会计师——都按照事先规定的计划，相互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每个人都假装不知道自己的伙伴弄到了多少钱。而布朗先生本人甚至准备暗示：他作为银行董事，几乎丝毫也不知道他作为银行主顾所做的事情。至于那些不属于行政人员的主顾，则布朗先生在受审时似乎还对其中有些人竟敢侵夺董事的特权而感到痛心。例如，他这样说到某位奥利弗先生：

“我可以肯定地说，奥利弗从银行骗取了两万英镑。我用的字眼很尖锐，但是我并不怀疑，这样说是正确的：奥利弗是一个骗子。”

当林克拉特先生问他“而你是个什么人？”的时候，他若无其事地回答道：“很倒霉，是一个蒙在鼓里的董事。”他对一切问题的回答都是那样丝毫不动声色。例如，他的存款数目与他在银行贴现自己期票的数目之间存在的那种令人发笑的悬殊，引起了他和林克雷特先生之间这样一段有趣的对话：

林克雷特先生：“难道银行业务没有这样一个通常的规定：如果在活期存款账户上没有一笔相当于贴现账户上期票总数四分之一的存款，任何人都不得开贴现账户？”

布朗先生：“这种规定是有的，我听说这是苏格兰的制度。”

林克雷特先生：“你没有采用这个制度吗？”

布朗先生：“没有采用，因为这是个不健全的制度。”

每当布朗先生发善心要给银行提供保证时，这总是一些他已在同一个时候审慎地抵押给别人的期票或提货单，因为他利用法庭官员居然胆敢称作极度“狡诈”的方法，随心所欲地支配他的抵押品。1856年3月1日，布朗先生事实上已经停止了他在银行的账户，换句话说，董事会已经决定不让他再扩大他的债务了。然而他在6月7日居然又从银行方面得到了1020英镑。林克雷特先生问道：“他是用什么狡诈干出这件事的？”布朗若无其事地回答道：“这并不困难。”

下面是他写给他的挚友凯麦隆先生的一封信，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这次因揭露英国皇家银行内幕而在报刊上引起的怒潮所持的一般态度：

1855年10月5日于韦斯明斯特小斯密斯街

“凯麦隆先生阁下：不知尊驾现在何处，兹托令亲转致此函。令人伤心的消息传播甚快，阁下谅已得悉大小各家报纸如何辱骂我们，而你我二人受到的攻击最多。我有理由相信，‘泰晤士报’上的刻薄文章都是我们的某位同事通过会计师挑唆起来的。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我全然不知，我所知道的只是公开报道的内容，我读了这些东西之后，几乎以为，过去谁也不曾欠过银行的债，以前的一切报道全是错的。‘泰晤士报’是为了侮辱我们才积存了全部愤怒……自从银行糊里糊涂地停止支付以后，我尚未见到其他董事。

您的忠实的

汉弗利·布朗”

好像“过去谁也不曾欠过银行的债”似的！显然，布朗先生认为，人们对他和他的同伙充满义愤，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全都

是盗贼！”提蒙这样说，布朗先生也这样说，也许他在灵魂深处还确信所谓体面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说哩！重要的只是不要做小偷。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5 月 1 日
载于 1857 年 5 月 16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015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CRÉDIT MOBILIER¹⁸²

(一)

在现今的法兰西帝国里，大军的战报已经为 Crédit Mobilier²⁸的报告书所代替了。4月28日，伊萨克·贝列拉先生在最近一次股东大会上，代表董事会作了一个决算报告，来概述这个出色的波拿巴机关 1856 年的活动。起草人在文件中以他惯用的手法，把财务上的计算同理论原理、把数字同感情、把证券投机同思辨哲学混在一起；只要仔细研究这份很讲究辞藻的文件，就会发现毋庸置疑的衰落征兆。这种辩护士的粉饰，与其说是掩盖了这些征兆，倒不如说是暴露了它们。

Crédit Mobilier 的利润确实还是很迷人。股票价格最初规定为 500 法郎，1856 年每股付利息 25 法郎，股息 90 法郎，合计 115 法郎，恰好为该公司资本的 23%。但是，要做出正确的结论，就不应当拿 Crédit Mobilier 同一般商业企业比较，而应当同它本身比较，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不过一年，它的收入就大约减少了一半。对于这家公司每年的纯收入，应当区别以下两种因素：一

拿破仑第一的军队。——编者注

种是固定的，另一种是变动的，一种是章程规定的，另一种是取决于该公司业务开展情况的，一种列入利息项，另一种列入股息项。所以，每股 25 法郎，即 5% 的利息收入是该公司报告中固定不变的项目，而公布的股息才是该公司有无进展的真正标准。所以，我们从报告书中看到，1855 年为 178 法郎 70 生丁的股息，1856 年减少到 90 法郎，这种变动绝不能说是上升。如果考虑到小股东们是平均按每股 1500 法郎的价格购进股票，那他们在 1856 年所得的实际股息，恐怕还不超过 7%。

伊萨克·贝列拉先生认为，“试图去指出 1855 年和 1856 年两年的股息不一样的原因，是无此必要的”。但他还是约略地说了一下 1855 年的利润有其“特殊的性质”。这一论断是不无根据的；但是，这就显而易见，只有保持住自己利润的特殊性质，Crédit Mobilier 才能企求一般地具有某种性质。这个公司的利润的特殊性质是由于它的资本同它的业务相差悬殊而产生的。这种悬殊——绝不是暂时性的——实质上是该公司生存的有机规律。Crédit Mobilier 既不是要求成为银行公司，也不是要求成为工业公司，它倒是要求成为别的银行公司和工业公司的（如果可能，成为全国范围的）代表。创办这个公司的意思的奇特之点，就是要它起代表机关的作用。所以 Crédit Mobilier 的业务表明，这些业务并不决定于该公司本身的资本和通常由资本派生的信用，而完全决定于 Crédit Mobilier 实际代表的或者企图代表的资本额。要是该公司的资本同该公司的业务之间的悬殊状况消失了，因而该公司的“特殊”利润也消失了，那末 Crédit Mobilier 就不是单单下降为一家普通银行，它会极可怜地破产。由于 Crédit Mobilier 向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去完成由于自己这个组织的性质本身而被卷进去的

那些巨大业务，因此，它就必须依靠那些规模越来越大的新计划能顺利完成。由于这个机关具有这种性质，业务上的任何停滞，而尤其是任何倒退，都是将来倒闭的恶兆。就拿 1856 年的报告书来说。一方面，我们看到 6000 万法郎的微不足道的资本，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数达 60 多亿法郎之巨的业务。贝列拉先生自己略举这些业务如下：

“本公司对最近一次债券的认购数不仅丝毫未动，而且由于有了便利认购者的分期缴款办法，本公司的认购数增加到 4000 万法郎。

本公司的库存现金	3085195176 法郎	39 生丁
本公司同银行的往来账	1216686271 法郎	33 生丁
本公司的其他往来账	2739111029 法郎	98 生丁
本公司收到 1455264 张股票和本票 的分期缴款数	160975590 法郎	98 生丁
本公司用本公司的款项支付的或由由 本公司起银行家作用的那些公司的 款项支付的 3754921 张息票	64259723 法郎	68 生丁
本公司的有价证券总存量为 4986304 张股票或本票。”		

贝列拉先生并不否认，Crédit Mobilier 在 1856 年所起的作用和它从前所起的作用有些不同。该公司在创办以后的头三年中，应当“在法国创立重要企业”，“为大企业的创立提供一套制度”，并因而不断地以新的有价证券来充斥证券交易所。但是，1856 年发生了突然的变化。“由于和约的缔结开始了社会活动的新时代”，因而投机活动有大肆泛滥之势。在这种变化了的情况下，Crédit Mobilier 的有良心的绅士们，那些抱有促进国家繁荣的非凡志向的贝列拉之流、富尔德之流、莫尔尼之流，突然感到，他们的“不可推卸的职责”是在他们过去鞭策的地方勒住，在他们曾经推动过

的地方加以抑制，在过去缺乏“明智的慎重”而表现出“勇敢大胆”的地方，“小心谨慎”。因为整个法国都动起来了，Crédit Mobilier 了宽慰自己的良心，决定反而要抑制自己的热情。但是，如果说这一善心的决定的作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 1856 年 3 月 9 日“通报”上的一篇评论“指出政府想限制新的有价值证券发行而规定了一些范围”，这也是正确的。贝列拉先生说，甚至“即使”Crédit Mobilier 有截然不同的打算，那“这篇评论也会是一项命令，尤其是对我们来说；这是被迫的停住，由于这一停住，新企业的建立就将停止”。看来，这一被迫的停住就是该公司答应抑制自己的充分根据。

正当 Crédit Mobilier 的迅速奔驰被政府的笼头这样遏止住了的时候，偏巧又遇到不讲道义的竞争千方百计地力图限制该公司的活动范围，减少它的财源。在法国，根据法律规定，匿名公司的建立及其活动只有政府才能批准和加以监督，而 Crédit Mobilier 根据自己的章程是无权建立这种公司的，当 1856 年 3 月 9 日“通报”上的评论直接反对所谓匿名公司的时候，法国的投机活动找到了 sociétés en commandite（两合公司）这种更加广阔的活动场所，这种公司不必经过政府批准并且几乎是完全不受监督的。因此，投机活动只不过改变了自己的途径；在匿名公司的发展上所受的阻碍完完全全由 sociétés en commandite 的丰收所补偿了。具有贝列拉先生所谓的“崇高的智慧”的拿破仑第三，并没有去阻止投机活动，他只不过是使投机活动大大脱离了自己的心爱机关的控制。1856 年头九个月中，整个法国都沉醉于投机活

动 ,Crédit Mobilier 本来可以从投机中得到甜头 ,但这个忠诚的公司仅仅由于“崇高的智慧”考虑不周因而只得这样地“在有限范围内”活动 ,服服贴贴地“等待官方发出叫它恢复活动的信号”。当一个甚至完全越出拿破仑本人“崇高的智慧”的权力范围之外的事件已经发生的时候 ,它还在等待官方的信号和“良机的到来”。

让我们下次再来分析这一事件吧。

(二)

1856年9月，欧洲大陆和英国同时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Crédit Mobilier 正在——用贝列拉先生的话来说——充当“金融和信贷方面的明智的哨兵”，这个哨兵比其他“站在各级阶梯上的”人“眼界更为广阔”，“能够防止惊慌和不必要的紧张”，一心一意地关怀“扶持国民劳动和国民信贷”这个崇高的目的，漠视“不公正的或嫉妒性的批评”，对“激烈的或蓄意的攻击”一笑置之，对“诬蔑者”的庸俗“诽谤”傲然不理。在这个紧急关头，法兰西银行对于Crédit Mobilier 纯粹出于追求社会幸福的热望而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法兰西银行提出的那些要求，看来是很不肯通融。所以，人家告诉我们说，“危机之所以发展得如此猛烈迅速，是法兰西银行根据自己所遵循的章程而采取的措施造成的”，并且说，“这个机关还很不完善，因为它没有承担任何义务和拟定任何实行和谐合作的措施”。法兰西银行拒绝帮助Crédit Mobilier，而同时也不要它的帮助。原来，Crédit Mobilier 本着它固有的敢想精神，认定金融危机是施展大规模的金融骗术的最适当的时机。因为在普遍惊惶失措的时候，实行一次冲击就可以攻克好几年用正规包围攻不下来的堡垒。Crédit Mobilier 建议同若干家外国银行一起，购买法兰西银行所握有的无期证券或国家债券，以便使法兰西银行能够“有效地增加自己的金属储备和继续发放以无期证券和铁路股票作抵押的贷款”，这是并不奇怪的。当Crédit Mobilier

er 提出这个无私的和仁慈的建议的时候，它的库里已经放满了将近 5475000 法郎的无期证券和 11500 万法郎的铁路股票，而法兰西银行此时所握有的无期证券约为 5000 万法郎。换句话说，Crédit Mobilier 所握有的铁路股票数额比法兰西银行所握有的无期证券数额多一倍以上。如果法兰西银行把自己的无期证券投进市场，以加强自己的金属储备，那就不仅会使无期证券跌价，而且会使其他一切的有价证券，尤其是铁路股票跌得更加厉害。因此，Crédit Mobilier 的建议实际上就是要法兰西银行不把自己的无期证券投进市场，而给 Crédit Mobilier 所握有的铁路股票在市场上多留一些地方。而且，正像贝列拉先生所断言的，法兰西银行就会有停止发放以铁路股票作抵押的贷款的口实。这样一来，法兰西银行就是暗中解救了 Crédit Mobilier，而人们却觉得法兰西银行从属于这一慷慨豪爽的机关，并且是由于 Crédit Mobilier 的帮助而得救的。但是，法兰西银行识破了诡计，认为还是和这个“明智的哨兵”离得远一点为妙。

Crédit Mobilier 像它的保护人过去应当保卫法国免于社会主义一样，也是十分坚决地要保卫法国免于财政危机，它提出了一个新建议，这次不是向法兰西银行提出的，而是向巴黎的私人银行提出的。它大公无私地建议

“满足法国各铁路公司的愿望，认购它们要在 1857 年发行的 3 亿法郎的债券。同时 Crédit Mobilier 自己表示准备认购 2 亿法郎，如果其他银行认购其余 1 亿法郎的话”。

这样的认购必然会迅速提高铁路股票和本票即主要为 Crédit Mobilier 所持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不仅如此，Crédit Mobilier 走了这一大胆的一着，就将成为法国所有铁路的大股东并且使巴黎

一切大银行家都会成为它的某种不由自主的合伙人。但是这个计划也落空了。不得不“打消采取任何共同措施的念头的”Crédit Mobilier 发觉，它只好自己去冒风险了。Crédit Mobilier 深信，“它的这类提议的本身，就无疑非常有助于安定人心”，因此，虽然危机具有“大大减少它觉得可以指望的利润”的趋势，它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处之泰然了。

除了所有这些倒霉事情以外，Crédit Mobilier 还抱怨人家直到现在还在阻止它使用自己的王牌，即发行 6 亿法郎的债券，也就是发行它自己发明的纸币，这种纸币的偿付期限很长，用来作保证的不是该公司的资本，而是可以拿这种纸币来交换的有价证券。

贝列拉先生说：“我们本来该从发行本公司债券中得到的资金，会使我们能够购买直到现在还没得到一定运用的有价证券，并且极大地扩大我们对工业的扶持。”

1855 年，Crédit Mobilier 本来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发行 24000 万法郎的这种债券，——这是该公司的章程所许可的，——但是土伊勒里宫的“崇高的智慧”制止了这种打算。Crédit Mobilier 把纸币的这种发行叫做增加自己的资本；而普通人却宁肯把它叫做增加 Crédit Mobilier 的债务。总之，1856 年 3 月，Crédit Mobilier 为政府所逼迫而不得不停住，sociétés en commandite 的竞争，金融危机和 Crédit Mobilier 自己的纸币的未能发行，所有这些情况充分说明为什么该公司的股息会减少。

在这家规模巨大的骗人的康采恩以往所有的报告书中，都是把以股份工业公司代替个人的工业企业吹嘘成这个康采恩的特点和革新。但是在我们所分析的最近这份报告书中，就是去寻找这方面的最细微的迹象，也会是白费气力。该公司 6000 万法郎的资

本中，1856年有4000万投入国家证券。而它由于信贷而握有的款子，相当大的一部分用于在交易所的结算日对无期证券和铁路股票进行“展期”。在1856年进行的这种业务中，法国无期证券为42150万法郎，铁路股票和其他股票为28100万法郎。在目前，这种展期不过就是给证券投机商人以货币贷款，使他们得以继续自己的业务，并使交易所的空头证券看来可靠而已。Crédit Mobilier 用来企求得到法国人民感谢的，主要就是经营这种吸引很大一笔国民资本脱离生产活动而去进行非生产性的有价证券买卖的业务。路易-拿破仑的确从贝列拉先生们的公司那里得到了巨大的支持。他们不仅使皇家证券具有虚拟的价值，而且不断地鼓励、灌输、支持和传播成了现今帝国根本原则的投机精神。只要草草地浏览一下贝列拉先生那么得意地加以描述的业务，便会明白，Crédit Mobilier 的投机手腕是必然同它的骗人的生意相联系的。一方面，Crédit Mobilier 执行交易所的保护人这种社会职能，它从居民那里把钱借来贷给从事投机活动的公司和个人，以维持法国股票和有价证券的价格。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私人企业，Crédit Mobilier 又经常利用这些股票和有价证券行情的涨落，既利用它们的上涨，也利用它们的下跌，来谋自己的利益。为了从表面上调和这种矛盾，Crédit Mobilier 就不能不欺诈骗人。

像一切职业投机分子一样，路易-拿破仑十分大胆地思考了自己的 coups [步骤]，又十分缓慢而谨慎地执行这些步骤。例如，他曾经两次制止 Crédit Mobilier 的肆无忌惮的活动，——先是1855年他禁止该公司发行债券，后来是1856年他在“通报”上的警告迫使 Crédit Mobilier 抑制自己的热情。但是，尽管有路易-拿破仑的阻碍，这个公司仍然在尽力活动。显然，如果给它以充

分的自由，那它是会招致灭亡的。如果波拿巴还要继续去打搅它，叫它抑制自己，那它就会不成其为这样的企业了。但是，从贝列拉先生的报告书中显然可见，“崇高的智慧”和“明智的谨慎”终于谈妥了。如果已经信誉扫地的 *Crédit Mobilier* 得不到发行自己本身的纸币这一危险的权利，那就应当把 *Crédit Mobilier* 的继续存在所不可缺少的资金，在法兰西银行这块更硬的招牌下给予 *Crédit Mobilier*。这就是现在提交给 *Corps Législatif*〔立法团〕的“有学问的狗和猴子们”审查的新的法兰西银行法的秘密目的之一。贝列拉先生说：“我们不怕声明，要是我们除了法兰西银行以外，还要到其他什么地方去寻找资金，以便通过贷款来给社会信贷、大企业、工商业”，换句话说，即给 *Crédit Mobilier* 本身，“以必要的协助，那将是徒劳无功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5 月 12 日
和 15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5 月 30 日和
6 月 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027
号和第 5028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俄
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波斯和中国¹⁸³

1857年5月22日于伦敦

英国人在亚洲刚结束了一场战争，现在又开始进行另一场战争了¹⁸⁴。波斯人对英国侵略的抵抗和中国人到现在为止对英国侵略所进行的抵抗，形成了值得我们注意的对照。在波斯，欧洲式的军事制度被移植到亚洲式的野蛮制度上；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正用自己的方法与欧洲人进行斗争。波斯被打得一败涂地，而被弄到绝望地步、陷于半瓦解状态的中国，却找到了一种抵抗办法，这种办法如果能彻底实行，就能使第一次英中战争时英军节节胜利的情形不再发生。

波斯的状况与1828—1829年俄土战争¹⁸⁵时土耳其的状况相同。英国的、法国的、俄国的军官曾轮流试图建立一支波斯军队。各种办法相继采用，但是由于那些本来应在这些办法的实施下成为欧洲式军官和士兵的东方人所具有的嫉妒、阴险、愚昧、贪婪和腐败，每一种办法都行不通。新式的正规军从来没有机会在战场上考验一下自己的组织和战斗能力。它的一切功劳只限于对库尔德人、土尔克明尼亚人和阿富汗人的几次征讨，而在这些征讨中，它只是作为波斯的数量众多的非正规骑兵的核心或预备队。当时实际作战的主要是非正规骑兵，而正规部队通常只利用它那表

面威武的战斗队形向敌人摆威风来欺骗敌人。最后，终于爆发了波斯同英国的战争。

英军进攻布什尔，遇到了虽然无效但却勇敢的抵抗。但是在布什尔作战的并不是正规军，而是由新招募的住在海滨地区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编成的非正规部队。正规军当时还正在大约 60 英里以外的山区集结。最后，他们向前挺进了。英印军队与他们在中途相遇；虽然波斯人很熟练地运用了自己的炮兵，并按照一切规定列成了方队，但是仅仅一个印度骑兵团的一次攻击，就把整个波斯军队，无论近卫军或者基干部队，完全扫出了战场。要想知道这支印度正规骑兵在他们自己军队中所得的评价如何，只要看看诺兰上尉论述这个问题的一部书¹⁸⁶就够了。英印军官认为印度的正规骑兵无用已极，远不如英印非正规骑兵。诺兰上尉举不出一个能说明正规骑兵表现良好的战例。可是 600 名这样的骑兵竟能打跑一万名波斯军队！波斯正规军如此心寒胆裂，以致从那以后，除炮兵外，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对英军作过一次抵抗。在穆罕默德附近，波斯正规军远远地避开危险，让炮兵单独防守炮台，一当炮台被压制，他们就立即撤退；当英军为了进行侦察，派 300 名步兵和 50 名非正规骑兵登陆时，波斯全军即行退却，把辎重、粮食、火炮都送给了侵略者（要把这些英国人叫做胜利者是不可能的）。

但是并不能根据这点就指责波斯人是怯懦的民族，也不能由此认为不能教东方民族学欧洲式的战术。1806—1812 年¹⁸⁷和 1828—1829 年的俄土战争中提供了许多这样的例子。无论在设防的城市中或山区省份里，对俄军进行主要抵抗的都是非正规部队。正规军只要在战场上一露面，就立刻被俄军击溃，并且常常一听

到枪炮声就逃跑；而一个由阿尔纳乌特人¹⁸⁸编成的非正规连，竟在瓦尔那附近的峡谷中成功地抵抗俄军围攻达几星期之久。不过，在最近一次战争中，土耳其的正规军却在从沃耳特尼察和切塔特到卡尔斯和印古耳河的各次会战中都击败了俄军¹⁸⁹。

问题是：把新的军队按欧洲方式来加以划分、装备和教练，还远不能算是完成了把欧洲的军事制度引用于落后民族的工作。这只是第一步。采用某种欧洲军队的操典，也是不够的；欧洲式的操典不能保证培养出欧洲式的纪律，就如同欧洲式的教练规则本身不能产生欧洲式的战术和战略一样。主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主要的困难就在于：需要造就一大批按照欧洲的现代方式培养出来的、在军事上完全摆脱了旧的民族偏见和习惯的、并能使新部队振作精神的军官和士官。这一切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一定还会遇到东方人的愚昧、急躁、偏见以及东方宫廷所固有的宠幸无常习气等方面的最顽强的抵抗。只要士兵在检阅时步法整齐，会操各种转法，能够在展开和排成纵队时不致乱成一团，那末土耳其苏丹或波斯沙赫就会很容易认为自己的军队已经能应付一切事变。至于军事学校，由于它们收效很慢，所以在东方政府不稳定的情形下，很难期望收到任何效果。甚至在土耳其，受过训练的军官也很少，土耳其军队如果不是有很多背教者¹⁹⁰和欧洲军官，那末它在最近一次战争中就不能有任何作为。

到处都成为例外的唯一兵种是炮兵。东方民族在这方面简直太无能为力了，他们不能不把领导炮兵的事务完全交给欧洲教官。结果，无论在土耳其或者波斯，炮兵都比步兵和骑兵强得多。

英印军队是按照欧洲方式组织起来的所有东方军队中最老的一支，也是唯一不隶属于东方政府而隶属于纯粹欧洲式政府、并

且差不多完全由欧洲军官指挥的军队。很自然，在上述那种情况下，这样一支军队有英国部队和强大舰队作为强有力的后盾，是不难把波斯的正规军击溃的。挫折愈严重，这种挫折给予波斯人的益处也愈大。正如土耳其人已经看到的那样，波斯人现在会看到：欧洲式的服装和检阅式的操练本身还不是一种护符；而经过二十年以后，波斯人可能也会令人肃然起敬，就像土耳其人在最近的各次胜利中所表现的那样。

据说，攻克布什尔和穆罕默德的军队将立即调往中国。在中国，他们将遇到不同的敌人。与他们作战的将不是依照欧洲方式变换队形的部队，而是亚洲人数众多的非正规队伍。毫无疑问，他们将不难对付这种队伍；可是，如果中国人发起民族战争来对抗他们，如果野蛮人毫无顾虑地运用他们善于运用的唯一武器，英国人又怎么办呢？

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 1840—1842 年战争时的情绪已显然不同。当时人民静观事变，让皇帝的军队去与侵略者作战，而在遭受失败以后，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服从了敌人的暴力。现在至少在南方各省（直到现在军事行动只限于这些省份之内），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国人极其镇静地按照预谋给香港欧洲人居住区的大量面包里放了毒药（有些面包已送交李比希化验。他发现大量的砒霜毒液浸透了面包，这证明在和面时就已掺入砒霜。但是药量过大，竟使面包成了呕吐剂，因而失去了毒药的效力）。中国人暗带武器搭乘商船，而在中途杀死船员和欧洲乘客，夺取船只。中国人绑架和杀死他们所能遇到的每一个外国人。连乘轮船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约定好了，在每个放洋的轮船上起来骚动殴斗，夺取轮船，他们宁愿与船同沉

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愿投降。甚至旅居国外的华侨——他们向来是最听命和最驯顺的国民——现在也密谋起事，突然在夜间起义，如在沙捞越就发生过这种情形；又如在新加坡，当局只有使用武力和严加戒备，才能压制他们。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

军队对于采取这种作战方法的人民有什么办法呢？军队应当在什么地方侵入敌国，侵入到什么地方为止和怎样在那里坚守下去呢？这些向毫无防御的城市开火、杀人之外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自然会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方法叫做怯懦的、野蛮的、残酷的方法；可是既然只有这种方法能生效，那末中国人管得着这些吗？既然英国人把中国人当做野蛮人看待，那末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中国人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全部长处。如果中国人的绑架、偷袭和夜间杀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卑怯行为，那末这些文明贩子们就不应当忘记：他们自己也承认过，中国人采取他们一般的作战方法，是不能抵御欧洲式的破坏手段的。

简单地说，我们不要像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 *pro aris et focis*〔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是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

这一次，英国人陷入了窘境。直到现在，中国的民族狂热情

绪似乎还只限于未参加大起义¹⁹¹的南方几省。战争是否将以这几个省为限呢？这样，它就不会得到任何结果，因为中国的一切要害地方都不会受到危险。同时，如果这种狂热情绪遍及内地各省的人民，那末这个战争对于英国人就将非常危险。英国人能把广州城完全毁灭，能攻占沿海的一切据点，可是他们所能调集的全部兵力都不足以夺取和扼守广东和广西两省。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有什么办法呢？广州以北到上海、南京一带的地区都掌握在中国起义者手里，触犯他们将是极大的错误；然而南京以北唯一能在袭击后收到决定性效果的地点是北京。可是从什么地方调集军队，来在海岸上建立既有防御工事又有守备队的作战基地，来克服途中的每个障碍，来用部队保证和海岸一带的交通以及用比较雄厚的兵力逼近这个与伦敦一样大并离登陆地点 100 英里远的城市呢？另一方面，对京城的军事示威行动，如果有成效，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华帝国本身的存在，就会加速清朝的崩溃，就会给俄国而不是给英国打开前进的道路。

新的英中战争的形势极为复杂，使人简直不能预料它将有什么样的转变。在几个月内兵力不足以及在更长时间内缺乏决心，使得英军除了或许向某一个不重要的地点（在目前情况下，广州也可以算是这样的地点）作一些进攻而外，将完全无所行动。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旧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国内战争已使帝国的南方与北方分立，而太平天国的天王在南京似乎不会受到清廷军队的危害（如果不受自己人阴谋危害的话），正如同清帝在北京不会受到起义者的危害一样。直到现在，广州似乎是独自进行着一种反对英国人以及根本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战争；但是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调集的时候，西伯利亚边

防的哥萨克部队却缓慢地、然而继续不断地把自己的驻屯地由达
乌拉山移向黑龙江岸，而俄国海军陆战队则在满洲的良好的港湾
周围设立堡垒。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
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
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
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5 月 20 日

左右

载于 1857 年 6 月 5 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 5032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有趣的揭露

1857年5月26日于伦敦

奥当奈尔5月18日在西班牙参议院发表的演说,包含着对现代西班牙秘密历史的极其有趣的揭露。由于他对埃斯帕特罗的背叛和他的 coup d' état [政变] 为纳尔瓦艾斯的上台扫清了道路, polacos¹⁹²现在便设法来摆脱后者。为了这个目的,卡龙赫将军(他本人曾经是1843年克里斯蒂娜派暴动的参加者,1854年革命爆发时潘普洛纳的镇守司令)被怂恿在5月18日当参议院对向女王呈递奏章一事进行辩论时,针对有关建议大赦的一节提出了一系列修正案。他猛烈地攻击一切军队起义,特别是1854年的军队起义,并且坚决要求“不应当让保证绝对不受惩罚的安抚政策导致对无可救药的暴徒的鼓励”。萨尔托里乌斯的朋友们预先策划的这次打击,既针对瓦伦西亚公爵(纳尔瓦艾斯),也针对奥当奈尔。实际上, polacos 曾经认定,奥当奈尔一有机会就会出来揭露纳尔瓦艾斯是他在近卫军卫戍部队中策动起义时的秘密同谋者。卡龙赫将军正是给了奥当奈尔这样一个机会。纳尔瓦艾斯为了防止爆发的危险,贸然采取了一个绝望的步骤。他,一个卫护秩序的人,为1854年的革命进行了辩护,他说,这次革命“受到了最崇高的爱国精神的鼓舞,它是由以前几届内阁的过火行为挑起的”。这样,

正当内政大臣诺塞达尔先生向议会建议通过残酷的出版法的时候，政府首脑纳尔瓦艾斯却在参议院中扮演 *advocatus diaboli* [魔鬼的保护人]，即革命和军队起义的捍卫者。但这是徒劳的。在 5 月 18 日参议院的会议上，纳尔瓦艾斯被 *polacos* 逼着收回了自己对“以前几届内阁”的谴责，同时还不得不痛心地听着奥当奈尔那些使他名誉扫地的揭露。纳尔瓦艾斯对“奥当奈尔揭露私人的和机密的谈话”表示了不满，并对“今后是否还能信赖友谊”提出了疑问，这样他就亲自承认了奥当奈尔的揭露是真实可信的。现在在宫廷看来，纳尔瓦艾斯已成了被揭露的反叛者，不久他就会被迫为布腊沃·穆里洛和萨尔托里乌斯让路，而这两个人无疑将是发生新的革命的先声。

下面是奥当奈尔的演说的逐字逐句的译文：

“奥当奈尔：自从参议院上次开会以来，发生了许多极重大的事件，这使我不能在这场有声有色的政治讨论中保持缄默。我在这些事件中所起过的作用，使我有义务出来讲话。我曾经是近卫军卫戍部队起义的首领，发表过曼萨那累斯纲领；又担任过维多利亚公爵内阁的陆军大臣，两年后王国曾经庄严地号召我去拯救这个王国和岌岌可危的社会，我幸运地无须经过流血战斗或者下令放逐任何人就达到了这一目的，——在这一切之后，我应该觉得自己有义务参加正在进行的讨论。况且，卡龙赫将军已经对我以及两年来与我有联系的、在危机期间出力拯救社会和王国的尊贵将军们提出指责，再保持缄默便是一种罪过。卡龙赫将军把起义描绘成只不过是近卫军卫戍部队里的骚动。这是为什么？难道他这么快就忘记了起义前所发生的一切事件？而那些事件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是会将国家卷入不可收拾的革命中去的。内阁首相那样坚决地摈弃了卡龙赫将军的指责，我向他表示感谢。的确，他这样做，是表现了一个捍卫自己事业的人的毅力。（普遍的强烈反应）我不得不从详叙述为证实这一事实所必需的情况；为了首先把所有可能带有私人性质的东西从这次辩论中剔除出去，如果内阁首相愿意回答如下几个问题，我将不胜感激：瓦伦西亚公爵自从 1852 年以来与维卡耳瓦罗的将军们保持着密切的联

系，是真的吗？自从参议院由于 105 人的表决而被封闭以来，他对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有情报，是真的吗？他打算等他们一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加入他们一边，是真的吗？他由于一些我所尊敬的理由而没有可能这样做，可是后来派了他的一个副官去祝贺我们的胜利，是真的吗？

纳尔瓦艾斯：在听了吕逊纳伯爵对我说的话以后，我应当声明，不论我们过去的关系如何，我丝毫没有参与他所策划的以及后来付诸实施的一切，也丝毫没有按照他所策划的以及实施自己阴谋的方式办事。

奥当奈尔：内阁首相以他认为最适当的方式做了回答。我本来不愿意做进一步的解释，但是，既然非这样做不可，我就做吧。任何人都知道，1852 年政治界的情况是绝对平静的。对于政府和国家来说，不幸的是，过一段时期以后，开始有人谈论‘立宪改革’，不过起初是窃窃私议罢了。议员先生们一定还记得由于担心 coup d'état 而产生的惶恐不安。他们大概没有忘记，当时在政治家当中产生了许多联盟，在这些联盟中酝酿成熟了一项向女王呈递奏章的决定。许多人都在这份奏章上签了名，但是它并没有呈递给女王。召开了议会，几天以后，‘日报’公布了奏章的几种方案，它们在这个议院中产生了这样大的效果，以致政府在议长选举中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在这以后，议会解散了。当时，温和党最有影响的人物为了对此表示抗议而联合起来了；瓦伦西亚公爵被任命为这个联盟的主席。由于害怕政府会阻碍这些联盟，建立了一个委员会，瓦伦西亚公爵又被选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芒先生、皮达尔先生和其他显要人物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最积极的成员。除了抗议以外，这个委员会还提请讨论新选举的合法性问题。在瓦伦西亚公爵到贝云去以后两三天，布腊沃·穆里洛内阁提出辞职。布腊沃·穆里洛被达尔卡伯爵所代替。反对派还是原班人马，当召集议会时，一份由瓦伦西亚公爵起草的宣言被提交给参议院。参议院否决了它，可是后来看得很清楚，反对派的声势非常浩大。亚尔科伯爵的内阁被勒尔松迪将军的内阁所代替，然后又建立了圣路易斯伯爵的政府。我很抱歉不得不说一些详细情况，但是现在该谈谈我自己同那些在近卫军卫戍部队里与我站在一起的人们的政治联系了。在瓦伦西亚公爵回到西班牙以前，正像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所做的那样，我接见了他的一个代理人，他在这以前曾和这个代理人有过一次长谈；在这次谈话中，公爵对国家所陷入的处境表示遗憾，对威胁着王权和宪法的危险表示不安，最后他说，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使用武力。（强烈反应）萨尔托里乌斯政府准

许瓦伦西亚公爵返回西班牙。他先前往马德里，然后来到阿兰惠斯。在那里我们和他进行了磋商。他向我们表示了他的爱国心情，这种爱国心情是我所钦佩的，尽管我并不能支持他在目前所领导的内阁。他向我们声明说，既成形势已使得动用武力成为不可避免；由于某些原因，他不能第一个出面，但一定是第二个拔出剑来；他补充说：在那时的情况下，只要有两个骑兵团发动起义就可以进行革命。他这一番话是以斩钉截铁的方式对我们说的。议会开会了。瓦伦西亚公爵由于深信一切合法手段都徒劳无益，没有出席参议院担任反对派的领导，而到洛哈去了。大家都知道，后来在议会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记得著名的 105 人表决。可是政府并不认为必须辞职。议会被解散了，然后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迫害措施。曾投票反对内阁的将军们、最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们、抱有反对情绪的新闻记者们都遭到驱逐；宣布在各方面进行根本改变；宣布发行强制性的公债；总之，政府将自己置于法律之外。现在我要问你们：你们敢不敢说，在这个所有反对党派一向阴谋倾轧的国度里，什么时候曾经有过比 1854 年革命更合法的革命吗？至于我，我离开了曾经隐藏了六个月的住处，骑着马，由几个将军和几团人伴随着离开了那里，目的是要推翻政府，因为它这么无耻地蹂躏了我曾经宣誓要以将军和参议员的身分来保卫的宪法。我们来到了维卡耳瓦罗，令我极为痛心的是，在那里开始了战斗。战斗没有分胜负。双方的部队都表现得很英勇。卫戍部队不得不返回马德里，而我们就留在维卡耳瓦罗。第二天，就像和瓦伦西亚公爵约定的那样，我们经过阿兰惠斯前往安达鲁西亚。当时塞拉诺将军驻在哈安省，他曾答应给我们援助。我们来到曼萨那累斯时，他在那里迎接了我们，并且说，那些答应跟随他的人都跑光了，他单身一人来和我们分担命运。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发表了宣言，因为我不喜欢做了事不认账，我想说说那时做了哪些准备工作。我通过密使了解了马德里的一切动态。温和党里所有一切有影响的人物都被卷入了运动。只是发生了一定会发生的情况：当你计划采取某项措施的时候，指望有大批人会参加，可是当行动的时刻一到，其中最热心的人却不见了。密使告诉我说，民众大概不会支持我们，因为政府企图使他们相信，仿佛运动的原因只是个人的纠纷，仿佛运动没有任何确定的政治原则。这就是发表曼萨那累斯宣言的原因，这个宣言包含两点重要内容：

立宪改革，我后来担任内阁首相时曾向女王陛下提出过这一点，还有国民军，但不是以前实际上组织过的那种国民军，而是我本人打算建立起来作

为真正的秩序因素的国民军。

我们离开了曼萨那累斯并给瓦伦西亚公爵写了一封信,信末由我和其他四位将军署名,我们在信中声明,如果他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将任命他为我们的总司令。公爵派了一个副官来通知我们,说他病了,正处在极严密的监视之下。曾有人说,我们仿佛决定逃往葡萄牙。这是不真实的。相反地,我们决定前往摩勒纳山,以便在巴里奥斯建立自己的骑兵,截住所有载运粮秣的车辆,一有机会就向马德里进发,而这时我们突然得到了萨尔托里乌斯内阁垮台和女王号召维多利亚公爵组阁的消息。从这时起,我的使命就结束了。per interim (这时的) 大臣圣米格尔将军给我送来了返回马德里的指示。我顺从了,但是坚决不想加入内阁。国王撤免了维多利亚公爵,我与这位公爵从1840年起就已断绝一切关系。那些后来责备我加入他的内阁的人,在我抵达马德里的当天晚上,就曾到我那里去恳求我接受陆军大臣的职务,说这是拯救秩序和社会的唯一办法。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温和党的。我见到了维多利亚公爵,在我当时与他保持的那种关系下面,要不是他自己的宣言帮助我摆脱了恶意的诽谤,我会感到相当为难的。埃斯帕特罗衷心地拥抱了我,并且说,结束西班牙人之间的一切纠纷的时间已到,以一党的力量来进行统治已不可能,因此他坚决要敦请一切贤达人士。我了解了马德里的情况。街垒还没有拆除,卫戍部队的人数极少,但是像任何时候一样明白事理的民众博得了我极大的信任。我和埃斯帕特罗的第二次见面显得冷淡得多了:他建议我当外交和殖民大臣。我通知他说,我如果入阁,只能同意当陆军大臣。于是他对我说,在所有的人当中,我是担任古巴镇守司令这个职务的最适当的人选。我回答说,由于我已经担任过这个职务,我不愿意重新回到哈瓦那去,而宁愿不再担任任何公职;但是我恳求他立即组成政府,不要再使国家受到临时统治的威胁。不久,原来被任命为陆军大臣的萨胡萨将军,以埃斯帕特罗的名义请求我接受陆军大臣的职位,我在当天夜晚就和我的同僚们一起宣誓就职。对我来说,当时只有两条道路:或者听任革命发展下去,直到它的过分做法引起反应,或者阻止它的发展。第一条道路是比较容易的;我的荣誉和国家的利益迫使我走第二条道路。我对这一点并不后悔。我们的第一次讨论涉及制宪议会。在座的科耳亚多先生知道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争论。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签署了关于召开议会的法令。举行了普选——不是像皮达尔先生说的那样是在政府的压力下举行的,而是在不受限制的自由

的情况下举行的。大部分代表都是衷心希望国家幸福的人。如果政府坚定的话，宪法是可以在四个月内制定的。但是埃斯帕特罗（不是作为军人，而是作为政治家）的出了名的软弱性格，使政府方面的任何行动都陷于瘫痪。我继续留在内阁里，并不是像维多利亚公爵所错认的那样，为了出卖自己的同僚。使我继续守在这个职位上的原因，也就是那曾经迫使我争取这个职位的原因。我继续留下来，是为了阻止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奥当奈尔在为自己的 coup d' état 作了极不高明的辩护以后，以这样的话结束了他的演说，即他不能支持纳尔瓦艾斯元帅的内阁，“因为纳尔瓦艾斯已经宣称他打算遵循那种与代议制不符的政治路线”。

对奥当奈尔演说的评论由卡·马克思于 1857 年 5 月 26 日写成
载于 1857 年 6 月 1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038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 新的法兰西银行法

新的法兰西银行法¹⁹³和法兰西银行总裁阿尔古伯爵的辞职，是目前帝国金融史上相当重大的事件。阿尔古先生自 1834 年被路易-菲利浦提升为法国银行巨擘的首脑以来，他的特色就是牢牢地保住了自己的这一职位达二十三年，并且依靠自己的谨慎和明智，安全地度过了 1848 年和 1851 年的风暴。1848 年革命不仅是反对路易-菲利浦的，而且是更猛烈地反对以法兰西银行为中心的 haute finance（金融贵族）的。所以可以意料到，这个机关及其不受欢迎的领导人自然要成为革命的第一批打击对象。阿尔古伯爵对于当时的形势没有完全认识清楚，而认为他有足够的力量通过人为地加剧金融危机的办法来恐吓资产阶级，促使它走上反革命道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突然中断了发放巴黎商界一向所依靠的信贷；可是，他有意制造出来的极大危局没有动摇临时政府的地位，反而把锋芒指向了这家银行自己。阿尔古伯爵确信会发生的反革命事件，并没有发生，却发生了向法兰西银行大量提前支取存款的事件。但是，如果说阿尔古伯爵错误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那末他却十分敏锐地估计了政府所可能采取的行动。他不仅说服政府给该行的银行券规定了强制性的行市，并要政府乖

乖地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向那家刚刚被它从彻底破产中拯救出来的银行取得借款，而且乘机谋取了发行票面额较小的银行券的特许权，剥夺了外省银行的发行权，扩大了自己的垄断，来增加该行的收入来源。1847年以前，法兰西银行发行的银行券的最小票面额是500法郎，1848年准许它发行200和100法郎的银行券。外省的银行失掉了从前的发行银行券的权利，法兰西银行新设的分行占据了它们的地位。这种变换的结果是：该行发行的投入流通的银行券总额，在1847年年终时只有4800万美元，而1855年年终时达到了122455000美元；该行的周转额在1847年还不及37500万美元，而1855年达到94060万美元，其中有54900万美元是各分支行的业务。而它的股票价格在革命前通常为2000法郎左右，现在市价为4500法郎。1848年以前，与其说法兰西银行是法国的机关，倒不如说是巴黎的机关。革命政府赋予它以新的特许权，使它变成了全国规模的私人企业。这样一来，二月革命所要消灭的金融贵族的垄断，却在阿尔古伯爵巧妙的管理之下，经过这次革命得到了扩大、加强和改组。

阿尔古伯爵必然要遇到的第二大灾难就是 *coup d' état* [政变]，因为它的成功主要依靠以强制手段侵入委托阿尔古伯爵看管的法兰西银行的金库。这位好商量的总裁不仅装作没有看见波拿巴破门入盗的行为，而且还在所有正派人士或假装的正派人士纷纷辞去行政职位，大有败坏这个篡位者的声誉的时候留在自己的职位上，因而大大地帮助了消除商界的阴暗的预感。为了嘉奖这种难能可贵的效劳，波拿巴同意不在1855年修改法兰西银行的章程，这本来是1840年最后一次恢复法兰西银行的特许权时规定了可以修改的。阿尔古伯爵和他的亡友苏尔特元帅一样；是只矢志

忠于自己的职位和自己的薪俸的。目前他辞去法兰西银行的总裁的职位，只能用民间故事中说的，老鼠被迫从正在沉没的船只上逃走的原因来解释。

新的法兰西银行法的经过始末：是一个非常能说明目前帝国时代的黑暗勾当。在 1856 年底欧洲爆发了金融危机的时候，关于修改现行的法兰西银行法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好听的借口下第一次提出来进行讨论的，即这家银行的庞大业务建立在资本过于微小的基础上。在六个多月的时间中，在拿破仑第三的出席下，以法兰西银行代表的这一方，同巴黎的大金融家、大臣们和国务会议的另一方，举行了多次秘密的谈判。虽然这样，上面所说的这个法案却直到 Corps L égislatif〔立法团〕最后解散的前夕才提交这个机构。在 bureaux 194 里初步讨论时，法案遭到猛烈地抨击；被指定来对这个法案提出报告的委员会简直把这个法案说得一塌糊涂，甚至有人威胁要完全否决这个草案。但是波拿巴很了解自己的傀儡。他要人使他们明白，政府的决定是坚决的，因此他们应当选择：或者是批准法案，或者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丢掉自己薪高而清闲的职位。为了帮助他们把最后一点点良心抹掉，讨论法案的时间恰恰安排在会议最后一天。不言而喻，这一来，法案只作了几处无关紧要的修改就通过了。这个甚至在 Corps L égislatif 这种机关里也要施尽诡计才得以通过的法令该具有何种性质呢？

的确，甚至在路易-菲力浦的年代，当法兰西银行和路特希尔德宗族被正式授权可以禁止一切不合他们心意的法案的时候，也没有哪一个大臣敢于建议国家这样地完全向他们投降。现在政府放弃了还是 1846 年银行特许状就保证了在新的法兰西银行

法有效期满以前修改这个法令的权利。有效期还有十年的法兰西银行的特许权，现在又被垂青延长到三十年这个新的期限。银行被准许把自己的银行券的票面额降低到 50 法郎；只要指出 1848 年发行票面额 200 和 100 法郎的银行券曾使得这家银行以自己的纸币代替了 3000 万美元的黄金和白银，这一措施的重要性就十分清楚了。这次新的发行无疑会给法兰西银行带来巨额利润，但是国家从中却什么也得不到。相反，国家由于代表了法国给予该银行以信任还要付钱给银行。法兰西银行取得在还没有说立分支行的各省设立分支行的特许权，这并不是作为国家向银行的让步，而相反地是银行向国家让步。准许银行向它的主顾收超过 6% 的法定利息，条件是只要承担一个义务，即把由此得来的利润并入银行的资本中，而不归入银行全年的股息中，国库的往来账的利率由 4 厘降低到 3 厘，这一点由于废除 1840 年法令的下述条款而得到了充分的补偿，这一条规定在国库的债款下降到了 8000 万法郎以下的时候，银行根本不收利息，而这种债款额通常平均是 8200 万法郎。法兰西银行所得到的最后一个但也是同样重要的优待，即该行新发行的票面价值为 1000 法郎的 91250 张股票，只有已有的 91250 张股票的持有人才能购买，并且目前该银行股票在交易所的价格为 4500 法郎，但这些新股票却应当以 1100 法郎的价格出售给旧股东。这一牺牲国家利益而完全对银行巨擘有利的法令，是波拿巴政府财政上陷入了怎样一种困难的局面的最有力的证明。作为所有这些让步的等价物，政府得到了 2000 万美元，也就是说这家银行必须购买 2000 万美元专门为此发行的三厘无期公债，这种公债的最低价格为 75 法郎。这笔交易显然完全证实了欧洲的一种普遍的看法，就是波拿巴已经从法兰西银行的金库中借到了一

笔巨款 ,现在他正在设法使自己的诈骗勾当表现得比较体面一点。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6 月 2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6 月 20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045 号

卡·马克思 与波斯签订的条约

1857年6月12日于伦敦

不久以前，帕麦斯顿勋爵在他把持的下院中受到有关波斯战争问题的质询时，他讥讽地回答道：“只要和约一经批准，下院就可以发表自己关于战争的意见。”1857年3月4日在巴黎签订并于1857年5月2日在巴格达批准的和约，现在已提交下院。和约共分十五条，其中八条都是和约中常见的具文。第五条规定，自互换和约批准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必须将波斯军队从赫拉特公国和赫拉特城以及从阿富汗的一切其他地区撤走。按照第十四条，英国政府方面则答应一俟上述条款得到履行，就“立即将英国军队撤出隶属于波斯的一切港口、地区和岛屿”。

但是应该提醒一下，早在布什尔被占领以前，波斯使节费鲁赫汗在君士坦丁堡同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进行长时间的谈判时，就曾主动提出把波斯军队从赫拉特撤走。因此，英国从这个条款中所能得到的唯一的新利益，只不过是特权在一年中最有碍健康的季节把自己的军队困在波斯帝国的最容易感染疾病的地方。夏季的烈日、沼泽和海洋甚至在布什尔和穆罕默腊的当地居民中间也会造成种种可怕的灾害，这些都曾被古代作家及近代作家们载入史册；可是，既然仅在几个星期以前，在这个

问题上很有权威并且追随着帕麦斯顿的亨利·罗林森爵士已经公开说过，英印军队必然会死于恶劣的气候，何必再引证这些记载呢？伦敦“泰晤士报”收到在穆罕默腊附近获胜的消息后，立刻就声言，虽然和约的谈判在进行，为了拯救军队，必须向设刺子推进。统帅这次远征的英国海陆军将领之所以自杀，也正是因为他们非常担忧军队可能遭到的命运，按照政府的指令，他们是不应当率领军队由穆罕默腊向前推进的。因此，完全可能看到克里木惨剧小规模地重演；然而这次惨剧的发生，不是由于战争的需要和政府犯了重大的错误，而是由于用胜利者的宝剑写成的和约的条款。在上述和约的条款中有一句话，只要帕麦斯顿愿意，这句话就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引起纠纷的苹果”。

第十四条规定，“英国军队撤出隶属于波斯的一切港口、地区和岛屿”。但正是在这句话上产生了问题，穆罕默腊城是否隶属于波斯？土耳其人对于这个位于幼发拉底河的三角洲、土耳其人在幼发拉底河上唯一可以经常通航的海港（因为巴士拉港口在一年中的某些时间内，对于载重量大的船只来说是太小了），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要求。因此，如果帕麦斯顿认为适当的话，他就可以借口穆罕默腊不“隶属于”波斯、借口应该等待彻底解决土耳其和波斯之间的这个边境问题，而把穆罕默腊据为己有。

第六条载明，波斯同意

“放弃对赫拉特公国和赫拉特城的领土主权以及对阿富汗各地区的主权的一切要求”；“对阿富汗的内政不予以任何干涉”；“承认赫拉特和整个阿富汗的独立，并永远放弃破坏这些国家的独立的企图”，在同赫拉特和阿富汗发生争端时，须请“英国政府从中进行友好的调处，以求消弭这些争端；只有当这种友好的调处达不到预期效果时，才能诉诸武力”。

英国政府方面则答应

“随时影响阿富汗各邦，以便预先杜绝从它们这方面产生的一切重大祸根”，并“竭尽全力用公正的和无损波斯尊严的方法调解争端”。

如果把这一条的官样文章去掉，那末它所表明的无非就是波斯承认赫拉特的独立，也就是费鲁赫汗自称他在君士坦丁堡会议时就准备要做的让步。诚然，按照这一条，英国政府被规定为波斯和阿富汗之间的正式调停人，但是从本世纪一开始，它一直就扮演着这个角色。至于它能否继续担任这个角色，这就不是权限问题，而是实力问题。此外，如果有那么一位胡果·格劳修斯在德黑兰朝廷中找到了栖身的地方，那他就会向朝廷指出，按照 *jus gentium*（国际法），凡独立国家据以授权外国政府干预本国国际关系的任何条款，均属无效，因此同英国签订的条款更属无效，因为它把阿富汗这个仅仅用来标明各部落与各邦的带有诗意的名词，解释为真正的国家了。从外交的意义上来说，阿富汗国家就同泛斯拉夫国家一样，是并不存在的。

第七条规定，阿富汗各邦对波斯国境有任何侵犯行为时，“波斯政府有权采取军事行动镇压和惩罚进犯者”，但是“任务一经完成，必须把自己的军队调回本国境内”，——这一条实质上是逐字逐句地重复了 1852 年条约中那一项曾给远征布什尔以直接借口的条款。

由于第九条的规定，波斯同意英国派驻总领事、领事、副领事和领事馆办事人员，这些人享有最优惠国家的特权；但是由于第十二条的规定，英国政府放弃

“对于今后实际上不为英国使节或英国总领事、领事、副领事和领事馆办事人员做事的任何波斯臣民的保护权”。

由于费鲁赫汗早在战争开始以前就同意英国在波斯设立领事馆，所以目前的条约所增加的只是英国放弃对波斯臣民的保护权，即放弃那个曾成为战争的正式原因之一的保护权¹⁹⁵。奥地利、法国和其他国家没有进行任何海盗式的远征，也在波斯设立了领事馆。

最后，条约又强使德黑兰朝廷接纳默里先生，并指出要向这位绅士道歉，因为在沙赫给萨德拉萨姆的一封信中，默里先生被描述成一个“愚蠢、无知和蛮横的人”，“蠢材”和“拙劣、荒谬与讨厌透顶的文件”的起草人。费鲁赫汗当时也曾提出要向默里先生道歉，但那时英国政府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要免去萨德拉萨姆的职务，并且要让默里先生“在号角声，在横笛、竖琴、风笛、古琴、箏和其他乐器的乐声中”隆重地进入德黑兰。由于默里先生在任驻埃及总领事时，曾接受过巴罗先生私人赠送的礼物；由于他第一次到达布什尔时就把当时用法赫名义送给他的烟草运往市场公开出售；由于他曾像流浪的骑士那样由一个声誉可疑的波斯女人伴随着出入各处，因此，他不能使东方公众对英国人的廉洁和品格有过分的好感。所以，应当把迫使波斯再一次容许他进入波斯朝廷这件事看做是大有问题的成就。除了费鲁赫汗在战争开始前所提出的建议以外，整个条约没有包含任何一项值得为它浪费纸张，尤其是为它消耗金钱和抛洒鲜血的条款。英国由于远征波斯而获得的纯利润，总计起来可以认为有以下几项：大不列颠在整个中亚细亚激起了对它的仇恨；印度的不满情绪由于调走印度军队和加于印度国库的新负担而加剧了；几乎免不了重演

克里木惨剧；承认了波拿巴在英国和亚洲各国之间起正式的调解作用；最后，使俄国获得了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地区：一个在里海附近，另一个在波斯北部沿海边境上。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6 月 12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7 年 6 月 2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048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印度军队的起义¹⁹⁶

罗马的 *divide et impera* [分而治之] 是大不列颠大约一百五十年来用以保有它的印度帝国的重要准则。总合起来构成那个叫做印度的地理上的统一体的不同种族、部落、种姓、教派和国家彼此之间互相仇视——这种仇视一直是英国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基础。然而最近，这一统治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在征服信德和旁遮普¹⁹⁷以后，英印帝国不仅达到了它的自然界限，而且还抹去了印度各独立国家的最后痕迹。所有好战的土著部落都被制服了，所有严重的内部冲突都结束了，而最近奥德的被兼并¹⁹⁸则清楚地表明，残余的一些所谓独立的印度公国也只是在获得默许的条件下存在的。这样，东印度公司的地位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它已不再借助印度一部分地区去进攻另一部分地区，而是自己高高在上，整个印度都伏左它的脚下。它已成为唯一的征服者，而不必再从事征战。它手下的军队不需要再去扩展它的领地，而只要保持这些领地就行了。士兵变成了警察，两亿当地居民被英国军官指挥的 20 万土著军队所控制，而土著军队则又控制在仅有 4 万人的英国军队的手里。一眼即可看出，印度人民的顺从依赖于土著军队的忠诚，而英国当局建立土著军队，同时也就组织起了印度人民过去从未有过的第一支核心的反抗力量。土著军队可靠到什么程度，从

他们最近的起义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当英国对波斯的战争几乎把孟加拉管区内的欧洲兵全部抽光了的时候，这些起义就立刻爆发了。在这以前，印度军队里面就有过起义，但是这次的起义¹⁹⁹则带有特殊而严重的性质。西帕依团杀死了他们的欧洲军官；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忘却了他们相互间的仇隙，而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共同的统治者；“骚动由印度教徒开始，而实际上其结果是在德里拥立一位伊斯兰教的皇帝”；起义已经不仅限于少数地区；最后，英印军队中的起义与亚洲各大国对英国统治的普遍不满同时发生，因为在孟加拉军内的起义无疑与波斯战争和中国战争有密切的联系，——所有这些，都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情。

四个月前不满情绪在孟加拉军内开始蔓延的原因，据说是土著士兵担心政府要干涉他们的宗教信仰。当时曾发下了一种子弹，据说包裹子弹的纸被涂抹了牛油和猪油，而由于子弹必须要用嘴咬，土著士兵认为这是破坏他们教规的行为，因此这件事就成为地方性骚动的信号。1月22日，在离加尔各答不远的兵营里发生了纵火事件。2月25日，第十九土著团在贝汉普尔举行了起义，抗议给他们发下那种子弹。3月31日，该团被解散。3月底，驻巴腊克普尔的第三十四西帕依团的士兵们听任他们的一个伙伴在操场上拿着实弹的枪走出队列，号召他们起义，然后又开枪射击该团的副官和军曹长，并打伤了他们。在随后发生的一场格斗中，几百名西帕依袖手旁观，其余的则参加了格斗，用枪托殴打他们的军官。由于这件事，这个团也被解散了。4月发生的突出事件是阿拉哈巴德、阿格拉和安巴拉等地的孟加拉军的兵营被纵火烧毁，驻米拉特的轻骑兵第三团发生了起义，在马德拉斯军和孟买军内出现了类似的不满情绪。5月初，在奥德首府勒克瑙有人策划起义，

但是被亨·劳伦斯爵士的果断措施防止了。5月9日,米拉特轻骑兵第三团的起义士兵被押赴监狱去服刑,他们都被判处了不同期限的徒刑。次日傍晚,骑兵第三团的兵士和两个土著团(第十一团和第二十团)一起在操场上集合,杀死了企图要他们镇定下来的军官,放火烧毁了兵营,杀死了他们所能碰上的一切英国人。虽然这个旅的英军部分包括有一团步兵、一团骑兵和大量的骑炮兵和步炮兵,但是他们直到天黑才能行动。他们仅仅使起义者受到轻微的损失,就让起义者逃到郊外,奔往距米拉特约40英里的德里。在德里,由步兵第三十八团、第五十四团和第七十四团以及土著炮兵一个连组成的土著警备部队与起义者会合了。英国军官遭到袭击,起义者所遇到的一切英国人都被杀死,已故的德里莫卧儿²⁰⁰的继承人被宣布为印度皇帝。在派去援救米拉特——那里的秩序已经恢复——的部队中,5月16日到达的六个土著工兵-地道爆破兵连,杀死了指挥官弗雷泽少校,立刻逃出城,受到在骑炮兵部队和近卫龙骑兵第六团的几个连的追击。有五六十名起义者被打死,但其余的人都逃到了德里。在旁遮普的菲罗兹普尔,第五十七和第四十五土著步兵团起义,但是被镇压下去了。从拉合尔来的私人信件说,整个土著军队都处于准备公开起义的状态。5月19日,驻在加尔各答的西帕依企图夺取圣威廉堡²⁰¹,但未获成功。从布什尔调到孟买的三个团立刻被派往加尔各答。

在回顾这些事件时,你会对米拉特英军司令的行为感到惊奇:他迟迟才在战场上出现,而更令人不解的是他对起义者的追击那样松懈无力。因为德里位于朱木拿河右岸,而米拉特位于左岸,两岸之间仅在德里有一座桥相连,要切断逃亡者的退路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

这时，所有笼罩着不满情绪的地区都已经宣布戒严；主要由土著士兵组成的部队正从北面、东面和南面集中去对付德里；邻近地区的王公，据说都宣布效忠英国；已有信件送往锡兰，命令正在前往中国途中的额尔金勋爵和阿希伯纳姆将军的部队停止前进；最后，一支 14000 人的英国部队大约在两星期后即将从英国派往印度。无论印度现时的天气以及运输工具的极度缺乏对英军的调动可能造成多大的阻碍，德里的起义者大概不会进行什么长时间的抵抗就要投降的。然而，即使这样，这也仅仅是一场必然要发生的最可怕的悲剧的序幕而已。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6 月 30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7 月 15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065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欧洲状况。——法国财政状况²⁰²

昏睡似的沉寂，这是东方战争结束以后欧洲状况的特征，但这种沉寂正在很快地为活跃，甚至狂热所代替。就拿将有改革斗争的以及在印度遇到困难的大不列颠来说吧。诚然，伦敦“泰晤士报”向全世界说过，除了那些在印度有朋友的人之外，

“整个英国公众期待印度当前的消息的兴趣，并不比我们等待从澳大利亚来迟的轮船和马德里起义的结果的兴趣大”。

但是，同一天，同一份“泰晤士报”，在它的一篇金融论文中却摘下了那副傲慢的无所谓的假面具，暴露了约翰牛这样的真实的感情：

“在银行的金属储备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在一片丰收的景象下，像目前我们在证券交易所所看到的这种长期萧条几乎是前所未闻的。印度的情况所引起的惶恐不安，使得其他一切想法都退居次要地位，假如明天得到任何严重的消息，那末大概就会要惊慌失措。”

现在，当通过每一信件都能得到可靠的消息的时候，来推测在印度发生的事件的进程是徒劳无益的。但是，非常明显，假如在欧洲大陆爆发重大的革命，那末，把军队和舰队都调去对中国作战和镇压印度起义的英国就不能重新占据它在 1848 年和 1849 年所占据的那种傲慢的地位。同时英国也不能让自己袖手旁观，因

为东方战争和与拿破仑结盟最近把英国锁在大陆政策上了，因为英国传统的政党的彻底崩溃和英国创造财富的各阶级之间的日益增长的对抗性，使英国的社会结构比任何时候更厉害地遭受痉挛性的震荡。1848—1849年，英国的威力像个恶梦似的压在欧洲革命上，开始时，英国稍许有些害怕这个革命，后来，为了排遣对于英国来说是一种平常的沉寂，开始将革命当做一场戏来消遣，后来就有点背叛革命，后来又向革命卖弄风情，最后，靠革命大发其财。甚至可以说，在1846—1847年商业危机中遭到相当猛烈震荡的英国工业，由于1848年的革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欧洲大陆的新的革命，对英国来说，既不再是一场可以消遣的愉快的戏，也不再是建筑在别人的不幸上的投机机会，却将是它必须经过的一场严重的考验。

越过拉芒什海峡，我们会看到，彼岸的社会表层由于地下火的影响在徐徐波动并向上隆起。巴黎选举，与其说是新的革命的预兆，还不如说是新的革命的真正开端。卡芬雅克的名字被反对波拿巴的势力作为口号，这完全符合于法国过去的历史，正像当时奥迪隆·巴罗曾经领导反对路易·菲利浦的势力一样。对于人民来说，卡芬雅克像以前的奥迪隆·巴罗一样，只是一种借口而已，然而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他们两个都体现出一个严肃的思想。革命开端时所借用的名字，从来不会在革命胜利之日被写在革命的旗帜上。在现代社会里，革命运动为了获得某些成功的机会，开始时就必须借用那些虽然有反对现行政府的情绪，但是对现行社会制度却全部接受下来的人们的旗帜。总之，革命应当正是从执政阶级的手里获得进到官方舞台的入场券。

只有注意巴黎交易所的状况：巴黎交易所的波动是发生在竞

选鼓动之前,并且比竞选鼓动延续得久,才能真正了解巴黎的选举以及巴黎的逮捕和巴黎的迫害。甚至在 1856 年最后三个月,整个欧洲遭受金融危机的时候,巴黎交易所也没有经受过像这一年的整个 6 月份和 7 月初所发生的全部有价证券那样惊人和不断跌价的事情。此外,这次没有出现下跌和上涨的突变过程,恰恰相反,一切都按着通常跌落的规律十分有条理地下降,也是按照这种规律仅仅在最后阶段跌落才变得急剧起来。Crédit Mobilier²⁸的股票,在 6 月初约值 1300 法郎,到 6 月 26 日下跌为 1162 法郎,7 月 3 日为 1095 法郎,7 月 4 日为 975 法郎,而到 7 月 7 日就已经跌到 890 法郎了。法兰西银行股票 6 月初市价为 4000 法郎以上,到 6 月 26 日,尽管赋予了该银行新的垄断权和特许权,但是股票仍然下跌到 3065 法郎,到 7 月 3 日又下跌为 2890 法郎,一直到 7 月 9 日股票的价格未曾超过 2900 法郎。在这种程度内长时间跌价的,还有三厘无期公债和下列主要铁路的股票,如北部铁路、里昂铁路、地中海铁路、铁路大联合公司以及其他所有股份公司的股票。

新的法兰西银行法,暴露了波拿巴的国库绝望的处境,同时也动摇了法兰西银行行政本身的社会信任。Crédit Mobilier 的最近一份报告书非常明显地表现了这个机关的空虚性,暴露了与它有利害关系的广阔范围,同时告诉了公众在公司董事们和皇帝之间发生了斗争,以及在准备某种财政 coup d'état。事实上,Crédit Mobilier 为了履行自己的最急迫的义务,不得不将自己拥有的约 2000 万法郎的有价证券抛向市场。就在这个时候,铁路股份公司和其他股份公司为了支付自己的股息和为了获得资金来继续已进

见本卷第 241—245 页。——编者注

直译是：政变；这里是：改革。——编者注

行的工作,或者来开始工作,同样也必须出卖自己的有价证券,向自己旧的股票索取新的股金或发行新股票获得资本。由此可见,法国证券交易所的持久的萧条绝不是由于纯粹偶然情况造成的;它将随着每次紧接着的付款期限的来到,以更尖锐的形式重复着。

现在这种病症使人惊慌的程度,从下列这个事实就可看出:第二帝国伟大的财政巫医艾米尔·贝列拉已经登场,并且向路易-拿破仑呈递了一份报告,其中他引用了路易-拿破仑于1850年向农商总会演说中的一段话:

“信任——我们将不会忘记这点——是物质利益的心理上的一面,是使肉体复苏的灵魂。它能唤起坚定的信心,因而能成十倍地增加所生产的一切东西的价值。”

然后,贝列拉先生借助我们的读者都已知道的手法来说明在最近五个月内全国减少了98000万法郎的证券。他以这样不祥的话结束了自己的牢骚:“害怕的预算几乎等于法国的预算。”如果像贝列拉先生所说的那样,除了法国为维持住帝国而缴纳的2亿美元的税金以外,由于害怕失掉帝国,法国还应当付出的就更要多得多,那末,这个当时只是为了节约钱而建立的这么宝贵的机关的末日,实际上是屈指可数了。既然帝国财政上的混乱造成帝国政治上的困难,那末后者又必定会影响前者。正是从法兰西帝国的这种情况来看不久前西班牙和意大利所发生的风潮²⁰³,以及斯堪的那维亚所面临着困难才具有其正确的意义。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7月10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1857年7月27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075号

卡·马克思 印度起义

1857年7月17日于伦敦

自从德里落到起义的西帕依手中和他们拥立了莫卧儿皇帝以后，到6月8日正好一个月了。但是，认为起义者能够对抗英军、守住这个印度古都的任何想法，都是荒谬的。德里的工事只有城墙和简陋的护城壕，而周围瞰制城市的高地已经为英国人所掌握。他们甚至不必轰毁城墙，也可以采用切断城内水源的简单办法，在很短时期内迫使德里守军投降。并且，那些杀死了自己的军官、挣脱了纪律的束缚、连一个可以赋予最高指挥权的人都推选不出的形形色色的起义士兵，当然很少有可能组织认真而持久的抵抗。使混乱局势更加混乱的，是德里的这支庞杂的队伍天天都有孟加拉管区各地的新的起义部队络绎不绝地前来加入，这些起义部队好像都按照一个预定的计划投身到这个命运已经注定的城市里来。5月30日和31日，起义者冒险出击两次，但均被击退，受到重大损失。这两次出击看来都是在绝望之下进行的，而不是由于有任何自信或者自认为有力量。唯一令人奇怪的倒是英军行动的迟缓，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由于天气酷热和缺乏运输工具的缘故。据法国人的报道，除总司令安森将军外，还有约4000名欧洲兵已死于致命的酷暑。就连英国报纸也承认，在德里城下的战斗中，烈

日对士兵的危害甚于敌人的枪弹。由于缺乏交通工具，驻在安巴拉的英军主力在向德里的行进中用了差不多二十七天的工夫，这样每天平均只运动一个半小时左右。造成进一步迟延的原因，是安巴拉没有重炮，因而必需从最近的军械库调去攻城炮兵纵列，而最近的军械库却远在萨特里日河彼岸的皮劳尔城。

尽管如此，德里陷落的消息仍然指日可待；但以后又将怎样呢？虽然印度帝国的传统中心被起义者充分掌握达一个月之久这一事实可能成了最强烈的酵素，使孟加拉军全部瓦解，使起义和逃亡现象从加尔各答向北扩展到旁遮普，向西扩展到拉吉普坦纳，并且使英国的统治从印度的一端到另一端发生动摇，但是认为德里的陷落（尽管它可能在西帕依队伍中引起惊慌）会足以扑灭起义的火焰，阻止它的进展，或者恢复英国的统治，仍然是极大的错误。拥有将近 8 万人的整个土著孟加拉军队（其中大约有拉吉普特人 28000 名，婆罗门教徒，23000 名²⁰⁴，伊斯兰教徒 13000 名，较低种姓的印度教徒 5000 名，其余是欧洲人），已有 3 万人起义、逃亡或被开除。至于这支军队中其余的士兵，有几个团已公开宣称他们将是忠于宣誓的，仍将支持英国当局，但土著部队目前正在从事的事情不在此限：他们将不协助当局反对土著团的起义者，而是相反地，将援助自己的“巴依”（兄弟）。从加尔各答起，他们几乎在每一个警备区都是这样做的。土著团曾消极了一个时期，但是一当他们相信自己有了足够的力量，他们就举行起义。伦敦“泰晤士报”一位驻印度的记者对于还没有公开表示态度的团和还没有与起义者一致行动的土著居民的“忠诚”说得非常透彻。

他写道：“如果你读到一切平安无事，你就应该了解为：土著部队还没有公开起来叛变；不满的居民还没有公开造反，他们不是力量还太弱，就是自

己感到力量不强，要不然就是在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机。当你读到某个孟加拉土著骑兵团或步兵团‘表示忠诚’时，你就应该了解为：在说得这样动听各团中只有一半是真正忠于宣誓的，另外一半只是在装样子，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到来时使欧洲人措手不及，或者借此避免嫌疑，从而更便于帮助他们那些参加叛乱的伙伴。”

在旁遮普，只是用解散土著部队的方法才防止了公开的起义。在奥德，可以说英国人只保有勒克瑙的驻劄官邸²⁰⁵，而在其他所有的地方，土著团都起义了，他们携带枪支弹药逃跑，把英国人的房子全部烧光，并且跟已经起义的居民联合起来。现在，英军的真正处境由下面这事实可以看得最清楚：英国人不得不在旁遮普和拉吉普坦纳建立流动部队。这说明，英国人既不能依靠他们的西帕依部队，也不能依靠土著居民来维持他们分散的各部队之间的联系。正像法国人在比利牛斯半岛战争²⁰⁶时期一样，他们只是控制住自己军队所占领的据点以及这些据点所瞰制的周围地区，而被分隔开的各部队之间的联系，则依靠流动部队来维持；但流动部队的活动本身就是极不可靠的，他们活动的地区愈广，自然效果便愈差。英军兵力确实不足，还可以从下面这事实得到进一步的证明：英军为了把财物从受起义威胁的警备区运出来，不得不利用西帕依来担任护送，而西帕依毫无例外地在半途起义，带着托付他们护送的财物逃跑了。由于从英国派去的部队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在11月以前到达，同时从马德拉斯管区和孟买管区抽调欧洲部队将更加危险（因为马德拉斯的西帕依第十团已经显露出不满的征兆），所以，在整个孟加拉管区征收普通税的一切念头都必须打消，而瓦解的过程也只好听任它继续下去。即使我们假定，缅甸人不会乘机行动，瓜廖尔的摩诃拉扎将继续支持

英国人控制着印度最精锐部队的尼泊尔统治者将继续保持平静，怀有不满情绪的白沙瓦不至于同不安分的山区部落联合起来，波斯的沙赫不会傻到从赫拉特撤退，——即使这样，整个孟加拉管区仍然需要重新征服，整个英印军队仍然需要重新建立。这件大事所需的费用将全部落在英国人民的肩上。至于格兰维耳勋爵在上院提出的意见，说东印度公司能够依靠发行印度公债来筹措必要的款项，它的可靠性可以从西北各省的骚乱局势对孟买金融市场的影响来判断。当时，印度本地的资本家立即感到恐慌，从银行提出大量款项，政府的有价证券几乎再也找不到买主，而大规模的囤积不仅在孟买，而且在它的郊区都开始出现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7 月 17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7 年 8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082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印度问题

1857年7月28日于伦敦

迪斯累里先生昨天晚上在“死寂的下院”²⁰⁷所发表的三小时的演说，如果不是去听它，而是去读它，只会显得好些，而不会显得坏些。一个时期以来，迪斯累里先生喜欢作绝顶庄严肃穆的演说，他故意慢条斯理地吐字，一五一十地平铺直叙而毫不动声色。不管这种品质如何符合他关于一个即将做大臣的人所应有的尊严的特殊概念，但对他的不幸的听众来说却是一种真正的折磨。过去他甚至能把陈词滥调变得像讽刺诗那样的锋利。而今他竟能把讽刺诗埋葬在枯燥无聊的尊严的俗套下面。像迪斯累里先生这样一个操匕首比操长剑更熟练得多的演说家，不应该忘记伏尔泰的一个警告：《Tous les genres sont bons excepté le genre ennuyeux》。

迪斯累里先生除了他目前的词令所具有的这种形式上的特点以外，从帕麦斯顿当政以来，在自己的议会演说里小心地避免任何哪怕稍微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他不是为了使他的提案获得通过而发表演说，而是为了让听众听他的演说而提出这些提案。他

“除了乏味的体裁之外，其余的一切体裁都是好的。”（伏尔泰喜剧“流浪子”的序言）——编者注

的提案可以叫做自相辩驳的提案，因为就它们的内容来说，如果它们被通过了，对提案的反对者并无损失，如果它们被否决了，对提案的起草人也无害处。实际上，提案所要的不是被通过或被否决，而只不过要人对它们置之不理。它们既不是酸，也不是碱；它们是天生的中性物。不是发表演说来促进行动，而是行动的假象为发表演说提供借口。实在，也许这就是议会演说的典范的和完美的形式；但是即使这种议会演说的完美形式也无论如何摆脱不了议会制的一切完美形式的命运，也就是：列入令人讨厌的东西之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动作是支配戏剧的法律。政治演说也是这样。迪斯累里先生关于印度起义的演说可以作为有用知识普及协会的小册子出版，或者可以在工人学校发表，或者可以作为悬奖征文送到柏林科学院去。他的演说对地点、时间和发表演说的理由所持的无所谓态度，证明他的演说既不适合地点、时间，也不符合理由。关于罗马帝国衰落的一章在孟德斯鸠或吉本的书²⁰⁸中是可以令人读得津津有味的，但是如果把它放在一个罗马元老的口上，那它就成了非常荒谬的东西，因为罗马元老的专门职责刚好是要防止罗马帝国的衰落。的确，可以设想某一个独立的演说家，由于认识到自己不可能对事件的实际进展施加影响，而只限于采取一种冷嘲热讽的不关痛痒的态度，在我们现代的议会里能够扮演一个既不失尊严，也不乏风趣的角色。已故的加尔涅-帕热斯先生——不是临时政府的加尔涅-帕热斯，而是路易-菲力浦时代有名的众议院议员——就曾经多少成功地扮演过这样的角色；但是迪斯累里先生，这个已失去作用的党²⁰⁹的公认领袖，

亚里士多德“诗学”第6章。——编者注

甚至会把这方面的成功也认为是极大的失败。印度军队的起义无疑地提供了一个练习演说艺术的大好机会。然而如果撇开迪斯累里先生发挥这个题目所用的非常枯燥的方式不谈，那末他选来作为发表演说的借口的提案的实质究竟何在呢？恰好就是没有提案。他装做渴望读到两个官方文件，但是对其中一个文件是否存在他不完全相信，至于另一个文件，则他认为与他所谈的对象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他的演说同他的提案，除了提案是一篇无对象的演说的先声，而对对象又不值得发表一篇演说以外，就没有任何接触之点，可是，作为一个未参加政府的英国最杰出的国家活动家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迪斯累里先生的演说应该引起其他国家的注意。我满足于用他 *ipsissima verba* [本人的话] 来对他的“关于英印帝国没落的见解”作出简短的分析：

“印度的骚乱是军事叛乱呢，还是民族起义？军队的行为是某种突然冲动的后果呢，还是有组织的阴谋的结果？”

迪斯累里先生认为，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实质所在。他肯定说，直到最近十年间，不列颠帝国在印度都是采用 *divide et impera* [分而治之] 的老原则，但是据说在实际实行这一原则时，政府对组成印度的各种民族曾采取爱护的态度，设法不干涉它们的宗教事务，并保护它们的土地所有权。西帕依军队曾作为吸收国内不稳定分子的安全阀。但是近几年来，在管理印度方面采取了一种新的原则——破坏民族的原则。这一原则是靠强力消灭当地王公的权力，破坏既定的所有制关系相干涉人民的宗教事务的方法来实现的。1848年，东印度公司的财政困难达到了必须不择手段增加收入的地步。这时公布了参事会²¹⁰的一份报告，其中几乎完全公开宣布了一项原则，按照这项原则，增加收入的唯一方法是靠兼

并土著王公的领地来扩大英国的领土。因此，萨塔腊公国的拉扎死后，东印度公司不承认他的养子和继承人，而把该公国并入公司的领地。从此，每当土著王公死去而未留下直接继承人时，就采用兼并制度。过继原则这一印度社会的基石经常遭到政府的忽视。因此，从 1848 年至 1854 年有十几个独立王公的领地被强制并入不列颠帝国。1854 年贝腊尔公国被强力侵夺，其领土有 8 万平方英里，人口 400 万至 500 万人，并拥有大量宝藏。迪斯累里先生最后提到对奥德的强行兼并，这一兼并使东印度政府不仅与印度教徒发生冲突，而且与伊斯兰教徒发生冲突。然后迪斯累里先生说明了，在最近十年间，新的管理制度如何破坏了印度的既定所有制关系。

他说道：“过继法的原则不是印度的王公和公国的特权，它在印度斯坦对每一个握有土地所有权和信仰印度教的人都有关系。”

我来引用演说里的一段话：

“由于为王公服公务而持有土地的大领主（或称札吉达尔）和不纳任何土地税的伊纳达尔（这种人如果说不是完全确切地，那末至少在一般意义上相当于我们的自由农）²¹¹——印度人数最多的这两类人，在没有直接继承人时，总是利用这种过继原则得到他们遗交其地产的继承人的。这两类人的利益由于萨塔腊的被兼并而受到触犯，也由于我已经提到的那十个不大的，然而独立的王公的领土的被兼并而受到触犯，但是当贝腊尔被兼并时，则不仅触犯了这两类人的利益，而且把他们吓慌了。谁能感到自己是不可侵犯的呢？哪个领主，哪个没有亲生孩子的自由农能感到自己在印度是不可侵犯的呢？（赞同的呼声）所以害怕不是没有道理的；行动方式和广泛采取的办法完全可以引起人的害怕。在印度开始收回札吉和伊纳是第一次。毫无疑问，以前也有过调查占有权的无礼尝试，但是谁从来也没想到过会废除过继法；所以任何

印度王公的称号。——译者注

政权，任何政府从来也未能取走没有留下直接继承人的所有者的札吉和伊纳。这里新辟了一个收入来源；但是就在这一切影响到上述两类印度教徒的思想趋向的时候，政府又采取了另一破坏既定所有制关系的步骤，我现在应该提请下院注意这个步骤。议员们一定读过在 1853 年委员会上所做的证词，因此该知道印度存在着很大一部分不纳土地税的土地。在印度免除土地税比在我国免除土地税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整个说来在印度土地税是国家征收的唯一的一种税。

很难查出这些土地赏赐的起源，但是毫无疑问，土地赏赐是远古以来就有的。土地赏赐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除了极为流行的私人免税领地之外，还有属于寺院和教堂的免纳土地税的大量土地赏赐。”

英国总督以存在有非法要求免税的事实作为借口，着手对印度地产占有权进行调查。根据 1848 年规定的新办法，

“这一占有权调查计划曾经立即执行，以证明政府的威力、当局的魄力并找出国家收入的最丰富的源泉。为此目的在孟加拉管区和邻近地区成立了土地占有权调查委员会。这样的委员会在孟买管区也成立了，此外，还命令在新设省份内进行土地整理，以便在这种土地整理结束后，委员会的工作能够得到充分的成果。现在无疑，最近十年来，这些调查印度的不纳税地产的委员会的活动一定规模很大，成效卓著。”

迪斯累里先生估计，每年从土地所有者手里收回的地产在孟加拉管区不少于 50 万英镑，在孟买管区不少于 37 万英镑，在旁遮普不少于 20 万英镑等等。英国政府并不满足于这一掠夺当地人财产的方法，它还停发了当地达官贵人的退休金，而根据条约这是应该发给的。

迪斯累里先生说道：“这是一种新的没收方法，并且规模最大，最惊人和最可耻。”

接着，迪斯累里先生叙述干涉当地人的宗教事务的情况——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必要谈。根据所有这些前提，他得出结论说，印

度目前的骚动不是军事叛乱，而是民族起义，西帕依在起义中只起着工具的作用。他在结束演说时，劝告政府放弃它目前的侵略政策，而注意改善印度的国内情况。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7 月 17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7 年 8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091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来自印度的消息²¹²

1857年7月31日于伦敦

最近一班印度邮件带来了6月17日以前来自德里的消息以及截至7月1日由孟买发出的消息，证实了最阴暗的预测。当督察委员会²¹³主席维农·斯密斯先生最初把印度起义的消息通知下院的时候，他满有把握地宣称，下一班邮件必将带来德里已被彻底消灭的消息。邮件来了，可是德里依然没有“从历史上被勾销掉”。于是人们就说，炮兵纵列最早要在6月9日才能开到，因此对这座法定要毁灭的城市的轰击必须推迟到这个日子。但是6月9日过去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也没有发生。12日和15日倒是发生了一些事件，不过不如说它们带有相反的性质，因为不是德里遭到英国人的轰击，而是英国人遭到了起义者的进攻，然而起义者的屡次出击都被打退了。这样，德里的陷落又再度延期，不过现在人们已不仅仅说这是由于缺乏攻城炮，而且还说是由于巴纳德将军决定等待援军，因为他的兵力——约3000人——完全不足以攻占这座由3万名拥有各种军需品的西帕依守卫着的古都。起义者甚至在阿季米尔门外建立了营地。在此以前，所有的军事著作家一致认为，一支3000人的英国部队，完全足以击溃拥有3万或4万人的西帕依军队；否则，用伦敦“泰晤士报”的话来说，英国

什么时候才能“再度征服”印度呢？

目前，在印度的英国军队共有 3 万人。在最近半年内从英国最多能派出 20000 或 25000 人，其中 6000 人要补充在印度的欧洲军队，而其余的 18000 或 19000 人，由于在途中遭到的损失，由于气候条件而遭到的损失以及其他原因，剩下来能够上战场的也就减少到将近 14000 人。英国军队必须下决心在力量对比极悬殊的情况下同起义者作战，要不然就根本不同他们作战。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英国军队在德里周围集中得这么慢。如果在目前这个季节，炎热竟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碍，而在查理·纳皮尔爵士那个时候并不是如此，那末过几个月等到欧洲军队抵达后，雨季将更有理由成为按兵不动的借口了。不应当忘记，现在的起义实际上在 1 月就已经开始，因此英国政府老早就已得到必须时刻准备作战的警告了。

尽管英国军队包围了德里，但西帕依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把德里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当然就产生了很自然的后果。起义蔓延到加尔各答的大门前，50 个孟加拉团已不复存在，孟加拉军全军复没，而分布在广大地区的、被围困在孤立据点上的欧洲军队，不是被起义者消灭，就是被迫拚命死守。在加尔各答，当据说经过周密策划的准备突然占领政府机关所在地的阴谋被揭露以后，当驻扎当地的土著团被解散以后，基督教居民组织了志愿队。在贝拿勒斯，企图解散土著团的做法，遭到了锡克教徒²¹⁴部队和非正规骑兵第十三团的反对。这件事有着极大的意义，因为它表明，锡克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一样，是同婆罗门教徒一致的，这样，各阶层的居民迅速地结成了一个反对英国统治的共同联盟。英国人曾坚信，西帕依军队是他们在印度的主力。现在他们突然完全确信，

这支军队对他们具有莫大的危险。还在不久以前就印度问题进行辩论时，督察委员会主席维农·斯密斯先生曾说道，“完全可以断言，土著王公和起义之间没有丝毫的联系”。事隔两天，同一个维农·斯密斯却不得不公布一份紧急报告，其中有这样一段不祥的话：

“据截获的文件证明，前奥德国王与阴谋活动有牵连，已于6月14日被押入威廉堡，其随从被解除武装。”

以后还会出现另外一些事实，这些事实甚至能使约翰牛也相信，他认为是军事叛乱的运动，实际上是民族起义。

英国报刊装出十分满意的样子，表示它们相信起义还没有蔓延到孟加拉管区以外，并且孟买军和马德拉斯军的忠诚丝毫不容置疑。但是，这种对局势的乐观看法似乎同最近一班邮件带来的关于奥郎加巴德爆发了尼赞的骑兵起义的消息正相矛盾。由于奥郎加巴德是孟买管区辖属的奥郎加巴德区的中心，实际上，最近一班邮件是宣告孟买军队中已开始起义。诚然，据说奥郎加巴德的起义已被伍德伯恩将军立即镇压下去了。但是，难道不是曾经有人说过，米拉特的起义也是被立即镇压下去的吗？勒克瑙的起义不正是在被亨·劳伦斯爵士镇压下去后，过了两个星期，又以威胁性更大的形式重新爆发了吗？难道记不得，印度军队中爆发起义的最初消息是与治安已经恢复的消息同时传来的吗？尽管孟买军和马德拉斯军主要是由属于下等种姓的人组成的，但各个团都有近百个拉吉普特人——这个数目完全足以构成与属于上等种姓的孟加拉军起义者相联系的环节。人们断言，旁遮普平静无

事，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却获悉，“6月13日在菲罗兹普尔执行了军事法庭的判决”，而伏恩的部队——旁遮普第五步兵团——“因追击第五十五土著步兵团的出色行动”而受到褒奖。应当承认，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平静”。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7月31日
载于1857年8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09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印度起义的现状

1857年8月4日于伦敦

当最近一班印度邮件把大量报道（它们的极简略的内容早先已在电讯中报道过了）带到伦敦以后，德里被攻占的谣言就迅速传开，而且博得这样普遍的信任，以致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行情都受到了影响。这是攻占塞瓦斯托波尔的骗局²¹⁵的翻版，只是规模小一些而已。只要对据说是直接提供了这种愉快消息的马德拉斯报纸的日期和内容略加考察，真相即可大白。马德拉斯的报道自称是根据6月17日来自阿格拉的私人通讯写成的，但是6月17日拉合尔的官方战报却宣称，截至16日午后4时，德里城下一切还是平静的；同时7月1日的“孟买时报”²¹⁶写道：“巴纳德将军在击退敌人若干次出击后，于17日晨尚在等待援军。”关于马德拉斯报道的日期，可以说的就是这些。至于它的内容，则显然是根据6月8日巴纳德将军关于攻占德里附近高地的战报以及关于被围攻者在6月12、14日出击的一些私人报道写成的。

德里市区和兵营的军用平面图，终于由劳伦斯上尉根据东印度公司未公布过的平面图绘制出来了。由该图可以看出，德里的防御工事既不完全像人们最初断言的那样差，也不完全像人们现在力图证明的那样坚固。德里有一座无论用强攻或正规围攻都可

以攻下来的城砦。城墙长 7 英里多，有坚固的石砌部分，但不很高。护城壕狭窄，也不很深，侧防工事不能以纵射火力有效地掩护中堤。每隔一段距离就有炮塔。它们呈半圆形，并开有枪眼。塔内有螺旋梯由墙顶往下通到与护城壕相齐的弹药室，弹药室的墙上开有供步兵射击的射孔，这在强攻队通过护城壕时，可能造成很大的麻烦。保护中堤的棱堡内设有供步枪射手用的踏垛，但它们可能被炮火压制。当起义爆发时，城内的军械库尚有 90 万发子弹，两个配备齐全的攻城炮兵纵列，大量的野炮和 1 万枝步枪。火药库在很久前已根据居民的要求迁至德里城外的兵营内，还存有不下 1 万桶火药。巴纳德将军于 6 月 8 日攻占的制高点位于德里的西北面，那里在城墙外面也设有兵营。

从这一根据可靠的平面图所做的说明可以看出，假如目前在德里城下的英军在 5 月 26 日就已经到达，——而他们如果配备有足够的运输工具，本来是可以在那时到达的，——那末，这个起义的中心只要经过一次 *coup de main* (坚决的攻击) 就一定会被摧毁。考察一下那张先在“孟买时报”上发表、然后由伦敦各报转载的列有 6 月底以前起义的各团兵力和起义日期的一览表，就能无可置疑地证明，5 月 26 日占领着德里的起义者还只有四五千人，也就是说，只有一支根本不能设想可以防守 7 英里长的城墙的兵力。同时，米拉特距德里仅仅 40 英里，自 1853 年初起，该地一直是孟加拉炮兵总部的所在地，有供科学研究用的重要的弹药厂以及野战炮兵和攻城炮兵的教练场，这就更令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军司令官竟连进行一次 *coup de main* 所必需的兵器都没有，而英军在印度向来是惯于以这种攻击压倒土著军队的。起初听说他们是在等待攻城炮兵纵列，后来又听说他们需要援军，而

现在，消息最灵通的伦敦报纸之一“新闻报”告诉我们说：

“我国政府确实知道，巴纳德将军缺乏给养和弹药，而枪弹每人已只剩24发。”

根据巴纳德将军6月8日关于占领德里附近高地的战报，我们看出，他本来打算在次日攻击德里。然而他不仅没有实现这一计划，反而由于某种意外情况，只得对被围攻者采取守势了。

目前很难计算双方的兵力。印度报纸的报道完全是自相矛盾的；但是我们认为，波拿巴派的“国家报”²¹⁷刊载的一篇印度通讯，可能有某些可信之处，这篇通讯似乎是由加尔各答的法国领事发出的。根据他的报道，6月14日巴纳德将军的兵力约为5700人，如果加上该月20日应当开到的援军，其数量预计可增加一倍(?)。他共有30门重攻城炮；同时起义者的兵力估计为4万人，他们组织很差，但有充足的攻防器材。

我们 en passant [顺便] 说一下，在阿季米尔门外(大概在加济汗陵墓附近)设营防守的3000名起义者，并不像伦敦某些报纸所想像的那样与英军直接对峙，而是恰恰相反，在他们与英军之间还隔着整个德里城，因为阿季米尔门在德里新城的西南角，在古德里废墟以北。在城市的这一边，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起义者再设立几个这样的兵营。在城市的东北面，即靠河的一面，起义者控制着舟桥，并且仍与他们的同胞们保持着经常联系，能够不断地获得人员和给养的补充。德里形成了一个与本国后方不断保持联系的要塞，就像塞瓦斯托波尔一样，只是小一些罢了。

英军的行动迟缓，不仅使被围攻者能集中大量兵力进行防御，

而且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已守住德里达数星期之久，并多次以出击袭扰欧洲军队，再加上他们每天都得到整个军队纷纷起义的消息，这无疑就增强了西帕依的士气。英军兵力不多，想围困城市自然是不行的，而必须采用强攻的方法。但是，如果下一班邮件还不带来攻占德里的消息，那末，我们几乎可以确信，在最近数月内英军的任何重大的行动都得停止。这时雨季将已来临，“朱木拿河的深而急的流水”将灌满护城壕而使城市的东北面得到保护，同时 75—102 度的气温加上每天平均 9 时的降雨量，将使欧洲人受到道地的亚洲霍乱的折磨。那时，埃伦伯勒勋爵所说的这段话就会得到证实了：

“我认为，亨·巴纳德爵士是不能停留在他现在的地点的，因为气候不允许。当雨季开始时，他将失去与米拉特、安巴拉和旁遮普的联系；他将被困在一个十分狭窄的地带内，那时他的处境——我不想说这是险境，——只能使他遭到瓦解和复灭的后果。我相信他是会及时撤离该地的。”

因此，德里的问题就完全决定于巴纳德将军是否得到足够的兵力和弹药，以便在 6 月的最后一两个星期内对德里发动强攻。从另一方面看，巴纳德将军的撤退会大大增强起义者的士气，并可能促使孟买军和马德拉斯军公开参加起义。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8 月 4 日
载于 1857 年 8 月 18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09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东方问题

1857年8月11日于伦敦

曾有人要我们相信，东方问题大约在十四个月前已经由于签订巴黎和约而获得解决，但是现在，由于君士坦丁堡外交活动停顿，它又成为悬案了。法国、俄国、普鲁士和撒丁的大使馆在这里降下了它们的国旗，同土耳其政府断绝了关系。英国和奥地利的大使，支持御前会议反对这四国的要求，同时宣称他们不怕对这一冲突所引起的后果负任何责任。

这些事件发生在本月6日。戏本身的情节相当陈旧，但是 *dramatis personae* (剧中人物) 交换了所扮演的角色，加上又是首次 *mise en scène* (演出)，因此这情节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新颖的外观。这一次打先锋的已不是俄国，而是法国。法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图温奈尔先生，用有点装腔作势的、缅甸科夫式的语气，强硬地要求土耳其政府撤销在莫尔达维亚的选举，他说这是因为莫尔达维亚的卡马康·沃戈里德斯违反巴黎和约，通过不能容忍的干涉使反对合并的人获得了多数的代表名额²¹⁸。土耳其政府拒绝接受这个要求，但表示同意把卡马康召到君士坦丁堡，由他答

复对他的行动提出的指责。图温奈尔先生傲慢地否决了这个建议，坚持要委托设在布加勒斯特的欧洲改组委员会对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进行调查。由于在这个委员会中法国、俄国、普鲁士和撒丁的代表占多数，也就是说，恰好是那些赞成多瑙河流域诸省合并、指控沃戈里德斯进行非法干涉的国家的代表占多数，因此受大不列颠和奥地利大使挑拨的土耳其政府，自然拒绝让自己的死对头来裁决自己的事务。不幸也就从此产生。

显然，现在争执的真正问题，仍然是那个曾经引起对俄战争的问题，这就是：多瑙河流域诸省与土耳其的实际脱离；这次是企图不以“物质保障”的形式，而以各公国合并起来由一个欧洲傀儡王公统治的形式，来实现这种脱离。俄国以它特有的沉着、谨慎和耐心，从不离开它既定的目标。在只对它一国有利害关系的问题上，它已经能够把一部分敌人团结起来反对其余的敌人，因此现在可能指望依靠一部分人使另一部分人服从它。至于波拿巴，则他抱着各式各样的动机。他指望在国际纠纷中为国内不满情绪找到出路。他以俄国肯赏光戴上法国的面具出场并且让他来主持舞会，而感到无限荣幸。他那虚构的帝国不得不满足于戏剧性的胜利，而且在内心深处，波拿巴可能希望借助俄国把一个属于波拿巴王朝的人扶上通过外交谈判而人为地建立起来的罗马尼亚傀儡王座。自从闻名的1850年华沙会议²¹⁹以及奥地利军队进入德意志北部边境以来，普鲁士只要有可能自己不吃亏，总是想方设法要对奥地利进行报复。撒丁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一场同奥地利的冲突上，但这种冲突已不是靠着同意大利革命结成危险的同盟来挑起，而是背着大陆的专制强国来挑起。

正如同俄国极力要实现多瑙河各公国的合并一样，奥地利极

力反对这种合并。奥地利很了解这个方案的主要动机，它的锋芒更直接地是指向奥地利自己的威力，而不是指向土耳其政府的威力。最后，主要靠故意做作的反俄情绪来博得声誉的帕麦斯顿，自然必须假装和弗兰茨-约瑟夫一样真正感到恐惧。他无论如何必须假装他是同奥地利、土耳其政府一致的，他只有在受到法国的逼迫时才会对俄国的压力让步。这就是各有关方面的立场。在这里，罗马尼亚人民只是一个借口，他们根本不被人放在眼里。甚至极端狂热的人也未必会这样轻信，以为路易-拿破仑真心拥护真正的人民选举，而俄国真的热切希望加强罗马尼亚民族，——从彼得大帝以来，消灭罗马尼亚民族始终是俄国进行阴谋和战争的目的。

几个自封的罗马尼亚爱国者在布鲁塞尔创办的一家名为“多瑙河之星”²²⁰的报纸，不久前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莫尔达维亚选举的文件；我想在这里把其中最重要的几件给“论坛报”翻译出来。这些文件就是莫尔达维亚的卡马康尼古拉·沃戈里德斯从他的父亲斯蒂凡·沃戈里德斯，他的姻兄弟、土耳其驻伦敦大使穆苏卢斯，他的弟弟、土耳其驻伦敦大使馆秘书亚·沃戈里德斯，他的另一个姻兄弟、莫尔达维亚政府驻君士坦丁堡的 *chargé d'affaires* [代办] 穆·弗提阿德斯，以及奥地利派驻土耳其帝国的使节普罗克希男爵等人那里收到的信件。这些信是前些时候从雅西的卡马康宫中盗窃出来的，现在“多瑙河之星”就以它掌握着这些信的原稿而大肆吹嘘。“多瑙河之星”显然认为，撬锁盗窃是搜集外交情报的十分体面的方式；看来，欧洲的一切官方报刊也都赞同它的这种观点。

“多瑙河之星”发表的关于莫尔达维亚
选举的秘密信件

摘自土耳其驻伦敦大使穆·康·穆苏卢斯
给卡马廉沃戈里德斯的信

1857年4月23日于伦敦

“我秘密地告诉您，克拉伦登勋爵赞同您就出版问题给法俄两国领事的答复。他认为这一答复是恰如其份、公平合理的。我在勋爵阁下面前称赞了您在当前形势下的明智做法。我写信给土耳其政府，设法保证您能够得到您理所应得的高升。您一定会使这个美好的国家摆脱那些不配称为莫尔达维亚人的卖国贼力图使它陷入的危险境地。他们由于追求物质利益和奖赏，竟堕落到促使自己的祖国莫尔达维亚变成瓦拉几亚的附庸，想把莫尔达维亚从自治的民族中一笔勾销。他们不顾当代人和后代的咒骂，竟想借口建立一个幻想的罗马尼亚，而把莫尔达维亚和莫尔达维亚人贬低到爱尔兰和爱尔兰人的地位。您蔑视这伙厚颜无耻地自称民族派的败类，是履行一个忠诚、英勇的爱国者的责任。在极力扩张国土的瓦拉几亚，主张合并的人可以称自己为民族派；但是在莫尔达维亚，持这种主张的人只能称为反民族派。在这里，唯有反对合并的才是民族派……英国政府极端反对合并。这一点不必怀疑。我秘密地告诉您，有关这一点的指示，不久前已发给英国驻布加勒斯特的代办（他是我的朋友），阁下很快就可看到这个指示的结果。您在出版问题上给了法俄两国领事适当的答复……您作为一个自治公国的首领的责任，就是回击外国人对内政的可耻的和无法无天的干涉行为。这两国的领事处境狼狽，他们的政府只有用召回他们的办法去帮助他们，这不能归咎于您……我还担心，在外国干涉的压力下，土耳其政府在对您的态度上会处于为难的境地，在同您的通信中会不由自主地不充分表示它对您的嘉许，以及您的温和而明智的做法使它感到的满意。当然，作为莫尔达维亚的卡马康，您必须服从最高政府；但作为这个独立公国的首领和作为莫尔达维亚的贵族，您又必须履行自己对祖国的责任，在必要时，应向土耳其政府指出，莫尔达维亚作为一个特殊的自治公国存在，是公国的第一个 *ab antiquo*〔自古就有的〕特权。”

土耳其驻伦敦大使馆秘书亚·沃戈里德斯 给卡马康沃戈里德斯的信

“我紧急通知您，您的姻兄弟刚才拜会了帕麦斯顿勋爵。他报告了关于勋爵阁下对公国合并的态度的主要消息。帕麦斯顿勋爵坚决反对合并；他认为合并是侵犯我国的权利，因此将对大不列颠驻公国代办亨利·布尔韦尔爵士发出相应的指示。因此，正如我以前告诉您那样，您必须尽力禁止莫尔达维亚人这样或那样地表示拥护合并的愿望，尽力表现得能博得土耳其帝国的好感或英奥两国的支持。既然这三个国家决定反对合并，您就不必对法国的意图或威胁感到不安，法国报刊对您的态度，如同它们对希腊人的态度一样。”

同一个人给他的信

1857年4月15日于伦敦

“我劝您完全按照奥地利领事的意见行事，不管他有多少缺点，甚至不管他的态度变得更加傲慢。您必须注意到，这个人只是按照本国政府的指示办事。奥地利同土耳其帝国与大不列颠的观点完全一致，因此，如果奥地利表示满意，土耳其和英国也必然表示满意。所以我再重复一遍，您必须听从奥地利领事的意见和愿望，毫不反对地使用他向您推荐的一切人，而不必追究这些人是否道德败坏或声名狼藉。只要这些人真心反对合并就够了。这是因为，如果莫尔达维亚的御前会议宣布要合并，奥地利就会要您对不听从它那积极反对合并的领事的意见担负责任。至于英国，即使两国的御前会议都主张合并，它也绝不会让这种合并实现的。然而您最好还是能阻止莫尔达维亚的御前会议发表主张合并的意见，因为这样三国就比较容易对付法国和俄国，从而您就会得到它们的感谢……您禁止出版自由，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莫尔达维亚的狂妄之徒，俄国的那些戴着法国面具的朋友，会滥用这种出版自由来煽起要求合并的民众运动……绝不能容许这种阴谋得逞。我相信，如果在法国发行了‘多瑙河之星’以及其他同样下流的刊物，政府马上会把它们的创办人放逐到凯恩去的。法国既然热切希望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准许成立自由俱乐部和举行政治性集会，它就应该先在自己国内准许这样做，不要放逐和迫害所有敢于稍微自由地说话的记者。法国有一句谚语：

《Charité bien ordonnée commence par soi-même》〔“先己后人”〕。巴黎条约没有提到公国的合并；它只是说，御前会议必须对国家的内部改组发表意见；可是把合并当做自己口号的狂妄之徒，完全忘记了条约的这一条款，不顾内部改革，而只追求新的国际组织，幻想着外国君主统治下的独立……英国采取同奥地利完全一致的行动，坚决反对合并，并且同土耳其帝国一致，决不让合并实现。如果法国领事对您说一些相反的话，请不要相信他，因为他满口谎言。”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8 月 11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7 年 8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02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印度起义

1857年8月14日于伦敦

当7月30日的的里雅斯特电讯和8月1日的印度邮件所带来的印度消息最初传来时，我们曾立即指出，从这些消息的内容和日期来看，攻占德里的说法是一个卑鄙的骗局，是对于人们难以忘却的塞瓦斯托波尔陷落事件的极其拙劣的仿制品。但是约翰牛却轻信到如此难以理解的地步，以致他的大臣、股票经纪人和报纸竟能使他确信，在那些只能说明巴纳德将军采取纯守势的报道中，包含着全歼敌人的证据。这种幻觉愈来愈强，最后发展到甚至使得在这类事情上是老手的将军德·雷希·伊文思爵士也于8月12日晚间在下院的欢呼声中宣称，他认为攻占德里的传闻是可靠的。然而这场令人发笑的戏毫无成果，因为肥皂泡马上就要破灭了。第二天，即8月13日，就接二连三地收到了比印度邮件先到达的、发自的里雅斯特和马赛的电讯，它们明确地指出，6月27日德里的状况仍无变化，而那位仍然只能进行防御并苦于应付被围攻者频繁而猛烈的出击的巴纳德将军，对于自己能把阵地守到那个时候，已经感到十分满意了。

指攻占德里的虚假报道（见本卷第273页）。——编者注

我们估计，下一班邮件大概将带来英军撤退的消息，或者至少将报道一些预示这种撤退行动的事实。肯定地说，德里城墙那样长，使人不能想像防御者能够处处有效地加以防守；相反地，这为敌人以集中的兵力进行 coups de main〔坚决的攻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巴纳德将军似乎深受欧洲人关于筑垒城市、围攻和轰击等观念的影响，不愿意采取查理·纳皮尔爵士所擅长的那种使亚洲人胆寒的出奇制胜的行动。据说，巴纳德将军的兵力确已增加到 12000 人左右，其中欧洲兵 7000 人，“可靠的土著兵” 5000 人；但另一方面，也没有人否认，起义者每天都得到新的援军，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围攻者和被围攻者兵力不平衡的情况依然如故。此外，巴纳德将军能够依靠突然袭击获得一定胜利的唯一地点，就是位于制高点的莫卧儿宫，但是在可能已经到来的雨季，要从朱木拿河岸向莫卧儿宫接近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从克什米尔门和朱木拿河之间攻打莫卧儿宫，又将使进攻者在一旦失利时遭到极大的危险。最后，雨季的到来，必将使巴纳德将军以保障交通线和退路作为他行动的主要目的。总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巴纳德将军会以他那还不充裕的兵力在最不利的季节冒险去干他在比较有利的季节都不敢做的事。尽管伦敦的报纸闭眼不看事实，竭力欺骗自己，但上层人物已极为不安，这一点从帕麦斯顿勋爵的机关报“晨邮报”就可以看出。该报贪财的绅士们向我们报道说：

“我们怀疑，甚至下一班邮件能否给我们带来攻占德里的消息；但是我们确实希望，一旦目前驰援围城军队的队伍开到并带去足够数量的、在德里城下至今仍感不足的重炮时，我们就会得到叛乱者的堡垒陷落的消息。”

显然，英国的将军们由于软弱、犹豫和失策，竟把德里提升

到印度起义的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英军在长期围攻以后退却，或者老是采取守势，就会被看做是一种肯定的失败，并且是引起全面起义的信号。此外，这还会使英军遭到可怕的死亡的命运，而到目前为止，他们只是由于进行着充满出击和搏斗的围攻战并抱有很快能对敌人进行血腥报复的希望而处于极端激昂的状态，才得以避免这种命运。至于说印度教徒对起义漠不关心，甚至说他们同情英国的统治，那完全是无稽之谈。王公们，像真正的亚洲人一样，正在等待着有利的时机。在不受一小撮欧洲人控制的整个孟加拉管区，人们安于自由自在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在那里也没有他们要起来反抗的人。如果指望印度起义具有欧洲革命的特征，那将是可笑的 *quid pro quo* [误解]。

在马德拉斯和孟买管区，由于军队还没有表示态度，人民当然也就没有行动起来。至于旁遮普，直到目前都是欧洲部队的主要配置中心，而当地的土著部队已被解除武装。要想在旁遮普发动起义，附近的半独立的王公们还必须大力施加影响才行。然而，像孟加拉军内部所发生的那种广泛的密谋，没有当地居民的暗中同情和支持，是不可能那样大规模地实现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同英国人在筹措军队给养品和运输工具方面所遇到的巨大困难（这正是军队集中缓慢的主要原因）说明农民对他们没有好感一样。

电讯中的其他消息之具有重要性，也只是在于它们说明：在旁遮普最远的边境，即白沙瓦地区已爆发起义；另一方面，起义正由德里往南向孟买管区迅速推进，遍及詹西、萨加尔、印多尔、默豪等地，最后达到孟买东北相距仅 180 英里的奥郎加巴德。关于班得尔汗的詹西，我们可以指出，这是一个筑垒地点，因而可

能成为武装起义的另一个中心。另一方面，据报道，范科特兰特将军在为了与德里城下的巴纳德将军会师而由西北向那里进发的途中，打败了锡尔萨地区的起义者；他那时距离德里还有 170 英里。他还需要经过詹西地区，在那里他会重新与起义者遭遇。至于英国政府所采取的准备措施，帕麦斯顿勋爵似乎认为最曲折的路线就是最捷近的路线，所以他命令军队绕道好望角前往印度，而不过埃及。另外，原定派往中国的数千人到锡兰后便被截住，转派往加尔各答，而 7 月 2 日火枪兵第五团确已到达该地，这一事实使帕麦斯顿勋爵有机会对他的驯顺的下院议员中直到现在还敢不相信他的侵华战争完全是“横财”的那些人，开一个恶作剧的玩笑。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8 月 14 日
载于 1857 年 8 月 29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10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 1957 年
“苏联东方学”杂志第 5 期

卡·马克思

* 欧洲的政治形势

在下院闭会前夕，帕麦斯顿勋爵利用最后一次会议以前的一次会议²²¹，让下院略微看一看他准备在已经结束的这届会期和下届会期之间款待英国公众的好戏。他的节目单上的第一项就是宣布恢复对波斯的战争，而按照他在几个月之前所做的声明，这场战争已由3月4日签订的和约宣告最后结束。当将军德·雷希·伊文思爵士表示，他希望杰科布上校已经得到要他率领他目前驻扎波斯湾的部队返回印度的命令的时候，帕麦斯顿勋爵直截了当地声明，只要波斯没有履行条约所规定的义务，杰科布上校的部队就不能撤走。然而，赫拉特的驻军还没有撤走。相反地，盛传波斯又向赫拉特增派了军队。固然波斯驻巴黎大使予以否认，但是波斯方面的诚意引起人们正当的严重怀疑，所以杰科布上校所率领的英军仍旧要占领布什尔。就在帕麦斯顿勋爵讲这些话的第二天，有电讯传来消息说，默里先生向波斯政府提出从赫拉特撤兵的强硬要求；这个要求很可能被认为是重新宣战的先兆。这就是印度起义的第一个国际影响。

帕麦斯顿勋爵的节目单上的第二项虽然缺乏具体细节，但是

见本卷第246—250页。——编者注

却展示了一幅广阔的远景。当他最初宣布从英国抽调大批军队派往印度时，他的反对者曾指责他使大不列颠丧失防御能力，从而给外国造成乘虚而入的机会，他的回答是：

“大不列颠人民永远也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随时都可以立即迅速动员起足够的人力去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

可是现在，在议会闭会前夕，他却完全改变了腔调。在回答德·雷希·伊文思将军关于用螺旋桨战列舰运送军队去印度的建议时，他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硬说什么帆船比装有螺旋桨的轮船优越，相反地，他承认将军的计划初看起来似乎非常可取。但是又要下院记住：

“关于是否需要在本国保持足够数量的海军，还有其他的情况必须加以考虑……有些情况说明，向国外派出的海军超出绝对必需的数量，是不适当的。当然，汽轮战列舰是处于常备状态，目前没有大用场；但是，一旦发生任何前面所指的那种事件，就需要派海军出海作战，如果让战列舰去执行向印度运兵的任务，那怎么能够应付迫在眉睫的危险？欧洲目前的局势可能需要使舰队在最短期间投入战斗准备以进行自卫，如果把舰队派往印度，就要犯严重的错误。”

不可否认，帕麦斯顿勋爵使约翰牛实在左右为难。如果采取有效的手段坚决镇压印度起义，本国就会遭到袭击；如果让印度起义的力量壮大起来，那就会如迪斯累里先生所说，“在舞台上，除去印度的王公之外，将碰到新的人物需要进行较量”。

在谈到被暗示得那么神秘的“欧洲局势”之前，不妨先综述一下同一次下院会议上所说出的关于英军在印度的现状的真实情况。首先，一举攻占德里的一切美妙希望，仿佛不约而同地被放弃了，以前那种狂妄估计已经让位给比较清醒的看法：如果英军能把他们的据点守到11月本国援军预定开到的时候，那就得庆幸不已

了。其次,人们隐隐地担心最重要的一个据点——康波尔很可能失守。正如迪斯累里先生所说,一切都要决定于康波尔的命运;他认为解救康波尔甚至比攻占德里还重要。康波尔位于恒河流域中心,牵制着奥德、罗希尔汗、瓜廖尔、班得尔汗,而且还是德里的前哨,所以在目前情况下,康波尔实在是一个头等重要的地方。最后,下院中的一位军职议员弗·斯密斯爵士,提请下院注意下面的事实:在英国人拥有的印度军队中,实际上没有技术人员和工兵,因为他们都开了小差,很可能“德里会成为第二个萨拉哥沙”。另一方面,帕麦斯顿勋爵也没有注意从英国派出任何工兵部队官兵。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所谓“隐现于未来”的欧洲事件,我们首先感到伦敦“泰晤士报”对帕麦斯顿勋爵的暗示所做的评论是令人惊异的。该报说,法国的现行政体可能被推翻,或者拿破仑可能与世长辞,那时,目前安危所系的英法联盟就要告终。换句话说,“泰晤士报”这家代表英国内阁的大报,认为法国随时可能爆发革命,同时宣称,目前的联盟不是建立在法国人民的同情的基础上,而只是建立在同这个法国篡夺者的秘密勾结的基础上。除去法国可能发生革命以外,还有多瑙河地区的纠纷问题²²²。这个纠纷并没有因为莫尔达维亚的选举结果被作废而平息下来,而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重要的是北欧的斯堪的那维亚,这个地方在不久的将来势必要成为一场大动乱的舞台,而且也许会发出欧洲国际冲突的信号。北欧之所以还能保持和平,是因为那里在急切地等待着两件事情的发生:瑞典国王的逝世和丹麦当今国王的逊位。在克利斯提阿纳最近举行的一次自然科学家大会上,瑞典皇太子坚决主张建立斯塔的那维亚联盟。皇太子是一个正当壮年、坚毅果敢的人;吸收瑞典、挪威、丹麦的热情青年参加自

己队伍的斯堪的那维亚党将把他的登基看做是拿起武器来的好时机。另一方面，孱弱而愚钝的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据说已终于得到他那位门户悬殊的配偶丹纳尔女伯爵的准许，引退了，在此以前她一直不准他这样做。就是由于她的缘故，国王的叔父斐迪南亲王——丹麦王位的假定继承人，曾被迫不过问国事，后来经过皇族其他成员的协商，他才再次入朝秉政。现在，据说丹纳尔女伯爵有意从哥本哈根迁居巴黎，甚至想怂恿国王永远退出充满风浪的政治生活，而让位给斐迪南亲王。这位六十五岁左右的斐迪南亲王，对哥本哈根宫廷的关系一向同阿尔图阿伯爵——后来的查理十世——对土伊勒里宫廷的关系一样。他性格倔强、苛刻，守旧观念非常强烈，从来就不屑于挂上拥护立宪制度的招牌。然而他登上王位的首要条件将是宣誓接受他公开表示憎恶的宪法。由此可见，国际纠纷是很可能要发生的，瑞典和丹麦的斯堪的那维亚党都打定主意要利用这些国际纠纷而有所收获。另一方面，丹麦同以普鲁士和奥地利为后盾的霍尔施坦和什列斯维希这两个德意志公国的冲突²²³，将使事情更加复杂化，将把德国卷入北欧的动乱之中；而保证斐迪南亲王取得丹麦王位的1852年伦敦条约²²⁴则将把俄国、法国和英国牵涉进去。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8月21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7年9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110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 印度刑罚的调查

我们昨天刊载了本报驻伦敦通讯员关于印度起义的通讯²²⁵，我们的通讯员十分正确地指出了造成这次猛烈爆发的许多前因。今天我们准备花点时间，略深一步谈谈我们对此事的看法，同时让大家明白，印度的英国统治者，决不像他们想在世人面前装扮的那样，是印度人民的非常温和的和无可责难的恩人。为此目的，我们要援引在 1856 年和 1857 年下院会议期间提交给下院的关于东印度的刑罚问题的官方蓝皮书²²⁶。我们会看到，这些蓝皮书的材料是无可辩驳的。

首先，我们有马德拉斯用刑事实调查委员会的报告²²⁷。该委员会宣称，它“深信到处都在为了征收税款而使用刑罚”。委员会怀疑

“每年因刑事罪而受严刑拷打的人是否有因不纳税罪而受严刑拷打的人那样多”。

委员会强调指出，

“有一种情形，它给委员会留下的印象，甚至比确信有刑罚存在这一点更加沉重，——这就是受害一方很难获得补偿。”

委员会的委员们认为，这种困难的原因如下：（1）想亲自向收税官²²⁸提出控诉的人必须走很远的路，而这样长途跋涉就会引

起金钱的开支和耗时间于进出官府；(2) 害怕呈文“将照例批上要控诉者去见特西达尔的批语而被退回来”，因为特西达尔就是掌管该地区警察和税收事务的官员，也就是那个亲自或者通过其下属警官欺侮过控诉者的人；(3) 即使政府官员已被正式控告并已被揭露犯有这类滥用职权的罪行，也难将他们交法庭审判，而且法律为他们规定的惩罚也过分宽厚。据查明，如果这类控告在法官面前得到证实，法官只能判处犯人 50 卢比罚款或为期一月的徒刑。诚然，他还可以把被告解交“刑事法官，由刑事法官判刑或将其案件提交巡回法院审理”。

报告中补充说：

“看来这是一个冗长的审判程序，而且只适用于一类过失，即警察的滥用职权，而在上述情况下，这种审判程序是不会有结果的。”

警官或税吏（这是一个人，因为税款是由警察征收的）在被控诈取钱财时，先由收税官助手审判；以后被告可以向收税官提出上诉，最后可向税务局提出上诉。税务局可以把被告送到政府法院或民事法院。

“在这种审判情况下，没有一个贫穷的莱特能斗得过任何一个富裕的税吏，同时我们也不知道有农民根据这两个条例（1822 年和 1828 年的条例）提出过控诉的任何事实。”

此外，只有在警官侵吞公款或强迫莱特²²⁹缴纳额外税款以饱私囊时，这种诈取钱财的控告才能成立。由此可见，在征收国家税款时使用暴力，法律对此并未规定任何惩罚。

这里援引的这个报告，只涉及马德拉斯管区，但是达尔豪西勋爵本人，在 1855 年 9 月写信给董事们说：

指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董事们。——编者注

“他早已不再怀疑，所有英属各省的下级官吏都采用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刑罚。”

这样，官方就承认了普遍施用刑罚是英属印度财政制度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这种承认是以替英国政府本身开脱的形式作出的。事实上，马德拉斯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犯有施用刑罚罪的全是印度籍的低级官员，而欧籍的政府官员却似乎总是在尽力阻止发生这类事情，不过没有成效。针对这种说法，马德拉斯土著居民协会于1856年1月向议会呈递过一封请愿书，对刑罚问题的调查提出如下的控诉：(1) 调查几乎根本没有进行，因为委员会只呆在马德拉斯城内开会，而且只有三个月，而想提出控诉的土著居民，除极少数例外，都没有离家的可能；(2) 委员会的委员们并未试图追究祸根；如果追究，他们就会发现，祸根就在税收制度本身；(3) 没有审问被控告的土著官员，弄清他们的上级对用刑情况了解的程度如何。

呈递请愿书的人写道：“犯有这种暴行罪的，不是暴行的实际执行人，而是下令要他们执行的官员，即他们的顶头上司，后者向他们的欧籍长官对一定数额的税款负责，而欧籍长官在这方面又向最高政府当局负责。”

的确，只要援引几段委员会所宣称的作为马德拉斯报告依据的证词，就足以推翻报告中的“英国人毫无过失”的论断。例如，商人科耳霍甫先生说：

“所施用的刑罚的特点，是方式很多，而这又是由特西达尔或他的下属随意决定的。但是我很难说，最高当局是否给过受害者任何补偿，因为一切控诉通常都被他们转给特西达尔去进行调查和呈报。”

在当地居民的控诉书中，我们看到如下的一份：

“去年，我们的佩赞穠（稻的主要收成或青禾）由于雨水欠缺而收成不好，

因此我们不能像往常那样缴税。在贾马班迪 确定之后,我们由于遭受损失,就要求根据 1837 年伊登先生任我们的收税官时我们所签订的协议条件减少捐税。由于没有减税,我们就拒绝接受我们的普塔。这时特西达尔就开始用极残酷的办法强迫我们缴税,这样从 6 月一直继续到 8 月。我,还有其他人,被交给一些人看管。这些人把我们赶到太阳下面曝晒。强迫我们在太阳下弯着腰,背上放上石头,站在灼热的沙地上。8 点钟以后才放我们到稻田去。这种残酷的虐待延续了三个月,这个期间,我们有时步行去向收税官递呈文,但收税官拒绝接受。后来我们把呈子收集拢来,交给巡回法庭,巡回法庭把它们转给了收税官。这样,我们还是没有得到公正的裁判。9 月我们接到官方的通知,过了二十五天我们的财产就被查封,接着就被拍卖了。除了我列举的事实以外,我们的女人也受到了虐待;人们用夹具箝夹她们的胸部。”

一个土著基督教徒在回答委员会委员向他提出的问题时说:

“每当欧籍或土著部队过村时,总是强迫所有的莱特无偿地拿出粮食等东西,如果谁想要收费,就要遭到严刑拷打。”

接着是一个婆罗门所经受的情况。这个婆罗门和自己的同村人及邻近村落的居民同时接到特西达尔的命令,要他们无偿地供给木板、木炭、木柴等物,使特西达尔能够继续在科列龙河上修筑桥梁;当这个婆罗门不肯的时候,就有 12 个人把他抓去,百般折磨他。他补充说:

“我向收税官助手卡德耳先生提出控诉,但是他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并且把我的控诉书也撕了。由于他想牺牲穷人的利益来廉价地完成科列龙桥的修筑,从而博得政府的好评,因此不论特西达尔干出什么坏事,收税官助手都毫不过问。”

1855 年管辖旁遮普卢迪阿纳州的专员布里尔顿先生的案件,

税额分摊。——编者注

税额通知单。——编者注

最清楚地表明了最高当局对这种极尽敲诈暴虐之能事的非法行为的看法。根据旁遮普首席专员的报告，已经证实

“往往在代理首席专员布里尔顿先生的同意或直接命令下，富裕公民的住宅无故遭到搜查；搜查时被没收的财产长期扣押；许多人被投入监狱，好几个星期也不提出受押的罪名，笼统地和同等严厉地对一切人采用对付嫌疑犯的预防措施法；代理首席专员到各个区巡回，都有一些警官和密探相随，他到处使用这些人，这些人是一切灾害的祸首”。

达尔豪西勋爵在他关于这一案件的报告中说道：

“我们握有确凿的证据——而且布里尔顿先生本人也不否认这些证据，证明这个官员确实犯有首席专员所列举的每一项令人不快的、不正当的和非法的行为，这种行为使不列颠行政机关的部分代表蒙受了耻辱，使众多的不列颠臣民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被任意剥夺自由，并遭受严刑拷打。”

达尔豪西勋爵主张“严惩布里尔顿先生，以儆效尤”，因此他认为：

“暂且不能让布里尔顿先生担任代理首席专员的职务，而应把他调任第一助理。”

可用马拉巴尔海岸坎纳腊的塔鲁克 的居民请愿书来结束摘自蓝皮书的这些引文。这些居民说他们白白向政府提出了几次请愿书，然后把他们过去的情况和目前的情况作了如下的比较：

“在‘腊尼’、巴哈杜尔和提普治理时期，我们耕作水地和旱地、丘陵地、低洼地和森林地，缴纳定得很低的税款，因此我们过着安定和幸福的日子。西尔卡尔 官员当时要我们缴纳额外的税款，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缴过。收税时我们没有吃过苦头、没有受过压迫或虐待。但是当这个国家交给尊贵的

区。——编者注

女王。——编者注

政府。——编者注

公司以后，这个公司就千方百计地设法榨取我们的钱财。抱着这个恶毒的目的，公司就弄条例，发命令，并派来收税官和民事法官执行这些条例和命令。不过，那时的收税官及其下属当地官员，有一个时期对我们的控诉还给予应有的注意，还按照我们的愿望办事。相反，现在的收税官及其下属官员，不择手段地想达到升官目的，对人民的福利和利益漠不关心，对我们的控诉充耳不闻，使我们遭到各种压迫。”

在这里，我们只是对英国在印度统治的真实历史做了一番简短而又温和的概述。看到这样的事实，公正而严肃的人们也许会问：人民企图赶走竟敢对自己的臣民这样滥用职权的外国征服者，难道不对吗？如果英国人能够冷酷无情地干出这种事情，那末就算起义的印度人在起义和斗争的狂怒中犯下了硬说是他们犯下的那些罪行和暴虐，又有什么奇怪呢？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8 月 28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9 月 17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20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 印度起义

“波罗的海号”轮船带来的邮件,丝毫没有报道在印度曾发生什么新事件,但却包含有大量极其有趣的细节,我们现在把这些细节扼要地介绍给读者。首先必须指出一点,就是迟至7月15日英国人仍然未能进入德里。同时,英军兵营内发生了霍乱,雨季也已开始,因此围攻军队的撤围和退却,看来只是时间问题。英国的报纸企图要我们相信,恶疫只夺去了将军亨·巴纳德爵士的生命,而他手下那些饮食更坏、操劳更重的兵士却幸免于难。因此,我们不能根据公诸于世的正式材料,而只能通过按公认的事实进行推断的办法,来大致了解这种可怕的传染病在围攻军队中间猖獗的情形。德里城下兵营里的一名军官在7月14日的信中写道:

“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攻夺德里的行动,而只是应付敌人的出击。我们有5个欧洲团的部分兵力,但能够集中用来进行任何有效攻击的,只有2000名欧洲兵,因为每个团都留下了大量兵力防守贾郎达尔、卢迪阿纳、萨巴图、达格夏伊、卡萨乌利、安巴拉、米拉特和皮劳尔等地。事实上各团只派来了少量兵力。敌人在炮兵方面远比我们占优势。”

这就证明了,由旁遮普派来的部队发觉从贾郎达尔到米拉特这一条重要的北方交通线处于起义状态,因此不得不在最重要的地点留下队伍而减少自己的兵力。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由旁

遮普到达德里的兵力比预期的少，但是这还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欧洲兵减少到只有 2000 人。伦敦“泰晤士报”驻孟买的记者在 7 月 30 日写的通讯中，企图从另一角度来解释围攻者行动消极的原因。他写道：

“援军确实已到达我们的兵营，其中包括：皇家第八团的一部分，第六十一团的一部分，步炮连一个，土著部队的火炮两门，非正规骑兵第十四团（护送载运大量弹药的辎重队），旁遮普骑兵第二团，旁遮普步兵第一团和锡克步兵第四团；但是这样归并给围攻军队的土著部队并不是完全地和同样地可靠，尽管已使她们与欧洲兵一起分别编入各旅。在旁遮普部队的各个骑兵团内，有许多来自印度斯坦本部和罗希尔汗的伊斯兰教徒和高级种姓的印度教徒，而孟加拉的非正规骑兵则主要是由这些人组成的。这些人全都是极不忠实的，他们在部队中出现，不论数量的多少，都必将带来许多麻烦，——事实已证明是如此。在旁遮普骑兵第二团内，曾不得不解除约 70 名印度斯坦人的武装，并处 3 人以绞刑，其中有一名高级土著军官。已调去一个时期的非正规骑兵第九团，有几名骑兵逃亡，而非正规的第四团，据我所知，曾在单独执勤时杀死了本团的副官。”

这里就暴露了另一个秘密。德里城下的兵营看来与阿格拉曼特²³⁰的兵营有某些相似之处，这里的英国人不仅要和面对着的敌人作斗争，还要与内部的同盟者作斗争。但这一事实仍不足以说明，为什么英国人只能用 2000 名欧洲兵来进攻。第三个报道者，“每日新闻”驻孟买的记者，提出了巴纳德的继任者里德将军所指挥的部队的精确的一览表，它看来是可信的，因为他把部队的各个组成部分都一一列举出来了。根据这位记者的报道，从 6 月 23 日至 7 月 3 日，由旁遮普到达德里城下兵营的约有 1200 名欧洲兵和 1600 名锡克兵，还有非正规骑兵及其他等等，总共约 3000 人，由张伯伦将军率领。而现在由里德将军指挥的全部兵力，他估计为 7000 人，其中包括炮兵和攻城炮兵纵列，因此，在旁遮普援军

开来以前，德里城下的军队不可能超过 4000 人。8 月 13 日的伦敦“泰晤士报”曾指出，亨·巴纳德爵士的兵力有 7000 名英国兵和 5000 名土著兵。虽然这个数字是过分夸大的了，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当时欧洲兵约有 4000 名，还有略少于此数的土著兵。这样，巴纳德将军当时的兵力，与目前里德将军的兵力是相等的。由此可见，从旁遮普调来的援军仅仅补充了几乎达围攻军队半数的损失，这是极大的损失，它部分地是由于起义者不断出击，部分地是由于霍乱猖獗而造成的。这样我们就清楚了，为什么英国人能够集中用来进行“任何有效攻击”的欧洲兵只有 2000 人。

德里城下的英军兵力就是如此。现在来看看他们的战斗行动。他们的行动并不十分出色，这一点根据以下的简单事实就完全可以看出：自从 6 月 8 日巴纳德将军报告说攻占德里对面的高地以来，大本营再没有发表过任何战报。当时的战斗都是围攻者抗击被围者的出击，只有一次是例外。围攻者有时在正面，有时在两翼受到攻击，但最多的是在右翼后方受到攻击。6 月 27 日和 30 日，7 月 3 日、4 日、9 日和 14 日被围者均曾出击。6 月 27 日的战斗仅仅是前哨冲突，持续了几个小时，但是快到中午的时候就因为雨季的第一场倾盆大雨而中止了。6 月 30 日，起义者一支较大的兵力出现在围攻者右侧的障碍物中，袭击了围攻者的步哨和小哨。7 月 3 日清晨，被围者先在英军阵地的右翼后方进行佯攻，然后沿卡尔纳耳大道向这一翼后方推进数英里，直达阿利普尔，目的是拦截送往兵营的弹药和钱款。在前进途中，他们同旁遮普非正规骑兵第二团的一个前哨遭遇，后者立刻让开了道路。当他们于 4 日回城时，英军兵营派出 1000 名步兵和两个连的骑兵向他们攻击，企图截住他们。但是起义者竟顺利退入德里城，损失很小，

甚至毫无损失，并且把所有的火炮也都保全下来了。7月8日，英军兵营派出一支队伍去破坏距德里约6英里的巴希村附近的运河桥；在前几次出击中，起义者就是通过这座桥攻击英军的深远后方和袭扰通往卡尔纳耳和米拉特的交通线的。桥被破坏了。7月9日起义者再次出动很大的兵力，攻击英军阵地的右翼后方。据该日用电报拍往拉合尔的官方报道称，出击者约有1000人被击毙；但是这个报道看来是过分夸大了，因为7月13日自兵营发出的一篇通讯中是这样写的：

“我方埋葬和焚烧了250具敌兵尸体，还有大量尸体被他们拖回城内。”

就在这篇刊登在“每日新闻”的通讯里，根本没有吹嘘说英军迫使西帕依退却，而是相反地说：“西帕依打退我方所有正在作业的部队，然后才退走。”围攻者的损失很大，计伤亡212人。7月14日，由于起义者又一次出击，发生了又一场激烈的战斗，但详细的报道尚未收到。

在此期间，被围者获得了大量援兵。来自罗希尔汗的巴雷利、谟拉达巴德和夏贾汉普尔等地的起义者，包括四个步兵团，一个非正规骑兵团和一个炮兵连，已于7月1日顺利地同他们在德里的伙伴们会合。伦敦“泰晤士报”驻孟买的记者写道：

“本来估计他们不可能渡过恒河，然而预期的河水泛滥没有发生，他们在加尔穆克特萨尔渡过恒河，穿过达普，到达德里。在两天内，我军痛心地看着他们的人员、火炮、马匹和驮畜（因为叛乱者有大约值5万英镑的财宝）排成长长的行列通过舟桥开进城内，但是既无法阻拦，也无法进行任何骚扰。”

起义者这次通过整个罗希尔汗地区的顺利行军证明，自朱木拿河以东直到罗希尔汗山脉这一大片地区对英军来说都是无法通行的；而起义者毫无阻碍地由尼马奇到阿格拉的行军，如果同印

多尔和默豪爆发的起义联系起来看，则证明，从朱木拿河西南直到文迪亚山脉的整个地区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英国人在德里地区唯一成功的——事实上也是唯一的——一次行动，就是他们靠范科特兰特将军的旁遮普锡克部队平定了德里以北和西北的地区。在卢迪阿纳与锡尔萨之间的整个地区内，范科特兰特将军所要对付的，主要是居住在荒凉沙漠上一些稀疏散布的村落里的专事抢劫的部落。据说他已于7月11日离开锡尔萨，前往法提哈巴德，由那里再去喜萨尔，以巩固围攻部队的后方。

除德里外，在西北各省还有三个地点成为土著居民与英国人斗争的中心，这就是阿格拉、康波尔和勒克瑙。阿格拉方面的情况的特点是，当地的起义者为了攻打英军一个遥远的据点，首次进行了行程约300英里的计划周到的远征。据阿格拉出版的报纸“乡下佬”²³¹报道，纳西腊巴德和尼马奇的西帕依团，为数约1万人（步兵约7000人，骑兵约1500人，火炮8门），于6月底到达阿格拉附近，7月初即在距阿格拉约20英里的萨西亚村后的旷野里设营驻扎，7月4日似乎在进攻准备。阿格拉城外兵营中的欧洲人得知这个消息后，便躲进了堡垒。阿格拉警备司令起初派出一支由科塔的骑兵、步兵和炮兵组成的部队作为前哨抵挡敌人，但他们在到达指定地点后就全部投到起义队伍里去了。7月5日，由孟加拉欧洲兵第三团、一个炮兵连和一队欧洲志愿兵组成的阿格拉警备部队出动去攻击起义者；据说，他们把起义者由村里赶到村后的旷野上，但后来显然自己又被打退了，在总数500人中死49人、伤92人以后，不得不在敌人骑兵的袭击和威胁之下匆忙地撤退，以致据“乡下佬”报道，“甚至来不及朝他们放一枪就不见踪影了”。换句话说，英国人简直是逃之夭夭，赶紧躲进了堡垒，

而西帕依则来到阿格拉城下，破坏了兵营里几乎所有的房屋。次日，即7月6日，他们开到通往德里途中的巴腊特普尔。这一事件的重要结果，就是起义者切断了英国人在阿格拉与德里之间的交通线，并且他们还可能出现在莫卧儿的古都之前。

在康波尔，根据最近的邮件得悉，威勒尔将军率领下的一支约有200名欧洲兵的部队，连同步兵第三十二团人员的妻子儿女，被数量占压倒优势的起义者围困在一座堡垒里面，起义者的首领是比都尔的纳那·萨希布。6月17日和6月24日至28日，堡垒遭到数次攻击，在最后一次攻击中，威勒尔将军腿部中弹，因伤致死。6月28日，纳那·萨希布建议英国人投降，条件是答应让他们乘船沿恒河顺流而下到阿拉哈巴德。英国人接受了投降条件，但当他们刚刚乘船到达河中央时，恒河右岸的火炮立即向他们开火。船上那些企图往对岸逃命的人，被骑兵捉住杀死。妇女和儿童都做了俘虏。由于康波尔曾多次派人到阿拉哈巴德紧急求援，7月1日，由勒诺少校率领的一队马德拉斯火枪兵和锡克兵出发，向康波尔前进。7月13日拂晓，在距法特普尔4英里的地方，这一队人和哈弗洛克准将会合了。哈弗洛克指挥的是第八十四团和第六十四团的约1300名欧洲兵、非正规骑兵第十三团以及奥德的残余的非正规部队，他在7月3日由贝拿勒斯到达阿拉哈巴德，然后以急行军赶上勒诺少校。就在与勒诺会合的当天，他被迫在法特普尔城下与纳那·萨希布率领前来的土著部队交战。经过激烈的战斗，哈弗洛克将军以侧击的方法把敌人赶出法特普尔，迫使他们退往康波尔。7月15日和16日，哈弗洛克又两次与纳那·萨希布在康波尔交锋。7月16日，康波尔重新被英军攻占，纳那·萨希布退往恒河岸边距康波尔12英里的比都尔，据说那里已筑有

坚固的工事。纳那·萨希布在向法特普尔进军以前，杀死了所有俘获的英国妇女和儿童。夺回康波尔对英国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就保住了恒河的交通线。

在奥德的首府勒克瑙，英军警备部队几乎处于和康波尔的情形一样致命的困境——被敌人占压倒优势的兵力围困在堡垒内，缺乏给养，并且丧失了指挥官。这位指挥官，亨·劳伦斯爵士，在7月2日的出击中腿部负伤，7月4日即死于破伤风。7月18日和19日，勒克瑙仍在坚守中。它唯一的获得解救的希望就寄托在由康波尔带兵前来的哈弗洛克将军的身上。但问题是，哈弗洛克在后方有纳那·萨希布威胁的情况下是否敢于这样做。然而任何拖延都将给勒克瑙带来致命的后果，因为雨季很快就会使野战成为不可能了。

考察了这些情况之后，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孟加拉西北各省的英军已逐渐陷在一些好像是分散在革命大海中的孤立礁石似的小据点上。在下孟加拉，除了在贝拿勒斯四郊游荡的婆罗门曾企图再次攻夺这个圣城而未获成功以外，只在米尔扎普尔、第纳普尔和巴特那发生过个别的违抗现象。在旁遮普，由于锡亚耳科特和杰卢姆两地的起义被镇压下去，白沙瓦的风潮也被制止，人们的反抗情绪受到了强力的压抑。在古扎拉特、庞达普尔、萨塔腊、在那格普尔地区的那格普尔和萨加尔、在尼赞辖区的海德拉巴，最后，还有远处南方的迈索尔，都曾试图举行起义，所以，孟买和马德拉斯管区的平静决不能认为是十分可靠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9 月 1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9 月 15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18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 英国人在印度的收入

在考察亚洲当前的情况时，会产生一个问题：对于不列颠国家和不列颠人民来说，他们在印度的领地究竟具有什么价值？直接收入，即贡赋形式的收入，亦即在印度的收入抵偿在印度的支出以外的余额，不列颠国库根本没有得到。相反，它每年的支出非常庞大。自从东印度公司踏上大规模征服的道路之后，——而这是距今将近一百年以前的事情，——它的财政就陷于枯竭状态，因而不得不屡次向议会不仅请求军事援助来维持它所征服的领土，而且请求财政援助来使它不致遭到破产。情况就这样一直继续到现在。目前它向不列颠国家要求派出大批军队，在这以后无疑将要求拿出大批的钱。为了进行征服和建立自己的机构网，东印度公司到目前为止已向国家借债 5000 万英镑以上；同时许多年来英国政府还负担了在属于公司本身的土著军和欧洲军之外的 3 万正规军的来往运输费和在印度的维持费。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大不列颠从其印度帝国所得到的利益只限于个别不列颠臣民所获得的利润和利益。这些利润和利益应该说是很庞大的。

首先，东印度公司有为数 3000 人左右的股东，按照最近的特许状²³²，要保证他们每 600 万英镑实付资本获得 $10\frac{1}{2}\%$ 的年利，即每年 63 万英镑。因为东印度公司的资本是由可以转让的股票构成的，因此每一个有钱购买股票的人都可以成为股东。由于实行现

行特许状,目前股票行市高于票面 125—150%。金额 500 英镑、即约值 6000 美元的股票的所有者,在股东大会上享有发言权,但是要具有表决权,他应持有 1000 英镑的股票。3000 英镑股票的所有者有两票表决权,6000 英镑的有三票,1 万英镑以上的有四票。然而,如果不算董事会改选,股东的作用是极小的。股东选举 12 个董事,同时国王自己任命 6 个,可是国王只能从在印度居住过十年以上的人当中任命这些董事。每年有三分之一的董事退出董事会,但是他们可以重新当选或者被任命。要成为董事,应持有 2000 英镑的股票。董事的薪俸收入每人为 500 英镑,而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薪俸则多一倍,但是使人愿意担任董事职位的,主要是随之而来的任命印度一切文职和军职官员的广泛权利。不过,督察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也享有这一权利,最重要职位的任命几乎完全取决于它。这一委员会由六人组成,他们都是枢密官,通常其中有两三个是内阁阁员。委员会主席因为必定是阁员,实际上就是印度事务大臣。

其次是通过董事和督察委员会而取得职位任命的人。这些职位分为五类:文职,宗教职务,医职,陆军职和海军职。要在印度任职,至少在文职系统,必须知道一些当地语言,并且为了给文职部门培养年轻人,东印度公司在海利贝里设有专门学校。相应的培养军事部门人员的专门学校则设在伦敦附近的阿迪斯康,但是这个学校主要是教授军事科学原理。以前进入这些学校是靠董事的情面,但是现在,新的特许状作出修改之后:入学则经过公开的考试。初到印度的文职官员每月的收入通常约为 150 美元;以后,在他通过一种或数种当地语言的必要考试(这种考试在他到达印度后的十二个月内一定要进行)之后,他即获得领取薪金的职务,薪金数额每年约在 2500 至 50000 美元之间。后一数字是

孟加拉参事会成员的薪俸；孟买和马德拉斯参事会²³³的成员的年收入每年约为 3 万美元。除了参事会的成员之外，谁也不能领取约 25000 美元以上的年俸，并且要领取 2 万美元以上的年俸，需要在印度居留十二年。在印度居留九年者，有资格领取 15000 至 20000 美元的年俸，而居留三年者，有资格领取 7000 至 15000 美元的年俸。表面上，文职的任命所根据的是年龄和功绩，但是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面。因为文职待遇优厚，所以在想获得这种职位的人中间竞争很厉害，许多军官一有可能就为此而脱离军队。文职部门的平均薪俸大约为 8000 美元，但是其中并不包括各种补贴，而补贴经常是很多的。文职官员可担任省督、参事、审判官、使节、秘书、收税官等等；其总人数一般约为 800 人。印度总督的薪俸为 125000 美元，但是补贴往往达到还要更大的数目。担任教会职务的有 3 个主教和大约 160 个牧师。加尔各答的主教每年收入 25000 美元；马德拉斯和孟买的主教每年收入为其二分之一；牧师除了收取仪式费外，每年收入 2500 至 7000 美元。从事医职的约有 800 名内外科医生，他们每年收入 1500 至 10000 美元。

在印度服役的欧洲军官人数，包括应由附属王公提供的军队的军官：约有 8000 人。步兵的薪饷规定为：少尉 1080 美元，中尉 1344 美元，上尉 2226 美元，少校 3810 美元，中校 5520 美元，上校 7680 美元。这是军队驻防时的薪饷，在军事行动时期有所增加。骑兵、炮兵和工程部队的薪饷要高一些。许多军官进入参谋部或担任文职系统的工作，其薪饷即增加一倍。

因此，大约有一万个不列颠臣民在印度占有各种赚钱的职位，并因在这一国家任职而领取薪俸。这里还应加上一大批在印度工作后回到英国领取退休金的人，退休金是一切部门在一定任职年

限期满后都应付给的。这些退休金，加上红利和应在英国偿付的债务的利息，每年要耗费掉来自印度的 1500 万到 2000 万美元，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印度臣民向英国政府间接缴纳的贡赋。每年离去各种职务的人都要往英国带回极大一笔自己薪俸的存款，这些存款也应加在每年来自印度的总款额之内。

除了在政府任职的欧洲人以外，在印度还住有至少 6000 个从事贸易和私人投机的欧洲人。如果不算农业地区那些为数不多的靛蓝、甘蔗和咖啡等的种植园主，那末基本上都是些住在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等城市或这些城市附近地区的商人，经纪人和工厂主。印度的对外贸易（其贸易额进出口约各为 5000 万美元）几乎完全操在这些人的手里，其利润无疑是很大的。

因此很显然，个别的人在从英国与印度的关系中牟取巨利，他们的利润当然会增加英国国民财富的总额。但是，应该拿另一笔巨款来与这一切对比一下。由英国人民口袋里支出的花在印度身上的陆军和海军费用，随着印度领地的扩展在不断增加。此外，还应该加上缅甸战争²³⁴、阿富汗战争、中国战争和波斯战争的费用。其实，最近对俄国的战争的一切费用也可以完全算在印度的账上，因为导致这场战争的原因是对俄国的恐惧和害怕，而这种恐惧和害怕又完全是由于对俄国在印度方面的计划的猜疑而产生的。如果再考虑到英国人由于占领印度而被卷入的无止境的征服和连续不断的侵略行动，那末与这一占领有关的开支，总的说来，就有可能达到它无论什么时候也难以补偿的数目。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9 月初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9 月 21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2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印度起义

1857年9月4日于伦敦

起义的西帕依在印度的暴力行为的确是惊心动魄的、可怕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人们通常只有在国内战争、民族战争、种族战争、特别是宗教战争中才能见到这种暴力行为；一句话，这是当万第派用来对付“蓝制服”、西班牙游击队用来对付不信教的法国人、塞尔维亚人用来对付他们的邻居德国人和匈牙利人、克罗地亚人用来对付维也纳起义者、卡芬雅克的别动队或波拿巴的十二月十日会的会员们用来对付法国无产阶级儿女²³⁵时，曾经一贯为体面的英国所赞赏的暴力行为。不论西帕依的行为多么不好，它只不过是英国自己在建立其东方帝国时期以及在其长期统治的最近几十年当中在印度所作所为的集中反映。为了说明这种统治的特点，只需说刑罚是英国财政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够了。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

第一次打击法兰西君主政体的是贵族而不是农民。印度起义不是由受尽英国人的折磨与屈辱并被劫掠得精光的莱特²²⁹发动

的，而是由那些靠英国人供给吃穿、被英国人一手培育、受到英国人宠幸的西帕依发动的。为了要找一些类似西帕依的暴力行为的例子，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像伦敦某些报纸所做的那样，远溯中世纪的历史，或者到现代英国历史范围以外去找寻。我们只要熟悉一下英国第一次对中国进行的战争，也就是熟悉一下昨天发生的事件就够了。当时英国士兵只是为了取乐就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们的狂暴既不是由于受宗教狂热的驱使，也不是由对傲慢的征服者的仇恨激起的，更不是由英勇的敌方的顽强抵抗引起的。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烧整个整个的村庄，这些并非由中国官吏而是由英国军官亲笔记载下来的暴行，完全是恣意的胡作非为。

即使就目前这次灾难来说，如果认为一切暴行都是西帕依干的，而英国人是至仁至善的体现者，那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英国军官们的来信中充满了恶意。有一个军官从白沙瓦来信，描述了第十非正规军骑兵团由于拒绝执行攻击第五十五土著步兵团的命令而被解除武装。他感到欢欣若狂的是这些士兵不仅被解除了武装，而且被剥去衣服和靴子，在每人分得 12 个辨士后，就被赶往河岸，在那里被装上小船，顺着印度河的下游漂去，并且这位军官喜不自胜地预言道，他们全都将在急流中被淹死。另一个军官告诉我们，一天夜晚，白沙瓦的几个居民为了祝贺一对新婚夫妇而燃放了一些小火药弹（这是当地的民族属俗），结果引起了一场虚惊，第二天早上，和这件事有关的人就被捆了起来，并且“遭到了一顿使他们难忘的毒打”。从品迪来的消息说，有三个土著领袖在组织一个阴谋。约翰·劳伦斯爵士就写了一封回信，命令派一个间谍前去监视他们的会面。约翰爵士接到间谍的汇报后，就发出第二道命令：“处以绞刑。”这几个土著领袖就这样被绞死

了。有一个文官从阿拉哈巴德来信说：“我们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我们敢向您保证，我们绝不饶他们。”另一个文官从同一个地方来信说：“我们没有一天不吊死 10 个到 15 个人（和平居民）。”一个军官怀着不可一世的心情写道：“霍姆斯真是好汉，他把他们一批一批地绞死！”另一个军官在谈到把一大批土著居民不经审讯侦察而立即处以绞刑时说道：“于是我们的娱乐开始了。”又有一个军官写道：“我们骑在马上进行军事审判，凡是被我们遇到的黑鬼，我们不是吊死他，就是枪毙他。”从贝拿勒斯来的消息说，有 30 个柴明达尔²³⁶被绞死，只因为他们有同情自己同胞的嫌疑，由于同样的理由，整个整个的村庄被烧成了灰烬。伦敦“泰晤士报”登载的一个军官从贝拿勒斯的来信中说：“欧洲士兵在和土人发生冲突时，便成了恶魔。”

我们同样不应当忘记，英国人的残暴被说成是军人的英勇行动，并且描述得很简单，没有令人作呕的细节，而本身已经够可怕的土著居民的暴力行为，却还被故意渲染夸大。例如，最初在“泰晤士报”发表、以后又在伦敦所有的报章杂志上转载过的那篇详细叙述德里和米拉特的暴力行为的报道，它的作者是谁呢？原来是一个住在离出事地点直线距离一千多英里的班加罗尔（迈索尔）的胆小的牧师！关于德里发生的真实事件的报道证明，一个英国牧师的想像能够比一个印度起义者的狂想造成更大的恐怖。割鼻子，割乳房等等，总之，西帕依的可怕的体刑，比起英军按照曼彻斯特和平协会会长 的指令用燃烧的炮弹轰击广州居民住宅、比起一位法国元帅火烧被困在山洞中的阿拉伯人²³⁷、比起根据

军事法庭的决定用九尾鞭活剥英国士兵的皮或在英国的感化营里采用任何一种“人道的”手段，当然更会引起欧洲人的反感。暴行像所有其他东西一样，也有它的因时而异的时尚。学识渊博的凯撒坦率地叙述了他怎样命令部下砍去了几千个高卢军人的右手²³⁸。拿破仑会认为这种做法是可耻的。他宁愿把他那些有共和主义思想嫌疑的法国团队放逐到圣多明各岛上去，让他们死于黑人手中或死于流行性病疫。

西帕依的可怕的体刑，使人想起基督教拜占庭帝国的风俗，或者皇帝查理五世的刑法法规，或者布莱克斯顿法官还描述过的英国对叛国罪犯的惩罚²³⁹。宗教已使印度人成为自我折磨的能手，因此，在印度人看来，折磨他们民族的和宗教的敌人是十分自然的；对英国人来说，则应该是更自然的，因为就在几年以前，英国人还一直庇护和鼓励札格纳特节日这种残忍宗教的流血仪式，并从中得到收入²⁴⁰。

“嗜血的老‘泰晤士报’”（科贝特通常这样称呼它）猖狂地咆哮；它扮演莫扎特歌剧中这样一个残暴人物，他在一段旋律极其优美的独唱中幻想着如何先把敌人绞死，然后把他放在火上烤，然后把他砍成四块，然后再把他穿在铁叉上，最后生剥他的皮²⁴¹；它竭力想煽起复仇的情绪，使之达到疯狂的地步，——要是在悲剧的激情后面没有明显地露出喜剧的把戏，所有这一切可能显得只是很愚蠢罢了。伦敦“泰晤士报”不仅仅是由于恐慌而把角色演得过火。它给喜剧提供了甚至连莫里哀都错过了的新题材，那就是复仇的答尔乔夫。而在实际上，它所需要的只不过是颂扬国家公债和庇护政府。既然德里的城墙没有像耶利哥的城墙那样仅仅由于空气的震荡而倒塌，那就必须用复仇的号叫来震聋约翰牛的

耳朵，使他忘掉他的政府应该对所发生的灾难以及使这次灾难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负责。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9 月 4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7 年 9 月 1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19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 法国的 CRÉDIT MOBILIER

Crédit Mobilier²⁸，正如我们在几个月以前分析其 1856 年的冠冕堂皇的报告书时所预见到的那样，又在走下坡路了。这一次下跌引起了欧洲金融界的严重恐慌。几天之间，这家康采恩的股票从 950 法郎跌到 850 法郎左右，而且后面这个数字，看来还远远不是极限。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他对 Crédit Mobilier 的股票涨跌的兴趣，并不下于一个地质学家对原生水涨落的兴趣。这个公司股票行情的涨落，应该划分为几个时期。它第一次发行股票是在 1852 年，这一次组织得很巧妙。股票分成三组，而第一组的持有者有权按照票面价值获得第二组和第三组股票。结果，在证券市场紧张的时期，由于股票的发行额有限，而人们又对这家公司的证券抱有很快就会大大超过票面价值的奢望，所以第一组股票的幸运持有者便从中得到了全部好处。股票市价马上就从第一次发行时的每股 250 法郎上涨到 1775 法郎。在 1852 年、1853 年和 1854 年，股票行情涨落的政治意义只是次要的，因为这种涨落所反映的，与其说是对完全形成了的康采恩的考验，还不如说是刚成立的企业所必经的不同阶段。1855 年，Crédit Mobilier 达到

见本卷第 218—227 页。——编者注

了它的极盛时期，它的股票在短时期内就飞涨到 1900 法郎，这是它同尘世营业相隔的最远距离。此后更进一步观察时，就会发现，Crédit Mobilier 的股票价格的涨落，如果以四个月为平均间隔时期，是在逐渐下降的，这种下降服从于一个固定不变的规律，尽管偶尔有些偏差。这个规律就是，价格从这些时期中的每个时期所达到的最高点下降到平均的最低点，而这个最低点又成了下一个时期的最高的起点。例如，1400 法郎、1300 法郎、1100 法郎这些数字，依次成为一个时期的平均最低点和另一个时期的平均最高点。在今年整个夏天，股票已经不能保持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上涨到 1000 法郎，而现在的危机，如果不导致更坏的后果，将使股票的平均最高价格，大约降到 800 法郎，然后从这一点下降，经过一些时间，降到更低的平均水平。当然，这个过程不可能 *ad infinitum*（无止境）继续下去，而且，Crédit Mobilier 的股票降到其票面价额 500 法郎，这同 Crédit Mobilier 的性质本身是不相容的。Crédit Mobilier 的资本额同它的业务规模之间的那种使它得到巨额利润的相差十分悬殊的状况，以及由此而来的它的股票市价异乎寻常地高于其原价，——这对 Crédit Mobilier 来说，不是它繁荣的条件，而是它本身存在的条件。我们没有必要来详谈这一点，因为我们在研究 Crédit Mobilier 的利润从 1855 年的 40% 减少到 1856 年的 23% 的时候，已经充分说明了。

目前 Crédit Mobilier 股票的跌价，是和那些会被误认为是原因而其实只是结果的种种情况有关。在 Crédit Mobilier 最“受人敬重的”董事当中，有一位奥·图尔内桑先生被宣布为破产人，原

因是法院认为他应当负责偿还本年 5 月偷偷逃出法国的他的侄子沙尔·图尔内桑先生所欠 1500 万法郎的债务。个别董事的破产决不能说明 Crédit Mobilier 业务的现状，这一点，凡是记起普拉斯先生的破产当时丝毫也没有明显地动摇波拿巴政体的这个支柱的人，都应该是清楚的。但是，社会舆论易于受个别人物突然垮台的影响，却不大去细心观察整个机关的逐渐衰落。群众只有在危险相当大了并且已经感触得到的时候，才会慌张起来。例如，罗的股票和银行券，只要摄政王和他的顾问们还满足于银行券所应当代表的硬币的贬值，它们就继续在法国得到无限的信任。公众不了解，当造币厂把一个银马克铸造成数目比过去多一倍的利维尔的时候，代表一定数目的银利弗尔的银行券，就贬值了一半。但是，根据枢密院的命令，这些银行券的正式票面价值降低了，100 利弗尔的银行券应当兑换 50 利弗尔的银行券，公众这才一下子搞清楚了这个过程，于是肥皂泡就破了。同样，Crédit Mobilier 的利润差不多下跌了 50%，也是丝毫没有引起甚至英国金融论文作者的注意，而现在关于奥·图尔内桑先生的破产，整个欧洲的报刊都在大叫大嚷。的确，这一事件使情况愈来愈糟。当今年 5 月，沙尔·图尔内桑先生无力偿还债务的时候，伊藤克·贝列拉先生表现了比他平时更大的高尚的愤懑，在伦敦报刊上郑重否认奥·图尔内桑先生和 Crédit Mobilier 同卑鄙的破产人有任何联系。但是，现在法国法院公布的决定，却彻底驳倒了这位能言善辩的先生的声明。

不仅如此，看来 Crédit Mobilier 本身也是惊慌不安的。它的

奥尔良的菲力浦。——编者注

马克是银币的重量单位，等于 8 盎斯（约 240 克）。——编者注

一个董事厄内斯特·安得列先生认为必须公开摆脱自己对将来的任何责任，并且要通过法律手续同这个机关断绝一切关系。别的人（包括奥坦格银号）也像俗语所说的那样，在鸣金收兵了。当舵手本人都在急忙上救生艇的时候，乘客有一切根据认为船免不了要沉了。最后，两位图尔内桑先生同圣彼得堡施提格里茨银号和庞大的俄国铁路计划之间的密切联系，也会给欧洲金融界提供丰富的思考资料。

如果以为 *Crédit Mobilier* 的董事们肯去“建立法国的信贷制度”，“促进国家的生产力”和支持全世界的有价证券买卖，以为他们去做这一切都是不要代价的，那就大错而特错了。除去收入（每年平均约为他们的股票所代表的资本额的 25%）以外，他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机关存在的头五年当中，还定期地从总利润中分到 5% 的红利——每人大约 275000 法郎，等于 55000 美元。另外，那些享有 *Crédit Mobilier* 的特惠的铁路公司和其他从事公共工程的企业，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和董事们私人的事业有联系。例如，贝列拉兄弟曾经同法国南部铁路的新股票有很大的利害关系，这对谁也不是秘密。现在，我们翻阅公布的报告书时看出，公司总共认购的这些铁路的股票，为数不下 62300 万法郎。但是，不仅所有这 15 名董事都是按照自己私人的利益来办理公司的业务，他们还能够根据他们掌握的关于公司准备进行的大规模 *coups de bourse*〔证券投机〕的材料，来进行自己私人的投机买卖，最后，他们还能够按他们正式经手的巨款的比例来扩大自己本身的信贷。所以，这些董事们发财之快才简直惊人。所以，欧洲的公众见到这些董事们碰到金融方面的倒霉事情，就十分惊慌。所以，董事们的私人财产和公司的公共信贷才有密切的联系。其实，其中

有些人的财产，由它们的占有者保障得非常地好，其寿命无疑会比公司本身还要长。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9 月 8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9 月 26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28 号

卡·马克思

* 印度起义

昨天从印度收到的消息，描绘了一幅对英国人来说是非常悲惨和险恶的情景，虽然从本报的其他栏里可以看出，我们消息灵通的伦敦记者另有他的看法²⁴²。关于德里的情况，我们得到截至7月29日为止的详细消息，并且还得到更新的消息，据说，由于霍乱猖獗，围攻军队被迫从德里城下撤退，而在阿格拉驻扎下来。固然，伦敦没有一家报纸肯证实这个报道，但我们认为，这个报道至多也不过是发表得稍微早一点而已。如同我们从印度的所有通讯中知道的那样，围攻军队由于被围者在7月14日、18日和23日的出击而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在这几次出击中，起义者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奋不顾身，并且由于炮兵方面的优势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一位英国军官来信写道：“我们用十八磅炮和八吋榴弹炮射击，而叛乱者以二十四磅炮和三十二磅炮还击。”在另一封信里又说：“我们遭到18次出击，伤亡人员达三分之一。”

可望到来的援军只有范科特兰特将军率领的一支锡克部队。哈弗洛克将军在打了几次胜仗以后，已被迫退回康波尔而暂时放弃解救勒克瑙的念头。同时，“在德里地区又开始了霖雨季节”，这当然更加强了霍乱的威焰。关于向阿格拉退却以及至少暂时放弃

占领大莫卧儿首都的企图的消息，如果不是已经被证实，那末也一定很快就被证实的。

在恒河线上最引人注意的是哈弗洛克将军的行动，他在法特普尔、康波尔和比都尔的功绩，不出所料地受到了我们伦敦同行们的过分赞扬。像我们在上面所说的，哈弗洛克由康波尔前进 25 英里后，就不得不又是回该地，不仅是为了把病员留在那里，而且也是为了等待援军。这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实，因为它表明，解救勒克瑙的企图失败了。这个城市的英国守军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章格·巴哈杜尔由尼泊尔派去解围的 3000 廓尔喀²⁴³部队。如果他们不能解围，那末康波尔的屠杀就会在勒克瑙重演。但是问题还不仅仅如此。起义者一占领勒克瑙要塞并随之巩固他们在奥德的政权，就会从翼侧威胁英军攻打德里的全部行动，并将在贝拿勒斯和整个比哈尔州占优势。如果起义者掌握住勒克瑙要塞，康波尔的重要性就失去了一半，而它同德里以及贝拿勒斯的交通将要受到威胁。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更加深了渴望从这个地方得到消息的焦急心情。勒克瑙守军在 6 月 16 日认为，他们在饿肚子的情况下可以支持六个星期。到最近一次报告发出的时候为止，六个星期中已经过去五个星期了。现在那里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那些据说要去但还不一定去的尼泊尔援军身上。

如果我们从康波尔沿恒河而下，看一看贝拿勒斯和比哈尔州，那末在这里英国人的前途就更加黯淡了。8 月 3 日从贝拿勒斯寄给“孟加拉日报”²⁴⁴的一封信里说：

“第纳普尔的叛乱者越过生河以后，向阿腊前进。欧籍居民自然担心自己的安全，写信请求从第纳普尔派遣援军。结果，派出两艘汽船载运皇家第五、第十和第三十七团的部队前往。深夜，有一艘汽船搁浅，牢牢地陷入泥中。船

上人员匆匆登岸，徒步前进，但却没有作应有的戒备。突然他们陷于近距离发射的猛烈的交叉火力之下，在这个不大的队伍里有 150 人 hors de combat [伤亡]，其中还有几名军官。据估计，阿腊警备区所有的欧洲人，约 47 人，全部被杀。”

阿腊城位于孟加拉管区英属夏哈巴德州，是从第纳普尔到加济普尔路上的一个城市，在第纳普尔以西 25 英里，加济普尔以东 75 英里。甚至贝拿勒斯也受到威胁。这个城市有一个按欧洲式样构筑的堡垒；如果这个城市落到起义者手中，它就会成为第二个德里。在位于贝拿勒斯以南恒河对岸的米尔扎普尔，发现了一起由伊斯兰教徒组织的密谋；同时在距离加尔各答约 18 英里的恒河上的贝汉普尔，第六十三土著兵团被解除了武装。一句话，一面是不满情绪，一面是惊慌，二者笼罩着整个孟加拉管区，甚至蔓延到加尔各答门。在那里，人们非常担心穆哈莱姆²⁴⁵大斋期（在这期间，伊斯兰教徒狂怒地在街上持刀巡游，随时寻衅械斗）会以对英国人的全面袭击而告终，并且总督已不得不把自己的亲卫队解除武装。因此，读者立刻会明白，英国人沿恒河的主要交通线现在有受袭击、被破坏和被切断的危险。而这就会影响预定在 11 月到来的援军的运动，孤立英国人在朱木拿河上的作战线。

在孟买管区，也出现了很严重的局面。孟买第二十七土著兵团在科拉普尔的起义是事实，而关于起义被英军镇压的消息，只不过是传闻。孟买土著部队在那格普尔、奥郎加巴德、海德拉巴，最后在科拉普尔相继举行起义。孟买土著部队人数现有 43048 人，而在该管区的欧洲部队实际上只有两个团。英国人不仅依靠土著部队来维持孟买管区内的秩序，而且要用他们来增援旁遮普的信德，来编成纵队向默豪和印多尔进发，以便重新占领这两个地方

并加以固守，还要利用他们来恢复通往阿格拉的交通线和解救该地的守军。负责这次行动的斯图亚特准将的纵队，由孟买第三欧洲团 300 人、孟买第五土著步兵团 250 人、孟买第二十五土著步兵团 1000 人、孟买第十九土著步兵团 200 人、海德拉巴部队第三骑兵团 800 人组成。在这支拥有 2250 名土著兵士的部队中，约有 700 名欧洲兵，他们主要是属于皇家第十六步兵团和皇家第十四轻龙骑兵团的。此外，英国人还在奥郎加巴德编成一支土著兵士纵队，以便威慑坎德什和那格普尔两地有不满情绪的居民，同时支援在中印度行动的机动部队。

我们听说，印度的这一部分地区“已经恢复治安”，但是我们对这种结局不能完全相信。事实上，这个问题不决定于默豪的占领，而决定于马拉提的两个王公——霍尔卡尔和辛迪亚²⁴⁶采取什么路线。报道斯图亚特到达默豪的同一条快电补充说，虽然霍尔卡尔仍旧可靠，但他的部队已不服从指挥。关于辛迪亚的政治立场，则一字未提。他年轻很轻，颇得人心，富有热情，可以把他当做整个马拉提民族的自然的首脑和领袖。他自己有 1 万人的精锐部队。他脱离英国人，不仅会使英国人失去中印度，而且会给予革命的联盟以很大的力量，使它更加巩固。德里城下军队的退却以及不满者的威胁和要求，可能最后迫使他站到自己的同胞方面来。但是，对霍尔卡尔以及对辛迪亚发生主要影响的是德干高原的马拉提人；在那里，如我们已经报道的，起义最后确实抬头了。也正是在那里，穆哈莱姆斋期特别危险。因此，有一定的理由期待孟买军会普遍起义。从海德拉巴、那格普尔、马尔瓦这些

信奉伊斯兰教最狂热的各州的居民中招募来 60555 人的马德拉斯军，也会立即起来效法。因此，如果考虑到 8、9 两月的雨季将使英军的运动瘫痪并使他们的交通阻绝，我们就不是没有理由来这样推断：由欧洲派去的援军虽然看起来很强大，但将会到得太迟并且要分批到达，因此是很难应付他们当前的任务的。在行将到来的战局中，我们几乎可以期待阿富汗惨剧²⁴⁷的重演。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9 月 18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10 月 3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34 号

卡·马克思

* 印度起义

昨天“大西洋号”轮船由印度带来的消息有两点很重要，即哈弗洛克将军前往解救勒克瑙未获成功和英军仍然坚持呆在德里城下。后一事实只有在英国历史上才有类似的情况，那就是伐耳赫伦远征。到 1809 年 8 月中旬，这次远征败局已定，然而英军还迟迟不肯登船撤退，一直拖延到 11 月。拿破仑知道英军在这个地点登陆以后，就决定不去攻打他们，而让他们死于疾病，因为疾病必定会比大炮使英军遭受更大的损失，而且不费法国分文。目前大莫卧儿的处境甚至比拿破仑更有利，它既能够以出击加强疾病，而又能够以疾病加强出击。

9 月 27 日由卡利亚里发出的英国政府的公报告诉我们：

“德里方面的最后消息到 8 月 12 日为止；这时该城仍在叛军手中，但不久可望攻城，因为尼科尔森将军率领的大量援军距城仅有一日路程。”

如果在威尔逊和尼科尔森用他们现有的兵力进行攻击以前，英军不能攻占德里，那末德里会坚守到它的城墙自行倒塌时为止²⁴⁸。尼科尔森的这支大军总共约有 4000 锡克人，这支援军用以攻击德里未免少得可怜，但是却完全足以造成不从城下撤兵的新的无异于自杀的借口。

当休伊特将军让米拉特的起义者得以进至德里而犯了错误

(从军事观点来看,甚至可以说是犯了罪)以后,当白白放过最初两个星期而使起义者得以突然夺取该城以后,计划围攻德里看来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大错。我们以为甚至比伦敦“泰晤士报”的军事预言家还高明的一位权威,即拿破仑,曾制定了两条看来差不多是老生常谈的作战原则:第一,“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只做最有胜利把握的事情”;第二,“主力只用于战争的主要目的——消灭敌人”。在制订围攻德里的计划时,就违反了这两条起码的原则。英军当局应当知道,印度政府自己不久以前曾整修过德里的防御工事,因此只有用正规围攻才能夺取该城,而这就需要一支至少有15000人至20000人的围攻部队,如果防御以通常应有的方式进行,所需兵力还要多得多。既然为了完成这一计划需要15000人到20000人,那末凭着6000人或7000人就干起来,简直是愚蠢的。此外,英国人也知道:由于英军兵力薄弱,围攻必然要拖延很久,而这就要使他们的军队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和这样的季节里受到一个不可伤害的而又无形的敌人的袭击,这个敌人将在他们的队伍里散播死亡的种子。因此,围攻德里是毫无胜利希望的。

至于战争的目的,那毫无疑问,是为了保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对于达到这个目的来说,德里根本没有任何战略意义。固然历史的传统使它在土著居民的心目中具有一种与其实际意义相左的迷信的意义,起义的西帕依单凭这点就要选择它作为他们总的集合地。但是,如果英国人不从土著居民的偏见出发来制订自己的军事计划,而置德里于不顾,并把它孤立起来,他们就能使德里失去那臆想出来的意义。现在英军把营盘扎在德里城下,用自己的脑袋往城墙上撞,把自己的主要兵力和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里,这就使自己甚至没有撤退的可能,或者更正确地说,使

这样一种撤退带有大败的意义。这样，他们简直是给起义者帮了忙，因为起义者正是要使德里成为战局的中心。但是问题还不如此。英国人不必绞多少脑汁就能够看到：对于他们说来，最重要的是建立一支积极行动的野战军，通过它的行动就可以扑灭不满情绪的火花，维持各地警备部队之间的交通，驱使敌人后退到少数的几个地点并孤立德里。但是，他们不按照这个既简单而又明了的计划行事，反而把他们手中仅有的作战部队集中在德里城下，胶着不动；他们把平原旷野留给起义者，而他们自己的警备部队却占领着一些分散的、彼此不相联系的、相隔很远的地点，并且这些地点被能够从容行动的、占压倒优势的敌军封锁着。

英国人让自己主要的机动部队胶着在德里城下，结果并没有箝制住起义者，而只是束缚住了自己驻在各地的警备部队的行动。但是，除了在德里的这一主要错误以外，这些警备部队部署军事行动的愚蠢，也是很难在军事史上找到任何先例的：它们独立行动，各不相顾，根本没有最高的指挥，它们不像是一支军队的各个组成部分，而像是属于不同的、甚至是敌对的国家部队。就以康波尔和勒克瑙的例子来说吧。这是两个相邻的地方，有两支单独的部队驻守，数量都很少而且不足以应付局势，各有自己的指挥；虽然它们相距仅 40 英里，但是行动上却丝毫不相配合，简直像位于南北两极似的。按照最普通的战略原则的要求，康波尔驻军司令休·威勒爵士应该有权把奥德首席专员亨·劳伦斯爵士连同他的部队调回康波尔，来加强自己的地位，而暂时放弃勒克瑙。这样做，两支警备部队就都能得救，接着哈弗洛克的部队与他们会合，这样就能够建立一支人数虽不多，但却足以控制奥德和解救阿格拉的部队。但是他们不这样做，由于两地各行其是，

康波尔的警备部队已被消灭，勒克瑙的警备部队也必将连同要塞一起落入起义者之手，甚至哈弗洛克做出惊人的努力，率领他的部队在八天内走完 126 英里，同时经受住了相当于行军日数那样多次数的战斗，而且所有这些都是印度夏季盛暑的气候条件下进行的，——甚至像这样英勇的努力，也无济于事。哈弗洛克由于徒劳无益地试图援救勒克瑙已使自己精疲力竭的部队更加疲惫，同时他还不得不由康波尔出兵，在不断缩短的半径上作反复的出征，从而遭受新的无谓的折损，这样一来，他很可能最后不得不带着所剩无几的部队退往阿拉哈巴德。这支部队的行动再好不过地表明了：甚至德里城下的一支小小的英国部队，若不是关在疫病流行的兵营里，而是集中起来用于野战，那它可以做出些什么来。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但英军在印度作战的计划却是分散兵力。他们应当做的是，尽量缩减警备部队的人数，使他们立刻摆脱妇孺的拖累，撤出所有没有战略意义的据点，从而集结尽可能多的部队用于野战。而现在，甚至为数极少的、由加尔各答沿恒河而上的增援部队，也完全为许多孤立的警备部队所吸收，连一支部队也没有到达阿拉哈巴德。

至于勒克瑙，上次邮件所引起的那种最黯淡的预测，现在被证实了。哈弗洛克又被迫返回康波尔；靠尼泊尔盟军解救勒克瑙已不可能；因此我们现在只好等待这个城市由于饥饿而被攻陷以及它的英勇守军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杀戮的消息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9 月 29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10 月 13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42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 印度起义

伦敦的报纸在讨论印度起义的目前形势时，充满了它们从最初就怀有的那种乐观情绪²⁴⁹。它们不但告诉我们对德里的攻击已获胜利，而且告诉我们这是发生在 8 月 20 日。当然，首先必须明确的一件事就是围攻军队的现有人数。一位炮兵军官在 8 月 13 日由德里城下的兵营寄来一封信，说明到 8 月 10 日为止英国军队实有兵力的详情如下：

	英国军 官人数	英国士 兵人数	土著军 官人数	土著士 兵人数	马 匹
司令部	30	—	—	—	—
炮 兵	39	598	—	—	—
工 兵	26	39	—	—	—
骑 兵	18	370	—	—	520
第 一 旅					
皇家第七十五团	16	502	—	—	—
东印度公司火枪兵第一团 ...	17	487	—	—	—
库马昂营	4	—	13	435	—
第 二 旅					
皇家猎兵第六十团	15	251	—	—	—
东印度公司火枪兵第二团 ...	20	493	—	—	—
帖木儿营	4	—	9	319	—
第 三 旅					
皇家第八团	15	153	—	—	—
皇家第六十一团	12	249	—	—	—
锡克第四团	4	—	4	365	—
向导队	4	—	4	196	—
库克队	5	—	16	709	—
共 计.....	229	3342	46	2024	520

由此看来，英军在德里城下兵营内实有的全部兵力截至 8 月 10 日是 5641 人。我们还得从这个数目中减去 120 人（112 名士兵和 8 名军官），因为根据英国的报道，他们在 8 月 12 日攻打起义者在城外英军左前方新设的炮台时已阵亡。因此，到尼科尔森准将率部与围攻军会合前，战斗人员只有 5529 人。尼科尔森是从菲罗兹普尔率领下列部队护送一个二级攻城炮兵纵列前来的：轻步兵第五十二团（约 900 人），第六十一团一部（约 4 个连，360 人），鲍切尔野炮连，旁遮普第六团一部（约 540 人）以及木尔坦的一些骑兵和步兵——共约 2000 人，其中有 1200 多名欧洲兵。这样，在尼科尔森部队到来时驻在营地的 5529 人再加上这些兵力，总数为 7529 人。据称，旁遮普省督约翰·劳伦斯爵士又派来了援军，包括步兵第八团的余部，第二十四团的 3 个连，并携有自白沙瓦开来的佩顿上尉部队的骑炮兵的 3 门火炮，旁遮普步兵第二团和第四团以及旁遮普第六团的另一部。但是这支部队，估计人数最多有 3000 人，而且大部分都是锡克人，现在还没有到来。如果读者还记得大约一个月以前曾在张伯伦指挥下由旁遮普开来了援军，你们就会明白，正像那支援军当时只足以把里德将军的部队补足到它在亨·巴纳德爵士指挥时的原数一样，新的援军也只能把威尔逊准将的部队补足到它在里德将军指挥时的原数。对于英军唯一现实的援助就是攻城炮兵纵列终于到来。但是即使所期待的 3000 人到达兵营，而且英军总数达到 1 万人（其中三分之一的人的忠诚都十分值得怀疑），那时又将怎样呢？据说，他们要把德里包围起来。但是，姑且不论企图用 1 万人包围这个设防坚固

马克思的计算中有差误，应该是 5521 人。——编者注
见本卷第 298 页。——编者注

的、城墙长达7英里以上的城市是多么可笑，英军只有先使朱木拿河改道，才能考虑包围德里的事情。不然英军早上进入德里，起义者就能在晚间离开它，或者渡过朱木拿河向罗希尔汗和奥德进发，或者顺朱木拿河而下，朝穆特拉和阿格拉方向前进。不管怎样，如果一个四边形地区有一边为围攻军所不能接近，但却给被围者准备了一条交通线和退路，那末如何包围这种地方，在目前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给我们提供上面那张表格的那位军官说：“大家一致认为，用强攻夺取德里是谈不上的。”

同时他告诉我们，在兵营里真正指望的是“对城市连续炮击几天，在城墙上打出一个足够大的缺口来”。可是这个军官又补充说：

“根据适中的估计，敌人现在已经集结了将近4万人，而且有无数门运用得很好的火炮；他们的步兵也是勇武善战的。”

如果考虑到伊斯兰教徒在据守城池时通常所表现的那种拼死顽抗的精神，那末，人数不多的英国军队通过“一个足够大的缺口”闯入城内以后，是否能再从这个缺口闯出来，就大成问题了。

事实上，英军要以现有兵力攻打德里而获得成功，只有一线希望，那就是起义者发生内讧，弹药耗尽，士气沮丧，对自己力量失掉信心。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们自7月31日到8月12日连续不断地进行的战斗，看来很难证实这种假定。同时，加尔各答的一封来信明白地告诉了我们，英国将军为什么违反一切作战原则决心留在德里城下。

来信中这样写道：“几星期前曾发生过我们的部队是否应当从德里城下撤走的问题，因为他们每日战斗，弄得疲惫不堪，不能再支持难以忍受的疲

劳。但是这种想法遭到约翰·劳伦斯爵士的坚决反对。他明白地告诉那些将军们，他们的退却将是使周围的居民起来暴动的信号，而这一定会立即使他们陷于危急的处境。这个意见占了上风，约翰·劳伦斯爵士并答应把他所能搜罗的一切援军派来。”

约翰·劳伦斯爵士既把旁遮普的部队完全调空，旁遮普现在也可能爆发起义，而这时德里城下兵营中的士兵很可能由于雨季末期从地面散发出的瘴气而病倒和成批地死亡。范科特兰特将军的部队，据四个星期前的报道，已到达喜萨尔并继续向德里推进，但以后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们的消息。显然，他们不是在途中遇到什么严重的阻碍，便是半路上被解散了。

英国人在恒河上游的处境实际上是万分危急的。哈弗洛克将军受到奥德起义者的行动的威胁，他们从勒克瑙取道比都尔前进，并企图在康波尔以南的法特普尔附近切断哈弗洛克的退路；同时瓜廖尔的队伍从朱木拿河右岸的一座城市卡耳皮向康波尔运动。这个分进合击的运动可能是由据说掌握着勒克瑙的最高指挥权的纳那·萨希布指挥的，这个运动第一次显示出起义者具有某些战略观念，而英国人则似乎只是一味吹嘘自己愚蠢的离心战法。例如，我们听说，从加尔各答派来增援哈弗洛克将军的步兵第九十团和火枪兵第五团，在第纳普尔被詹姆斯·乌特勒姆爵士截留，他打算把他们经由法扎巴德带到勒克瑙去。伦敦“晨报”称颂这个作战计划，认为这一着很高明，因为据说这样勒克瑙就将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右面受康波尔的威胁，左面受法扎巴德的威胁。根据一般的作战原则，兵力远居劣势的军队如果不设法集中自己分

散的队伍，反而自行分为两部，中间为敌军整个隔开，那末这只能使敌人毫不费劲地就把他们消灭掉。实际上，就哈弗洛克将军来说，问题已不在于援救勒克瑙，而在于援救他自己和尼耳将军的少数部队的残部。很可能，他必须退到阿拉哈巴德。阿拉哈巴德位于恒河和朱木拿河汇合处，是这两河之间的达普²⁵⁰的锁钥，的确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阵地。

看一下地图就可以知道，企图收复西北各省的英军的主要作战线是沿着恒河下游流域的。因此，第纳普尔、贝拿勒斯、米尔扎普尔的阵地，尤其是必定成为真正作战行动起点的阿拉哈巴德阵地，应当予以加强，就是说应当把孟加拉省本部的所有较小而在战略上又无关紧要的地点的警备部队都集中到那些地方。目前这一主要作战线本身也处于严重威胁之下，这可以从一封由孟买寄给伦敦“每日新闻”的信里的如下一段话看出来：

“不久以前第纳普尔三个团哗变，截断了阿拉哈巴德与加尔各答之间的交通（河上的轮船来往除外）。这次哗变是最近所发生的事件中最为严重者，因为距加尔各答不到 200 英里的整个比哈尔州现已暴乱蜂起。今日消息称，桑塔尔人²⁵¹又起暴乱，有 15 万嗜血和劫掠成性的野人在孟加拉横行，情况的确会骇人听闻。”

只要阿格拉还能坚守，对于孟买军来说，次要作战线就是通过印多尔和瓜廖尔到阿格拉的道路，而对于马德拉斯军来说，次要作战线就是通过萨加尔和瓜廖尔到阿格拉的道路，旁遮普军以及占领阿拉哈巴德的部队则必须恢复他们与阿格拉的交通。但是，如果动摇不定的中印度各王公公开起来反对英国，同时孟买军内部的起义变得严重起来，那末对目前军事行动的一切估计就都要落空了，那时除了从克什米尔到科摩林角整个国土上发生大规模

的屠杀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确切预言了。在最好的情况下所能做到的一切，就是把决定性的事件推延到 11 月，即欧洲军队开来的时候。甚至这一点是否能够办到，也还要看科林·坎伯尔爵士的才干。关于他，除了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以外，我们迄今一无所知。如果他是一个称职的人，那末他就会不惜任何代价，不管德里攻陷与否，成立一支人数虽不多但却有战斗力的军队来进行野战。可是我们仍然必须再说一遍：问题最终取决于孟买军队。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10 月 6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10 月 23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51 号

卡·马克思

* 印度起义

“阿拉伯号”轮船的邮件给我们带来了关于德里陷落的重要消息。根据我们手中的贫乏材料所能判断的，这个事件看来是下述情况同时出现的结果：起义者中间发生了尖锐的内讧，交战双方军队数量对比起了变化，以及早在 6 月 8 日就期待到达的攻城炮兵纵列已于 9 月 5 日开到。

在尼科尔森指挥下的援军到达之后，我们曾估计德里城下军队的总数为 7529 人。我们的计算现在完全证实了。后来，在克什米尔部队的 3000 人由拉扎朗比尔·辛格转交英军指挥而并入英国以后，据“印度之友”²⁵²称，英军共达 11000 人左右。另一方面，伦敦“军事旁观者”²⁵³断言，起义者的军队约减少到 17000 人，其中包括 5000 名骑兵，而“印度之友”则把他们的兵力计算为 13000 人左右，包括 1000 名非正规骑兵。由于在城墙被打开缺口和城内战斗开始以后，骑兵便完全无用，所以一当英军突入城中，骑兵就弃城而逃。因此，无论根据“军事旁观者”的计算，或者根据“印度之友”的计算，西帕依全部兵力不可能超过 11000 人或 12000 人。由此看来，英军兵力几乎与起义者的兵力相等，但

这与其说是由于前者增加了兵力,不如说是由于后者减少了兵力。英军在数量上略居劣势,但这却由于对城市的有效炮击所造成的精神上的效果和进攻的有利条件,而得到绰绰有余的补偿,因为进攻者可以选择主攻地点,而防守者则不得不把他们不足的兵力分散在周围所有受到威胁的地点。

起义者兵力的减少,与其说是由于大约十天以来不断出击所遭到的严重损失,远不如说是由于内讧使整批部队走散。不用说,幽灵似的莫卧儿本人同德里城的商人一样,都对于把他们积蓄的钱财抢劫一空的西帕依的统治感到十分不满,就是西帕依内部的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宗教分歧以及原守城部队和新增援部队之间的不和,已足以瓦解他们松弛的组织,使他们必然遭到失败。尽管如此,英军仍然不得不与只在数量上比他们稍占优势,但无统一指挥而又为内讧所削弱和沮丧的敌人作战,而这个敌人在受了八十四个小时的炮击后,仍然经受住了整整六天的轰击和城内的巷战,然后从容地由舟桥渡过朱木拿河。所以必须承认,起义者总算以他们的主力在如此恶劣的形势下做到了所能做到的一切。

攻占城市的经过看来是这样的:9月8日,英军把他们的炮队配置在离部队原阵地前面很远、距城墙700码的地方。在8日和11日之间,英军的重炮和白炮推进得更接近防御工事。考虑到德里守军在10日和11日曾作了两次出击,再三企图配置新炮队,并由散兵壕内用步枪不断进行扰乱性的射击,那末英军把他们的炮队配置在预先准备好的阵地上,所受的损失是很小的。12日英军死伤约56人。13日晨,敌人的一个棱堡上的重要弹药室以及由郊区塔耳瓦腊纵射英军炮台的一门轻炮的弹药箱被炸毁

了，同时英军炮台在克什米尔门附近的城墙上打开了一个可以通行的缺口。14日攻城，军队未遇严重抵抗就由克什米尔门附近的缺口突入城中，占领了邻近的大建筑物，并沿城墙向摩里棱堡和喀布尔门前进。在这里，敌人的抵抗变得十分顽强，英军因此受到严重的损失。英军准备利用已被占据的城堡上的火炮转而对付城市，并另运一批火炮和臼炮到制高点去。15日，英军开始用在摩里棱堡和喀布尔棱堡缴获的火炮轰击伯恩棱堡和拉合尔棱堡，同时还在军械库打开了一个缺口，并且开始轰击王宫。军械库在9月16日拂晓被攻下，17日臼炮从军械库围墙后面继续轰击王宫。

从这一天起，关于攻城的官方消息就断绝了；据“孟买信使报”²⁵⁴说，这是由于旁遮普和拉合尔的邮件在信德边境被劫。在给孟买省督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说，星期日即20日整个德里城被占领，起义者的主力在该日早晨3时放弃城市，经舟桥过河，朝罗希尔汗方向退走。由于英军在占领位于河岸的塞林加尔以前是不可能进行追击的，所以起义者显然由城市的极北端向东南端慢慢地打开一条退路，把掩护退却所需要的阵地扼守到20日。

至于攻占德里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一家权威报纸即“印度之友”指出：

“英国人现在应当注意的不是德里的情况，而是孟加拉的形势。迟迟攻占德里已确实使我们完全丧失了如能早日成功即可取得的威信；而叛军的力量和人数，正如由于继续围困而减少一样，会由于城市被攻占而大大减少。”

与此同时，据说，起义正由加尔各答向东北扩展，并且经过中印度向西北扩展。在阿萨姆边境上，有两个强大的普尔

比 团起义,公开提出要恢复前拉扎帕兰杜尔·辛格的王位。第纳普尔和朗格普尔的起义者在库埃尔·辛格的领导下经由班达和纳哥德向贾巴耳普尔进发,并且雷瓦拉扎在自己军队的压力下也与他们会合了。就在贾巴耳普尔,孟加拉军第五十二土著团离开了自己的驻地,并带走一名英国军官作为他们留下未走的伙伴的人质。据报道,瓜廖尔起义者已渡过昌巴耳河,驻扎在该河和多耳普尔之间的某地。现在还得把所有的报道中最严重的几项指出来。原来,周德普尔军团投到在贝阿伐尔西南 90 英里的阿瓦赫起义的拉扎那方面去了。这个军团打败了周德普尔拉扎派来征讨它的大批兵力,同时还打死了他们的一个将军和蒙克·梅森上尉,并缴获了火炮三门。乔·圣帕·劳伦斯将军率领了一部分纳西腊巴德部队向他们进攻,逼使他们退入一座城中,但是劳伦斯想夺取这座城市的企图并没有成功。由于驻在该地的欧洲部队撤出信德,那里就发生了一个范围很广的密谋,至少有五个地方,其中包括海德拉巴、卡拉奇和希卡普尔,曾经试图起义。在旁遮普也有不满情绪的征兆,在那里木尔坦和拉合尔之间的交通曾中断了八天。

在本报另一处,我们的读者可以看到 6 月 18 日以来由英国派出的部队的统计表²⁵⁵;各有关船只开到的日期,是我们根据官方材料计算出来的,因而这种算法是对英国政府有利的。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除经由陆路派去的少数炮兵和工兵部队外,乘船的部队共计 30899 人,其中步兵 24884 人,骑兵 3826 人,炮兵 2334 人。从表中还可看出:10 月底以前不会有大量援军开到。

普尔比——原意是东部的,这里指的是东孟加拉的两个团。——编者注

派往印度的部队

下表所列为自 1857 年 6 月 18 日起从英国派赴印度的部队

到达日期	合计	加尔各答	锡兰	孟买	卡拉奇	马德拉斯
9月20日	214	214	—	—	—	—
10月1日	300	300	—	—	—	—
10月15日	1906	124	1782	—	—	—
10月17日	288	288	—	—	—	—
10月20日	4235	3845	390	—	—	—
10月30日	2028	479	1544	—	—	—
10月份小计...	8757	5036	3721	—	—	—
11月1日	3495	1234	1629	—	632	—
11月5日	879	879	—	—	—	—
11月10日	2700	904	340	400	1056	—
11月12日	1633	1633	—	—	—	—
11月15日	2610	2132	478	—	—	—
11月19日	234	—	—	—	234	—
11月20日	1216	—	278	938	—	—
11月24日	406	—	406	—	—	—
11月25日	1276	—	—	—	—	1276
11月30日	666	—	462	204	—	—
11月份小计...	12115	6782	3593	1542	1922	1276
12月1日	354	—	—	354	—	—
12月5日	459	—	—	201	—	258
12月10日	1758	—	607	—	1151	—
12月14日	1057	—	—	1057	—	—
12月15日	948	—	—	647	301	—
12月20日	693	185	—	300	208	—
12月25日	624	—	—	—	624	—
12月份小计...	5893	1851	607	2359	2284	258

到达日期	合计	加尔各答	锡兰	孟买	卡拉奇	马德拉斯
1月1日.....	340	—	—	340	—	—
1月5日.....	220	—	—	—	—	220
1月15日.....	140	—	—	—	—	140
1月20日.....	220	—	—	—	—	220
1月份小计 ...	920	—	—	340	—	580
9月至1月20日.....	30 899	12 217	7 921	4 431	4 206	2 114
由陆路派去的部队						
10月2日.....	工兵 235名	117	—	—	118	—
10月12日.....	炮兵 221名	221	—	—	—	—
10月14日.....	工兵 244名	122	—	—	122	—
10月份小计...	700	460	—	—	240	—
合计					31 599	
绕道好望角前去的以及部分已经到达的部队					4 000	
总计					35 599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10 月 30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11 月 14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70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 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
和英国的金融危机

本月 5 日，英格兰银行把它的最低贴现率从 10 月 19 日确定的 8% 提高到了 9%。我们想，英格兰银行从恢复现金支付以来向无先例的这种提高，还没有达到极限。这是由于黄金和白银的外流以及所谓银行券后备的减少而引起的。黄金和白银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外流：黄金流入本国，因为我们这里倒闭了一些银行；而白银流往东方，因为减少了对中国和印度的出口贸易，并且政府需要直接给东印度公司汇款。英国为了换取这些用途所必需的白银，不得不把黄金送往欧洲大陆。

至于谈到银行券后备以及它在伦敦金融市场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必须简短地提一提罗伯特·皮尔爵士于 1844 年实行的英格兰银行法，这项法律不仅对英国，而且对美国以及整个世界市场都有影响。得到银行家劳埃德（即如今的奥维尔斯顿勋爵）以及其他许多重要人物撑腰的罗伯特·皮尔爵士，打算通过他的银行法来实现一个纸币流通的自动起作用的原则。按照这条原则，纸币流通今后应该完全循着纯粹金属货币流通的规律而增加和缩减；这样一

来,按照罗伯特·皮尔及其拥护者的说法,就永远消除了发生任何金融危机的可能。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部:发行部和银行部,并且前者只是一个印制银行券的工厂,后者才是名副其实的银行。发行部依法有权发行银行券 1400 万英镑,这个数目被认为是实际流通额永远不会低于它的极限,并且这个数目有英国政府对英格兰银行的债务作为保证。对于在这 1400 万以外发行的全部银行券,发行部必须在金库中有相应数量的黄金和白银作为保证。受到这种限制的全部银行券交由银行部投入流通。因此,如果发行部的金库里有 1000 万英镑的黄金和白银储备,它就可以发行并且交给银行部 2400 万银行券。如果实际上在流通中只有 2000 万,那末保存在银行部钱柜里的其余 400 万就是它的银行券后备,其实这也就是那些私人和国家交托给银行部的存款的唯一保证。

现在假定说,黄金和白银开始外流,从发行部几次提出了共值 400 万的一定数量的贵金属,例如黄金。这时 400 万的银行券就要作废,这会使发行部发行的银行券完全等于流通中的银行券,而银行部钱柜里的银行券后备则化为乌有。换句话说,银行部就根本没有分文来满足存户的要求,因而只好宣布自己无力支付。这会严重影响公共团体和私人的存款,结果不得不停止支付国家有息证券持有人应得的季度红利。这样一来,银行部就可能弄到破产,尽管在发行部的金库里还保存着 600 万贵金属。这不仅仅是一个假定。在 1847 年 10 月 30 日,银行部的后备减少到 160 万英镑,而存款为 1300 万英镑。这种危急的情况只有靠政府实行财政 *coup d' état* 才缓和了下来,如果它再延续几天,英格兰银行的

后备就会告罄，银行部就不得不停止支付，尽管在发行部的金库里还存有 600 万英镑以上的黄金。

因此，很显然，黄金外流和银行券后备减少是相互影响的。由于从发行部的金库里提出黄金会直接造成银行部的后备减少，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惟恐银行部弄得无支付能力，便压缩信用，提高贴现率。但是，贴现率的提高，引起一部分存户从银行部提走存款来按当时的高利放债，而后备的不断减少，又使另一部分存户感到惴惴不安，使他们也从银行部提走存款。这样，本来为了维持后备而采取的措施，使后备丧失无余。读者在看到这种解释之后一定会了解，在英国，人们怀着怎样的焦急心情注视英格兰银行后备减少的情况，以及最近一期伦敦“泰晤士报”上的一篇金融论文犯了什么样的巨大错误。这篇文章中说道：

“那些一向反对银行法的人又动起来了，而且现在对什么都不能稳有把握。他们制造恐慌的惯用手法之一，就是推说不处在流通中的银行券后备减少了，似乎这种后备一旦耗尽，英格兰银行就不得不完全停止贴现。”（按照现行法律，它在破产时事实上只有这样做。）“其实，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银行也能够继续贴现而不缩小规模，因为它每天收进的期票当然平均总是跟它通常该付出的数量一样的。要它扩大业务是不可能的，但是很难设想在目前到处紧缩业务的情况下，会对它提出这样的要求。因此，要政府采取弥补措施是毫无理由的。”

制造这个论据的手法，就是故意忽视存户。不必多费脑筋就会明白，如果银行部一旦对自己的债权人宣布破产，它就不能再以借贷或者期票贴现的方式向债务人支付贷款了。简单地说，罗伯特·皮尔爵士的备受推崇的银行法在平时根本不起作用；在困难时期则使金融恐慌加剧（这种金融恐慌是由商业危机以及这个法律本身造成的金融恐慌所引起的），而正当这项法律按照它所依

据的原则应该发生良好影响的时候，不得不通过政府的干预使它暂时停止生效。在平时，英格兰银行依法有权发行的最大数额的银行券，从来没有完全进入流通过程，——这是由银行部的钱柜在这种时期总是存有银行券后备所充分证明了的事实。只要把英格兰银行从 1847 年至 1857 年的公报对比一下，或者甚至把 1819 年到 1847 年银行券的实际流通量同法定的最高流通量比较一下，就能证实这种情况。在困难时期，例如在 1847 年和今年，由于英格兰银行被任意地截然划分为两个部，金银外流的后果就人为地加剧，利率的提高就人为地加快，英格兰银行也就由于它的一个部表面上无支付能力（不是由于银行真的无支付能力）而有破产的危险。

当真正的金融困难这样被人为的恐慌加剧以及当它造成大量牺牲的时候，政府往往受不住舆论的压力，而使这项法律恰好在本来需要它来应付局面、而且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起某些作用的时期停止生效。例如，1847 年 10 月 23 日，伦敦的大银行家曾前往唐宁街求援，即要求停止实行皮尔的银行法。由于他们的要求，约翰·罗素勋爵和查理·伍德爵士给英格兰银行经理和副经理去了一封信，建议他们增加银行券的发行，从而提高法定的货币最大流通量，同时他们承担起破坏 1844 年银行法的责任，并且声明他们准备在议会一召开会议时就提出一项保证这次违法行为免受惩罚的法案。现在，当事态发展到像 1847 年 10 月 23 日之前那个星期的样子（当时似乎有完全停止全部业务和一切支付的危险），这出滑稽戏又将重演。可见，皮尔的银行法的唯一优点就是：它使全国人民完全依赖于贵族政府——依赖于某一个亡命之徒（例如帕麦斯顿）的喜好。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阁员们那样偏爱 1844 年的

法律，——它使他们得到了他们从未享有过的对私人资本的权威。

我们之所以这样详细地论述皮尔的银行法，是因为它现在对本国发生影响，并且还因为它在英国可能要停止生效；但是，如果英国政府有力量把它亲自加在英国人民肩上的经济困难的重担卸去，我们就以为，我们将在伦敦金融市场上看到的现象——金融恐慌的产生和终结——会成为衡量英国贸易界行将经受的危机的强度的真正寒暑表，那就是最大的错误。政府在这种危机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当美国发生危机的初步消息传到英国的时候，英国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一种即使不是很巧妙至少也是很新颖的理论。他们断言，英国的贸易很健康，只可惜它的买主，尤其是美国佬不健康。只有一方面是健康的健康贸易——真亏英国经济学家想得出来！看一看英国贸易部最近发表的 1857 年上半年的报告书，你就会看到，在英国出口的全部原料和工业品当中，有 30% 运往美国，11% 运往东印度，10% 运往澳大利亚。如今，美国市场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不能接受英国货，最近两年本来就已存货过多的印度市场，由于爆发起义而大大缩小了，而澳大利亚市场存货过剩到如此地步，以致各种英国货在阿得雷德、悉尼、墨尔本比在伦敦、曼彻斯特或格拉斯哥还要卖得便宜。那些由于突然失去买主而宣告破产的英国工厂主的“健康”状况，可由两个例子来判断。在格拉斯哥一家花布印染厂厂主的债权人会议上，发现这个厂主负债达 116000 英镑，而资产尚不足 7000 英镑。同样，格拉斯哥的一个船主，全部资产不过 789 英镑，而应当偿还的债务却达 11800 英镑。

但是，这还只是一些个别现象；重要的是：英国工业的状况已经极度紧张，在国外市场缩小的影响下，必然要发生普遍危机，而随之将引起大不列颠全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震荡。美国 1837—1839 年的危机，使英国的出口额从 1836 年的 12425601 英镑缩减到 1837 年的 4695225 英镑，在 1838 年缩减到 7585760 英镑，在 1842 年缩减到 3562000 英镑。类似这样的瘫痪现象在英国也已经开始了。它无疑将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11 月 6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11 月 21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76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英国贸易的震荡²⁵⁶

英国贸易的大震荡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似乎有三种明显的形式，伦敦和利物浦的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困窘，苏格兰的银行业恐慌，工厂区的工业衰落。关于这方面的事实，在我们星期五的报纸上已经以大量英国报纸摘要的形式，作了详细的叙述。但是它们的重要意义和可能发生的后果，还需要进一步加以说明。

虽然，正像我们在以前一篇文章中所预料的那样，政府终于被迫停止了 1844 年银行法的效力，然而政府在做出这种处理之前，英格兰银行为了挽救自己已经大胆地使它的许多主顾吃尽了苦头。但是，终于在 11 月 11 日晚上，英格兰银行的首脑人物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向政府求援；他们所得到的回答就是暂时停止上述法律各项条款的效力。政府的这项命令将立刻提交给应该在月底开会的议会去批准。如我们早已指出的，停止这项法律的效力，必然会使目前的状况有一定程度的缓和。这样做就消除了银行法在金融市场于贸易动荡时期自然产生的货币紧张现象之外所引起的人为的紧张现象²⁵⁷。

在目前这次危机中，英格兰银行妄想挽狂澜于既倒，曾五次

见本卷第 343 页。——编者注

提高它的贴现率。10月8日，贴现率被提高到6%，12日提高到7%，22日提高到8%，11月5日提高到9%，9日提高到10%。这样迅速的变动，与1847年危机时的那种变动相比，真是一个惊人的对照。当时最低贴现率在4月提高到5%，在7月提高到 $5\frac{1}{2}\%$ ，在10月23日才提高到最高点即8%。此后它就一直下降，在11月20日降到7%，在12月4日降到6%，在12月25日降到5%。此后的五年是贴现率不断下降的时期，它下降得如此匀称，就仿佛是按照计算尺的指示进行的一样。这样，在1852年6月26日，它达到了最低点，即2%。从1852年到1857年这五年又出现了相反的变动。1853年1月8日的贴现率是 $2\frac{1}{2}\%$ ，1853年10月1日是5%，从此以后，经过连续多次的变化，它终于达到目前这样的高度。迄今为止，过去十年中利率的上下波动，只是现代贸易的各周期性阶段所常有的现象。简单地说，这些阶段就是：在恐慌时期信贷完全收缩；然后逐渐扩大，在利率降到最低点的时候，这种扩大达到自己的最高限度；那时又开始相反的变动，即逐渐收缩，在利率涨到最高点并且又开始恐慌时期的时候，这种收缩达到自己的最高限度。但是，只要比较仔细地研究一下，就可以在目前这个时期的后半段中发现一些根本不同于以往各个时期的现象。在1844年到1847年的繁荣时期，伦敦的利率摇摆于3%和4%之间，所以整个这段时期是利息较低的信贷时期。当利率在1847年4月10日上升到5%的时候，危机已经开始了，只有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性的措施，才使危机的普遍爆发推迟了几个月。另一方面，在1854年5月6日已经达到 $5\frac{1}{2}\%$ 的利率，后来又连续下降到5%、 $4\frac{1}{2}\%$ 、4%和 $3\frac{1}{2}\%$ ；从1855年6月16

日到9月8日,利率一直是 $3\frac{1}{2}\%$ 。然后它又朝着相反的方面经过同样的变化,上升到4%、 $4\frac{1}{2}\%$ 、5%,到1855年10月又达到了在1854年5月曾达到过的最高点,即 $5\frac{1}{2}\%$ 。两个星期以后,即1855年10月20日,短期期票的利率上升到6%,长期期票的利率上升到7%。但是接着又出现了倒退现象。在1856年,利率时而下降时而上升,到1856年10月,又达到了6%和7%,也就是说,达到了前一年10月的水平。1856年11月15日它曾上升到7%,但是并没有保持在这个数字上,而是上下跳动了好几次,有一次整整三个月保持在 $5\frac{1}{2}\%$ 的水平上。只是在今年10月12日,当美国的危机开始影响英国的时候,它才恢复到原来7%的高度。从此以后,利率就迅速地 and 不停地增长,其结果终于是几乎完全停止贴现。

换句话说,在1848年至1857年这个时期的后半段中,利率的波动更剧烈更频繁,而从1855年10月到1857年10月是货币奇缺的两年,利率在从 $5\frac{1}{2}\%$ 到7%这个范围内来回波动。同时,尽管利率很高,生产和交换仍然以从未想像过的速度不停地发展。一方面,这种例外现象之所以能够发生,是由于从澳大利亚和美国及时流入黄金,使英格兰银行能够间或放松它的硬性条件;而另一方面,十分明显,危机在1855年10月就已应该开始,它是由于一系列短暂的动荡而被推迟下去的,因此危机的最后爆发,无论就征候的强度或就蔓延的范围而言,都要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危机。贴现率在1855年10月20日、1856年10月4日和1857年10月12日周期性地回涨到7%这一有趣的事实,就完全可以证明刚才所说的这个论点,即使我们此外并不知道,英国在1854年已

经发生预先的崩溃，欧洲大陆上在 1855 年 10 月和 1856 年 10 月就已反复出现过恐慌的一切征候。然而，总的说来，如果不谈这些使事态恶化的情况，1848—1857 年这一时期是与 1826—1836 年和 1837—1847 年这两个时期非常相似的。

的确，我们听说，实行英国贸易自由就可以改变这一切，但是如果别的什么还没有得到证明，那末至少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自由贸易派的医师只不过是些骗人的庸医而已。正像在以往的各个时期一样，在一系列丰收之后接着是一系列歉收。尽管有自由贸易派的万应灵丹，英国小麦及其他一切农业原料的平均价格在 1853—1857 年甚至比在 1820—1853 年还要高；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那时的工业不管谷价高昂，仍然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而现在，仿佛是为了使人根本无法诡辩，它在高度丰收的情况下遭到了前所未闻的崩溃。

我们的读者当然会明白，英格兰银行目前这种 10% 的贴现率只是名义上的，伦敦给第一流有价证券实际支付的利息远远地超过了这个数字。

“每日新闻”写道：“在自由市场上所索取的贴现率远远地超过了英格兰银行的牌价。”

“纪事晨报”写道：“英格兰银行本身除了极少数的情况（例外情况，而不是常规），并没有按照 10% 的利率办理贴现；而在自由市场上所要的利息则与官方的牌价根本不符。”

“先驱晨报”写道：“用第二流和第三流的有价证券不论以任何条件都弄不到钱，这已经造成了大量恶果。”

正像“地球报”²⁵⁸所写的，“由于这一切，事情就陷入僵局；资产超过负债的公司纷纷倒闭；似乎是发生了一场普遍的商业革命。”

金融市场的这种困难以及美国产品的大量涌现，使得商品市

场上的各种商品都降低了价格。在几个星期之内，利物浦的棉花价格跌了 20—25%，糖跌了 25%，谷物跌了 25%，随着咖啡、硝石、牛油、皮革等也都跌了价。

“晨邮报”写道：“期票贴现和以实物为抵押取得贷款几乎完全不可能了。”

“旗帜报”写道：“在明辛街²⁵⁹，贸易十分紊乱，除了以货换货以外，不可能销售任何商品；根本谈不上支付现金。”

但是，如果在苏格兰不发生银行业的恐慌，这一切灾难不能这样快地使英格兰银行屈服。在格拉斯哥，西区银行倒闭以后就是格拉斯哥市银行的倒闭，于是资产阶级中的存户和劳动者阶级中持有银行券的人都来向银行提款和挤兑，结果发生了一场大骚动，使格拉斯哥市的市长不得不向刺刀求援。很荣幸地有阿尔盖公爵这样一位尊贵人物任董事长的格拉斯哥市银行，拥有实付资本 100 万英镑，备付资本 90595 英镑，有 96 个分行分布全国各地。它可以发行 72921 英镑，而苏格兰西区银行可以发行 225292 英镑，总共为 298213 英镑，即约占苏格兰全部合法流通手段的十分之一。这两家银行的资本几乎都是农村居民的小额存款。

在苏格兰发生的恐慌自然影响到英格兰银行；11 月 11 日从它的金库中提取了 30 万英镑，11 月 12 日又提取了 60 万到 70 万英镑汇往苏格兰。此外，爱尔兰的银行还提取了另一些款项，英国的一些地方银行又收回了大量存款，所以英格兰银行的银行部处于破产的边缘。可能，普遍危机对于上述这两家苏格兰银行说来，只是提供了一个体面地下台的口实，因为这两家银行早已彻底腐烂了。然而事实仍然是：曾经在 1825—1826 年、1836—1837 年和 1847 年顶住了将英国和爱尔兰各家银行扫荡一光的几场风

暴的著名的苏格兰银行体系，自从 1845 年那迫使苏格兰接受的皮尔的银行法生效以来，第一次遇到了大规模的挤兑现象；在苏格兰的银行中第一次听到了这样的呼声：“要黄金，不要纸币！”甚至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在爱丁堡也第一次遭到拒绝。那些替皮尔的银行法辩护的人以为，如果这项法律不能根本防止金融危机，那末它至少能保证在流通中的银行券的兑换，——这种想法现在站不住脚了；银行券持有者分享了存款人的命运。

至于英国工业区的一般状况，下面这两段文字刻划得淋漓尽致——一段是摘自“经济学家”杂志上刊载的曼彻斯特贸易通报，另一段是摘自伦敦“自由新闻”²⁶⁰上发表的一封来自麦克尔士菲尔德的私人信件。曼彻斯特通报对最近五年来的棉花贸易作了一番比较，然后接着说道：

“本周内，价格逐日迅速下跌。许多种物品都不能标价，因为根本找不到买主；而且即使标了价，这种价格与其说取决于实际需求，还不如说取决于主人的状况和顾虑。根本谈不上什么当前的需求。国内市场上堆积的存货，今年冬天也难望销完。”（关于国外市场存货过多的情形，通报当然避而不谈。）“现在到处都迫于必要缩短了工作时间，估计目前在全部生产部门中已有五分之一以上都采用了这种办法。反对广泛实行这种办法的抗议，一天比一天减少，现在大家讨论的问题是：把工厂完全关闭一个时期是否更好一些。”

麦克尔士菲尔德的来信者说道：

“现在至少有 5000 名熟练的手工业者及其家眷，清早起床后不知从哪儿可以弄到填肚子的吃食，而只好向济贫所请求帮助。可是由于他们是属于体力强壮的贫民，他们必须进行这样的选择：或者是去做每天可领 4 辨士的碎石工作，或者是到习艺所去接受那罪犯般的待遇，去吃那份从壁上一个小洞递送的有害身体而又少得可怜的食物。对于那些只习惯于操作最纤细的物质即纺织丝绸的人来说，建议他们去做碎石工作，就等于拒绝帮助他们。”

英国的作者们认为，英国的这次危机同 1847 年的危机相比，有一个优点，即这次危机并没有为大量吸收资本的投机，例如铁路股票的投机，开辟广阔的场所。但是事实远非如此。因为英国人在国外，无论是在欧洲大陆和美国，都大量参与了投机活动；而在本国，他们的剩余资金主要是投在工厂企业中，所以目前这次震荡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带有工业危机的性质，因此它震撼了国家繁荣的根基。

在欧洲大陆上，这种传染病一方面从瑞典蔓延到意大利，另一方面从马德里蔓延到布达佩斯。当然，首当其冲的是关税同盟²⁶¹的最大进出口贸易中心、德意志北部的主要金融市场——汉堡。至于法国，法兰西银行已经把它 的贴现率抬高到英国的水平；禁止谷物出口的命令也作废了²⁶²；所有的巴黎报纸都接到了秘密警告，不许表示悲观；金银兑换商受到宪兵的威胁，路易·波拿巴本人在一封口气相当虚夸的信中告诉他的臣民说，他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对财政 coup d' état 有所准备，因此，“邪恶只存在于想像之中”²⁶³。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11 月 13 日
载于 1857 年 11 月 30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18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 德里的攻占

我们不想参加目前在大不列颠举行的这场把攻克德里的军队的英勇行为吹捧上天的乱嘈嘈的大合唱。在自我吹嘘方面，特别是在吹嘘自己的英勇行为方面，没有一个民族，甚至法国人，能够同英国人相比。可是，如果对事实进行分析，一百次中有九十九次能很快地看出，这种勇敢精神原来是十分平淡无奇的；因此，每一个正常的人必定会厌恶英国人这种利用别人的勇敢来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这些英国 *pater familias*（老爷）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对于使他们冒最小的风险去取得战功的任何事情都非常反感，却企图把攻占德里时确实表现出来的、但决不是那么非凡的勇敢精神算上自己一份。

如果把德里同塞瓦斯托波尔比较一下，我们当然得承认：西帕依不能与俄国人相提并论；他们对英军兵营的任何一次出击都完全不能同因克尔芒²⁶⁴相比；在德里没有托特列本；不管每一个西帕依和每一个连在大多数场合下作战如何英勇，但是几乎他们所有的营——更不用说旅和师——都没有任何指挥；因此他们的协同动作不超出连的范围；他们没有任何军事知识，可是在今天，任何军队没有军事知识就无法作战，就无法守住任何城市。虽然如此，在人数和装备方面的悬殊，西帕依比欧洲兵更服水土的优点，

德里城下的军队有时在数量上出现的极端劣势，——所有这一切都抵销了许多差别，而使我们完全能够把这两次围攻（姑且把这些行动称为围攻）加以比较。再说一遍，我们并不认为强攻德里是什么不平凡的或特别壮烈的英勇事迹，虽然毫无疑问，这一次，和在所有的战斗中一样，双方都有过个别比较出色的行动。不过我们认为，德里城下的英印军队所表现的坚韧、刚毅、谨慎和技巧，要胜过英国军队在塞瓦斯托波尔和巴拉克拉瓦²⁶⁵一带的考验中的表现。当时，英军在因克尔芒战役之后已经完全准备退回船上，如果不是因为法军的缘故，毫无疑问，他们真的会这样做。但是围攻德里的军队却不然，季节和因季节而产生的疫病、交通的断绝、迅速获得援军的无望以及上印度的总的形势，曾促使他们后退，诚然他们也考虑了采取这一步骤是否恰当，但他们终于还是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了。

当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国人首先需要的是在上印度有一支机动部队。当时只有两支部队可以用于这一目的，一支是哈弗洛克的小部队，但它不久就显得力不胜任了；另一支是德里城下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按兵德里城下，与不能攻破的敌人作无谓的战斗而消耗现有的力量，从军事观点来看，是错误的；军队在运动中要比在停驻时有四倍的价值；这样它就可以肃清除德里以外的上印度各地，恢复交通，粉碎起义者集中兵力的一切企图，在这以后，德里的陷落就会是自然的、轻而易举的事了，——所有这些都是不容争辩的。但是政治上的原因使英国人不能解除对德里的围攻。应该受到责备的是大本营中那些下令围攻德里的自作聪明的人物，而不是那些既已开始围攻就坚守在那里的军队。同时还应当指出，雨季对这支军队的影响比预料的要轻微得多，而

在这样的季节由于积极的军事行动而发生的疫病只要达到与平时差不多的程度，军队就非撤退或瓦解不可。军队的危险处境一直持续到8月底。以后，援军开始到达；同时内讧继续削弱起义者的阵营。9月初，攻城炮兵纵列开到，英国人就由守势转为攻势。9月7日，第一个炮队开火了，13日晚在城墙上打开了两个可以通行的缺口。现在来看看，在这个期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件。

如果在这方面只能依靠威尔逊将军的官方报告，我们简直会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这个报告混乱不清，如同克里木战争中英军大本营所发表的文件一样。世界上谁也不能根据这个报告确定上述两个缺口的位置或相互位置以及强攻纵队所采取的队形。至于私人的报道，当然更混乱不清了。幸好在应当获得几乎整个胜利荣誉的孟加拉工兵和炮兵中任职的那些有学识和教养的军官中间，有一位军官在“孟买日报”²⁶⁶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所发生的事件的报道，这个报道既清楚又有条理，同时简单而且没有什么吹嘘的地方。在整个克里木战争期间，就没有一个英国军官能写出这样切实的叙述文。可惜，这位军官在攻城的第一天就负了伤，他的通讯也就从此结束。因此，以后的事情，我们就完全不清楚了。

英国人曾加固过德里的城防，但只求它能够抵御亚洲军队的围攻。就我们现代的概念来说，德里很难称得上是个要塞，因为它只能抵御野战部队的硬攻。它的石城墙高16呎，厚12呎，上面加有厚3呎高8呎的胸墙，除胸墙外，还有没有斜堤掩护的高6呎的石砌部分，进攻者在攻击时可以对它直接发射火力。这道石头城墙很狭窄，除了棱堡和炮塔外，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安置火炮。棱堡和炮塔不能充分地以侧射火力掩护中堤，同时因为攻城炮不难把3呎厚的胸墙摧毁（这甚至用野炮也可以做到），所以要想压

德里的攻占

制防守者的炮兵,特别是压制对护城壕进行侧射的火炮,是非常容易的。在城墙和护城墙之间有一条很宽的崖路,或者说是一条平堤,便于造成可以通行的缺口;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护城壕不但不能在任何部队进入其中时成为他们的 *coupe-gorge* [陷阱],反而成为在进攻斜堤时乱了队形的队伍用以休息和整顿队形的场所。

利用正规的堑壕按照围攻的原则向这样一个地点进攻,即使具备最起码的条件,也就是说,即使有足够的兵力把这个地点团团围住,也是荒谬绝伦的。鉴于德里城防工事的一般情况,鉴于防守者组织涣散,士气低落,除了已经采取的这种攻城法以外,使用任何其他方法都会是绝对错误的。这个方法就是军人所熟知的硬攻法 (*attaque de vive force*)。既然城防工事只能抵御没有重炮的围攻者以暴露的兵力来进行的攻击,那当然要直截了当地用炮兵来破坏这些工事;同时,要塞的内部也不断遭到炮轰,一当城墙上的缺口大到能够通行的时候,部队就立刻攻上前去。

攻击的正面是正对着英军兵营的北城墙。这段城墙有两个中堤和三个棱堡,在中央棱堡(克什米尔棱堡)形成一个稍向里缩的凹角。东段(从克什米尔棱堡到水棱堡)比西段(克什米尔棱堡和摩里棱堡之间)短些,而且稍向前突出。克什米尔棱堡和水棱堡前面的地区有未被西帕依扫清的矮丛林、花园、房屋等等,因而为进攻者提供了掩蔽所。(这个情况说明为什么英军常常能够在要塞的炮口下追击西帕依,当时这一点被认为是了不起的英勇,其实既然英国人有了这些掩蔽所,这样做是没有什么危险的。)此外,距要塞约四五百码的地方,沿城墙有一道很深的沟,成为供进攻用的一道天然的平行壕。再者,河流可以作为英军左翼的极好的依托,因而选择克什米尔棱堡和水棱堡之间稍向前突出的那一段

城墙作为主攻点，是非常合适的。对西段中堤和棱堡则同时进行佯攻，这一动作非常成功，使得西帕依派出主力来击退这一佯攻。西帕依在喀布尔门外编了一支强大的队伍来威胁英军右翼。如果摩里棱堡和克什米尔棱堡之间的西段中堤是最危险的地点，他们这一动作就是完全正确和非常有效的。西帕依的侧防阵地作为一种积极防御的手段是很好的，因为这一支兵力向前运动就能立即对每一个强攻纵队进行侧击。但是这个阵地对于东面位于克什米尔棱堡和水棱堡之间的那段中堤却不能起什么作用，因此，占领这个阵地，就使守军的精锐力量离开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地点。

炮队阵地的选择、构筑、装备以及使用方法，都值得大加赞扬。英军约有 50 门火炮和白炮，都集中在强大的炮队里并隐蔽在很好的、坚固的胸墙后面。根据官方报道，西帕依在被攻击的地段有 55 门火炮，但是它们分散在小的棱堡和炮塔里面，不能集中使用，而且只有一道可怜的 3 呎高的胸墙勉强掩护着。毫无问题，只需要两三个小时就完全可以把防守者的火力压制下去，而此后要做的事也就不多了。

8 日，第一炮队（有 10 门炮）在离城墙 700 码的地方开火。当天夜间，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条沟已被加修成一道堑壕。9 日，这条沟前面的起伏地和房屋未经抵抗即被占领。10 日，第二炮队（有 8 门炮）投入战斗，这个炮队距城墙五六百码远。11 日，非常大胆而巧妙地配置在距水棱堡 200 码的一处起伏地上的第三炮队，用 6 门炮射击；同时有 10 门重白炮轰击城市。13 日晚，据报告说，两个缺口——一个在与克什米尔棱堡右侧相邻的中堤上，另一个在水棱堡的左正面和左侧——已经可以用来进行攻击，于是即下令攻击。西帕依在 11 日已经在两个受威胁的棱堡之间的斜堤上挖

掘了一条反接近壕，并且在英军炮队前面约 350 码处挖掘了散兵壕。他们还从喀布尔门外的阵地前进来进行侧击。但是这些积极防御的企图没有统一的计划和相互的联系，没有高昂的士气，因而也就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14 日拂晓，英军五个纵队投入攻击。右翼上的一个纵队应与喀布尔门外的西帕依队伍接战，胜利时即向拉合尔门进攻。给每一个缺口派了一个纵队，一个纵队被派去爆破克什米尔门，还有一个纵队则作为后备。除第一队外，各队的行动都成功了。缺口处防守薄弱，但是城墙附近房屋内的抵抗却非常顽强。由于一个工兵军官和三个军士的英勇行动（这确实是英勇的行动），炸开了克什米尔门，所以在那里作战的纵队也突入城内。傍晚的时候，整个北段城墙都落入英军手中。但是，威尔逊将军在这里停下来，漫无秩序的冲杀停止了，火炮被调了上来并向城内每一个坚固的阵地射击。除了攻打军械库外，看来很少有真正的战斗。起义者士气沮丧，开始成批地弃城而走。于是威尔逊谨慎地向城内推进，17 日以后已经几乎遇不到抵抗，20 日占领了全城。

我们已经说出了关于进攻者的行动的意见。至于防守者，那末采取攻势的对抗性运动的企图、喀布尔门附近的侧防阵势、反接近壕、散兵壕，——这一切都说明：科学的作战方法的某些概念已经在西帕依中间存在；但是这些概念不是还不十分清楚，便是还不够有力，因此西帕依不能有效地予以运用。这些概念究竟出自印度人本身，还是出自和他们合作的一些欧洲人，当然很难判断；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尽管这些企图在执行上还不完善，然而基本上和塞瓦斯托波尔的积极防御十分近似；同时这些企图的执行情况看来很像是有某一个欧洲军官给西帕依制定了正确的

计划，可是由于他们自己还没有能够完全领会它的精神，或者是由于组织松懈和缺乏指挥，于是现实可行的计划变成了软弱无力的企图。

弗·恩格斯写于 1857 年 11 月 16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12 月 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88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 英国的贸易危机

当我们在大洋这边演奏那部后来震耳欲聋地响彻全世界的宏伟的破产交响乐的前奏曲时，我们那位有点怪癖的同行，伦敦“泰晤士报”曾大奏其以英国贸易的“健康”为主题的庄严华丽的变奏曲。但是现在“泰晤士报”换上另一种比较低沉忧郁的调子了。在“欧罗巴号”轮船昨天运到我们这个幸福之岸的最近一期即 11 月 26 日这一期上，这家报纸宣称：“英国的商业阶级已经病入膏肓。”然后，这家报纸极端愤激地感叹道：

“正是在繁荣结束前的八年或十年当中那种使工商业越出正轨的竞争活动，导致了最可怕的灾难。正是世上出现了一帮无所顾忌的投机者和空头股票开发者，并且这帮人被誉为英国人勇于进取的榜样，使人们不再相信通过诚实经营来逐渐致富的途径，——正是这种情况成了万恶之源。每一个这样形成的腐化中心都在愈益扩大其影响的范围。”

我们现在不想追究英国新闻记者们十年来一直强调贸易震荡的时代已随着贸易自由的实行而永远结束是否正确，也不想追究他们现在突然从现代赚钱方式的热情歌颂者变成责难它的罗马监察官是否正确。下面这份提交给最近在苏格兰举行的债务人会议的材料，可以作为英国贸易“健康”的事实注解。

负债超过资产	
(单位：英镑)	
约翰·蒙提思公司	430 000
麦克唐纳兄弟公司	334 000
高弗莱、派蒂逊合股公司	240 000
威廉·斯密斯公司	104 000
特勒赫斯、罗宾逊合股公司	75 000
共 计	1183000

“根据这份材料可以看出”——正如“北不列颠邮报”²⁶⁷所说的，——“按照破产者本人的招供，这五家公司的债务人就损失了 1183000 英镑。”

但是，尽管有过去的一切教训而危机仍然在经过一定时期后有规则地重复发生这一事实，使我们不能把个别人的轻率冒失看做是造成危机的终极原因。如果在某一个贸易时期终结时，投机表现为直接预报崩溃即将来临的先兆，那末不要忘记，投机本身是在这个时期的前几个阶段上产生的，因此它本身就是结果和表现，而不是终极原因和实质。那些企图用投机来解释工商业之所以发生有规则的痉挛的政治经济学家，就好像那个如今已经绝种了的把发寒热当做产生一切疾病的真正原因的自然哲学家学派一样。

欧洲危机的中心至今仍然是英国，但是在英国本国，正如我们所预见到的那样，危机的性质已有所改变。如果大不列颠对美国发生危机的最初反应，主要表现为金融恐慌，而伴之以商品市场的普遍萧条以及过一段时期以后才出现的工业上的困难，那末如今占第一位的是工业危机，其次才是金融困难。如果说火灾的发生地曾经一度是伦敦，那末我在它已转移到曼彻斯特。英国工

见本卷第 350—351 页。——编者注

业过去所受到的最严重的震荡，并且是唯一引起过巨大社会变革的震荡——1838年至1843年的工业危机——只有在很短的时间里，即在1839年一度缩小；而在这个时期的大大部分时间里，利率是很低的，甚至下降到 $2\frac{1}{2}\%$ 和2%。我们指出这一事实，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伦敦金融市场业务情况的相当好转是它彻底复元的征兆，而只是想指出，在英国这样一个工业国家里，金融市场的波动决不反映贸易危机的强度和规模。试把同一天的伦敦报纸和曼彻斯特报纸比较一下。当英格兰银行以新收购一批黄金“巩固了它的地位”的时候，只注意黄金进出的伦敦报纸就喜不自胜。而曼彻斯特的报纸却愁云密布，因为它认为这种巩固是靠牺牲它的利益，即靠提高利率和压低它的产品价格而得到的。因此，甚至“价格史”²⁶⁸的作者图克先生，无论他多么善于分析伦敦金融市场和殖民地市场上的现象，可是对于在英国生产的中心中所发生的痉挛，却不仅不能描述，而且不能理解。

至于谈到英国的金融市场，那末它在11月27日前的那个星期的情况表明：一方面破产的日子和非破产的日子不断交替出现；另一方面英格兰银行的处境有所改善，而诺森伯兰和德勒穆的地方银行却倒闭了。后者是二十一年以前建立的，有408个股东，拥有实付资本562891英镑，总行设于新堡，分行分设在阿耳尼克、伯里克、赫克谢姆、莫尔珀思、北希尔兹、南希尔兹、散德兰、德勒穆。目前它负债300万英镑，——单是通过它支付的每周工资就达35000英镑。当然，德勒穆银行倒闭的第一个后果将是靠这家银行贷款的一些大煤坑和铁工厂的停工。因此，千万名工人将被解雇。

据说英格兰银行已经把它的金属储备增加了大约70万英镑。

黄金这样剧增的原因，一部分是它不再流往苏格兰，一部分是从本国和俄国运去了一些黄金，再就是澳大利亚的黄金运到了。这种流动并不奇怪，因为十分明显，英格兰银行提高利率就会减少进口，增加出口，把一部分投在国外的英国资本吸收回来，从而改变贸易差额，使相当数量的金银流入英国。但是可以同样有把握地预言，如果稍微放宽贴现的条件，黄金又会开始外流。问题只在于英格兰银行能把这些条件保持多久。

贸易部 10 月份的官方报告书——在这一个月里，最低贴现率起初提高到 6%，然后又提高到 7% 和 8%——清楚地证明了，实行这种措施的第一个后果并不是工业生产的停止，而是英国货向国外市场出口的增加和外国货进口的减少。

尽管美国发生了危机，1857 年 10 月份向美国的出口比 1856 年 10 月份增加了 318838 英镑，但是在这同一份报告书中所反映出的各种食品和奢侈品消费量的大大缩减，证明了工业品出口的这种增加是不合算的，根本不是工业繁荣的自然结果。危机对英国工业的影响，在贸易部下一个月的报告书中将会变得更加明显。如果我们把 1857 年 1 月到 10 月期间每个月的报告书比较一下，就会看出英国的生产在 5 月份曾达到它发展的最高峰，当时的出口比 1856 年 5 月份超过了 2648904 英镑。在 6 月份，随着印度起义的头一批消息传来，整个生产下降到了 1856 年同月的水平以下，而出口也比那个月减少了 30247 英镑。在 7 月份，尽管印度市场缩小了，然而生产不仅恢复到 1856 年同月的水平，而且还比它多出 2233306 英镑这样大一个数目。因此，在 7 月份，其他市

场除了它们通常消费的商品量以外，不仅必须吸收平时运往印度的那一部分商品，而且还必须吸收英国比平常多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所以，在这一个月里，外国市场大概都充满了商品，以致出口价值连续下降，从7月份的大约230余万英镑下降到8月份的885513英镑，再降到9月份的852203英镑，最后在10月份下降到318838英镑。只有研究英国的贸易报告书，才能很有把握地识破目前英国危机的秘密。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11月27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7年12月15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19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 欧洲的金融危机

昨天早晨“加拿大号”和“亚得利亚海号”轮船运来的邮件，向我们再现了一周来欧洲金融危机的经过。这段经过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汉堡仍然是危机的中心，危机比较剧烈地影响了普鲁士，并渐渐使英国的金融市场处于不稳定状态，而本来英国金融市场似乎已开始摆脱不稳定状态。风暴的遥远回声已从西班牙和意大利传来。工业活动的停滞和由此而引起的工人阶级的贫困，迅速地扩展到整个欧洲。另一方面，法国仍在继续对这种传染病进行某种抵抗，这个事实就像一个比普遍危机问题本身还要难解的谜，难住了那些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

据推测，汉堡的危机在 11 月 21 日以后，已随着保证贴现公司的建立而经过了自已的最高点，这个公司的股票认购总数达到了 1200 万马克。创办这个公司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盖有这个公司图章的期票和银行券的流通。但是过了几天，又发生了一些宣告破产以及像期票经纪人果瓦自杀之类的事件，预告新的灾难将要到来。11 月 26 日，恐慌又达到极点；于是，先是贴现公司，后来政府自己也采取办法来阻止恐慌蔓延。11 月 27 日，参议会提出了一项建议——并得到了城市土地所有者的许可——发行 1500 万马克的有息有价证券（国库券），用来发放以经久不坏的商品或以

国家有价证券作抵押的贷款；贷款数目应为抵押品的相当价值的50—66 $\frac{2}{3}$ %。这第二次想改变商业状况的试图，同第一次一样遭到了失败，两次都像船舶沉没时绝望的呼救一样。原来贴现公司本身的保证也需要另一种保证。此外，国家贷款不仅受数量限制，而且受作为抵押品的商品的种类限制，正因为有这些条件的限制，国家贷款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变得相对地没有用处了。为了维持价格，从而消除灾难的真正原因，国家必须按照商业恐慌爆发前的价格支付，并给仅仅是国外已破产的公司的债务的那种期票办理贴现。换句话说，私人资本家的损失应当用以政府为代表的整个社会的财富来补偿。这种只要求一方实行互利原则的共产主义，在欧洲资本家看来，是相当诱人的。

11月29日，汉堡的20家大商行破产了，阿尔托纳的大批商行还没有计算在内，期票贴现停止了，商品和有价证券的价格跌得非常低，各种商业都陷于绝境。从破产名单中可以看出，其中五起破产是由于在银行业务上同瑞典和挪威有联系而发生的，而一家破产的乌尔贝格—克拉麦尔商行，债务达到1200万马克；五起发生在殖民地商品的贸易方面，四起发生在经营波罗的海沿岸商品的贸易方面，两起发生在工业品出口方面，两起发生在保险业方面，一起发生在证券交易所，一起发生在造船工业。瑞典对于汉堡这个自己的出口商、期票经纪人和银行家的依赖是如此之深，以致汉堡市场的历史也就是斯德哥尔摩市场的历史。所以，在倒闭发生两天以后，就有电报说，汉堡发生破产使斯德哥尔摩也发生了破产，国家的支持在那里也没有效果。瑞典在这方面是如此，丹麦在这方面更是如此，因为丹麦的商业中心阿尔托纳不过是汉堡的郊区而已。12月1日发生了大批的破产，其中包括两家

很老的商行，一家是经营殖民地商品、主要是做糖生意的康拉德·沃尼克商行，这家商行拥有资本 200 万马克，同德意志、丹麦、瑞典有广泛的联系，一家是同瑞典和挪威有业务联系的劳伦特·安姆·恩德商行。有一个船主兼批发商因陷于困境而自杀了。

汉堡的贸易总额，根据下列事实可以推算出来：正好在这个时候，汉堡的仓库和港口积存的各种属于汉堡商人的商品约值 5 亿马克。共和国现在采取的消除危机的唯一办法，是免除本国公民支付债款的义务。可能会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各种期票延期一月支付。至于普鲁士，报纸只是稍微提了一下莱茵河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工业区的艰难状况，因为这种状况还没有引起大批的破产，只有施特廷和但泽的谷物出口商和柏林的 40 个左右工业家破了产。普鲁士政府对这些事情干预表现在它委托柏林银行发放商品抵押贷款，并废除了高利贷法。前一措施在柏林将同在斯德哥尔摩和汉堡一样地白费力气，后一措施只会使普鲁士处于同其他商业国一样的境地。

汉堡发生倒闭的事对于那些以为目前的危机是用纸币人为地哄抬价格造成的富于想像力的人，是一个有力的回答。至于货币的流通，汉堡同这个国家完全相反。汉堡除了白银以外，没有别的货币。那里根本没有纸币流通，值得这个城市骄傲的是，在那里执行交换手段职能的完全是金属。然而目前，那里是一片极端的恐慌；自从普遍商业危机（它的发现和彗星一样，还不太久）出现以来，汉堡总是这种危机喜爱的场所。在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多年间，那里曾两次发生现在这样的事件。如果说，汉堡有什么特点，使得它与世界上别的大商业中心不同，那就是利率经常而剧烈地波动。

现在撇开汉堡来看看英国，我们发现，伦敦金融市场的状况从

11月27日至12月1日在逐渐好转,但后来又开始了相反的变化。11月28日,白银的价格的确下跌了,但12月1日以后又回升,而且大概会继续上涨,因为汉堡需要大量的白银。换句话说,黄金又将从伦敦外流,去购买大陆的白银,黄金重新外流的情况要求英格兰银行再把螺丝拧紧。除了突然产生的汉堡对白银的需求以外,预料不久将来要给印度一笔贷款,不管政府怎样力图推迟这个倒霉的日子,但是总免不了要拿出这笔贷款。本月1日以后发生的新的破产,也有助于消除关于金融市场已经经过了最坏时刻的错觉。奥维尔斯顿勋爵(银行家劳埃德)在上院会议开幕时指出:

“对英格兰银行的下一次压力,大概在账目调整之前就要产生,而且那时候,危机将比我们目前正在它面前表示屈服的这次危机更加严重。严重的和危险的困难正在威胁着我国。”

汉堡的灾难,在伦敦还没有感觉到。金融市场情况的好转对商品市场有良好的影响;但是,不管货币量可能再次减少的情况如何,施特廷、但泽和汉堡的商品价格的猛跌,显然不能不使伦敦的价格下跌。法国的一个取消禁止谷物和面粉输出的法令,立即使伦敦的磨坊主不得不把每280磅的价格降低3先令,以阻止法国面粉流入。有报道说,粮食贸易方面发生了几起破产,但这些破产只涉及较小的商行以及粮食交易所里一些签订了定期交货合同的投机商。

在英国工业区里,专门为印度市场生产的棉织品,如咖啡色的衬衫料子、薄棉布、印度白棉布以及也是为这个市场制造的纱,1847年以后在印度第一次开始卖到了好价钱,除此以外,没有发生任何新事情。从1847年起,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经营这种贸易所得的利润,不是从在东印度出售他们的商品中得到的,而纯粹是

从在英国出售他们自己从东印度运回的商品中得到的。从 1857 年 6 月起，由于发生起义，英国向印度的输出几乎完全停止，这使得印度市场把积存的英国货都吸收了，甚至还可能按照提高了的价格把新供应的货物销售出去。在通常的条件下，这种情况会使曼彻斯特的贸易异常活跃起来。但目前，正如我们从私人信件中知道的，这种情况仅仅使那些销路最广的商品的价格稍微上升了一点，同时由于这种情况，有大量待雇的劳动力拥向这些商品的生产，如果把它们全部加以利用，那末，生产出的成品可以在最短期内充斥整整三个印度。英国工业区的生产力近十年来增加的总量很大，即使工作量比过去的规模缩减三分之一以上，工业也能支持，因为厂主在自己的仓库里积存了大量商品。杜费公司的先生们在他们的曼彻斯特贸易月报中写道，“本月贸易曾经中断；成交很少，价格一律都非常低。交易总额从来没有 11 月这样少”。

在这里，注意一下英国谷物法的废除在 1858 年将第一次经受严重考验这个事实，也许是适当的。部分地由于澳大利亚的黄金和工业繁荣的影响，部分地由于歉收的自然结果，在 1847—1857 年期间小麦的平均价格比 1826—1836 年期间较高。现在，在国内销路减少的同时，还要经受外国农产品的尖锐竞争，而且大概又要发生似乎已经被人遗忘的 1815—1832 年的不列颠史册上的农业危机。诚然，皇帝的诏书发出之后法国小麦和面粉价格的上涨，只是暂时的，在开始稍微广泛地向英国输出之前就停止了。但是，在法国金融市场继续不振的情况下，法国将被迫把自己的谷物和面粉抛向英国市场，而同时德国也将把自己的农产品大力塞进英国市场。随后春天一到，船只将从美国载运货物而来，给不列颠的粮食市场以致命的打击。全部价格史使我们有根据这样推测，如

果接着来几次丰收，那我们就会看到，谷物法的废除，首先对于农业工人来说，其次对于农场主来说，归根到底对于整个不列颠土地所有制来说，其真正后果将会是什么。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12 月 4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7 年 12 月 22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202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 欧洲的危机

我们昨天收到的一份由“尼亚加拉号”轮船带来的邮件，以及我们对现有整套的各种英国报纸的细心研究，都只是证明我们在不久以前所阐明的关于英国危机进一步发展的看法是正确的。伦敦金融市场肯定地在好转，也就是说，英格兰银行地下室的黄金在积聚，在英格兰银行要求期票贴现的在减少，第一流的有价证券在伦巴特街 269 可以按 9.5—9.75% 贴现，国家有价证券的行市保持稳定，证券交易所的状况也有了某种程度的好转。然而，这种表面上的乐观情景却因为以下种种事实而黯然失色：在伦敦，每隔两三天就有一些大的破产事件发生；每天的电讯可悲地报道外地的灾难；伦敦“泰晤士报”大发雷霆，对英国商业阶级普遍的无可救药的堕落无比愤懑。本来，最好的期票可以比较容易地贴现，但是由于能够被认为是最好的期票愈来愈难找到，在实际上，这种机会显然就十分难得了。因而，我们在伦敦最近发表的关于金融问题的论文里看到，针线街的业务活动非常“有限”，而伦巴特街的交易也很少。可是，因为来自英格兰银行和贴现所的供应日益增加，而对它们的压力即它们的主顾的需求日益

减少，所以应该承认，金融市场的状况是比较良好的。尽管如此，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还是不敢降低贴现率，因为他们显然相信，金融危机的再次出现不是时间问题，而是取决于贴现率，因此降低贴现率必定会引起金融危机的重复出现。

虽然伦敦金融市场的状况开始有了某种好转，但英国商品市场的紧张程度依然在不断增长，尽管价格一直下跌，购买商品的人还是愈来愈少。甚至像油脂这种从前是例外的商品，现在由于不得不出售，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把 12 月 18 日以前一周的价格同 11 月份几周的价格作一比较，可以看出 11 月出现的价格急剧下跌的情形又出现了。但是这一次不是恐慌性的下跌，而是一步步的下跌。至于工业，郎卡郡的六家纺织厂、西莱丁毛纺织业中的三家主要商行和伍斯特地毯生产中的一家大商行的倒闭，现在证明了我们关于严重的工业危机的预言是正确的。

商品市场上和工业部门中的这种双重危机的现象将愈来愈明显，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从曼彻斯特寄给本报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摘录下来的一段话就可以知道了：

“您未必会想像得到市场受到的连续不断的压力及其严重后果。任何人也不能把任何东西卖掉。价格一天天地下跌。情况已经到了这种程度，连殷实可靠的商行都根本不愿意拿出自己的商品。纺织业者陷于绝望的境地。棉纱商人只收现金或者要有双倍的保证金才把棉纱卖给织布业者。如果这种情形继续下去，一定会引起可怕的破产。”²⁷⁰

汉堡的危机刚刚平息。这是过去见过的所有金融危机中最正

规最典型的例子。除了白银和黄金，一切都贬值。老商行倒闭，因为它们连一张到期的期票也不能用现金偿付，虽然它们保险柜里放着的期票比提出要支付的期票的价值高百倍。然而在这个时候，这些期票不值分文，这并不是由于期票已失去信用，而是由于期票不可能贴现。据现有的消息，如富有的克·马·施勒德尔老商行在倒闭以前曾经接到他的兄弟勒·亨·施勒德尔从伦敦来的电报，说要拨给它价值 200 万的白银，但是该商行在回电中说：“300 万，否则分文不要。”这 300 万没有来到，克·马·施勒德尔就破产了。再看看完全不同的一种例子：欧洲报刊曾经多次提到的乌尔贝格商行负债 1200 万马克，其中期票 700 万，而现在表明，这个商行用来经营其整个庞大业务的资本总共只有 30 万马克。

在瑞士，特别是在丹麦，危机显著地加剧了。灾难似乎刚刚过去而又出现，这是由于汉堡、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有大批款项到了支付期限。例如，在 12 月，从里约热内卢运咖啡到汉堡的出口商提取的价值 900 万的期票到期了；所有这些期票都遭到了拒付，而这种大量的拒付引起了新的恐慌。在 1 月，用来支付巴伊亚和佩囊布库运来的砂糖的贷款的期票，大概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而这又会重新导致危机的发生。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12 月 18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1 月 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21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法国的危机²⁷¹

法兰西银行不断降低它的贴现率,从11月12日以后规定的10%降到11月26日的9%,12月5日的8%,12月17日的6%。皇家的报刊当然利用这一点作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商业动荡趋于下降,“法国将不发生任何灾祸而通过严格的考验”。用他们的话来说,拿破仑第三的金融体制造成了“法国对所有其他国家的这种明显的贸易上的优越性”,保证法国现在和将来永远“在发生危机的时候比同它竞争的国家遭受的苦难要小”。但是,6%这一银行贴现率在法国除了1800年2月,在伯父建立法兰西银行几天后有过后,从本世纪开始以来一直到侄子执政时的1855年和1856年危险时期从未有过。但是,即使法兰西银行把自己的利率再降低一些,譬如降低到4%,结果又怎样呢?在1847年12月27日,贴现率曾经降低到4%,当时普遍危机还在继续,危机在法国还没有达到顶点。那时也像现在一样,政府庆贺法国幸免于普遍危机,只不过轻微地擦伤了一点,而且这点伤也是最表面的。但是过了两个月以后,财政上的地震却颠翻了皇座和坐在上面的那位聪明人。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路易·菲力浦。——编者注

当然，我们不会来辩驳这样一个事实，即直到现在为止危机对法国商业的伤害要比所预料的轻微。这一点原因很简单：法国同美国、大不列颠和汉撒城市的贸易差额是——并且早就是有利的。所以，要上述国家所遭受的灾难直接影响到法国，那必须是法国对上述国家发放了广泛的信贷，或者是为了投机积压了向这些国家出口的商品。但是这些情况都没有。因此，美国、英国和汉撒城市中所发生的事件不会引起法国的贵金属外流；法兰西银行之所以在几个星期之中曾经把利率提高到英格兰银行的水平，也只是因为害怕法国资本开始向国外寻找更有利的投资场所。

但是，不能否认，普遍危机甚至在目前的阶段上，也是以相应于法国同美国、英国和汉撒城市的贸易关系的形式影响了法国，这种形式就是经常性的停滞。这种情况迫使曾经在 11 月 11 日的信件中说“灾难仅仅存在于想像之中”的波拿巴，发表了另外一则正式文告，文告的大意是，“虽然法国商界历来具有审慎的作风，政府保持着警觉，商业危机仍然迫使许多工业部门即使没有停止生产，至少也缩减了生产或降低了工资”，因而“大批工人苦于被迫赋闲”。所以他设立一笔 100 万法郎的贷款来救济贫民和赋予他们就业手段，命令在里昂采取军事预防措施，并通过自己的报纸对私人慈善事业发出呼吁。储蓄银行的取款额开始大大超过新存入的存款额。很多厂主由于在美国和英国的破产而遭受了巨大损失。巴黎、里昂、牟尔豪森、鲁贝、卢昂、利尔、南特、圣亚田及其他工业中心的生产急剧缩减；马赛、哈佛尔和波尔多等地也感觉到严重的困难。

全国商业的普遍停滞特别明显地反映在法兰西银行最近一次的月报中，这份月报表明 12 月份货币流通量较 10 月份减少了

7304 万法郎，较 11 月份减少了 48955900 法郎。同时，贴现期票的总额比 10 月份大约减少 1 亿法郎，比 11 月份减少 77067059 法郎。在法国报刊目前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确切弄清楚外省城市发生的破产事件的性质，至于巴黎的破产事件，虽然，这些事件目前当然还没有表现出任何严重的性质，但毕竟有日益发展的趋势，不仅就遭到破产的企业数量来说是如此，而且就其质量来说也是如此。在从 11 月 17 日至 12 月 1 日的两个星期中，巴黎共发生 34 起破产事件，其中至少有 24 起是发生在这样一些人中间，如：旧衣商、牛奶商、成衣匠、假花匠、木匠、女式手提包制造商、镀金工匠、皮件商、珠宝商、流苏制造商、米醋商、便帽制造商、水果商等等。从 12 月 1 日至 8 日至少发生了 31 起破产事件，而从 9 日至 15 日则增加到 34 起，其中包括几家比较大的商行，如布尔顿、杜比克先生的银行，voitures de remise〔出租马车〕总公司，提花织机制造公司，一家植物油制造公司，等等。另一方面，波拿巴以取消禁令来阻止小麦和面粉价格狂跌的企图遭到了失败：从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21 日价格一直往下跌，而且，尽管在伦敦出售这种产品可以得到厚利，截至 12 月 22 日，运往那里的小麦和面粉仍不超过 3000 袋（110 公斤装）。

但是，如果说法国同美国、英国和汉撒城市的贸易差额为顺差，那末对南俄、关税同盟、荷兰、比利时、列万特和意大利的贸易差额是不利的。瑞士在目前贸易上始终是逆差，但是法国却欠了它那么多的钱，——因为大多数亚尔萨斯工厂靠瑞士的资本进行生产，——以致于在瑞士缺钱的时候，总是会给法国的金融市场以很大的压力。目前，也和过去一样，只要上述各国的贸易上的困难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在法国便不会出现尖锐的危机。

只要考虑一下荷兰的数目仍然相当大的贸易几乎仅仅限于那些价格已经跌落、并且继续狂跌的物品，就会明白荷兰不可能顺利地通过目前这一次考验。在关税同盟的各工业中心中，预示危机的到来的征兆已经明显地出现。的里雅斯特报纸不断表示担心在黑海和列万特的贸易破产，并且只要一出现这个行将到来的灾难的预兆，就会使马赛数家大商行垮台。最后，当金融恐慌在欧洲北部似乎开始平静下去的时候，在意大利它却又猛烈地爆发起来了，这一点可以从12月18日米兰“舆论报”²⁷²的下列一段话中看出：

“当前的困难是非常非常巨大的；破产达到了可怕的规模；在帕勒阿里、巴拉博公司、契格拉、雷达埃里、韦赫勒和马佐拉破产之后，在国外发生了那些也影响到我国的破产事件之后，在维罗那、威尼斯、乌迪讷和贝尔加莫的最好的商行停止了支付以后，我国最有实力的商号也动荡起来并开始结算。而这些结算数字是很惨的。只要看看我国经营绸缎的最大商行没有一家的仓库里不放着至少5万磅的绸缎就明白；由此不难算出，按照现行价格计算其中每一家都要损失50万到200万法郎，因为其中有些商行的存货超过15万磅。勃兰比尔兄弟商行得到了150万法郎借款的支援，巴蒂斯特·加瓦戚商行正在结束事务，其他公司也在这样做。每一个人都在问自己：他的前途如何。很多财产已经消失，还有很多财产减少了一半；许多从前富裕的家庭现在沦于赤贫；许多工人没有工作，没有面包，没有任何生存手段。”

当法国的危机由于受到来自这些国家的日益增长的压力而成熟起来的时候，它必然会打击那班投机倒把之徒，也许就是商业冒险家；也会打击政府，这个政府在法国所起的作用同私人商业在这个国家、英国和汉堡所起的作用完全相同。危机将猛烈地冲击证券市场并使它的主要支柱即国家本身遭受危险。法国的商业和工业缩减的自然结果将是，交易所取得对货币的支配，尤其是

美国。——编者注

法兰西银行还必须发放以国家有息证券和铁路有价证券为抵押的贷款。法国商业和工业目前的停滞局面并没有妨碍交易所的活动，而是有利于这种活动。例如，我们从法兰西银行最近一次的月报中看到，该行以铁路股票为抵押的借款数字在期票贴现和货币流通缩减的同时增多了。因此，尽管法国大部分铁路的收入锐减，但它们的证券行市却提高了；例如，奥尔良线的收入以 11 月底同去年同期比较减少了 22.5%，但是它的股票价格 12 月 22 日为 1355 法郎，而 10 月 23 日只有 1310 法郎。

当法国的商业开始萧条的时候，几家铁路公司立即被迫停止营业，而同样的遭遇也威胁着几乎其余所有的铁路公司。为了扭转它们的这种情况，皇帝强迫法兰西银行同铁路公司签订合同，由于合同的关系，法兰西银行实际上变成真正的铁路承包人。法兰西银行应当发放以下列新本票为抵押的货币贷款，即根据 1856 年 11 月 30 日的协定规定铁路公司有权在 1858 年发行的本票，以及其中在 1857 年就应当发行的那部分本票。准许在 1858 年发行的本票，其总额为 4250 万。看来 *Crédit Mobilier*²⁸ 也受到一旦遭到危机的打击就要破产的威胁，12 月 3 日该行只得在对自己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出售该行数量庞大的有价证券中的一部分。目前有一个把 *Crédit Mobilier* 同 *Crédit Foncier* 和 *Comptoir d'Escompte*²⁷³ 合并的方案，以便把赋予后面两个机关的权利扩大适用于前者，使它也能在法兰西银行办理自己的期票贴现和以自己的有价证券为抵押取得借款。因此，这个计划显然是要法兰西银行负担所有这些康采恩的责任，使它们经受得住风暴，这样做无疑使法兰西银行本身遭到破产的危险。但是，甚至连拿破仑第三也不会想到去迫使法兰西银行按照对那些各种各样股份公司的私人股东提出的

要求办理支付。不算小额款项，到 12 月底须要办理支付的要求如下：马德里工商业公司（路特希尔德家族）每股为 30 美元，法美航运公司每股为 10 美元，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铁路公司每股为 30 美元，厄尔谢朗施铁工厂公司每股为 20 美元，地中海铁路公司每股为 30 美元，奥地利铁路公司每股为 15 美元，萨拉哥沙铁路公司每股为 10 美元，法国瑞士铁路公司每股为 10 美元，Société générale de tanneries〔皮革厂总公司〕每股为 10 美元，Companie de la carbonisation de houilles〔炼焦公司〕每股为 10 美元，等等。在本年年初，即将办理支付的有：希梅—马里恩堡铁路公司每股为 20 美元，伦巴第—威尼斯铁路公司每股为 12.5 美元，比利时和南美洲各轮船公司每股为 20 美元。根据 1856 年 11 月 30 日的协定，1858 年仅法国铁路的要求的总额就几乎有 5000 万美元。毫无疑问，存在着严重的危险，这就是由于这些沉重的负担，法国在 1858 年会像英国在 1846—1847 年那样遭到破产。不仅如此，德国、瑞士和尼德兰的资本家还持有大宗的法国有价证券，当危机在这些国家继续发展时，这些有价证券的大部分将会由它们的持有人投入巴黎的交易所，不问任何价格来把它们变为现金。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12 月 25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1 月 1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219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 勒克瑙的围攻和强攻

加尔各答寄出的最近一班邮件带来了一些详细报道，它们通过伦敦的报纸传到了我们这里。根据这些报道，人们对科林·坎伯尔爵士在勒克瑙的活动做出判断。既然英国报纸断言，这个战功在战史上享有无上的光荣，我们不妨稍微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勒克瑙城位于古姆提河右岸，该河在这个地区是顺东南方向流的。在离河 2—3 英里的地方，有一条几乎与它平行的运河，运河穿过城市，在城市下方逐渐靠近古姆提河，在离城约 1 英里的地方流入该河。在古姆提河两岸没有人群熙攘的街道，只有一些宫苑和个别的公共建筑。在运河和古姆提河汇合的地方，在它们的右岸即南岸，拉马蒂尼埃尔学院和迪尔库什宫苑并肩而立。在运河的另一岸，但仍在古姆提河的南边，紧靠着河岸，首先是锡康德尔巴格宫苑，再向西是兵营和军人餐厅²⁷⁴，然后是马提-马哈尔（珍珠宫），它距离驻劄官官邸只有几百码远。驻劄官官邸矗立在这一带唯一的高地上，它瞰制全城，有高墙围护，内有几座宫殿和附属的房屋。这些建筑物以南就是人烟最稠密的市区，再向南 2 英里是阿朗巴格宫苑。

驻劄官官邸所处的天然优势立即说明，为什么英国人能够坚

守官邸,抵抗数量远远超过自己的敌人;但是这件事本身同时也说明:奥德人是哪一种战士。的确,这些人多少受过欧洲军官的训练而且拥有很多火炮,可是直到现在还攻不破欧洲人防守的唯一的一道不堪一击的围墙,这种人,从军事观点来看,无非是些野人;所以不管他们在数量上占多么大的优势,战胜他们并不能给军队增添多少荣誉。还有另一件事实可以说明奥德人是最不堪一击的敌人,那就是哈弗洛克不顾街垒和设有射孔的房屋等等,冲过了最稠密的市区。他的损失的确很大,但这战斗行动连1848年最糟糕的巷战也比不上。如果进行了真正的战斗,他这支人数不多的队伍中没有一个人能安然通过。显然,房屋根本没有加以防守,不然,要想占领足以保证一条畅行通道那样多的房屋,就需要用几个星期。至于哈弗洛克这样猛冲猛打表现了多少谋略,我们还无法判断,据说,他是由于驻劄官邸处于极严重的情况才被迫这样做的,还有人举出其他的理由;但确实的情况却一点也不知道。

当科林·坎伯尔爵士抵达的时候,他带来约2000名欧洲步兵、1000名锡克步兵、350名欧洲骑兵、600名锡克骑兵、18门骑炮兵的火炮、4门攻城炮、300名水兵和一些重海军炮,总共5000人,其中欧洲兵有3000人。就数量来说,这支部队同曾经立过大功的大多数英印军队不相上下,事实上,查理·纳皮尔爵士在征服信德时所率领的野战部队恐怕不到这个数目的一半,往往还要更少一些。另一方面,这支部队中有大量欧洲人,而且所有的土著士兵都属于印度最饶勇善战的民族,即锡克人,这就使得这支部队的内在力量和团结程度比一般的英印军队强得多。我们上面已经说过,这支部队的敌人是不堪一击的,他们大部分都是一些拼凑而成的民兵,而不是训练有素的士兵。诚然,奥德人被认为是下印度斯坦最

勒克瑙的围攻和强攻

尚武的部落,但这只是与那由于世界上最使人懒散的气候和世世代代的压迫而精神面貌已被彻底摧残的怯懦的孟加拉人相对而言。奥德人那样听任自己的国家被“海盗式”地并入东印度公司的领地以及他们在起义期间的一切表现,无疑地使人认为,他们在勇敢和智慧方面都赶不上西帕依。不错,有人告诉我们,数量弥补了质量的不足。有些通讯的作者说,城里足有 10 万奥德人。无疑,他们在数量上比英国人多三倍或五倍,甚至可能还要多些;但是,和这样的敌人作战,这一点是没有多大关系的。任何阵地只能由一定数量的士兵防守,如果这些士兵决心要逃跑,即使在半英里内有比这多三四倍的这样的英雄,也没有多大意义。毫无疑问,就是在这些奥德人中间也曾出现不少个人英勇的例子。其中有些人也可能勇猛如狮;但是,当守军中的那些乌合之众已逃走,这些人对于他们已经无力防守的地方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似乎没有企图把所有的人统一在共同的指挥之下;他们的地方首领只在自己的人中间才享有威信,而首领们自己也不愿意服从任何人。

科林·坎伯尔爵士首先向阿朗巴格前进;然后,他没有像哈弗洛克那样硬冲过市区,而是利用这位将军的经验,转向迪尔库什和拉马蒂尼埃尔。11月13日,这些建筑物的围墙前面的奥德散兵被肃清了。15日开始攻击。敌人却非常疏忽大意,直到这时还没有完成以堑壕加固迪尔库什的准备工作;迪尔库什立刻就被攻下,没有遇到多少抵抗,拉马蒂尼埃尔也是如此。这两个阵地使英国人掌握了运河线。敌人越过这个障碍,进行反攻,企图夺回早晨丧失的这两个地点,但很快就被击退,并遭到严重的损失。16日,英军渡过运河,向锡康德尔巴格宫攻击。这里的堑壕比较好些,因此坎伯尔将军慎重地利用炮兵攻打这个地点。等到防御工

事被破坏以后，步兵向前冲锋，占领了该地。接着，另一个据点萨穆克遭到3小时的炮击，按照坎伯尔爵士的说法，它是“经过他亲眼见过的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之后”才被攻下的，一位聪明的战地记者补充说：“很少有人像这位将军这样，见过这么多激烈的战斗。”我们倒想知道，坎伯尔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些战斗。肯定不是在克里木，因为他在阿尔马河会战²⁷⁵后就在巴拉克拉瓦过着安静的生活；他手下只有一个团参加了巴拉克拉瓦会战，而参加因克尔芒会战的，一个团也没有。

17日，炮兵对准通往驻劄官官邸道路上的下一个阵地——兵营和军人餐厅轰击。炮击继续到3点钟，然后步兵攻占了这个地区。逃跑的敌人受到猛烈的追击。在进攻的军队和驻劄官官邸之间还剩下一个阵地——马提-马哈尔。黄昏前，这个阵地也被攻下，与警备部队的联系完全恢复了。

当然，坎伯尔选择了比较容易打通的路线，在他的队伍开始进攻之前利用重炮摧毁据点，他在这方面所表现的谋略是值得赞许的。但是英军在这次战斗中具有以训练有素的、服从于一位指挥官的士兵来对付根本无人指挥的半野人的有利条件，而我们也看到，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他们非不得已不让自己的士兵冒险。只要还有目标需要破坏，他们就不断地使用炮兵。毫无疑问，他们是勇敢作战的；但是值得赞扬的是他们的小心谨慎。对于这一点，最好的证明就是伤亡的人数。虽然士兵伤亡人数尚未公布；但是在军官中仅死5人，伤32人。在5000人的军队中，军官至少应当有250到300名。英国军官当然是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的。给自己的部下树立英勇的榜样，常常是他们所知道的唯一职责。但是，如果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大家都知道需要牺牲

极多的人才能攻占的这种阵地上连续进行了三天的战斗，损失却只有八分之一或九分之一，这就谈不上是激烈的战斗了。从英国的历史上举一个例子来看，与滑铁卢会战时的乌古蒙和拉埃桑特的防御战²⁷⁶对照一下，在印度的这些战斗全部加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现在把每一次小接触都说成是酣战的通讯作者们，对于使一方丧失一半兵力而另一方丧失三分之一兵力的博罗迪诺会战²⁷⁷，又将怎样说呢？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1 月 4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1 月 3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235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英国的贸易

在英国议会最近举行的非常会议上,得比勋爵在上院宣布:最近三年以来,英国进口价值已超过英国出口价值 16000 万英镑。这项声明在议会外面引起了争论,有些人向贸易大臣奥尔德利的斯坦利勋爵征询得比勋爵的说法是否正确。贸易大臣在写给征询者的一封信中这样回答道:

“得比勋爵在上院说,最近三年以来,我国进口价值已超过我国出口价值 16000 万英镑,是不对的,得比勋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所取的进口总值包括了我国从殖民地和外国的全部进口,但是在出口总值中却没有把我们 从殖民地和外国购来的商品的再出口计算在内。所以得比勋爵的计算是:

	英 镑
进 口.....	468000000
出 口.....	308000000
	差 额..... 160000000
其实应当是:	
	英 镑
进 口.....	468000000
出 口.....	371000000
	差 额..... 97000000”

贸易大臣为了证实这段话,又把 1855 年、1856 年和 1857 年联合王国的进出口价值作了比较。我们把这份在伦敦各家报纸上

找不到的最有趣的文件印在后边。首先，我们会看到，可以赋予这些统计数字以一种能证实得比勋爵的说的形式，即：

	英 镑
全部进口	468000000
英国货的出口	308000000
<hr/>	
进口超过英国货的出口	160000000
外国货的再出口	63000000
<hr/>	
大不列颠入超	97000000

因此，外国货的进口确实比英国货的出口超过了 16000 万英镑，除了外国货的再出口 6300 万英镑以外，按照贸易大臣本人的说法，英国入超 9700 万英镑，也就是在 1855 年、1856 年和 1857 年三年中，每年平均入超 3200 多万英镑。不久前伦敦“泰晤士报”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而埋怨道：“实际上，最近五六年以来我国一直有亏损，而我们只是现在才发现。”但是，造成这些亏损的原因并不是进口超过了出口，而是一大部分出口货所具有的特殊性质。

问题在于：再出口中有一半都是外国原料，它被外国工业用来加剧不利于英国工业利益的竞争，并且有一部分又以制成品形式回到英国人手中，供他们国内的消费。但是，必须考虑到的决定性因素是，大陆工业的竞争所造成的原料的大量再出口，使原料价格高涨到几乎要完全吞没英国工厂主的利润。以前，我们曾在这种意义上对英国棉织工业发表过一些意见。既然现在英国毛织工业地区工业危机最猖獗，企业不断倒闭，既然伦敦报纸竭力向公众隐瞒这一切，在这里就不妨援引一些数字来说明欧洲大陆

上的工厂主为了羊毛而与英国工厂主展开了多么激烈的竞争，这场竞争使这种原料的价格空前高涨，涨风毁灭了工厂主，同时也助长了目前对这种商品的大量投机。下面这个表包括最近五年中每一年的前九个月的材料：

进口（单位：磅）			
年份	从外国	从殖民地	总 计
1853	37568199	46277276	83845475
1854	27006173	50187692	77193865
1855	17293842	53896173	71190015
1856	22377714	62148467	84526181
1857	27607364	63053100	90657464

出口（单位：磅）			
年份	向外国	向殖民地	总 计
1853	2480410	4343166	6823576
1854	5993366	13117102	19110468
1855	8860909	12948561	21809470
1856	5523345	17433958	22957303
1857	4561000	25068787	29629787

因此，英国国内消费的外国羊毛和殖民地羊毛的数量就表现为下述数字：

羊毛（单位：磅）	
年份	
1853	77021899
1854	58083397
1855	49380545
1856	61568878
1857	61027677

另一方面，英国国产羊毛的出口量是：

年份	磅 数
1853	4755443
1854	9477396
1855	13592756
1856	11539201
1857	13492386

如果从联合王国进口的外国羊毛的总数中，先减去向国外再出口的数量，再减去英国羊毛的出口数量，就可以得出英国国内消费的外国羊毛的实际数量：

年份	磅 数
1853	72266456
1854	48606001
1855	35787789
1856	50029677
1857	47535291

这就是说，联合王国进口的殖民地羊毛从 1853 年前九个月的 46277276 磅增加到 1857 年同一时期的 63053100 磅，各种羊毛的进口总额在那两个同样的时期从 83845475 磅增加到 90657464 磅，然而欧洲大陆上对羊毛的需求大有增长，以致英国国内消费的外国羊毛和殖民地羊毛的数量在这五年中从 1853 年的 77021899 磅缩减到 1857 年的 61027677 磅；如果再计入英国羊毛的出口量，就可以得出一个总的缩减数字，即从 1853 年的 72266456 磅缩减到 1857 年的 47535291 磅。如果注意到伦敦“泰晤士报”一篇金融论文中所揭示的事实，即联合王国在增加羊毛出口的同时增加着大陆毛织品特别是法国毛织品的进口，那末这里所说的这些情况的意义就变得更明白易晓了。

根据奥尔德利的斯坦利勋爵所提供的数字，我们编制了以下这个表格，说明与大不列颠通商各国的出超或入超的程度：

1855、1856 和 1857 年对英国的贸易出超

	英 镑
1. 美国	28571764
2. 中国	22675433
3. 东印度	19605742
4. 俄国	16642167
5. 普鲁士	12842488
6. 埃及	8214941
7. 西班牙	7146917
8. 英属西印度	6906314
9. 秘鲁	6282382
10. 瑞典	5027934
11. 古巴和波多黎各	4853484
12. 毛里求斯岛	4672090
13. 新不伦瑞克	3431303
14. 丹麦	3391144
15. 锡兰	3134575
16. 法国	2696291
17. 加拿大	1808454
18. 挪威	1686962
19. 非洲（西部）	1432195
20. 葡萄牙	1283075
21. 双西西里王国	1030139
22. 智利	693155
23. 布宜诺斯艾利斯	107676

1855、1856 和 1857 年对英国的贸易入超

	英 镑
1. 汉撒城市	18883428
2. 澳大利亚	17761889
3. 土耳其	6947220
4. 巴西	7131160
5. 比利时	2214207
6. 荷兰	1600904
7. 好望角	59661

单是英国在三年中进口比出口超过 9700 万英镑的事实,还决不能作为英国人目前叫嚷“他们每年在贸易中亏损 3300 万英镑”、他们的贸易只是对外国有利的根据。对英国在世界各地大量的和日益增长的投资,必须支付利息、股息和利润,这些钱有很大一部分必须以外国产品的形式寄回英国,因而使英国的进口量扩大。除了与出口相应的进口以外,还必须有不只是为了支付所提供的商品、而是作为资本收益的额外的进口。因此,一般说来,所谓贸易差额应该对外国说来总是出超,对英国说来总是入超,因为世界各国每年不仅要向英国偿付货款,而且还要支付所欠英国债务的利息。上述数字唯一可能使英国真正感到不安的,是英国显然不能在国内为它的巨额资本找到足够广阔的场所,因而不得不愈来愈大量地出借这些资本,并且像处于衰落时代的荷兰、威尼斯和热那亚那样,亲手为自己的竞争者锻造武器。英国为了给它的剩余资本寻找投资场所而放出大量贷款,必然会助长别国的投机,这样就无异于为了保存和扩大自己的财富而拿这笔财富去冒险。英国被迫向其他工业国例如欧洲大陆借出大量贷款,就是自己向它的工业竞争者提供与它争夺原料的资金,因而也就是自己为自己的工厂抬高原料价格。英国工厂主因此只剩下很微薄的利润,并且,由于这个国家的存在本身与世界工场的垄断地位有密切联系,必须经常比其他国家卖得更便宜,这种很微薄的利润还要减少。但是,这种利润的减少从工人工资的削减和国内贫困现象的迅速增长得到了补偿。这就是英国为自己的工商业优势而付出的自然价格。

1854、1855和1856年联合王国从一些主要外国和
英属领地进口和向这些地方出口的价值对照表

国 家	年份	进 口 出 口 价 值			
		进口的实际 计算价值	联合王国 产品的申 报价值	外国和殖民 地产品的实 际计算价值	合 计
(单位：英镑)					
外 国					
俄 国.....	1854	4252288	54301	19378	74039
	1855	478169	—	—	—
	1856	11561924	1595237	1775617	3370854
瑞 典.....	1854	2509539	334518	249792	584310
	1855	3325171	545384	279515	824899
	1856	2031861	629697	300795	930492
挪 威.....	1854	1369440	402290	106244	508534
	1855	1099642	487400	102551	589951
	1856	947934	488489	143080	631569
丹 麦.....	1854	2706186	758228	230010	988238
	1855	3086979	756967	260624	1017591
	1856	2201831	1033142	352173	1385315
普鲁士.....	1854	9055503	798434	1717285	2515719
	1855	10242862	1100021	2016650	3116671
	1856	4534815	933715	624908	1558623
汉撒城市.....	1854	6221524	7413715	2720274	10133989
	1855	4816298	8350228	3344416	11694644
	1856	5302739	10134813	3260543	13395356
荷 兰.....	1854	6731141	4573034	2320877	6893911
	1855	6460932	4558210	2611767	7169977
	1856	7433442	5728253	2434278	8162531
比利时.....	1854	3631161	1406932	1948740	3355672
	1855	2533732	1707693	2239514	3947207
	1856	2936796	1689975	2323042	4013017
法 国.....	1854	10447774	3175290	3216175	6391465
	1855	9146418	6012658	4409223	10421881
	1856	10386522	6432650	4038427	10471077

		(续)			
国 家	年份	进 口	出 口 价 值		合 计
		进口的实际 计算价值	联合王国 产品的申 报 价 值	外国和殖民 地产品的实 际计算价值	
		(单位：英镑)			
西班牙.....	1854	3594501	1270464	165642	1436106
	1855	4799728	1158800	135192	1293992
	1856	3645083	1734483	377820	2112303
古巴和波 多黎各.....	1854	3369444	1073861	4727	1078588
	1855	2332753	1077745	22933	1100678
	1856	2654580	1398837	25190	1424027
葡萄牙.....	1854	2101126	1370603	148997	1519600
	1855	1962044	1350791	184580	1535371
	1856	2164090	1455754	433470	1889224
双西西里王田 ...	1854	1411457	563033	109258	672291
	1855	1281940	921220	175221	1096441
	1856	1505582	1202183	197925	1400108
土耳其本部 ...	1854	2219298	2758605	317476	3076081
	1855	2294571	5639898	419119	6059017
	1856	2383029	4416029	291991	4708020
埃 及.....	1854	3355928	1253353	113895	1367248
	1855	3674682	1454371	117235	1571606
	1856	5753518	1587682	43151	1630833
美国(包括加 利福尼亚)...	1854	29795302	21410369	923034	22333403
	1855	25741752	17318086	744517	18062603
	1856	36047773	21918105	698772	22616877
巴 西.....	1854	2083589	2891840	119982	3011822
	1855	2273819	3312728	128550	3441278
	1856	2229048	4084537	179979	4264516
布宜诺斯 艾利斯.....	1854	1285186	1267125	32565	1299690
	1855	1052033	742442	26383	768825
	1856	981193	998329	43892	1042221
智 利.....	1854	1380563	1421855	43589	1465444
	1855	1925271	1330385	56688	1387073
	1856	1700776	1396446	64492	1460938

(续)

国 家	年份	进 口 出 口 价 值			
		进口的实际 计算价值	联合王国 产品的申 报价值	外国和殖民 地产品的实 际计算价值	合 计
(单位：英镑)					
秘 鲁.....	1854	3138527	949289	22236	971525
	1855	3484288	1285160	60278	1345438
	1856	3048694	1046010	26154	1072164
中国(包括 香港) ...	1854	9125040	1000716	26400	1027116
	1855	8746590	1277944	26052	1303996
	1856	9421648	2216123	70611	2286734
非洲西岸(不 包括英国领 地和法国领 地) ...	1854	1528896	646868	174073	820941
	1855	1516729	839831	219827	1059658
	1856	1657375	666374	223842	890216
外国总计.....	1854	118239554	63800605	15645612	79446217
	1855	109959539	69524475	18710749	88235224
	1856	129517568	83327154	20035442	103362596
英国领地					
加拿大.....	1854	4007052	3957085	180569	4137654
	1855	2296277	1515823	90298	1606121
	1856	3779741	2418250	123591	2541841
新不伦瑞克 ...	1854	2079674	863704	40273	903977
	1855	4379041	370560	27718	398278
	1856	1891707	572542	34322	606864
英属西印 度群岛.....	1854	3977271	1870674	166690	2037364
	1855	3978278	1389992	136022	1526014
	1856	4157098	1462156	180799	1642955
英属圭亚那 ...	1854	1636267	—	31779	31779
	1855	1491935	421398	35189	456587
	1856	1418264	411241	41248	452489

包括英属圭亚那。
已计入西印度。

(续)

国 家	年份	进 口	出 口 价 值		
		进口的实际 计算价值	联合王国 产品的申 报 价 值	外国和殖民 地产品的实 际计算价值	合 计
(单位：英镑)					
澳大利亚的 英国移民区 ...	1854	4301868	11931352	1474634	13405986
	1855	4500200	6278966	942659	7221625
	1856	5736043	9912575	1759814	11672389
英属东印度 ...	1854	10672862	9127556	493154	9620710
	1855	12668732	9949154	404321	10358475
	1856	17262851	10546190	478328	11024518
锡 兰.....	1854	1506646	382276	31228	413504
	1855	1474251	305576	20321	325897
	1856	1304174	388435	22660	411095
毛里求斯岛 ...	1854	1677533	383210	17936	401146
	1855	1723807	303173	14772	317945
	1856	2427007	420180	16977	437157
好望角和英国 南非洲领地 ...	1854	691352	921957	63309	985266
	1855	949640	791313	45437	836750
	1856	1502828	1344338	73127	1417465
英国领地总计 ...	1854	34149499	33384121	2990754	36374875
	1855	33583311	26163610	2292466	28456076
	1856	43026586	32499794	3357963	35857757
外国和英国 领地总计 ...	1854	152389053	97184726	18636366	115821092
	1855	143542850	95688085	21003215	116691300
	1856	172544154	115826948	23393405	139220353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1 月 7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载于 1858 年 2 月 3 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 5238 号

弗·恩格斯 勒克瑙的解救

我们终于得到科林·坎伯尔爵士关于解救勒克瑙的正式报告。这个报告在各方面证实了我们根据这次战斗行动的最早的非官方报道所做的结论。奥德人的抵抗不堪一击,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得更加明显,而另一方面,坎伯尔本人所引以自豪的似乎更多的是他个人指挥的高明,而不是他或他的军队所表现的任何非凡的英勇。这个报告说,英军兵力约 5000 人,其中步兵 3200 人,骑兵 700 人,其他为炮兵、水兵、工兵等。如同以前所报道的,战斗行动是以对迪尔库什的进攻开始的。这个宫苑经过短时间的战斗后被攻下。“损失微不足道。敌人由于迅速退却,损失也很轻微。”在这种情形下,确实没有机会表现英勇精神。奥德人退却非常仓卒,甚至来不及利用拉马蒂尼埃尔附近地形所提供的新防线,就一下子通过了这个地区。比较顽强的抵抗的最初表现是在锡康德尔巴格。这是一个由开有射孔的高大围墙围护着的、长宽各 120 码的方形阵地,在相距约 100 码的地方有一个设防的村庄作为侧防。在这里,坎伯尔采用了他那虽非勇敢但却谨慎的作战方法。重炮和野炮集中火力对这个宫殿的围墙进行轰击,一个旅攻打设防的

村庄，同时另一个旅把试行出击的敌人打回去。防御是很差的。像刚才所说的那两个可以相互以火力支援的筑有工事的阵地，即使由很普通的士兵，或者甚至由虽然勇敢但毫无训练的起义者防守，通常也需要相当大的努力才能攻下。但是这次似乎抵抗既不勇敢，动作又不配合，甚至连一点合乎常识的东西都没有。没有任何报道提及防守者曾使用过炮兵。村庄（显然只有很少几户人家）一攻而下。在围墙外的部队，不费什么力气就被打散了。这样，锡康德尔巴格很快就被完全孤立起来。经过一小时的炮击以后，有一处围墙被破坏，苏格兰团的士兵便闯进这个缺口，消灭了所有的防守者。据科林·坎伯尔爵士说，在那里约有 2000 个土人被杀。

下一个据点是夏纳治夫，这个阵地四周有围墙，设有防御工事，有一座清真寺作为多面堡；它又是那些虽然勇敢但没有受过充分训练的部队的任何一个指挥官所求之不得的那种阵地。在三个小时的炮击使围墙遭到破坏以后，这个地点就被攻下。次日，11月 17 日，攻打军人餐厅。这是周围有土墙和由 12 呎宽的陡壕环绕的一群建筑物，换句话说，这是壕沟不大、胸墙的厚度和高度都成问题的很平常的野战工事。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阵地在坎伯尔将军看来似乎是很难攻取的，因为他立即决定先给炮兵以充分时间摧毁这个阵地，然后再发起攻击。于是，炮击继续了整整一个上午，一直到下午 3 时，才出动步兵，一举夺取了阵地。总之，在这里也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在通往驻劄官官邸路上的奥德人的最后一个据点马提·马哈尔，被炮轰了一个小时，打开几个缺口以后，便不费力气地被攻下来。这样就结束了解救警备部队的战斗。

整个战斗行动都带有这样一种性质：训练有素、配备有足够的军官、习惯于作战并且具有一般勇气的欧洲军队，进攻一群既未受

过任何训练,又没有军官,也没有作战经验,甚至没有足够的武器,并且还由于感到敌人有双重优势——士兵对平民和欧洲人对亚洲人的优势——而丧失了勇气的犹如乌合之众的亚洲人。我们看到,科林·坎伯尔爵士似乎无论在哪里都没有遇到敌人炮兵的抵抗。往下,根据英格利斯准将的报告,我们还可以看出,很大一部分起义军一定根本没有火器;并且如果确实有2000土人在锡康德尔巴格被屠杀,那末很显然,他们一定没有配备什么武器,否则,哪怕最胆小的人也能抵抗住一个进攻的纵队,守住这个阵地。

另一方面,坎伯尔将军在指挥战斗方面所表现的战术修养是很值得称赞的。他一定了解到,由于敌人没有炮兵,他的前进是不会遇到抵抗的;因此他充分利用了这个兵种来为他的纵队的攻击扫清道路。对锡康德尔巴格及其侧防工事的攻击是进行这种战斗的范例。同时,当他一弄清防御微弱无力时,他就对这种敌人不再客气;只要围墙上一打开缺口,他就立即出动步兵。一般地说,从在勒克瑙作战之日起,科林·坎伯尔爵士就可以归入将帅之列;在此以前,他只是一名大兵而已。

勒克瑙解围后,我们终于得到一份叙述驻劄官邸被围期间所发生的事件的文件。继亨·劳伦斯爵士之后担任指挥的英格利斯准将,向总督提出了报告。根据乌特勒姆将军的说法和英国报纸的unisono〔一致意见〕,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英雄行为的范例,的确,因为据说,这种勇敢顽强的精神,这种不辞劳苦、不畏困难的毅力是从来不曾见到过的,这次勒克瑙的防御在抵御围攻的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英格利斯准将的报告告诉我们,6月30日,英军曾出击当时正好在驻劄官邸周围集中的士兵,但是被击退,损失惨重,以致他们不得不立即只限于防守官邸,甚至把附近一

批存放有 240 箱火药和 600 万发枪弹的建筑物也放弃和炸毁了。敌人立即包围了官邸；攻占并加固了与它毗邻的一些建筑物（有些距防御工事不到 50 码），这些建筑物是先前亨·劳伦斯爵士不听工兵的劝告而拒绝予以拆毁的。英军防御工事的胸墙到这时还没有全部修筑好，只有两个炮兵连的阵地可以投入战斗；但是尽管 8000 人“不间断地”以可怕的连续的火力“同时向阵地”射击，英军还是迅速完成了工事的构筑，设置了 30 门火炮。这种可怕的火力一定是漫无目标的乱射，绝对够不上英格利斯将军所称的准确射击，不然的话，约有 1200 人防守的官邸中还会有一个人幸存吗？为了证实这次射击的可怕而举出的事例，如呆在被认为隐蔽严密的地方的妇女、儿童和伤员被打死，是很不成功的例子，因为这种情况正是在敌人的火力不是对准一定的目标而是对准整个防御工事，因而从来不会杀伤真正的防守者时最容易发生的。7 月 1 日，劳伦斯受了致命伤，英格利斯继任指挥。这时敌人在阵地上有 20 到 25 门火炮，“都配置在我们的周围”。这对防守来说是很幸运的，因为如果敌人集中火力对垒墙的一点或两点射击，阵地很可能被攻占。这些火炮中有一部分配置在“我们自己的重炮射击不到”的地点。而由于驻劄官邸位于高处，进攻者配置在这些地点的火炮就不可能射到垒墙，而只能射到驻劄官邸内建筑物的顶部；这对于防守是非常有利的，因为这不会引起很大的损害，而如果用这些火炮来轰击胸墙或街垒，是会收到大得多的效果的。总之，看来双方的炮兵都使用得很糟，否则，像这样短距离的炮击，会由于相互摧毁对方的炮兵阵地而很快停止下来的。但是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形，这一直是个谜。

7 月 20 日，奥德人在胸墙下进行了一次爆破，但胸墙并没有

被炸坏。紧接着，两支主要的队伍进行强攻，同时在其他地段上进行了佯攻。但是警备部队一开火，就把他们打退了。8月10日，又进行了一次爆破，炸开了一个缺口，

“从这里可以秩序井然地通过整整一个团。一个纵队在两翼助攻下向缺口攻击，但是只有少数最坚决的敌人才到达了缺口”。

这些为数不多的敌人很快被警备部队的侧射火力击毙，而这时在两翼上进攻的一群未受训练的敌人被手榴弹和几次步枪齐射火力击退。8月18日，进行了第三次爆破，又炸开了一个缺口，但接着发起的强攻比以前几次更软弱无力，很容易地就被打退了。最后一次爆破和强攻是在9月5日发生的，但是攻击又在手榴弹和步枪火力下被打退了。自此以后，一直到援军开来时为止，围攻似乎变成了简单的封锁，只是断断续续有步枪和火炮的射击。

这真是一次不寻常的战斗。由勒克瑙及其周围地区居民组成的5万人或者甚至更多的人群，其中还可能包括5000或6000名受过训练的士兵，把1200或1500名欧洲人封锁在勒克瑙的驻劄官邸，企图迫使他们投降。封锁者竟然如此束手无策，以致虽然截断了警备部队与康波尔的联络，但显然始终未能使他们的补给完全断绝。这种所谓“围攻”无非是亚洲的愚昧和粗野以及在欧洲人统治时期得来的一星半点军事知识的一种混合物而已。显然，在奥德人中间；有一些炮兵和工兵人员知道如何设置炮位，但是他们的工作看来只限于构筑防避敌人炮火的掩蔽工事。看来，他们甚至把构筑掩蔽工事的方法改进到这种程度，以致使他们的炮台不仅对于射手们是十分安全的，而且对于被围者也是十分无害的，因为在这样的掩蔽工事里，没有一门炮能够有效地射击。这些火炮也没有好好地射击过，否则怎样解释这样罕见的事实，即

驻劄官邸内的 30 门火炮和官邸外的 25 门火炮彼此在极近的距离（有些甚至不超过 50 码）相互射击，可是我们却没有听说有火炮被打坏或者一方迫使另一方停止射击？至于说步枪射击，我们首先要问：8000 名土著士兵在英军炮台附近的步枪射程以内占领阵地而没有被炮兵击退，这怎么可能呢？如果他们果真在那里占领了阵地，那末他们为什么没有把所有的防守者打死打伤呢？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告诉我们说，他们确在那里保有阵地并且夜以继日地射击，而且不管有这一切情况，在 6 月 30 日以后最多只可能有 500 人并且不得不承担抵抗围攻的全部重担的第三十二团，在围攻结束时仍然有 300 人！这不是完全抄袭那个开往普鲁士时有军官 88 名和士兵 1815 名的“第四（波兰）团最后有 10 人生还”的故事，又是什么呢？英国人说得非常正确，像勒克瑙这样的战斗是从来没有过的，——确实是从来没有过的。尽管英格利斯的报告语气谦逊，表面看来并不虚夸，但是他的一些奇怪的说法，如火炮配置的位置使人无法还击，8000 名士兵日夜射击而没有任何效果，有 5 万起义者封锁他，子弹飞到根本没有必要去的地方而造成了损伤，敌人非常坚决地进行攻击，然而总是毫不费力就被打退，——所有这些说法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整个报告显然过于夸大，一点都经不起公正的批评。

但是被围者一定经受了异乎寻常的困难吧？请听：

“土著仆役不敷用，这也是严重困苦の根源。有些太太不得不自已照管孩子，甚至自己洗衬衣，自己烹调简单的饭食而完全没有人帮忙。”

可怜的勒克瑙的太太们！固然，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时代里，旦夕之间就改朝换代，革命和经济破产使一切人生幸福都变得异常飘摇不定，要是我们听说其一位旧日王后不得不亲自缝补甚至洗

袜子,更不用说亲自烹制羊肉饼,我们是不会深表同情的。但是问题是一位英印夫人,是退伍军官、印度政府官员、商人、办事员或冒险家的那一大批姊妹、表姊妹或侄女当中的一个,是那每年,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爆发起义前每年直接从寄宿学校送到印度广大的婚姻市场上去(和漂亮的切尔克斯女人被送到君士坦丁堡市场上去是同样鲁莽而且常常是更不情愿)的女郎中的一个,——只要一想到这样一位太太不得不亲自洗衬衣,亲自烹调简单的饭食而完完全全没有人帮忙,你就会火上心来,完全没有“土著仆役”,唉,还得自己照管孩子!真是气人,真是还不如在康波尔的情形哪!

围攻驻劄官邸的人群也可能有5万人,但其中绝大部分显然不可能有火器。8000名“准确的射手”可能有火器,但是他们的武器怎样,他们是些什么样的射手,从他们的射击效果就可以看出。事实证明,他们的25门火炮使用得非常糟糕。掘壕和射击一样,毫无目的。攻击甚至连侦察动作都够不上。围攻者的情形就是这样。

被围者的毅力值得大大称赞,他们坚持了大约五个月,而且在这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得到英军的任何消息。他们战斗着,存着万一的希望,正像必须以尽可能更高的代价献出自己的生命并且保护妇孺免遭亚洲人残杀的人们所应当做的那样。的确,他们的坚定和顽强应得到应有的评价。但是在知道了威勒尔在康波尔投降的结局以后,谁还会有另外的做法呢?

至于想把勒克瑙的防御说成是一件英勇作战的无可比拟的范例,那简直是可笑的,尤其是在读了英格利斯将军不高明的报告以

后更是如此。警备部队所受的艰苦也无非是缺乏可以抵御恶劣气候的房舍(但气候也没有造成严重的疾病);至于食粮,那末最坏的也不过是“粗劣的牛肉和更粗劣的面粉”,比欧洲被围困的士兵所常吃的饭菜要好多了!只须把这次勒克瑙对一群愚昧无知的野蛮人的防御与1832年安特卫普的防御或者与1848—1849年威尼斯附近马尔格腊堡垒的防御²⁷⁸比较一下就很清楚了,更不用说塞瓦斯托波尔,托特列本将军在那里遇到的困难比英格利斯将军遇到的困难要大得多。围攻马尔格腊堡垒的是奥地利最优秀的工兵和炮兵,而防守它的是一支新征入伍的人数不多的部队;守军有五分之四没有避弹所;低洼的地势引起了疟疾,这比印度的气候更危险;将近100门火炮对堡垒进行射击,并且在最后三天的炮击中每分钟发射40发炮弹。尽管如此,堡垒还是坚持了整整一个月,如果不是奥军占领了一处重要的阵地,迫使防守者退却的话,一定还能坚持更长的时间。或者以但泽的例子来说,拉普率领由俄国撤回的法军残部,在这里坚守了十一个月²⁷⁹。实际上拿现代任何一次像样的围攻作例子,你都会发现,虽然被围者所面临的众寡悬殊的局面丝毫不亚于这次勒克瑙的情形,但是他们却施展了更大的本领,表现了更高的士气,在胆略和毅力方面也毫不逊色。

奥德的起义者虽然在战场上不堪一击,但在坎伯尔到来后立刻表现出民族起义的力量。坎伯尔马上看出,用他的兵力不但不能攻击勒克瑙市区,而且也守不住自己的阵地。这是极其自然的,而且只要仔细研究过法军在拿破仑时代入侵西班牙的史实的人,都一定能理解这种情形。民族起义的力量不在于进行决定性的会战,而在于进行游击战争、防守城市和切断敌人的交通线。因此,坎伯尔和组织进攻时一样精心地布置了撤退。他还攻占了驻劄官邸

附近的几处阵地。他这样做是为了欺骗敌人,不让他们看出他的企图,发觉退却的准备。除了一支不大的预备队外,整个军队都被大胆地(对付这种敌人完全可以这样)分散配置在前哨线上,在前哨线掩护下撤退妇女、伤病员和辎重。这一预备行动一完成,被派出的前哨就撤回来,逐渐集中成较大的部队,而其中最前面的部队则通过后一道前哨线退到后方组成预备队。这次调动自始至终有条不紊地实现了,没有受到起义者的任何干扰。除了留在阿朗巴格的一小支由乌特勒姆率领的警备部队外(暂时还不清楚这样做的目的何在),整个军队就这样撤出奥德王国,开往康波尔。

在这个期间,康波尔发生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件。“凸角堡英雄”温德姆²⁸⁰——又是一位据说已经以个人的非凡英勇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的军官,——于26日击溃了瓜廖尔部队的前卫,但是在27日他自己却遭到惨败;他的兵营被攻占和焚毁,而他本人不得不躲在威勒尔使用过的康波尔的古堡中。28日,起义者攻击这个阵地,但是被击退了,而在6日,坎伯尔击溃了他们,自己几乎未受任何损失,缴获了他们所有的火炮和辎重并追击了14英里。关于所有这些行动的详细报道目前还很缺乏,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印度起义还远未被镇压下去,虽然英军大部分甚至全部增援部队已在印度登陆,但是他们几乎莫名其妙地都消失了。大约有2万人在孟加拉登陆,可是现在作战的部队仍然不比攻占德里的时候多。这里有点不妙。很可能,气候使新开来的部队受到极大的消耗。

弗·恩格斯写于1858年1月14日
载于1858年2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23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即将发行的印度公债

1858年1月22日于伦敦

因大量资金从通常的生产性使用领域抽出来从而转入证券市场而造成的伦敦金融市场上的兴隆气象，最近两周以来由于可能即将发行 800 万或 1000 万英镑的印度公债而略微减色了。将在英国举借、并且议会在 2 月间一开会即应予以核准的这项公债，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东印度公司的英国债主对该公司的要求，同时也是为了偿付因印度起义而引起的有关军用物资、军需品和部队调动等项特别开支。1857 年 8 月议会闭会前夕，英国政府曾经在下院郑重宣布，它根本不打算发行这种公债，因为该公司本身的财政后备对应付紧急局面绰绰有余。但是这样给予约翰牛的美妙幻想，在东印度公司通过极端可疑的手段攫取了各公司交给它在印度修筑铁路用的大约 350 万英镑、此外还秘密地向英格兰银行借用了 100 万英镑、另外又向伦敦各家股份银行借用了 100 万英镑的消息传出来以后，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当公众因此而对最坏的情况有了心理准备时，政府终于决定扯下假面具，在“泰晤士报”、“地球报”以及其他的政府机关报上通过半官方的文章公开承认了发行公债的必要性。

可能有人会问，发行这种公债为什么需要立法部门的特别法

令，而且为什么这种事件竟会引起人们的顾虑。要知道，现在英国资本正在徒劳无益地寻求有利可图的使用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为它提供的任何出路似乎都应该算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和制止资本迅速贬值的绝妙途径。

大家知道，东印度公司的商业活动在 1834 年就停止了，当时取消了它还保有的一个主要的商业利润来源，即对华贸易的垄断权²⁸¹。由于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持有者至少在名义上是从该公司的商业利润中领取红利，所以必须采取新的财政措施来予以保证。于是一向靠该公司的商业利润来支付的红利，开始靠它的政治收入来支付了。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持有者从此以后应该从该公司作为印度政府所得的收入中领取红利，该公司的总数为 600 万英镑的股票支付 10% 利润的股票，则由于议会的法案而变成了价值 100 英镑的股票按 200 英镑结算的资本。换句话说，东印度公司原来的 600 万英镑的股份资本变成了 1200 万英镑由印度居民税收中支付 5% 利润的资本。于是，东印度公司的债务借助议会的魔法变成了印度人民的债务。此外，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本国还借用了 5000 多万英镑，这笔债务只有靠这个国家的国家收入来偿还。该公司在印度本国所借的这种债款，一向被认为是议会立法无权过问的，是同加拿大或澳大利亚殖民政府所借的债款一样与它毫无关系的。

然而在英国本国，东印度公司如果没有议会的特别批准就不得举借有息债款。几年以前，该公司着手在印度修筑铁路和架设电报线的时候，曾请求允许它在伦敦市场上发行印度债券，当时它得到允许发行 700 万英镑仅以印度国家收入为担保的四厘本票。在印度起义开始时，这些本票还只发行了 3894400 英镑，而

它现在又必须向议会提出请求，这表明，在印度起义期间，东印度公司已经把它在英国发行公债的合法权利使用净尽了。

如今尽人皆知，东印度公司在重新采取这一步骤以前，曾在加尔各答发行公债，但是遭到彻底的失败。一方面，这证明印度资本家对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前途远不如伦敦报纸那样乐观；而另一方面，这使约翰牛极端恼怒，因为他知道，最近七年当中在印度如何大量地积存了资金，按照最近公布的哈格德和皮克斯莱公司的报告，仅仅从伦敦港口运往印度的金银就有 2100 万英镑。伦敦“泰晤士报”以最肯定的语气告诫自己的读者道：

“在促使土著居民忠诚于王室的一切方法中，最可靠的就是使他们变成我们的债主；而另一方面，最易使这种容易激动、心思隐秘和贪得无厌的民族产生不满和叛离情绪的，也莫过于使他们感到，每年向他们征税，是为了给别国的富有的债主分送红利。”

但是印度人对于这种不仅能靠印度资本恢复英国统治而且还能间接为英国商业打开印度宝藏的计划的的全部妙处，也许并不理解。的确，如果印度资本家真的热爱英国的统治，像每一个真正的英国人那样把这当做一种信条，那末再也不可能给他们一个比这更好的表示忠诚和奉献白银的机会了。可是，既然印度资本家紧闭钱柜，约翰牛只好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真理，即对印度起义的开支，至少在最初一个时候，得由自己掏腰包，而得不到土著居民的任何协助。不但如此，即将发行的公债只是一个开端，就好像是“英印内债”这本总账簿的第一页。谁都知道，东印度公司需要的不是 800 万或 1000 万英镑，而是 2500 万到 3000 万英镑，甚至这个数目也还只是第一笔开销，而且不是做新的用途，而是为了偿付旧债。最近三年预算的赤字是 500 万英镑，根据印度

的政府报纸“凤凰”²⁸²的报道，截至去年 10 月 15 日，起义军从国库中劫掠了 1000 万英镑；由于起义，东北各省的收入减少了 500 万英镑，而军费至少是 1000 万英镑。

诚然，东印度公司在伦敦金融市场上接二连三的举债，会提高货币价值，防止资本的日益贬值，也就是说，防止贴现率的继续下跌；但是这种下跌正是为活跃英国工商业所必需的。对贴现率下跌作任何人为的阻止，就等于生产费用和信用价值的提高，而这种提高是目前还孱弱的英国工商业所不堪忍受的。这就是对于宣布发行印度公债发出一片怨声的原因。虽然议会的批准没有给该公司举债提供帝国方面的保证，但是如果按照别的条件不能弄到钱，这种保证就必须提供，而且当东印度公司一旦被英国政府所取代，它的债务就会不分彼此地与英国的国债合而为一。因此，本来就重的国债的进一步增长，也许将是印度起义的初步财政后果之一。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1 月 22 日
载于 1858 年 2 月 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24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温德姆的失败²⁸³

正当整个英国在克里木战争期间物色善于组织和统率英军的人才的时候，正当像腊格伦、辛普森和科德林顿这样的庸才被授予指挥权的时候，在克里木却有一位堪称将才的军人。我们说的就是科林·坎伯尔爵士，他现在每天都在印度证明：他精通本行的业务。在克里木，坎伯尔受命在阿尔马河畔指挥一个旅，可是，英军死板的线式战术使他在那里无从施展自己的才能，以后，他就被留在巴拉克拉瓦，再也没有让他参加后来的战斗行动。但是，他的军事天才很早以前就在印度为一个权威人士所赏识，这个人就是英国自马尔波罗以来所推崇的最伟大的将领查理·詹姆斯·纳皮尔爵士。不过，纳皮尔为人刚直，过于高傲，不甘心在当权的寡头集团面前卑躬屈膝，因此，他的推荐只足以使坎伯尔成为名声不好、不可信赖的人物。

于是，克里木战争的功劳和荣誉落到了别人身上。其中有威廉·芬威克·威廉斯，即卡尔斯爵士，他现在心安理得地享受着靠恬不知耻、自吹自擂和窃取理应归克美蒂将军的功劳等手段所得来的荣誉。从男爵的封号，每年一千英镑的薪金，乌里治的美差和议会的席位——这一切完全足以使他不必拿自己的名誉到印度去冒险。和他不同，“凸角堡英雄”温德姆将军却率领一师人去

攻打西帕依，可是他的最初几次行动就使他信誉扫地。就是这位温德姆是一个有很好的家族关系的不出名的上校，曾在攻打凸角堡时指挥一个旅，作战极其迟钝无力；最后，因为援军未到，他两次弃置自己的部队于不顾，自己回到后方去探听援军的消息。这种十分可疑的行径，在别的军队里一定会受到军事法庭的追究，可是他反而因此立即晋升为将军，不久以后又被任命为参谋长。

当科林·坎伯尔开始向勒克瑙进攻的时候，他把康波尔的古堡、兵营和城市连同恒河大桥都交给温德姆将军掌管，还给他留下一支足以完成这一任务的队伍。这支队伍包括5个步兵团（有的满员，有的缺额），许多要塞炮、10门野炮、两门海军炮以及100名骑兵，共2000多人。正当坎伯尔在勒克瑙作战的时候，游散在达普的各路起义队伍就集合起来，准备袭击康波尔。除了由起义的柴明达尔²³⁶所招募的各种乌合之众以外，这支袭击的队伍中还有受过训练的部队（不能认为他们受过正规军的训练）；这就是第纳普尔的西帕依的残部和瓜廖尔部队的一部分。后者可以说是编制超过连以上的唯一的起义部队，因为他们过去几乎全部由土著军官指挥，所以，有自己的陆军校官和尉官，还维持着类似有组织的营的规模。由于这个原因，英国人对他们具有相当的戒心。温德姆奉有严格指示，仅仅进行防御，但是由于联络中断，没有接到坎伯尔对他的报告的答复，他就决定个人负责，采取行动。11月26日，他率领步兵1200人和骑兵100人并携带火炮8门去迎击进攻的起义者。他很容易就把他们的前卫击溃了，可是后来发现起义者的主力部队接近，就退到康波尔城下。在这里，他在城市前面占领阵地，把第三十四团配置在左翼，把猎兵（5个连）和第八十二团的两个连配置在右翼。退路是穿过城市，在左翼后方还有几座砖窑。在距正面

400 码以及更靠近两翼的某些地方有丛林和莽林 ,成为进攻的敌军的绝妙掩蔽。老实说 ,再也选不出比这更坏的阵地了 :英军配置在开阔的平地上 ,而印度人却能够依靠掩蔽接近到三四百码的距离 ,从下面这一情况更能清楚地看出温德姆的“英勇精神” :就在附近 ,有一处十分合适的阵地 ,阵地前后都是平地 ,前面还有运河作为屏障 ,但是 ,他当然坚持选择最坏的阵地。11 月 27 日 ,敌人把火炮推进到莽林所形成的掩蔽地的边沿 ,开始射击。温德姆以英雄所特有的谦逊态度 ,把这叫做“轰击” ,并且说 ,他的队伍在这种轰击之下支持了五个小时。但是在这以后所发生的事 ,无论是温德姆或在场的任何人 ,无论是印度报纸或英国报纸 ,直到现在都不敢报道。自从炮击转入会战时起 ,向我们提供消息的一切直接来源都断绝了 ,我们只能从手头所有的含糊不清、模棱两可而又不完整的材料中做出自己的结论。温德姆只做过如下的毫无条理的报道 :

‘我军冒猛烈的轰击 ,抵抗敌人的攻击 把对野战部队的射击称为攻击 ,真是奇闻 ! 达五个小时之久 ,并继续守住阵地 ,直到我从第八十八团士兵所杀死的敌军人数上知道暴徒已完全突入城市时为止 ;当有人向我报告 ,他们正在攻击堡垒时 ,我就命令杜毕伊将军撤退。天黑前不久 ,全军携带全部军需品和火炮退入堡垒。由于随军仆役逃散 ,我未能将兵营设备和一部分辎重撤出。如果不是在传达我的命令时发生差错 ,我相信 ,我能够把阵地至少坚守到天黑。’

温德姆将军以他在凸角堡时所表现的那种本能去到预备队 (因为我们应当得出的结论是 : 第八十八团当时占领着城市) ,在这里他遇到的不是活着并且战斗着的敌人 ,而是被第八十八团士兵杀死的大量敌人 ,而这件事就使他得出结论 : 敌人 (他没有说是死的还是活的) 已完全突入城市 ! 这个结论对于读者以及对于他本人来说当然都是令人惊恐不安的 ,但是 ,我们的英雄并不

到此为止。他得到报告说，堡垒受到攻击。任何一个别的将军都会考察一下这种传说的虚实，当然会发现这是假的。可是温德姆却不这样。他下令撤退，尽管说，要不是在传达他的一项命令时发生了错误，他的部队可以把阵地至少坚守到天黑！由此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温德姆的合乎英雄身分的结论是，凡是西帕依死亡甚众的地方必定是活着的西帕依甚众的地方；第二，关于堡垒的攻击是一场虚惊；第三，在传达命令的时候发生了错误。这三个不幸合起来就使得人数众多的一群土著士兵打败了凸角堡英雄，挫折了他的部下所具有的百折不挠的英国式的勇气。

另一个当时在场的军官报道说：

“我不相信有谁能够确切地描写今天上午所发生的战斗和退却。退却的命令已下达。皇家第三十四步兵团奉令退到砖窑后面去，但是无论是该团的军官或士兵都不知道砖窑在什么地方！消息很快就传遍军队驻地，说我军被击溃，正在退却。于是所有的人都拚命闯入内堡，其势不可阻挡，有如尼亚加拉瀑布的洪流。数不清的步兵和水兵、欧洲人和本地人、男人和妇孺、马匹、骆驼和犍牛，从下午2时开始就向内堡涌来。到夜里，营垒挤满了人群、牲畜、货物、行李和成千上万难以言状的累赘物，真像混沌初开时一样乱成一团。”

最后，“泰晤士报”驻加尔各答记者报道，英国人显然在27日吃了“极像败仗的一次亏”，但是英印报纸从爱国的观点出发，用慈悲心肠把这个耻辱密不透风地包藏起来了。然而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大部分由新兵组成的皇家步兵团，虽然没有放弃自己的阵地，但在转瞬间陷入了混乱；由于温德姆已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军队，堡垒里极度混乱，一直到28日晚上坎伯尔到来，“申斥了几句”，使所有的人回到自己的岗位时为止。

那末，从所有这些混乱不清和支吾搪塞的报道里可以得出的明显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只能是这样的：温德姆的无能的指挥使

英军吃了一次大败仗，而这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当下令撤退的时候，第三十四团的军官由于根本没有认真熟悉作战的地形，无法找到他们奉命撤退的地点，全团陷入混乱，终于逃散；这引起了兵营里的惊慌，结果所有的秩序和纪律都破坏了，兵营设备和一部分辎重遭到了损失；最后，和温德姆关于军需品的说法相反，15000发米涅枪弹、钱柜以及够很多团和新兵穿用的鞋子、服装都落在敌人手里。

英国步兵在组成横队或者纵队时都很少溃逃。和俄国步兵一样，他们具有那种通常只是老兵才有的自然的结合力，这固然部分地是由于在两国军队中都有很大数目的老兵，但部分地显然也是由于他们的民族特性。这种性格与“勇敢”毫不相同，相反地，不如说是自卫本能的一种独特的表现，虽然如此，它还是很宝贵的，特别是在防御中。此外，这种性格同英国人冷静的天性一样，也可以防止惊慌失措；但是必须指出，当爱尔兰部队一旦陷于混乱而惊慌失措时，是不容易重新整顿他们的。11月27日，温德姆所面临的情况正是这样。今后，他将列入那些使自己的军队惊慌逃散的、为数不多但却引人注目的英国将军的名单了。

28日，瓜廖尔起义部队得到了从比都尔来的大量援军，并前进到距离英军筑有工事的前哨400码的地点。战斗再起，但进攻者作战十分无力。这次，第六十四团的官兵树立了真正英勇的例子，我们乐于指出这一点，虽然事迹本身和有名的巴拉克拉瓦进攻²⁸⁴一样，是不足取的。这件事的责任也是推到一个阵亡者即该团的威尔逊上校身上。据传他曾率领180名士兵向数量远远超过自己的敌军防守的4门火炮攻击。我们没有听说，敌军是哪里的队伍；但是战斗的结果使我们得出结论：这是瓜廖尔的部队。英军

靠突袭夺取了火炮，钉塞了其中 3 门火炮的火门并且坚守了一些时候，但由于没有得到援军，不得不退却，牺牲了 60 名士兵和大部分军官。这些损失说明了战斗的激烈。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这支小部队，从它所受的损失来看，必然是受到了敌人猛烈的回击，但是他们坚守炮台阵地直到他们的人死伤三分之一时为止。这的确是一场激战，而且是德里被攻占以来进行激战的第一个例子。然而，策划这次进攻的人应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并枪决。温德姆说，这是威尔逊干的。但是威尔逊已经阵亡，不能答辩了。

晚间，英军全部被赶入堡垒，这里仍然混乱不堪，大桥处的阵地处于显然的危险之中。但是这时坎伯尔来到了。他恢复了秩序，早晨调来了生力军，把敌人赶到相当远的地方，使大桥和堡垒脱离危险。然后，他把全部伤员、妇孺和行李送过河去，自己则固守防御阵地，直到这些人沿着去阿拉哈巴德的道路走出很远时为止。他把这件事一办完，立即于 12 月 6 日向西帕依进攻，把他们击溃，而且他的骑兵和炮兵在当天把他们追击了 14 英里。从坎伯尔的报告可以看出，起义者抵抗微弱，因为他只叙述自己的军队如何前进，根本没有提敌军有什么抵抗或机动；这里没有抵抗，没有战斗，而只是一场 *battue* [屠杀]。霍普·格兰特准将率领轻装师追击逃敌，8 日在渡河时追上了他们；这使他们陷入绝境，于是转身反抗，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坎伯尔在勒克瑙和康波尔的第一次战局于此结束。今后一定还有一系列新的战斗。关于这些战斗的初步发展情况，我们也许将在最近两三星期内听到。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2 月 2 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2 月 20 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 525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对波拿巴的谋杀²⁸⁵

Quos deus vult perdere prius dementat [上帝欲毁其人，必先夺其理智]，看来，这是欧洲对法国篡夺者的极为普遍的看法。只不过几个星期以前，所有各个国家的、操着各种不同语言的无数趋炎附势的人们，曾异口同声地把这个篡夺者捧成人间的一位天神。现在，骤然间，当真正的危险刚刚临近，又认为这位半人半神的人物发疯了。但是，在那些不为初步印象所惑的人看来，最明显不过的是，这位布伦英雄²⁸⁶今天一如既往，无非是一个赌徒。如果说他现在摊出最后一张牌，孤注一掷，那末不是这个人变了，而是赌运变了。以前也曾有过谋杀波拿巴的事件，可是从未对帝国的经济状况产生任何显著后果。为什么 1 月 14 日爆炸的雷汞，不但炸死了许多人，而且结束了一种局面呢？勒佩勒蒂埃街上的手榴弹正同在巴腊克普尔分发的油脂子弹一样，它们并没有使帝国发生变化，而只是撕破了那块掩盖着已经发生的变化的帷幕。

波拿巴得以飞黄腾达的秘密，一方面固然在于互相敌对的党派彼此弄得精疲力尽，另一方面也在于他的 coup d' état [政变] 恰好碰上了商业界进入繁荣期。因此，商业危机就必然破坏了帝

见本卷第 252 页。——编者注

国的物质基础；至于说精神基础，除所有各阶级和所有各党派暂时精神不振而外，帝国从未有过任何精神基础。工人阶级一遭到失业，立刻又对现政府采取了敌对态度。工商业资产阶级中一大部分人因危机而陷入的处境，恰好是曾经迫使路易·拿破仑加速其 *coup d'état* 的那种处境；大家知道，他是由于害怕被关进克里希的债务监狱才停止犹豫的。同样的原因曾促使巴黎资产阶级在 1848 年慌忙跑向街垒，而在目前则会使他们把任何政局动荡当成上天的恩赐。现在已经完全证实，在恐慌心理达到高潮的时候，法兰西银行按照政府的命令更换了所有到期的期票——顺便提一下，这是该银行再度被迫在 1 月 31 日提供的一个方便之门；但是这种警缓清算债务的办法并没有恢复商业的活跃，而只是使恐慌成为慢性的罢了。巴黎资产阶级中另外一些占很大比重而且很有影响的人——*petits rentiers* [小食利者]，或者说有小额固定收入的人——由于交易所证券价格的巨大波动而遭到了彻底破产；这种波动是皇朝及其投机冒险的扈从们一手造成的，并且使他们大发其财。法国上层阶级的一部分人，至少是自命代表所谓法兰西文明的那一部分人，除了把帝国当做必需的权宜手段以外，从来没有承认帝国，从来没有隐讳他们对那位“伯父的侄子”的仇视，而且近来只要一找到借口，就对那妄想把他们认为只不过是权宜手段的帝国变为永存体制的企图表示愤怒。这就是由于勒佩勒蒂埃街谋杀事件而表露出来的普遍情绪。另一方面，这种情绪的表露使冒牌的波拿巴有一种山雨欲来的预感，使他不得不摊出最后一张牌。“通报”就皇帝和皇后走出歌剧院遇到群众欢呼以及“公众的热情场面”写了大量报道。这个街头热情场面的价值如何，可由下述一段插曲看出。这段插曲是这件事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传出

来的，并且有一家极有威望的英国报纸担保它真实可靠：

“14日夜晚，皇宫侍从室一位当晚不值勤的高级人员正穿过林荫道，忽然听到爆炸声，看到人们向歌剧院跑去。他也向那里跑，目睹了全部情景。当时他立即被人认出，有一个同所发生事件有密切关系的人对他说：‘噢，先生，看上帝的份上，去找一个土伊勒里宫里的人，派他去再找些马车来吧。要是找不到人，就请你亲自去一趟。’他听了以后，立刻就去寻找宫廷的侍从人员，这可不是容易的事，因为大大小小的侍从人员，从执事到仆役，除一两名忠勇可嘉者外，全都飞快地溜之大吉了。但是过了一刻钟的功夫，他终于抓到了一个信差，并且立刻要他到皇宫去办这件事。过了大约二十五分钟至半小时，他回到了勒佩勒蒂埃街，因为人太拥挤，费了很大力气才挤回到剧院的列柱廊上。四周仍然躺着受伤的人们，显然到处都是一团混乱。这位先生在不远的地方无意中看见了警察局长比埃特里先生，就喊住他，要他别走开，等着自己。这位先生一过去就立刻大声说：‘我求求你，赶快使这条街道断绝交通吧。一会又要有马车来了，这样是不能把马车赶到门前的。再说，请看这里乱成什么样子了。我求求你，清理一下街道吧。’比埃特里先生诧异地望了他一眼。‘清理街道！’——他应声回答说，‘街道已经清理过了。花了五分钟的功夫就把街道清理好了。’对方听后瞪起眼睛问他：‘那末，这一大群人是怎么回事？这密密层层、挤得水泄不通的一大群人是怎么回事？’比埃特里先生回答说，‘那全是我的人，现在勒佩勒蒂埃街这一段上没有一个人；你所看到的全都是我的手下。’”

如果这就是“通报”所吹嘘的街头热情场面的秘密，那末，报上关于“谋杀事件发生后人们自动在林荫道上张灯结彩”的报道，当然骗不了曾经目睹这种张灯结彩场面的巴黎人，因为张灯结彩的仅限于那些替皇帝和皇后办事的商店。就连这些人也是逢人便说，在那个“鬼机关”爆炸之后半小时，警探曾登门造访，提醒他们，应该立刻张灯结彩，表明他们如何为皇帝幸免于难而感到欢欣不已。

更能证明皇帝处于完全孤立地位的，是那些慰问辞和对他表示忠诚的公众献辞的底细。在这些东西上面签名的人，没有一个

不这样或那样隶属于那个吸吮法国人民脂膏的无孔不入的寄生虫——政府，没有一个不像木偶一样受内务大臣的摆弄。“通报”必须逐日把这些由皇帝本人献给皇帝的单调无味的慰问辞当做表示人民对 coup d' état 无限热爱的许多证明记录下来。的确，曾企图从巴黎居民方面弄到一篇慰问辞；为了这个目的，警探们曾拿着一篇慰问辞到处奔走；但是，由于发现签名的人数不会很多，这个计划也就作罢了。连巴黎的小店主都敢于拒绝在这篇慰问辞上签名，说这事不宜由警界发起。巴黎的报刊；只要是靠公众而不是靠公费支持的，就采取与人民群众完全相同的态度。它们或者像不幸的“旁观者”那样，吞吞吐吐地谈论继承下来的权利；或者像“卢瓦尔河上的灯塔”²⁸⁷那样，引述半官方报纸来作为自己报道群众热情场面的依据，或者像“辩论日报”那样，把自己的慰问祝贺文字严格限于官样礼节范围之内，或者仅限于转载“通报”上的文章。总之，已经很明显，如果说法国还没有准备拿起武器来反对帝国，那它无疑已经决心一有机会就要把帝国抛掉了。

伦敦“泰晤士报”驻维也纳记者写道：“据最近巴黎来人谈，这个城市里的普遍看法是，现今的王朝已摇摇欲坠。”²⁸⁸

在此以前，波拿巴一直是法国唯一相信 coup d' état 已取得最终胜利的人，这时他自己也忽然觉察出他的幻想毫无根据了。虽然所有的社会团体和报刊都在赌咒发誓地说，勒佩勒蒂埃街的罪行是意大利人一手干下的，其结果只是更加突出法国对路易-拿破仑的爱戴，路易-拿破仑自己却急忙跑到 Corps Législatif(立法团)去，在那里公开宣称，这次密谋是全国性的，因此法国需要新的“镇压性法律”加以压制。已经提出的那些以 loi des suspects²⁸⁹为

首的法律，只不过是当初发动 coup d' état 时所采取的措施的再版。不过那时是把它们当做临时办法，而现在把它们宣布为构成法了。这样，路易-拿破仑就自己宣布了：帝国只有依靠那些它所由诞生的卑劣手段才能永世长存；它对于采取比较体面的常态政府形式的一切奢望都必须抛弃；全国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地默认背信弃义的篡夺者的协会²⁹⁰进行统治的时代，已经肯定一去不复返了。

在实行 coup d' état 之前不久，路易-拿破仑还设法从所有的省份，主要是农业区，弄到了对国民议会进行攻击、对总统表示无限信任的声明。现在这个来源既已枯竭，就只有求诸军队了。军队方面的声明简直就是赤裸裸地宣布在法国实行御用军人²⁹¹的统治；在其中一篇声明中，朱阿夫兵“几乎悔恨没有得到机会出色地表示他们对皇帝的忠心”。把法国分为五大帕沙军事辖区，由五位元帅分别担任各区长官，以佩利西埃为主帅予以统辖²⁹²，这不是由那个前提得出的必然结论。另一方面，设立了一个枢密院，它在由某一位蒙蒂霍摄政时将同时作为国务委员会进行工作，它的成员都是富尔德、莫尔尼、培尔西尼、巴罗什等这一类可笑人物，这就向法国表明了，这些新上台的政治家给它准备了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个枢密院的设立，以及路易-拿破仑在“通报”上的一封信中向目瞪口呆的世人宣布的家族妥协（由于这一宗族妥协，前威斯特伐里亚国王日罗姆被指定在皇帝缺席时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这一切，正如人们所正确指出的，“看来就像是朝圣者准备动身去作一次危险的旅行”²⁹³。斯特拉斯堡英雄²⁹⁴到底打算进行什么新的冒险呢？有人说他想靠出兵非洲得到慰藉；有人说他想进攻英国。前一种设想使人回忆起他以前有过

到塞瓦斯托波尔走一遭的打算²⁹⁵；可是现在也和过去一样，很可能他的智虑终将证明是他的勇敢的最大要素。至于说对英国采取任何敌对行动，那只会使波拿巴看到自己在欧洲是多么孤立，正像勒佩勒蒂埃街的谋杀事件表明了他在法国的孤立一样。军人的声明中所包含的对英国的威胁，已经最终断送了早已 *in articulo mortis*〔奄奄一息〕的英法联盟。帕麦斯顿的外侨管理法案²⁹⁶只会促使约翰牛本来已经被伤害的自豪感变得极端愤激。不论波拿巴可能采取什么步骤——他总要想法子来恢复他的威望的——都只会加速他的毁灭。他已经临近他那奇特的、罪恶的、致命的事业的尽头。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2 月 5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2 月 2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254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 法国的经济危机

在其他国家已经消退了的商业危机一旦在法国达到自己的顶点的时候，路易-拿破仑勉强维持住的、还使他能够自称为法国人的皇帝的政权，就要大吃苦头，这一点是不必证明的了。目前这个顶点临近的征兆，应当主要从法兰西银行和法国农产品市场的状况中去寻找。法兰西银行 2 月份第二周的报告表，同 1 月份最后一周相比较，有下列一些能说明问题的数字：

货币流通的减少	8776400 法郎
存款的减少	29018054 法郎
银行期票贴现业务的减少	47746641 法郎
分支行期票贴现业务的减少	23264271 法郎
期票贴现业务减少的总数	71010912 法郎
逾期期票的增加	2761435 法郎
金属储备的增加	31508278 法郎
购买黄金和白银支付的贴水的增加	3284691 法郎

在所有的商业国里，银行的金属储备都随着商务活动的减少而增加了。银行的状况，一般都随着工业生活减弱的程度而更加稳固，因而法兰西银行地下室里的金属储备的积累会使人觉得，这不过是在纽约这里以及在伦敦和汉堡所看到的特殊经济现象的又一个例子罢了。可是，法国金属储备的变动有一个特点，就是购

买黄金和白银所支付的贴水增加到了 3284691 法郎，2 月份法兰西银行在这方面支出的总数达到了 4438549 法郎。这个事实的严重意义从下面的比较中就可以看清楚：

法兰西银行购买黄金和白银支付的贴水

1858 年 2 月	4438549 法郎
1858 年 1 月	1153858 法郎
1857 年 12 月	1176029 法郎
1857 年 11 月	1327443 法郎
1857 年 10 月	949656 法郎
从 1856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3100000 法郎
从 1856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11 日	3250000 法郎
从 1855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4000000 法郎

这样，我们就看到，为了人为地暂时增加法兰西银行的金属储备，2 月份支付的贴水，同 1857 年 10 月至 1858 年 1 月这四个月内为了同一目的而支付的数目几乎相等，并且超过了 1856 年和 1855 年各个六个月所支出的贴水的数目，而 1857 年 10 月到 1858 年 2 月支出的贴水，总数达 9045535 法郎，几乎超过 1856 年全年支付的贴水总数的 50%。这就是说，虽然表面看来资金过剩，但实际上目前法兰西银行的金属储备却比前三年少了。法兰西银行的金属储备根本不是过多，只是人为地提高到了必要的水平。单是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商业危机在法国还没有进入在美国、英国和北欧已经过的阶段。正如货币流通和期票贴现业务的同时减少所表明的，法国的商业普遍萧条已经出现；然而真正的破产还在前头，在购买黄金和白银所支付的贴水增加的同时，存款的减少和逾期期票数量的增加就证明了这一点。

法兰西银行还不得不宣布，它自己本身的、目前还没有完全

缴清的新股票，有相当大一部分将要出售。此外，政府使法兰西银行成了法国所有铁路建设的总承包人，因而法兰西银行必须在一定时期内向各铁路公司发放大量贷款，这些贷款仅在 1 月和 2 月两个月就达 5000 万法郎。诚然，作为对这些贷款的交流，法兰西银行得到了这些公司的本票，只要有可能，它就有权出售这些本票。但目前对于出售这种债券特别不利，铁路每周的周报表明，它们的收入不断降低，这些周报所描绘的这方面前景远远不能令人乐观。例如，1 月份同 1857 年同月比较，奥尔良铁路的收入减少了 21%，东部铁路减少了 18%，里昂铁路减少了大约 11%，西部铁路减少了 14%。

大家都很清楚这个事实，买主对物价上涨所进行的抵抗，而尤其是卖主对物价下跌所进行的抵抗总是很强烈的；大家也都清楚，市场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的趋势没有够于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显露出来以前，往往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出售发生困难，而且价格低。商品的所有者和购买者之间的这种偶然发生的斗争一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像法国商人和法国消费者之间那样持久的斗争，从 11 月初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在价格史上似乎还是空前的。在法国工业正苦于停滞，许许多多工人没有工作，所有的人的生活资料都减少了的时候，价格在其他国家虽然平均下跌了 30%—40%，而在法国却仍然维持在普遍危机以前时期的投机水平。如果有人问我们，这种经济奇迹是用什么办法取得的，答复很简单：法兰西银行在政府的压力下，曾两次不得不把应付的期票和贷款延期，于是，法兰西银行地下室里积存的法国人民的钱财就直接或间接地被用来维持哄抬起来的价格，而使法国人民自己蒙受损失。大概政府以为，通过这种极为简单的方法——在一

切需要银行券的地方把银行券散发出去，——就可以彻底防止灾祸。而实际上，使用这种伎俩的结果，一方面是消费者更加贫困，他们的生活资料的减少并没有使价格降低，另一方面是大量商品积存在海关仓库里，而这些商品终归要抛向市场，结果由于它自身的数量而跌价。下面是从法国官方的一个出版物上抄下来的关于法国海关在 1857、1856 和 1855 这三年 12 月底存货量的比较表，这张表使人丝毫不怀疑法国将来还会有价格的灾难性的自行调整：

	1857 年	1856 年	1855 年
	(单位:公担)		
可可	19419	17799	10188
咖啡	210741	100758	57644
棉花	156006	76322	28766
铜	15377	1253	3197
锡	4053	1853	1811
生铁	132924	102202	76337
油料作物籽	253596	198982	74537
油脂	25299	15292	11276
靛蓝	5253	2411	3783
羊毛	72150	31560	38146
胡椒	23448	18442	10682
糖(从殖民地来的)	170334	56735	55387
糖(从其他国家来的)	89607	89807	71913

可是，在粮食贸易方面，价格斗争的结果是商品所有者彻底失败了。然而他们的损失同法国农业居民在目前行情下的一般状况比起来，其意义毕竟还是要小得多。不久前，在法国农村户主的会议上曾指出，全法国每百公升（约等于 2.75 蒲式耳）小麦的平均价格在 1854 年 1 月底为 31 法郎 94 生丁，1855 年同月为 27

法郎 24 生丁，1856 年 1 月为 32 法郎 46 生丁，1857 年 1 月为 27 法郎 9 生丁，1858 年 1 月为 17 法郎 38 生丁。会议一致认为：

“价格的这种状况不能不使法国农业遭到巨大损失，在目前平均价格为 17 法郎 38 生丁的状况下，法国一些地区的生产者只能得到极其微小的利润，而其他地区的生产者则受到严重损失。”

看来，在法国这样一个国家，大部分土地属于农民本人，只有比较小的一部分产品流入市场，其谷物的丰裕似乎不应看成是祸，而应看成是福。然而路易十八于 1821 年 11 月 26 日在御前演说中就曾经说过：“任何法律也不能消除过大的丰收所造成的灾难。”问题在于，大多数的法国农民仅仅在名义上是所有者，而真正的所有者则是抵押债权人和政府。法国农民能否履行他占有的一小块土地加在他身上的沉重义务，这不取决于产品的数量，而取决于产品的价格。

农业的这种困苦状况，加上商业的萧条，工业的停滞以及仍然在威胁着的财政灾难，必定会使法国人民处于他们通常起来进行新的政治试验时的思想状况。随着经济繁荣的消失以及通常相随而来的对政治的漠不关心的消失，第二帝国继续存在的任何借口也将消失。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2 月 12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3 月 12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270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御用军人的统治

1858年2月22日于巴黎

“猎狮能手热拉尔什么时候将被任命为国民教育大臣呢？”自从因出征多布鲁甲而扬名²⁹⁷的埃斯潘纳斯将军被任命为内务和公安大臣以来，这就成了巴黎郊外争相传问的一句时髦话。大家都知道，在俄国，一个骑兵将军可以主持正教行政总署。既然法国已完全成为御用军人的领地，为什么埃斯潘纳斯不可以主持法国的内务部呢？波拿巴借着这种显而易见的不协调现象毫不隐讳地宣布了雪亮军刀的统治，想使法国清楚地认识到，帝国的统治所依靠的不是人民的意志，而是60万军队。于是就有了各团团长摹仿土伊勒里宫提供的范本而拟定的御用军人宣言——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所谓“人民的意志”的宣言；于是就把法国划分为五个帕沙辖区；于是就使内务部变成了军队的附庸。然而变化并不到此为止。据说，约有60名省长将被辞退，其中大部分将由军人接任。省的行政管理要移交给退休的上校和中校。军队和居民之间的对立应成为“社会安全”，也就是萨托里英雄²⁹⁸及其王朝的安全的保障。

一位杰出的现代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不管你怎么掩饰这件事实，法国从大革命以来一直是受军队支配的。当然，在帝国时代、

在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利浦统治时期以及在 1848 年的共和国时期，进行统治的阶级有所不同。在帝国时期是农民这个 1789 年革命的后裔占统治地位；在复辟时期是大地主占统治地位；在路易·菲利浦统治时期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而 1848 年的共和国，则与共和国奠基者的愿望相反，实际上是正统王朝派和七月王朝派企图分而治之的一次失败的尝试。然而所有这些政治体制都同样依靠军队。甚至 1848 年的共和国宪法，不也正是在戒严状态下，也就是在刺刀统治下制订和宣布的吗？这个共和国不正是由卡芬雅克将军来体现的吗？它不正是在 1848 年 6 月和 1849 年 6 月一再因军队而得救，最后在 1851 年 12 月又被同一支军队结束掉的吗？那末，现在路易·波拿巴公开宣布的政治体制有什么新货色呢？他借助军队来进行统治吗？然而所有他那些从热月政变²⁹⁹以来的前辈都是这样做的。不过，虽然在以往各个时期，与法国社会的独特发展相应而起的统治阶级，都依靠军队作为它反对敌手的 *ultima ratio*，占统治地位的还是社会的一定阶级的利益。在第二帝国时期，军队本身的利益要占统治地位。军队不必再去维持一部分人民对另一部分人民的统治。军队要维持它自己对全体法国人民的统治，即维持它自己的王朝。

军队要代表与社会相对立的国家。不要以为波拿巴不知道他所进行的实验的危险性质。他在宣布自己是御用军首领的同时，也就把每一个御用军的头目都宣布为自己的竞争者。他的党羽，以瓦扬将军为首，都反对把法国军队分成五个元帅的部属，他们说，即使这样做有助于维持秩序，但对帝国却毫无好处，有朝一日终

会酿成内战。对帝国政策的新转变感到万分气恼的皇宫³⁰⁰，搬出了拿破仑手下以贝尔蒂埃为首的元帅们进行背叛的事例。

至于那五位彼此视若死敌的元帅将来在某个危急关头的行动如何，根据他们的过去来下判断，是再好也没有的了。马尼扬背叛过路易·菲利浦；巴拉盖·狄利埃背叛过拿破仑；博斯凯背叛过共和国，虽然他全仗着共和国才得以飞黄腾达，而且谁都知道，他是同情共和国的原则的。卡斯特朗甚至不曾等到发生真正的灾祸就背叛了路易·波拿巴本人。在与俄国进行战争期间，他收到一封电报，大意是说：“皇帝逝世”。他便立即起草了一个拥护亨利五世的宣言，并且送去付印。里昂市长却接到一封比较确凿的电报，电文是：“俄国皇帝逝世”。那份宣言没有发出去，然而这件事却传开了。至于康罗贝尔，他也许是帝国的拥护者，但他只能算作一个分数，重要的是，他缺乏作为整数的才干。这五位元帅自己也感到要他们承担的任务极其艰巨，总是犹豫不定，不肯接受各自的指挥职务，因此根本不可能预先征得他们的同意；于是波拿巴亲自给每个人确定了管区的名字，把名单交给富尔德先生，要他填好，送交“通报”，这样，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终于正式公布了对他们的委任。不过，波拿巴不敢任命佩利西埃为主帅，以彻底实现他的计划。关于他实行的元帅五头政治，我们完全同意所传关于日罗姆·拿破仑亲王对富尔德先生讲的话。波拿巴派富尔德先生去向他叔叔面呈委任摄政委员会主席的委任状，这位前威斯特伐里亚国王悍然拒绝接受，并且据巴黎人传说，还以这样的话把富尔德先生打发走：“Du reste [其实]，你们这个摄政委员会人选的搭配，使你们只能达到一个目标，那就是使彼此尽可能快地互相进行逮捕。”我们再说一遍，决不能以为路易·波拿巴

对他这个新想出来的体制所包藏的祸机一无所知。可是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了解自己的处境，了解法国社会急于想摆脱他和他所玩弄的帝国把戏。他知道各党派已经从瘫痪中复苏，他那交易所性质的政治体制的物质基础，已经被商业上的震荡摧毁了。因此，他不仅准备同法国社会作战，而且还大声地宣布这一事实。同他对法国采取好战态度这一决定相一致的，是他与各色各样的政党为敌。当卡桑尼亚克在“立宪主义者报”上谴责维尔曼先生为对帝国的“仇恨的煽动者”，并且指控“辩论日报”“默默参与了”这个 attentat [阴谋] 的时候，人们起初以为这是基佐称为 roi des drôles [丑王] 的那个人所献的傻殷勤。可是不久便透露出来，这篇文章是国民教育大臣卢兰先生硬要“立宪主义者报”发表的，他还亲自校阅了清样。顺便提一下，这个解释是“立宪主义者报”的所有人米勒斯先生对“辩论日报”的萨西先生作的，因为米勒斯先生不愿对这篇文章承担责任。可是，指责所有的党派都是他个人的仇敌，这是波拿巴的意图。这是他的整个体系的一部分。他毫不含糊地告诉他们，他对他的统治所引起的普遍嫌恶不抱任何幻想，但是他准备用霰弹和步枪来对付它。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2 月 22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8 年 3 月 1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270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得比内阁。——帕麦斯顿的 假辞职³⁰¹

如果说奥尔西尼没有能够刺死路易-拿破仑，那末他毫无疑问地把帕麦斯顿砍倒了。既然这个政治赌棍是被广州的一位中国官员推上了英国独裁者的地位，那末从历史眼光来看，他到头来应该被巴黎的一个意大利烧炭党人推下台去，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³⁰²。但是，得比勋爵应当做他的继任者，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历史现象，而是近乎历史规律的范畴了。这是完全符合英国宪法传统的。继皮特而起的是福克斯；继福克斯而起的是皮特的拙劣副本派西沃；继威灵顿而起的是福克斯的拙劣副本格雷；继格雷而起的是威灵顿；继威灵顿而起的是格雷的拙劣副本墨尔本；继墨尔本而起的是又一个威灵顿，即皮尔；继皮尔而起的是又一个墨尔本，即罗素；继罗素而起的是皮尔的代替人得比；继得比而起的又是罗素。为什么僭取罗素职位的帕麦斯顿不该由得比来替换呢？

如果说在英国有什么新生力量，能够结束约定俗成的旧习，如坐在议院这一边的尊贵绅士同坐在议院另一边的尊贵绅士最近这次调换位置³⁰³就是这种旧习的一个例子；如果说有哪一个人或哪一批人能够出来反对并取代传统的统治阶级，那末世界上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人。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托利党人执政远比任

何其他人执政更有利于推进一切进步事物。最近五十年以来，一切广泛开展起来的运动不是发生于托利党人执政时期，就是完成于托利党人执政时期。托利内阁通过了解放天主教徒³⁰⁴法案。在托利内阁时期，议会改革运动³⁰⁵变得势不可挡。实行所得税——尽管现在这种所得税很不合理，但它毕竟包含着比例税的萌芽——是托利内阁一手完成的。反谷物法同盟的活动在辉格党人执政时期软弱无力和畏首畏尾，而在托利内阁时期，却造成了革命的声势；罗素即使尽量壮着胆子也从来不敢越出像他本人一样温和的固定关税的范围，而皮尔却不得不把谷物法送进了凯普莱脱³⁰⁶，全家的坟墓。而且可以说正是托利党人把贵族平民化了，为了加强贵族的势力而给它注入了平民的力量和才智。多亏托利党人，女演员的儿子坎宁才能对英国的旧土地贵族发号施令；一度当过手织工人后来成为棉纱厂主的暴发户的儿子皮尔，也才能凌驾于旧土地贵族之上；一个普通文人的儿子而且还是犹太人的迪斯累里，现在也能驾驭旧土地贵族。得比勋爵本人就曾使刘伊斯一个小店主的儿子以圣莱昂纳兹勋爵的称号当上了英国大法官。而辉格党却一向很厉害：把为它出力的平民走卒埋葬在眩人耳目的装饰下面，或者傲慢无礼地把他们一脚踢开。布鲁姆，议会改革运动的首脑人物，就被提升为上院议员，使他不能作对，而对于反谷物法同盟的领袖科布顿，则这些由他重新扶上内阁大臣交椅的辉格党人给了他一个贸易副大臣的职位³⁰⁷。

仅就人才方面而论，新内阁完全比得上前届内阁。像迪斯累里、斯坦利、埃伦伯勒这些人，比起下面这一班人马，如前督察委员会主席维农·斯密斯先生、只凭“请照顾一下多布”³⁰⁸这一句话就可以名垂千古的陆军大臣潘缪尔勋爵、枯燥无味的“爱丁堡

评论”的化身乔·康·路易斯爵士、甚至德高望重的掌玺大臣克兰里卡德，可谓毫不逊色。事实上，当初帕麦斯顿不仅以一个无党派的内阁代替了一个包括各党各派的内阁，而且以一个除他本人以外别无贤才的内阁代替了一个群贤内阁。

毫无疑问，帕麦斯顿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他的垮台已最终注定。他还以为，得比勋爵这一次也会像克里木战争时期一样，拒绝担任首相。这样，女王就会把罗素召去；但是因为他手下那批人马大部分都在帕麦斯顿任内做过事，而与他敌对的人马大部分都曾站在迪斯累里的旗帜下，所以罗素将不得不放弃组阁的希望，况且，他是辉格党人，因此不能采取“极端手段”——解散在辉格党旗帜下选出来的议会。这样，经过一个星期的摇摆以后，帕麦斯顿重新执政将是势在必行。这个如意算盘由于得比同意就职而成了泡影。现在不知道这个托利内阁执政是否长久。也许他们支撑了几个月以后不得不采取解散议会的行动——这是他们最后放弃政权以前必定要做的事。但是有两件事我们是毫不怀疑的，即托利党人执政的特色将是在社会改革方面提出富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法律草案（斯坦利勋爵到目前为止的活动以及约翰·帕金顿爵士关于国民教育的法案可以做担保），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会给对外政策带来极其有益而良好的转机。固然，许多见识肤浅的观察家和政论家断言，帕麦斯顿的垮台不会给路易·拿破仑以重大的打击，因为，在他们看来，新托利内阁的某些阁员同法国的这位暴君有很好的私人关系，而且英国也没有条件同一个强大的大陆国家打仗。但是，正因为英国无力进行新的战争，我们认为它对路易·拿破仑手下那些小暴君的粗暴威胁和蛮横要求的答复就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议会中的独立自由派反映全国真实的、强烈的情

绪，以否决帕麦斯顿的取缔阴谋活动法案来回答了瓦列夫斯基的紧急照会³⁰⁹，这决不是因为要让马姆兹伯里和迪斯累里参加内阁。得比勋爵可能会失足下台，但是不管怎样，采用米尔纳·基卜生的修正案这一决议³¹⁰仍然有效并将收到效果。

我们不相信英国的托利党同法国的波拿巴派会结成什么真诚而持久的联盟。双方的直觉、传统和愿望都厌恶这样做。我们并不认为新内阁会像巴黎报刊所认定的那样重新回到帕麦斯顿的取缔阴谋活动法案上来并且坚持通过这项法案。即使它会这样做，也得先本着皮特和卡斯尔里的精神答复瓦列夫斯基和莫尔尼。尽管托利党一无是外，它要是同意按波拿巴的指示改变英国法律，必先改变自己的本性。

另一方面，假定在不久的将来两国政府关系破裂，这也并不降低不久前所通过的决议的意义。我们认为，这一决议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向欧洲宣布，不列颠已不再充当法兰西帝国的帮手了。布鲁塞尔、都灵、甚至维也纳的人们都有此感觉；柏林、马德里、圣彼得堡的人们不久也会有这种看法的。长久以来在拿破仑第一手下充当爪牙的英国，已经公然拒绝再充当他的继承人的走卒了³¹¹。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2 月 26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3 月 1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272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时代的表征

1858年3月11日于巴黎

3月5日星期五的夜晚,在索恩河岸夏龙,共和派举行了一次不大的叛乱。3月9日星期二的夜晚,阴谋分子在这个城市举行了一次会议。从2月24日,即从二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以来,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这次逮捕按其性质来说,与阿尔及利亚的搜捕³¹²极其相似,以致正如伦敦的“笨拙”杂志所说的,不久在法国就会只剩下囚犯和狱吏两个阶级了。有一本半官方的抨击性的小册子“拿破仑第三和英国”³¹³出现了,同时在“通报”上刊载了拿破仑第一的书信片断。最后,有半数巴黎人所关心的是,在至今尚在缓期执行的奥尔西尼被处决时他们能有一个立足的地方。对于皇帝的这份菜单所列的最后一道菜还应该指出,由于很少有人知道的种种情况的凑合,奥尔西尼被“打发去见祖先”——按照伦敦小市民的讽刺说法——的问题,甚至比路易-菲力浦时期处决比桑歌骚动的参加者³¹⁴更具有决定性的转变。当时,群情所以激愤,就是因为这个血腥的案件——虽然它是通过法庭,根据法兰西法律的一切手续处理的——暴露了路易-菲力浦伪善统治的十分丑恶的面貌。给普拉兰公爵开的不是良药而是毒药,目的是使他逃脱普通刑事犯应该受到的可耻的死刑³¹⁵,然而那些

éneutiers〔参加骚动的人们〕，穷困到半死不活地步的农民，由于饥饿，在拿走粮食而发生冲突时并非有意地杀了人，却被残忍地送交给刽子手。相反地，奥尔西尼勇敢地承认自己参与谋杀，并承担了全部责任。他被依法判了罪，虽然巴黎的居民群众很同情他，但他的遭遇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使第二帝国威信扫地的东西。可是，只要注意一下围绕这个案件发生的许多情况，那末这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子。在整个诉讼案的过程中，这种在法国政治诉讼史册上从无先例的、不寻常的行径激动着巴黎人的好奇心。

控诉意见的措词温和而有节制。其中只含混地引证了一些由 juge d' instruction〔法院侦查员〕确定下来的事实，而警察当局那些通常在这类案子中起主要作用的冗长的不止一次的审问，却完全省略了。看来，文件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关于这件事谈得越少越好。被告人在帝国法庭上第一次受到了礼遇。据目睹者说，“完全或者几乎完全没有恐吓、傲慢态度或企图打断发言的现象”。奥尔西尼的辩护人居里·法夫尔甚至在大胆地发表了下列言论时，也没有受到斥责：

“我憎恨暴力，如果暴力不是为正义事业服务的话。假使一个民族已经处于暴君统治的悲惨境地，那末，匕首也就无力斩断它的锁链了。上帝正在计算暴君的寿命，并且为他安排下比凶手的匕首更难逃脱的劫运。”

这番话博得了低声的赞扬，可是没有惹起庭长德朗格尔先生的职业的恼怒。但是，问题还不止如此。大家都知道，居里·法夫尔本人还把奥尔西尼的一封信送到土伊勒里宫交给了皇帝，皇帝读完了这封信以后，据说删掉了其中两句话，就批示把它刊登出来。但是，判决刚一做出，对奥尔西尼的态度就变得极其残酷了，当他请求允许“整理一下自己的文件”时，得到的答复却是

马上给他套上 *camisole de force* [紧束衣]。

这样，事情越来越明显，这里玩弄的是一套凶恶的两面把戏。奥尔西尼可以而且实际上已经告诉比埃特里，他揭发了拿破仑参与烧炭党人运动，揭发了拿破仑甚至在 *coup d' état* [政变] 以后，即在他尚未决定采取什么策略时，就曾对意大利爱国者许下了完全肯定的诺言。为了劝说奥尔西尼审慎从事，仿佛这是为了他本人的利益，以免宣扬出去当众出丑，人们答应赦免他，尽管对这个诺言丝毫也没有打算兑现。这种诉讼方式在第二帝国史册上是屡见不鲜的。读者大概还记得法国著名律师和正统派贝利耶的儿子的诉讼案吧。当时，涉及的是一家股份企业——*Docks Napoléoniens* [拿破仑造船厂] 所干的诈骗案。要知道，老贝利耶掌握着大批文件，足以证明拿破仑亲王和玛蒂尔达公主也曾用这种使他的儿子贝利耶坐在被告席上的欺骗行为赚得了大宗款项。贝利耶是一位具有法国风格的善于雄辩的巨匠，他的这种完全依靠演说家的举止、声调、目光和手势的技能，可以把那些写在纸上看来索然无味的字，用炽烈的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如果贝利耶在法庭上宣读这些文件，再加上一些说明，那末皇帝的宝座就会动摇不稳了。所以，皇帝的近臣前去劝说贝利耶放弃他的意图，并且肯定地答应他，只要他保持缄默，就可以保证他的儿子无罪。他同意了，但是他的儿子却判了罪，父子双双成了欺骗的牺牲品。对于奥尔西尼也是使用同样的手法，并且取得了同样的成绩。但是，问题还不止如此。人们说服了他，不仅使波拿巴免于大出其丑，而且还使他为了同一个波拿巴的利益，打破了自己的缄默，也毁掉了自己的名誉。人们对奥尔西尼示意说，皇帝是暗地里同情意大利解放事业的，于是唆使他写了一封信。随后

居里·法夫尔就上演了一场戏。奥尔西尼的信刊登在“通报”上。为了使奥地利清楚地了解波拿巴还能够操纵意大利人的爱国意向，就必须吓唬一下奥地利，迫使它接受波拿巴的要求。奥地利竟认为是侮辱自己。处决奥尔西尼本应当缓和奥地利的忿怒，但是奥地利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增加了意大利对它的憎恨和扼杀了维也纳的出版自由的弱芽。不管正确与否，奥尔西尼案件的总的理解就是如此。

至于夏龙的 émeute(叛乱)，这只是一个预兆罢了。在法国即使连一个勇敢的人也没有，人们仅仅出于自卫感也会继续诉诸起义的。或者死于街头的战斗，或者丧身于凯恩城²⁰，他们是没有别的选择的。根据什么理由进行逮捕，——而且每一次逮捕都有可能发送到凯恩，正如条条道路通向罗马一样，——可以作为例证的总共只有一个事实。大家知道，不久以前巴黎的三个律师被逮捕了。法律界，或者更确切些说，律师委员会处理了这件事，并且向司法大臣提出了质问。得到的回答是，上述三位先生所以被捕，是因为他们在十个月以前巴黎的最后一次选举期间搞了“阴谋和诡计”，此外，不应当再作任何解释。所以，如果说夏龙的 émeute 似乎完全是理所当然的，那末，夏龙卫戍部队的军官们在这种场合下的行为，就未必符合法军代表奉命送到“通报”去的那篇非常激烈的声明。兵营位于索恩河的右岸，而大部分军官的住宅是在发生叛乱的左岸。军官们不但没有急速率领自己的士兵去捍卫帝国，反而谨慎地采取了一些外交步骤，以便查明巴黎是否宣告成立了共和国。对于这件事，连“通报”也不敢完全避而不谈。该报写道：

“卫戍部队的军官们匆匆奔向专区政府，以便对流传的谣言得到某些消息。他们手里握着军刀为自己开辟道路。”

“祖国报”³¹⁶企图按照自己的看法来说明这一微妙的事件，硬说这些欲明真相的军官企图“逮捕专区区长，如果他是站在共和国一边的话”；其实，他们急于去见专区区长，是要从他那里知道巴黎是否真的宣告成立共和国了。只是在得到专区区长的否定的回答以后，他们才认为必须表现出自己的职业的热心了。卡斯特朗已经从里昂出发去调查他们的行为。简单说来，军队中出现了不满的迹象。“通报”把军队大肆夸奖的手法，反而成为整个欧洲的笑柄，后来为了讨好约翰牛，这一点干脆就不提了。波拿巴把军队分成单独五个部分，是由于担心军队会把最高指挥权交给近来对自己的主子越来越冷淡的佩利西埃；尚加尔 和贝多在语气轻蔑的信中拒绝返回法国；被任命担负要职的埃斯潘纳斯在向多布鲁甲进军以后就曾引起全军营的普遍不满；最后，对事件进程中的急剧变化产生的一种模糊的预感，从来不能使法国的“有思想的军队”³¹⁷受骗，——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军队中那些谨慎的头子们的声望一落千丈。除了夏龙事件以外，麦克马洪将军在法兰西参议院中的行为，也能证明这种离奇的、大概也是出人意料的变化。他针对 *loi des suspects* [嫌疑犯处治法] 发表的意见以非常坦率著称，而他这位波拿巴手下的穿绣金线制服的仆从，竟对这个法律投了反对票。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3 月 11 日
载于 1858 年 3 月 3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285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波拿巴目前的状况³¹⁸

1858年3月18日于巴黎

《Risorgere ò nemico ognor piu arudo
Cenere anco sepolto e spirto ignudo》·

(我将从死人中间复活,成为更加可怕的敌人,虽然我不过是坟墓中的灰烬和无形的幽灵。)这是奥尔西尼在法夫尔发言以后带着异样的笑容向自己的辩护人低声吟诵的塔索的“耶路撒冷”中的两行诗,它已经开始应验了。一位目睹者曾这样描写群众观看这位意大利爱国者被判死刑时的心情:

“政府非常恐惧,因而由将军亲自指挥的整整一师人被派往刑场。15000名士兵准备信号一响就行动起来,一切入口和出口都像起义时期一样有人警戒。据我估计,从郊区来的9万到10万名穿工作服的工人,挤满了拉-罗克特广场附近的所有空地和街道;但是军队的队形排列得使观众看不清楚或者根本什么也看不见。当屠刀落在奥尔西尼颈勃上的声音隐约可闻时,响起了一阵强大的虽然是压抑着的回声:《Vive la R épublique》〔“共和国万岁!”〕我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它好似轰鸣声;它不是喊声,不是呼声,仿佛是千千万万人的低语声和叹息声。当局十分了解这种声音的意义,因为在这一刹那间,士兵掀起了难以想像的嘈杂声,摆弄武器频频作响,鞭打自己的马匹踢跳不已;这样,他们不直接使用武力就能把人群的轰鸣声压下去。但是,毫无疑问,《Vive la R épublique》这句话大家都听得很清楚。我特意步行回家,

托尔克瓦托·塔索的叙事诗“解放了的耶路撒冷”第9章。——编者注

慢慢地从最拥挤的人群中穿过去。我应当坦白地说，我到处都听到同情和钦佩奥尔西尼的话。看来，他的罪状已经完全被忘记了，留下的印象只是他那勇敢的精神和对自己的同谋者的高尚态度。我一次也没有听见谁提起过比埃里这个名字。我要说，人民的情绪是非常危险的。可以看出，蕴藏在内心的憎恨和复仇的欲望已经深到非用言语来表达不可了。我所听到的一切议论几乎都是低声细语的，仿佛随时随地都在担心警察暗探的光临。”

看来，为了肃清共和派分子而采取的“公安”措施，大规模的监禁和流放，并不比 *cités ouvrières* [工人区]、新建的作坊以及企图收买法国工人阶级良心的其他措施取得的成绩更大。以前已经详细谈过的围绕奥尔西尼案件发生的种种情况，现在变成了整个巴黎的共同话题。甚至大家都知道，在检查奥尔西尼和比埃里的大批来往信件时，发现了路易·拿破仑在许多年以前写的亲笔签名的书信。如果法国的“立宪主义者报”仍然像在基佐先生时期那样处于有利的地位，那末，我们天天都可以听到《*L'horizon politique s'obscurcit*》[“政治视野黯淡了”]这句庄严的话了。的确也是这样。当土伊勒里宫的人们知道夏龙卫戍部队的军官的所作所为时，都吓呆了。那里的人们对“通报”的 *naïveté* [天真行为] 感到极其愤怒，因为该报告告诉法国和欧洲说，夏龙的军官没有立刻叫自己的士兵做好战斗准备，没有对士兵说，即使巴黎真的宣布成立共和国，他们也要为反对共和国和保卫帝国而战斗，夏龙的军官没有把所有这些事情变成笑柄，却先跑去见专区区长。可见，他们事先没有证实究竟是否宣布成立了共和国，就拒绝拿自己的生命和地位来为皇帝冒险。这一事实证明，大部分军队是不可靠的。除了军队中一些高级官员或者由于做了极其败坏名誉的事，或者由于得到非常荣耀的嘉奖，因而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帝

国的命运分开以外,也许只有一部分军队应当得到充分的信任,那就是近卫军。这个军团的确很强大,并且无疑懂得,它在任何其他政府之下都会被并入常备军或者全部解散。近卫步兵由4个精选团、2个 voltigeurs〔射击兵〕团、1个宪兵团、1个朱阿夫团和1个 chasseurs〔猎兵〕营——总共17个步兵营组成。此外,近卫军有2个重骑兵团、2个龙骑兵团、1个精选骑兵团、1个骠骑兵团和1个 chasseurs 团——总共21个骑兵连。近卫炮兵也是一支相当可观的力量。近卫军的全部兵力约为2万人,拥有40或50门大炮。这是一个十分强大的核心,在一旦同巴黎居民进行严重斗争时足以制止常备军可能发生的动摇倾向。此外,从省里迅速集结军队的一切工作已经安排妥善,只要大略看一下法国的铁路图就可以明了这一点。因此,一旦发生政府突然无法掌握的运动,就必然会遇上这支拥有6万—8万人的巨大力量。正是波拿巴为镇压武装起义而采取的这些措施,完全排斥了爆发武装起义的可能性,除非武装起义是由于某个非常意外的大事件引起的,因为那时资产阶级的明显的反波拿巴态度,在军队下层进行破坏活动的秘密社团,使军队上层分裂的渺小的嫉妒心、背信弃义的行为、奥尔良派或正统派的同情,大概都会使天平倒向革命的群众方面。对革命的群众说来,最糟糕的就是谋杀波拿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莫尔尼的答复便成了预言,莫尔尼在对俄战争爆发时对波拿巴提出的一旦他意外身亡他们将怎么办的问题所作的答复如下:

《Nous commencerions de jeter tous les Jérômes par la fenêtre, et puis nous tâcherions de nous arranger tant bien que mal avec les Orléans》。(“我们先把所有的日罗姆派抛到窗外,然后千方百计地同奥尔良王朝达成协议。”)

在郊区居民决定他们如何行动之前，莫尔尼可能先行发动宫廷政变，宣布奥尔良王朝，从而把资产阶级拉到反革命阵营中去。

同时，波拿巴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失望，大大地驱使他在国内走上实行恐怖政策的道路。他在外面遭遇的每一次失败，都暴露出他的地位动摇不稳，并且使他的对手产生了希望，这必然会使所谓“巩固的政府当局”有一些新的表现。要知道，在对外方面失败的次数最近几个星期大大增加了。首先在英国方面遭到了严重的失败³¹⁹。其次就连一向非常胆怯、多次让步的瑞士也鼓足了勇气，反对以后用最无礼的方式强加于它的一些措施。瑞士联邦曾接到正式通知说，如有必要，法国步兵团将开入它的国境，履行瑞士警察本身所无法履行的警察职责。当时甚至连凯伦先生也认为必须申请本国的护照，法国政府只好让了步。曾经根据波拿巴的指示修改了本国法律³²⁰的比利时，也拒绝了波拿巴提出的驱逐尚加尔将军的要求。皮蒙特议院中受权审查使撒丁设施适合 *idées napoléoniennes*³²¹ 这一法案的委员会，以 5 票对 2 票的多数提出了完全否定波拿巴草案的建议。奥地利虽然清楚地懂得，奥尔西尼的处决向它暴露了斯特拉斯堡英雄²⁹⁴的真相，而且后者再也不会因为同意大利的关系而使它不安，但是它对波拿巴却表示了明显的冷淡。

陷入可笑的境地——这是法国政府走向灭亡的必经之路。波拿巴意识到，他最近几次扮演欧洲独裁者角色的失败尝试使他处于多么可笑的境地。他在欧洲的地位愈卑微，就愈强烈地感到必须在国内显得威严可畏。因此，恐怖统治就变本加厉了。内务大臣埃斯潘纳斯将军现在得到了前骠骑兵团团长、现任警察局局长布阿泰尔先生的支持。“大陆评论”³²²在描写第二帝国的这批军事爪牙所采用的方法时写道：

“他们拿着 1848 年和 1851 年骚乱以后由警察局当做危险分子而开列的旧名单，并且按照这个名单在巴黎和各省大肆逮捕。他们在这样做以前，丝毫不调查一下，这些人自从那时以后是不是有过可以被提出任何控告的理由。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例如，有许多可尊敬的公民，虽然他们曾醉心于 1848 年全国风暴，并且同情进步思想，但是后来完全脱离了政治，况且其中有许多人现在已经成了家长和热心经商了，而警察却使这样一些人放下自己的工作，离开自己的亲人。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证明，逮捕的理由是多么不充分，即使从表面上看来，采取恐怖行动又是多么缺乏合法性或必要性。在警察局爪牙所要逮捕的人中间，有的至少已经在外国呆了六年，因而不可能犯有任何过错，但是，如果他们这时在法国出现，似乎为了‘公安’起见，他们必定会被关进监牢。甚至还有一种情况，警察竟跑到那些几年以前已经死了的人家里去逮捕。他们的名字写在以前被捕者的名单中（其中许多人当时被捕，不过是因为他们在街头人群中出现，这就是他们的唯一罪行）。因此很清楚，警察不是要对付犯罪分子，而是要对付可疑分子，实行这个法律所采用的方法本身就证明舆论对它的称呼是名副其实的。各省的情况都同巴黎差不多。嫌疑犯的名单是行政当局开列的，倒霉的是那些在最近的六月选举中对省长所推荐的候选人敢于表示反对的人，以及那些认为宪法、选举法和内务大臣的通告是确实可以实现的并认为可能会采取措施让人们按照自己的意见选举候选人的人。现在这些候选人被看成是最坏的罪犯，他们要末就是很有钱有势的，要末就是受到有权势的朋友庇护的，才不致遭到被他们挡着道路的那些官吏的报复。省里被捕的人中间，有库尔泰将军的名字，他在 1848 年是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总司令，但是近十年来他脱离了社会，脱离了政治和公共事务而独居在阿利埃省的一个乡村庄园里。”

在实行“公安”制度的时候，在慢性的商业危机爆发的时候，法国资产阶级很快就会达到这个地步，即在它看来，革命将是为“恢复信任”所必不可少的某种东西。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3 月 18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8 年 4 月 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287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佩利西埃在英国的使命

1858年3月27日于巴黎

对于统治者说来，最困难的处境是一个非军人高居专制军事国家之首的处境。在东方，这种困难由于专制君主被看成天神而多少被消除了，因为这种政权的神权性质不允许把统治者同他的军人武士等同看待。在罗马帝国时代，皇帝之被神化并没有起到这种防护作用，但也是出自同样的需要。路易·波拿巴是一个非军人（尽管他著有大炮史³²³）；但是他无法援用罗马的先例。因此他的处境就益发困难。随着法国越来越感到军队的羁绊不堪忍受，军队越来越大胆地力求把这种羁绊加在波拿巴身上。12月10日³²⁴以后，波拿巴可以认为他是农民即法国人民的绝大多数选举出来的，而聊以自慰。自从1月14日的谋杀事件以后，他知道他只是靠着军队的恩赐才存在。既然他不得不公开承认他是通过军队进行统治，自然军队也就企图通过他本人来进行统治了。

由此可见，法国分为五个帕沙辖区，这只不过是任命埃斯潘纳斯为内务大臣的一支序曲。接着就是任命布阿泰尔先生做巴黎警察的头子。这位先生在1830年是一名下级军官，曾在拉费尔同培尔西尼先生在一个团里服役；七月革命爆发时，他曾试图强迫自己的伙伴高呼《Vive Napoléon II》〔“拿破仑第二万岁！”〕。与

布阿泰尔荣升的同时，马拉霍夫公爵佩利西埃被任命为皇帝陛下驻圣詹姆斯宫的代表。这个任命无非是对军队的讨好和对英国的威胁。诚然，“通报”想把这件事说成是对约翰牛的讨好，可是“世界报”³²⁵的维伊奥（大家知道，他在土伊勒里宫有 *petites et grandes entrées* [出入正式和非正式场合的资格]），在一篇火气十足的文章中预示过这件事，其中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英国的自豪感被损伤了，而且早就被损伤了。在克里木的阿尔马附近、因克尔芒附近和马拉霍夫冈，在凡是法军在战场上—马当先而且比所有的人都更深入敌军阵地的一切地方，都受到了损伤。圣阿尔诺、博斯凯、康罗贝尔、佩利西埃、麦克马洪——正是这些人损伤了英国的自豪感。”

总之，拿破仑第三把自己的缪施科夫派到伦敦去了。顺便提一下：他甚至很高兴能有一个时期摆脱一下这位缪施科夫，因为佩利西埃在刚一撤销委任他为五个帕沙辖区总司令的命令后，就表现得桀骜不驯。当佩利西埃被派赴伦敦的消息一传出去，巴黎证券交易所的股票行情立刻下跌。

佩利西埃可以举出不少理由来对英国实行报复。1842年，帕麦斯顿在梯维尔顿对选民发表演说时，公开骂他是恶魔，并示意伦敦报界群起而攻之。克里木战争以后，雷希·伊文思将军在下院更露骨地表示，佩利西埃是使英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城下遭到惨败的主要根由。英国报刊在评论伊文思将军的这种意见时，对佩利西埃也是十分粗暴无礼。最后，佩利西埃本人在为参加克里木战争的将领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干脆把这场战争的全部荣誉——如果谈得上荣誉的话——归之于法国的武力，对约翰牛的合作竟不屑一提。为了报复这件事，伦敦报界又狠狠地抨击了佩利西埃。此外，大家也都知道，佩利西埃是不能扮演希腊神话中那个唯一

能治好自己亲手所造成的创伤的角色的³²⁶。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同意那些伦敦报纸的看法，它们以古罗马人的心情劝告执政官多加小心，《ne republica detrimenti capiat》〔“以免共和国遭殃”〕。佩利西埃是威吓，而不是战争。对他的任命只不过是 coup de théâtre〔戏剧手法〕。

将 perfide Albion〔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与 la belle France〔美丽的法国〕隔开的宽沟，是法国的 Lacus Curtius³²⁷，然而波拿巴却不是那情愿跳进这个深渊去、为了使深渊合拢起来而抛弃生命的浪漫青年。在全欧洲谁也没有他明白！他的不稳固的政权要依靠同英国的联盟，但是对于要为滑铁卢一战雪耻的人说来，这条真理是致命的东西，他必须想方设法，通过对约翰牛的横加指责，来向自己的武装部下隐瞒它，使这个由法国所强加而为英国所接受的联盟看上去像一种附庸从属的关系。

这就是波拿巴的最危险的把戏，它可能加速他的末日的来临，虽然它的目的是为了推迟这个末日。如果佩利西埃完不成要他前去进行威吓的使命，——这是很可能的，——那就会是输掉了最后一张牌，势必要用实际行动来代替演戏，否则波拿巴在自己的军队眼里将成为一个原形毕露的骗子，这个骗子装出拿破仑的神气来掩盖 1848 年 4 月 10 日的伦敦警察的可怜相³²⁸。

说老实话，幸亏同英国结成联盟，才使这个侄子能够一时仿效他的伯父。英法之间的紧密联系给了神圣同盟以致命的打击，彻底破坏了欧洲的均势，自然也就使这个同盟在大陆上的代表波拿巴依然以欧洲命运主宰者的姿态出现。当对俄战争和法国国内形

“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是拿破仑第一对英国的称呼。阿尔比昂是不列颠群岛的古称。——译者注

势许可这样做的时候,他对于这种徒有其表的霸权是心满意足的。但是自从和平统治了欧洲,而军队统治了法国以来,情况就完全改变了。现在军队要求他像真正的拿破仑那样,表示出他做欧洲的霸主,不是受英国的委托而是违反英国的意愿。难也就难在这里。一方面,他威胁约翰牛,另一方面又暗示约翰牛,说对它毫无恶意。他简直是在央求约翰牛,要它为了礼貌起见,装出一副样子来表示害怕自己的“至圣的盟友”的虚假威胁。然而这恰恰是使约翰牛强硬起来的最好办法;约翰牛知道,自己摆出一副英雄姿态是万无一失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3 月 26 日
载于 1858 年 4 月 15 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 5299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马志尼和拿破仑

马志尼先生最近给法国皇帝写了一封信³²⁹，从文学的观点来看，这封信大概在他的著作中要占首屈一指的地位。马志尼的许多作品所固有的那种假装热情、一味夸大、冗长噜嗦和故弄玄虚的现象（这可以说是他所创立的那个意大利文学派别的特征），在这封信里只能看到少许的痕迹。同时可以看到，他的视野已变得较为广阔。到再在为止，他一直是欧洲共和派形式主义者的领袖。这些人只注意国家的政治形式，而不能理解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的社会组织的意义。他们以其虚伪的理想主义自豪，认为研究经济现实有损自己的尊严。代别人去做个理想主义者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肚子胀得饱饱的人很容易嘲笑饿着肚子的人们不要崇高思想而要普通面包的实际主义。听任康帕尼亚农民处于比他们罗马帝国时代的祖先更悲惨的奴隶境地的 1848 年罗马共和国的三执政³³⁰，当然不难大谈其农村居民的低下精神水平。

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杜罗·德·拉·马尔以探究古罗马土地所有制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为了解这个曾经征服过世界的城市的命运提供了一把钥匙，——与此相较，孟德斯鸠关于罗马盛衰的论述³³¹差不多就像是小学生的作业。年

高德劭的列列韦尔由于细心研究了使波兰农民从自由民变为农奴的经济条件³³²，在阐明他的祖国被奴役的原因方面比一大群全部货色仅仅是诅咒俄国的著作家做出了远为更大的贡献。现在马志尼先生也不认为注意社会实际、注意不同阶级的利益、注意出口和进口、注意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房租以及诸如此类的庸俗东西有损自己的尊严了，这也许是由于他亲眼看到了使第二帝国遭到强大的、甚至是致命的打击的，不是各民主委员会的宣言，而是那由纽约开始之后波及到全世界的经济震荡。但愿马志尼不要就此止步，不屈服于虚伪的自尊心，而进一步按照经济科学来改造自己的全部政治纲领。他的信是以这样一段对路易-拿破仑的愤怒言词开始的：

“最后的时刻正在临近；帝国的浪潮正在明显地消退。这一点你也感觉得到。你从1月14日以来在法国采取的一切措施，你从这个不幸的日子以来向四面八方散发的一切外交照会和请求，都说明你惶恐不安。你的心灵正像麦克佩斯的一样，受着剧烈痛苦的折磨，——不论你说什么，做什么，这一点都可以感觉出来。你的内心已预感到 *summa dies et ineluctabile fatum* 正在临近。就像以前的‘葛莱密斯爵士、考特爵士和君王’一样，现在僭望者、总统和篡位者是注定要灭亡的。魔力已经消失。人类的良心已经觉醒；它正在严峻地望着你；正在与你面对面地站着，仔细地检验你的行为，并且要求你对自己的诺言的执行情况做出交代。从现在起你的命运已经决定。你现在只能活几个月，但决不能活几年了。”

最后的日子和不可避免的时刻（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二册）。——编者注

这里用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主人公麦克佩斯来比喻路易-拿破仑。麦克佩斯先当上葛莱密斯爵士，然后当上考特爵士，最后通过谋杀手段夺得了王位。麦克佩斯后来被杀。路易-拿破仑则先是王位僭望者，后来在1848年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在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使自己成为终生总统，并于1852年称帝。——译者注

马志尼在这样宣布了第二帝国的灭亡之后，将法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拿破仑关于普遍繁荣的漂亮诺言作了一番对比：

“当你非法夺得政权之后，你好像为了弥补政权的这种非法来路，曾经许下诺言，说要这样治理国家，以使惶惶不安的、自己动乱不定并且也使别人动乱不定的法国得到太平。可是，难道监禁、箝制言论和放逐就是治理吗？难道宪兵就是教员吗？难道密探就是宣扬道德和相互信任的使徒吗？你曾向闭塞无知的法国农民说，国家由你来治理，就会开始一个新的纪元，使他们叫苦连天的沉重负担就会一个一个地消失。可是哪怕有一个负担消失了吗？你能说他们的命运曾有一点点好转，他们的苛捐杂税有一点点减少吗？你能解释为什么农民现在要参加Marianne³³³吗？你能否认过去本来用于农业的资金现在都被你所开辟的工业投机的门路吞噬了，而使农民无法获得贷款来购置农具、改良土壤吗？你曾引诱无所适从的工人，说你要做 *empereur du peuple* [人民的皇帝]，新型的亨利四世，说你要给工人保证固定的工作，高工资和 *la poule au pot* [锅里的鸡]。现在 *la poule au pot* 的价钱在法国不是正好涨得太不成话吗？而房租和一些生活必需品，价钱不是涨得更高吗？你开辟了新的街道——为了达到你的镇压政策的战略目的而铺设的新交通线，——你把街道拆了又重新修建。可是，难道工人阶级的大部分都是在你施予恩惠的建筑部门工作吗？你能为了给无产者开辟工作和工资的来源而毫无止境地翻修巴黎和各主要省城吗？你能甚至梦想以这种人为的、暂时的办法来代替正常的进步和够本的生产吗？难道生产的状况现在令人满意吗？难道巴黎不是有五分之三细木工、粗木工和机械师现在没有活干吗？你曾使很容易吓唬住也很容易迷惑住的资产阶级充满美妙的梦想和希望，以为将成倍增加工业活动，将有新的收入来源，将实现大量出口和扩大国际联系的‘黄金国’。这一切在哪里呢？全部工业生活在你的法国都陷于停滞状态，商业订货已日益减少，资本已开始退却。为了摘果子，你像野蛮人那样，把树砍倒了。你人为地过分鼓励了狂热的、不道德的、只许愿不兑现的投机事业；你以大吹大擂的、极其夸大的企业建设方案把法国各地小资本家的积蓄吸收到巴黎来，使它们脱离了国民财富唯一真正长远可靠的源泉——农业、商业

法国国王亨利四世（1589—1610）曾经说道：“如果上帝再给予我一次生命的话，那我一定要保证我的王国里每一个农民都有可能锅里有鸡。”——译者注

和工业。这些积蓄好像掉进无底深渊，在几十个大投机家的手里消失了；它们被白白地穷奢极侈地挥霍掉了；或者被人们小心地悄悄转移到别的安全的国度里去了——我可以举出你家里的一些人作例子。所有这些企业建设方案中有一半已经不存在并且被人遗忘。有一些方案的制定人，为了谨慎起见正在国外旅行。现在你面对着不满的资产阶级；你所有一切正常的财源都已枯竭；耗费于法国几个主要城市的非生产性公共工程的5亿法郎，像梦魇似地纠缠着你；你上年度的预算中显然有3亿法郎的赤字；巴黎城债台高筑，它只得发行16000万法郎的新债（不是用你的名义——因为这样会一无所成，——而是用市政委员会本身的名义），并且为了偿付这项债款的利息不得不把人们所痛恨的市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城外的堡垒地区。这个补救办法将大大加重工人阶级的负担，并且促使至今一直忠实于你的郊区起来反对你。你的阴谋诡计都已用尽；今后你为消除你的财政困难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只会加速你的末日。迄今为止你一直是靠不断的举债和贷款维持生存，但是现在你在哪里能保证继续得到贷款呢？罗马和拿破仑曾经掠夺全世界，而你现在只有一个法国可以掠夺。他们的军队是靠征服他人来维持的，而你的军队就办不到。你只能梦想征服他人，但是你没有能力、没有勇气去冒险尝试。罗马的独裁者们和你的伯父曾经率领无往不胜的军队，至于你，尽管你喜欢穿金光闪闪的军礼服，可是我怀疑，你是否能够率领一支哪怕只有几营人的队伍。”

马志尼从第二帝国的物质前景进而谈到它的精神前景，当然，他在综合证据来证明自由不穿波拿巴的仆役制服这个命题时感到有点为难。自由，不仅它的躯体，而且它的灵魂，它的精神生活，都被那些想使过去的时代复活的人们粗手粗脚地弄得枯槁不堪了。结果，法国思想界的大部分代表，虽然从来不以过分讲究政治良心著称，并且随时都准备为任何政体效劳，不管它是摄政王还是罗伯斯比尔，是路易十四还是路易-菲力浦，是第一帝国还是第二共和国，现在却在法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背离了现存的

政府。

“法国思想界，从梯也尔到基佐，从库辛到维尔曼，从米希勒到让·雷瑙，都避免和你接触，怕你玷污他们。只有巴托罗缪之夜和宗教裁判的辩护士维伊奥，黑人奴役制的庇护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才是你的追随者。为了要找到一个能够以自己的威信来支持你那抨击英国的文章的人，你只好去寻找既背叛正统主义又背叛共和主义的人。”

接着马志尼正确地解释了1月14日事件的真实意义，他说炸弹没有击中皇帝，却击中了帝国，揭穿了帝国所说的大话全是胡诌。

“不久前，你还向欧洲夸口说，安宁、幸福和平静的法国的心是属于你的，法国把你当做它的救星来赞颂。但是几个月之后，勒佩勒蒂埃街上就发出了爆炸声，接着你采取野蛮的、慌张的镇压措施，向欧洲发出半带威胁、半带哀求的呼吁，从军事角度把全国分成许多区，并且指派一名武夫掌管内务部，——你现在以这一切证明了，尽管经过七年的绝对统治之后，你拥有庞大而集中的军队，清除了国内所有使你担心的领袖人物，可是，如果不把法国变成一个大巴士底狱，不把欧洲变成帝国的一个警署，你就不可能生存和统治下去……的确，帝国原来是一个骗局。阁下，你是按照你自己的样子把它塑造出来的。上半个世纪在欧洲，除了达来朗以外，谁也没有像你那样多地撒过谎；而这就是你得以暂时掌权的秘密。”

接着信中提纲挈领地历数了这位社会救主的一切谎言，从1831年开始，当时他参加罗马居民反对教皇的起义³³⁴，说是把它看做“神圣事业”；直到1851年，当时他在*coup d'état*〔政变〕的前几天向军队说，“除宪法所承认的权利以外，我不向你们要求任何东西”；最后到12月2日，当时由于他的篡夺计划的最后结果还未见分晓，他宣布说：“他的责任在于保护共和国。”最后，马

巴托罗缪之夜是指天主教徒在巴黎大规模地惨杀胡格诺教徒的事件；发生于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缪节的前夕。——译者注

志尼直截了当地对拿破仑说，要不是英国，他早就成了革命的牺牲品了。接着，他驳斥了拿破仑关于法国与英国之间似乎已经建立同盟的说法，并且用下面这样两句话作了结束：

“阁下，不管虚伪的、假装的外交怎么说，你现在在整个欧洲都是孤立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3 月 30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8 年 5 月 1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321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伦敦的法国人审判案

1858年4月4日于巴黎

维克多·雨果给侄子起了个绰号叫小拿破仑，于是承认其伯父为大拿破仑了。他的著名小册子³³⁵的标题就意味着一种对照，并且是对那种迷信拿破仑的现象表示一定程度的肯定，因为奥当斯·博阿尔奈的儿子就是依靠这种心理巧妙地建立了自己幸福的血腥大厦。但是，对目前这一代人更有益处的是要清楚了解，小拿破仑实际上反映了大拿破仑的劣迹。这一事实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不久以前英法之间发生的“令人可悲的误解”，以及英国政府在这种“误解”的压力之下对侨民和印刷商进行的刑事审判。简短的历史回顾将证明，在这一出卑鄙的传奇剧中，小拿破仑只是不折不扣地重演了早先大拿破仑所构思和扮演过的卑劣角色。

仅在缔结亚眠和约（1802年3月25日）和大不列颠重新宣战（1803年5月18日）之间的这一短短时期内，拿破仑就恣意地干涉了大不列颠的内政。他没有白费时间。早在和谈还在进行的时候，“通报”就向所有敢于对“波拿巴的温和的和诚恳的意图”表示怀疑的伦敦报纸大肆攻击，并且露骨地暗示说，“这样的怀疑很快就会得到惩罚”。但是执政不仅限于充任英国报刊语气和意见的检查官。“通报”攻击格伦维耳勋爵和温德姆先生在讨论和约问题

时采取的立场。首席检察官派西沃曾在下院要议会议员埃利奥特先生对表示怀疑波拿巴的意图一事负责。卡斯尔里勋爵和小皮特本人都成了鼓吹克制的人，他们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谆谆告诫地说，当谈论到法国的执政时必须谨慎一些。缔结和约以后大约六个星期，在 1802 年 6 月 3 日，达来朗通知英国驻巴黎公使梅里先生说，波拿巴出于对英国的尊敬，决定派真正的大使安得列奥西将军接替法国驻伦敦公使奥托先生，但是第一执政真诚地希望，在这位高级人物抵达伦敦以前，能够“消除横亘在两国和两国政府之间达到充分和解的道路上的障碍”。不客气地说，他要求从英国领土上驱逐

“所有法国亲王及其追随者，连同法国主教和在政治主张及行动方面必然会引起法国政府很大怀疑的其他法国人…… 如果上述这些人在同法国紧相毗邻的国家里继续得到庇护和厚待，那末仅仅这一点，也会被看做是鼓励这里的不满分子，即使这些人没有犯下任何在这个国家里煽起新的骚乱的罪行；但是法国政府掌握的材料证明，他们滥用英国对他们的庇护以及利用同法国靠得近的有利条件，确实进行了这类犯罪活动，因为前不久截获的一些印刷品，如所周知，是他们为了建立政府的反对派而运到法国来散发的”。

当时英国有一种外侨管理法，然而这种外侨管理法是专门为保护不列颠政府而制订的。当时的外交大臣霍克斯柏里勋爵答复达来朗的请求时说：

“国王陛下当然希望侨居在他领土内的一切外侨，不仅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英国的法律，而且对同陛下保持和睦关系的任何国家的政府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然而陛下认为，只要外侨遵守这个原则，如果拒绝保护他们，那是同自己的尊严、荣誉和好客习惯不相容的。只有侨居在陛下领土内的人本身有不轨行为，陛下方不予保护。达来朗先生在谈话中所提到的那些人，大部分完全是过着安分守己的生活。”

梅里先生把霍克斯柏里勋爵的急电转交给达来朗时再三保证“可以告慰第一执政，让他放心和满意”。但是达来朗坚持要自己的一磅肉，硬说第一执政的要求，并未超出英国政府本身在觊觎者 侨居法国时曾向路易十四提出的要求，硬说他根本看不出采取上述措施有任何屈辱的地方，并说他必须再次声明，“接受这种措施会使第一执政感到非常愉快和十分满意”，执政会把这件事看做是“陛下要在两国之间建立真诚了解的最令人信服的明证”。1802年7月25日，奥托先生从他的波特曼广场官邸写信给霍克斯柏里勋爵，信中恰恰是坚决要求在一切涉及波拿巴及其政府的问题上取消英国的出版自由。

他写道：“不久以前，我转给哈蒙德先生一份贝尔蒂埃出版的对法国政府和整个法国极尽诬蔑之能事的刊物。同时我表示，我多半会接到要求惩罚这种滥用出版物的行为的命令。这样的命令果然送来了。我不能向您阁下谄言，聚集在伦敦密谋反对法国政府的一小撮侨民一再进行的侮辱行为，极恶劣地影响了两国之间的真诚了解……我应当提请陛下政府不仅注意贝尔蒂埃，而且要注意《*Courrier Francais de Londres*》的编辑（雷尼埃）科贝特和其他类似的作家……没有一定的旨在对付这类罪行的法律，是不能作为违背国际法的借口的。根据国际法的原则，缔结和约就必须停止一切敌对行动。毫无疑问，一切有损于政府荣誉和声望并导致那些把利益委诸政府的人民掀起暴乱的行为，都是最足以削弱和约的好处和引起国家的愤慨的。”

霍克斯柏里勋爵在7月28日给奥托先生的信中没有坚决、严正地回答波拿巴对出版问题进行干涉时第一次提出的这些指责，反而对存在出版自由的问题低三下四地表示歉意。他在信中写道：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三场。——编者注
詹姆斯二世。——编者注

“陛下政府看到贝尔蒂埃的文章后，不能不深表愤慨，不能不极欲使发表这篇文章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然后，他诉说“不便”对诽谤进行起诉，“碍难”对诽谤者进行审判，他在结尾中说，他已经把案件转给皇家首席检察官，“以便由首席检察官裁决这是不是诽谤”。

正当不列颠政府准备用这种办法对出版自由发起十字军讨伐以使自己的强大的新盟国息怒的时候，8月9日的“通报”突然发表了一篇带威胁性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指责英国容纳法国的强盗和凶手，让他们在泽稷岛避难和派遣他们到法国海岸进行掠夺性的袭击，甚至还把英国国王本人描绘成杀人行为的鼓舞者和怂恿者。

“‘泰晤士报’，这家所谓受政府直接领导的机关报连篇累牍地谩骂法国。该报的四版中间每天有兩版篇幅散布肆无忌惮的诽谤。这家毫不荣誉的报纸把一切可能想像出来的下贱、卑鄙、丑恶的东西都硬加在法国政府身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谁为此付了钱呢？这将导致什么结果呢？一些卑贱的侨民，一些没有祖国、没有人格、罪行累累、不可饶恕的极端卑鄙下流的残余分子所出版的法文期刊，比‘泰晤士报’有过之无不及。”“在伦敦聚集着以阿拉斯的凶残的主教为首的11个主教，他们是反对自己的国家和教会的叛逆分子。他们发表诽谤法国主教和僧侣的言论。”“泽稷岛上麇集着在缔结和约之后因杀人、抢劫和纵火而被法庭判处死刑的匪徒。若尔日 在伦敦公然佩戴他的红色勋章带，这是他以定时炸弹炸毁了巴黎的部分地区和炸死了30个妇女和儿童或和平居民而得到的奖赏。这样的特殊庇护使人确信，如果他的图谋得逞，他将会荣膺袜带勋章。”“两者必居其一：要末是英国政府准许和容忍这类政治的和刑事的罪行，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说这种行为符合英国的宽宏、文明和荣誉；要末是英国政府无能防止这类罪行，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配称为政府，特别是它没有办法去制止谋杀和诽谤行为以及维持社会秩序。”

卡杜达尔。——编者注

“袜带勋章”(Order of the Garter)，是英国爵士的最高级勋章。——译者注

当这份充满威胁性词句的“通报”在深夜送到伦敦时，群情十分激愤，以致政府机关报“诚实的不列颠人报”³³⁶不得不声明：“这篇文章登在‘通报’上，不可能是法国政府知道或者同意的。”劳伦斯博士在下院就法国对陛下的诽谤一事向阿丁顿先生（即后来的西德默思勋爵）质问。大臣答复说，“很抱歉，他不能向博学的先生介绍对这个问题所做的令人满意的解释”。答复的含意是，当不列颠政府把讥讽波拿巴及其夫人的案件按法律处理时，贝尔蒂埃先生由于挖苦这两位人物而被皇家法院³³⁷当做刑事犯传讯；可是当法国官方报纸诽谤英国并把英国国王称做杀人事件的鼓舞者时，全部问题就用“解释”来调解，甚至秘密得都不能告诉给议会。英国内阁这种明显的优柔寡断，鼓励了奥托在1802年8月17日交给霍克斯柏里勋爵一份极其蛮横的照会，照会中公然要求：采取有效措施禁止英国报刊登载一切不妥当的煽动性的通告，把某些人赶出泽稷岛，驱逐法国主教，遣送若尔日及其追随者到加拿大，放逐法国亲王到华沙。至于外侨管理法，奥托先生坚持说，政府必须具有“合法的、强有力的权力，不必诉诸法庭而能约束外侨”；同时又说：

“为了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互惠，法国政府认为，它要求把那些一贯阴谋在两国之间制造纠纷的人驱逐出去，就是再一次证明自己的和平意图。”

在最近同波拿巴第三发生的争论中，霍克斯柏里勋爵8月28日以急电的形式给英国驻巴黎公使的答复，被伦敦报刊引为具有国家活动家尊严的典范。但是必须承认，尽管这个答复充满了合乎美德的愤慨言词，然而还是允诺以损害法国侨民来消释第一执政的疑虑。

1803年初，拿破仑曾着手整顿英国议会的程序和限制议会议

员的言论自由。他在自己的“通报”上直接影射前任大臣温德姆先生、格伦维耳勋爵和敏托勋爵说：

“禁止前任大臣在辞职后七年之内担任英国议会议员的法律，是一条爱国的明智的法律。另外一条对侮辱友好人民及其政府的任何议员剥夺两年发言权的法律，也是明智的法律。舌头犯了罪，舌头就应当受惩罚。”

正在这时抵达伦敦的安得列奥西将军在致霍克斯柏里勋爵的照会中表示不满说，英国报刊上那些撰写短评和诋毁文章的卑鄙的作者“在他们的无礼的短评中一贯引用某些著名议会议员言论中的个别词句”。他在照会中就这些言论说，“任何明事达理的英国人都会为这种闻所未闻的秽语感到耻辱”。他代表第一执政希望

“采取措施禁止将来以任何方式（无论是在官方的辩论中或者是在英国发表的辩论性文章中）涉及法国所发生的事件，正像法国的官方辩论和辩论性文章不应当涉及英国所发生的事件一样”。

当波拿巴以这种虚伪而又傲慢的语调同英国政府秘密通信时，“通报”竟肆无忌惮地对英国人民横加侮辱，并且发表了塞巴斯提昂尼上校的官方报告，报告中对驻埃及的英军进行了极端侮辱性的责难。1803年2月5日，法国驻泽稷岛 *commissaire de relation commerciale*（商务委员）尽管没有任何官方权力，却蛮横地埋怨一些印刷商从伦敦报纸上转载了一段侮辱波拿巴的章节，并且威胁说，如果不取缔这类阴谋，波拿巴一定会对泽稷岛进行报复。这种威胁产生了预期的效果。皇家法庭便传讯其中两名印刷商，并且决定以后严禁他们再印刷任何有辱法国的东西，即使这些东西是摘自伦敦报纸的。1803年2月20日，即贝尔蒂埃受审的前一天，英国驻巴黎大使惠特沃斯勋爵被那位伟人亲自召见。波拿巴自己在桌子的一端坐下以后，就让被邀请到他办公室来的惠

特沃斯坐在另一端。波拿巴列举了一些似乎是他在英国方面受到的挑衅。

“他谈到了英国报刊对他的侮辱,但是他说,他对此并不像对伦敦出版的法文报纸上发表的东西那样注意。他认为后者包藏着更大得多的祸心,因为法文报纸的目的是要鼓动他的国家反对他本人和他的政府。他抱怨不该对若尔日及其同伙加以庇护。他承认,他对英国的愤慨一天比一天强烈起来,因为从英国来的一切,除了对他的敌意和憎恨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为了证明自己维护和平的愿望,他说他看不出同英国打仗对自己有任何好处。登陆是他防止遭受侮辱的唯一手段,他决定亲自领导远征军来试一试这种手段。他承认,百分之九十九对他是不利的,但是如果这次谈判的结果将是战争的话,他还是决定试一试这种手段。他补充说,军队的士气很高,准备前仆后继地远征……为了保持和平,必须遵守亚眠和约。如果不彻底制止报刊上的侮辱言论,至少也应当加以限制,而且仅限于对英国报纸,同时必须禁止对他的极凶恶的敌人进行如此公开的庇护。”

2月21日,贝尔蒂埃在埃伦伯勒勋爵和特别指定的陪审官面前受审,他的罪名是发表诽谤波拿巴的文章和“唆使法国人民谋刺自己的元首”。埃伦伯勒勋爵在结束他对陪审官的讲话时卑贱地说:

“先生们,我深信你们的裁决将会增进我国利益同法国利益所维系着的关系。这种裁决将在世界各地证实并加强早就举世传诵的一种信念:英国司法是公正无私的。”

陪审官即席立即宣判了贝尔蒂埃先生有罪。然而,由于后来两国之间断绝了关系,贝尔蒂埃先生没有被传去接受判决书,诉讼就此终止了。诚实而英勇的“通报”在迫使英国政府对出版事业开始了这种压制,使它不得不宣判贝尔蒂埃有罪以后,就在1803年3月2日发表了如下的评论:

“一个名叫贝尔蒂埃的人被伦敦法庭判了罪,因为他印发了一些恶毒地

诽谤第一执政的东西。令人不解的只是，为什么英国政府极力围绕这件事掀起这样的 *clat* [喧嚷]。鉴于英国报纸硬说，审判是应法国政府的要求进行的，甚至当陪审官在审判会上宣布判决时，似乎还有法国大使在场，我们受权声明，从来没有过这类事情。第一执政在没有看到贝尔蒂埃审判案的公告以前，根本不知道有贝尔蒂埃的诽谤这件事……但是必须承认，这次审判案在其他方面虽然没有什么好处，却使主持审判的法官有机会以自己的明智和公正来表明，他们在这个许多方面受人尊敬的、这么开明的国家里确实当之无愧地行使了司法权。”

当“通报”在同一篇文章中坚决强调一切“文明的欧洲国家”都有责任共同消灭报刊野人的时候，法国驻汉堡公使雷纳尔先生曾召集汉堡参议会讨论第一执政要求在“汉堡记者”³³⁸上发表竭力侮辱英国政府的文章的问题。参议会希望至少应当容许删改最带侮辱性的地方，但是雷纳尔先生声称，他接到的一项坚决的命令是要全文刊载。后来这篇文章就原封不动地发表了。法国公使要求阿尔托纳各报也登载这篇文章，但是丹麦的长官宣称，在没有接到本国政府的确切命令时他们决不容许这样做。由于受到这样的拒绝，法国驻哥本哈根的公使阿格索先生就从汉堡的同事那里收到了这篇文章，请他争取容许在丹麦报纸上发表这篇文章。当惠特沃斯勋爵为了这种诽谤去拜会达来朗先生的时候，达来朗先生声称：

“当第一执政得知这样一篇文章是奉命发表的时候，他感到的震惊不小于英国大臣，并且立即要求雷纳尔先生进行解释”云云。

大拿破仑就是这样的人物。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4 月 4 日
载于 1858 年 4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309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 法国财政状况

1858年4月13日于巴黎

情况越来越迫使复辟了的帝国抛弃装腔作势的姿态，现出自己全部丑恶的原形。招认的时刻对它来说来得十分突然。它已经不再自命为合法的统治形式或《suffrage universel》〔“普选权”〕的产儿了。它已经宣布自己是暴发户、告密者和十二磅炮的制度³³⁹。现在它更进了一步，公开地供认自己是骗子的制度。4月11日的“通报”发表了一篇短评，说有几家报纸过早地宣布了许多铁路公司以及其他工业公司的股票股息，并且宣布的数字低于董事会早已规定的数字。

“必须保护我国的工业和资本免受这一类诡计的损害。帝国的检察官传讯了上述各报的编辑，警告他们说，今后这种事件将提交法院按别有用心地充假消息论处。报纸刊物的义务是开导公众，而不是谣言惑众。”

换句话说，报纸刊物的工作人员的义务——如果他们不希望流放到凯恩去的话——是维护Crédit Mobilier²⁸的声誉，而不是像他们不久以前所做的那样，向公众预告这个骇人听闻的诈骗机关即将破产，即使措词十分谨慎和委婉。Crédit Mobilier的每年一次的股东大会定于4月29日举行，会上将宣布公司上年度的股息。尽管该公司的董事们严守秘密，但是最坏的消息却在流传着，推测

该公司会采用什么方式“虚构出”期待着的股息,有一家报纸甚至敢于旁敲侧击地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一家同 *Crédit Mobilier* 有联系的股份公司的不很久以前召开的会议上,公司的董事非常泰然地说,纵然他可能宣布只有 8% 的股息,公司的业务却比一年以前在股息为 25% 的情况下要好得多。文章的作者冒险地表示怀疑,说这家公司“以及其他”公司恐怕是拿资本而不是拿所得的利润来偿付全部股息的吧。这一切使得“通报”勃然大怒。*Crédit Mobilier* 的股票的行市,2月10日为 957—960 法郎,3月10日跌到 820—860 法郎,4月10日再跌到 715—720 法郎,甚至这个行市也仅仅是名义上的。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股票持有者决定至少出售 6000 股,而贝列拉兄弟的奇妙的创作之一“海事总公司”在卷入了绝非“海事”的投机活动以后,已经 *articulo mortis*〔奄奄一息〕,这些不体面的事实是用任何手段也掩盖不了的。完全不愧为埃斯潘纳斯将军的那一类政治经济学家的好一个妙计,以为“通报”的威胁将保证信贷的增长,同时也使人们不敢说话。警告是发生作用的,不过恰好是发生相反的作用,尤其是这个警告发自一个其财政诡计早已成为人们谈话中的笑柄的政府。大家知道,财政大臣曼涅先生编制的预算上载明有结余,但是,由于 *cour de révision*〔检查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不识分寸的多嘴,暴露了这个预算实际上有将近 1 亿法郎的赤字。当曼涅先生被召见向“财产的救主”作解释时,他恬不知耻地对自己的主子说,他知道主子有“结余”的嗜好,所以就像在他以前的路易-菲利浦的大臣们所做的那样“虚构了”一个预算。事情就这样了结,但是这一事件传开以后,迫使政府做

了一次招认。政府虽然在“通报”上郑重宣布关税在 2 月份有了增长,却又不肯坚持自己的说法。3 月底公布的海关月报表明,今年 2 月份的进口税甚至根据官方的说法总共也只有 13614251 法郎,而 1857 年同月却有 14160013 法郎;今年 1 月和 2 月进口税总共为 25842256 法郎,而 1857 年这两个月份为 28044478 法郎。官方所说的“保护我国的工业和资本免受诡计的损害”和“开导公众”而不要“谣言惑众”,原来就是这种意思。

Coup d'état〔政变〕在更大规模上的重演,大批的流放,法国被分割成为御用军的兵营,关于战争的风闻,外部的纠葛和内部的阴谋——简单地说,1 月 14 日谋杀事件以后,小帝国的焦躁不安的抽搐稍微转移了人们对法国的财政状况的普遍注意。否则,公众会看到,就在这个时候,波拿巴政体的装出来的繁荣已经还原为自己的最初的元素——盗窃国家财产和进行投机活动了。为了证明这种情况,我只要列举这样一些事实,有关这些事实的消息不时地渗入欧洲的报界。先拿普洛斯特先生领导的 Compagnie générale de caisses d'escompte〔贴现银行总公司〕来说。这家总公司不仅参与了一切证券投机活动,而且忙于在全法国创立贴现银行。公司的资本为 600 万美元,分 6 万股。这家公司已与葡萄牙的 Crédit Mobilier 合并,并且是马德里 Crédit Mobilier 的 magna pars〔重要部分〕。但是公司的全部资本已经枯竭,而且负债将近 300 万美元。Compagnie parisienne des équipages de grandes remises〔巴黎大型马车出租公司〕的达莫尼约先生因骗取了自己股东的现款和股票 10 万美元,使他们承担 40 万美元的债务,胡乱浪费了公司的全部资本 160 万美元,已被 police correctionnelle〔违警裁判所〕判罪。另一家公司(Lign éenne〔木材业〕,似乎是从事木材造纸的)的经理

也因为浪费了 80 万美元的资本而被判罪。另外两个波拿巴的“财产的救主”同银行家集团勾结在一起,决定把他们自己以 20 万美元买进的在遥远的多瑙河畔的某些森林和矿场以 1000 万或 1500 万美元的价格脱手卖给大众,因而被判罪。还查明了亚琛附近一家矿业公司的经理们把只值 20 万美元(后来他们不得已供认出来的)的矿井以 50 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自己的股东。由于揭露出了这种种情况, Messageries g n rales(运输公司)的股票行市从以前的 1510 法郎跌到大约 500 法郎。Compagnie des petites voitures(小型马车公司)的股票发行后不久曾哄抬到 210 法郎,现在跌到了 40 法郎。联合公司的股票从 500 法郎跌到 65 法郎。法美航运公司的股票曾经值 750 法郎,现在用 30 法郎便能买到。瓦斯联合公司的股票价格从 1120 法郎跌到 620 法郎。Caisse des actionnaires(股份银行)的董事、小帝国的暴发的百万富翁之一米洛先生对自己的股东们说:

“最近半年来的营业没有取得分毫利润,因而他不仅无法宣布股息,甚至无法支付这半年通常的利息,但是这种利息他一定会掏自己私人的腰包来支付的。”

小帝国的社会溃疡就这样接二连三地暴露出来。路易·波拿巴竟同证券投机商人的上层荒谬地商谈采取什么手段来帮助法国的商业和工业,当然这种商谈没有产生任何结果。法兰西银行自己的处境也十分悲惨,因为它无法出售铁路公司的本票,这些本票是法兰西银行为了使铁路公司进行自己的工程而不得不贷款给它们时作为抵押品收进的。正当法国的铁路公司的全部财产迅速贬值,铁路的每周周报表明铁路的收入不断减少的时候,谁也不愿意买进这种本票。

伦敦“经济学家”杂志驻巴黎记者指出：“至于法国商业的状况，仍旧和过去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它表现了好转的趋势，但是还没有好转。”

与此同时，波拿巴固执地继续向非生产性企业投资，但是，正像塞纳省省长欧斯曼先生坦率地告诉巴黎居民的那样，这种企业“从战略观点来看”是重要的，可以用来防止“随时可能发生和危害社会安全的意外事件”。例如，为了防卫的目的，防备这个城市爆发不满事件，巴黎将建设价值 18000 万法郎的新的林荫道和街道。塞瓦斯托波尔林荫道的新地段的开辟也完全符合这一“战略观点”。起先纯粹是市民的和市政的盛典，由于所谓发现了旨在暗杀波拿巴的新阴谋而突然变成了军事示威。“通报”在解释这一 quid pro quo [误解] 时说道：

“举行阅兵来隆重庆祝首都这条新动脉的落成是完全正确的，我国的士兵继皇帝以后首先踏上这片有如此光荣的胜利的称呼的土地，也是完全正确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4 月 13 日
载于 1858 年 4 月 3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312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勒克瑙的攻占³⁴⁰

印度起义的第二个危急时期结束了。第一个时期以德里为中心，并以该城的被攻占而告终；第二个时期的中心在勒克瑙，现在该城也陷落了。除非那些至今仍然平静的地方爆发新的起义，否则起义势必逐渐转入拖延持久的结束时期，在这个时期，起义者终将变成土匪和强盗，他们会发现，本国居民将和英国人一样，成为他们的敌人。

强攻勒克瑙的详细报道还没有接到，但是最初的战斗部署以及最终的战斗的大致情况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读者都记得，在勒克瑙驻劄官邸解围以后，坎伯尔将军就把官邸炸毁了，但是让乌特勒姆将军率领 5000 人左右留在离城几英里的一个设防据点阿朗巴格。他自己则率领其余的部队返回康波尔，在这里温德姆将军被一支起义军打败。坎伯尔彻底击溃了这支起义军，并迫使他们在卡耳皮附近渡过朱木拿河。然后他就在康波尔等待援军和重炮到来，准备自己的进攻计划，下令集中被指定去进攻奥德的各路队伍，特别是设法把康波尔变成一个力量雄厚和规模巨大的营垒，以便使它成为对勒克瑙作战的最近的和主要的基地。当这

见本卷第 405—406 页。——编者注

一切准备就绪以后,他认为还要完成另一项工作才能安心出征,这项工作的提出使他立刻显得和几乎所有以前的驻印英军指挥官有所不同。他不愿意有妇女在兵营里游逛。他在勒克瑙以及在开往康波尔的途中,对这些“女英雄”算是领教够了。她们以为,军队的行动,就像在印度常常遇到的那样,要服从她们的喜好,听随她们的方便,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坎伯尔到达康波尔以后,立即把这群有趣的但又招惹麻烦的人全部送往阿拉哈巴德,免得碍事;接着,马上又把当时住在阿格拉的第二批太太小姐们召来。直到她们到达康波尔,他又送她们安全地前往阿拉哈巴德,然后才回到向勒克瑙进发的军队里去。

为这次出征奥德进行的准备工作,其规模之大,在印度是前所未有的。英军在印度过去所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是入侵阿富汗³⁴¹,参战的军队从来没有超过两万人,而且其中大多数是土著士兵。在这次出征奥德时,仅欧洲人的数目就超过派往阿富汗的所有部队的人数。在科林·坎伯尔爵士亲自指挥下的主力部队,包括3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炮兵师和工兵部队。乌特勒姆指挥的第一个步兵师守在阿朗巴格。这个师由5个欧洲团和1个土著团组成。第二个师(4个欧洲团和1个土著团)、第三个师(5个欧洲团和1个土著团)、霍普·格兰特爵士指挥的骑兵师(3个欧洲团和4个或5个土著团)以及全部炮兵(48门野炮、攻城炮兵纵列和工兵部队)组成了坎伯尔由康波尔出动的作战部队。弗兰克斯准将所指挥的、集中在古姆提河和恒河之间的章普尔和阿扎姆加尔两地的一个旅则应沿古姆提河向勒克瑙前进。这个旅除土著部队外,有3个欧洲团和2个炮兵连,应构成坎伯尔的右翼。连同这个旅在内,坎伯尔的兵力总数是:

	步 兵	骑 兵	炮 兵 和 工 兵	合 计
欧洲部队.....	15000	2000	3000	20000
土著部队.....	5000	3000	2000	10000

也就是说，总数达 3 万人；此外，还应当加上在章格·巴哈杜尔指挥下由果腊克普尔向苏耳坦普尔前进的 1 万尼泊尔廓尔喀人，这就使入侵军队的总数达到 4 万人，而且几乎全是正规部队。但这还不是全部。在康波尔以南，亨·罗斯爵士率领一支强大的队伍由萨加尔向卡耳皮和朱木拿河下游前进，以便堵击任何可能从弗兰克斯和坎伯尔两军之间溜过去的脱逃者。在西北方面，张伯伦准将于 2 月底左右在恒河上游渡河，进入奥德西北部偏北的罗希尔汗，而且不出所料，这里是起义军队退却的主要地点。奥德四周围城市的警备部队也应当列入直接或间接向奥德王国进攻的兵力之内，这样一来，这支兵力的总数必定有 7 万—8 万人。根据官方材料，其中英国人不下 28000 人。上述的兵力总数中还不包括约翰·劳伦斯爵士的大量部队，这支部队在德里占领着一种侧防阵地，由米拉特和德里的 5500 名欧洲兵和 2 万或 3 万旁遮普土著士兵组成。

这样庞大的兵力的集中，一部分是坎伯尔将军策划的结果，但一部分也是印度斯坦各地起义被镇压的结果，由于各地起义被镇压，部队就自然集中到有战事的地方。毫无疑问，坎伯尔本来是会冒险以较少的兵力作战的，但是当他等待这些兵力的时候，种种情况使他得到了新的兵力；而他这个人，即使明知道在勒克璠将会遇到的敌人是多么可怜，也不至于拒绝利用这些兵力。而且不要忘记，虽然这些部队的数目看来很大，但是他们却分散在一

个像法国那样大的地区里；在决战的地点勒克瑙，他只能用上大约 2 万欧洲兵，1 万印度兵和 1 万廓尔喀兵，而在土著军官指挥下的廓尔喀兵究竟有多大价值，至少还是值得怀疑的。这支军队单靠它的欧洲兵就确实可以绰绰有余地保证迅速取胜，但是全军的数量与它所担负的任务并不是不相称的。很可能，坎伯尔这一次打算向奥德居民显示一下印度任何民族都从未见过的一支威武的白人大军，作为对印度人利用欧洲人为数不多而又广泛分散全国各地的情况举行起义的回答。

起义者在奥德的兵力是由大多数起义的孟加拉团的残部和奥德本地的新兵组成的。前者最多不超过 35000 或 40000 人。战斗、逃亡和军心涣散一定使原先达 8 万人的这支兵力至少减少一半，而留下来的则是组织涣散，士气不振，装备恶劣，完全不适于作战的。根据不同的报道，新兵约有 10 万到 15 万人；但是他们数量究竟有多少，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他们只有一部分人装备有构造拙劣的火器，大部分人只有进行白刃战的兵器，而这种战斗他们是很少会遇到的。这支兵力的大部分在勒克瑙，与詹·乌特勒姆爵士的部队作战，但是有两支队伍向阿拉哈巴德和章普尔方面行动。

向勒克瑙分进合击的运动约在 2 月中开始。从 15 日到 26 日，主力部队同它的大量辎重（仅随军仆役就有 6 万人）由康波尔向奥德的首府前进，未遇抵抗。同时敌军在 2 月 21 日和 24 日曾攻打乌特勒姆的阵地，没有成功。19 日，弗兰克斯向苏耳坦普尔进攻，一天之内把起义者的两支队伍都击溃了，并且在没有骑兵的情况下尽力进行了追击。这两支被击溃的队伍会合后，弗兰克斯又在 23 日把他们击溃，使他们损失了 20 门火炮以及全部兵营设

备和辎重。指挥主力前卫的霍普·格兰特将军，在强行军过程中离开主力，绕到左面，于23日和24日摧毁了位于由勒克瑙到罗希尔汗途中的两个堡垒。

3月2日，主力集中在勒克瑙南面。城市在这方面有运河围护，坎伯尔在前次攻城时曾不得不渡过这条运河；运河后面现在已经筑有坚固的工事。3日，英军占领了迪尔库什宫苑，第一次进攻勒克瑙时，也是由攻击这个宫苑开始的。4日，弗兰克斯准将与主力会合，形成它的右翼，而他自己的右翼则以古姆提河为依靠。这时，对付敌人工事的炮台已建成，并在城市下方古姆提河上架起两座浮桥。当这些准备工作完成以后，詹·乌特勒姆爵士立即率领他的步兵师、1400名骑兵和30门火炮渡河去占领左岸（即东北岸）的阵地。从这里他可以用纵射火力射击敌人在运河岸边的大部分阵地及其后的很多设防的宫殿。他还切断了敌人与奥德整个东北部的交通。6日和7日，他遇到相当顽强的抵抗，但仍驱退了敌人。8日，他再次受到攻击，但攻击仍被击退。这时，配置在右岸的炮台开火；乌特勒姆的炮台沿河岸射击起义者的翼侧和后方；9日，爱·路加德爵士指挥的第二师攻占了马蒂尼埃尔，读者也许还记得，这是一所带花园的学院，位于运河南岸，在运河与古姆提河汇合处，和迪尔库什宫苑相对。10日，银行大厦被打开了缺口并被攻下。乌特勒姆沿河而上，更往前进，用他的火炮对起义者的阵地逐个进行纵射。11日，两个苏格兰团（第四十二团和第九十三团）攻占了王后宫，乌特勒姆攻占了连结左岸与城市的几座石桥。然后，他就把自己的队伍调过河去，参加攻打对面

最近的一座建筑物。3月13日,对下一个设防的建筑物伊曼巴拉大厦的攻击开始了。为了设置隐蔽的炮位,向大厦挖掘了一道对壕。次日,在那里造成缺口,这座建筑物遂被攻占。逃向恺撒巴格(即王宫)的敌军遭到猛烈的追击,英军紧跟着逃军冲入了王宫。激战继之而起,但到下午3时,王宫已落入英军手中。这看来已使战斗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至少,抵抗的意志已丧失净尽,于是坎伯尔立即部署追赶和堵击脱逃的敌人。坎伯尔准将奉命率领一个骑兵旅和少部骑炮兵去追击他们,而格兰特则率领另一个旅绕到位于勒克瑙到罗希尔汗途中的锡塔普尔去堵击他们。在对逃跑的那一部分守军采取了上述措施以后,步兵和炮兵继续向城内前进,肃清还在那里坚持的敌军,从15日到19日,战斗显然主要是在城内狭窄的街道上进行,因为沿河岸的宫殿和花园地带早已被占领。可是在19日,全城已落入坎伯尔手中。据说,约有5万起义者逃跑,一部分逃向罗希尔汗,一部分逃向达普和班得尔汗。他们往后一个方向有可能逃脱,因为罗斯将军和他的队伍距朱木拿河至少还有60英里,并且据说他前面还有3万起义者。在罗希尔汗方向上,起义者还有机会重新集中,因为坎伯尔不能够很迅速地追赶他们,至于坎伯尔现在何处,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而且该省之大足以使起义者暂时安身。因此,起义的下一阶段的特点,很可能是在班得尔汗和罗希尔汗成立两支起义军,而后一支军队可能很快就被勒克瑙和德里的军队用分进合击的运动消灭掉。

就我们现在所能判断的,科·坎伯尔爵士在这次战役中的行动仍以他所常有的谨慎和毅力为特点。他对勒克瑙实行分进合击的部署是出色的,而且在进攻的准备中看来也充分利用了一切有利情况。另一方面,起义者的行动大概比以前更加可怜了,任何

地方只要一看见红制服，就惊慌失措。弗兰克斯的队伍击溃了比自己多 20 倍的兵力，自己却几乎没有损失一兵一卒；虽然电讯照例说什么“顽强的抵抗”、“激烈的搏斗”，但报道中提到的英军的损失却少得出奇，因此，恐怕这次在勒克瑙不需要英国人比上次进攻该城 时表现更多的勇敢，他们在那里所取得的荣誉也不会比上次更大些。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4 月 15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4 月 3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312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迪斯累里先生的预算

1858年4月20日于伦敦

迪斯累里先生4月19日在下院发表的关于预算的演说，虽然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占了大约十栏的版面，但是不管怎样，读起来却很愉快，也许甚至比读这同一位作者的长篇小说“年轻的公爵”³⁴²还要更愉快些。就分析透彻、结构简练、布局巧妙和细节处理适中等方面来说，这篇演说比他那位在帕麦斯顿执政时的前任的笨拙冗长的言论要高出一头。演说并没有包括任何特别新的东西，而且也没有企图这样做。迪斯累里先生处于不是和他自己造成的赤字、而是和对手遗留下来的赤字打交道的财政大臣的有利地位。他扮演的角色是医师，而不是病人。这样，一方面他得找出弥补赤字的资金；而另一方面，根本谈不上大量缩减由于英国已在帕麦斯顿勋爵庇护下从事的冒险而引起的开支。迪斯累里先生直截了当地向下院的议员们宣布，如果他们想要实行侵袭和侵略的政策，他们就应当拿出钱来，而且他们关于节约的喊叫只不过是一种嘲笑，因为与此同时下院曾表示愿意付出任何开支。按照他的声明，1858—1859年财政年度的支出应该如下：

	英 镑
偿付长期公债	28400000
经常费开支.....	1900000
军队给养	11750000
海军（包括邮船在内）.....	9860000
民政事务.....	7000000
国家税务部门.....	4700000
需于 1858 年 5 月还清的国库债券	2000000
偿还军债的基金.....	1500000
<hr/>	
全部支出	67110000

1858—1859 年的收入估计如下：

	英 镑
关税	23400000
消费税	18000000
印花税.....	7550000
土地税和不动产税.....	3200000
邮政事业.....	3200000
财产税和所得税.....	6100000
国家土地	270000
其他收入.....	1300000
<hr/>	
全部收入	63020000

把预计的支出和收入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尽管迪斯累里先生对于关税、消费税和邮政事业可能提供的收入估计得相当乐观，但是纯赤字还是有 400 万英镑。如何来弥补呢？帕麦斯顿派一想到迪斯累里先生明年不得不暂缓把所得税从每一英镑征收 7 辨士降低到 5 辨士，就不禁暗自发笑，——因为当康瓦尔·路易斯爵士提出这项建议的时候，迪斯累里先生和格莱斯顿先生曾极力反对

过。帕麦斯顿派那时就会高声叫喊这是无原则的反对,并且利用所得税的不受欢迎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总之,所得税是帕麦斯顿派曾大胆预言得比内阁这艘船一定会因而碰得粉碎的暗礁。然而迪斯累里先生是一只不致于陷入这种圈套的老狐狸。迪斯累里出人意外地向议院宣称:约翰牛在最近五年以来在钱财方面曾“表现得”像乖孩子一样,他愉快地承担了国家的负担,因此在目前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就不应该用他一向特别厌恶的捐税来苦恼他;何况根据大多数议员通过的1853年协定³⁴³,已经答应乖孩子要逐渐减少这种捐税,并且在若干年之内把它完全取消。迪斯累里先生自己那张用来弥补赤字、甚至用来保证收入略高于支出的单方就是:暂时推迟200万英镑的国库债券的偿还;为偿清军债所需的130万英镑,在还没有可以拨作此用的 bona fide(真正的)多余收入以前不予支付;平衡英格兰和爱尔兰的酒税,把爱尔兰的酒税从每加仑6先令10辨士提高到8先令,这可使国库收入增加50万英镑;最后,对银行支票征收1辨士的印花税,这可使收入增加30万英镑。

至于迪斯累里先生所征收的为数不大的新税,它们是不可能引起重大的反对的。帕蒂的代表当然认为自己有责任提出抗议,虽然如此,但是对爱尔兰使用酒精饮料的任何障碍,应该看成是治疗措施。财政大臣在提出这项措施的时候,忍不住要对他的爱尔兰朋友开开玩笑。他“以最真诚的精神”要求“急性的爱尔兰人”同意对“爱尔兰的酒精饮料”课税的建议,要求他们把自己的“灵魂”与英格兰人的和苏格兰人的灵魂融合在一起。对银行

“帕蒂”是“帕特里克”的小名,也是爱尔兰人的绰号。——编者注
文字游戏:原文是《spirit》,这个词既有“酒精饮料”的意思,也有“精神”、“灵魂”的意思。——编者注

支票征收一个辨士的印花税，遭到了代表伦敦银行家和股票经纪人利益的格林先生的猛烈抨击。他表示确信，这个不幸的辨士一定会妨碍国家的货币流通执行自己的职责；但是，无论格林先生对于居然敢对银行家和股票经纪人课以微不足道的捐税这件事觉得或者假装觉得多么恐怖，他的感觉未必能在广大的英国人民中得到反响。

迪斯累里先生的预算的最大特点就是取消人为的还债基金——这是康瓦尔·路易斯爵士由于对俄作战时拉借了债款而重新采取的财政上的大欺骗手段。真正英国的还债基金，是那些使整个这一代人认识模糊、并且下一代人也未必能理解其实质的可怕的错觉之一。1771年，理查·普莱斯博士在他的关于继承支付的评论³⁴⁴中，第一次向世人揭开了复利息和还债基金的内幕。

他写道：“生复利息的钱，起初增长得很慢，以后就不断加快，过了一段时期之后，其速度就超出任何想像。一个辨士，在耶稣降生那一年以5%的利息放出，到现在会增长成一个比15000万个纯金地球还要人的数目。可是如果以单利息放出，在同样长的时间里，它至多只能变成7先令 $4\frac{1}{2}$ 辨士。直到现在，我们的政府宁可用后一种方法而不用前一种方法来理财。一个国家总是能摆脱困难的，因为它只要有一小笔积蓄就能在它的利益所要求的短期限内清偿大笔的债务。至于国家必须付出多少利息，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因为利息愈高，则可以更快地用这种基金来偿还基本债款。”

因此普莱斯建议

“每年储备一笔钱，把它和它所产生的利息专门用来偿还国债，换句话说，就是建立还债基金。”

这个荒诞的计划远不如塞万提斯小说中一个傻子的财政方案那样聪明（那个傻子建议全体西班牙人民只要在两个星期内不吃不喝就可以取得偿付国债的基金），然而还是博得了皮特的青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于 1786 年建立了自己的还债基金，规定每年必须“一文不少地”拨出 500 万英镑作这项用途。一直到 1825 年，下院通过了只能用国家 bona fide（真正的）多余收入来偿付国债的决议，这个制度才被废止。这种奇怪的还债基金把国家的整个信贷制度弄得混乱不堪。在迫于需要而借的款和为了娱乐而借的款之间，在增加债务的公债和用以偿还债务的公债之间，造成了一片混乱。利息和复利息、借债和还债，在人们眼前川流不息地跳来跳去；统一公债和本票，债券和国库期票，无利息的资本和无资本的利息是这样变幻不定，即使头脑最健全的人也会感到眼花缭乱。普莱斯博士的观点就是：国家应当以单利息借款，以复利息放债。其实联合王国已经借了 10 亿英镑，在账面上它收到了大约 6 亿，可是其中的 39000 万不是用来还债，而是用来维持还债基金。帕麦斯顿的财政大臣曾经企图使约翰牛再担负起这个标志着股票经纪人和投机家的黄金时代的出色基金。迪斯累里先生给了它一个 coup de grâce（最后的打击）。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4 月 20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8 年 5 月 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318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英法联盟

1858年4月22日于巴黎

自从贝尔纳博士被宣告无罪开释，受到公众的热情欢呼，英法联盟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首先是“世界报”这家报纸（它相当精明地懂得，“杜弗市政当局对天性浑厚的马拉霍夫公爵礼遇有加”，并不比“人民在老贝利¹³⁵法庭上的可恶的欢呼声”更能说明“英国的真情实意”）宣称英国不仅是“杀人犯的巢穴”，而且是杀人犯的民族，包括陪审员和法官在内。于是上校们提出的最初的原理³⁴⁵就得到了更广泛的基础。紧跟在“世界报”之后，“立宪主义者报”发表了一篇由勒奈先生署名的社论，勒奈先生是麦凯尔先生的女婿，而麦凯尔先生，大家知道，又是波拿巴的私人秘书、心腹朋友和总管。如果说“世界报”同意了上校们给英国人民所下的定义，只是扩大了它的意义，那末“立宪主义者报”则是重复他们的威胁，所不同的只是力图以臆想的“城市和乡村地区”的愤怒来论证兵营的不满情绪。它故意用第二帝国的庸俗文学所特有的那种无辜受屈的声调大嚷大叫：

“我们不再来详细谈论那种使公共道德蒙受空前侮辱的无罪开释了；因为凡是法国和英国的正直人士，谁不相信贝尔纳犯了罪呢？我们只想通知那些愿意维持两国友好关系的邻国，万一贝尔纳的辩护人的发言，那篇被准许

对皇帝、对推选他的国民、对军队和我国制度滥施诽谤和侮辱的发言,不幸在法国的城市、兵营和乡村地区传播开来。兵营这个位置放得很有趣,竟在城市和乡村地区之间!那末政府即使十分愿意也很难防止国民公愤的后果。”

原来是这么回事。法国是否将进攻英国,只是取决于“立宪主义者报”本身所宣扬的詹姆斯先生的发言是否会在法国传播开来。但是在这种可以说是宣战以后,第二天“祖国报”上却来了一个有趣的、令人惊奇的转变,说什么法国入侵英国是可能避免的,只是必须使英法联盟进入一个新阶段。贝尔纳的无罪开释,暴露了英国社会的无政府势力日有增长。得比勋爵必须采用波拿巴拯救法国社会的方法来拯救英国社会。这就是这一联盟必然会产生出的结局,这也是它的 *conditio sine qua non* (必要条件)。这家报纸又说,得比伯爵“是一个有雄韬大略的人,几乎与皇室有亲戚关系”,因此拯救英国社会,他是责无旁贷的。英国的日报自然注意到了在这种愤怒、威胁和诡辩的交替后面所隐藏着的虚弱无力、变化无常和束手无策。“每日新闻”驻巴黎记者援引了这样一件尽人皆知的事实,即波拿巴有两派谋士——晚间是酩酊大醉的酒鬼,早晨是神志清醒的顾问,以为这就是“世界报”、“立宪主义者报”和“祖国报”上的那些朦胧画面的奥秘所在。这位驻巴黎记者从“世界报”和“立宪主义者报”的文章中闻到了沙托-玛丽奥酒和雪茄的芳香,而从“祖国报”的文章中则感到了冷水淋浴的飞沫。但是要知道,在波拿巴与法兰西共和国决斗时也是这两派人活动。一派在1849年1月以后曾从他们的小型晚报上以 *coup d'état* (政变) 相威胁,而另一派则在“通报”的累赘篇幅中直接揭穿他们是在说谎。可是毕竟不是“通报”上的“呆板”文章,而是“权力报”³⁴⁶上的醉汉的欢呼,反映出了未来事件的影子。然而,我们决不认为波拿巴有顺利渡过“宽濠

沟”的手段。由“纽约先驱报”³⁴⁷着手发表的、在这个问题上经过苦思冥想而得出的可笑成果,甚至初学军事科学的人也会付之一笑。可是我们坚决相信,作为一位非军人——这一点绝不应该忘记——来领导军人政府的波拿巴,已经在“祖国报”上对英法联盟作了能使他的“上校们”感到满意的、最后的、唯一可能的解释。他的处境非常荒唐同时也非常危险。为了欺骗外国政府,他必须挥舞宝剑。为了安慰自己的剑客,不让他们把他的吹牛信以为真,他必须求助于这种令人难以相信的 *fictiones juris*(法律上的虚构),即英法联盟意味着用行之有效的波拿巴的方法来拯救英国社会。当然,事实总是和他的理论相抵触的,如果革命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来结束他的王朝,那末结果他就会像他交运时一样倒运,也就是说,他最后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冒险,来一次更大规模的 *expédition de Boulogne*(布伦远征)³⁴⁸。正像当年冒险家变成皇帝一样,皇帝将要变成冒险家。

既然“祖国报”已经把波拿巴关于英法联盟的意义所能说的一切都说出来了,那末就值得注意一下英国统治阶级目前关于这个联盟持什么论调。在这方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伦敦“经济学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标题是“论英法联盟及其性质、价值和代价”。这篇文章是用有意卖弄学问的笔调写成的,这倒很适合帕麦斯顿内阁前任财政部秘书长和英国资本家经济观点的代言人的身分。威尔逊先生从这样一个命题开始,即“到手的东西可能不完全是所约定的那样”。他说:“对真正的英法联盟的意义是无论给予多高的估价也未必过分的”;但是要知道,联盟有各种各样的,有真正的联盟

和人为的联盟,有一点不假的联盟和温室里成长的联盟,有“自然的”联盟和“政府的”联盟,有“政府的”联盟和“个人的”联盟。首先“经济学家”听任自己的“想像”自由驰骋,而关于律师所说的那句话也可以用来谈“经济学家”:一个人越是平庸,他的想像就越爱同他开玩笑。“经济学家”未必能靠自己的

“想像,来仔细地考察关于领导现代文明的两大民族的真正联盟可能影响欧洲命运和其他各国的幸福和兴隆的问题”。

可是它不得不承认,尽管它希望并且相信这两个民族结成真正联盟的时机“正在成熟”,然而这种时机“还没有成熟”。但是,如果说英国和法国结成真正的民族联盟的时机还没有成熟,那末自然就会发生这样一个问题:目前的英法联盟到底是哪一种联盟呢?

这位帕麦斯顿内阁的前任阁员、英国资本家的先知承认道:“我们承认,最近我们缔结的联盟在很大的程度上简直可以说是与政府缔结的联盟,而不是与民族缔结的联盟,是与皇帝缔结的联盟,而不是与帝国缔结的联盟,是与路易·波拿巴缔结的联盟,而不是与法国缔结的联盟。而且我们对这个联盟所做的估价以及我们为它所付的代价,已经使我们或多或少地忽略了这个重要的事实。”

当然,波拿巴是法国民族选出来的,以及诸如此类的废话等等,但是可惜,

“他代表的只是法国人民的数量上的多数,而不是理智方面的多数。不幸的是,那些不拥护波拿巴的社会阶级中,恰巧包括着几乎在文明的全部重大问题上和我们持有同样看法的党派”。

“经济学家”就这样用非常慎重而客气的方式和累赘噜嗦的词句(我们不想用它们来麻烦读者),确定了目前所谓的英法联盟与其说是民族的联盟不如说是政府的联盟这个公理,然后又进而认

为这个联盟与其说是纯粹政府的联盟，甚至还不如说是个人的联盟。

它写道：“路易-拿破仑不像一个伟大民族的首脑所做的那样，他曾经十分明白地暗示，正是他是我们在法国的一位特殊的朋友，与其说是法国人民，不如说是他本人愿意与英国缔结联盟并且保持这种联盟；可能我们比真正的谨慎和诚恳所要求的更加情愿和无条件地同意了这种观点。”

总而言之，英法联盟是一个假造的冒牌货，是同路易·波拿巴缔结的联盟，而不是同法国缔结的联盟。因此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值得为这个冒牌货付出代价呢？在这里“经济学家”捶着胸脯，代表英国的统治阶级高声喊道：《Pater, peccavi》〔“父亲，我犯了罪！”〕首先，英国是立宪的国家，而波拿巴则是专制的君主。

“单是为了尊重自己，我们也应当注意使我们对法国 de facto（事实上的）统治者的忠诚的谦恭，只是随着他的政策变得能够得到我们衷心赞同的程度而发展成由衷的热情赞赏。”

英国人民，实行立宪制的人民，不是这样用一把计算尺来衡量自己的波拿巴主义，而是

“对这位消灭了自己臣民的宪法上的自由的皇帝殷勤备至，任何一位恩赐这种自由并且尊重这种自由的立宪君主，都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关注。当波拿巴生气和感情激动的时候，我们就低声下气地用那种肉麻得很难令人相信是出自英国人之口的奉承话去安慰他。我们的言行使法国人民中那些认为路易-拿破仑不是篡位者就是凭借武力的独裁者的集团与我们疏远了。这也使得法国的议会派，无论共和主义者或奥尔良派，都感到特别愤怒和难堪。”

最后，“经济学家”发现对这位幸运的篡位者卑躬屈膝是太不慎重了。

他说：“决不能认为法国的现存制度就是这个精力充沛的民族愿意生活于其中的永远不变的制度……因此，同法国统治的过渡阶段缔结联盟，一种只会使法国在具将来更稳固的发展时期仇恨我们的联盟，这是不是合理呢？”

不仅如此，波拿巴需要与英国结成联盟远远胜过英国需要与他结成联盟。在 1852 年，他只是一个冒险家——虽然一帆风顺，但终究还是冒险家。

“当时在欧洲没有人承认他，现在是否有人承认他，还是一个问题。但是英国迅速地并且毫不犹豫地承认了他；它立刻承认了他的政权，让他进入皇族的狭窄圈子，从而使他有权进入欧洲的一切宫廷。此外，我国宫廷通过互相拜访和缔结亲善同盟，使泛泛之交变成了密友……那些有进取心的金融阶级和商业阶级——他特别需要他们的支持——立刻看出了他靠与英国缔结亲密联盟获得了多么大的力量。”

这个联盟是他所迫切需要的，因此他“会不惜为它付出任何代价”。英国政府在要价的时候是否表现了生意人的敏锐和必不可少的洞察力呢？它根本没有要价，也没有提出任何条件，而是像东方的小暴吏那样，跪在地上把这个联盟当做礼物呈献给他。不管波拿巴干了多么卑鄙的勾当，都未能使英国政府片刻停止它那“无边的慷慨”，——这是“经济学家”的说法，我们则说：无度的顶礼膜拜。

这位英国的罪人有所悔悟地说：“很难证明，我们对于波拿巴为了压迫新教、箝制思想、取缔市政当局的活动以及把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活动变成丑剧而采取的所有各种各样的措施，哪怕是对于其中的一件也好，曾经以冷淡的表情或皱紧眉头来表示我们的不满。”“不管他做了什么事，不管他迫害了什么人，不管他查封和禁止了多少报纸，不管他用什么不足道的借口解雇了可尊敬的、杰出的教授，——我们对他的态度都未改变；在我们看来他仍然是一个伟人，仍然是精明干练的政治家，仍然是杰出的、果断的统治者。”

英国人不仅这样助长、支持和鼓励了波拿巴的卑鄙的对内政策，而且还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让他阻碍、改变、阉割和取消了他们自己的对外政策。

“经济学家”最后得出结论说：“如果让这种反常的状态再继续下去，那末这决不会提高我们的威信，增加我们的收入，使各民族的友好家庭有所裨益。”

把这一声明和“祖国报”上的声明对比一下，你就丝毫不会怀疑，英法联盟已经垮台了，随着，第二帝国的唯一国际支柱也垮台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4 月 22 日
载于 1858 年 5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 5319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几份重要的英国文件

1858年4月30日于伦敦

最近，英国政府发表了几份统计材料：贸易部 1858 年第一季度报告，1857 年 1 月和 1858 年 1 月的赤贫现象的比较材料和工厂视察员的半年报告³⁴⁹。贸易部的报告果然不出所料，指出了在 1858 年的头三个月，无论是进口或出口，都比去年同一季度缩减了许多。全部出口商品的申报价值总数在 1857 年第一季度为 28827493 英镑，在今年头三个月降低到了 23510290 英镑，因此，英国的全部出口估计大约缩减了 19%。只计算到 2 月底为止的主要进口项目的价值表说明，与 1857 年的头两个月相比，进口价值从 14694806 英镑降低到了 10117920 英镑，因此进口的缩减就比出口的缩减更加明显。从以下这份摘要材料中，可以看出联合王国在 1857 年头三个月和 1858 年头三个月对美国出口贸易的对比情况：

联合王国对美国的出口

	数 量		申报价值(英镑)	
	1857 年	1858 年	1857 年	1858 年
啤酒和麦酒(桶)...	9504	6581	40893	29269
煤和灰煤(吨).....	19972	44299	11975	24818

(续)

	数 量		申报价值(英镑)	
	1857年	1858年	1857年	1858年
棉织品(码).....	61198140	35371538	1128453	618540
五金商品(公担)...	44096	14623	301275	104668
亚麻织品(码).....	18373022	8757750	527076	265536
铁块(吨).....	10172	6569	39927	20344
条铁(吨).....	70877	6417	610124	54602
钢铁锭(吨).....	207	2362	4659	14475
各种锻铁.....	12578	2097	151602	29218
原钢.....	3607	1118	128178	43666
铜(公担).....	11075	1954	69286	10595
铅(吨).....	941	60	21793	1324
植物油(加仑).....	400200	42790	62576	5768
盐(吨).....	66022	35205	33169	16990
丝织品(磅).....	66973	22920	82280	25212
毛织品,呢绒(匹)	106519	30624	351911	110096
混毛织品(匹).....	6030643	6368551	401249	232202
精梳毛织品(匹)...	212763	80601	249013	106913
陶瓷器.....	—	—	155700	70998
装饰品和帽类.....	—	—	614825	288752
白铁(张).....	—	—	273409	105847

除了极少数微不足道的例外，这个表说明各种出口商品都有很大的削减；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出口价值的跌落几乎都与出口数量的减少不符。在这方面，美国这个市场要比别的国家好得多，因为在别的国家，英国人拿出更大量的货物，而捞回的钱反而更少。例如，英国人向荷兰出口的羊毛，1858年为277342磅，1857年为254593磅，但是在1858年只得到24949

英镑，而在 1857 年反而得到 25563 英镑；同样，他们在 1858 年向法国出口 1505621 磅羊毛，总共只得到 103235 英镑，而在 1857 年出口的羊毛数量较少，即 1445322 磅，反而得到 108412 英镑。此外，如果我们把报告中关于 1858 年整个第一季度的材料与 3 月份这一个月材料对比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英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有恢复过去水平的趋势。例如，1858 年 3 月的精梳毛织物的出口，与 1857 年 3 月相比，只从 66617 英镑减少到 54376 英镑，而在一个季度中，就从 249013 英镑减少到 106913 英镑。但是，唯一不在此例并且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不是减少而是大有增长的国家就是印度，这一点可以从以下这些数字看出来：

	数 量		申报价值(英镑)	
	1857 年	1858 年	1857 年	1858 年
啤酒和麦酒(桶)...	24817	51913	77845	166567
棉织品(码).....	120092475	151463533	1385888	1787943
五金商品(公担)...	10642	16776	42849	67287
棉纱(码).....	5145044	10609434	276469	531567
条铁(吨).....	20674	26266	191528	217539
铜(铜片、铜条) (公担).....	18503	23313	115927	132156
羊毛呢绒.....	12123	19571	63846	90584
陶瓷器.....	—	—	9989	19631
装饰品和帽类.....	—	—	21350	31427
蒸汽机.....	—	—	31408	36019

英国对印度出口的某些项目的增加，例如毛织品，可以说是由于战争的需要。但是总的说来，这种增长的原因应该从另一方面去寻找。其实事情很简单：几个月的起义把印度的市场完全封

锁了，使那里所有的商品全部售光，形成了一种真空，现在在把这种真空重新填补起来。至于澳大利亚，报告中也指出英国出口的某些项目有很大的增长，但是，从悉尼和墨尔本寄来的信件使人确信：往那里运商品带有纯粹投机的性质，这些商品将不是按照申报价值出售，而是要大打折扣。

关于在 1857 年 1 月底和 1858 年 1 月底领取官方津贴的英格兰和威尔士贫民的比较材料，说明贫民人数已经从去年的 920608 人增长到今年的 976773 人，共增加了 6.1%。但是在中央地区的北部、西北行政区和约克郡行政区，也就是说在工业地区，贫民人数增长的百分比分别为：20.52%，44.87%，23.13%。此外，必须看到，工人阶级中有很大大一部分人真是宁愿挨饿也不入习艺所。下面这个从官方报告中摘出的材料表明，真正工厂居民在全体人民中所占的百分比即使在英国也是多么微小，就这一点而言，这个材料是极其有趣的。

工 业 统 计

地 区	20 岁以上 的 人 数	20 岁以上的人从事以下各行业的百分比：			
		手工业、 商业和 家 务	农 业	工 业 生 产	采 矿 工 业
1. 首都	1394963	47.6	1.1	6.0	3.5
2. 东南地区	887134	30.7	20.8	2.5	2.4
3. 中央地区的南部	660775	28.8	25.4	7.1	2.4
4. 东部地区	603720	27.4	26.5	4.0	2.3
5. 西南地区	978025	28.6	23.3	4.6	5.6
6. 中央地区的西部	1160387	29.1	15.5	5.2	12.6
7. 中央地区的北部	654679	31.8	21.7	6.4	5.3

(续)

地 区	20 岁以上 的 人 数	20 岁以上的人从事以 下各行业的百分比：			
		手工业、 商业和 家 务	农 业	工 业 生 产	采 矿 工 业
8. 西北地区	1351830	29.8	8.3	21.5	5.4
9. 约克郡	961945	25.2	14.3	17.5	7.3
10. 北部地区	521460	27.7	16.1	4.2	12.4
11. 威尔士	641680	21.8	25.7	2.5	12.4
英格兰和威尔士	9816597	31.0	16.1	8.4	6.3

所包括的材料只到 1857 年 10 月底为止的工厂视察员报告，并不像往常那样有趣，因为正如视察员一致宣称的，工厂的停闭、工作时间的缩减、工厂主的纷纷破产以及恰好在视察员写报告时开始了的全面经济萧条，使他们不能搜集到他们在过去能够据以编写关于新工厂数目、以及关于增添发动机的工厂和停工的工厂的报告的精确资料。因此，只有在他们以后的报告中才有可能找到反映危机后果的工业统计数字。目前这份报告中唯一新颖的东西，是它多少揭露了花布印染工厂的童工和青年工人的状况。英国立法机关的检查只是在 1845 年才从纺织工厂扩展到花布印染工厂。花布印染工厂条例丝毫不差地重复了工厂法关于视察员的权利，关于他们对违法者的处理方式以及关于在执行时可能发生的工厂法中所提到的各种困难的规定。正如在织布工厂一样，这个条例在这里也规定必须登记雇佣人员、在接纳未成年者从事长期工作之前要对他们进行身体检查、严格遵守每天开工和收工的规定时间。这个条例也采用工厂法为划分工人类别而汇编造册的

办法，但是在确定哪些人应该属于哪一类，因而在确定哪些人应该受到限制劳动的保护方面，与工厂法大有悬殊。

工厂法把工人划分为三类：(1) 18 岁以上的男工，其劳动不受限制；(2) 13 岁到 18 岁的男工以及 13 岁以上的女工，其劳动应有限制；(3) 8 岁到 13 岁的童工，其劳动应有限制，而且他们必须每天上学。

花布印染工厂中与此相当的三类是：(1) 13 岁以上的男工，其劳动不受限制；(2) 13 岁以上的女工，其劳动时间应有限制；(3) 8 岁到 13 岁的男女童工，其劳动应有限制，而且他们必须定期地上学。花布印染工厂条例与工厂法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对以下几点没有作任何规定：划出吃饭时间，星期六休息，在圣诞节和耶稣受难日停工，定期的半日休假，对危险机器的防护设备，不幸事件的登记和对受害者的津贴，厂房的定期粉刷。现在，工厂的劳动时间与熟练工人以及其他一般工人的通常劳动时间完全一样，也就是说，从上午 6 时到下午 6 时，其中有一个半小时吃饭时间。花布印染工厂的劳动时间，尽管有法定的限制，实际上可以说是没有限制的。对劳动的唯一限制，包括在花布印染工厂条例（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第八年和第九年时通过，第二十九章）第二十二款中，它规定不应当使用 8 岁至 13 岁的童工和妇女做夜工，并且夜工时间是指从晚上 10 时到翌晨 6 时。因此，8 岁的儿童完全合法地可以而且实际上也常常被雇用来从事在许多方面都与纺织工厂的劳动类似的、主要是在高温室内进行的劳动，从上午 6 时一直到晚上 10 时，没有休息或吃饭的间歇时间；而年满 13 岁的孩子完全合法地可以而且常常被雇用来在白天黑夜进行任何时数的劳动，根本没有限制。关于花布印染工厂的童工上学的问题

题，是这样规定的：每个儿童应该在进入花布印染工厂以前至少上学 30 天，或者在受雇以前的六个月中至少在学校学习了 150 小时；然后在受雇于花布印染工厂期间，他应该上学 30 天，或者每六个月上学 150 小时。上学时间应该在上午 8 时至下午 6 时之间。同一天内在校时间不足两个半小时或超过 5 小时，都不算入这 150 小时。花布印染工厂厂主的仁慈特别表现在他如何执行这条规定的方式上。儿童上学校去度过法定的时数，总是有时在这个时候，有时在那个时候，毫无定准；例如，他可能有一天是从上午 8 时到 11 时呆在学校里，在另一天则是从下午 1 时到 4 时，然后可能好几天不在学校露面，以后又可能在下午 3 时到 6 时去上学；或者他可能一连上学三天或四天，甚至一个星期，然后隔上三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不去，以后工厂主想放他去了，他又在偶然的日子或时间里去学习一下。儿童就是这样在学校和工作之间被抛来抛去，直到上学 150 小时的故事讲完为止。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4 月 30 日
载于 1858 年 5 月 2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329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 攻占勒克瑙的详情

我们终于得到关于勒克瑙的强攻和陷落的详细消息。固然，科林·坎伯尔爵士的报告——从军事观点来看，这是情报的主要来源，——至今尚未公布，但英国报纸的报道，特别是伦敦“泰晤士报”上罗素先生的通讯（其主要内容已向我们的读者介绍过了），完全足以使我们对进攻方面的行动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我们根据电讯所做出的关于防御方面表现了无知和怯懦的结论，已全部为详细的报告所证实了。印度人所构筑的工事在外表上虽然很威武，但实际上不比中国兵勇在他们的盾牌上或者城墙上绘画的火龙和鬼脸有更大的意义。每一单个的工事，从正面来看都是攻不破的阵地，到处是带有炮眼、枪眼的垒墙和胸墙，工事前面有各种各样的障碍物，到处架着枪炮。但是每个阵地的翼侧和后方却被完全忽略了，从来不曾想到各工事之间的相互支援，而且甚至工事之间和工事前面的地区都从不扫清，因而进攻者可以准备无论正面或侧面的攻击而不致被防守者觉察，可以在很好的掩蔽之下接近到距胸墙几码的地方。像这样一堆工事，只有一群没有军官指挥、在愚昧和无纪律占统治地位的军队中服务的普

通工兵才能构筑出来。勒克瑙周围的工事只是全部西帕依式作战方法通过粘土围墙和土胸墙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欧洲战术的机械方面，他们也部分地领略了一些。他们对步枪的操法和排教练相当熟悉，他们也会设置炮位和在围墙上凿射孔，但是在阵地防御中如何配合各连和各营的行动，或者如何把炮位与开了射孔的房屋和围墙配合起来构成有抵抗能力的营垒，所有这些他们就一窍不通了。例如，他们在坚固的石砌宫墙上凿的射孔过多，因而减弱了宫墙的抗力，他们让炮眼和枪眼一层叠一层，把有胸墙围护的炮位设置在宫顶上，而所有这一切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从翼侧绕过所有这一切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同样地，他们由于意识到自己在战术上的劣势，就尽量把每个据点塞满人，来弥补这一弱点，但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英军炮兵有机会发挥可怖的威力，而且，只要进攻的队伍从出其不意的方向袭击这一群乌合之众，就根本没办法进行有秩序、有组织的防御。即使英军因某种偶然的情况而不得不对工事的威武可畏的正面进行攻击，这些工事也都由于构筑失当，致使英军几乎不冒任何危险就可以接近它们，打开缺口，进行强攻。伊曼巴拉大厦的情形就是这样。距这所大厦几码的地方有一道坚固的粘土墙。英国人挖了一条短短的对壕接到这道墙脚下（这充分证明：大厦上部的枪眼和炮眼不能对大厦紧跟前的地区进行俯射），于是就利用这一道墙作为攻城炮的炮位，而这正是印度人自己为英国人准备好的！他们在这道墙后面设置了两门六十八磅炮（海军炮）。英军中最轻的六十八磅炮不连炮架重 87 英担，甚至假定说的是仅用空心弹的八吋炮，这类炮最轻的也有 50 英担重，加上炮架，则至少有 3 吨重。这样的重炮竟能够运到有几层楼高的、而且顶部设有炮位的王宫的跟前，可见

防守者对于制高点多么忽视，对于军事工程多么无知，这种情况是任何一支文明军队中的任何一个普通工兵都不会有的。

英军对手的军事知识水平就是这样。至于说到勇敢和顽强，这在防守者方面也是同样没有的。从马蒂尼埃尔到穆萨巴格，土著部队只有一种普遍一致的行动，即一当敌军向前进攻时，他们就拚命逃跑。上一次，当坎伯尔给驻劄官邸解围的时候，在锡康德尔巴格还发生过一场屠杀（很难把它叫做战斗），而这一次在所有的冲突中，甚至连一点可以与那场屠杀相比的东西都没有。进攻的部队一开始前进，起义者就立即向后方仓皇溃逃，在只有几处狭窄的出口、拥挤的人群不得不停下的地方，他们就毫不抵抗地纷纷倒在进攻的英军的扫射火力和刺刀之下。“英国刺刀”在对惊慌失措的土人进行任何一次攻击时所收的效果，比他们在欧美两洲的一切战争中所收的效果还要大。在东方，像这样只有一方积极作战而另一方则怯懦地消极应付的白刃战，是战争中的常事；缅甸防栅³⁵⁰在每一次战事中都可以作为例证。据罗素先生说，英军的主要损失，都是由那些被截断后路、堵在宫殿房舍里的印度人从窗口向庭院和花园里的军官射击所造成的。

在伊曼巴拉和恺撒巴格被攻时，印度人逃得非常快，因此那里不是被攻下，而简直是长驱直入。可是有趣的场面这才开始，因为据罗素先生泰然自若地说，那天恺撒巴格的攻占是那样出乎意料之外，甚至没有来得及设法防止肆无忌惮的抢劫。真正的、爱好自由的约翰牛看着他们的不列颠掷弹兵们自由自在地拿走奥德国王陛下的珍宝、贵重武器、衣物及其他一切家用物品，那该是个很开心的场面。锡克人、廓尔喀人和随军仆役们是十分乐意仿效他们的榜样的，接着而来的一场抢劫和破坏的情景显然甚至超

过了罗素先生的描绘能力。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抢劫和蹂躏。恺撒巴格于 14 日陷落；过了半小时，军队就丧失了任何纪律，军官对部下完全不能控制。17 日，坎伯尔将军不得不派出纠察队来制止抢劫，“在目前这种胡乱行为没有中止以前”，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显然，军队已完全失去控制。18 日，我们听说，最肆无忌惮的抢劫行径虽已中止，但是蹂躏破坏还在自由自在地进行着。在市区内，当前卫与从房屋里射击的土著士兵争夺的时候，后卫就尽情地抢劫和破坏。晚间，又发出另一道禁止抢劫的命令；由每一团派出强有力的队伍带回本团人员，并且不让随军仆役离开部队驻地；除值勤者外，任何人不得擅离兵营。20 日，再度发出了同样的命令。就在该日，有两个英国“军官兼绅士”凯普中尉和塞克维尔中尉“进城抢劫，在一所房屋里被杀害”。26 日的情况还是那样糟，以致下达了最严厉的命令禁止抢劫和暴行；规定对士兵每小时点名一次；严禁一切士兵入城；随军仆役持武器入城者，一经发现即处以绞刑；士兵非值勤不得携带武器；所有非战斗人员均解除武装。为了使这些命令得到应有的慑服力，在“适当地点”设置了许多鞭笞用的三角架。

这在十九世纪的文明军队中确实不是体面的事情；如果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军队哪怕只干了这些暴行的十分之一，义愤填膺的英国报纸会如何诅咒它们啊！但是这些却是英国军队干出来的，所以人们告诉我们说：这种事情只不过是战争的正常后果。英国军官兼绅士完全可以随意把他们在自己扬名显威的舞台上所碰到的银匙、钻石手镯以及其他细小珍品据为己有；如果说坎伯尔不得不在战斗正酣的时候把自己的军队解除武装来制止大规模的抢劫和暴行，那末这样做可能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当然谁也不会舍

不得让这些可怜的小伙子在经受过这么多艰难困苦之后休息个把礼拜，稍微消遣一下的。

事实是，无论在欧洲或者在美洲都没有像英国军队这样残暴的军队。抢劫、暴行、屠杀——这在任何别国军队里都是已经严格禁止和完全排除了的行为，——是英国士兵由来已久的特权，是他们的合法权利。英军在西班牙战争中攻占巴达霍斯和圣塞瓦斯田³⁵¹以后几天内所干的卑鄙事情，是自从法国革命爆发以来任何其他民族历史中所无以比拟的；洗劫被攻占的城市这种中世纪的习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已被禁止，可是在英军中仍然是老规矩。在德里，迫于军事原因，破例没有这样干，但是军队虽然领取了特别津贴，仍然满腹牢骚，因此这次他们在勒克瑙就补偿了在德里错过的机会。在十二个昼夜内，在勒克瑙的不是英国军队，而是一群无法无天、酗酒肇事、粗暴无礼的乌合之众，分散为一帮帮的强盗，他们比刚刚从这里被赶出去的西帕依更加无法无天，更加粗野狂暴，更加贪得无厌。1858年勒克瑙的洗劫是英国军队永远洗不掉的耻辱。

如果说鲁莽的大兵打着传布文明和人道的旗号在印度横行无忌时只能抢劫土著居民的动产，那末英国政府则紧跟着把他们的不动产也一起夺去。他们说，第一次法国革命就没收过贵族和教会的土地！他们说，路易·拿破仑也没收过奥尔良王朝的财产！于是言语委婉、态度和蔼，性情温和的英国贵族坎宁勋爵奉自己上司帕麦斯顿子爵之命来没收整个民族的土地，没收上万平方英里面积上的每一寸、每一块、每一亩土地³⁵²。这是约翰牛的多么好的掠夺物啊！当埃伦伯勒勋爵代表新政府对这一前所未闻的措施表示非议的时候，“泰晤士报”和英国其他一伙小报立即挺身出来为

这一大规模的抢劫作辩护，并争论说，约翰牛有权利想没收什么就没收什么。因为，约翰是个特殊人物，按照“泰晤士报”的说法，对别人是耻辱的东西，对他却是一种美德。

这时，由于英军只顾抢劫而完全陷于瓦解，起义者没有受到追击，而逃出了该城。他们集中在罗希尔汗，同时有一部分在奥德开始进行游击战争，另一部分则逃向班得尔汗。不过，热天和雨季很快就要到来，不能指望天气对欧洲人会再像去年那样异乎寻常地有利。去年，欧洲部队大部分已多少习惯于那种气候，而今年大部分都是刚到印度来的。毫无疑问，6月、7月、8月的战事将使英军丧失大量的生命，并且由于每拿下一座城市都得留些警备部队，野战部队将很快地消散。现在我们已经听说，每月补充1000人几乎还不足以保持军队现有的战斗力；至于说警备部队，仅仅勒克瑙一地就至少需要8000人，即坎伯尔军队三分之一以上的兵力。为进攻罗希尔汗而组织的队伍，未必会比勒克瑙的这支警备部队更加强大。我们还听说，英国军官中越来越普遍地认为：随着大规模起义部队的分散而必然到来的游击战，比起现在以战役和围攻为内容的战争，将使英国人更加难以应付并将夺去更多的生命。最后，锡克人也开始用一种对英国人来说不是什么好兆头的口气讲话了。他们感觉到，没有他们的帮助，英国人很难保住印度，假如他们和起义者合伙，印度斯坦肯定会从英国人手中失去，至少是暂时失去。他们高声谈论这个，并用他们东方人的方式加以夸大。在他们眼中，英国人再也不是在穆得克、菲鲁兹沙赫尔和阿利瓦尔打败过他们³⁵³的高贵种族了。从这种信念到公开的敌对行动，对于东方民族说来只有一步之隔：星星之火可成熊熊之焰。

总之，勒克瑙的攻占也和德里的攻占一样，远没有结束印度的

起义。今年夏季的战事可能造成这种结果：英军在今年冬季实际上还得再度转战于这片土地上，甚至得重新征服旁遮普。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面临着使人疲于奔命的长期的游击战，而在印度的烈日之下，这对于欧洲人决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事情。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5 月 8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5 月 2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333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奥德的兼并

大约一年半以前，英国政府在广州宣布了一种新奇的国际法原则，按照这种原则，一个国家可以对另一个国家的任何地区采取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而无需同这个国家宣战或宣布处于战争状态。现在，又是这个英国政府，由印度总督坎宁勋爵出面，更进一步破坏了现行的国际法。它宣称：

“奥德省的土地所有权应予没收，归英国政府所有；英国政府将本着它认为适宜的方式行使此项权利。”³⁵⁵

1831年华沙陷落以后，俄国皇帝没收了那时属于许多波兰贵族的“土地所有权”，这件事在英国报界和议会中引起了一致的愤怒。诺瓦拉战役以后，奥地利政府并没有没收而只是查封了积极参加独立战争的伦巴第贵族的地产，这在英国又引起了一致的愤怒。最后，当路易-拿破仑在1851年12月2日以后没收了奥尔良家族的地产——按照法国的习惯法，这些地产早在路易-菲力浦登极时就该收归国有，但是由于一个法律上的花招而逃避了这种命运，——英国人简直是愤怒不已，伦敦“泰晤士报”也说，这种行动破坏了社会秩序的基础，使市民社会无法继续存在。实践说明了这全部高尚的愤怒有多大价值。英国只是大笔一挥，就不仅把几个有爵位的人的地产、不仅把王族的土地给没收了，而且

把一个几乎与爱尔兰大小相仿的王国³⁵⁶的全部领土，即埃伦伯勒勋爵本人所谓的“整整一个民族的世袭财产”给没收了。

但是，我们来看看坎宁勋爵以英国政府的名义提出了什么样的口实——我们无法把这叫做理由——来为这种旷古未闻的行为辩护吧。第一，“勒克璠现在在军队的统治之下”；第二，“叛军的反抗得到这个城市以及全省居民的支持”；第三，“他们犯下了重罪，自己招致正义的惩罚”。说得明白一点：因为英国军队占领了勒克璠，所以英国政府有权没收它尚未到手的奥德土地。因为靠英国人供养的土著士兵哗变了，所以原来在武力压迫下屈从于英国统治之下的奥德当地居民就没有权利为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而举行起义。简单地说，奥德人民举行起义反对英国政府的合法权力，现在英国政府就厉声宣布，起义是实行没收的充分根据。可见，如果撇开坎宁勋爵的夸夸其谈，那末全部问题就归结为这样：在他看来，英国在奥德的统治权是合法地建立起来的。

其实，英国在奥德的统治权是这样建立起来的。1856年达尔豪西勋爵断定行动的时机已到，他就在康波尔集中了军队，而告诉奥德国王说这支军队是用来监视尼泊尔的。突然间，这支军队侵入了奥德，占领了勒克璠，俘掳了国王。他们要国王把自己的国家让给英国人统治，但是枉费心机。于是国王被送往加尔各答，奥德这块地方就被并入东印度公司的领地。这种背信弃义的入侵行为的依据，是威尔斯里勋爵经手签订的1801年条约第六条³⁵⁷。这个条约是另一个条约即约翰·肖尔爵士在1798年经手签订的条约的自然产物。按照英印政府在同土著王公交往时所遵循的一

般政策。这个第一次签订的 1798 年的条约是缔约双方的攻守同盟条约。它保证东印度公司每年得到 76 拉克（380 万美元）的津贴；但是按照第十二、十三条的规定，国王必须减少国家的捐税。不言而喻，国王无法同时履行这两个显然互相矛盾的条件。结果，正如东印度公司所指望的，出现了新的复杂的情况，最后终于签订了 1801 年的条约。按照这个条约，国王必须割让领土来补偿似乎已经出现的对原有条约的破坏行为。顺便提一下，当时在议会里曾对这次领土割让严加指责，认为是一种公开的掠夺，而且威尔斯里勋爵那时要不是倚仗着自己家族的政治势力，就会因此而被提交调查委员会查办。

作为这次领土割让的交换条件，东印度公司根据第三条，负责保护留给国王的领土不受任何内外敌人的侵犯，而根据第六条，还保证国王及其后裔和继位者永久占有这些领土。但是这第六条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对国王设下的圈套，那就是：国王必须建立一套通过他的官吏来执行的行政制度，这套制度要能促进他的臣民的福利，并且要能保障居民的生命和财产。现在我们假定，奥德国王破坏了这个条约，他没有用他的行政制度来保障居民的生命和财产（譬如说，把他们绑在炮口上轰死，没收他们的全部土地）；那末东印度公司能做什么呢？条约上承认国王是独立的国君，是行动自主的人，是缔约的一方。东印度公司在宣布条约遭到破坏从而宣告无效时，只能采取两种行动：或者通过谈判施加一定压力来达成新的协议，或者向国王宣战。但是，不宣战就侵入他的领土，出其不意地将他俘掳，夺去他的王位和兼并他的国家，——所有这一切不仅

仅是破坏条约,而且也是破坏国际法的一切原则。

有一件奇怪的事实证明,兼并奥德不是英国政府突然决定的。帕麦斯顿勋爵刚刚就任外交大臣,就马上在1831年命令当时的总督兼并奥德。他的这位僚属当时拒不执行这项命令。但是这个消息传到了奥德国王那里,他就找了一个借口派一个使团到伦敦去。使团不顾一切阻挠,终于向当时还被完全蒙在鼓里的威廉四世陈述了奥德面临着什么样的危险。于是,威廉四世和帕麦斯顿大闹了一场,结果帕麦斯顿奉到极严厉的上谕:今后不得再发生这类 *coup d' état*, 否则立予免职。这里很有必要提醒一下:这次兼并奥德和没收其全部地产正是在帕麦斯顿重新当政的时候发生的。几个星期以前,下院曾要求调阅有关1831年第一次企图兼并奥德的文件,但是督察委员会秘书贝利先生宣称这些文件已经遗失。

1837年,当帕麦斯顿再度出任外交大臣,奥克兰勋爵出任印度总督时,奥德国王又一次被迫同东印度公司签订新的条约。这个条约使1801年条约的第六条有所改变,因为“其中没有规定,如果不履行本条所包括的义务”(善自治理国家)，“当如何惩处”；因此第七条特别规定：

“奥德国王应会同英国驻劄官立即拟制最有效的办法来消除自己统治地域内警务、司法、财政方面的弊端；如果国王陛下无视英国政府的建议和指示,如果在奥德境内普通存在着粗暴而一贯的压榨、无政府和混乱状态,以致严重危害社会安宁,英国政府则保留权利委派自己的官员在英国政府认为

纳集尔·埃德·丁。——编者注

直译是：政变；这里是：变故。——编者注

穆罕默德·阿利·沙赫。——编者注

必要的期限内治理奥德任何一部分发现有这类施政恶劣情事的领土,不论其地域大小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收入中扣除一切开支以后的余额当交入王国国库,并将收支情况如实呈报国王陛下。”

其次,条约的第八条还规定:

“印度总督及其参事会不得已而行使第七条所赋予他的权力时,将在可能范围内力求保持并尽量改善该地区的本地行政机关和政府形式,以便在时机成熟时将该地区交还奥德的国君。”

在形式上,这个条约是由英印总督及其参事会³⁵⁸同奥德国王签订的。它作为这样一个条约,由双方遵照一切正式手续予以批准,并按应有的方式交换了批准书。可是,当它被提交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核准时,后者认为它破坏公司和奥德国王之间的友好关系,是总督对这位君主的权利的侵犯,而把它宣告作废了(1838年4月10日)。帕麦斯顿并没有请求公司许可签订这个条约,因此他也就根本没有理睬公司关于宣告条约作废的决定。同样,奥德国王也从来没有得到宣告条约作废的通知。达尔豪西勋爵本人证明了这一点(1856年1月5日会议记录):

“很可能,国王在即将同驻劄官进行的谈判中会提起他同前任驻劄官在1837年签订的条约。驻劄官知道,条约已经无效,因为英国刚刚接到它之后,它立刻就被董事会宣告作废了。其次,驻劄官知道,虽然奥德国王那时曾得到通知,说1837年条约中某些有关增加军事力量的沉重条款将不能实现,但是关于完全废除条约这件事却从来没有通知国王陛下。由于这样隐讳和吞吞吐吐,现在已使人感到棘手。而且由于这个已经宣告无效的条约仍然被收进1845年奉政府命令出版的条约汇编,更使人感到棘手。”

就在同一份议会记录的第十七节中还有这样的话:

“如果国王援引1837年的条约,并提出询问:为什么——假使目前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来管理奥德——英国政府不行使前述条约赋予它的广泛权

力,则应该通知国王陛下:这项条约自从提交董事会那一天起已经不复存在,因为董事会已宣告它完全作废。应该提醒国王陛下,勒克瑙宫廷那时曾得到通知:1837年条约中关于由国王负担新添武装力量的军饷的若干条款应宣告作废。必须承认,当时认为没有必要把条约中那些不立即生效的条款通知国王陛下,由于疏忽,以后也没有通知国王陛下。”

但是,这个条约不仅被收进1845年出版的官方编纂的条约汇编,而且在1839年7月8日奥克兰勋爵给奥德国王的通知里、1847年11月23日哈丁勋爵(当时的总督)向同一位国王所上的条陈以及1851年12月10日斯利曼上校(在勒克瑙的驻劄官)致达尔豪西勋爵本人的信件里,都把它当做现行条约而正式引用。达尔豪西勋爵的所有前任、连同他自己的僚属在和奥德国王的来往信件里,都把这个条约视为有效条约,为什么达尔豪西勋爵本人偏偏这样顽固地否认条约的合法性呢?唯一的原因是,按照这个条约,不论国王为干涉自己的事务提供了什么样的口实,这种干涉总是受到限制:英国的官员们只能在奥德国王的名义下掌握这个国家的行政权,而且他们必须将剩余的收入交给国王。但是英国人所希望的恰恰相反。只有兼并才能使他们心满意足。否认二十年来构成相互关系的公认基础的条约的合法性;用公开违背公认的条约的方式强占独立的领土,彻底没收整个国家的每一亩土地——英国人对印度本地人使用的所有这一切背信弃义、令人发指的手法,目前不仅在印度,而且在英国国内,都已开始得到它应有的报复。

卡·马克思写于1858年5月14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8年5月28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33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历史上有趣的一页

1858年5月18日于曼彻斯特（英国）

在上次对俄战争刚结束不久，报上出现过一条消息，说土耳其军队的一个上校穆罕默德·贝伊，即前匈牙利军队的上校班迪亚先生，随同一些波兰志愿人员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切尔克西亚。他一到那里，就立刻在切尔克斯人的首领塞弗尔-帕沙那里成了参谋长之类的人物。凡是了解切尔克西亚的这个匈牙利解放者以往经历的人，都毫不怀疑，他到这个国家去的唯一目的，是把它出卖给俄国。以前已公开而确凿地证实，此人在伦敦和巴黎时，就是同时从法国警察机关和普鲁士警察机关领取薪俸的间谍。所以毫不足奇，大约一个月前，欧洲报纸刊登了一则消息，说已确实查明，班迪亚，即穆罕默德-贝伊，同俄国的菲力浦逊将军有叛卖性的通信往来，并且审讯他的军事法庭已将他判决死刑。然而过了不久，班迪亚突然出现在君士坦丁堡，把自己装扮成阴谋的牺牲者，以他特有的无耻口吻宣称，这一切关于他的叛卖以及军事法庭等等的说法，纯粹是他的敌人捏造出来的。

我们获得了与切尔克西亚战争中这一有趣插曲有关的最重要

的文件，在这里我们把其中的几件摘引出来。这些文件是由审讯班迪亚的军事法庭的成员之一、切尔克西亚波兰营的中尉弗朗契舍克·斯托克带到君士坦丁堡的。这些文件无须加以解释。

以下就是在切尔克西亚阿迭尔比开庭审讯伊洛什法尔瓦人穆罕默德·贝伊（亚·班迪亚）的军事法庭的纪录摘要。

（第1号）1858年1月9日的审讯。诺迪厄科尼若省人穆斯塔法的证词：

“……穆罕默德·贝伊上校来到舍普苏古尔后，要我把一封信交给黑海哥萨克指挥官菲力浦逊将军。我说，不向塞弗尔·帕沙报告和未经他的许可，我不能这样做，穆罕默德·贝伊对我说，作为赫谟沙赫的使者和代表以及切尔克西亚军队的司令官，他有权同俄国人交换信件，塞弗尔·帕沙知道这件事，他的目的是要迷惑俄国人……当塞弗尔·帕沙和国民议会把致沙皇的切尔克西亚宣言交给我时，穆罕默德·贝伊也把一封给菲力浦逊将军的信交给我。我在阿纳帕没有找到菲力浦逊将军，便把信交给了指挥当地部队的一个少校。少校答应转递宣言，但是拒绝收下这封既没有地址又没有署名的信。于是我把信带了回来，但是穆罕默德·贝伊频繁的通信引起了我的怀疑，由于害怕受连累，我把这一切情况报告了当局……”

（第2号）曾给穆罕默德·贝伊当过秘书的土耳其人阿罕默德·埃芬蒂的证词：

“……穆罕默德·贝伊非常憎恨泰菲克·贝伊（拉品斯基上校），把他说他得很坏，说他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和他作对。在我们来到阿迭尔比的第二天晚上……天刚亮，穆罕默德·贝伊的马夫把我叫醒了。穆罕默德·贝伊亲自对我说，格连治克那边有激烈的炮击声。他已经起床，似乎心情不安……早在炮击停止以前，阿迭尔比方面就得到了拉品斯基上校和他的部队全体被俘的消息，消息是怎样得到的，我不知道。我是听穆罕默德·贝伊这样说的。后来，当上校和他的部下都没有被俘的消息传来后，穆罕默德·贝伊非常生气地说：‘大概，他把自己的大炮卖给俄国人’……”

（第3号）驻扎在阿迭尔比的波兰部队官兵的证词：

“在格连治克被突袭的前一天，穆罕默德·贝伊来到营地，说他接到君士坦丁堡来信，通知他，如果他们从各处都得不到援助，那只能归咎于拉品斯

基上校一人…… 穆罕默德-贝伊下令发酒给士兵们,并许诺给他们种种好处,只要他们离开自己的上校而跟他走…… 后来,查明这个消息(拉波斯基被俘)不确实后,穆罕默德-贝伊亲自来到营地,向士兵演讲,劝他们拒绝服从上校。而在上校回来后,穆罕默德-贝伊却假装什么也不知道,舍弃了某些追随他的人,允许惩罚这些人,而不加庇护。后来,穆罕默德-贝伊企图趁上校外出的机会依靠某些匈牙利人在军队中煽起暴动。这些匈牙利人写了一份对上校的控诉书,想要士兵们签名。除了三个人承认他们被说服签了名以外,其余的人都发誓说,他们的签名是伪造的…… 伪造签名是很容易的,因为在部队中只有极少数士兵会写字。”

(第4号)班迪亚在军事法庭上的供词:

“冗长的讯问使我感到厌倦,因此我把这份由我亲手写就并署名的供状呈交委员会。我希望我的法官,由于我的供状使他们摆脱了颇费时间的艰巨工作,而能够更快地考虑到我的无辜家庭的命运也是同我的命运连接在一起的。我是伊洛什法尔瓦人,原名亚诺什·班迪亚,现名穆罕默德-贝伊,40岁,原来信奉罗马天主教,但在1853年改信伊斯兰教…… 我的政治活动……受我国过去的领袖拉约什·科苏特的指挥…… 1853年12月22日,我带着我的政治领袖的介绍信来到君士坦丁堡……我参加了土耳其军队,军衔是上校。在这个期间,我经常收到科苏特有关我国利益的信件和指示。同时科苏特写信给奥斯曼政府,热心地劝土耳其人不要同法国、英国或奥地利结成联盟,劝他们宁可同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者建立联系…… 根据发给我的指示,我必须设法打进派往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作战的部队…… 到达切尔克西亚后最初一个时期,我只是研究当地情况,并把我观察的结果告诉我的政治朋友…… 我设法同塞弗尔-帕沙接近…… 根据指示,我必须防止切尔克斯人方面的一切进攻行动,反对在切尔克西亚的一切外国势力。在我离开君士坦丁堡前不久,和我从同一来源接受指示、多年来和我在政治上较接近的图尔上校,接到了参加希腊起义的命令。也属于我们这一伙的施泰因将军(费尔哈德-帕沙),被派到安那托里亚。同塞弗尔-帕沙接近的计划实现了,因此我很快就博得了他的完全信任。由于博得了这种信任,我得以

在这里他指的是班迪亚第三号家庭。他除了在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兰教家庭以外,还在匈牙利有一个妻子,在巴黎有一个妻子。

顺利地执行并实现给我的指示…… 我使塞弗尔-帕沙相信,战争结束后切尔克西亚将归还苏丹统治…… 我向土耳其指挥官证明,他们军队的一切进攻行动都有危险,因为切尔克斯人……在紧急关头会离开他们的。情况对我很有利,虽然俄国人把军队调上战场而使边境空虚,但他们始终没有受到切尔克斯人任何猛烈的进攻。我定期地向我的政治领袖汇报我的秘密活动情况……同时,我遇到了一些妨碍我的计划的人物和情况。我指的是英国领事朗沃思先生来到阿纳帕。朗沃思先生奉命前来劝塞弗尔-帕沙用英国经费建立一支由6000个切尔克斯人组成的部队,把这支部队派到克里木去…… 我从土耳其当局方面也接到同样的命令,但在这同时,我的秘密领袖对我发出了最坚决的命令,要我竭尽全力破坏英国领事的使命…… 在我和朗沃思先生的一次谈话中……我要求让我在英国军队中担任上校职务或者给我1万英镑…… 朗沃思先生想出5万披亚斯特把我拉过去…… 结果我的阴谋成功了。受过空洞诺言不少次欺骗的塞弗尔大公疑心起来,他断然拒绝了领事对他的人民所提的要求…… 在这个时候,我便和原定指挥6000个切尔克斯人的塞弗尔-帕沙的儿子伊布拉辛·卡拉巴特尔大公结下了冤仇……

1856年3月21日塞弗尔-帕沙告诉我说,国民议会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到土耳其、法国和英国政府那里去要求把切尔克西亚同土耳其重新合并。我设法使塞弗尔-帕沙把我派进这个代表团…… 到达君士坦丁堡后……我向我的政治朋友和科苏特详细报告了切尔克西亚的情况…… 结果我接到指示,要我同图尔上校以及施泰因将军建立联系,和他们协同工作,并尽量争取更多的匈牙利人参加工作。同时,我同原为切尔克斯人的奥斯曼帝国邮政总长伊斯马伊耳-帕沙建立了联系,我觉得他是一个能为自己祖国牺牲的爱国者。我同他研究了把武器、弹药、军械技工用的工具、以及优秀军官和工匠运进切尔克西亚的办法。但是真正的运送计划,是由施泰因将军、图尔上校和我三个人制定的。俄国公使的军事秘书弗兰基尼上尉参加过我们的几次会议。我们的目的是用和平缓慢然而可靠的方法,把切尔克西亚拉到俄国人方面去…… 如果能使切尔克西亚服从我和施泰因将军的领导,那末我们必定按照这样的计划行事:

(1) 选出一个当地的大公来统治全国;

(2) 使切尔克斯人相信,他们无论从苏丹或是从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得到任何援助;

(3) 用军事失败(周密考虑和事先策划的失败)瓦解山民的士气;

(4) 设法使他们承认沙皇是他们名义上的元首,他们无需向他缴纳任何贡品,但必须允许他派兵进驻他们的国家…… 准备用引进切尔克西亚的匈牙利人来包围这个大公;把其中最有可能的人安置到重要职位上…… 弗兰基尼上尉要我相信,俄国所要求的只不过是形式上的顺从……其余的事情则由帝国恩惠的标志、金钱和俄国勋章来完成……

1856年9月22日,伊斯马伊耳·帕沙建议我把斯库塔里兵营内几百名曾在扎莫伊斯基军团服役的波兰人,吸引到切尔克西亚去…… 这个建议不合我们的计划,但是又不便加以拒绝…… 我以前就知道拉品斯基先生,他在匈牙利工作时很有成绩…… 他住在斯库塔里…… 我们同施泰因将军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使用对我绝对信任的拉品斯基上校…… 9月24日,我写信通知拉品斯基上校,说切尔克西亚爱国者委托他在切尔克西亚建立波兰军团。上校回信要求发给供700个波兰人使用的武器和制服…… 后来经施泰因将军、图尔·弗兰基尼和我共同研究,决定由图尔前往英国购买制造弹药的工具和机器,但暂时不把任何武器运送回来。我们想在发给武器以前,考验一下波兰人…… 拉品斯基上校的激烈反对…… 迫使我仓卒动身,使我不可能把我招募的匈牙利军官带走…… 1857年1月我接到科苏特和我的其他政治朋友的来信和指示。我的计划得到了赞同…… 在我动身前不久,我和施泰因将军假装我们之间的关系冷淡下来了。我想再延期动身,以使某些匈牙利人能够和我同行,但是弗兰基尼上尉说,一天也不能耽误,因为整个君士坦丁堡对我们运送的事议论纷纷,如果俄国大使能不出面加以干涉,他就会被指责参与此事。2月15日,拉品斯基上校登上了英国的‘袋鼠号’轮船。我也上了船…… 到达多勃(俄国人把它叫做卡巴尔定斯克)后,我分别写信给塞弗尔·帕沙、纳伊勃以及其他部落首领,说苏丹皇帝陛下委派我指挥切尔克西亚军队…… 我对拉品斯基上校的做法不很放心…… 在波兰部队开到沙朴苏霍(俄国人把它叫做田辛斯克炮台)的塞弗尔·帕沙官邸之后几个星期,吕默尔先生搭乘装载着我们留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武器、弹药的二桅横帆舰抵达多勃…… 俄国人在5月经由阿塔库姆突然入侵,使全国各地几千名切尔克西亚战士集合起来。切尔克斯人第一次看到他

们自己的炮兵胜利地轰击俄国炮兵。虽然这次战斗本身规模不大，但它赋予波兰部队和我以重大的意义…… 我利用切尔克斯人的这种情绪来完成我的任务；我公开以苏丹使者的身分出现；我要求服从…… 后来我得悉，拉品斯基上校曾竭尽全力破坏我的计划…… 我力图在他的部队的官兵中争取拥护者，同时由于他的部队情况危急，我就把这归咎于指挥官…… 一艘俄国船在苏茹克和格连治克港夺走了一些檀香树，于是我有了借口，把上校调到跟阿塔库姆附近的战场相隔一段距离的地方去，把他完全隔离开来……

过了几天，我接到拉品斯基上校的来信，他报告说在格连治克根本没有军队，他无法守住阵地…… 我亲自前往格连治克，拉品斯基上校当场向我说明他处境危险，俄国人必然会前来进攻。过了九天，他的预言应验了……

我使阿迭尔比的官兵在格连治克发生悲剧的当时和以后保持的那种激昂情绪，只不过是决定在拉品斯基上校和他的部队之间散布不和的结果…… 我通过我的密使在切尔克斯人中间散布流言，说上校把大炮卖给了俄国人…… 我上了上校的当，我被他的伪装诚实所欺骗，事实上，他比以前更警惕地监视着我……

根据给我的指示，我必须同俄国将军建立联系…… 现在委员会所掌握的我的那封匿名信，应该是建立经常通信的开端，但是由于俄国指挥官的愚蠢，落到了你们手中……

拉品斯基上校突然抛弃了假面具，他在塞弗尔-帕沙家中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他既不承认我是他的上司，也不承认我是切尔克西亚军队的司令官，他同我断绝了一切关系……并且还向他的波兰部队发出了同样内容的命令。我企图向部队士兵另发一项撤销他职务的命令，但我的努力徒劳无益……

（签名）穆罕默德-贝伊”

（第5号）亚诺什·班迪亚给菲力浦逊将军的信。

“难道使切尔克西亚诚服不是对俄国有利吗？可以以重大牺牲作代价暂时占据切尔克西亚的平原，但是它的山岭和天然堡垒永远也不能占领。俄国大炮已失去意义。切尔克西亚的炮兵将有效地还击俄国的炮兵。切尔克斯人已不是五年前的切尔克斯人了；他们有一支不大的正规军的支援，同俄国军队一样善战，并将为自己的信仰和祖国战斗到最后一人。给与切尔克斯人一种虚有其名的自由，在切尔克西亚建立一个本民族大公的政权，把这个大公置于俄国沙皇的保护之下，岂不更好吗？总之，把切尔克西亚变成第二个格

鲁吉亚或是与此类似的什么东西，岂不更好吗？如果切尔克西亚同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那就为俄国人开辟了通向安那托里亚和印度的大道。Sapientia sat [对聪明人来说已经足够了]。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开始谈判。希慎重考虑并予以答复。”

（第6号）1858年1月20日的判决书：

“在听取了穆罕默德·贝伊在1月2日、3日、4日、5日、6日、7日和11日审讯时的供词，以及证人在1月9日审讯时的证词以后，本军事法庭今天开庭宣布，根据穆罕默德·贝伊本人的招供以及证人的证词，穆罕默德·贝伊确实犯有叛国、与敌人秘密通信的罪行，特此宣布褫夺他的公权，撤销他在本国的军衔，并判处死刑——全体通过。

签名：雅科布·贝克尔特（列兵）；菲利浦·特帖尔陶布（炮手）；马捷伊·贝德涅塞克（中士）；奥托·利诺夫斯基（炮手）；弗朗契舍克·斯托克（少尉）；安东·克雷斯契维奇（少尉）；米哈尔·马列茨基（中尉）；莱昂·查瓦德斯基（炮手）；斯塔尼斯拉夫·坦茨科夫斯基（下士）；杨·哈马尼斯基（中士）；亚历山大·米希茨基（上士）；卡季米尔·维斯托茨基（少尉）；约瑟夫·阿朗诺斯基（中尉）；彼得·斯坦凯维奇（上尉）；泰奥菲尔·拉品斯基（上校）。”

对上述文件我们只有一点补充：塞弗尔·帕沙不愿意对一个在苏丹军队中有上校军衔的人执行死刑，因此把他押送到特拉比曾德。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匈牙利人宣称，关于穆罕默德·贝伊背叛的消息，纯粹是捏造的；但是波兰军官立即出来反驳这种说法，并且威胁说，在必要时将公布这一案件的有关文件。我们在前面摘引了这些文件，因为这些文件无疑是对切尔克西亚战争史的极有趣的贡献。

关于俄国大使馆在这个案件期间的行动，我们还可以举出以下的事实。在君士坦丁堡尽人皆知，“袋鼠号”轮船是被租来运送军队、弹药到切尔克西亚去的。可是俄国大使馆对土耳其政府只

字未提这件事；但是就在“袋鼠号”驶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当天，俄国大使向土耳其政府提出抗议，要求进行调查，追究这件事的发起人。大使馆竭力想把当时正在君士坦丁堡的扎莫伊斯基伯爵牵扯进去，但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当时，显然是根据俄国的要求，施泰因将军和伊斯马伊耳-帕沙以曾参与这一事件而被流放。经过几个月的流放后，在俄国皇帝的某个节日，又是根据俄国大使的要求，施泰因将军和伊斯马伊耳-帕沙被允许回到君士坦丁堡。

对文件的评论由卡·马克思

于 1858 年 5 月 18 日写成

载于 1858 年 6 月 16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352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 坎宁的公告和印度的 土地占有问题

坎宁勋爵关于奥德的公告（我们曾就这事于上星期六发表了几个重要文件³⁵⁹），重新引起了关于印度土地占有问题的讨论。这个问题在过去曾经是引起大量争论和意见分歧的题目。有一种意见认为，对这个问题的不正确理解；使得在对印度那些归英国直接统治的地区³⁶⁰的治理工作中造成了很严重的实际错误。这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所谓柴明达尔、塔鲁克达尔或谢尔达尔³⁶¹在印度经济体系中究竟占什么地位？应当把他们看做土地所有者还是仅仅看做收税人？

大家都同意：印度同亚洲大多数国家一样，土地的最高所有权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争论的一方认为，应该把国家看做土地的所有者，它把土地按分成制租给农人；另一方则认为，实质上土地在印度就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是私人所有，而所谓国家所有不外是指土地由君主封赠——这种封赠在所有以封建权利为法律基础的国度中都得到理论上的承认，并且还毫无例外地在所有一切国度中被实际实行着，因为政府有权按自己的需要征收土地税，除政治上的考虑以外，丝毫不照顾占有者的方便。

然而，如果假定在印度土地是私人所有，私人占有者对土地

的权利也同在其他国家那样肯定无疑，那末应该认为谁是真正的所有者呢？可以获得这种地位的有两类人。其中的一类是通称为柴明达尔和塔鲁克达尔的阶级，他们曾被比做欧洲的有爵位的和无爵位的土地贵族。他们也就被认为是只须向国家缴纳一定捐税，并且作为所有者有权随意更换直接耕种者的土地真正所有者；而直接耕种者，从这种观点来看，则只是必须听任柴明达尔随意征收地租的无权的佃户。这一观点自然符合英国人关于无爵位的土地贵族作为社会制度主要支柱是重要和必需的这种概念，因此在七十年以前，在康沃利斯勋爵担任总督时，这一观点就成了著名的孟加拉土地法³⁶²的基础。这一土地法目前仍然有效，但是许多人认为，它曾使政府和直接耕种者遭到了不少祸害。在对印度斯坦的习俗和孟加拉土地法所造成的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困难做较为仔细的研究之后，使人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根据古印度教徒的习俗，土地所有权属于村社，村社有权把土地分配给个人耕种；柴明达尔和塔鲁克达尔当初只不过是政府委派去监收农村缴纳的税款并将其汇齐交给王公的官吏。

这种观点对近几年在英国人直接管辖的那些印度省份里进行的土地所有权和税收的调整起了很大的影响。已认为塔鲁克达尔和柴明达尔所要求的绝对所有权是来源于对国家和耕种者的篡夺，因此曾竭尽全力要把他们当做窒息直接耕种者并且阻碍国家普遍进步的梦魇来消除掉。但是，既然这些中间人，不论其权利从何而来，能够援引惯例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就不能不承认他们的要求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不管这些要求对人民是如何难堪、专横和沉重。在奥德，在土著王公的微弱统治下，这些封建土地占有者在削减政府的要求和耕种者的权利方面都做得很过分，因此，

当不久前这个王国被兼并后,对这个问题又进行重新审查的时候,受委托实行新土地法的官吏很快就和这些封建土地占有者就其权利的实际范围发生了极其激烈的争论。因此也就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不满,促使他们与起义的西帕依联合起来。

拥护上述政策的人们(上述政策即村社土地整理制度的政策,它把直接耕种者看做土地所有权的拥有者,这种权利驾凌于国家赖以取得其一份农产品的中间人的权利之上),为坎宁勋爵的公告辩护,认为它成功地利用了大多数柴明达尔和塔鲁克达尔在奥德所处的地位;他们说这一公告的目的是为在其他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的更广泛得多的改革铺平道路;他们说,根据这一公告没收的所有权只是柴明达尔或塔鲁克达尔的权利,只涉及很小一部分居民,而且完全不包括直接耕种者。

另一方面,得比内阁对坎宁勋爵的公告所持的立场(如果把关于正义和人道的各种议论撇开不谈),完全符合托利党即保守党所遵循的关于合法权利的不容侵犯和维护土地贵族利益的重要性的一般原则。托利党在说到英国的与土地有关的阶级时,总是与其说是指缴税人和直接耕种者,倒不如说是指土地所有者和收租人,因此他们要把柴明达尔和塔鲁克达尔(尽管他们的人数实际上很少)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等量齐观,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从英国来管理印度,最大的不便和困难之处也就在于:在考察印度问题时,很容易受到纯粹英国人的偏见和信念的影响,尽管这些偏见和信念在这里是被应用在与它们几乎毫无关系的社会状态和情况上。今天发表的消息中,坎宁勋爵不顾奥德专员詹姆斯·乌特勒姆爵士的反对,十分自信地坚持他在公告中提出的政策,虽然看上去好像他对专员的主张做了让步,而在自己的公

告中加入了在已发往英国的、作为埃伦伯勒勋爵报告³⁶³的基本内容的原文中所没有的缓和词句。

坎宁勋爵关于应从什么角度来看待参加起义的奥德土地占有者的行为的意见，看来同詹姆斯·乌特勒姆爵士和埃伦伯勒勋爵的意见没有重大分歧。坎宁勋爵认为，这些土地占有者的立场不仅与叛乱的西帕依的立场极不相同，而且与不列颠统治已久的那些起义地区的居民的立场也大有不同。他认为应当把他们当做胁从者看待；但是同时他坚持必须使他们认识到，发动叛乱就会给自己招来严重的后果。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这一公告的发表起了什么作用，在判断这一公告可能引起的后果方面谁更接近真理，是坎宁勋爵，还是詹姆斯·乌特勒姆爵士。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5 月 25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6 月 7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344 号

卡·马克思
* 波拿巴的财政手段。
——军事专制

1858年5月27日于巴黎

现在已经没有谁能反驳波拿巴的国库陷于瓦解的事实。“财产的救主”³⁶⁴本人也公开谈到了这一点。否则，埃斯潘纳斯将军给法国各省长发通知信，号召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在必要时运用权力”使医院和其他慈善机关的监护人把他们用来获得收入的不动产转为三厘统一公债的事情便无法解释。这一部分财产的价值为1亿美元，但是，正如波拿巴代表穷人抱怨说，这部分财产只带来不超过2.5%的收入。如果把这部分财产转为国家证券，收入至少会增加一半。不久前波拿巴以慈父般的关怀曾建议国务会议通过关于把慈善机关的地产转为国家有息证券的法令，然而多么奇怪的是，波拿巴自己的国务会议却固执地不理睬对它的这种暗示。于是，现在波拿巴企图“用行政方法”和军事 order du jour〔命令〕来实现他用立法手段行不通的事情。有一些够老实的人，以为他玩弄这种手法只是竭力要增加国家有价证券的数额。不能想像比这更远离真相的了。如果上述地产按标价1亿美元出售，那末用来购买地产的大部分钱当然是从以前投入统一公债和其他国家有价证券的资本中提取出来的，于是人为的对有价证券的需求

就被向公开市场大量抛出有价证券所抵销。这样甚至会使得有价证券市场进一步萧条。但是波拿巴的计划要实际和简单得多了。他打算设立 1 亿美元新的无期公债来代替 1 亿美元地产。他预备一手攫取慈善机关的财产，另一手用国家《grand livre》〔“债券簿”〕的支票来补偿它们。我们在研究 1857 年法兰西银行法时，已经详细谈过波拿巴为了保证自己发行可怜的 2000 万美元公债，而牺牲国家利益赐给法兰西银行极大特权的问题。当时我们认为这个法兰西银行法是“社会救主”在财政上的绝望的哀号，然而，从那时起法国商业、工业、农业遭到的灾难也殃及了本来就在以骇人比例增长着支出的国库。各部在 1858 年的实际需要是 79804004 法郎，超过了 1855 年的实际需要；仅军费开支一项就占国家总预算收入的 51%。Crédit Mobilier²⁸已经不能像 1854 年和 1855 年那样进行援救和在“民主”的原则上帮助发行公债。如果仔细看一看该公司最近的报告，就可以看出负债大大地超过了资产，因而对自己股东付不出股息。在这种情况下，波拿巴只好在财政方面重新采用他在政治方面已不得不采用的 coup d'état〔政变〕的最初的原则，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从盗窃法兰西银行地下室 2500 万法郎开始的、继而又没收奥尔良家族产业的财政政策现在竟进一步发展到没收慈善机关的财产了。

然而，最近这一次行动需要波拿巴使用他的一支军队，而且正是他的管理绝大多数慈善机关的教士大军。从 coup d'état 以来“世界报”就第一个敢于公开不同意“社会救主”的做法，甚至恳求“世纪报”³⁶⁵同自己联合起来反对这种准备侵犯“私有财

产”的罪行。

正当“教会的长子”对自己的圣军的态度十分暧昧的时候，他的俗军也有不听从指挥的危险。如果他真的试图打扰像默西、列奥德和伊安先生这些英雄的消遣，他就会在他唯一所能依靠的这一部分军队中丧失威望。相反，如果他放纵御用军人的贪赃枉法（自萨托里兵营检阅的那天起他一直鼓励这种贪赃枉法），那末任何纪律都会完了，军队也就不能经受外来的最小的一个震动。现在还有像杀害“费加罗报”³⁶⁶编辑这样的事件，而且也一定会有震动。从下面这个事实就可以知道普遍的愤怒充满各地，当决斗的消息一传到巴黎，大约就有 5000 个青年人开始成群地聚集在“费加罗报”bureaux〔编辑部〕，要求把他们的名字列入准备同任何一个前来挑衅的少尉进行搏斗的人的名单。当然，“费加罗报”本身就是波拿巴扶植起来的，它率领着一类专干丑事、进行讹诈和诬蔑的刊物，这类刊物是在对政治报刊施加暴力镇压以后一下子办起来的，因为它们在现在的小帝国的条件下得到了使自己蓬勃繁荣的有利基地和环境。波拿巴集团文武代表之间的这场流血搏斗是即将到来的冲突的信号，这正是对历史讽刺的十分微妙的表现。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5 月 27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8 年 6 月 1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348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 印度起义

虽然英国人曾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先后攻占德里和勒克瑙这两个相继成为西帕依起义大本营的城市，但是印度的平定还远没有完成。事实上甚至可以说，这方面真正的困难才刚开始。当起义的西帕依还是大批集结在一起的时候，当问题还是进行大规模围攻和正规战的时候，英军在这类行动中的巨大优越性使他们占到种种优势。但是当战争现在具有新的性质时，这些优势可能会大量丧失。攻占勒克瑙并没有使奥德归顺；即使奥德归顺也不会使印度平定下来。奥德王国全境布满大大小小的要塞，虽然其中也许任何一个也不能长久抵御正规的攻击，但逐一夺取这些要塞，不仅是极端令人厌倦的事情，而且还要比进攻德里和勒克瑙这样的大城市遭到更大的损失。

但是需要征服和平定的还不仅是奥德王国。溃败的西帕依被赶出勒克瑙以后，向四处逃散。他们有一大部分人藏匿在北部罗希尔汗的山区，罗希尔汗仍然全部为起义者所控制。另外一些人逃到东部的果腊克普尔，英军部队虽然在向勒克瑙进军时曾通过该地，但现在又不得不再次征服它。还有许多人成功地潜入到南方的班得尔汗。

的确，似乎发生过这样的争论，即什么是最好的行动方式，如

果首先征服那些可以作为起义者藏身之处的边缘地区，然后再与集结在勒克瑙的主力作战，是否更好些。据说，这曾经是军事家们愿意采取的作战计划；但是很难理解，以英国人现有的这样有限的兵力如何能有效地占领这些边缘地区，使逃跑的西帕依最后被赶出勒克瑙后不能渗入到那里去，从而使英国人不需要像在果腊克普尔所发生的那样，来重新征服这些地区。

自从攻占勒克瑙以后，起义者的主力似乎退到了巴雷利。据传：纳那·萨希布也在那里。有人认为，必须在夏季出征勒克瑙西北 100 英里以外的这个城市和地区，并且，根据最后的报道，科林·坎伯尔爵士也亲自到那里去了。

可是，游击战似乎正向各方扩展。当英军调往北方的时候，零散的小股起义的士兵就渡过恒河，进入达普，截断英军与加尔各答的交通，到处破坏，使农民不能交纳地租，或者至少给他们不交地租造成借口。

甚至巴雷利的攻占，不但不能防止这些祸患，也许反而会扩大这些祸患。西帕依的优点就在于这种不规则的作战方法。他们在行军方面优越于英军，正如同英军在战斗方面优越于他们一样。英军纵队不能一天行军 20 英里，而西帕依队伍却可以一天走 40 英里，如果努力一些，甚至可以走 60 英里。运动迅速是西帕依部队的主要优点，再加上他们服水土，粮食供应也比较容易些，这就使他们成为印度战争中一支不可少的力量。英军在出征中，特别是在夏季战局中，损失是浩大的。现在已经深感人员不足。也许不得不把逃跑的起义者从印度的这一端追击到那一端。在这方面，欧洲部队是很难胜任的，同时，起义者到处游荡，因而可能与至今还忠实于英军的孟买和马德拉斯各土著团发生接触，这样

就又有可能会引起新的起义。

但是即使不再有新的起义者参加，在战场上的武装人员，已不下 15 万人，而没有武装的居民则既不帮助英军，也不给英国送消息。

此外，孟加拉缺雨，有发生荒年的危险——这是本世纪还未发生过的灾害，即使在过去，甚至在英国人占领印度以后，这种灾害也是可怕的苦难的源泉。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5 月末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6 月 15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35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 英国军队在印度

我们的不够谨慎的朋友，伦敦“泰晤士报”的威廉·罗素先生，由于喜作生动的描述，在不久以前又一次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抢劫勒克瑙的情景，使得外国人对英国人的性格产生一种并不特别令人称羡的印象。现在看来，德里也受到相当大规模的“掠夺”，并且除了愷撒巴格以外，勒克瑙全城也被用来犒劳曾经备尝艰辛和英勇奋战的英国兵。现在引用罗素先生的一段话：

“有些连真可以夸耀它们的一些拥有几千英镑财物的士兵。我听说，有一个兵洋洋自得地要借钱给一个军官；如果他想购买上尉官衔的话，要多少就借多少’。另外一些士兵汇大笔款子给他们的朋友。在这封信还未寄到英国以前，许许多多的钻石、翡翠和珍珠一定已经非常安详而愉快地告诉你们关于攻击和抢劫愷撒巴格的故事。好在佩带这些珠宝的漂亮妇女们……没有看见这些光彩夺目的东西是怎样得来的，也想像不出这些宝物被强夺时的那种情景……有些军官真正发了大财……在放军装的破箱子里，藏着一些小匣子，里面装着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整个庄园，装着世界上盛产飞禽走兽和鱼类的各个地方的舒适的渔猎别墅。”

这就说明为什么英军在攻占勒克瑙后无所作为。用来从事大肆抢劫的两个星期没有白白浪费。军官和士兵进城的时候是穷光蛋或者负债累累，而出城的时候都突然变成了富豪。他们已经不再是原来那样的人了，可是有人还期待他们重新执行原来的军事

职务，俯首听命，默然服从，甘心忍受疲劳、艰难和征战之苦。但这是不可能的了。军队一旦任其抢劫，就永远变样了；将军的任何命令和威信都无法使它恢复原状。请再听听罗素先生的话吧：

“看看钱财怎样引起疾病的发展，抢劫怎样使人变得凶狠无情，在家庭里，在最亲近的、最可爱的人们中间一些光泽的石炭结晶会造成怎样巨大的灾害，这是很有意思的…… 列兵腰间所系的装满卢比和金币的沉甸甸的皮带，使他们确信自己的梦想 在祖国逍遥自在 可以变成现实，无怪乎‘集合、集合！’的口令会使他们发怒…… 两次会战、双份奖金、两个城市的洗劫和很多顺手发财的机会，使得我们有些士兵过于富足，以致不安心当兵了。”

于是我们听说有 150 名以上的军官向科林·坎伯尔爵士提出辞职的请求，——这在与敌人对峙的军队中确实是极少有的行为。在任何其他的军队中，由于这种行为将会在 24 小时内受到撤职以及其他最严厉的惩罚，但是在英国军队中显然把这种行为看做是突然发财致富的“军官兼绅士”的十分自然的举动。至于士兵，做法就两样了。抢劫产生再抢劫的欲望；并且如果附近再没有印度人的财宝可供抢劫，那末为什么不能抢劫英国政府的财宝呢？无怪乎罗素先生这样写道：

“欧洲兵护送的两辆钱柜车可疑地翻了车，丢失了一些卢比，因此军需官表示宁愿要土著士兵来执行护送公款的微妙的任务！”

真是妙事！印度兵或者锡克兵更有纪律，他们中间做贼做盗的、贪财好利的竟少于那些无可比拟的军人模范英国兵！但是前面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个别英国人的行动。现在来看看集体“行劫”的英国军队吧：

“战利品日益增多，据估计，这些财产出售后，可得 60 万英镑。据说，康波尔城堆满了在勒克璠抢来的东西；如果能估算出公共建筑所受的损失、私

人财产的毁坏、房屋地产的跌价以及人口减少的影响，那末就会发现，奥德首府的损失总数约为 500 万或 600 万英镑。”

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卡尔梅克寇群，像蝗群一样袭击了许多城市，沿途所遇，无不吞噬一光，但是要与这些信奉基督教的、文明的、有骑士风度的、文雅的英国士兵的侵略比较起来，对于受害的国家来说，却未必不是一种善行。至少前者按照他们的游荡不定的路线很快就过去了；而这些有条不紊的英国人却到处带着自己的搜括人员，把抢劫变成制度，把抢来的东西登记下来，公开拍卖，并特别注意使英国兵的英勇受赏的权利不受欺骗。看看这支因大规模行劫而纪律松弛了的军队，当炎暑季节作战的困难要求最严格的纪律时，还能有多大作为，将是很有意思的。

尽管印度人到这时一定比他们在勒克瑙时更不适于作正规战了，但现在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如果起义者在佯作抵抗之后，又重新改变作战地区，比如说，把它移到拉吉普坦纳（那是一个远未平定的地方），那时应当采取什么办法。科林·坎伯尔爵士不得到处留驻警备部队；他的野战部队已经减少，不及他在未攻克勒克瑙时所有兵力的一半。如果他要占领罗希尔汗，他还有什么部队来进行野战呢？现在他正碰到炎热的季节；6月的雷雨大概中止了积极的军事行动，而使起义者获得喘息的机会。从4月中旬起当天气变得炎热不堪的时候，欧洲兵因疾病造成的损失一定逐日增多，尤其是去年冬天运到印度来的新兵，他们中成为气候的牺牲品的必然会比去年夏天在哈弗洛克和威尔逊指挥下久经印度征战的老兵多得多。罗希尔汗已不是像过去的勒克瑙或德里那样的具有决定性的地点。固然，起义者已大大丧失了进行正规战的能力，但是现在他们处于分散状态，使英

国人不得不由于在不利的氣候条件下不断出征而拖垮自己的军队，这是更加可怕的。试看有多少新的抵抗中心：罗希尔汗，那里集中有大批的老西帕依；哥格拉河彼岸的奥德的东北部，那里奥德人已设置了阵地；卡耳皮，现在那里已成了班得尔汗起义者的集中地点。很可能，几个星期之内，也许还要早些，我们将要听到攻克巴雷利以及卡耳皮的消息。攻克巴雷利的意义不大，因为这个任务要占用坎伯尔手中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兵力。至于现在正受到惠特洛克将军和罗斯将军威胁的卡耳皮，则是比较重要的猎取物，前者正率领自己的部队由那格普尔开到班得尔汗的班达，后者由詹西方向开来，已击败卡耳皮部队的前卫。攻克卡耳皮，将解除坎伯尔的作战基地康波尔所面临的唯一危险，从而也许使他能够以因此而腾出的部队对他的野战军作某种程度的补充。但是十分值得怀疑的是：他的部队除了肃清奥德的起义者以外，是否还有多余的力量。

这样一来，这支在印度从来没有这样集中于一地的最强大的英国军队，又重新分散到各地，并且它需要做的事比它能够做的事要多。夏季溽暑和霪雨的气候所造成的损失一定是骇人听闻的；同时，无论欧洲人在士气上比印度人高多少，但仍然使人不得不怀疑，难道印度人不畏当地夏季溽暑和霪雨的这个体质上的优越性不也是有助于他们消灭英国的军事力量吗？现在只有少数英国部队在前往印度的途中，7月或8月前又不打算向那里派遣大批援军。因此，在10月和11月以前，坎伯尔只有靠这样一支正在迅速消散的军队来支撑局面。如果这时起义的印度人在拉吉普坦纳和马拉提人地区发动起义成功，那又将会怎样呢？如果现在有8万人在英国军队里服务的锡克人（他们想把胜利的全部荣誉据

为己有；并且对英国人不很友好）发动起义，那又将会怎样呢？

总之，看来英国人在印度至少还得进行一次冬季战局，而且如果不从英国再派军队来，是无法进行这一战局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6 月 4 日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6 月 26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361 号

卡·马克思 英国的贸易状况

1858年6月8日于伦敦

英国贸易部刚刚发表的关于贸易和航运的统计材料，包括联合王国截至3月31日为止的1858年头三个月与1857年同一时期相比的出口申报价值，截至4月30日为止的1858年头四个月与1856年和1857年同一时期相比的来往货船的数量和吨数，以及截至1858年4月30日为止的四个月当中的主要进出口项目。1858年的4月份出口价值为9451000英镑，1857年的为9965000英镑，1856年的为9424000英镑，而1858年头四个月的出口总值减少了将近6000000英镑。因此，1858年4月份的英国出口，似乎不仅超过了1856年的水平，而且几乎达到了1857年的、即在美国爆发商业危机几个月之前的指数。由此可能得出结论：危机的最后痕迹正在迅速消失，英国贸易至少又在重新进入繁荣时期。但是得出这种结论是极端错误的。首先必须看到，官方的统计，既然只涉及申报价值，所反映的就不是实际数字，而只是出口商自己的估价。并且，较仔细地研究一下出口材料，就会看出，英国贸易的表面繁荣主要是由于对东印度的过度出口造成的，这必然会导致该市场的剧烈缩减。在乔治·弗雷泽公司最近的商务通报上已经这样写道：

“最近来自东方的消息表明，与孟买和加尔各答在供货有限制的时期所出现的特别高昂的价格水平比较起来，价格有下跌的迹象。在英国 12 月以前发出的货物到达后，价格就已显著下跌。从那时起，对这两个市场的供应极其充裕，甚至可以说过分充裕，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必然会看到，由东方 1 月初开始的大量需求所造成的价格水平将不大可能继续维持下去。”

除了印度以外，那些至今尚未受到商业危机影响的欧洲国家以及其他国家，也不是由于增长了需求，而只是为了试验而堆满了英国货。如此受惠的国家有比利时、西班牙及其殖民地、某些意大利国家（特别是双西西里王国）、埃及、墨西哥、中美洲、秘鲁、中国、还有一些很小的市场。当由于从巴西传来极坏的消息，对这个国家的总的出口已经停顿的时候，某些不得不为剩余产品寻找出路的英国工业部门，不但没有减少甚至还增加了对该市场的供货。例如，在 4 月份，运往巴西的亚麻织品、陶瓷器的数量和申报价值都有所增长。谁也不能认为这是一种 *bona fide*（真正的）出口。对于在危机的头几个月成为大量吸收商品的中心的澳大利亚，同样可以这样说。澳大利亚当时是并且现在仍然是存货充塞；突然引起了某种程度的反应；对这个地方的总的出口减少了。然而英国某些工业部门不顾澳大利亚所有地方报纸的警告，不是减少供货，而是实际上增加了供货——自然是为了投机的目的。因此，4 月份的出口报告不能看做是英国工业繁荣的 *bona fide* 指标，而只能看做是为了确定世界各个市场目前能经受多大压力而做出的试探。下面这个统计表包括 1858 年截至 3 月 31 日为止的三个月与 1857 年同一时期相比的英国和爱尔兰的出口申报价值的材料：

输入英国货的外国

	1857 年	1858 年
	英 镑	
俄国，北方港口	3015	8853
俄国，南方港口	72777	42493
瑞典	48007	3717
挪威	30217	5911
丹麦	92046	40148
普鲁士	133000	78917
梅克伦堡	9502	3099
汉诺威	288648	236689
奥登堡	3520	1957
汉撒城市	2318260	1645419
荷兰	1305606	975428
比利时	515175	546033
法国	1631672	1035096
葡萄牙本土	380160	356178
亚速尔群岛	10793	12581
马德拉	9955	16245
西班牙	496788	584287
卡内里群岛	18817	8475
撒丁	290131	293138
托斯卡纳	189584	257508
教皇领	69953	123059
双西西里王国	284045	375177
奥地利领地	253042	323086
希腊	40860	69570
土耳其	969288	821204
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	111052	93135

	(续)	
	1857年	1858年
	英 镑	
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199070	81874
埃及(地中海沿岸各港口)	449497	483516
突尼斯	865	2323
阿尔及利亚	4790	4831
摩洛哥	55826	37206
非洲西海岸(非英属)	235527	196484
非洲东海岸	301	1927
红海的非洲港口	1130	567
佛德角群岛	2419	3965
爪哇	234071	149493
菲律宾群岛	144992	212942
中国(香港除外)	290441	389647
玻里尼西亚群岛	—	585
西印度(非英属)	620022	321435
美国(大西洋沿岸各港口)	6231501	2565566
加利福尼亚	50219	94147
墨西哥	112277	151890
中美洲	22453	46201
新格拉纳达	88502	117411
委内瑞拉	105417	62685
厄瓜多尔	2099	—
巴西	1292325	826583
乌拉圭	145481	177281
布宜诺斯艾利斯	285187	279913
智利	336309	270176
秘鲁	209889	299725
对外国输出总计	20636473	14940756

英 国 领 地	(续)	
	1857年	1858年
	英 镑	
拉芒什海峡各岛	136071	120431
直布罗陀	152826	210575
马尔他	116821	131238
伊奥尼亚群岛	66148	52849
非洲西海岸(英属)	135452	62343
好望角	442796	403579
纳塔尔	26605	23106
阿森匈岛	3832	2308
圣海伦岛	3837	8416
毛里求斯岛	142303	164042
亚丁	11263	11996
英属东印度(新加坡和锡兰除外) ...	2822000	3502664
新加坡	101535	308545
锡兰	98817	153090
香港	133743	242757
澳大利亚西部	15515	13813
澳大利亚南部	180123	249162
新南威尔士	706337	682265
维多利亚	1427248	1056537
塔斯马尼亚	67550	82942
新西兰	96893	93768
北美洲英国殖民地	818560	439433
英属西印度群岛	334024	426421
英属圭亚那	122249	95385
洪都拉斯(英国租界)	28362	31869
对英国领地输出总计	8191020	8569534
对外国和对英国领地 输出总计	28827493	23510290

“经济学家”杂志认为，精确地分析这些数字，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英国出口的减少只是在对外国的贸易方面，而不是在对自己殖民地的贸易方面”。的确，上面的统计表可以扼要地表达如下：

三个月的出口额		
	1857年	1858年
	英 镑	
对外国	20636473	14940756
对英国领地	8191020	8569534
共 计	28827493	23510290

尽管如此，“经济学家”杂志所得出的结论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按照总计数字，似乎对外国的贸易减少了 5695717 英镑，而同时对殖民地的贸易却增加了 378514 英镑。但是，如果我们不算对直布罗陀、马尔他、香港这种英国走私中心的出口的增长，不算对新加坡这种只是作为对外国贸易货仓的地点的出口的增长，那末对殖民地的贸易总额就会有显著的减少，如果再不算印度，这种减少就会极大。在对外国的贸易方面，主要是以下这些国家有减少：

	1857年	1858年
	英 镑	
美国	6231501	2565566
巴西	1292325	826583
汉撒城市	2318260	1645410
法国	1631672	1035096
荷兰	1305606	975428

关于航运的材料说明，进港的英国船只的数量和吨数稍有增

加，但是出港船只的数量和吨数有所减少。在外国当中，照旧是美国在航运方面占首位。以下的数字表明进出英国港口的美国船只的数量：

	1856 年		1857 年		1858 年	
			进 港			
	船只	吨数	船只	吨数	船只	吨数
美国.....	382	383255	367	366407	366	366650
			出 港			
美国.....	414	395102	440	427221	343	321015

从同一份材料中可以看出，挪威、丹麦和俄国是在航运方面受商业危机的影响似乎特别严重的国家。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6 月 8 日
 载于 1858 年 6 月 21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356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 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

目前，英国正呈现出一幅国家上层发生瓦解而社会下层却似乎全都静止不动的奇特景象。在民众中听不出有任何动荡不安，然而在他们的统治者当中却发生着显著的变化。但是果真会有上层在熔解而下层却依旧呆滞不动的事吗？当然，我们不是指帕麦斯顿及其同僚想把财政部“捞到手”的那些卑劣企图³⁶⁷。英国议会史上当权派和在野派之间的斗争，跟意大利城市中世纪编年史上流亡者和放逐者之间的战争一样，是寻常的事情。可是请看，下院的托利党首领以这种不祥的声明结束他的演说：

“在我们激进党人和托利党人之间，有一种使我们在这个议院和这个国家中联合一致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将不再充当陈腐的寡头政体的工具或牺牲品！”

上院通过人民宪章中的一个条款——废除下院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³⁶⁸；辉格党改革家的后裔格雷勋爵警告他的出身高贵的同僚，说他们将“使他们政府的整个制度和他们的宪法的性质发生全面的革命”；拉特兰德公爵由于看到可能要把“宪章的所有五项条款，甚至更多的东西”全部吞下去的前景而吓得魂不附体。还

有，伦敦“泰晤士报”前一天用不祥的语调告诫资产阶级，说迪斯累里和布尔韦尔对它心怀叵测，为了制服它，可能同微贱的民众联合一致，第二天这家报纸又警告土地贵族要防备被小业主扼死的危险，说小业主将借着刚在下院通过二读的洛克·金的法案登上王位，因为这个法案把选举权扩大到了各郡每年缴纳 10 英镑房金的居民。

事实是，英国这两个执政的寡头政党，早已变成没有任何明确原则的单纯的派系了。它们在试图先联合一致、然后建立专政的努力遭到失败以后，现在已落到这种地步，即它们只有把它们共同利益奉送给共同的敌人——在下院拥有约翰·布莱特这样强有力的代表的激进资产阶级政党，才能指望延长各自的寿命。到目前为止，托利党是以贵族阶级名义执政的一群贵族，辉格党是以资产阶级名义执政的一群贵族；但是资产阶级既已开始以自己的名义执政，辉格党就无事可做了。托利党为了不让辉格党当权，将屈从于资产阶级政党的压力之下，直到使辉格党完全不能忍受，直到使这些寡头政治家确信，为了挽救本阶层的利益，他们必须融化在保守派的队伍中，并且放弃他们的企图代表自由派利益或者自成一体的一贯要求。辉格派并入托利派，并且共同转变为与新兴的资产阶级政党（它在自己的领袖领导下，打着自己的旗帜、喊着自己的口号进行活动）相对立的贵族阶级政党——这就是我们目前在英国所看到的过程。

如果我们考虑到英国这种内部状况，再联想到印度战争仍将大量耗费英国的人力和财力，我们就会完全明白，英国已不可能像它在 1848 年那样去阻碍显然在日益临近的欧洲革命。还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在十年前极其有力地抑制了革命的浪潮。我们指的是俄

国。但是现在它自己脚下已堆积起易燃的物品，只要从西方刮去一阵大风，就会立刻燃烧起来。农奴战争的征兆在俄国内部已这样明显，以致地方行政长官感到除了指责奥地利不该通过秘密间谍在全俄各地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和革命学说而外，无法解释这种少见的纷扰现象。真有意思，居然不仅是怀疑而且公开指控奥地利进行革命间谍的活动！的确，加里西亚惨案³⁶⁹已向全世界明显地证明了，维也纳政府是知道在必要的时候把它自己的社会主义传授给农奴的。然而，奥地利愤怒地反对这种指控，它说，它的东方各省布满了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密探，并且被他们所毒化，而它的意大利臣民则被波拿巴和沙皇的联合阴谋弄得晕头转向。最后，普鲁士深切地感觉到情势的危险，但是它手足被缚，无论往哪个方向都不能动弹。王权实际上由于国王患疯癫症和摄政王没有充分权力而陷于瘫痪。在拒绝退位的国王和不敢掌权的亲王这两者的党羽之间，进行着明争暗斗，而给人民群众的洪流打开了闸门。

因此，一切都取决于法国了。可是在法国，商业上和农业上的灾难、财政上的 *coup d' état*、借助于军队的统治为军队本身的统治所代替，这都更加速了爆发的来临。甚至法国报纸也终于承认，现在必须不再寄一切希望于恢复繁荣时期了。“立宪主义者报”说道：“我们认为，以很快就会复原的空想去愚弄人民是蠢笨的。”“祖国报”说道：“不景气的状况在继续，尽管存在着有利因素，我们不应期待会立刻发生变化。”“同盟报”³⁷⁰和“世界报”随声附和了这些怨言。伦敦“泰晤士报”驻巴黎记者说道：“大家承认，自从1848年革命以来，巴黎从未经受过目前这样的商业危

直译是：政变；这里是：变革、改革。——编者注

机”；而Crédit Mobilier²⁸的股票价格跌到了550法郎左右，即比出售给公众的票面价格还低。另一方面，帝国国库的极度空虚迫使拿破仑不得不坚持他的没收计划。在昂茹出版的一家教权主义报纸写道：“唯一要问的是要不要尊重财产权。”现在还管得了财产权！波拿巴回答说：目前唯一要问的是如何保住军队；并且他以自己惯用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对全军重新进行收买。他下令普遍增加军队的薪俸。这时，英国感到惶恐不安，奥地利则惊慌失措。大家都认为战争迫在眉睫。路易-拿破仑没有别的办法逃脱迅速的毁灭。结局的开端已经临近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8年6月11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1858年6月24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359号

卡·马克思 英国政府和奴隶贸易

1858年6月18日于伦敦

在上院6月17日的会议上，牛津主教提出了奴隶贸易问题，并且代表牙买加岛圣玛丽教区呈递了反对这种贸易的请愿书。这次辩论必然会对所有不抱什么成见的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英国现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极其慎重，坚决要避免引起同美国发生纠葛的任何口实。马姆兹伯里勋爵以下面这段话完全取消了对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的“检查权”：

“美国声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为了什么目的，或无论发生什么怀疑，除美国船只以外，任何船只都不能驶近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否则，驶近或扣留这种船只的官员应对这一行动的后果负全部责任。美国外交部长的这项声明在未得到皇家司法官员赞同和批准以前，我并未承认它符合国际法。而在承认之后，我已极其强硬地警告美国政府，如果获悉美国国旗能庇护任何不法行为，那末世上所有的海盗和奴隶贩子就会只悬挂美国国旗；这必定会使现在受尊敬的美国国旗蒙受耻辱；美国人如果坚持他们现在的声明，不仅不能维护国家的荣誉，反而会得到相反的结果；最后，美国国旗会被人购买去干最卑鄙的勾当。我将继续坚持，在现今的文明时代，海洋上航行的船只千千万万，因此必须在海洋上设置警察；必须由各国商定——如果国际法不做出规定——如何来判明船只的国籍、确定悬挂某国旗帜的权利。我说话的语调、我同美国驻我国代理公使的谈话、盖斯将军在其精心拟制的报告中就这个问题所提出的意见，使我对同美国达成协议抱很大希望，这种协议在两国官员接到命令之后，就使我们能够检查各国的旗帜，而不致触犯船只所

属国。”

在反对党的议席上也没有人试图维护英国对美国船只进行检查的权利，但是格雷伯爵说道：

“英国人曾跟西班牙及其他国家缔结了防止奴隶贸易的条约，如果他们合理的根据怀疑某一艘船从事这种可耻的贸易，而这艘船当时是利用美国旗帜，实际上根本不是美国船，那末他们就有权利追上它并对它进行搜查。但是，如果这艘船能拿出美国证件，那末即使它满船都是奴隶，他们也应该释放它，让美国去蒙受这种罪恶贸易的耻辱。我希望并且相信，我们的巡洋舰在这方面将接到严格的命令，任何违背这些规定的官员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以后问题就只是围绕着这一点转圈子，即是否可以要求被怀疑非法利用美国国旗的船只提出证件，而马姆兹伯里勋爵似乎连这一点也抛开不管了。阿伯丁勋爵直接否认这样做可能产生任何争论，因为英国官员在这种场合据以行事的指令，即由拉欣顿博士和乔·科克伯恩爵士起草的指令，当时已经通知美国政府，并且已经得到这个政府的代表韦伯斯特先生的同意。所以，如果这项指令没有什么改变，如果官员的行动没有超出指令的范围，那末“美国政府就不可能有任何理由抱怨”。的确，当时社会舆论似乎很疑心帕麦斯顿又玩了一个他惯用的戏法，在给英国巡洋舰的命令中任意做了一些变更。大家知道，帕麦斯顿虽然夸耀他对禁止奴隶贸易的热心，然而却在他执掌外交事务的十一年中（直到 1841 年）撕毁了所有涉及奴隶贸易的现行条约，颁布了一些被英国司法当局认为是罪恶的法令，它们实际上曾使他的命令的的执行者之一受到法律制裁，而将一个奴隶贩子置于英国法律的保护之下，使他免受英国本国政府的追究。帕麦斯顿为自己选择了奴隶贸易作为战场，把它变成了在英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挑起争端的简单工具。他在 1841

年离职以前曾发出这样的指令,据罗伯特·皮尔爵士说,这些指令“如果没有及时被撤销,一定会造成与美国的冲突”。帕麦斯顿自己说过,他曾命令海军军官“不要太尊重国际法”。马姆兹伯里勋爵虽然措词非常婉转,然而曾经暗示过,帕麦斯顿“把英国舰队派到古巴海面上去,而不让它留在非洲海岸附近”,是使英国舰队离开它在英俄战争爆发前几乎已经消灭了奴隶贸易的地方而到一个它只能挑起与美国的争端的地方去。帕麦斯顿自己委派的前驻圣彼得堡大使沃德豪斯勋爵同意这种看法,他说:

“不管发出了什么样的指示,如果政府下令派遣这样大量的英国船只进入美国洋面,那末在我们和美国之间迟早会发生纠纷。”

然而,不管帕麦斯顿抱着什么样的秘密意图,很明显,他的意图在 1858 年也像在 1842 年一样,已被托利党政府所粉碎,在国会中和报刊上掀起的疯狂的战争叫嚣已注定成为“无事烦恼”。

至于奴隶贸易问题本身,牛津主教和布鲁姆勋爵斥责西班牙是这种罪恶贸易的主要中心。他们两人都呼吁英国政府采取力所能及的一切办法迫使这个国家奉行符合现行条约的政策。早在 1814 年,大不列颠和西班牙之间就缔结了一个一般条约,在这个条约中,西班牙明确地谴责了奴隶贸易。在 1817 年缔结了一个特别条约,按照这个条约,西班牙承担了义务,从 1820 年起禁止它自己的臣民从事奴隶贸易,并且得到了一笔 40 万英镑的赔偿费,以弥补它的臣民由于实现这项条约而可能受到的损失。钱是装进了口袋,可是义务却没有履行。在 1835 年又缔结了一项新的条约,按照这项条约,西班牙在形式上承担了义务——颁布一项相当严厉的刑法,以使它的臣民不可能继续从事这种贸易。但是又拖延下来了,一切又完全按照那句西班牙成语《A la mañana》〔“明天

再说”)行事。只是过了十年以后才颁布了这项刑法；可是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刑法中遗漏了英国所极力争取的主要条文，即把奴隶贸易当做海盗行为看待。一句话，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古巴镇守司令，内务大臣，宫廷奸党，如果传闻属实的话，还有皇室本身，在这方面大发其财，他们向奴隶贩子征收私税，并且出售以每口值多少杜布隆 的价格贩卖人类血肉的特许证。

牛津主教说：“西班牙不能以这种贸易是它的政府没有足够力量来禁止的体系作为辩解的理由，因为瓦尔德斯将军已经证明，这种借口是丝毫不足为凭的。他到岛上以后，召集了最闻名的奴隶贩子，限他们在六个月之内结束奴隶贸易方面的一切交易，并且告诉他们，他决心在这个期限结束时禁绝奴隶贸易。结果怎样呢？在 1840 年，即瓦尔德斯将军上任的前一年，有 56 艘船从非洲载运奴隶到古巴来；而在 1842 年，当瓦尔德斯将军任镇守司令的时候，这样的船只只有 3 艘。在 1840 年，运到岛上来的奴隶至少有 14470 个；而在 1842 年只有 3100 个。”

现在英国应该对西班牙怎么办呢？重申抗议，增发函电，恢复谈判吗？马姆兹伯里勋爵自己承认，用两国政府之间徒然交换的文件已能把从西班牙海岸到古巴的淼淼汪洋完全盖住。也许英国应该坚持它那为这么多条约所肯定的要求吧？然而这里正是开始出现主要困难的地方。这里加进来了一个“至圣的盟友”、现在公认为奴隶贸易的护卫天使的不祥形象。波拿巴第三这个一切奴隶制的庇护者，禁止英国按照它的信念和条约行事。大家知道，人们曾大大怀疑马姆兹伯里勋爵跟萨托里英雄²⁹⁸保持有非法的亲密关系。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极其坦率地揭露出波拿巴第三是全欧闻名的奴隶贩子，是一个以最卑劣的形式，即借口黑人向法国殖

民地“自由移民”来恢复这种可耻贸易的人。格雷伯爵对这一揭露补充了一点，他说，“在非洲进行战争是为了捕获俘虏，然后把他们卖给法国政府的代理人。”克拉伦登伯爵补充道，“西班牙和法国这两个国家在非洲市场上竞争，它们为一个人出一定的价钱；这些黑人，不论是被运到古巴还是被运到法国殖民地去，所受到的待遇没有丝毫差别。”

这就是英国在帮助这个人推翻共和国以后所处的绝妙处境。第二共和国跟第一共和国一样，消灭了奴隶制。完全靠迎合人的最卑劣情欲而获得政权的波拿巴，只有每天收买新的党羽才能维持这种政权。他这样做不仅恢复了奴隶制，而且以恢复奴隶贸易收买了庄园主。任何玷污民族良心的事情，对他都是延续政权的新保证。奴役法国的最牢靠的手段，就是把法国变成买卖奴隶的国家。可是要知道，这个法国曾经有勇气面对着全世界宣布：打倒殖民地，原则万岁！波拿巴至少做到了一件事情：奴隶贸易已成为帝国阵营和共和派阵营之间的斗争的口号。如果法兰西共和国今天恢复，那末明天西班牙就会被迫放弃这种可耻的贸易。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6 月 18 日
载于 1858 年 7 月 2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366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 印度的捐税

据伦敦报纸报道，印度的有价证券和铁路股票最近在伦敦交易所有下跌的趋势，这决不能证明约翰牛对印度游击战的进展情况所爱表示的乐观看法出自真心，无论如何这是对印度财力的伸缩性绝不信任的表示。对于印度的财力，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印度的捐税比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苛重；在多数管区，特别是在英国统治最久的管区内，农民，即印度人民的绝大多数，通常是处在赤贫和绝望的状态中，可见印度的捐税已增加到极限，印度的财政情况因而是无法改善的。目前这是令人颇为烦恼的结论，因为据格莱斯顿先生说，今后几年内印度仅特别开支一项每年总计即将达 2000 万英镑。另一种意见认为，——并且还用许多统计资料来加以证明，——没有哪个国家的捐税像印度那样少；如果开支增加，则收入也可以增加；认为印度人民似乎已担负不起新的捐税的看法是极端错误的。布莱特先生可以说是“令人烦恼”的理论的一个最热心和最有威望的代表，他在关于印度政府的新法案³⁷¹进行第二读时发表了如下的意见：

“印度政府管理印度所花的钱要比它从其人口中所能挤出的钱为多，虽然政府无论是在派税项目或征税方法方面都毫无顾忌。管理印度要花 3000 万英镑以上，总税收也是这样多，然而国家预算总是有赤字，而赤字又只好

用利息很高的贷款来弥补。目前印度债务为 6000 万英镑,并在继续增加,同时政府的信用却在下降,这部分地是因为政府有一两次对债权人很不老实,而现在又由于印度不久以前遭到了灾难。我曾提到总税收,但是因为其中也包括鸦片贸易的收入,这种收入很难说是印度人民负担的捐税,所以我把实际由印度人民负担的捐税估定为 2500 万英镑。但是不应把这 2500 万英镑同在我国所征收的 6000 万英镑相比较。议院应该记得,用在英国只能购买一天劳动的黄金或白银,在印度可以购买十二天的劳动。这 2500 万英镑在印度所能购买到的劳动数量,在英国要用 3 亿英镑才能买到。有人会问我:印度人的劳动价值是多少?我就说:如果印度人的劳动一天只值 2 辨士,那末很明显我们就不能期望他缴纳如果他的劳动值 2 先令时那样多的捐税。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我们有 3000 万人口;在印度则有 15000 万居民。在国内我们征收 6000 万英镑的捐税;在印度,按人口的日劳动推算,我们要征收 3 亿英镑税款或者说征收的税款为我们在英国所收的五倍。由于看到印度人口为大不列颠人口的五倍,人们会说按人口计算印度和英国每人分摊的捐税大致一样,因此这种负担不能说特别重。然而英国拥有机器和蒸汽的巨大动力,有运输工具,有资本和人的发明能力为帮助人民的劳动而创造出来的一切。在印度完全没有这类东西。那里甚至连一条像样一点的道路也没有。”

应该承认,这种把印度的捐税与英国的捐税相比较的方法并不完全恰当。一则印度人口为英国人口的五倍,再则印度的捐税只为英国的一半。可是,布莱特先生说,印度的劳动大约只等于英国的劳动的十二分之一。因此印度的 3000 万英镑捐税就相当于大不列颠的 3 亿英镑捐税,而不是相当于其实际征收的 6000 万英镑。那末布莱特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考虑到印度居民比较贫困的话,印度人民按人口比例和大不列颠人民缴纳着同样多的捐税;因此 3000 万英镑对于 15000 万印度人的负担正如 6000 万英镑对 3000 万不列颠人的负担一样。但是在这种前提下,他如果说穷人缴不起和富人一样多的捐税,当然是错误的,在证明印度人缴纳的捐税与不列颠人一样多的时候,

已经把印度人民比较贫困的情况考虑进去了。实际上这里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试问按公道来说，能不能指望一个每天赚 1 角 2 分钱的人缴税 1 分钱和每天赚 12 元钱的人缴税 1 元钱同样容易？按比例来说，他们两人都交出了自己收入中的同样的一份，但是这一捐税对他们的生活需要的影响，程度却完全不同。可是布莱特先生至今没有这样提出过问题；其实，要是他这样做的话，那末把不列颠雇佣工人负担的捐税和不列颠资本家负担的捐税加以比较，可能会比用印度和不列颠的捐税相比较显得更加清楚，更加令人信服。此外，他本人承认，应该从 3000 万英镑的印度税款中扣除从鸦片贸易中所得的 500 万英镑收入，因为，实在说，这笔收入不是印度人民所负担的捐税，而倒是中国消费者所负担的出口税。其次，英印政府的辩护者们又提醒我们说，政府收入中有 1600 万英镑是来自土地的收入或地租，而地租从太古时代起就属于作为土地最高所有者的国家，从来就不是农民个人财产的一部分，因此，实际上，这也很难算作真正的捐税，就像不列颠农民向不列颠贵族缴纳的地租不能归入捐税一样。按照这种观点，印度的捐税总额可表示如下：

	英 镑
征收捐税总额	30000000
扣除鸦片的收入	5000000
扣除地租	16000000
真正的捐税	9000000

此外，据说还必须承认，在这 900 万英镑捐税中，某些重要项目，如邮政税、印花税和海关税，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涉及到居民大众。因此，在不久以前提交给不列颠统计协会的关于印度

财政情况的报告中，汉德里克斯先生企图根据议会及其他官方文件证明，取自印度居民的收入总额中，目前以捐税形式征收的，即征自居民实际收入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在孟加拉真正的捐税只占总收入的 27%，在旁遮普只占 23%，在马德拉斯只占 21%，在西北各省只占 17%，而在孟买则只占 16%。

下面是我们从汉德里克斯先生的报告中引用的关于 1855—1856 年印度和联合王国每一居民平均所纳税款的比较资料：

	取自每一居民的收入总额		其中真正的捐税		
	先令	辨士	英镑	先令	辨士
孟加拉	5	0	—	1	4
西北各省	3	5	—	0	7
马德拉斯	4	7	—	1	0
孟买	8	3	—	1	4
旁遮普	3	3	—	0	9
联合王国	—	—	1	10	0

布里格斯将军列举了如下数字来说明其他年度各国按人口平均的税款情况：

	英镑	先令	辨士
英国 (1852 年)	1	19	4
法国	1	12	0
普鲁士	—	19	3
印度 (1854 年)	—	3	8 $\frac{1}{2}$

根据这些数字，英印政府的辩护者们做出结论说，即使把印度居民比较贫困的情况估计在内，在欧洲也没有一个国家的捐税像在印度那样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印度的捐税问题不仅意见有分歧，而且这些意见所根据的事实本身也相互矛盾。一方

面，我们应该承认，印度捐税名义上的金额相当小，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从议会文件中和印度问题最大权威的著作中援引许多资料，这些资料清楚地证明，这种似乎很轻的捐税对印度人民大众是极沉重的负担，为了征税不得不求助于像刑罚这样的可耻方法。可是除了印度债务的不断迅速增加和印度赤字的增大以外，是否还需要其他证据呢？当然谁也不会认为，印度政府之所以宁愿增加债务和赤字，是因为它不想过多地耗用居民的资财。它所以走上借债的道路是因为不这样它就不能做到收支相抵。1805年印度债务等于25626631英镑，1829年约达到3400万英镑；1850年是47151018英镑；而目前大约为6000万英镑。顺便提一下，我们还没有把东印度公司欠英国的债务计算进去，这批债务也是要用东印度的收入来偿还的。

年度赤字（1805年约为250万英镑）在达尔豪西勋爵管理下平均达到500万英镑。乔治·坎伯尔先生是孟加拉的一个文职官员，对英印政府是很有好感的，然而他在1852年就不得不公开承认：

“虽然从来没有哪个东方征服者在印度取得了像我们这样充分的优势，这样平静的、普遍的和不可争辩的统治，但是他们所有的人都靠该国的税收发了财，而且其中有很多人从自己的财富中拿出大笔款项来办公共设施……我们却没有这种可能性……虽然捐税总额在英国统治时期毫无减少，然而我们却没有剩余。”

在估计捐税负担时，应该考虑的主要不是它的名义上的数额，而是捐税的征收方法和使用方法。印度的征税方法极为可恶，譬如就土地税来说，在现行的方法下，大概糟蹋的产品要比收获的为多。至于说到征收来的捐税的使用情况，那末只要指出以下两

点就够了：它没有拿出一丝一毫来以公益设施的形式还用于人民（这种公益设施对亚洲国家比对任何地方都更加必不可少），再就是如布莱特先生所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统治阶级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印度那样大发其财。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6 月 29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7 月 23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383 号

弗·恩格斯 印度军队³⁷²

印度的战争正在逐渐转入分散的游击战争的阶段，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这是必将面临的和最危险的一个发展阶段。起义者在正规战、在城市和营垒防御战中接连失败后，逐渐化为一些从 2000 人到 6000 或 8000 人的比较小的队伍，每一支小队伍，在一定程度上各自独立行动，但也随时准备联合起来对任何可以单独予以奇袭的英军部队进行短促的战斗。在科·坎伯尔爵士的野战军战斗部队被引出勒克瑙大约 80 英里以后，巴雷利未经战斗就弃守了，这是起义者的主力在这方面的一个转折点；卡耳皮的弃守对于土人的第二支大队伍，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两种情况都是把最后可以防守的中心作战基地放弃了，因此全军作战已不可能，起义者就分成许多较小的队伍，向四面退却。这些机动的队伍并不需要大城市作为中心作战基地，他们在所到的各个地区有办法弄到生存资料、补充弹药和增添新兵；而且，一个小城镇或大村庄，对于每一支小队伍来说都可以成为整顿队伍的中心，其价值正如德里、勒克瑙或卡耳皮对于较大的军队一样。经过这样的变动，战争就不是那么吸引人了；起义者各支队伍的行

见本卷第 389、500—501、523—525 页。——编者注

踪无法详细了解，而有关的情报也很混乱；英军指挥官的作战行动几乎无法加以批评，因为这些行动所依据的前提根本就是模糊的；胜败成了唯一的标准，而这样的标准无疑是最能骗人的。

土人行踪不定的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很严重。勒克瑙被攻占以后，他们向四面八方退却，有的往东南，有的往东北，有的往西北。最后一支队伍最强，被坎伯尔一直追到罗希尔汗。他们在巴雷利集中，进行了整顿，但是当英军赶到时，他们没有抵抗就放弃该地，又向不同的方向撤退了。关于撤退的各条路线，现在是详情不明。我们只知道一部分人撤往尼泊尔边境的山岳地带，同时有一支或几支队伍似乎是向相反的方向推进，前往恒河和达普（即恒河和朱木拿河两河流域）。但是，坎伯尔刚刚占领了巴雷利，原来向东撤退的起义者就立即与奥德边界的几支队伍会合起来，袭击了有少数英军警备部队留守的夏贾汉普尔；这时又有其他的起义队伍沿着这个方向赶来。总算警备部队运气好，琼斯准将带着援兵在5月11日就赶到了并击败了土人，不过土人也得到了向夏贾汉普尔集中的队伍的支援，于15日又包围了这个城市。同一天，坎伯尔留下一支警备部队防守巴雷利，自己率兵前去解围，但是直到5月24日他才对起义者发动进攻，并击退了他们，而参加这次联合行动的各支起义队伍又向不同的方向散开了。

当坎伯尔在罗希尔汗边界这样作战的时候，霍普·格兰特将军在奥德的南部带着自己的部队东奔西跑，这除了使部队在印度的炎炎夏日之下疲惫不堪而遭到折损以外，毫无结果。对他说来，起义者是太神速了。他们到处都是，只是在他要去搜寻的地方就没有了；当他以为可以在前面碰上他们时，他们早又绕到了他的背后。顺恒河而下，在第纳普尔、贾格迪斯普尔和布克萨尔一带

地区，路加德将军也跟在这样的影子后面追来追去。土人使他不平地奔波，在把他诱离贾格迪斯普尔以后，就突然向该地的警备部队袭击。路加德又赶回去。接着就有电讯报道说，他已于 26 日获得了胜利。这些起义者的战术和奥德、罗希尔汗的队伍的战术完全相同，这是很明显的。但是，路加德所获得的胜利未必有很重大的意义。这样的队伍能够经得起多次失败而不致于丧失士气和兵力。

这样，到 5 月中，印度北部所有的起义部队都放弃了大规模的战争，只有在卡耳皮的军队除外。这支军队用比较短的时间在这座城市建立了一个完备的作战中心。他们有大量的粮食、弹药和其他储备，有许多火炮，甚至还有铸造厂和步枪制造厂。虽然这支军队和康波尔的距离不超过 25 英里，坎伯尔却不去惊动他们；他只是派兵在朱木拿河靠达普那一岸即东岸监视着他们。罗斯和惠特洛克将军早已向卡耳皮进军；最后，罗斯终于到达，在卡耳皮前沿阵地附近经过多次交锋才把起义者打败。同时，在朱木拿河对岸监视的队伍开炮轰击城市和要塞，起义者突然撤守，把他们最后这一支大军分成若干独立的队伍。根据现有的报道，还完全弄不清楚他们所选择的路线；我们只知道有些队伍前往达普，另一些队伍到瓜廖尔去。

于是，从喜马拉雅山脉到比哈尔和文迪亚山脉，从瓜廖尔和德里到果腊克普尔和第纳普尔，整个地区都布满了活跃的起义队伍。他们由于有了十二个月的作战经验而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组织性；他们吃过不少败仗，但是每一次败仗都还不能决定大局，英军只是占了一些小便宜，因而他们仍然斗志昂扬。的确，他们所有的据点和作战中心都失败了，大部分储备品和大炮都损失了，重

要的城市全落在敌人的手里。但是另一方面，英军在一大片地区内所占领的仅仅是一座座城市，而在旷野地带所占领的也只是他们的机动部队偶然停驻的小块地方；英军不得不追击机警灵活的敌人而又毫无希望赶上他们；英军被迫在一年当中最致命的季节采取这种疲于奔命的作战方式。当地印度人能够比较自如地经受本国夏季正午的炎热，而欧洲人单单是呆在烈日下就几乎要送命；印度人在这种季节能够每日行军 40 英里，而他们北方的敌人走上 10 英里就吃不消了；对于印度人，甚至热带的霖雨和潮湿的密林都没有多大害处，而欧洲人在雨季或潮湿地带只要一劳累，痢疾、霍乱和疟疾便跟踪而来。我们现在没有关于英军卫生状况的详细材料，但是根据罗斯将军部队中暑人数和被敌人杀伤人数的比例数字，根据关于勒克瑙警备部队中疾病流行、第三十八团在去年秋天开到时有 1000 多人而现在几乎不到 550 人这份报告，再根据其他一些迹象来看，我们可以断定 4 月和 5 月的夏季酷热，已经在那些为了顶替去年在印度参加战役的晒得黝黑的老兵而于最近派去的青壮年中间奏效了。以现有的军队，坎伯尔无法举行哈弗洛克式的强行军，也无法在雨季展开一次像围攻德里那样的攻城战。尽管英国政府又在派遣强大的援军，但他们能否补足在今年夏季战局中所受的损耗是令人怀疑的事情，在这次战局中英军所遇到的是除非在最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下不肯交锋的敌人。

起义者的战斗行动现在开始有点像阿尔及利亚的贝都英人在反抗法国人时所采取的行动了，不同的是，印度人远不是那样狂热，并且不是善于骑马的民族。后面这一点在一个拥有广阔平原的国家里是很重要的。起义者中间有许多伊斯兰教徒很可以组成优秀的非正规骑兵队；可是到目前为止印度那些擅长骑马的主要

民族还没有参加起义。起义军队的主力是步兵，可是这样的兵种不适于在旷野同英军作战，成为平原游击战争的累赘，因为要在这种地方进行游击战，主要是靠非正规的骑兵。起义者趁英军在雨季被迫休战的时期能把这个缺陷弥补到什么程度，我们以后将会看到。这段休战时期给土人以整顿和补充兵员的充分机会。除了组织骑兵以外，还有两个方面值得重视。冷天一到，只靠游击战是不行的，必需建立起作战中心，要有储备品、大炮以及营垒或城市，以便使英国人在冬季结束以前闲不下来；否则，游击战等不到明年夏天赋予它新的生命力就要熄灭了。瓜廖尔看来是对起义者有利的据点之一，要是他们真的占据了它的话。其次，起义的成败决定于起义能否扩大。如果分散的队伍不能设法穿过罗希尔汗进抵拉吉普坦纳和马拉提人地区，如果他们的行动仍然局限于北部中央地区，毫无疑问，只要今年一个冬天，就会使这些队伍溃散，并且成为盗匪，他们很快就会甚至比白面孔的侵略者更引起居民的憎恨。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7 月 6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7 月 21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38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关于印度的法案³⁷³

关于印度的最近一项法案已在下院三读通过，既然处于得比影响下的上院未必会反对这项法案，东印度公司的命运可以说已经决定。应该承认，公司决不是像英雄那样死去；但是它已将自己的权力，以它取得时的那种方式，即一点一滴地，通过巧妙的交易变卖出去。实际上，它的全部历史就是一篇买进卖出的故事。它以买进主权开始，而以卖出主权告终。它不是在决战中倒了下去，而是在拍卖人的木槌声中落到了出价最高的人手里。1693年，公司由于给里子公爵和其他国家官员付了大批款项，从国王那里获得了一张为期二十一年的特许状。1767年，它由于答应每年向帝国国库缴纳40万英镑，而使自己的权力延长了两年。1769年，它又成交了同样的一笔为期五年的交易；但是此后不久，由于国库放弃所规定的每年纳款并且向它提供了利率四厘的140万英镑贷款，它让出了自己主权的某些部分，即第一次将总督及其四个参事的任命权移交给议会，完全让国王来任命最高法官及其所属的三个法官，并同意将股东会由民主机关变成寡头机关³⁷⁴。1858年，东印度公司在向股东会庄严保证了要用宪法所许可的一切“手段”来反对将自己的行政权力移交给国王之后，自己却接受了这个原则，并且同意了一个对公司不利、但却为其主要董事们保

证了收入和职位的法案。如果像席勒所说的那样，英雄的死犹如太阳落山，那末东印度公司的下场更像是破产者与其债权人签定的协议。

根据上述法案，主要行政职权移交给印度事务大臣及其参事会³⁷⁵，就如在加尔各答管理事务由总督及其参事会执掌一样。但是这两个官员，即在英国的印度事务大臣和在印度的总督，同样有权不顾其助理们的建议而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新法案将目前由督察委员会主席通过机密委员会所行使的一切权力，即在非常情况下不征询参事会的意见径向印度发出指示的权力，也授予印度事务大臣。在组成这个参事会时，它的人选除由国王任命的以外，终究不能不依赖东印度公司作为唯一现实的来源。参事会中由选举产生的参事，均应由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从他们自己当中选出。

这样，东印度公司的名称终究注定比它的实质命长。得比内阁在最后一分钟承认，内阁的法案不包含董事会所提出的废除东印度公司的条款，但是今后该公司的性质将同最初一样是一个股份公司，分配各种立法决议所保障的股息。1784年的皮特法案实际上已以督察委员会的名义使公司的政策服从于内阁的权力。1813年的法令取消了公司的贸易垄断权（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例外）。1834年的法令使公司彻底失去了一个商业机构的性质，而1854年的法令则消灭了它的权力的最后残余，但是它仍保留着对印度的行政管理。历史在重演：1612年变成股份公司的东印度公司，重新获得了其最初的形式；只是现在它是一个没有贸易的贸易公司和没有经营资本而只有取得定息权利的股份公司罢了。

关于印度的法案产生的经过，比现代议会立法的任何其他法令都更富于戏剧性的变化。当西帕依开始起义的时候，英国社会的一切阶级都大声疾呼要求在印度实行改革。有关印度刑罚的消息在人民中间引起了强烈的激愤；在印度供职的高级军官和高级文官公开谴责了政府干涉当地人民的宗教事务。不过是唐宁街工具的达尔豪西勋爵所执行的贪婪的兼并政策；由帕麦斯顿本人授意在波斯和中国挑起和进行的海盗式战争在亚洲居民心中所贸然引起的动乱；他为镇压起义所采取的软弱措施——运送军队用帆船，而不是用轮船，并且是绕道好望角，而不是经过苏伊土地峡，——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不满情绪的增长，而使得公众大声疾呼地要求在印度实行改革，改革公司对印度的行政管理，改革英国政府对印度的政策。帕麦斯顿支持了人民的这一要求，但是决定利用它来纯粹为他本身的利益服务。既然政府和公司都丢尽了脸，那就应该牺牲公司，而使政府成为全能的东西。公司的权力应该干脆移交给现今的独裁者。这位独裁者企图既代表王权与议会相抗衡，又代表议会与王权相抗衡，从而把双方的特权集中于一身。依靠印度军队，掌握印度国库，把在印度的官员的任命权攫为己有，帕麦斯顿就可以为自己建立一个绝难攻破的阵地。

他的法案经过第一读就顺利地通过了，但是他的前程却由著名的取缔阴谋活动法案，继之是托利党的上台所断送了。

托利党在正式回到内阁的头一天就声明，为了尊重下院坚决提出的要求，他们不再反对把印度的管理权从公司移交给国王。埃伦伯勒勋爵立法上的失败看来已在使帕麦斯顿迅速重掌政权，但是这时约翰·罗素勋爵却插手进来怂恿独裁者妥协，并建议把印度法案当做是由议会提出，而不是由政府提出的法律草案，以此

挽救了政府。于是帕麦斯顿就急忙起来利用埃伦伯勒勋爵关于奥德的电报，利用他的突然辞职和由此引起的内阁内部的混乱，以谋私利。托利党在把自己短暂的全部执政时期都用来摧毁本党对没收东印度公司的反抗之后，又要被打入反对派的冷宫。但是人们已十分清楚，所有这些如意算盘都落空了。帕麦斯顿未能在东印度公司的废墟上东山再起，反而葬身在它下面。在辩论印度问题的整个期间，看来下院特别得意的是百般地侮辱这位 *civis romanus* [罗马公民]³⁷⁶。所有他的大大小小的修正案都遭到丢人的否决；人家时常当着他的面以令人最不愉快的冷言冷语谈到阿富汗的战争、波斯的战争和中国的战争；而格莱斯顿先生关于取消印度事务大臣在印度以外发动战争的权力的提案（这一提案等于是对帕麦斯顿过去执行的全部对外政策的不信任表决），尽管遭到帕麦斯顿的强烈反抗，仍然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但是，虽然这个人被抛开了，他的原则大体上却仍在生效。由于对印度的正式兼并；行政权尽管受到印度事务参事会（实质上它只是前董事会的高薪的幽灵）有抑制性权力的某些限制，仍然被提高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为了与这一权力取得平衡，必须在议会的天平上放上民主的砝码。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7 月 9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7 月 24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38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 1940 年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 2 期

卡·马克思 布尔韦尔-利顿夫人的囚禁

1858年7月23日于伦敦

轰动一时的布尔韦尔家庭纠纷，在伦敦“泰晤士报”看来，已经通过友善的家庭协议而得到“圆满”解决，但实际上还远没有平息下来。的确，尽管这场纠纷严重地涉及党派利益，首都各家报纸，除极少数外，都用尽一切办法通同一气保持缄默，以图暗中了结这一事件。要知道，爱德华·布尔韦尔爵士是那控制着伦敦新闻界的文化圈子的头目之一，这个圈子的控制甚至比党派关系还要专横，当事情闹到公开斗争的地步时，文化界的先生们一般总是屈服于它的怒火之下。“晨邮报”第一个披露了布尔韦尔夫人的友人有意要求法庭审理的消息；伦敦“泰晤士报”仅仅转载了“晨邮报”的这条简讯；就连在文化界没有地位因而完全不必为此担心的“晨报”，也只敢转载“索美塞特报”³⁷⁷上的三言两语的报道。甚至帕麦斯顿，尽管有势力，一时也不能从他的文化界走卒那里挤出什么东西来；当布尔韦尔的儿子写的那封敷衍塞责的检讨书发表出来以后，所有这些冠冕堂皇的人身自由捍卫者都表示满意之至，不愿意再莽撞地干涉这一“沉痛事件”。托利党的报纸自然早就把自己满腔高贵的怒火发泄到克兰里卡德勋爵身上，而多少受到曼彻斯特学派精神熏陶的激进派报纸，则唯恐给当今

政府惹麻烦。可是，除了正派的或自命正派的首都报纸以外，还有不正派的报纸。这种报纸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政治后台老板，这些人根本无所谓文化界地位问题的约束，随时准备着利用自己特有的言论自由来发财，并竭力抓紧一切机会在公众眼前显示自己是勇敢精神的唯一体现者。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本能一经激发，也就没有必要再耍花招了。只要激起了公众的义愤，那时就连伦敦“泰晤士报”也会撕下矜持的面具，并且（当然是抱着沉痛心情），把“社会舆论”的判决甚至加到爱德华·布尔韦尔 - 利顿爵士这样的文化把头身上，借此打击得比政府。

目前事态的演变正是这样。正如我们一开始就暗示过的³⁷⁸，帕麦斯顿勋爵是这场戏的幕后导演；用法国人的话来说，现在这已经是《un secret qui court les rues》〔“众所周知的秘密”〕了。

伦敦一家周刊写道：“On dit〔据传〕，在整个事件中，为布尔韦尔 - 利顿夫人出力最多的是帕麦斯顿夫人。我们都记得，当墨尔本勋爵因那位诺尔顿绅士的夫人而处于尴尬境地的时候，托利党人是多么急切地出来替诺尔顿先生说话啊。一报还一报，这是公道的。但是细想起来，我们觉得这样的事很令人痛心：在我们这个时代，内阁大臣竟利用自己的权势干出暴力行为，而一位内阁大臣的夫人竟唆使另一位内阁大臣的夫人去反对政府。”

事情的真相常常只有通过迂回曲折的政治倾轧方式才能在英国报端的一个角落里透露出来。对于一件真正的凶恶行为所持的似乎出自内心的义愤，归根到底不过是别有用心装的腔作势；呼吁社会主持公道不过是为了发泄私愤。至于那些大无畏的舞文弄墨的骑士，则不论布尔韦尔夫人是永远呆在伦敦的疯人收容所里，还是被人家比在圣彼得堡或维也纳更加巧妙、更加神不知鬼不觉地收拾掉，实际上他们都是毫不在乎的；要不是她运气好，被帕

麦斯顿一眼看中，认为可以借她来作为分裂托利政府的工具，文化界因袭守旧的礼仪是会使她没有任何可能进行申述的。

约略研究一下布尔韦尔的儿子给伦敦报界的信，很有助于说明事情的真相。罗伯特·布尔韦尔-利顿先生首先声明，对他的“老实话”应该“深信不疑”，因为他“作为布尔韦尔-利顿夫人的儿子，比任何人都更有权利出来保护她，自然，对全部情况也比任何其他了解得更真切”。但是这个孝子不仅不关心他的母亲，不仅不同她通信，甚至将近十七年没有见过她的面，而在他父亲被重新选入议会的哈特福的选民会上才同她相会。当布尔韦尔夫人离开选民会，到哈特福市长那里去向他借用市政厅大厦做讲演会场时，罗伯特·布尔韦尔-利顿先生派了一位医生到市长公馆去检查他母亲的精神状态。后来，他母亲在伦敦克拉普斯街黑耳·汤普逊先生家里遭到绑架，她的堂姊妹莱夫斯女士跑到街上，看到利顿先生等在外面，就央求他管一管这件事，不要让别人把他母亲送到布伦特弗德去，这时利顿先生竟无动于衷地说，这与他不相干。起初他是他父亲所策划的阴谋的主要参与者之一，现在他又改变了立场，出来做他母亲的当然保护人了。利顿先生为自己辩护所寻找的第二点依据是，他母亲“根本没有被送进疯人收容所”，而只不过是送进了医生罗伯特·加丁纳·希尔先生的“私立病院”。其实这不过是诡辩。由于希尔先生管理的魏克病院按照法律并不属于“收容所”之列，而属于“首都官准私立疯人病院”之列，因此，说布尔韦尔夫人不是被关进“疯人收容所”，而是被关进了疯人病院，这从表面上看是完全正确的。

靠“精神错乱症”吃饭，自担风险的希尔医生也出来辩解，他说：布尔韦尔夫人完全没有受到禁闭，相反地，她可以使用马车，而

且在她被迫留住期间,几乎每天晚上都乘车到里士满、阿克顿、汉威耳或艾兹卢艾尔特去散心。希尔先生忘记告诉公众,他实行的这种“对疯人的改良待遇”完全符合精神病委员会的明文规定。装模作样的亲热、耐着性子的笑脸、哄小孩般的劝导、曲意逢迎的废话、机巧投递的眼色、一群训练有素的护理人员的故作镇静,——这一切,都像灌水法、紧束衣、粗暴的监视人和黑暗的病房一样,能有效地把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女人逼疯。不论怎么说,医生希尔先生和利顿先生的声明简单归结起来就是,他们的的确是把布尔韦尔夫人当成疯子,只不过对她使用的是新办法,而不是旧规矩。

利顿先生在他的信中说:“我经常同我母亲保持接触……而我是遵照我父亲的吩咐办事的,他总是把他的一切打算完全告诉我……他要我照舍夫茨别利勋爵的主意去做,只要这能给利顿夫人带来好处和安慰。”

谁都知道,舍夫茨别利勋爵是总部设在埃克塞特会堂³⁷⁹的那班人马的总头目。用他的神圣香味来驱散肮脏勾当的臭气——这是配得上小说家的天才想像的 *coup de théâtre* [戏剧手法]。舍夫茨别利勋爵已经不止一次地在这方面被派过用场,例如中国问题和剑桥馆密谋。但是利顿先生对公众只交代了真相的一半,不然的话,他就得坦白说出,就在他母亲被绑架以后,帕麦斯顿夫人的一封命令式的来信推翻了爱德华爵士的计划,并要他“照舍夫茨别利勋爵的主意去做”。这位舍夫茨别利勋爵偏偏又是帕麦斯顿的姻兄弟,同时也是精神病委员会的主席。为了让公众感到神秘,利顿先生又接着说:

“我的父亲自从不得已而同意使用那些为许多人曲解的办法时起,就极力征询最有经验和最权威的医生的意见,以求对我母亲的自由的约束绝不超出绝对必要的期限。他对我的嘱咐就是这样的。”

从这一整段硬编出来的笨拙的遁辞中可以看出，爱德华·布尔韦尔爵士之所以需要权威医生提供意见，似乎不是为了把他的夫人作为疯子隔离起来，倒像是为了把她作为 *mentis compos* [精神正常的人] 来恢复她的自由。事实上，同意绑架布尔韦尔夫人的那些医生，绝不是什么“最有经验和最权威的医生”。爱德华爵士雇来的人里面，有那么一位罗斯先生，他是伦敦的一个药商，显然是由于获准经售药品而一跃为精神病名医；还有一位黑耳·汤普逊先生，他曾同韦斯明斯特病院有点往来，但同科学却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是由于外来的温和的压力，爱德华爵士着了慌，感到必须让步时，他才去找医学界真正著名的人物。他的儿子发表了他们的证明书，可是他们证明了什么呢？布尔韦尔夫人的法律顾问们早就请教过的那位“心理学医学杂志”³⁸⁰编辑福布斯·温斯劳医生宣称，“检查了布尔韦尔-利顿夫人的心理状态以后”，他认为“完全可以不再限制她的自由”。需要向公众证明的不是可以恢复布尔韦尔夫人的自由，相反地，是剥夺她的自由是否合法。利顿先生就是不敢接触这个问题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微妙的一面。如果一个巡警被控非法扣押了自由的英国人，而他竟说，他已经恢复了被押者的自由，因此自己没有做错事，他把这作为理由来替自己辩解，岂不令人好笑？但是布尔韦尔夫人真的恢复自由了吗？

利顿先生接着说，“我的母亲现在住在我这里，她的行动不受限制。她自己愿意同我、还有她自己选择的一位女伴和亲戚做一次短期旅行。”

利顿先生的信上注明的是“公园街1号”，即他父亲在市内的住址。这不就是说他们已经把布尔韦尔夫人从布伦特弗德的拘禁处转移到伦敦一个新的拘禁处，完全把她送到凶狠敌人的掌心中

去了吗？有谁保证她的“行动不受限制”呢？至少，她在交给她的和解书上签字时不是自由的，而是在经受着希尔医生的改良治疗法的折磨。这个事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爱德华爵士讲话的时候，布尔韦尔夫人总是沉默的。虽然人们都知道她长于文字，可是公众没有见到过一篇她所写的声明。她写了一份关于自己所受到的待遇的报告，却被人巧妙地从我那里弄走了。

不论他们夫妇之间目前取得了什么样的协议，英国公众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能以重金收买两个贪财医师的无耻阔人有没有权利在疯人待遇法的掩盖下发出 lettres de cachet [拘捕令]？还有一个问题：能不能听任一个内阁大臣用简单的家庭和解来了结一件昭然若揭的罪行？不久以前揭露了一件事：今年精神病委员会在约克郡调查一个收容所时，发现有一个精神完全正常的人被秘密地关在地窖里已经有好几年了。沃尔波尔先生在答复菲茨罗伊先生在下院就这件事提出的问题时说，他没有发现“任何有关这件事的记录”；这样他只是否认记录的存在，但没有否认事实。事情不会就此了结，这从泰特先生的声明里就可以看出。泰特先生的声明表示：“议会下届会期一开始，他就要提议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如何使用疯人待遇法的问题。”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7 月 23 日
载于 1858 年 8 月 4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398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 英国疯人数目的增加

英国社会史上恐怕找不出比现代财富和赤贫现象相应增长这一点更确凿无疑的事实了。有趣的是，这条规律大概对疯人数目也适用。大不列颠疯人数目的增加不下于出口额的增长，而且超过人口的增长。下面是一张引自 1852 年、1854 年和 1857 年关于贫民、疯人和痴呆者的年度报告³⁸¹的对照表，它清楚地说明，在 1852 年至 1857 年商业空前繁荣时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疯人数目迅速增大：

日 期	人 口	各 郡、 市 疯 人 病 院 病 人	官 准 私 立 疯 人 病 院 病 人	习 艺 所 收 容 疯 病 患 者	由 亲 友 等 照 管 者	病 人 和 痴 呆 者 总 数	疯 人、痴 呆 者 总 人 数 的 比 例
1852 年 1 月 1 日	17927609	9412	2584	5055	4107	21158	1 847
1854 年 1 月 1 日	18649849	11956	1878	5713	4940	24487	1 762
1857 年 1 月 1 日	19408464	13488	1908	6800	5497	27693	1 701

1856 年年底，急性的和可以医治的病症数目同慢性的和显然不可医治的病症数目的比例略低于 1 5。这从下列的官方报告可以看出：

	各类精神病患者	经诊断认为 可以医治者
各郡、市疯人病院.....	14393	2070
医院	1742	340
首都各官准私立疯人病院	2578	390
地方私立疯人病院	2598	527
总 计.....	21311	3327
经诊断认为可以医治者	3327	
经诊断认为不可医治者.....	17984	

为了收容各种各样的和不同程度的疯人和痴呆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设有 37 个公立收容所，其中 33 个分设在各郡，4 个设在城市；还有 15 个医院、116 个官准私立疯人病院，其中 37 个设在首都，79 个分设在外地；最后还有习艺所。公立疯人收容所或一般所称的疯人病院，按照法律规定，是为收容居民中贫苦阶层的疯病患者而专门设立的，应当是能够进行适当的医疗工作的诊所，而不仅仅是隔离疯子的地方。大致可以认为，至少在各郡，这些收容所是按正规原则建立的机构，虽然由于过分庞大而无法保证适当的管理；它们都挤得很满，不是严格地根据病情来分别对待病人；而且它们所能收容的只比贫苦居民中全部疯病患者的半数略多一些。归根到底，这 37 个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收容所按其面积来说总共只能容纳大约 15690 个病人。这些收容所是如何赶不上精神病患者的需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1831 年，当可以容纳 500 个病人的汉威耳疯人病院（在密多塞克斯郡）修建起来的时候，都以为它可以满足全郡的需要。可是过了两年，这所疯人病院就已经满员；又过两年，该院不得不扩充，以便再容纳 300 个病人；而现在（虽然这一时期内又修建了一所科尼·海奇疯人病

院来安插该郡的 1200 名贫民疯病患者), 汉威耳疯人病院收容的病人已在 1000 人以上了。科尼·海奇疯人病院是在 1851 年开设的; 不到五年就不得不向纳税人要钱来修建新的收容所; 最近的调查报告表明, 1856 年底, 该郡居民中已有 1100 名以上的贫民疯病患者在这两个疯人病院中都得不到安置。一方面, 现有的疯人病院太庞大了, 以致无法使它们维持正常的状态, 而另一方面, 它们的数量又太少, 赶不上精神病的迅速增长。首先必须把疯人病院严格划分为两类: 不可医治的病人的收容所和可以医治的病人的医院。把不可医治的病人和可以医治的病人混合收容, 两者都不能得到应有的护理或治疗。

官准私立疯人病院一般是为比较有钱的病人设立的。但就是这些“安乐窝”(它们的老板都喜欢这样称呼它们), 在最近一个时期也招致了普遍的愤怒, 起因是布尔韦尔夫人被强迫送进魏克病院, 以及特纳太太在约克的艾科姆病院遭到虐待。由于最近议会就要调查英国精神病行业的秘密, 所以本题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放在以后再谈。现在我们只考察一下济贫以及其他地方机构按照合同托付给官准私立疯人病院的 2000 名贫苦疯病患者的生活状况。付给这些私人企业主供病人吃穿和医疗的款项, 每人每周是 5 至 12 先令, 而实际用于病人的费用平均是 5 先令至 8 先令 4 辨士。企业主们的心思当然是全部集中在一个唯一的目标上——从这笔菲薄款项里榨取大量收入, 尽量少花钱来维持病人的生活。精神病委员会在最近的报告³⁸²中证实, 甚至在那些领有相当大量的病人生活费的私立疯人病院里, 实际上也没有提供什么良好的生活条件, 而对病人的护理则恶劣到极点。

固然, 大法官有权根据精神病委员会的呈请, 撤销私立疯人

病院的营业执照或不准它更换新照；然而在许多场合下，附近没有公立疯人病院或者现有的疯人病院已经满额，委员会不延长它们的执照期限，就得把大批贫苦的精神病患者送进各种各样的习艺所去。但是这个委员会认为，不论私立疯人病院多么糟糕，总比让这些贫苦病人几乎毫无照料地住在习艺所里要安全些，好一些。目前住在习艺所里的疯病患者将近 7000 人。起初，习艺所中的疯人收容部只是为了收容那些只需比一般人略多要一些照料而且能与习艺所中其他人相处的贫苦病人。但是由于很难给贫苦的精神病患者在设备良好的收容所中找到位置，再加上为了省钱起见，教区委员会就渐渐地把习艺所变成了疯人病院，只是这种疯人病院里没有照料、医疗和监护，也就是说没有正规收容所中的病人所应享有的一切基本待遇。很多较大的习艺所里都设有疯人收容部，收容着 40 名至 120 名病人。这都是阴森森的地方，病人住在里面什么也不能做，不能散步，没有什么娱乐。照管他们的大半是住在习艺所里的贫民，这些人根本不适合于担负派给他们的差使。至于对不幸的精神病患者说来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饮食，则难得比习艺所里那些身心正常的人的饮食好一些。很自然，由于这一切，本来供收容患文静精神病的贫民的习艺所，不仅使这种病人住在那里之后状况恶化，而且还可能使甚至可以及时治好的病症也变成慢性痼疾。然而对于济贫所说来，主要的是省钱。

按照法律规定，贫困的精神病患者应首先到分教区医师那里去检查，分教区医师负责把病人的情况通知济贫所的官员；济贫所的官员应当报告地方长官；按照地方长官的命令，病人被送进疯人收容所。实际上这些规定一条也没有执行。贫民疯病患者被直截了当地送进习艺所，只要他们不癫狂，就会在里面住上一辈

子。精神病委员会的委员在视察习艺所时，如果建议把所有那些可以医治的或得不到适当护理的病人转入疯人病院，这种建议往往都因济贫所医务人员证明该病人“无癫狂表现”而不能生效。习艺所中疯人的生活条件如何，从最近的精神病调查报告中所举的下列事实就可以看出。这个报告“如实地描绘了习艺所中疯人生活条件的一般情景”。

在诺里奇的疯人病院里，甚至身体虚弱的病人所用的床垫和枕头都是用稻草填塞的。13间小屋都是砖地。没有带抽水马桶的厕所。男病人的住处取消了夜间守护。被子、毛巾、法兰绒内衣、紧束衣、洗脸盆、椅子、碟子、羹匙以及其他食具都非常缺乏。通风设备很坏。且从报告中摘引下面这一段话：

“甚至对那些在外表上初看起来能给人以良好印象的事情，也不能相信。例如，曾发现有这样的情况：肮脏的病人所使用的大多数被褥通常总是早晨收起来，白天则换上仅仅为了装样子用的比较整洁的被褥，床上铺的是干净的床单和被子，到晚上干净的床单和被子照例收起，又铺上污秽的被褥。”

再以布莱克本的习艺所为例：

“男人们白天在楼下所占的房间又小又矮、又暗又脏；供11名病人容身的地方有一大部分被几只笨重的椅子（病人都用皮带拴在椅子上）以及向外伸出的大炉挡占去了。楼上女人们的房间也是拥挤不堪，其中一间兼作寝室，室内有一大块地方被隔开当厕所；床铺一个紧挨着一个。在一间住着16名男病人的寝室里，空气闷人，臭气熏天。这间屋子长29尺，宽17尺10寸，高7尺5寸；这样，每个病人占的空间只有2.39立方尺。床垫一律都是稻草做的，连病号或卧床不起的病人所使用的都不例外。所有的枕套都很脏，上面都有铁床架子的锈痕。床铺的整理显然主要由病人自己动手。很多病人都特别不爱干净，这主要是由于对他们缺乏应有的护理和照料。夜里用的便壶很少，只是在一大间公共寝室的中央，夜里放上一个小便桶给男人们公用。散步的庭院——男女各有两处——满地都是砖头瓦块，周围是高墙，也没有长凳。

这些庭院最大的长 74 尺，宽 30 尺 5 寸；最小的长 32 尺，宽 17 尺 6 寸。其中一个庭院内有一间常常用来隔离癫狂的病人的小屋。这间小屋完全用石头筑成，有一个小方洞可以透光，方洞上隔有防止病人逃跑的铁栅栏，但是却并没有护窗板和窗框。小屋的地上有一个大的稻草铺，在屋子的一角放着一把笨重的椅子。这个部门完全包给了一个卫生员和护士管理；习艺所的主管人很少过问他们的工作，对所里的这一部门根本不像对其他部门那样注意。”

我们实在不愿意在这里引述委员会的委员关于有如地狱一般的伦敦圣潘克拉斯习艺所的报告。总而言之：英国绝大多数马厩，与习艺所的疯人病房相比，就像是客厅一样；马厩里四条腿的牲畜受到的待遇，与贫苦居民阶层的疯病患者受到的待遇相比，不能不说是爱护备至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7 月 30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8 月 20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07 号

卡·马克思

* 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

读者也许还记得，在 1857 年，由于首相和财政大臣于 11 月 12 日即金融恐慌最紧张的时刻自己承担责任，命令银行法停止生效，英国议会曾匆忙地召开了会议。在通过不追究政府破坏银行法的作用的议案之后，议会便马上宣布休会，但是责成特别委员会“调查 1844 年和 1845 年的英格兰银行法的作用以及最近一次贸易危机的原因”。其实，这个委员会从 1857 年年初起就已开始进行工作，并且已经发表两大册关于 1844 年和 1845 年英格兰银行法的作用和后果的报告——一册是证词，另一册是附录³⁸³。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在已经开始的贸易危机重新使它恢复活动并且给它提供了“额外的调查材料”的时候，几乎已被人遗忘。这个委员会恰好在发生巨大贸易危机之前两个月，曾经在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两大册报告中宣布：英国的贸易是“健康的”，它“没有任何危险”。至于罗伯特·皮尔爵士的银行法的作用，奥维尔斯顿勋爵曾于 1857 年 7 月 14 日在这个委员会面前大唱起这样的赞美歌：

“由于严格而迅速地实现 1844 年法律的原则，一切都进行得有条理，很顺利；货币制度变得巩固而不可动摇；国家的繁荣毋庸置疑；公众对 1844 年

见本卷第 345 页。——编者注

法律的明智所寄予的信任与日俱增；如果委员会想进一步实际考察这项法律所依据的原则是否正确，或了解它所保证的良好结果，那末，对委员会的适当而充分的答复就是：请看看周围吧，看看我国目前的贸易状况吧，看看人民的丰足生活吧，看看我国所有各阶级的富裕和繁荣吧。在这样做过之后，就让委员会去决定，它是否应该取消这项已经收到这种结果的法律。”

六个月之后，这同一个委员会不得不因为政府停止了这一项法律的效力而向它表示祝贺！

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中，至少有五位财政大臣和前任财政大臣，这就是：迪斯累里先生，乔·康·路易斯爵士，格莱斯顿先生，查理·伍德爵士，弗兰西斯·贝林爵士，另外还有威尔逊先生和卡德威尔先生这两个一向替英国财政部出主意的人。除了这些人以外，参加委员会的还有英国官僚政治的一切大头目。事实上委员会里有二十多个委员，集中了财政经济方面的全部智慧。它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第一，1844年英格兰银行法的原则；第二，发行可以随时兑换的银行券对于贸易危机的影响；第三，最近这次危机的一般原因。我们想在这里简要地评论一下委员会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

1844年的法律禁止英格兰银行在没有黄金保证的条件下使银行券发行量超出1450万英镑，这项法律的议会教父罗伯尔·皮尔爵士和接受忏悔的牧师奥维尔斯顿勋爵，曾洋洋得意地自以为已经防止了那种在1815年至1844年期间周期地发生的金融紧张和恐慌。但是在十年中，他们的希望曾两度落空，尽管这项法律由于发现新的大金矿而获得了非常显著的、出乎意料的支持。从给委员会提供的证词中可以看出，1847年和1857年的恐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严重，更富于破坏性。政府不得不在1847年和1857年两度破坏银行法，来挽救英格兰银行和围着它旋转的金融

界。

委员会似乎应该从以下这两个极其简单的结论中选择一个：或者政府周期地破坏法律是正确的，那末法律本身当然就是错误的；或者法律是正确的，那末就应该禁止政府任意破坏它。但是读者能否相信，委员会居然会同时既认为法律必须存在下去，又认为它可以受到周期的破坏？法律的用处通常是限制政府的绝对权力。而在这里却恰好相反，把法律保存下来似乎只是为了保存行政方面绕过这一法律的绝对权力。政府那封授权英格兰银行按照现有的保证在 1844 年法律规定的货币流通限额以上进行贴现和发放贷款的公函，是在 11 月 12 日发表的，但是一直到 11 月 30 日，英格兰银行平均每天要把超过法定限额大约 50 万英镑银行券投入流通。11 月 20 日，非法增加的流通货币大约等于 100 万。在这以后，是否还需要证明，罗伯特·皮尔爵士“调节”货币流通的企图是多么有害无益？委员会认定“任何货币流通制度都不能使一个商业国家不遭受到它本身冒失从事的后果”，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个英明的意见并没有击中要害。问题不如说是在另一方面：立法措施是否能人为地加剧只是作为贸易危机的一个阶段的金融恐慌。

委员会在为银行法辩护时说道：

“毫无疑问，所说的这个法案的主要目的，是保证联合王国纸币流通量的变化符合于金属货币流通量所据以变化的规律。绝不会有人说这个目的没有达到。”

我们首先要指出，委员会没有对金属货币流通量所据以变化的规律表示自己的意见；原因是委员会担心它“不能得出某种没有重大意见分歧的结论”。在以罗伯特·皮尔爵士为首的硬币论者

看来,纯金属货币的流通应当随着汇兑行市而相应地减少或增加,这就是说,在行市有利时,黄金应该流入,行市不利时,黄金就应该流出。在前一种情况下,一般价格水平应该上升,在后一种情况下,则应该下降。但是如果假定价格的这种急剧波动是纯金属货币流通所固有的,那末约·斯·穆勒先生向委员会说,纸币流通的目的是纠正和防止这种灾难性的变化而决不是模仿它,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事实证明,硬币论者在推论时所依据的前提,只是他们的幻想的产物。在没有信贷业务因而没有纸币流通的国家里,黄金和白银的储备到处都聚集在私人手里;不久以前在法国大致就是这样,在所有亚洲国家到目前为止几乎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这样。当汇兑行市不利,造成贵金属外流的时候,这些储备由于提高贴现率而被吸引出来。汇兑行市一变而有利时,多余的贵金属又转为储备。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在流通中都不会产生货币空缺或者货币多余的现象。贵金属的流出和流入,影响私人储备的状况,而不影响货币流通的状况,因此丝毫不影响一般价格水平。那末,委员会替 1844 年的英格兰银行法的辩护,硬说这项法律在金融市场紧张时期能帮助造成价格的突然波动(委员会错误地以为这种波动是在纯金属货币流通的基础上发生的),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委员会却说,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法律至少保证了银行券的兑换,而这是英格兰银行的起码职责。委员会又补充说:

“按照 1844 年的法律规定,现在这家银行的金库里所保存的必要保证,比以往任何一次金融市场紧张时期所保存的保证都要多。在 1825 年的危机时期,金属储备减少到 1261000 英镑,在 1837 年减少到 3831000 英镑,在 1839 年减少到 2406000 英镑;但是它在 1844 年以后减少到的最低点是:在 1847 年为 8313000 英镑,在 1857 年为 6080000 英镑。”

首先，在这些恐慌时期，银行券的兑换之所以能够维持，并不是因为英格兰银行拥有足以履行义务的大量贵金属，而只是因为人们没有要求它用黄金支付。例如在 1825 年，英格兰银行发行了一镑券才算勉强应付了挤兑现象。如果认为 1847 年和 1857 年拥有比较大量的金属储备只是 1844 年的法律的结果，那末根据同样的理由，1857 年的金属储备在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涌现的情况下比 1847 年减少了两百多万英镑这一事实，也应该归咎于这项法律。虽然英格兰银行当时拥有的黄金比在 1825 年和 1836 年多一两倍，可是由于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法律，它在 1847 年和 1857 年都濒于破产。据英格兰银行的经理说，在 1857 年 11 月 12 日即财政部发表公函的那一天，银行部的全部准备金只有 580751 英镑；当时它的存款是 2250 万英镑，其中大约有 650 万英镑是属于伦敦各家银行的。如果没有财政部的这封公函，只好关门大吉。提高或降低贴现率——而英格兰银行承认，它没有别的办法来影响货币流通，——这是在 1844 年的法律颁布以前就已采用的办法，当然也是在它废除之后可以采用的办法。可是，英格兰银行说，董事们希望借助这项法律来维持他们的声望，不宜于“听任他们按照自己的智慧和决心行事”。平时，在银行法明明是一纸空文的时候，董事们希望有的确行使着这项法律的假象中找到支持，而在紧迫时期，即在这项法律唯一能起作用的时期，他们却希望借助政府的命令来摆脱它。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8 月 6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8 月 23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09 号

卡·马克思

* 英国的贸易危机和货币流通

在政治经济学上,也许没有比所谓发行银行能够通过扩大或缩减货币流通来影响一般价格水平这种看法更流行的误会了。认为银行滥发通货就会造成物价飞涨,只有在经过危机之后才能予以强行调整,这种看法是对任何一次危机的过分简单化的、因而也是极受欢迎的解释。应该了解,问题并不在于银行是否能促使建立虚假的信用体系,而在于银行是否能控制公众手中的货币数量。

恐怕未必有人会反对这样一点,即每一家发行银行的利益都促使它把自己发行的银行券尽可能多地保持在流通当中。如果世界上有一家银行,它不仅有这种愿望,而且还有实现这种愿望的能力,这当然是英格兰银行了。但是,如果我们来看一看例如从1844年至1857年这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发现,除了商业恐慌时期以外,这家银行尽管有着通过购买公债把自己的银行券投入市场的特权,尽管连续降低利率,也从来没有能使它投入流通的银行券达到法定的最高限量。然而,还有另一种更令人惊异的现象。在1844年至1857年这段时期,联合王国的贸易总额大约增加了两倍。而英国在最近十年的出口额,我们知道,增加了一倍。可是,与这种贸易的巨大增长的同时,英格兰银行的流通银行券数目实际上却减少了,而且还在陆陆续续地减少。

请看下面的数字：

年份	出 口 英 镑	银行券的流通 英 镑
1845	60110000	20722000
1854	97184000	20709000
1856	115826000	19648000
1857	122155000	19467000

可见，在出口增加了 62645000 英镑的同时，货币流通却减少了 1255000 英镑，虽然在同一时期，由于 1844 年的银行法，英格兰银行的分行数目增加了，与它竞争的地方发行银行的数目减少了，而它自己的银行券变成了地方银行的合法支付手段。可能有人以为，由新的富裕的金产地涌来的金币，排挤了英格兰银行的一部分银行券，夺去了原来为这些银行券占据的流通地盘。的确，在 1857 年担任英格兰银行经理的魏格林先生在下院的委员会上说道，据最有权威的人士估计，黄金流通在最近六年中增加了 30%。他本人认为，全部黄金通货目前达到 5000 万英镑。但是，金币数量的这种增加与纸币的减少很少联系，像五镑和十镑的这种比较小额的银行券（这是在零售贸易中和在商人与消费者的结算中唯一可以用金币代替的银行券），实际上反而在金属货币流通量增加的同时也有所增加。下面这个表说明这种增加的比例：

年份	五镑和十镑的银行券 英 镑	对全部流通银行券 的百分比
1845	9698000	46.9
1854	10565000	51.0
1855	10628000	53.6
1856	10680000	54.4
1857	10659000	54.7

因此，减少只限于票额较高的银行券，即从两百镑到一千镑的银行券。这种银行券所执行的那种国内流通的职能，严格说来，是几乎完全不用硬币的。这种银行券用得非常节省，因此尽管贸易扩大了，价格普遍提高了，小额纸币的流通量增长了，银行券的流通量总的说来还是在逐渐减少。两百镑到一千镑的银行券数量在 1852 年曾达到 5856000 英镑，而在 1857 年下降到了 3241000 英镑。在 1844 年，这种银行券还占银行券全部流通的 26%，在 1854 年就只占 20.5%，在 1855 年占 17.5%，在 1856 年占 16.9%，到了 1857 年则只占 16.7% 了。

大不列颠的纸币流通所以产生这种新的特点，是因为伦敦的股份银行与私人银行进行着有增无已的竞争，并且因为股份银行实行按存款付息而在手中积累了大量资金。伦敦的私人银行家在进行了长期的然而徒劳无益的抵抗以后，不得不于 1854 年 6 月 8 日同意股份银行参与票据交换所的业务，并且不久之后，最终结算就开始在英格兰银行内部进行了。由于现在各家银行在英格兰银行立有户头，每天的结算都用转账的办法进行，银行家们过去用来彼此清账的巨额银行券就失去了广泛使用的领域，因此大部分巨额银行券也就不再流通了。同时，伦敦所有九家股份银行的存款，按照它们发表的报告，已经从 1847 年的 8850774 英镑增加到 1857 年的 43100724 英镑。因此，银行对贸易的一般趋势和价格可能产生的影响，应该是通过它们的存款业务即信贷业务，而不是通过滥发银行券来实现的，因为银行并不能使银行券的流通量甚至达到早已规定的限额。

伦敦的一家最大商号的股东斯雷特先生向下院委员会提出的一个对每年流水达几百万英镑的交易的分析，令人信服地证明了，

英格兰银行的现款、黄金和银行券参加英国贸易批发交易的数量是多么少。1856年的收入和支出的数额只不过100万英镑，收支手段的情况如下：

收 入	
	英 镑
各银行的汇票和各种期限的期票	533596
各银行随时承兑的支票	357715
地方银行的银行券	9627
共 计	900938
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	68554
黄金	28089
白银和铜	1486
邮汇	933
共 计	99062
总 计	1000000
支 出	
	英 镑
各种期限的期票	302674
伦敦各银行的支票	663672
共 计	966346
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	22743
黄金	9427
白银和铜	1484
共 计	33654
总 计	1000000

这些数字可以作为对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批发贸易的说明。从中可以看出，在全部收入中，以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支付的还

不足 10%，而以黄金和白银支付的只占 3%。在支出中，以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支付的只占 2%，而以黄金和白银支付的只占 1%。另一方面，全部收入的大约 90%和全部支出的大约 97%都是用贸易者本人的账款和资金支付的。

根据对纽约各银行最近六年来的发行量的分析，我们必须得出同样的结论，即流通银行券的数量不是银行本身所能控制的，它们在贸易扩大和发生最终会引起崩溃的物价飞涨的同时，实际上有所减少。因此，把最近这次危机以及一般危机同滥发银行券联系起来庸俗看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必须予以抛弃。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8 月 10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8 月 28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14 号

卡·马克思 鸦片贸易史³⁸⁴

关于联军全权代表强迫中国订立新条约³⁸⁵的消息，大概引起了大大扩充贸易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幻想与第一次对华战争结束后商人们在 1845 年所浮现的幻想是一样的。即使彼得堡的电讯所传属实，是否能够完全相信，通商口岸的数目增多了，就一定会扩大对华贸易呢？是否能够指望 1857—1858 年的战争会比 1841—1842 年的战争导致更好的结果呢？要知道，有一件事是无可置辩的：1843 年的条约，不是扩大了美国和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而只是加速和加深了 1847 年的商业危机。现时的这个条约也是这样，它引起人们幻想取之不尽的市场，鼓励投机事业，可能在世界市场刚刚从不久以前的普遍恐慌中逐渐复元的时候，又加速酝酿一次新的危机。除了这个消极后果以外，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刺激了鸦片贸易的增长而使合法贸易受到损失，只要整个文明世界的压力还不能迫使英国不用强制办法在印度种植鸦片和不用武力在中国推销鸦片，那末这第二次鸦片战争将会产生同样的后果。我们不想详细讲述这种贸易的道德方面，关于这一点，连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都这样写道：

“可不是吗，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摧残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

的品格,没有腐蚀他们的思想,没有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贪得无厌的摩洛赫时时刻刻都要求给自己贡献更多的牺牲品,而充当凶手的英国人和吸毒自杀的中国人彼此竞争着向摩洛赫的祭台上贡献牺牲品。”³⁸⁶

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条件下,扩大对华贸易,就是扩大鸦片贸易;而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这些论点早在两年以前已经得到相当普遍的承认了。1847年为调查中英贸易关系的状况而委派的一个下院委员会,曾提出报告说:

“可惜我们应当承认:近来同这个国家的贸易处于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扩大我们的交往的结果并没有证实我们的合理的期望,自然,这种期望是以自由进入这个蔚为壮观的市场为依据的。我们认为,妨碍这种贸易发展的,根本不是由于中国不需要英国商品,也不是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竞争;花钱买鸦片——这消耗了所有的白银而使中国人一般的贸易遭受巨大的损失;他们不得不用茶叶和丝来支付其他商品。”

1849年7月28日的“中华之友”在概括这些事实时,十分肯定地指出:

“鸦片贸易在不断地增长。英国和美国对于茶叶和丝的需求增大,只会使鸦片贸易继续增长;工厂主的情况是不妙的。”

一位旅居中国的美国大商人给汉特所出版的1850年1月份的“商人杂志”³⁸⁷写了一篇文章,把对华贸易的全部问题归结如下:

“究竟哪一种贸易应该取消——鸦片贸易还是美英商品的出口贸易?”

中国人自己的看法也正是这样。蒙哥马利·马丁叙述道:

“我曾问过上海道台:在他看来,什么才是促进对华贸易的最好办法。他

当着英国领事巴富尔上尉的面立刻回答我说：“别再向我们运送那么多鸦片，我们就能够购买你们的产品。””

最近八年来的全部贸易史给这个论点提供了新的、十分明显的说明；但是在研究鸦片贸易对于合法贸易的有害影响以前，我们要谈一下这种不寻常的贸易产生和发展的概况。这种贸易，无论就那些构成它随之旋转的所谓轴心的悲惨冲突，或者就它对东西方之间一切关系所发生的影响而言，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

在 1767 年以前，由印度输出的鸦片数量不超过 200 箱，每箱约重 133 磅。中国法律许可输入鸦片供医疗使用，每箱鸦片纳税 3 美元左右；当时从土耳其贩运鸦片的葡萄牙人几乎是唯一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出口商。

1773 年，堪与埃芒蒂埃之流、帕麦尔之流以及其他世界闻名的毒品贩子并驾齐驱的上校沃森和副董事长威勒尔，建议东印度公司开始同中国进行鸦片贸易。于是在澳门西南海湾里下碇的轮船，建立起囤积鸦片的堆栈。但是这笔投机买卖没有成功。1781 年，孟加拉省政府派了一艘满载鸦片的武装商船驶往中国，而在 1794 年，东印度公司就派了一艘运载鸦片的大船停在黄埔——广州港的停泊处。看来，黄埔比澳门更适合于做堆栈，因为黄埔被选定做堆栈以后两年，中国政府才认为有必要颁布法令，用鞭笞和枷号示众的刑罚来威吓中国的鸦片走私商。大约在 1798 年，东印度公司不再是鸦片的直接出口商，可是它却成了鸦片的生产者。在印度，建立了鸦片生产的垄断组织，同时东印度公司自己的轮船被伪善地禁止经营这种毒品的买卖，而该公司发给同中国做买卖的私人船只的执照中却附有条件，规定这些轮船不得载运非东

印度公司生产的鸦片，否则要处以罚金。

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达到2000箱。如果在十八世纪时期，东印度公司与天朝之间的斗争，同外国商人与中国海关之间的一般争执具有相同的性质，那末从十九世纪初叶起，这个斗争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特征。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既禁止外国人输入这种毒品，又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卡·马克思写于1858年8月31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1858年9月20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33号

卡·马克思 鸦片贸易史³⁸⁸

正因为英国政府把在印度种植鸦片的垄断权据为己有，中国才采取了禁止鸦片贸易的措施。天朝的立法者对违禁的臣民所施行的严厉惩罚以及中国海关所颁布的严格禁令，都不能发生效力。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的官员。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东印度公司一手扶植的、虽经北京中央政府禁止而无效的鸦片贸易的规模日益增大，在 1816 年，鸦片贸易总额已将近 250 万美元。1816 年在印度允许自由贸易（唯一例外的是直到现在仍然被东印度公司垄断的茶叶贸易），这又大大推动了英国走私商人的活动。1820 年，偷运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 5147 箱，1821 年达 7000 箱，而 1824 年达 12639 箱。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向外国商人提出严重抗议，同时也惩办了一些与外国商人同谋共犯的行商，大力查办了本国的鸦片吸食者，并且在本国海关内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所有这一切努力的最终结果，正像 1794 年一样，只是使鸦片堆栈由不可靠的地点移到更适合于经营鸦片贸易的地点。鸦片堆栈从澳门和黄埔转到了珠江口附近的伶仃岛，在那里，具有全

副武装设备的、配备有很多水手的船只，成了固定的鸦片栈。同样地，当中国政府得以暂时禁止广州原有的窰口 营业时，鸦片贸易只是转了一道手，转到比较小的商人手里，他们不惜冒着一切危险和采用任何手段来进行这种贸易。在这些更有利于鸦片贸易的新条件下，鸦片贸易在 1824 年到 1834 年的十年当中，就由 12639 箱增加到 21785 箱。

1834 年，也像 1800 年、1816 年和 1824 年一样，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东印度公司不仅在那一年被取消了买卖中国茶叶的特权，而且必须完全停止一切商务。由于东印度公司从商务机关改组为纯粹的行政机关，对华贸易就完全转到了英国私人企业手里，它们干得非常起劲，以致不顾天朝的拚命抵制，在 1837 年就已将价值 2500 万美元的 39000 箱鸦片顺利地偷运入中国。这里有两件事要注意：第一，从 1816 年起，在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上，走私的鸦片贸易总是占着大得极不相称的比例。第二，就在英印政府对鸦片贸易的纯商业性利害关系逐渐消失的同时，英印政府对这种非法贸易在财政上的利害关系却日益增加了。1837 年，中国政府终于到了非立即采取坚决措施不可的地步。因鸦片的输入而引起的白银不断外流，开始破坏天朝的国库收支和货币流通。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许乃济，曾提议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并从中取利；但是经过帝国全体高级官吏一年多的全面讨论，中国政府决定：“这种万恶贸易毒害人民，不得开禁。”早在 1830 年，如果征收 25% 的关税，就会使国库得到 385 万美元的收入，而在 1837 年，公使收入增加一倍。可

是，天朝的野人当时拒绝征收一项必定会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增大的税收。1853年，当今的咸丰皇帝虽然处境更加困难，并且明知为制止日益增多的鸦片输入而做的一切努力不会有任何结果，但仍然信守自己祖先的坚定政策。En passant〔顺便〕要指出的是：这位皇帝把吸食鸦片当做邪教一样来取缔，从而使鸦片贸易得到了宗教宣传的一切好处。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了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顶点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焚毁走私的鸦片；这成了第一次英中战争的起因，这次战争又使中国发生起义，使帝国国库完全空虚，使俄国能够顺利地由北方入侵，使鸦片贸易在南方得到极大的发展。英国以签订条约结束了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华战争，虽然鸦片贸易为条约所禁止，可是从1843年起，鸦片贸易实际上还是完全不受法律制裁。1856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总值约3500万美元，同年英印政府从鸦片垄断贸易上得到了2500万美元的收入，即等于国家总收入的六分之一。造成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的那些事件，是不久以前才发生的，无需再作任何解释。

在结束我们的分析时，我们不能不特别指出装出一副基督教的伪善面孔、利用文明来投机的英国政府所具有的一个明显的内部矛盾。作为帝国政府，它假装同鸦片走私贸易毫无关系，甚至还订立禁止这种贸易的条约。可是作为印度政府，它却强迫孟加拉省种植鸦片，使该省的生产力受到极大的损害；它强迫一部分印度的莱特²²⁹种植罌粟，用贷款的办法引诱另一部分莱特也去种植罌粟。它严密地垄断了这种毒药的全部生产，借助大批官方侦探来监视一切：栽种罌粟，把罌粟交付指定地点，使罌粟的蒸晒和鸦片的调制适合于中国鸦片吸食者的口味，把鸦片装入为便于

偷运而特制的箱子，以及把鸦片运往加尔各答，在那里，鸦片由政府标价拍卖，国家官吏把鸦片移交给投机商人，然后又转给走私商人，由他们运往中国。英国政府在每箱鸦片上所花的费用将近 250 卢比，而在加尔各答市场上的卖价是每箱 1210 到 1600 卢比。可是，这个政府并不满足于这种实际上的共谋行为，它直到现在还直接跟那些从事于毒害整个帝国的冒险营业的商人和船主们合伙，分享利润和分担亏损。

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实际上不只是依赖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正是依赖这种贸易的走私性质。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时允许在中国栽种罂粟，这意味着英印国库会遭到严重的损失。英国政府公开宣传自由买卖毒品，暗中却保持自己对于毒品生产的垄断权。只要我们注意考察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几乎可以处处看到，它的“自由”的基础就是垄断。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9 月 3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9 月 25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38 号

卡·马克思 现代历史中又一奇怪的一章

1858年9月7日于伦敦

数月以前，我寄给你们一系列有关穆罕默德·贝伊（班迪亚上校）企图出卖切尔克斯人的文件。从那时以来，切尔克西亚战争中的这一奇怪的事件又增添了新的一章；各有关方面的宣言和反宣言，首先是引起了在君士坦丁堡的匈牙利和波兰流亡者之间的严重纠纷，其次是在伦敦的欧洲流亡者大本营内引起了就某些知名人士似乎与班迪亚一案有关的问题的激烈争辩。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各种色彩和各种民族的革命流亡者对“论坛报”刊载的一切是如何感到兴趣，所以我在没有亲眼看到载在君士坦丁堡各报上的、但对其真实性后来有所争论的那几封信的原件，从而完全证实上述案件的全部事实以前，故意没有再提这个问题。然而，如果对那旨在阻止做进一步调查和掩盖这一全部事件真相的怯懦伎俩不加以反对，我认为是一种失职行为。如果在革命流亡者中间有人想同俄国政府勾结，或者甚至站在像班迪亚这样一些职业间谍一边，那就让他们出来说话，拿出勇气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吧。

读者记得，班迪亚的供词和有关他的其余文件是由在切尔克

西亚的波兰部队的中尉斯托克带到君士坦丁堡的，他为自己的上司拉品斯基上校传递过紧急报告，当过审判班迪亚的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斯托克中尉在君士坦丁堡逗留了四个月，以便在必须由法院进行审理时为拉品斯基对班迪亚叛卖行为的控告的正确性作证。班迪亚在其供词中指控科苏特、施泰因将军、图尔上校和由科苏特领导的匈牙利流亡者的一部分人参与了他在切尔克西亚的阴谋。住在君士坦丁堡的波兰人在得到消息和斯托克中尉带来的文件后，没有马上相信班迪亚对他的同胞所提出的控告，由于怀疑这些文件的真实性，而决定将文件留了下来。他们在等待来自切尔克西亚的进一步的消息时，只在“东方新闻报”上登载了一篇关于穆罕默德-贝伊（班迪亚）的叛卖行为及军事法庭的判决的简讯。在这篇简讯登出之后，有几个匈牙利人到过他们那里，其中有图尔上校，他声称这篇简讯对他这个匈牙利人和全体流亡者来说是一种侮辱。然而当图尔看过从切尔克西亚带来的文件之后，起初他是非常无力地反驳班迪亚指控他曾亲身参与其事的说法，而后则高声地说应该把班迪亚绞死，并请波兰人派一个密使去说服塞弗尔-帕沙批准和执行军事法庭的判决。于是他就得到波兰人的许可，把班迪亚那封劝自己的同胞不要侵入切尔克西亚并且放弃反对波兰人的任何阴谋的信带去。

“至于我们的计划”，——班迪亚在该信中说，——“它们已彻底破灭，而我的命运正掌握在拉品斯基的手里。”

波兰人不仅把后来刊载在“论坛报”上的文件转交给了图尔和其他匈牙利人，而且还为自己的善意另外提供了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明。班迪亚在被判死刑后，为了博得审判官的好感和向他们证明他决心坦白招认他所知道的一切，曾向军事法庭庭长拉品斯

基说出他的同胞为反对奥地利所做的准备工作的全部经过。他告诉他，他们拥有何种资源，说出他们设有军械库的城市和受托保护这些仓库的人。波兰人马上就告诉匈牙利人他们所面临的危险，给他们看了与该案有关的全部未发表的文件，并且为了使匈牙利人相信这些文件将永不公布，提出要当着他们的面把文件加以密封，并盖上他们自己的印章。这些文件至今存在，密封的印记也仍完整无用。参加密封文件的人有图尔、土孔尼（塞里姆-阿加）、塔尔迈尔（艾敏-阿加）和以卡耳马尔为首的君士坦丁堡流亡者的其他首领。他们后来都在保护班迪亚的宣言上签了名。

图尔和波兰人会晤后不久，在巴黎的哈瓦斯通讯社的石印通讯上出现了一则有如下内容的电讯：

“在马赛收到的图尔上校的一封信揭露了‘东方新闻报’关于穆罕默德-贝伊上校的叛卖行为和被判罪的谎言。”

这条简讯曾被欧洲大部分报刊转载。同时有几个匈牙利人向“东方新闻报”编辑部提供了来自切尔克西亚的信件，信上说穆罕默德-贝伊并未被捕，而且仍旧和塞弗尔-帕沙保持着联系。班迪亚被宣扬为自由事业的受难者；拉品斯基上校被指控有伪造和其他罪行，而在君士坦丁堡的波兰人则被说成是他的同谋者。也进行了恐吓波兰人的可笑尝试。只是这时波兰人才在“论坛报”和伦敦“自由新闻”上公布了班迪亚的供词及有关该案的一系列文件。这时班迪亚已来到君士坦丁堡，他前往“东方新闻报”编辑部。该报编辑们对他说，他们发表了有关他的报道，因为他们毫无根据去怀疑这一报道的正确性，但是，如果班迪亚能够提出确凿证据来证明这一报道是谣传的话，他们准备辟谣。班迪亚只能回答说这一切都是谣言，说他是阴谋的牺牲者，而后来自动谈了

许多有关切尔克西亚事件的细节。当有人问他，他既是一名土耳其军官和切尔克西亚的总司令，怎么会写一封显然是给俄国菲力浦逊将军的，而且完全能证明对他提出的一切控告的信时，班迪亚随意应对说，他正在准备对硬说是他招认的供词给以答复，从而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难关。他最后说他要是在报上答复对他提出的控告；这个要求被接受了，但条件是不得在信中进行任何人身攻击。参加这次谈话的有一个法国军官，一个法国牧师和一个阿尔明尼亚政论家，他们表示愿意在任何法庭上出庭作证。4月25日，班迪亚第二次去报馆，把他的一封信交给了“东方新闻报”编辑部，这封信违背了约定的条件，充满了对拉品斯基上校和伊布拉辛-贝伊的卑鄙的攻击，但是信上没有提到斯托克中尉的名字，对班迪亚不幸的是，斯托克那时还在君士坦丁堡。这封信在按照编辑部的要求做了某些修改之后，在“东方新闻报”上发表了。下面是这封信的主要内容：

“我是伊布拉辛-贝伊和拉品斯基先生的卑鄙阴谋的牺牲者。去年12月31日傍晚，伊布拉辛-贝伊叫到我家里去进行私人谈话。我去了，身边没有带武器。伊布拉辛-贝伊的房间里早已聚集了我的敌人，我刚一走进去就被捕了，并于当晚被押往阿透尔比。因为我处在我的敌人们的控制之下，所以我的生命和我全家的生命都遭到极大的危险，如果不是切尔克斯人的威胁，我已被杀了。但是，切尔克西亚的领袖们终于在3月19日释放了我，现在该轮到拉品斯基、伊布拉辛-贝伊和塞弗尔-帕沙本人发抖和请求我宽恕他们对我所做的一切恶事了。只要我的一句话，就足以叫他们掉脑袋了……至于说到截获的证明叛卖行为的文件，或者切尔克西亚领袖们和欧洲军官举行过会议，以及什么判罪等等……所有这些有趣的细节都只不过是记者——拉品斯基先生的代理人 and 应声虫的虚构……冒充记述事件经过的文件——有一份摆在你们面前——是一种捏造，一部分是由T先生在君士坦丁堡假造的，并得到了拉品斯基先生的认可。这是一个策划已久、在我动身去切尔

克西亚后就准备好了的阴谋。这一文件是用来损害一个知名人士的名誉和向某一大国骗取金钱的。”

“东方新闻报”刊出这封信后没有几天，班迪亚怀着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动机，以他特有的厚颜无耻在“君士坦丁堡报”³⁸⁹上声明说，“东方新闻报”的编辑把他的信歪曲得使他不能承认是他自己写的。然而我见过信的原件，我认识班迪亚的笔迹，并且可以证明，他所抱怨的全部修改只不过是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代替了名字，开头增加了几句称赞“东方新闻报”编辑部报道准确的话。班迪亚的全部目的在于欺骗舆论。由于他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就决意——仿佛 *re bene gesta* [万事如意] 一样——按照风行的美德保持顽强的沉默。这时伦敦报纸上出现了两个文件：一个是由君士坦丁堡的匈牙利流亡者的领导人签名的，另一个是由图尔上校签名的。那些曾经把证明班迪亚有罪的文件加以密封的人，在头一个文件上表示相信“班迪亚能够为自己辩白清楚”，假装“认为穆罕默德·贝伊的全部案件只是与他个人有关的”和“没有任何国际性的问题”；同时他们咒骂拉品斯基上校的朋友们是“存心在两个流亡团体之间散布不和的魔鬼”。在这时一变而为阿罕默德·基阿米尔·贝伊的图尔，在信中说：

“刚一听说穆罕默德·贝伊到达君士坦丁堡，我就由卡巴特上尉（波兰人）陪同去见他，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报上公布的备忘录中所有的供词是否确实。他回答说，他曾被阴险地逮捕起来并被送交波兰人组成的委员会审判，然而在该委员会审讯两次之后，在切尔克西亚的一支由 82 个人组成的波兰部队的指挥官拉品斯基先生来到他被囚禁的地方，对他说：他在委员会上的一切供词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好处，而为了帮助他（拉品斯基）的计划，他（穆罕默德·贝伊）应该亲手写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事先已由拉品斯基拟好和写就。他（穆罕默德·贝伊）拒绝抄写交给他的第一份备忘录，即报上公布过的

那份备忘录。这时拉品斯基将它部分地改动了一下，弄成了第二份备忘录，他（穆罕默德·贝伊）抄写了它并在上面签了名；他是在威胁之下做这件事的，因为不然就要被枪毙，从而失去对指控进行申辩的机会，而拉品斯基是一定会用指控来玷污他死后的名声的。这一文件的原件至今谁也没有见过。

听了穆罕默德·贝伊这一番话之后，我无法断定，两人之中谁是坏蛋。”

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到，图尔认为，班迪亚在自己的供词上签过名不过是出于拉品斯基的逼迫，害怕拉品斯基的威吓，而班迪亚本人却说，他的供词是在君士坦丁堡，甚至在他动身去切尔克西亚之前就假造好了的。

当塞弗尔·帕沙的信件和许多切尔克斯人到达君士坦丁堡时，所有这些鬼蜮伎俩终究被揭穿了。切尔克斯人的代表团访问了“东方新闻报”的一个编辑，证实了已经公布的班迪亚贩卖行为的一切详细情况，并表示准备当着班迪亚本人和无论多少证人的面手按可兰经发誓来证明自己的证词的正确。然而班迪亚不敢接受这一公意审判，图尔、土孔尼、卡耳马尔、维莱什以及其他庇护他的人也不坚持要他出面证明自己的无辜。

还在对俄战争时，法国大使图温奈尔先生，就往巴黎写信索取有关班迪亚的情报；回信说，班迪亚是一个谁给钱就为谁服务的间谍。图温奈尔先生曾要求把他骗逐出阿纳帕，但是班迪亚借助科苏特的介绍信为自己作了辩白。对于我们上面谈过的匈牙利宣言中呼吁各族人民亲密团结的号召，波兰人以充分的权利作了如下的回答：

“你们向我们谈论各族人民的亲密团结；我们给你们看了在喀尔巴阡山峡谷中，在特兰西瓦尼亚驿道上，在蒂萨河和多瑙河平原上的这种亲密团结的榜样。匈牙利人民不会忘记这点。忘记这点的是那些在1848年投票表决数百万弗罗伦和投票赞成派1000人去反对意大利的立宪派分子，忘记这点的

是那些在 1849 年向俄国祈请国王的共和派分子，忘记这点的是那些正当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战争进行得热火朝天时要求把全体瓦拉几亚人民赶出匈牙利国土的国家领袖们，忘记这点的是在美洲流浪的街头演说家。他是否至少向美国人（他们过去付钱给他就同他们现在付钱给劳拉·孟戴斯或珍妮·林德一样）说过，他这个最先离开了自己的正在灭亡的祖国、最后离开这个走向苦难的浴满鲜血的国家的街头演说家，是一位年老的将军、英雄、波兰人——贝姆？’

为了补充我们的报道，我们把拉品斯基上校的信附在下面：

拉品斯基上校致……帕沙

（信的摘录）

切尔克西亚，阿迭尔比……

阁下：自从我因答应您的请求和信任您的诺言而来到这里已经快两年了。我没有必要提醒阁下，您是怎样履行了这一诺言的。我在这里没有武器，没有衣服，没有金钱，甚至没有足够的食物。

我希望所有这些不是来自阁下的某种恶意，而是由于其他原因，特别是由于您和那些同贵国利益背道而驰的人们的不幸的联系。一年来，人们硬塞给我一个最狡猾的俄国间谍。我靠上帝的帮助挫折了他的阴谋，让他知道我明白他是干什么的，现在我已控制住他。恳求阁下和匈牙利人断绝一切联系，特别是您要设法摆脱施泰因和图尔——这是些俄国间谍。其余的匈牙利人都在为俄国人服务，有一些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一点。不要被各种各样的开设工厂、开采矿山和扩大贸易的计划所欺骗。这样花费的每一文钱都是白费——而图尔先生的全部努力都放在这上面，他只希望您把钱花在既于贵国无益，又于俄国无害的方面。我们这里需要：火药制造场、铸币机、小型印刷机、磨面机和武器，我们这里的武器不仅质量不好，而且比君士坦丁堡贵一倍；就连本地不像样的马鞍也要比法国的军用马鞍多花一倍的钱。至于说到矿场，有这种想法就是很幼稚的。在这里，每一文钱都应当用来保卫国家，而不是用来进行投机。把您全部的钱财用来训练军队吧；这样您不仅将有助于贵国的安宁，而且还可以加强您个人的影响。不要因为想使某一派拥护您而浪费您的钱财。目前国内的局势表面上是平静的，但实际上形势却危险之至。

塞弗尔·帕沙和纳伊勃 尚未和解，这是因为俄国间谍在阻碍他们。不要吝惜您将要花在训练这里的军队上的钱。钱只有这样才算花得有益处。不要去想炮。我是一个研究过炮兵的人，我很了解炮的价值。我动身前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起初俄国人被炮火击溃了，可是现在他们对炮火则置之一笑。在我设置两门炮的地方，他们则设置 20 门；如果我将来没有正规部队来保护我的大炮（而切尔克斯人不会保护它们），那末俄国人就会夺去它们，而我们自己也就会成为它们的俘虏。

还有一句话。我和我的人，帕沙，都准备为保卫贵国而献身，并且从今天起过八个月，我要把我的部队增加到 600 名射手，260 名骑手，260 名炮手，如果您能给我送来他们所必需的一切弹药和武器的话。

如果在两个月之内我什么也得不到，我就将搭船回土耳其，那末全部过错就要落在您身上，而不是落在我身上和波兰人身上。我不打算利用切尔克斯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不打算欺骗他们。如果我不能适当地为他们和我本人的事业服务，那末我就离开他们。

我已派斯托克去君士坦丁堡。我建议您把您所能给的一切都交给他，并立即将他遣回。愿上帝保佑您。恳求您什么也不要拖延。一分钟也不要放过，否则您就会为损失的时间付出重大的代价。

拉品斯基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9 月 7 日
载于 1858 年 9 月 23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436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 英 中 条 约

1842年8月29日由亨利·璞鼎查爵士签署的、并且像一切新近与中国订立的条约一样是在炮口的威逼下订立的中国条约，从商务观点上看来，是不成功的；现在甚至英国自由贸易派的著名机关刊物、伦敦的“经济学家”也承认了这一点。这家杂志曾经是不久以前发生的入侵中国事件的最积极的赞助者之一，现在它觉得自己应该“抑制一下”某些方面人士所抱的乐观期望。“经济学家”杂志把1842年的条约对于英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看做是“应该使我们防止错误行动的后果的先例”。这当然是明智的劝告。但是威尔逊先生为了说明用武力扩大西洋商品在中国的市场的最初企图遭到了失败而举出的理由，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他说：在璞鼎查订立条约以后的最初三年中，中国市场上由于投机而发生商品过多的现象，英国商人不注意中国需求的性质，是造成这次严重失败的第一个重要原因。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在1836年是1326388英镑，在1842年下降到960000英镑。它在以后四年中的不断迅速增长情况表现为下列数字：

即1842年8月29日中英两国缔结的南京条约。——译者注

年代	英 镑
1842	969000
1843	1456000
1844	2305000
1845	2396000

可是，到 1846 年，不仅出口额降低到 1836 年的水平以下，而且伦敦从事对华贸易的商行在 1847 年危机时期遭到的灾难也证明：官方报告统计表中所列的 1843 年至 1846 年出口的计算价值同出口的实际价值一点也不符合。由此可见，如果说英国出口商在卖给中国消费者的商品数量上计算错误，那末他们在商品种类的选择上也同样有错误。为了证明后一种说法，“经济学家”杂志援引了前伦敦“泰晤士报”驻上海和广州通讯员温·库克先生的一段话：

“1843 年、1844 年和 1845 年，当北方各通商口岸刚刚开放的时候，英国人抱着一种难以言状的跃跃欲试的心情。设非尔德一家有名的商行向中国运去了大批餐刀和餐叉，并且声明它准备给全中国供应刀类制品。这些商品的卖价几乎抵不上运费。另一家极有名的伦敦商行向中国运去了大批钢琴，这些钢琴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刀类制品和钢琴的遭遇，也光临到毛织品和棉织品，不过形式没有那么尖锐。当各通商口岸开放的时候，曼彻斯特盲目地做了一番巨大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失败了。从此以后，它就消极等待，只把希望寄托在偶然性上。”

最后，“经济学家”为了证明贸易的缩减、稳定和增长要取决于对消费者需求的考察，还从上述那位作者那里引用了 1856 年的材料：

	1845 年	1846 年	1856 年
精梳毛织物(匹) ...	13569	8415	7428
羽毛布	13374	8034	4470

粗哔叽	91530	75784	36642
毛织品	62731	56996	88583
印花布	100615	81150	281784
平纹棉布	2998126	1854740	2817624
棉纱 (磅)	2640098	5324050	5579600

但是，所有这一切论据和例证，除了说明继 1843—1845 年之后市场过于饱和而起的反应以外，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贸易的骤增为贸易的大大缩减所代替，或者新开辟的市场充斥了剩余的英国商品，此外，向这个市场抛售商品时，对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和购买力缺乏精确的估计，这种现象决不是对华贸易所特有的。实际上，这是世界市场历史上一种普通的现象。拿破仑垮台以后，欧洲大陆开放通商，那时从英国的进口与大陆的购买能力这样大不相称，以致“由战争转向和平”比大陆的封锁本身具有更大的灾难性。坎宁承认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也促进了 1825 年商业危机的发生。为适应莫斯科的气候而定做的商品，当时被运往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再说，今天甚至连澳大利亚，尽管它有巨大的潜力，也没有摆脱一切新市场所共有的命运，那里堆满了商品，既没有消费者也没有足够的支付手段来吸收它们。中国市场的特点是：自从它根据 1842 年的条约开放以来，中国的茶叶和丝向大不列颠的出口额不断增长，而英国工业品对中国的进口额，整个说来却没有变化。这种有利于中国的继续不断增长的贸易差额，可以说同俄国和大不列颠之间的贸易差额的状况相似；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是由于俄国施行了保护关税的政策，可是中国的进口税却比任何一个同英国通商的国家都低。1842 年以前，中国对英国的出口总额，大约等于 700 万英镑，1856 年约达到 950 万英镑。

而输入大不列颠的茶叶数量,在 1842 年以前从未超过 5000 万磅,在 1856 年,大约增加到 9000 万磅。另一方面,英国进口中国丝,只是从 1852 年起才具有巨大的意义。关于它的增长情况,可以从下列数字中看出:

	1852 年	1853 年	1854 年	1855 年	1856 年
丝的进口额(磅)	2418343	2838047	4576706	4436862	3723693
价值(英镑)	—	—	3318112	3013396	3676116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看一看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额的变动:

年代	英 镑	年代	英 镑
1834	842852	1836	1326388
1835	1074708	1838	1204356

关于 1842 年市场开放和英国得到香港以后的时期;我们有下列材料:

年代	英 镑	年代	英 镑
1845	2359000	1853	1749597
1846	1200000	1854	1000716
1848	1445950	1855	1122241
1852	2508599	1856	2000000 以上

“经济学家”杂志企图以外国的竞争来解释为什么英国工业品对中国市场的输入会停滞和相对地减少,并且再一次援引库克先生的话来加以论证。按照这位权威人士的意见,在中国市场上进行的正当的竞争使英国人在许多商业部门内遭到失败。他说,美国人在输出斜纹布和被单布方面胜过了英国人。1856 年,输入上海的美国斜纹布是 221716 匹,而英国是 8745 匹;美国被单布是

14420 匹，而英国是 1240 匹。另一方面，在羊毛商品的贸易方面，似乎德国和俄国大大地排挤着他们的英国竞争者。我们不需要其他的证明，仅凭这些例子就可以看到：无论库克先生或是“经济学家”杂志对于中国市场的估计都是错误的。他们硬说英中贸易有它的特点，其实美国和天朝之间的贸易也带有这些特点。1837 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超过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约 86 万英镑。在 1842 年条约订立以后的时期中，美国每年平均得到 200 万英镑的中国产品，而它以总值 90 万英镑的商品来支付中国产品。1855 年，上海的进口总额达 1602849 英镑（硬币和鸦片不算在内），其中英国所占份额是 1122241 英镑，美国所占份额是 272708 英镑，其他国家所占份额是 207900 英镑；而上海的出口总额达 12603540 英镑，其中英国所占份额是 6405040 英镑，美国所占份额是 5396406 英镑，其他国家所占份额是 102088 英镑。我们只消把美国对上海的 272708 英镑出口额同美国从上海得到的 500 万英镑以上的进口额对比一下。如果美国的竞争仍然使英国的贸易蒙受若干重大的损失，那末，这表明中国市场要容纳外国的全部贸易活动是多么有限。

人们用来说明中国进口市场自 1842 年开放以来意义不大的最后一个原因，就是中国革命³⁹⁰；可是，尽管发生了这次革命，1850—1852 年对中国的出口，仍然随着贸易的一般增长而增长了，而鸦片贸易在整个革命时期，不但没有缩减，反而迅速达到了很大的规模。然而无论如何，这是很明显的：由于最近这次海盗式的战争和统治王朝遭到的新的屈辱，帝国内部的纷乱不宁对外国进口所造成的一切障碍，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我们仔细地考察了中国贸易的历史以后得出的结论是：一般

说来：人们过高估计了天朝老百姓的需求和购买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下，谈不上什么大宗进口外国货。尽管如此，只要取消鸦片贸易，中国可以在它对英美贸易大致出超 800 万英镑这个数字的范围内逐渐地吸收更多的英美商品。这是从分析下面这个简单事实而自然得出的结论：尽管有着贸易顺差，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流通却因为鸦片输入总额约达 700 万英镑而陷于严重的破坏状态。

然而，惯于吹嘘自己道德高尚的约翰牛，却宁愿用海盗式的借口经常向中国勒索军事赔款，来弥补自己的贸易逆差。他只是忘记了：如果兼施并用迦太基式的和罗马式的方法去榨取外国人的金钱，必然会在这两种方法之间引起相互冲突和相互消灭。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9 月 10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10 月 5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46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英国的贸易和金融

1858年9月14日于伦敦

我们在评论下院委员会关于1857—1858年危机的报告时，首先指出了罗伯特·皮尔爵士的银行法的有害倾向，其次揭穿了所谓发行银行只要随意扩大或缩减纸币流通就能影响一般价格水平的错误看法。于是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危机的真正原因呢？委员会宣称，它已“满意地查明，英国、美国和北欧最近一次贸易危机无疑地主要是由过度投机和滥用信贷造成的”。这个结论的价值，自然不会因为世人无需下院委员会的帮助就能得出它，不会因为社会从这个启示中所能吸取的一切教训目前已经失去任何实际意义，而有丝毫减少。假定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而我们根本不想来反驳它，——但是它能解决社会问题，还是只能改变问题的提法呢？要产生空头信贷制度，总是需要有借款人和放债人这两个方面。借款人总是想利用别人的资金来做买卖，竭力使别人冒险而自己发财，——这种意图是这样明显，以致相反的意图对于我们说来简直不可理解。问题倒不如说是在另一方面，即怎么可能在所有的现代工业国里，人们竟抵抗不住最明显的幻

想的影响，不顾每隔十年就重复一次的最严重的警告，而周期地屈从于和自己的资金分手的强烈愿望呢？是什么社会条件几乎有规律地反复造成这种普遍自欺、过度投机和空头信贷的时期呢？只要我们对这些社会条件哪怕进行一次细心的观察，我们就会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社会能够控制这些社会条件，或者是这些社会条件是现在的生产制度所固有的。在前一种情况下，社会能够防止危机；在后一种情况下，只要这个制度还存在，危机就必然会由它产生出来，就好像一年四季的自然更迭一样。

我们认为，不仅最近的议会报告，就连“关于 1847 年贸易危机的报告”以及所有以前发表的其他类似的报告，都有这样一个重大的缺点：它们把每一次新危机都解释成第一次在社会地平线上出现的孤立现象，因而说它仿佛是由只为一个时期即两次震荡之间的时期所特有的（或者被认为是只为这一个时期所特有的）那些事件、运动和因素造成的。如果物理学家也采用这种幼稚的方法，那末甚至彗星的出现也会每一次都使世人惊慌失措了。要想弄清那些左右世界市场危机的规律，必须不仅说明危机的周期性质，而且也要说明这种周期性的准确日期。此外，决不能容许每一次新的贸易危机所固有的特点遮掩所有各次危机共有的特征。如果我们要在这里给这种研究描绘出一个哪怕是最一般的轮廓，那就会超出本文的任务。大概谁也不会反对这一点，即委员会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而且也未能正确地提出问题。

委员会为了说明空头信贷制度而提出的那些事实，当然并不新颖。这个制度本身，在英国是用非常简单的方法来实现的。空头信贷是通过空头期票建立的。空头期票主要是在地方股份银行

贴现，地方股份银行又把它们拿到伦敦的期票经纪人那里去再贴现。伦敦的期票经纪人只注意银行的背书，而不注意期票本身，他们所倚靠的又不是他们自己的资金，而是英格兰银行给他们提供的可能性。关于伦敦期票经纪人的原则，可以听听利物浦市银行前任行长狄克逊先生向委员会叙述的这件趣闻：

“在关于整个这件事情的一次偶然的谈话中，一位期票经纪人指出，如果没有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法律，市银行也不致于停止支付。在回答这一点时，我说道，无论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法律有什么优点，我都懒得插手去帮助市银行渡过困难，如果我知道这样会促使现在实行的这种有害的经营制度继续下去，接着我又加了一句，如果我在接任行长以前对市银行的业务所了解的情况，抵得上你由于看到市银行的大量贴现期票而应该了解到的一半，你就永远不会看到我成为股东了。”对这点的回答是：“但是你也看不到我是股东；搞期票贴现对我说来非常有利，然而我也不会同意做什么股东。”

在胡乱经营方面首屈一指的，大概是利物浦市银行、格拉斯哥的苏格兰西区银行以及诺森伯兰和德勒穆的地方银行；委员会曾极其仔细地研究过它们的业务。格拉斯哥的西区银行，在全苏格兰有 101 家分行，并且与美国有业务联系，它仅仅为了收取佣金而接受期票；它在 1854 年把股利从 7% 提高到 8%，在 1856 年又从 8% 提高到 9%，甚至在 1857 年 6 月，它的大部资金已经耗光，它还宣布股利为 9%。由它贴现的期票在 1853 年是 14987000 英镑，在 1857 年增加到了 20691000 英镑。这家银行在伦敦进行的再贴现，在 1852 年为 407000 英镑，在 1856 年增加到了 5407000 英镑，虽然该银行的全部资本一共才有 1500000 英镑；它在 1857 年 11 月破产时所有的 1603000 英镑，只是麦克唐纳、蒙提思、华莱士和派蒂逊这四家公司的欠款。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根据一种独特的“保证”发放贷款，也就是：给工厂主供应

资金，其保证在于将来出售预定用这笔预支的贷款制造出来的产品。对于贴现业务的轻率态度，可以从下面这事实看出来：麦克唐纳公司的期票曾有 127 个不同的人和公司承兑；可是只对 37 个的情况进行了查询，并且关于其中 21 个的反应是令人不满的或者是很坏的。然而麦克唐纳公司的信用贷款并没有减少。从 1848 年起，银行的账簿上就玩弄改头换面的把戏，把债务变成了信贷，把亏损变成了资产。

在报告书中说道：“要理解这种弄虚作假的方法，也许最好是看一看：在另一个资产栏中的一项称做斯卡特的债务是如何勾销掉的。这项债务共 12 万英镑，本应列为拒付期票。但是它被用斯卡特的期票承兑人的名字分立了四五个无担保信用贷款户头。这些户头的贷方记他们各自承兑期票的数目，并且几个债务人保了 75000 英镑的人寿险。从这笔保险费中，银行付出了 33000 英镑的保险费。现在这一切都作为资产记在账簿上。”

最后，调查结果表明，银行自己的股东还欠银行 988000 英镑。

诺森伯兰和德勒穆地方银行的全部资金只有 60 万英镑，可是这家银行还是把大约 100 万英镑借给了无偿还能力的德温特铁厂公司。虽然这家银行的主要人物，事实上主持银行一切事务的乔纳森·理查逊先生本人并不是德温特公司的股东，但是他对于这个没有前途的企业却极其关心，因为他可以从开采铁矿的地区收取地租。所以，这事实可以作为股份银行的全部资本完全被行长用于私人投机目的的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委员会报告中这两个揭露的实例，给股份企业的道德原则和一切事务投上了相当阴暗的影子。显然，这些制度——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价再高也不为过的——还远没有

为自己创造出适当的结构。它们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但是它们还没有像中世纪的帮会那样，形成自己团体的良心，来代替它们那由于组织本身的缘故而摆脱了的个人责任感。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9 月 14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8 年 10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45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 印度起义

在夏季炎热多雨的月份里,印度的战事几乎完全陷于停顿了。科林·坎伯尔爵士在夏初经过一番奋战,掌握了奥德和罗希尔汗的一切重要阵地以后,非常明智地把自己的军队驻扎下来:让旷野地带留在起义者手里,而集中自己的力量维持交通线。这个时期,在奥德只发生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件,这就是:霍普·格兰特爵士出兵夏冈季去营救经过多次推托才在不久以前同英军讲和,而现在遭到过去的土著同盟者封锁的土著领袖曼·辛格。这次出兵不过是一次军事漫游,虽然中暑和霍乱也一定会使英军遭受很大的损失。土著士兵不战而逃,于是曼·辛格就和英军会合了。虽然这次征讨的轻易取胜还不能说明整个奥德也将同样容易地被征服,但这仍然说明起义者的士气已丧失净尽。如果说在英军方面重要的是在热天进行休整,那末对于起义者来说重要的是尽量袭扰英军。但是土著士兵不去组织活跃的游击战、截断敌人占领的城市之间的交通、伏击小股敌人、扰乱粮秣的征发、切断粮食的供应(没有粮食,英国人占领的任何大城市都无法维持),反而满足于征收捐税和安享敌人留给他们的空闲时间。不仅如此,他们之间似乎还发生了内讧。他们看来也没有利用这几个星期的安静时间重整自己的力量,补充弹药,补充已经损失的大炮。这次在夏冈季的溃败比

以前任何一次失败都更能说明,他们对自己和自己的领袖缺乏信心。同时,大多数领袖和英国政府之间都有着秘密的信件来往,英国政府终于认识到,把奥德的全部土地装进自己的口袋是相当不实际的,而情愿在适当的条件下把它归还原主。这样,既然英国人的最后胜利目前已无疑义,奥德的起义看样子将不经过积极的游击战争阶段而平息下去。一旦大多数地主与英国人达成协议,起义者的队伍将立即瓦解,其中那些有充分根据害怕政府的人会成为土匪(dacoits),而农民是乐于协助捕捉他们的。

奥德东南部的贾格迪斯普尔密林似乎是这种土匪集聚的中心。这些难以穿越的竹林和灌木林为阿马尔·辛格率领的一支起义队伍所占据。阿马尔·辛格对游击战显得相当积极而有经验;总之,他不消极等待,一有可能就去袭击英军。如果像有人担心的那样,一部分奥德起义者在阿马尔·辛格还没有被赶出他的据点以前就同他会合,英军就要面临比最近一个时期更为艰巨的任务。起义队伍把这些密林作为隐蔽之处已将近八个月了,他们使加尔各答到阿拉哈巴德的干线大道这条英军的主要交通线受到严重的威胁。

在印度西部,瓜廖尔的起义者仍遭到罗伯茨将军和霍姆斯上校的追击。在瓜廖尔被攻占时,退却的军队选择哪个方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在整个马拉提人地区和拉吉普坦纳部分地区,只要有一支足够强大的正规部队开到,形成起义的核心,看来就会立刻爆发起义。瓜廖尔部队向西南方向退却,在当时似乎是实现这一计划最有利的机动。但是,起义者由于某些根据现有情报还猜测不出的理由,却选择了西北方向。他们向贾普尔进发,从那里向南折往乌代普尔,企图达到通向马拉提人地区的道路。但是这一迂回运

动使得罗伯茨乘机赶上了他们,并且不费多大力气就把他们完全打败。这支队伍的残部没有火炮,没有组织,没有弹药,也没有声望卓著的领袖,因此不大可能引起新的起义。相反地,他们携带的妨碍他们一切行动的大量抢来的财物,看来已经激起了农民的贪欲。农民杀死每一个掉队的西帕依,取走他身上的金币。情况既然如此,罗伯茨将军就可以放心地让农村居民去把这些西帕依全部驱散。辛迪亚的财宝被他本人的军队抢劫,竟使得英国人免于在一个比印度斯坦更危险的地区遇到新的起义,要知道,在马拉提人地区爆发起义会使孟买的军队受到相当严重的考验。

在瓜廖尔附近又发生了新的起义。辛迪亚的一个小藩臣曼·辛格(不是奥德的那个曼·辛格)参加到起义者方面来,并占领了不大的鲍里要塞。但是这个要塞已被英军包围,不久必定会被攻下。

这时,被征服的各州渐渐趋于平定,据传,约·劳伦斯爵士已使德里四郊完全平静下来,欧洲人可以不带武器和警卫人员而非常安全地到处游逛。其实这是因为每一个村庄的居民要对本村发生的任何罪行或暴乱共同负责;英国人组织了宪兵队;更重要的是到处实行了使东方人产生特别强烈印象的军事法庭的紧急诉讼程序。不过,这种顺利的情况看来是个例外;因为我们没有听说其他各地有类似这样的事。罗希尔汗、奥德、班得尔汗以及其他许多大省份完全平定下来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还要英国军队和军事法庭做不少事情。

但是当印度斯坦的起义缩小到几乎没有任何军事意义的时候,在和阿富汗接壤的遥远地区却发生了将来可能引起很大困难的事件。在德腊-伊斯马伊耳汗的几个锡克团里发现了刺杀军官

和起义反英的密谋。这一密谋蔓延的范围有多么广，还很难说。也许，这只是在个别锡克人集团中间发生的地方性事件，但是我们还不能断然肯定这一点。无论如何，这是极其危险的征兆。现在英军中约有 10 万锡克人，而且我们听说过，他们是何等强悍；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今天给英国人打仗，而明天也许就会按上帝的意旨起来反对英国人。他们勇猛、暴躁、变化无常，因此甚至比其他东方人还要容易出人意料地突然冲动起来。如果他们中间真正发生起义，那末英国人的确很难支持得住。在印度土著居民中间，锡克人一向是英国人最难对付的敌人；他们建立过相当强盛的国家³⁹¹；他们属于婆罗门教的一个特别支派，既仇恨印度教徒，又仇恨伊斯兰教徒。他们曾看到英国的《raj》[“统治”]岌岌可危；他们也曾为恢复它费了很大力气，而且甚至自信，他们在这一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他们产生了这种念头，认为英国的统治由锡克人的统治取代的时机已到，认为应当由一位锡克皇帝从德里或加尔各答来统治印度，这不是非常自然的吗？可能这种念头在锡克人中间还很不成熟，可能他们在军队中被安插得很巧妙，以致他们的力量为欧洲人所抵销，因此任何起义都能够很容易地被镇压下去；但是，我们认为，凡是读过关于锡克人在德里和勒克瑙事件后所作所为的报道的人，一定都会看出，他们中间确实存在着这种念头。

尽管如此，目前英国人毕竟又重新征服了印度。由孟加拉军哗变掀起的伟大起义，看来是真的平息下去了。但是，这再次的征服并没有加强英国对印度民心的控制。英军在所谓土著居民暴虐残杀这种夸大和捏造的传说驱使下所进行的残酷报复，以及整批和零星地没收奥德王国的企图，并没有使胜利者博得任何特殊

的好感。相反地，他们自己都承认，无论在印度教徒或伊斯兰教徒中间，对基督徒入侵者的宿仇旧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深了。也许这种仇恨目前还没有力量，但是可怕的乌云既已笼罩着锡克人的旁遮普，它并不是没有重要意义的。而问题还不止于此。英国和俄国这两个亚洲大国现在都在争夺西伯利亚和印度之间的一个地点，在这里俄国和英国的利益必然要发生直接冲突。这个地点就是北京。不久，从这里向西横过整个亚洲大陆，将形成这些互相敌对的利益不断发生冲突的一条线。这样，“西帕依和哥萨克相遇于奥克斯斯平原”的日子可能确实不会很远了，如果这件事真正发生的话，那末 15 万印度土著士兵的反英情绪将是一个值得严肃考虑的问题。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9 月 17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10 月 1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4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马志尼的新宣言

1858年9月21日于伦敦

由于热那亚的“上帝和人民”这家在意大利国土上出版的最后一家共和派报纸，终于受不住撒丁政府的不断迫害而宣布停刊，顽强不屈的马志尼在伦敦创办了一家意大利文报纸——取名《Pen- siero ed A zionc》（“思想和行动”）的半月刊。

我们就是从该报的上一期中翻译了他的一篇新宣言，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使读者能够自己判断聚集在罗马三执政旗帜下的那部分革命流亡者的生命力和前途。马志尼并没有研究那些使1848—1849年的革命遭到失败的巨大社会因素，也没有试图描绘那些在过去十年里无形中成熟起来并且一齐为新的更强大的运动奠定了基础的真实条件，在我们看来，他又重新回到他以前的幻想里，给自己提出一个臆造的问题，自然也就只能得出虚假的解决办法。他仍然认为何以流亡者作为一个团体未能实现他们想革新世界的意图这个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并且他仍然在兜售医治他们的政治瘫痪症的万应灵药。他说：

“我在1852年给欧洲民主派的备忘录中就问过：现在党的口号，党的战斗口号应当是什么？答复很简单。只有两个字——行动，不过是联合的、全欧洲的、不断的、彻底的、大胆的行动。你们只有有了对自由意识，才能

争取到自由，而你们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取得这种意识。你们的命运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里。世界在等待着你们。只要哪里的人们准备起义，准备战斗，并且必要时为了挽救全体而准备牺牲，只要哪里的人们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上帝、人民、正义、真理、美德，那里的人们就能率先发动。为了大家而起义，大家就会跟着前进。全党必需清楚地了解这点。每个人都可以继续探讨他认为已经略窥端倪的解决办法，但是请他不要带上个人的色彩，不要背离这支未来的大军…… 我们并不就是民主主义；我们只不过是它的先锋。我们的任务只是为它扫清道路。我们需要的是群策群力…… 自从这个呼吁发出后，六年过去了，而情况依旧。党的力量在数量上是增长了，可是党的统一还没有达到。几个有组织的小集体，以其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和令敌人感到的恐惧，证实了团结的力量；可是党的大部分党员依然是一盘散沙，因而无能为力。少数忠心耿耿的人，不能容忍这种可耻的无所作为的情况，像 *tirailleurs*（自由射手）那样在整个战线上东攻西打，每个人都冒着自己个人的风险，只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而没有对共同目标的理解；他们力量太弱，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取得胜利，他们只是抗议和死亡。主力部队无法去援助他们；它既无计划，又无资力，更无领袖…… 各国政府的联盟曾一度瓦解。克里木战争给了各国被压迫人民一个良好的机会，它们理应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可是它们由于缺乏组织而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曾看到真正的革命者把自己国家的解放同某一个认为干预国事和号召起义意味着必然毁灭的人的假想的计划联系起来。我们曾看到波兰人忘记了萨比斯基以及波兰在基督教欧洲所完成的历史使命，而给土耳其充当哥萨克。有一些民族，例如罗马尼亚人，曾幻想他们能够借助外交达到统一，仿佛在世界历史上曾有哪一个国家没有经过自己儿女们的斗争就建立起来了。另外有一些民族，如意大利人，则决定等待奥地利参加斗争，好像奥地利除了武装中立以外还能够采取别的什么立场。只有希腊投入了战争；可是它没有了解到，在存在着各国政府联盟的情况下，如果不爆发能够瓦解这些力量的革命，如果希腊人不和斯拉夫-罗马尼亚人联合起来以便使起义成为合理合法的事情，希腊就不可能有任何民族运动。我所指责的缺乏组织，缺乏计划的情况从来没有表现得这样明显。因此我们的行列中有时到处都是令人窒息的沮丧情绪。孤立无援的单独一个人，很少经费，甚至毫无经费，怎么能够解决涉及全欧洲的问题呢？只有联合才能解决这个任务…… 1848年我们以所有伟大的和神圣的事物的

名义在十个地方举行了起义。自由、团结、人民、联盟、祖国、欧洲——所有这些当时都属于我们。后来，我们被骗了，不知道被什么怯懦的罪恶的妄想迷住了心窍，竟让这些运动变成了地方性的运动…… 我们把路易·菲力浦推翻之后，却重复了那句可以概括他的统治的渎神的话：《Chacun pour soi, chacun chez soi》〔“人人为自己，人人顾自己”〕。因此我们遭到了失败。难道我们一点没有从这种痛苦的经验中得到教训吗？难道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团结而且只有团结才能产生力量吗？

人是由思想和行动构成的。不见诸行动的思想，只不过是人的影子；不受思想指导和推崇的行动，只不过是行尸走肉——没有灵魂的躯体。上帝之所以为上帝，因为他是思想和行动的绝对同一。人之所以为人，只有在不断努力尽量接近这个理想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如果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之间，个人义务和集体义务之间，著作家和阴谋家或者战士之间划上一条反常的和荒唐的鸿沟，把我们的党分成思想家和实践家，分成理论家和实行家，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我们都宣扬联合，把它当做以我们为先驱的这个时代的口号，可是我们当中究竟有多少人实际上是和自己的弟兄联合起来共同行动的呢？我们在口头上都讲忍让、友爱、自由，可是只要我们的同志在某一个问题上同我们观点不一致，我们就会和他们决裂。我们都热烈赞扬那些不惜牺牲生命为我们扫清行动道路的同志；可是我们却不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我们都指责小规模袭击鲁莽轻率，可是我们又不设法进行大规模的强有力的袭击。我们都叹惜党缺乏经费，可是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定期向党缴纳几文党费的呢？我们说我们的失败是由于敌人有强大的组织，可是我们当中有几个人试图建立总的统一的组织——这个组织在目前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将来会产生成果——以使我们党无比强大的呢？…… 难道没有办法使我们党摆脱目前这种可悲的一盘散沙的局面吗？我们都认为思想是神圣的，它的表现应当是自由的、不可侵犯的；都认为，如果一种社会组织由于物质上的极端不平等而使工人注定成为机器的附属物，使他们丧失精神生活，那末这种社会组织就毫无可取之处。我们认为，人们的个人生活是神圣的。我们认为，人们的联合也同样是神圣的；它是反映我们时代的特殊使命的口号。我们认为，国家不应当用强制的办法来实行这种联合，而是应当采取鼓励的办法。我们热烈期望，有朝一日，生产者将普遍联合起来，工资将由分享利润来代替。我们相信劳动神圣，并且认为，任何社会，如果那里的

人们愿意自食其力而不可能做到，那就是罪恶的社会。我们相信民族，我们相信人类……我们所理解的人类，就是自由平等的各民族在这样两个原则上的联合：内部独立发展以及为了调节国际生活和争取共同进步而互助友爱。我们认为，为了使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民族和人类能够存在，欧洲地图必须重画；我们认为必需重新划分领土，以代替维也纳条约所做的任意划分；这次划分应以语言、传统、宗教的近似为依据，以每个国家的地理条件和政治特点为依据。你们不认为根据这些共同的信念足以建立互助友爱的组织吗？我不是要你们服从唯一的一种学说，唯一的一种观点。我只是说：让我们一齐来向否定一切学说的现象作斗争；让我们联合起来，和今天有可能重新征服欧洲的那种东方的消极无为的原则作斗争，争取第二个马拉松式的胜利。所有的人，不管他们属于共和主义的哪一派，只要赞同我上面列举的那些意见，都应当组织成为一种欧洲的行动党，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波兰、希腊、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其他被压迫的民族都应当各自建立起这个党的支部；每个民族的支部都独立存在，设有自己单独的金库；设有中央金库的中央委员会，应当由各民族支部的代表组成，等等。

党的统一达到后，欧洲问题就会变为从何着手的问题。在革命中也和在战争中一样，胜利取决于在某一点上迅速地集中尽可能众多的力量。如果党想使革命取得胜利，它就应该在欧洲地图上选择一个最易于和最利于表现主动性的地点，把各支部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都投到那里去。罗马和巴黎就是两个应该开始联合行动的战略据点。法国，由于它的强大的统一，由于对它的大革命和拿破仑军队的回忆，由于巴黎每次发生的运动对欧洲人心的影响，迄今还是一个只要一发起行动就一定能唤起所有其他被压迫民族的国家，尽管它的每一次真正的革命发动都必然遭到欧洲各国政府的全力攻击。如果除开这个唯一的例外，那末，今天只有意大利是显然集中着发起行动所必备的各种条件的国家。不必来谈促使意大利前进的观点的普遍性；在过去十年中那里就发生过一系列欧洲绝对看不到的出色的反抗行动。意大利民族的事业就是所有被维也纳分赃所摧毁或者肢解了的各民族的事业。意大利的起义，由于使奥地利遭受打击，会立刻使那些在这个帝国内部争取摆脱羁绊的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得到行动的机会。分布在帝国内那些不满情绪极端严重的地区的意大利军队，会支持他们的运动。奥地利派往意大利的两万名匈牙利士兵会站在我们起义的旗帜下面。因此，意大利的运动不可能成为

地方性的运动。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和它的 2500 万人口将保证起义运动能够坚持足够的时间，使其他民族能够来得及利用它。奥地利和法国，法国和英国在意大利都没有能使它们采取共同政策的共同利益。由于意大利不推翻教皇的统治就无法起义，所以它一旦起义，就会解决欧洲良心自由的问题，就会获得所有珍视这一自由的人的同情。”

对马志尼的宣言的评论由卡·马克

思于 1858 年 9 月 21 日写成

载于 1858 年 10 月 13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5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俄

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中国和英国的条约

1858年9月28日于伦敦

英国政府终于发表了关于英中条约的正式摘要³⁹²，对于早已由其他方面传开的消息，大体上很少补充。其实，对于英国有意义的只有条约中的第一款和最后一款。根据第一款，南京条约缔结以后所规定的“善后旧约并通商章程”“作为废纸”。这个善后补充条约曾规定，在香港以及为英国贸易开放的五个中国口岸，英国领事在遇到装载鸦片的英国船只驶入英国领事裁判权所辖地区时，必须给中国当局以协助。这样，英国商人在形式上被禁止输入这种违禁的毒品，而且英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一名天朝海关职员的角色。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解除第一次鸦片战争在表面上加于鸦片贸易的禁令而告终，这是十分合乎逻辑的结果，是那些特别热烈鼓掌欢迎帕麦斯顿施放的广州焰火的英国商界殷切期望得到的成就。可是，如果我们以为英国正式放弃它对鸦片贸易的假惺惺的反对行动，不会导致与原来的希望完全相反的结果，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中国政府请英国政府协助取缔鸦片贸易，也就是承认了自己不能依靠本身的力量做到这一点。南京条约的善

本篇内有关条约的引文的中译文，均见中英天津条约的中文本。——译者注

后补充条约是企图借助外国人的帮助来摆脱鸦片输入而作的最后的也是绝望的努力。既然这种企图遭到了失败——而现在已公开谈论这次失败——既然英国现在已在法律上认可鸦片贸易，那末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无论从政治上和财政上着想，都将试行一种办法，即准许在中国栽种罂粟并对外国鸦片征收进口税。不论当前的中国政府的意向如何，中国政府因天津条约而陷入的情况本身就向它提出了这个办法。

这种改变一经实行，印度的鸦片垄断以及印度的国库一定会受到致命的打击，而英国的鸦片贸易会缩小到寻常贸易的规模，并且很快就会成为亏本生意。到目前为止，这一直是约翰牛用假骰子来进行的一场赌博。因此，约翰牛的算盘完全落空，大概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明显的结果。

慷慨的英国对俄国宣布了“正义战争”，在订立和约时，不曾要求任何军事赔款。另一方面，英国虽然不断声明它同中国处于和平状态，同时却强迫中国必须偿付这次战争的费用，这些费用，按照英国自己现任大臣们的意见，是由它自己的海盗行为引起的。不管怎么样，天朝的百姓将偿付 1500 万或 2000 万英镑的消息一传来，甚至对于最清高的英国人的良心都起了镇定作用。“经济学家”杂志以及一般写作金融论文的作者们，都兴致勃勃地计算着中国白银对于贸易差额和英格兰银行金银储备状况将发生多么良好的影响。但是真可惜！帕麦斯顿派的报纸煞费苦心制造出来的那些初步印象太脆弱了，经不起关于事情真相的消息所带来的打击：

专条规定：“前因粤城大宪办理不善致英民受损”，中国应偿付“商亏银二百万两，军需经费银二百万两二项”。

这两笔款项总共才 1334000 英镑，而在 1842 年，中国皇帝却

应该偿付 420 万英镑，其中 120 万英镑抵偿被没收的走私鸦片，300 万英镑折偿军费。由 420 万英镑外加香港，减少到只有 1334000 英镑，这毕竟不像是一桩漂亮的买卖；可是，最坏的事情我们还没有讲呢。中国皇帝说，既然你们不是同中国作战，只是同广州进行“地方性战争”，那就请你们自己向广东省索取你们尊贵的军舰逼迫我批给你们的那笔损失费吧。同时，你们那位赫赫有名的斯特罗本齐将军不妨占领广州作为物质上的保证，并且照旧使英国武器成为连中国兵勇都会耻笑的笑柄。乐观的约翰牛因为 1334000 英镑的小战利品所附带的这些条件而产生的苦恼，已经发作为大声的呻吟。伦敦有一家报纸写道：

“不仅没有可能将我们的 53 艘军舰从中国调回，看到它们满载着几百万银锭凯旋归来，我们反而必须派遣 5000 名士兵去重新占领和守住广州，并帮助海军去进行我们的副领事所宣布的地方性战争。可是这场地方性战争，除了把我们的贸易从广州移到其他中国口岸以外，会不会引起其他结果呢？…… 继续进行战争 地方性战争 会不会使绝大部分的茶叶贸易落到俄国手里呢？欧洲大陆和英国本身会不会依靠俄国和美国来供给茶叶呢？”

约翰牛担心“地方性战争”会影响茶叶贸易，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从麦克格莱哥尔的“商业税则”³⁹³中可以看出：在第一次对华战争的最后一年的内，俄国经由恰克图得到 12 万箱茶叶。在同中国媾和后的一年内，俄国对茶叶的需要减少了 75%，总共只有 3 万箱。无论如何，占领广东将使英国人继续耗费钱财，这笔钱一定会大量增加收支的逆差，以致第二次对华战争未必能弥补损失，爱默逊先生说得对，在英国人看来这是空前未有的大错。

在第五十一款上载明了英国侵略所取得的另一个大胜利，按照这一条款，“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

得提书夷字”。约翰牛并不坚持要称自己为神国或圣朝，只要正式文件中除去表示“蛮夷”意思的字样就满意了，这在自称“天朝”的中国当局看来，约翰牛该是多么谦恭啊！

条约中涉及贸易的条款，并未向英国提供它的竞争者没有享有的任何利益，而这些条款在目前条件下只是空洞的诺言，其中大部分还不如书写条约用的羊皮纸值钱。第十款规定：

“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惟现在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议，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

按照这一条款，英国人实际上是被禁止进入全帝国的通商大动脉，正如“晨星报”³⁹⁴所公正地指出的，被禁止进入“英国人能将自己的工业品销往内地的唯一通路”。如果他们很乖，帮助帝国政府将起义者逐出目前被他们占领的区域，那时他们或许可以在大江上航行，但也只限于某几个口岸。至于新开放的海港，如果最初说的是开放“一切”口岸，那末，现在除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五个口岸外，已缩减到开放五个口岸了，按照伦敦一家报纸的说法，这些口岸“一般都是偏僻的或者位于海岛上”。此外，那种以为贸易的发展会与所开放的通商口岸数目成正比的欺人之谈，现在已该抛弃了。请看英国、法国和美国海岸上的港口，其中有多少发展成了真正的商业中心呢？在第一次对华战争以前，英国人只限于在广州经商。让出五个新口岸来开放，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使贸易逐步由广州移到上海，这一点可以从关于1856—1857年各地贸易状况的议会蓝皮书援引的下列数字看出来。同时还应该记住，广州的商品进口额中也包括由广州转往厦门和福州的商品。

年 代	由英国进口的贸易额(美元)		对英国出口的贸易额(美元)	
	广 州	上 海	广 州	上 海
1844	15500000	2500000	17900000	2300000
1845	10700000	5100000	27700000	600000
1846	9900000	3800000	15300000	6400000
1847	9600000	4300000	15700000	6700000
1848	6500000	2500000	8600000	5000000
1849	7900000	4400000	11400000	6500000
1850	6800000	3900000	9900000	8000000
1851	10000000	4500000	13200000	11500000
1852	9900000	4600000	6500000	11400000
1853	4000000	3900000	6500000	13300000
1854	3300000	1100100	6000000	11700000
1855	3600000	3400000	2900000	19900000
1856	9100000	6100000	8200000	25800000

“条约中有关商务的条款不能令人满意”，——这就是帕麦斯顿最卑鄙的走卒“每日电讯”³⁹⁵所做的结论；同时，这家报纸还嘲笑“条约中最精彩的一点”，即“英国公使将常驻北京，而某一位满清大官将驻在伦敦，也许他还会邀请女王参加在阿尔伯特门举办的舞会呢。”但是，无论约翰牛怎样用这个玩笑来寻开心，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有谁将在北京拥有政治影响，那一定是俄国，俄国由于最近的条约得到了一块大小和法国相等的新领土，这块领土的边境大部分只和北京相距 800 英里。约翰牛由于进行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俄国得以签订一个允许俄国沿黑龙江航行并在两国接壤地区自由经商的条约；又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

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自然，这种回顾对于约翰牛来说是不愉快的。伦敦“泰晤士报”为此深深感到痛心，所以当它刊登来自圣彼得堡的、过分渲染大不列颠占便宜的消息时，竟将电报中有关俄国依照条约获得黑龙江流域那一部分故意删去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9 月 28 日
载于 1858 年 10 月 15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455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 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

农奴制问题目前任俄国似乎要发生一个严重的转折；这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迫采取这样一个非常措施，即在圣彼得堡召开一次可说是全体贵族代表会议来讨论废除农奴制的问题，可以最清楚地看出来。农民事务总委员会³⁹⁶的工作已几乎完全失败，只不过引起了各委员之间的激烈争吵，在这场争吵中，该委员会的主席康斯坦丁大公是偏袒反对沙皇的旧俄罗斯派的。省贵族委员会似乎大部分也是利用正式讨论解放农民的预备步骤的机会，一心来阻挠这个措施。在俄国贵族中当然有一派人主张废除农奴制的，但是他们为数甚少，而且在一些最重大的问题上意见也不一致。口头上反对奴役，但是只答应在使解放有名无实的条件下给予解放，这种态度甚至在俄国自由派贵族中似乎也是很流行的。其实，老农奴主对解放农民采取的这种公开的反抗或缺乏诚意的支持，完全是很自然的。收入减少，地产跌价，他们作为围绕着中央暴君旋转的许多小暴君所惯于享有的政治权利受到严重侵犯，——这就是他们会预料到的、也是很难期望他们会乐于承受的直接后果。在一些省份里，现在就已经不能用地产作抵押筹得信用贷款了，因为谁也说不定地产是否不久就会贬值。俄国有很大一部分地产是抵押在国家自己手中，那些地产的所有者提出这

样的问题：他们将如何履行对政府的义务呢？许多地主的地产有私债的负担。许多地主是靠定居在城市里当商贩、手工业者和帮工的农奴缴纳租赋过日子的。当然，这些收入会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而消失。还有一些小贵族，他们拥有的农奴数目很有限，但是拥有的土地还要少。如果每一个农奴都领到一块土地（一旦解放必定如此），那末这些农奴的主人就会变成乞丐了。对于大地主说来，按照他们的观点，解放农民几乎等于放弃权势地位。如果农奴被解放，这些地主还能凭借什么去抵制皇帝的专横呢？此外，俄国如此需要的并且取决于土地实际价值的赋税将从何而来呢？国有农民又将如何处理呢？所有这些问题都被提了出来，并且构成了农奴制拥护者们借以藏身的许多坚固阵地。这是像各国人民的历史一样古老的故事。的确，要解放被压迫阶级而不损害靠压迫它过活的阶级，而不同时摧毁建立在这种阴暗社会基础上的国家全部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的。当到了需要进行改革的时候，起初总是表现得热情洋溢；人们兴高采烈地互相祝贺彼此的善良愿望，冠冕堂皇地大谈其对进步的普遍热爱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一旦到了说话要用行动兑现的时候，有些人就害怕被他们召来的鬼魂而向后退缩，而大多数人则表示决心捍卫自己实际的或想像的利益了。欧洲一些合法政府只是在革命的压力下或由于战争的关系才能废止农奴制。普鲁士政府只是在吃到拿破仑铁枷的苦头以后才敢于考虑解放农民；然而即使那时它对这个问题也解决得不彻底，以致不得不在 1848 年重新予以解决，并且，这个问题尽管在形式上已有所改变，仍然有待于在未来的革命中予以彻底解决。在奥地利，解决这个问题的不是合法政府，也不是统治阶级的善良意志，而是 1848 年革命和匈牙利起义。在俄国，亚历山大

一世和尼古拉并不是由于什么人道观念，而纯粹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才企图用和平方法改变人民群众的状况³⁹⁷，但是他们两人都失败了。必须补充说明一下，其实在 1848—1849 年革命以后，尼古拉背弃了他自己过去提出的解放农奴的计划，而变成了一个最顽固的保守派。至于亚历山大二世，则是否要唤醒那些沉睡的力量，对他来说未必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问题。他从父亲手中继承下来的战争，使俄国人民群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种牺牲的规模之大，单凭这一事实就可以想见了：在 1853—1856 年这段时期，强迫流通的纸币从 33300 万卢布增长到大约 70000 万卢布，而这全部增长的纸币数量实际上只是国家预先征收的赋税。亚历山大二世只是仿效亚历山大一世在与拿破仑作战时的做法，用解放的诺言鼓舞农民。再说，战争以丢脸的失败告终，至少在那些决不可能通晓外交秘密的农奴看来是如此。以这种明显的失败和丢脸来开始他的朝代，并且还公开违背在战时向农民所许的诺言，——这种做法甚至对于沙皇说来也是太冒险了。

甚至尼古拉本人，不管是否发生东方战争，能否更久地拖延这个问题，都是令人怀疑的事情。至于亚历山大二世，就无论如何没有这种可能了；但是他曾认为（而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一向服从惯了的贵族不会违抗他的命令，如果让他们通过各种贵族委员会在这出大戏中扮演一个角色，他们甚至还会引以为荣的。然而这种估计落空了。另一方面，农民对沙皇打算给他们做的事情甚至抱有过分夸大的想法，他们对于自己领主们迟疑不决的做法已感到不能忍受。好几个省份里发生的纵火事件，就是意义很清楚的危险信号。其次，大家知道，在大俄罗斯和过去属于波兰的各省都发生了情景非常可怕的暴动，结果使贵族们从乡村移居到

城市，在那里借着城墙和驻防军的保护，才能不怕愤怒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亚历山大二世认为必须召开一次类似贵族会议的集会。如果这次会议成为俄国历史上一个新的起点，那末结果会怎样呢？如果贵族们一定要坚持以自己的政治解放作为在解放农奴问题上向沙皇让步的先决条件，那末结局又将如何呢？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10 月 1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10 月 19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58 号

卡·马克思 普鲁士国王的疯癫症

1858年10月2日于柏林

德国作家豪弗在他的一篇故事里描写了一个喜欢说短道长、专爱无事生非的小城镇，在一天早上，突然发现它那里最时髦的人物、实际上在社交界占头把交椅的大红人，原来不过是一只化装的猴子，因而大为惊愕，失去了它平素那种安然自得的心情。现在，普鲁士人民，或者说一部分普鲁士人民，大概正由于一种更不愉快的发现而感到万分沉痛：他们竟被一个疯子统治了整整二十年至少，人民已在暗自猜疑，忠实的普鲁士“臣民”被朝廷的一个大规模骗局巧妙地愚弄了。这种疑窦的产生决不像约翰牛和他的那些滑头编辑们断定的那样，是由于国王在对俄战争中所采取的做法。恰恰相反，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不愿参加这场可耻的屠杀，倒被公认为是他可以引以自负的一次最清醒的政治行动。

如果一个人，不论他的社会地位如何，也不论他多么平凡，忽然被发觉完全不是人们原先所认为的那个样子，那末通常他周围那些恼怒的和受骗的人们就必然要去翻查他的经历，搜出他的全部陈年旧账，回想起他的一切反常的行径，把他过去所有荒唐古

怪的举止——连缀起来，最后，怀着病态的满足心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他们早该看出这种情况才对。因此，人们现在记起来了（这件事我也记得，可以证实），济克堡的莱茵精神病院的主治医师雅科比博士突然于 1848 年 5 月被当时的内阁首相康普豪森先生召到柏林，去给当时据说正患脑炎的国王治病。据新产生的内阁的恭顺奴仆们在心腹人士中间私下传说，陛下的神经系统在三月事件中，特别是由于人民要他站在那些因故意制造的误会而被杀害的公民的遗体面前，迫使他向这些血迹斑斑、尚未冷却的尸体脱帽赔罪³⁹⁸，而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没有疑问，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健康后来复原了，但是不能因此肯定他不会像乔治三世那样周期性地复发旧病。不过由于大家都知道他时常沉湎于那种曾使忒拜的一位著名天神的女巫们大发酒疯的纵性狂欲³⁹⁹，对于他偶然做出的一些奇怪举动也就不大理会了。

然而，1855 年 10 月，当他为了给准备在科伦附近修建的莱茵河的新桥主持奠基典礼而来到莱茵普鲁士的时候，关于他就有许多奇怪的传闻。他脸皮皱缩，两腿无力，挺着大肚子，一副神色焦躁不安的样子，就像是他自己的亡魂。在他致词的时候，断断续续，结结巴巴，时而前言不接后语，简直是狼狈不堪；而王后紧随在他身边，焦灼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一反往来的习惯，不接见任何人，不和任何人谈话，没有王后陪伴他哪儿也不去，王后已经和他寸步不离。在他回到柏林以后，时常传出一些奇怪的。on dits〔传言〕，说他在突然发狂的时候，竟动手打了他的大臣，就连曼托伊费尔也难幸免。为了安定人心，只说国王得了水肿病。后来，越来越多地传出他在自己的桑苏西花园里不幸出事的消息，他时而碰到树上撞伤了眼睛，时而碰在石头上磕伤了腿；而在 1856

年初，开始到处有人暗中传说他时常有疯癫病发作。特别是说他把自己想像成一名士官，还需要通过普鲁士军曹所说的 *Übungsmarsche* [机械操练]。因此他通常独自在他的桑苏西和沙洛顿堡两处花园里练习跑步，这也就造成了不妙的后果。

现在人们正费尽心思把十年来发生的诸如此类的往事联系起来。请问，既然现在才证实，至少最近十八个月以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尽管有精神病，但仍被留在王位上，既然现在由于王族成员之间发生了争吵，王后和大臣们假借国王名义玩弄的鬼把戏才公开暴露出来，那末，在整个那段时期里为什么不可能让一个疯子当国王来愚弄普鲁士人民呢？因脑软化而引起疯癫的病人，一般说来直到死以前都常会有神志清醒的时期。普鲁士国王的情况就是如此；他的疯癫症的这种特点，为布置骗局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王后经常守着她的丈夫，抓住他的每一个神志清醒的时期，让他出现在人民面前，或者让他在公共场合露面，教他演习他应该扮演的角色。有时她却大大失算。例如，大家都记得，葡萄牙女王曾在柏林举行婚礼，国王本来说好要作为 *per procura* 公开出席在教堂举行的结婚典礼。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大臣、侍从武官、廷臣、外国使节和新娘本人都在等候国王，突然之间，他神经错乱，以为自己就是新郎，王后拚命设法制止也没有用。他说自己命运多舛，居然在第一个妻子还活着的时候再度结婚，又说他（作为新郎）穿着军服出现很不相称，这些不伦不类的话使那些让他抛头露面的人毫无办法，只好停演这场已经宣布开幕的好戏。

从下面的事例中可以看出王后做事的大胆。在波茨坦还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习俗，按照这个习俗，渔民一年一度要用鱼向国王缴纳一次古老的封建贡赋。王后想借此机会向这些来自老百姓的人证明，当时盛传的有国王的精神状况的流言蜚语是假的，她竟决定邀请几个为首的渔民出席由国王亲自主持的鱼宴。的确，这次鱼宴进行得很顺利，国王喃喃地讲了几句事先背熟的话，面带笑容，举止相当得体。王后深恐好景不常，急于示意客人退席，可是国王这时却蓦然站了起来，大声要求把他放入煎锅。阿拉伯人关于人变鱼的故事由他变成了现实。恰恰是由于王后迫于需要而大胆采取的这种鲁莽行动，这场喜剧遭到了失败。

不言而喻，没有一个革命家能想出比这更好的办法来贬低皇家的尊严。王后是巴伐利亚的一位公主，是臭名昭彰的奥地利的索菲娅（弗兰茨-豹瑟夫之母）的同胞姊妹，在各阶层人士中从来也没有想到柏林宫廷奸党的首领就是王后本人。1848年以前，人们都称她为“慈祥的国母”（die milde Landesmutter），以为她对国家事务完全没有影响，而且由于秉性的缘故根本不过问政治。有人因为听说她暗中信奉天主教而感到不满，还有人因为她是国王按照她的意思而创立的神秘的天鹅骑士团⁴⁰⁰的首领而咒骂过她，民众对她不满的表现仅此而已。当人民在柏林取得胜利以后，国王曾请求人民看在“慈祥的国母”面上宽容他，而这一请求打动了他的听众。可是在反革命得势之后，人民对奥地利的索菲娅的这位同胞姊妹就逐渐改变了看法。胜利了的人民曾看在这个人的面上采取了宽宏大量的态度，而现在这个人却完全不理那些被

“一千零一夜”里的渔夫的故事。——编者注

得势的反革命的魔掌夺去了儿子和兄弟的母亲和姊妹们。这个“慈祥的国母”显然曾赞同这种暴君式的怪僻行为——把几个不幸的自卫团员(Landwehrleute)在1850年国王生日的那一天,即在他们所犯的保卫人民权利的罪行似乎已被人遗忘的时候,在萨尔鲁伊处决,而同时她又满怀悲天悯人的虔诚在那些由于袭击手无寸铁的柏林市民而被击毙的士兵墓前慎重其事地表示吊唁,并且还做出一些类似的反动气焰嚣张的活动。她同普鲁士亲王夫人的激烈争吵不久也成了公众议论的话题,不过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既然她没有子女,对国王的法定继承人的目空一切的妻子就会怀恨在心。这个题目我准备以后再谈。

卡·马克思写于1858年10月2日
载于1858年10月23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546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⁴⁰¹

几个星期以前，我们曾指出 俄国近年来在东亚细亚，即在太平洋西岸有着极顺利的进展。今天，我们要请读者注意这同一个大国在另一方面，即在中亚细亚的同样顺利的进展。

关于两个亚洲大国俄国和英国可能在西伯利亚和印度之间的某处发生冲突的问题，关于哥萨克和西帕依在奥克苏斯河两岸发生冲突的问题，自从 1839 年英国和俄国同时出兵中亚细亚⁴⁰²以来，常常被人们谈论着。这两国军队的第一次远征由于当地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气候而遭到的失败，有一个时期使人们对议论不感兴趣。英国曾以成功的然而一无所得的进军喀布尔来弥补自己的失败。俄国似乎是默默地忍受了自己的耻辱，可是我们就会看到，它丝毫也没有想到要放弃自己的计划，而且顺利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当最近一次战争开始的时候，俄国有可能进攻印度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但是那时大家几乎一点也不知道俄国的先遣部队已推进到什么地方以及他们在哪一个方向进行侦察。印度报纸偶尔登载一些关于俄国在中亚细亚的征服地的报道，但是人们没有注意它们。最后，在 1856 年英国—波斯战争时期，整个问题又

见本卷第 625—626 页。——编者注

重新引起了讨论。

但是近来中亚细亚的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还在急速地变化着。当 1812 年拿破仑在自己的地图上标出莫斯科作为向印度进军的作战基地时，他只是步彼得大帝的后尘而已。还在 1717 年，这位深谋远虑的、向自己的继承者指示种种侵略方针的帝王，

在 1858 年 11 月 24 日“自由新闻”刊载的原文中，文章从开头到“当 1812 年”这几个字之前是这样的：“兹附上从我所作的关于俄国近来在中亚细亚的进展的札记中摘录的几段文字。可能，这些材料有一部分对你们是新鲜的，因为据我所知，在圣彼得堡用俄文公布的、作为这些材料的主要来源的俄国官方文件，还没有来到英国。

只要注意一下年月日，就会发现帕麦斯顿勋爵的行动与俄国对中亚细亚的侵略之间的联系。例如：1839 年俄军向希瓦推进，尽管他们遭到军事上的失败；1854 年俄国在希瓦最后固定下来，虽然它只作了简单的军事示威，也没有发出一枪一炮；1856 年俄军匆匆通过吉尔吉斯草原向土尔克斯坦东南部进军，恰巧这时，在印度发生了起义。在俄国官方文件中，只提到已经发生的事实（faits accomplis）；当然，事件的内幕被小心翼翼地掩盖起来了，而在整个这出戏里只不过充当点缀品的武装力量，却被描绘成主要的登场人物。因为你们已很熟悉这个问题在外交上的全部经过，我在所摘录的文字里就只限于按俄国自己的说法来叙述事实。我仅就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从军事观点来看对印度有什么意义，补充了几点看法。

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亚历山大二世公布了关于俄国入侵北亚细亚和中亚细亚的文件，而尼古拉是一直用心良苦地不肯把这些文件公布于世的。一般来讲，关于亚历山大可以这样说，他做到了他父亲没有做到的事情，也就是说，让欧洲知道俄国的秘密的‘亚洲’计划，从而使欧洲成为他在制定这些计划时的公开同谋者。其次，这些文件实质上只有学问渊博的德国人才能看懂，因为他们珍视亚历山大对发展地理科学的宽容态度。再者，克里木战争以后，老莫斯科派由于俄国丧失了它的威信而愚顽不化地一再表示不满。对于这一点，亚历山大就以公布文件来答复他们，从文件中不仅可以看出俄国最近一年来取得了多么重大的成就，而且公布文件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就是对‘威信’的坚决肯定；这是尼古拉从来下不了决心去做的事。”

接下去那一部分文章的标题是：“俄国文件概述”。——编者注

就曾派军队远征希瓦，当然，那次远征是失败了。此后，俄国在一个长时期内没有去破坏土尔克斯坦草原上的安宁，不过这时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地区内却移去了许多哥萨克人，沿乌拉尔河建立了哥萨克军屯。但在乌拉尔河彼岸，俄国对吉尔吉斯人的三个汗国或部落的统治仍然只停留在名义上，到 1833 年瓦西里·彼罗夫斯基将军被派往奥连堡担任总督以前，俄国的商队总是遭到吉尔吉斯人和希瓦人的抢劫。彼罗夫斯基发现，由于这些游牧民族的袭击，俄国同亚细亚内地和南部各地区的贸易往来完全被切断了，因为甚至近几年来护送商队的武装护卫队也不能保护商队。彼罗夫斯基为了结束这种状态，首先组织了流动纵队来对付吉尔吉斯人，接着很快就在他们的地域上布置了哥萨克兵哨。他用这种办法在几年内使吉尔吉斯人屈服于俄国的实际控制和统治之下，然后便着手实现彼得大帝很久以前制定的征讨希瓦的计划。

彼罗夫斯基得到俄皇的许可后，组织了一支军队，人数大约相当于一个步兵师（8000 人），并附有许多半正规的哥萨克骑兵和非正规的巴什基里亚骑兵和吉尔吉斯骑兵的队伍。征集了 15000 头骆驼在荒漠的草原上往来运输给养。由于缺水的缘故，没有可能在夏季进行远征。因此，彼罗夫斯基选定在冬季作战，并在 1839 年 11 月由奥连堡出动。结果如何大家都已知道。暴风雪和严寒摧毁了他的军队，冻死了他的骆驼和马匹，使他损失惨重，不得不撤退。虽然如此，这次进军的公开目的还是达到了：当英国还一直不能替在布哈拉被杀的使节斯托达特和康诺利复仇的时候，希瓦可汗释放了全体俄国俘虏，并派使节到圣彼得堡去求和。

这时彼罗夫斯基着手开辟一条取道吉尔吉斯草原的交通线。

不到一年半的时间，科学考察团和工程勘察队就已开始进行工作，他们在军队的保护下考察了亚克萨尔特河（锡尔河）和咸海以北的整个区域。对于土壤的特性、修筑道路的最好线路以及开凿大水井的最适宜的地点，都作了调查。他们把这些水井钻凿或者挖掘在彼此相隔不远的距离内，在水井四周筑起足以抵御游牧部落任何袭击的坚固工事，在工事里面留有相当宽阔的地方用以贮藏大量的粮食。奥克斯斯河上的卡腊布拉克和伊尔吉兹河上的伊尔吉兹，成了保卫吉尔吉斯草原南部的中心据点；在这两个地方和乌拉尔河沿岸各城市之间，道路两旁都修筑了小型堡垒，在每相距 10 英里或 12 英里的地方开凿了水井。

在 1847 年采取了下一个步骤，即在锡尔河上离河口约 45 英里的地方建立了一座堡垒；这座堡垒取名阿腊耳斯克。里面可以容纳一个营以上的守备部队。阿腊耳斯克马上就成为分布在锡尔河下游以及与该河邻接的咸海沿岸的广阔的俄国农业移垦区的中心，这时，俄国便正式占有了咸海和锡尔河三角洲以北的全部地区。在 1848 年和 1849 年，咸海第一次受到详细的勘察；发现了一群新的岛屿，它们立刻就被划作不久就要着手建造的咸海汽船队的主要停泊处。在对着锡尔河河口的一个岛上建立了另一座堡垒，同时奥连堡和咸海之间的交通线也得到进一步加固并修竣完工。

1842 年卸去奥连堡总督职务的彼罗夫斯基，现在又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并于 1853 年春天率领大军向阿腊耳斯克推进。军队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困难就穿过了沙漠，然后沿锡尔河向上游

在“自由新闻”上不是印作“12英里”，而是“20英里”。——编者注

前进，当时还有浅水汽船沿河伴行。俄军来到离河口约 450 英里、隶属于浩罕可汗的阿克麦吉特要塞时，便把它一举攻了下来，并立刻把它变成了自己的要塞，而且做得非常成功，以致同年 12 月浩罕军队在进攻这个要塞时遭到了惨败。

1854 年，当欧洲的注意力投向多瑙河和克里木的战事时，彼罗夫斯基率领了 17000 人的军队，从锡尔河上新建立的作战基地向希瓦推进。但是希瓦可汗没有坐等他到达奥克苏斯河就派使者前往俄国军营，双方签订了条约，按照条约，希瓦可汗承认俄国的最高权力，将宣战权和媾和权让给俄国，把统治本国臣民的无限权力移交给俄国，俄国永远有权确定商队的线路，规定捐税和关税，调整希瓦全境的贸易。在希瓦驻有俄国领事，他作为俄国政府的代表，也负责全权裁决希瓦的一切政治事务。

随着希瓦的归顺，关于征服土尔克斯坦的问题实质上已经解决；也许现在这个问题在事实上也已经解决了。浩罕可汗和布哈拉可汗也曾派使节到圣彼得堡；俄国同他们签订的条约虽然没有公布，但是条约的内容可想而知。这些小国家唯一的力量就在于它们难以被人攻破，可是目前，至少对俄国来说，这一点已经不成问题了，所以不论俄国愿意让这些国家有多大程度的独立，这种独立终究只是名义上的独立，因为只要从希瓦或阿克麦吉特派一支两万人的军队到比较富饶的上土尔克斯坦盆地去，就完全可以镇压任何反抗的企图和横扫全境。应当说，俄国在 1854 年以后并没有对这些地区置之不理，尽管它行动十分诡密；而既然它在最近二十五年来在土尔克斯坦迅速地、悄悄地和连续不断地获得了成就，就很有把握可以预料，它的国旗不久将在兴都库什山和博洛尔塔格山的山隘上飘扬。

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些征服地的重大意义就在于,由于它们而为进攻印度建立了作战基地的核心;的确,自从俄军这样深入中亚细亚以后,从北方进攻印度的计划,已经不再是模糊不定的意图,而是具有相当明确的轮廓了。亚洲的热带地区同温带地区为一片宽阔的、从波斯湾沿岸径直穿过整个大陆而通向黑龙江发源地的沙漠地带分隔开来。这个沙漠地带——姑且不说黑龙江沿岸地区——直到最近为止,军队几乎不能通行;唯一可以设想的穿越这个地带的道路,是由里海的阿斯特拉巴德取道赫拉特到喀布尔,再往印度河这样一条道路。但是现在俄军驻在亚克萨尔特河(锡尔河)和奥克苏斯河(阿姆河)下游,而且有了供给军队用水和粮食的军用道路和堡垒以后,中亚细亚沙漠就不再是军事上的障碍了。俄国本来只有一条未修好的、由阿斯特拉巴德经由赫拉特通往印度河的道路,而现在有三条不同的道路,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准备好供行军之用。首先是一条穿越赫拉特的老路,在目前局势下这条路不可能再对俄国封锁起来;其次,是从希瓦到巴耳赫的奥克苏斯谷地;第三是从阿克麦吉特到霍德仁特的锡尔河谷地,从这里军队可以通过水源充足和人烟稠密的地区到撒马尔汗和巴耳赫。赫拉特、撒马尔汗和巴耳赫可以成为攻打印度的一个极好的作战基地。巴耳赫距离英印帝国的西北前哨白沙瓦总共才 500 英里。撒马尔汗和巴耳赫都隶属于布哈拉可汗,布哈拉可汗现在已经完全依靠俄国;要是阿斯特拉巴德(它不是已经被俄国人占领,就是随时可能被他们占领)和巴耳赫将来落在俄国手中,只要俄国决心攻占赫拉特,赫拉特就保不住。一旦这样的作战基地实际上为俄国所占有,英国就不得不为自己的印度帝国而斗争了。从巴耳赫到喀布尔,不见得比从喀布尔到白沙瓦更远一些,仅仅这一事实就已经证明,

西伯利亚和印度之间的中立地带现在是多么狭窄。

十分清楚,如果俄国人的进展继续保持着最近二十五年内所采取的那种速度、那种精力和始终不渝的精神,那末再过十年或十五年,俄国人就将直叩印度的大门了。他们只要穿过吉尔吉斯草原,就进入土尔克斯坦东南方那些耕种较好和肥沃富饶的地区,在征服这些地区方面,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们,这些地区可以在许多年内毫不费力地维持一支拥有5万或6万人,完全足够向任何地方,直至印度河进军的军队。像这样一支军队在十年内就可以征服全境、成立警卫队保护修筑道路和保护俄国国家农民垦殖广阔的土地(就像目前在咸海所做的一样),使周围的国家慑服、准备同印度作战时所需要的作战基地和交通线。是否会在什么时候进行这种进军,那要取决于目前只能作为渺茫推测对象的政治条件。

弗·恩格斯写于1858年10月8日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1858年11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71号,经马克思补充后又载于“自由新闻”第6卷1858年11月24日第23号

“自由新闻”上刊载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担保,凡是研究过这个国度的地理的军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如果我们的推测正确无误,那末‘哥萨克同西帕依’(假如那时还有愿意替英国效劳的西帕依)之间的搏斗,就不会像原来推测的那样,发生在奥克斯斯河沿岸,而是发生在喀布尔河和印度河沿岸。”——编者注

卡·马克思 普鲁士国王的疯癫症

1858年10月12日于柏林

国王已在今天离开柏林，en route〔启程〕赴提罗耳和意大利。在波茨坦火车站等候给他送行的沉默的人群中，有很多人曾在1840年参加了他的加冕典礼，并且后来在他的第一篇公开的蛊惑性演说中听到过他郑重其事地宣称，他决不允许一张“高卢纸片在他和他的人民之间作梗”。不幸，这同一个人后来不但宣誓要忠于这张“高卢纸片”——为成文的宪章或宪法起了好一个浪漫的名称！——而且自己还当上了普鲁士宪法的教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这张捣乱的“纸片”而被赶下了宝座。读者想必会看出国王给普鲁士亲王的诏书和普鲁士亲王给内阁的诏书之间存在着矛盾。国王在他的诏书中说：

“鉴于我目前仍不能亲理国政，特敦请殿下在暂时、临时等等意义上，作为摄政王代表我行使国王权力，务期竭尽全部德才，仅对上帝负责。”

亲王在他的相应的诏书中称：

“遵照国王的要求并根据宪法第五十六条，本人作为王位的男性直接继承人承负国家摄政之责，并依照宪法第五十六条，召集王国议会两院会议。”

请看，国王在诏书中表现出他是一个有自主力的人，而且他

是自愿暂时引退的。可是，亲王却同时抬出“国王的要求”和“宪法第五十六条”，而宪法第五十六条是以国王患精神病或被俘，以致不能亲自任命摄政人选为前提的。再者，国王在他的诏书中要求摄政王在行使他的权力时“仅对上帝负责”，可是这位亲王抬出了宪法，把全部责任都推给现任内阁。根据摄政王引据的条款，“王位直接继承者”应立即召集两院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有无必要实行摄政”。为了剥夺议会的上述权力，要强调国王是自愿引退的，可是为了不致完全依赖于国王的任性，又抬出了宪法。可见，摄政王提出的论点是有漏洞的，因为他所依据的是两种彼此不相容的权利。宪法第五十八条规定，

“自他 摄政王 宣誓 对联议会宣誓 效忠宪法之日起，现任内阁应对政府的全部行动负责。”

这同“仅对上帝负责”怎么相符呢？承认国王的诏书只是一个借口，因为同时还召集了议会；而召集议会，也是一个借口，因为“有无必要”实行摄政的问题不能由议会做出决定。曾在1850年拒绝向宪法宣誓的普鲁士亲王，为形势所迫，处于尴尬境地：他不仅得承认宪法，而且还得诉诸宪法。不要忘记，从1848年秋天到1850年初，专制派，特别是在军队里，曾蓄意有时甚至公开宣布要以头脑清醒的亲王来代替优柔寡断的国王，这位亲王至少没有由于头脑特别圆滑而使他的意志力受到压抑，此外，由于他在三月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他的逃亡英国、人民群众对他的痛恨，以及他在巴登战役中所立的功劳⁴⁰³，他似乎是完全能在普鲁士主持一个强有力政府的人，就像弗兰茨-约瑟夫、奥当斯之子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在霍亨索伦领土的南面和西面的邻邦里一样。亲王的确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原则。不过,他,尤其是他的夫人(歌德的学生,一个有文化修养、虚荣心强和目空一切的人)从王后及其宫廷奸党方面遭到的蔑视,不能不使他产生多少有点对立的情绪。国王的病症使他只能是要末让王后秉政,要末自己承认宪法。况且,这个人所抱有的那种在1850年曾成为他的思想负担的顾虑现在已经消除。那时,他不过是普鲁士军队的最高长官,这支军队只效忠于国王,并不效忠于宪法。如果他在1850年对宪法宣誓,那他就会使自己所统率的军队受到约束。按照现在的情况,他是可以宣誓的;但是,如果他愿意,他只要辞退职务,就能够让他的儿子倚仗军队的力量来推翻宪法。如果还需要其他佐证的话,那末,他哥哥在最近八年统治时期的例子正好充分证明,宪法对国王的无上权力只是一种纸上的约束,可是同时,从财政观点来看,宪法简直变成了天赐财源。请回想一下,在1842年到1848年这段时期内,国王在财政上遇到多少困难:打算通过 *Seehandlung*⁴⁰⁴ 借款,结果落空;向路特希尔德家族借贷几百万美元竟遭到悍然拒绝;1847年的小额借款也被联合议会否决;国库完全空虚。而另一方面,可以把这些同1850年即宪法诞生的第一年在财政方面出现的顺利情况比较一下,当时有7000万赤字的三个预算,转眼之间就由两院弥补上了。的确,谁要是不抓住这样一棵摇钱树,他准是一个大傻瓜!就人民而论,普鲁士宪法只是给官僚制度的传统力量增添了贵族的政治影响,而对于王权来说则相反,由于这部宪法,它已经能够举借一笔国债,并且把年度预算增加一倍以上。

这部宪法的历史本身是近代史上最异乎寻常的篇章之一。起初,在1848年5月20日,康普豪森内阁草拟了一个宪法纲要,提

交普鲁士国民议会。这个组织的主要工作是修改政府提出的草案。正当国民议会忙于这项工作的时候，它就被波美拉尼亚的刺刀驱散了。1848年12月5日，国王恩赐了一部御制宪法，然而这不过是鉴于时代还带有相当革命的色彩而被拿来搪债的临时票据。为了审查这部宪法，召开了两院会议，而两院所做的这项工作正好是在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进行的。这两院很像是普鲁士式的路易十八的 *chambre introuvable*⁴⁰⁵。可是国王还是犹豫不决。这张“纸片”，虽然有着甜言蜜语，浸透着忠诚的气息，刻着中世纪的图案花纹，仍然不合国王的口味。国王用尽种种办法使那些宪法兜售者泄气，而后者却下定决心，不惜蒙受任何屈辱，不怕做出任何让步，要弄出一部不问内容只求名义的宪法，哪怕卑躬屈膝也要达到目的。实际上，国王像连珠炮似地发出的左一篇右一篇的咨文所勾销的，不是负责审查宪法的两院制定的决议，因为两院只是保持着一种被动的态度，相反地，它所勾销的是国王的大臣们以国王本人的名义陆续提出的建议。今天，他们提出一个条款，过两天，当这个条款在两院被通过以后，又发现其中有不足的地方，于是国王宣布对它 *sine qua non*（一定要）加以修改。最后，国王觉得这套把戏玩腻了，便在1850年1月7日的咨文中决定采取一个最后的和彻底的步骤，试图迫使他的忠实臣民绝望地放弃他们对宪法的热望。他在一篇专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发出的咨文中提出了一连串修正案，他以为，这些修正案大概就连两院也无法消受。然而两院居然把它们囫圇吞下去了，而且做得那么爽快。这样一来，就只好作罢，颁布宪法。国王的誓词使人感觉出这部宪法是用怎样滑稽可笑的方法炮制出来的。国王在他“认为有可能借助宪法进行统治”的条件下接受了宪法，而两院把这个含糊其

词的声明当成了誓言和全数的兑现，广大人民群众则对这项交易采取了完全冷漠的态度。

这就是这部宪法的历史。关于它的内容，我想在另一篇通讯中扼要地向读者介绍一下，因为凑巧碰在一起的情况现在已经使这“一纸空文”至少在表面上成了那些互相倾轧的政党的行动基地，而这些政党，在普鲁士也像在别处一样，注定要掀起那迟早必将登上舞台的普遍运动。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10 月 12 日
载于 1858 年 10 月 27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465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普鲁士的摄政

1858年10月13日于柏林

经过一场严重斗争以后，普鲁士的宫廷事变终于成为 *fait accompli* [既成事实]。普鲁士亲王从国王的普普通通的代理人 and 代表一变而成为一国的摄政王。甚至从这出王朝戏的最后一幕中也可以看出，王后和宫廷奸党是多么不甘心让出自己的权位。他们的公开代表人物内务大臣冯·威斯特华伦先生，拒绝在国王将王权让给自己兄弟的法令上签字；他提出辞职，而由冯·弗洛特韦尔先生继任。另一方面，国王的让位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像法令中所说的，“只是暂时的，到我本人重新有能力履行国王职责时为止”，而且保留“亲自处理与我本人有关的王室事务的权力”。前面一条使摄政王的权力具有临时性质，后面一条是让王后继续把持王室的钱财出入。这种有条件的让位表明宫廷奸党虽然被迫让出了这个重要阵地，但仍然立意不就此作罢。的确，谁都知道，上星期国王得了中风病以后，他的私人医生们已宣布，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无法保证他哪怕再多活一年了。他们的这一宣布，对于冯·曼托伊费尔先生下决心倒向另一边和打起普鲁士亲王的旗号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曼托伊费尔有一点粗浅的近代历史知识，他懂得马扎里尼的权势比路易十三的寿命长。他知道，派

西沃虽然由于充当了名为“国王之友”的宫廷奸党的盲目工具，并且按照王后和约克公爵的指示办事，而大大得罪了王太子，然而，任凭辉格党的钻营家们怎样巧施诡计，屡发不祥之兆，他还是讨得了摄政王（后来的乔治四世）的欢心，保住了他的官职。正是由于曼托伊费尔的这种倒戈行为，才迫使宫廷奸党以及在幕后支持它的容克们退却。如果不是这样，普鲁士亲王就只能选择一条出路：或者仅仅满足于挂起一块王权招牌，或者呼吁人民群众予以干涉，后者无论同霍亨索伦王朝的传统或他自己的原则都是不相容的。曼托伊费尔的见风转舵使他摆脱了这个左右为难的烦恼处境。他对这个变节分子是否感恩，有待来日证明。不过，曼托伊费尔这个名字是同三月革命的失败密切联系着的，他是普鲁士 coup d' état〔政变〕的主要策划人，因而他的内阁看来也是对人民群众的“篡夺行为”的活生生的持续抗议；单单这一点事实，就很可能使亲王不跟这位《Mann der rettenden Tat》〔“救命恩人”〕毅然决然地决裂，尽管亲王同他有个人嫌隙。

亲王和国王之间的对照带有霍亨索伦王朝的家传特征。在一个多多少少有些骄奢淫逸、多多少少迷恋于拜占庭式的神学观念、多多少少卖弄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小丑式的人物之后，跟着来的总是一个集军曹、官僚、教师于一身的板面孔的人物。弗里德里希一世和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之间的对照是这样，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无伤大雅的奇怪行径和现任摄政王的冷静平庸之间的对照也是这样。

现在有许多人认为——而且英国报刊也在大事传播这种看法——这位摄政王的上台会立刻在普鲁士的外交政策上引起变革，

使普鲁士摆脱俄国的控制而更向英国靠拢。很可能摄政王本人也抱有这种想法。他当然从来也没有忘记，尼古拉曾在华沙会议上对身为普鲁士全权代表和王室近亲的勃兰登堡伯爵横加侮辱，以致逼得伯爵自杀⁴⁰⁶。与此同时，尼古拉曾强迫——而且是非常无礼地强迫——普鲁士屈从奥地利的要求，同意让奥地利军队开往汉堡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并且乖乖地在整个欧洲面前蒙羞受辱，这就使他对上述的人身侮辱更是痛定思痛。不久，当英国公布了英国驻彼得堡大使的秘密函件时，这位绝非宽宏大量的亲王再一次为那位已故皇帝的有意的轻蔑态度所震惊：这位皇帝在估计一旦瓜分土耳其帝国，欧洲各大国可能采取什么态度时，对普鲁士竟不屑一提。如众所周知，在布拉格举行的一次会见中，普鲁士亲王在起初采取了一些气势汹汹的步骤以后，对他这位莫斯科姻兄的专横傲慢报之以执拗的沉默。在对俄战争期间，宫廷奸党怀疑亲王倒向西方联盟国家，因而对他的私人活动进行周密的 *surveillance*（监视）和刺探，这是偶然在波茨坦的一件轰动一时的诉讼案中揭露出来的。而亲王则查明了，宫廷奸党的头子和国王的宠臣冯·格尔拉赫将军、枢密官尼布尔（一位大历史学家的儿子）是彼得堡政府的直接代理人，他们经常向彼得堡政府详细报告内阁中发生的一切情况，并从它那里接受任务，其中甚至有像王国各地 *corps d'armée*（军团）的部署情况这种问题。随着尼古拉皇帝的逝世，私人冤仇的起因消失了。再说，看不出亚历山大二世会像尼古拉那样在他舅父心中引起畏惧的情绪（尼古拉在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长女结婚以后是很懂得怎样使霍亨索伦王朝产生这种畏惧情绪的）。也很可能同英国新建立的亲戚关系会对摄政王的外交政策的倾向有一些影响。但是实际上，外交

政策不决定于亲王个人的好恶，而是决定于他的国家的地位。如果普鲁士不过是德意志国家之一，那问题的解决倒很简单；可是，普鲁士不仅仅是奥地利（而奥地利又与俄国为敌）的竞争者，而且普鲁士王国的大政方针是依靠俄国的援助来霸占全德。正是由于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同俄国结成联盟，普鲁士才得以从瑞典夺走波美拉尼亚。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同叶卡特林娜缔结联盟，弗里德里希大帝才能够把奥地利的西里西亚据为己有，才能够得到波兰自古就有的领土；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如法炮制，收到了同样的效果。正是在亚历山大一世的庇护下，普鲁士才得到了莱茵河流域各省，同时得以用损害萨克森的手段实行扩张。而一旦法国人进犯，普鲁士所必须依靠的又是俄国。所以，普鲁士国家的地位到底能不能使它的统治者摆脱俄国的控制，公众在这个问题以及国内政策问题上的期望是否不致于落空，是很值得怀疑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10 月 13 日
载于 1858 年 10 月 27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465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普鲁士状况

1858年10月16日于柏林

如果说一般人对普鲁士宪法一无所知或知道得极少,那末他们至少可以拿这样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实来自慰:连普鲁士人民自己也同样茫然无知。就在这个时候,柏林、布勒斯劳、科尼斯堡、科伦以及自由派的所有其他大小城市的选举委员会,都在忙于翻查普鲁士宪章的发黄了的篇页,看看从这个神秘的武库中能找出什么适用于目前情况的合法的进攻武器或防御武器。在最近十年间,即当这个宪章要人家把它看做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看做最终的结果,看做最后的决定的时候,大多数普鲁士人对它的态度非常冷淡,对它并不比对摩挲法典⁴⁰⁷更感兴趣,但是,当一发现这个官方的废物由于时势关系而变成一把双刃利剑的时候,看来谁都急切地想认识一下这个“无名宝物”了。另一方面,官方感到非常恼火,唯恐知识之果在这一次也和和太古时代一样,竟是罪恶之果,并且对那突然席卷了普鲁士人民的宪法狂热,投以阴郁的、而且我不能不说是完全有根据的怀疑目光。恰好现在普鲁士亲王在考虑 coup d' état〔政变〕可能是他不久将不得不采取的手段了。如果选举委员会真的实现了自己的计划——在选出的议院中,由1848年国民议会时代的自由派,即由瓦尔德克、雅科比、洛贝尔图斯、翁鲁、基

尔希曼之类的人物构成多数,普鲁士亲王恐怕就不得不在那个1848年12月间王权似乎获胜的战场上再来一次决战。正在重新觉醒的人民大众,只要吐口气、哼一下、喊一声,都足以使他不知所措。如果他真的像自己手下的一部分宫廷奸党建议的那样,去组织一个俾斯麦-申豪森内阁,从而公然向革命挑战,粗暴地连根扼杀人们似乎因他执政而产生的些微希望,那末,选出的议院按照宪法第五十六条和他自己的诏书,就可以将他摄政的“有无必要”问题提出讨论。这样,在他的统治一开始时,就会对他的执政权是合法的还是篡夺的问题进行激烈而危险的辩论。另一方面,他哪怕是暂时地允许运动扩展开来,让它自由地采取明显的形式,那末他的困难就会更加严重,因为旧的保皇党会翻转来攻击他,说他又启开了革命的闸门;保皇党人认为,只要让他们在患疯病的老国王的旗帜下进行统治,他们凭着自己独有的经世治国之才,是能够把革命的闸门堵住的。君主国的历史表明,在社会革命的时代,对于一个坚决而果断的,但同时又粗暴而守旧的人说来,最危险不过的是做一个动摇、软弱而又不讲信义的统治者的继承人。同弗里德里希-威廉极其相似的詹姆斯一世,经受了将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大风浪,而詹姆斯二世由于抱有那种甚至一度助长查理二世的奇特威望的关于神授王权的幻想,而遭到了没没无闻的流放。也许,威廉亲王正是由于本能地预感到他会遇到这类困难,才执拗地反对那位在1847年等级联合省议会的开幕式上曾口出狂言的国王颁布宪章。国王那时曾经说道:

“我觉得有必要郑重声明,任何人世间的力量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使我把国王和人民之间的天然的、牢固的关系变成条约的、宪法的关系;我永远也不允许在上帝和我的国家之间插进来一张写满字的纸片,或者说,插进来一

个要用自己的条文来实行统治并且要用它们来代替过去的神圣信仰的第二天神。”

我在前一篇通讯里已经说过，作为目前这部宪法的基础的，是那由康普豪森内阁起草并经1848年的革命的国民议会加工过的宪法草案，但是在它成为目前这部宪法的基础之前，*coup d'état*已经毁掉了它原来的样本，并且把它复制成钦定宪章这种歪曲形式；钦定宪章又由为审查它而召集的两院大删大改了一番，最后国王发出的无数敕令对这个业经修订过的宪章进行了修改。整个这一无休无止的过程，就是为了要把这块七拼八凑的东西所具备的那些令人想起它的革命渊源的特点彻底抹掉。然而这个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因为所有现成的宪章都必须或多或少仿照法国的样式，不论你如何摆弄它们，也不能使它们取得任何鲜明的独创性。所以，如果粗略地读一读1850年一月宪法的第二篇，即论述“普鲁士人的权利”、论述这些普鲁士的所谓 *droits de l'homme*〔人权〕的那部分，那末乍看起来它那里的条文是相当动听的：

“一切普鲁士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保障个人自由。私人住宅不容侵犯。任何人应受的合法审判都不得予以剥夺。处刑除由司法官员按合法执行职务的程序进行外，不得用作威胁的手段。财产不容侵犯。褫夺公权和没收财产被排除于现行法律之外。除非涉及兵役问题，国家对迁徙自由不得侵犯。宗教信仰的自由、组织宗教社团和无论在私宅或教堂共同做礼拜的自由，均予以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享有不依赖于宗教信仰。准许只按照民法履行结婚手续。科学和科学学说享有自由。开办国民学校以使青年教育有充分的保证。任何人都有教学和办学校的权利。国民学校的财务由各地基层单位负责管理。初等国民学校实行免费教育。每一个普鲁士人都有权利以口述、

书写和印刷的方式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与行使此项权利有关的犯罪案件由普通法庭审理。一切普鲁士人都有权利举行集会，但只限于室内并且不得携带武器。他们有权利组织宗旨不与法律相抵触的社团和俱乐部。一切普鲁士人都有请愿的权利。通信秘密不受侵犯。一切普鲁士人都必须服兵役。武装力量只能用于法律规定的特殊场合。限嗣继承制由法律加以禁止，现存的封建财产制应改变为私有财产制。地产允许自由划分。”

可是，如果你从这些写在纸上的“普鲁士人的权利”转过来看看它们体现在现实中的可怜样子，那末你就会充分认识到——如果你过去从未有过丝毫认识的话——理想和现实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何等惊人的矛盾。你每迈一步，甚至只是走动一下，都要受到万能的官僚制度这个纯粹普鲁士土生土长的第二天神的干涉，没有《obrigkeitliche Erlaubnis》，即没有当局的许可，你不能生、不能死、不能结婚、不能写信、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不能做买卖、不能教书、不能学习、不能集会、不能开工厂、不能迁徙，什么都不能做。至于科学和宗教的自由、取消领主裁判权、废除等级特权、消灭限嗣继承制和长子继承权，所有这一切都纯粹是瞎说。在所有这些方面，普鲁士在1847年要比现在自由。为什么会有这个矛盾呢？原来普鲁士宪章所恩准的这一切自由受到一个重大保留条件的限制。这些自由只是“在法律范围内”被恩准。但现行的法律恰好是专制独裁的法律，它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时候制定下来的，而不是随着普鲁士宪法的诞生问世的。这样，在宪法的法律和法律的内容之间就存在着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事实上后者已使前者成为泡影。另一方面，宪章在一些最紧要的问题上要人去查看构成法，它的含糊不清的原理应该由构成法加以详细发挥。但这些构成法本身是在反动势力的强大压力下制定的。它们取消了甚至在君主专制政体最反动时期都有的那些

保证，例如法官不受行政权力干涉的独立性。宪章还不满足于这些搅混在一起的溶解剂——旧有的和新造的法律，它还给国王保留了在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时候使宪章在任何政治问题上停止生效的权力。

尽管如此，毕竟存在着两个普鲁士：宪章的普鲁士和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各选举委员会现在也就在忙于解决这个矛盾，尽管选举法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10 月 16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8 年 11 月 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71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普鲁士状况

1858年10月19日于柏林

两院定于本月21日举行联席会议，届时亲王将要求它们“承认摄政的必要性”。不用说，这个要求会马上被同意，而且是俯首帖耳地同意。可是，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如果说宪法的形式上的存在是从1850年1月30日开始，那末它作为一个反对王室特权的有效工具的实际存在则应该从1858年10月21日算起。同时，为了打消无益的热情，查封若干家报纸就提上了日程。如果注意到这些触犯律条的报纸的温顺和善的特点，那只能对此感到莫大遗憾。这些报纸中最出名的要算“人民报”和“国民报”⁴⁰⁸；后者曾靠着它那体面的平庸、怯懦的退让和纯普鲁士式热情的洋溢，设法渡过了反革命大风暴，并且把运动（对运动的危险的极端行动，它非常明智地未予同情）的可怜的残余，变成了叮当作响的银钱。经过洪水浩劫之后，居住在地球上的生物比世界洪水发生以前的祖先，外貌长得较为悦目，尺寸变得较为适度了。社会的形成过程也受同一个规律的支配。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不禁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如果必须把柏林报界的侏儒看做是德国革命的合法代表，看做是它的最终的体现者，那末德国革命本身的渺小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不管怎样，这些报纸的编辑们虽然不是什么英雄，甚

至也不是什么普通的战士,但至少是善于推测的能手。他们感到正在发生某种动乱,作为他们那种冒牌自由主义所必需的背景,并且赏识他们的货色的那个政治体制,正在迅速垮台。因此,他们为了使自己的主顾相信他们确实在守着岗位。就大胆地发出些低声的牢骚和埋怨的叫声。他们当然不咬人,甚至也不汪汪大叫。他们现时的全部胆量就是把亲王捧上天。他们甚至还像“国民报”最近所做的那样,劝他任意动用国库;但是——这也是事情最滑稽的地方——他们对亲王的尚未见诸事实的政绩的那一番吹捧,全都变成了对曼托伊费尔内阁的旧日施政的谴责。他们预先给亲王以信任,这使亲王感到恼火;他们事后对内阁表示不信任,这又激怒了内阁。但是,要想恰当地评价他们,就必须去读他们的大作的原本。用任何一种别的语言,甚至用至少发着独特的 *odeur de mauvais lieu* (臭气)的十二月式的法语,也表达不出他们叨念的那套无聊乏味、又臭又长的废话。也许有人以为他们只是在讲隐语,因为他们是在同警察捉迷藏;可是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他们讲的都是他们所要说的,只不过极巧妙地按照自己的利益把顺逆两种方法配合起来使用罢了;他们在浩如沧海的白水里只注入微乎其微的一滴药剂。另一方面,内阁大臣们似乎知道这样一种地质现象:水的不断作用能把最坚硬顽强的岩石冲毁而化为碎石。使他们恼火的与其说是这些谨小慎微的聪明人的吞吞吐吐,倒不如说是似乎由这些人所反映的公众心理的一般状态。所以他们使用那一向近视的官僚方法,为了打驴背上的袋子——即公众舆论——而去打驴子。标志着新政权的开端的重新查封报纸,按照保皇党人的说法,是乱哄哄地表示对亲王寄予希望所应得的回答。官方的自由派说,不,亲王的政权还没有开始;在他得到两院的承认并宣誓就任摄政王

以前,他对宪法的极大尊重使他不能不允许内阁大臣们——按照宪章的规定——对自己的行动负责。但是要知道,在我们一切君主国的宪法中,——不管它们是照英国式还是照法国式仿造的,——这种“内阁大臣的责任”是个非常难捉摸的概念。在英国,它似乎是以最实际、最鲜明具体的形式存在的,而它在那里意味着:在某些隆重庄严的时刻,要末是由辉格党把自己的不负责任的职责移交给托利党,要末是由托利党把它移交给辉格党。内阁大臣的责任在这里就是追逐有利可图的职位,这种追逐已经成为议会中各党派的主要操劳了。担任内阁大臣职务的人在任职期间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他代表立法多数,而立法多数,为了帮助他取得该职位,则听命于他的党的议会领袖。在普鲁士,资产阶级最热衷于追求的目标是把内阁大臣的职位变为可以在议会比赛上赢得的奖品。但是到目前为止,普鲁士内阁大臣的责任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都还是一个谜。宪章第四十四条规定:

“王室内阁大臣是负责任的;王室政府的一切政令,必须由内阁大臣签署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内阁大臣负有全部责任。”

然而关于这种责任制却没有任何法律。上述条文本身也没有说明内阁大臣是对谁负责的。实际上,每当两院敢于用投不信任票来威胁内阁大臣时,他们就干脆告诉两院说,他们对此毫不反对,因为内阁大臣虽然的确是负责任的,但只是对他们的君王负责。内阁大臣的责任问题在普鲁士像在路易-菲力浦时代的法国一样,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事实上这是整个官僚集团的责任问题。内阁大臣是这个拥有无限权力、事事都插手的寄生集团的首领,按照宪法第一六条,他们所属的下级官吏只能唯他们的意图是从,下级官吏不得过问内阁大臣的命令是否合乎法律,并

且对这些命令的执行是没有责任的。这样，官僚的权威以及随之而来的执行机关的权威就仍然原封不动，而宪法规定的“普鲁士人的权利”变成了一纸具文。

即将到来的选举是目前一切政党企图利用的一根杠杆；但是恰恰是在有关选举的问题方面，现行的钦定宪法已经把自己的革命渊源的一切痕迹连根铲除了。诚然，为了给官吏们从议会方面另辟一个收入来源以增加他们微薄的薪俸，关于人民代表领取薪金这样一条满有平民味道的法律保存下来了。凡年满 25 岁的普鲁士公民都有被选举权这一条也保存下来了。但是，有关选举权和选举机构方面的安排，不仅把人民的大多数排除在外，而且还使其余享有特权的一部分遭到官僚集团最肆无忌惮的摆布。选举分两级。首先选举复选人，然后由复选人选举议员。在初选当中，不仅不缴纳直接税者都被排除在外，而且全部初选人还要分成三类：最高、中等、量低税额缴纳者。三类中的每一类都像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王⁴⁰⁹的特里布斯一样，选举同等数目的议员。然而就是这个复杂的层层过滤的过程看来还是认为不够，因为官僚集团此外还得到了把选区任意划分、拼凑、改变、分开、合并的权力。譬如说，如果疑心某一个城市倾向于自由派，那就可以把它淹没在乡村选民的大量反动选票中；内阁大臣只凭一纸命令就能把这个倾向于自由派的城市和反动的农村地区合并成一个选区。这就是束缚着选举运动的枷锁，只有在大城市里才有可能例外地挣脱这种枷锁的束缚。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10 月 19 日
载于 1858 年 11 月 8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475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 俄国在远东的成功

俄国由于自己在塞瓦斯托波尔遭到军事失败而要对法国和英国进行的报复，现在实现了。虽然格拉克列亚半岛上顽强而持久的战斗伤害了俄国的民族自豪感，并使它丧失了一块不大的领土⁴¹⁰，但是俄国在战争结束后毕竟还是得到不少好处。“病夫”⁴¹¹的状况更是大大恶化了；欧洲土耳其的基督教居民，无论希腊人或是斯拉夫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摆脱土耳其的束缚，比任何时候都更认为俄国是自己唯一的保护人。毫无疑问，最近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以及克里特岛上所发生的一切暴动和阴谋，都有俄国的代理人插手其中；但是土耳其在战争期间就已表现出来的并且为和约强加于它的义务所加剧了的极端衰竭和软弱，已足以说明苏丹的全体基督教臣民为什么会普遍地激动不安。因此，俄国以暂时牺牲一小块领土为代价（因为很明显，俄国一有机会就要收回这块领土），在实现它对土耳其的计划方面推进了很远。加紧分裂土耳其和确立自己对于土耳其基督教臣民的保护权，这就是俄国在战争刚开始时竭力追求的目的；而谁能说，现在俄国不是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地行使着这种保护权呢？

这样，俄国甚至由于这场对它不利的战争也得到了好处。可是，俄国还是要实行报复，于是它选定了一个没有人能与它匹敌

的领域——外交领域。当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一场代价巨大的战争时，俄国则保持中立，只是在战争快结束时它才插手干预。结果，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战争，只是为了让俄国得到好处。俄国这时的处境确是少有的顺利。不稳定的亚洲帝国在一个一个地变成野心勃勃的欧洲人的猎获物，这里所谈的是其中的一个帝国；这个帝国是如此衰弱，如此摇摇欲坠，它甚至没有力量来度过人民革命的危机，因为连激烈爆发的起义也会在这个帝国内变成慢性的而且显然是不治的病症；这个帝国是如此腐化，它已经既不能够驾驭自己的人民，也不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正当英国人在广州同中国的下级官吏争执不下，并且在英国国内讨论叶总督是否真是遵照本国皇帝的意旨行事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时候，俄国人已占有了黑龙江以北的领土和该河南岸满洲的大部分土地；他们在那里建筑了工事，进行了铁路线的勘查工作并预定了未来的城市和港口的地点。当英国终于决定打到北京，当法国希望为自己捞到一点东西而追随英国的时候，俄国，——尽管它正好在这个时候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竟能挺身而出充当衰弱的中国的秉公无私的保护人，而在缔结和约时俨然以调停者自居；如果我们将当时所缔结的各项条约比较一下，就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件一目了然的事实：这次战争不是对英国和法国有利，而是对俄国有利。

各参战国得到的利益（其中也有俄国和美国的份），具有纯粹商业的性质，而且正如我们以前所指出的，这些利益大部分都是虚妄的。在目前条件下，中国的贸易（除鸦片和若干数量的东印

度棉花以外),还是应该像过去一样,主要只限于中国商品即茶叶和丝的出口,并且这种出口与其说是取决于中国政府给予多少方便,不如说是取决于外国的需求。在南京条约订立以前,世界各国已经设法弄到茶叶和丝,而在这个条约订立以后,由于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使广州的一部分贸易转移到了上海。其他的口岸差不多都没有进行什么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五个开放的口岸。至于在长江上开放贸易,为了谨慎起见,在中国皇帝还不能完全恢复自己在长江沿岸起义地区内的权力以前,必须延期,也就是说遥遥无期。但是关于这个新条约的价值,还产生了另一些怀疑。有人说,英中条约第二十八条所规定的子口税纯属子虚。过去曾有人认为这种税是存在的,但是这种意见所持的根据,只是说中国人不很需要英国商品,因此这种商品根本就不销往内地,然而有些能满足中国人需要的、经由恰克图或西藏运去的俄国布匹,却甚至锁到沿海各地。人们没有想到,如果这种子口税是存在的,那末它们也会像适用于英国商品一样适用于俄国商品。可是,曾被专门派往中国内地的温格罗夫·库克先生,未能发现这种假想的“子口税”,他在答复人们公开向他提出的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时承认,他已“痛心认识到,我们对中国的了解实在是极其明显的无知”⁴¹²。另一方面,英国贸易大臣约·沃·汉利通过报纸回答“是否有材料说明确实存在着这种内地税”的问题时,十分清楚地说道:“对于你们感兴趣的、有无关于中国内地税的材料问题,我无法奉告。”这样,约翰牛除了颇不愉快地意识到额尔金勋爵在要求赔款时未规定付款期限,并且将战事由广州转到京都只是为了订立一个将使英国军队重新由京都回到广州去作战的条约以外,脑子里还产生了一种模糊的

疑虑，以为英国不得不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来偿付条约中所规定的赔款，因为第二十八条很可能诱使中国当局对英国制造品规定 7.5% 的子口税，这种税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变为 2.5% 的进口税。伦敦“泰晤士报”为了不让约翰牛过细考察自己的条约，认为必须假装遣怒于美国公使，气势汹汹地责骂他把事情弄糟了，虽然事实上他同第二次英中战争的失败毫不相干。

因此，就英国的贸易来说，和约所带来的只是新的进口税和一系列的条件，这些条件不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就是中国人无法遵守的，因而随时可能成为挑起新战争的借口。英国没有增加任何新的领土——如果它不给予法国同样的权利，就不能提出领土要求，可是让法国借助英国进行的战争来在中国沿海得到领土，对于英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至于俄国，它的地位就完全不同了。它除了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的利益以外，还得到了黑龙江沿岸地区，这个地区是它悄悄地占领的。俄国并不满足于这一点，它已设法成立了俄中委员会来确定边界，而我们知道，这种委员会在俄国手中是什么东西。我们曾看到这种委员会在土耳其的亚洲边界上的活动情况，二十多年来它们在那里把这个国家的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直到最近这次战争才打断了它们的活动，所以现在这项工作又该重新开始了。其次，在条约中有关于调整恰克图和北京之间的邮政的条款。从前那种不定期的、只为中国当局所容忍的通信路线，现在要变成定期组织的和法定的通信路线。在这两个地点之间预定每月有一次邮政交通；而且相距约 1000 英里的路程只需走十五天；此外，在这条路上，每隔三个月将派出一支商队。无疑地，中国人或者不愿执行或者不能执行这个职务；既然邮政交通现在已作为权利赋予俄国，其结果是这种交通将逐渐

转入俄国人手里，我们曾看到，俄国人怎样在吉尔吉斯草原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堡垒线；我们深信不疑，用不了几年，同样的一条路线将穿过戈壁沙漠，那时候关于不列颠统治中国的梦想将完全破灭，因为俄国军队不论哪一天都能够向北京进发。

不难想像，在北京设立常驻使馆将有什么样的结果。请回想一下君士坦丁堡或德黑兰吧。只要是俄国外交同英国外交或法国外交交锋的地方，俄国外交总是占上风。俄国公使在几年以后就能在与北京相隔一个月路程的恰克图拥有足以达到任何目的的强大军队和一条供这支军队顺利进军的道路，——这样一位俄国公使在北京将是威风凛凛的，有谁能怀疑这一点呢？

十分显然，俄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亚洲的头等强国，它很快就会在这个大陆上压倒英国。由于征服了中亚细亚和吞并了满洲，俄国使自己的统治权扩大到一块与整个欧洲面积相等的领土上（俄罗斯帝国不包括在内），并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进入了温带。中亚细亚各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很快就会住满俄国的移民。以这种方式获得的战略阵地之对于亚洲，正如在波兰的阵地之对于欧洲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占领土尔克斯坦威胁着印度；占领满洲威胁着中国。而拥有 450000000 人口的中国和印度，现在是亚洲的举足轻重的国家。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10 月 25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11 月 18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84 号

弗·恩格斯 对蒙塔郎贝尔的起诉

1858年11月6日于巴黎

蒙塔郎贝尔伯爵是投到路易-拿破仑的 coup d'état 方面去的法国第一个比较闻名的人物。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他曾在众议院代表天主教政党；在共和国时期，他曾属于国民议会中那个由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组成的反动政党，这个政党为了更有效地颠覆共和国而在表面上接受了共和国，尽管它希望为波旁王朝的这个或那个支系效劳，实际上却正好为路易·波拿巴效劳，这位路易·波拿巴在一天早上把他们全部逮捕和遣散，并且承蒙酒醉酩酊的大兵的恩情掌握了绝对无上的权力。蒙塔郎贝尔遭受到这次强迫解散之后，加以他过去是一个奥尔良派分子，于是便成了头一个、并且除开杜班先生这“一个可耻的例外”至今还是唯一的投向波拿巴营垒的法国议会知名人士。当时整个法国陷于政治瘫痪的情况下，蒙塔郎贝尔的这一背叛行为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它对于当时还靠一道由士兵组成的厚墙作为护壁而与整个法国分隔开来的新政府说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使蒙塔郎贝尔迷住心窍的，是路易-拿破仑政府的明确的天主教倾向。据传他还到手了别的更具体的东西。有一个时期，蒙塔郎贝尔以立法团成员的资格支持政府；他讨好和奉承那个以军事独裁代替

议会辩论的人；他下流到以能置身于这个幸运的篡位者的傀儡行列，受他的委托去按照他的意旨通过法律和拨款为荣（正是通过法律和拨款，而不是议论，即或议论，也只能夸耀他）。但是，蒙塔郎贝尔这样自愿贬低身价，并未得到任何报偿；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作用；他已经同先前在政治上的朋友永远分手了；他已经永远败坏了自己的声誉；他已经再也不能成为一个危险的对手了；他已经像一只橘子一样被榨干了——为什么还要再对他客气呢？蒙塔郎贝尔受到冷遇之后，发现路易·波拿巴用以拯救过并且还在继续用以拯救法国的方法，即迫使所有的人都按照他的意旨行事，终究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不禁把他在众议院中的地位同十年或二十年以前他在那同一座大厦里通常所占的地位作一番比较；于是他开始逐渐反对起政府来了。他这样做，曾在一定限度内得到了容忍；他最初的两三篇演说甚至得到许可予以发表。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和少数曾宣誓效忠政府的共和派议员以及一些心怀不满的波拿巴分子，便在这个可怜的议会里形成了一种反对派——这个反对派跟它所属的机构同样可怜。

这种对皇帝的进一步侵犯行为表示反对，看来使蒙塔郎贝尔在一部分资产阶级中赢得了些许声誉，而他显然想找机会施展某种大胆而出人意料的手腕来提高这种声誉。他和“记者”杂志⁴¹³有联系，这个杂志几乎完全是属于布洛利家的，因此它所执行的是奥尔良派的政策。蒙塔郎贝尔趁布洛利家不在巴黎的空隙，在杂志上发表了他的一篇题为“英国议会关于印度问题的辩论”的文章，如果谨小慎微的布洛利父子能当场施以影响，这篇文章是不会准予以现有形式发表的。在这篇文章中，蒙塔郎贝尔企图为他皈依波拿巴进行 *amende honorable*〔公开的忏悔〕；他把英国的议

会政治捧上了天，借以毫不隐讳地斥责法国当前的政治制度。

“当我的耳朵有时被议会记者的窃窃私议声，有时被那些自命为我们主人的狂信家或者那些把我们看做牺牲品的伪君子的叫喊声闹得发聋的时候；当我在一种充满了奴性和腐朽臭味的环境压力下感到透不过气来的时候，我就赶紧跑开去呼吸一些比较清新的空气，并且到英国的自由之海去洗一个令人神清气爽的海澡……如果在翻开这些篇页的人们中，有谁崇尚那种时髦波拿巴主义的和君主专制的时髦，那末我就要坦率地对他们说：停下来吧，别读下去了；我要写的东西不能博得你们的青睐或者使你们感到兴趣，还是到你们那悠闲自在的肥沃牧场上去安详地咀嚼吧，不要羡慕那些并不羡慕你们而要保持权利继续忠于自己的过去、忠于冥思苦索和对自由的憧憬的人们……我离开这个宏伟的场面，下院的辩论时头一次感到浑身激动；任何人都会这样，只要他认为政府应该高于侍从室，文明民族应该优于一群只供剪羊毛用的或者在软弱无力的安全庇护下被赶着去默默吃草的绵羊。”

这番话说得很动听，并且的确很响亮。近来听惯了法国报纸的谩骂和冷嘲热讽的约翰牛，当然十分感激蒙塔郎贝尔对它恭维备至，以致完全没有想到要察看一下：蒙塔郎贝尔说他要继续忠于的“过去”究竟是什么。大家知道，蒙塔郎贝尔先生是自愿与那些正以窃窃私议声和叫喊声使他的耳朵发聋的议会记者、狂信家和伪君子混在一起的；如果他有意识地沉浸到现在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的充满着奴性和腐朽臭味的环境中去，那只有怪他自己。如果法国现在崇尚的时髦是厌恶任何与缅怀或惋惜过去政治生活相像的东西，那末蒙塔郎贝尔先生大张旗鼓地投到那宣布了以完全和彻底破坏“过去政治生活”为基础的新纪元的营垒里去，就是最先提倡这种时髦的人物之一。至于那些满足于在悠闲自在的肥沃牧场上安详地咀嚼的人们，蒙塔郎贝尔是不能责备他们的。Coup d'état原来正是在需要镇定政治热情和创造这种安宁和悠闲自在的幌子下进行的；如果蒙塔郎贝尔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投

到 coup d' état 方面去，那又是由于什么原因呢？的确，无论怎样攻击路易-拿破仑都可以，但是不能指责他在 coup d' état 之后掩饰了自己的政策或意图。他打算把法国人民变成一群只供剪羊毛用的或者在软弱无力的安全庇护下被赶着去默默吃草的绵羊，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也不曾有过任何误解。蒙塔郎贝尔跟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很清楚这一点。如果他现在仍然挺身而出，要我们钦佩他，把他当做一个不羡慕旧日的波拿巴派朋友而继续忠于自己的过去的人看待，那我们就要问：你指的是哪一个过去，蒙塔郎贝尔先生？是指你在专制议会里一贯为反动、镇压和僧侣狂热主义的利益而发言和表决时的过去呢？还是指你在共和国议会时的过去？你在那里跟你那许多议会里的老朋友阴谋恢复君主专制，把人民的各种自由、出版自由以及集会结社的权利一点一点地否决掉，亲手为那个冒险家锻造了武器，让他利用这些武器把你和你的同伙们全都撵出门外。最后，或者是指你在波拿巴的立法团时的过去？你在那里对这个一帆风顺的冒险家低声下气，心甘情愿投到他门下去当一名侍从。蒙塔郎贝尔先生，在这三个过去中，哪一个包含着你对自由的憧憬呢？我们以为：这需要大多数人好好地“冥思苦索”一番才能弄清楚。同时，路易-拿破仑的政府以提起公诉来回敬了这个不忠诚的仆人，并且本月份就要开庭审讯。我们将有机会把蒙塔郎贝尔先生的义愤与波拿巴政府检察官的义愤加以比较；而且我们甚至现在就可以断定，就诚恳方面而言，他们两人几乎不相上下。这次审判案本身将在法国轰动一时，而且不管它的结局如何，都将是第二帝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蒙塔郎贝尔认为有必要这样明目张胆地与现政府决裂并且引起公诉，这件事本身就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生命开始

苏醒的重大证明。只是这个阶级的极度冷淡——政治上的贫乏和智力上的 blasé (衰竭) 才使路易-拿破仑建立了自己的权力。路易-拿破仑只遭到既不依靠资产阶级又不依靠工人阶级的议会的反对，而他却拥有资产阶级的消极援助和军队的积极支持。议员们马上就被击溃了，但是工人阶级只有经过在全法国进行的一个月斗争以后才被击溃。资产阶级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不是心悦诚服地顺从路易-拿破仑，但是他们毕竟是顺从的，并且把他看做是社会的救主，因而是不可或缺的人物。现在，看来他们已经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们渴望回到那种由他们或者至少是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来管理国家、而讲坛和报刊只为他们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服务的时期。他们显然又开始对自己和自己管理国家的能力充满信心，如果事实如此，他们是会找到方法来表现的。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在法国将会发生一个相当于普鲁士目前所进行的运动的资产阶级运动，正如 1846—1847 年的意大利资产阶级运动曾经是 1848 年革命的先声一样，这个运动也必将是一次新的革命运动的先声。看来路易-拿破仑非常了解这一点。他在瑟堡对一个多年不见的人说道：“遗憾的是这个国家的有教养的阶级不愿意跟着我走，这是他们的过错；但是我有军队，因此我不在乎。”可是，他很快就会发现，一旦资产阶级群众公开出来反对，军队，尤其是有他那种军官和将军的军队，会变成什么样子。无论如何，欧洲大陆看来就要出现一个动乱的时代。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11 月 2 日
左右
载于 1858 年 11 月 24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489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新内阁

1858年11月6日于柏林

经过再三踌躇以后，新内阁终于组成了。这个内阁最好称做普鲁士亲王夫人的内阁。它比柏林庸人们所敢于希望的还要更带有自由主义色彩，而且正如对一个女人的抉择所能预期的那样，在组织它时很少照顾到各个不同成分的协调一致，而是只求达到一个主要的目的——暂时博得各方面的欢心。亲王夫人以道地的贵妇人姿态应酬了每个人：为了天主教徒，她任命了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人为首相，这在普鲁士是史无前例的；为了那些狂热的新教徒，把国民教育部交给一位虔诚的福音派掌管；为了那些有反俄倾向的人，把陆军部委派给一个曾经完全由于沙皇尼古拉的要求而被免去这一职务的将军；为了那些妒恨奥地利的人，把外交部委派给一位曾因不肯俯首听命于施瓦尔岑堡公爵而辞去这一职务的人；为了那些满脑袋官僚政治的人，任命昔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一位遗老为内务大臣——这个职位实际上是那包括行

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编者注

贝特曼-霍尔威克。——编者注

博宁。——编者注

施莱尼茨。——编者注

弗洛特韦尔。——编者注

政 (Regierung) 以至警务在内的整个官僚大军的首脑；为了自由派，给那位曾在 1848 年革命所产生的第一届内阁中任首相的人在内阁中留了一个不管部大臣的位置，这个官职有些像英国政府中的国务会议议长⁴¹⁴；为了自由贸易派，把帕托夫先生请进了财政部；为了保护关税派，让海特男爵仍继续执掌贸易部；为了贵族，让王室的一位亲王担任内阁首脑，而且内阁中所有属于政治工作的职位都用贵族来担任；为了资产阶级，把司法、贸易、国民教育、内务等负责实际工作的各部都给予普通的或有贵族封号的资产者；为了宫廷奸党的敌人，以同格尔拉赫将军等人有私仇的人物组成了内阁的大多数；而为了那些生怕任何类似议会的所谓更换内阁的做法在普鲁士风行起来的保守派，则留用了一些曾经做过曼托伊费尔的同僚的大臣，这些人都是曼托伊费尔自己挑选的，他们都在 1848 年 12 月宣布 coup d' état (政变) 的命令上签过名。

可见，新内阁的特征是折衷主义——造成这种折衷主义的原因是力求面面俱到，然而，这种面面俱到被不肯为之作出任何重大牺牲的坚定决心所限制。我只想提到新内阁的一个特征，这是冷静的政治观察家们毫不在意、但柏林的小市民极感兴趣的一个方面。在新任命的内阁大臣中，没有一个人的名字不令人感到是对普鲁士王后打出的一张王牌，没有一个人的名字不令人感到是她那位心怀不善的弟妇为嘲讽她个人而写下的诗句。关于新内阁人选在柏林较有头脑的那部分人中间所产生的总的印象，我想借用我的一位柏林朋友的话来描述。正式的公报是发表在“国家通报”⁴¹⁵今天的晚报版上，就是说大约在下午 6 时光景才发表的，但

奥尔斯瓦特。——编者注

是在这以前很久，确切的人选名单已在菩提树街⁴¹⁶的人群中间随意地传阅开了。我在那里遇到了刚才提到的那位朋友，他是柏林一个普通的酒店小政客。我问他对新内阁的看法如何，“城里”一般人对它的看法又如何。然而，在告诉读者他是怎样回答的以前，我必须先向你们介绍一下柏林的普通的酒店小政客是怎样一种人。这种人浸透了这样一种思想：柏林是世界第一城市；除柏林以外，什么地方也找不到《Geist》〔“精神”〕（这是个无法翻译的概念，尽管从语源学上讲来，英文的 ghost〔鬼魂〕同它是一个字；法文的 esprit〔机智〕则完全是另外的东西）；Wei bier〔白啤酒〕——外地来的蛮子都不爱喝的一种饮料——就是“伊利亚特”中所说的甘露，“艾达”⁴¹⁷中所说的蜜酒。除了具有这些无伤大体的偏见之外，我们的普通的柏林明星是不可救药的空谈家，喜欢信口开河、说短道长、醉心于一种在德国被称做 Berliner Witz〔柏林式风趣〕的低级幽默，这种风趣与其说是玩弄思想，不如说是玩弄字眼，它是一种古怪的混合物，里面有一点讽刺，有一点怀疑论，还有大量的粗俗不堪的东西。总之，这种人是人类的不太杰出的、同时也不太有趣的标本，但毕竟是一种相当有特色的类型。就这样，我的那位柏林朋友用纯粹柏林式的幽默，引用席勒“大钟歌”中的这样一节来回答了我的问题。我还应该 en passant〔顺便〕指出一点：我们普通的柏林人通常颂扬的只是歌德，而引用的只是席勒。

《O zarte Sehnsucht, sü es Hoffen,
Der ersten Liebe goldne Zeit!
Das Auge sieht den Himmel offen,
Es schwelgt das Herz in Seligkeit:
O, da sie ewig grünen bliebe,
Die schöne Zeit der jungen Liebe》

（啊，柔情的苦恼、甜蜜的希望、初恋的黄金时代！眼前是万里无云的晴空，心头是无边无际的快乐。啊，愿初恋的黄金时代的花朵，永不雕谢！）

现在让我们从爱好诗篇的柏林的酒店小政客回到普鲁士的新内阁上来，并且按照法国的一句古老格言：《à tout seigneur tout honneur》〔“按其德才，予以荣誉”〕，首先把注意力放在普鲁士亲王夫人的密友、首相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亲王身上。他是葡萄牙女王的父亲，曾经坚决不肯做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国丈。然而他却是波拿巴的一位近亲。他的母亲是拿破仑新封为王的缪拉特的同胞姊妹。他的夫人是巴登大公未亡人、出自博阿尔奈家族的斯蒂凡尼的次女。所以，这位亲王就是使普鲁士王朝、科堡家族和波拿巴王朝之间的亲戚关系联系起来的一个环节。南德意志的自由派曾对他极尽诬蔑辱骂之能事，因为他在1849年放弃了他在小小的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邦的王位，并依照家族协定把它卖给了统治着普鲁士的那一霍亨索伦家族支系。在他做这项交易的时候，没有一个德意志公国能值它自己三年收入的价钱，而且这位亲王是最不可能为了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的政治煽动家而继续维持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国的存在的。此外，在南德意志升起普鲁士国旗，不仅是巴登和维尔腾堡的末流政治煽动家所嫌恶的，而且同样也是奥地利所不满意的。这位亲王逊位之后就将军身分到普鲁士军队里服役，在杜塞尔多夫——一个绘画、雕刻和兵营的城市——驻下来。普鲁士王朝的一个旁支从前在这里设有一个小朝廷。因为杜塞尔多夫的居民参加了1848年革命，他们

的行动最高竟发展到在国王路过该城时向他举行群众示威，所以为了惩罚他们，杜塞尔多夫就被剥夺了在那里设置弗里德里希亲王朝廷的幸福，而被贬入普通城市之列，必须设法在没有朝廷主顾的情况下过日子。因此，这位霍亨索伦亲王在杜塞尔多夫的出现就很可以算是一件大事了。他无需有什么出色的作为，单是他来到此地这一事实本身就使他大出风头，正如歌德关于一位伟大人物所说的那样，他是以自己的身分，而不是以自己的行动来酬答人们的。他的声望以异乎寻常的速度从杜塞尔多夫传播开来。由于他同时既是王族的一员，又是天主教会的信徒，也就为他完成了其余的一切。对莱茵普鲁士的那部分狂信的居民说来，再不需要什么别的品德了。可以肯定，莱茵普鲁士、威斯特伐里亚、西里西亚以及波兹南这些地区的势力强大、组织完善的天主教僧侣，对于一个以罗马天主教信徒为首的普鲁士内阁，将不遗余力地加以支持。其实这样倒很好。对于 1848 年的革命，再没有比罗马天主教僧侣所采取的对态度为害更大的了。他们由于革命而获得了大量好处，即赢得了可以同教皇直接来往、可以建立女修道院和男修道院的权利，还有一点并不次要的，是可以购置地产的权利。这些圣徒们为了酬答他们所赢得的这些特权，在革命失败的时候当然是恶狠狠地来打击它。他们充当了反动派的最残暴的工具，现在最好不要让他们再混入反对派的阵营。关于别的内阁大臣，我以后还要找机会再谈。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11 月 6 日
载于 1858 年 11 月 24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489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新内阁

1858年11月9日于柏林

“日月流转，时间的报复难逃。”我在前一篇通讯里已经说过，新内阁的副首相奥尔斯瓦特先生曾任革命时期第一届正规内阁的名义首脑。当时对他的任命被看做是反动的征兆；而在十年以后的今天，这件事却被认为是进步的征兆。上一次，他是那位被革命风暴从科伦的账房卷到柏林普鲁士国王宝座跟前的谷物商人康普豪森的继任者。奥尔斯瓦特内阁从1848年6月底存在到同年9月7日。不论他那时可能做些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单是他的名字列在内阁的名单上，在1848年6月就有巨大的意义。他的前任，康普豪森是莱茵普鲁士人，奥尔斯瓦特是东普鲁士省人；前者是原无一官半职的商人，后者是国家官吏；前者是资产者，后者是贵族；前者富，后者穷。可见，情况很清楚：在1848年6月底，即在三月事件以后仅仅过了一个月，普鲁士革命的钟摆就从西部摇摆到东部，从与法国为邻摇摆到与俄国为邻，从凡夫俗子一边摇摆到大官僚一边，从资产阶级一边摇摆到贵族一边，从钱袋上摇摆到爵位头衔上。如果除去他的名字所具有的意义不算，不

莎士比亚“第十二夜”第五幕第一场。——编者注
见本卷第671—672页。——编者注

能说奥尔斯瓦特在他的内阁存在的三个月期间做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如果你向一个普鲁士人询问前届奥尔斯瓦特内阁的情况，他很可能活像古迪布腊斯⁴¹⁸一样，把食指戳在额头上，满认真地擦来擦去，最后恍然大悟似地说道：“啊，你说的是汉泽曼内阁吧！”的确，奥尔斯瓦特内阁的灵魂是在这以前参加过康普豪森内阁的财政大臣汉泽曼。所以，为了说明奥尔斯瓦特作为首相的活动，我们必须谈谈汉泽曼。

汉泽曼是亚琛的商人，他在 1847 年联合会议上对普鲁士王室所说的一句后来广泛闻名的话，扼要地表达了他的政治信条：“左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In Geldsachen hört die Gemülichkeit auf.）如果许可 *parva componere magnis*（以小比大），这句话在当时的情况下无异于西哀士的名言：《Le tiers-état c'est tout》⁴¹⁹。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统治时，即除普鲁士各大学的讲师以外没有人敢动笔谈论政治的时候，汉泽曼出版了一本将普鲁士与法国作比较的书⁴²⁰，书中充满了对法国的好感，但是写得非常巧妙，语调非常温和，连普鲁士的书报检查机关也不能够禁止这一亵渎的对比。当股份公司在德国还 *rara avis*（极其稀少）的时候，汉泽曼就雄心勃勃地想成为德国的哈德逊，而且表明了自己在那种目前盛行于所有文明国家并且甚至已由 *Crédit Mobilier* 之类的机构变成一套制度的交易所投机生意方面是个真正的行家。当老派的德国人还认为破产有损于一个人的名声的时候，汉泽曼就想方设法来证明，轮流破产在商业上几乎和轮种在农业上一样有益。这个人在奥尔斯瓦特名义下的施政，所根据的是这样一种错误概念，即以为历时几个星期的革命似乎已经充分动摇了旧的国家基石，王朝、贵族和官僚似乎已经受到足够的凌

辱，资产阶级似乎已经永远取得政治优势，所以这时要做的事只是把愈益高涨的革命浪潮平息下去了。

内阁如此成功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即打垮那些想打垮现行制度的人，以致它自己存在了三个月就被打垮了；这些自由派的逢迎谄媚之徒，被他们背后的、只把他们当做工具使用的宫廷人物粗暴无比地一脚踢开了。奥尔斯瓦特和汉泽曼结果扮演了上当的骗子的可怜角色。此外，奥尔斯瓦特还陷于必须对普鲁士的对外政策负责这样一种极为不妙的处境，因为他一身兼任首相和外交大臣的职务。如果说内阁的对内政策至少是由被革命成就吓倒的资产阶级的明显利益所决定，那末对外政策完全是由宫廷奸党所操纵，奥尔斯瓦特不过是他们手中的傀儡。1850年6月，他被任命为莱茵普鲁士省省长，但不久即被威斯特华伦先生免职。威斯特华伦先生把自由派逐出普鲁士官僚集团，就像苏格兰贵族把农民从领地上赶出去那样铁面无情。作为下议院(Abgeordnetenhaus)议员，奥尔斯瓦特仅限于进行微弱到只有政治上百依百顺的人才能看得出的反对行动。奥尔斯瓦特是东普鲁士省自由主义的贵族代表人物之一。这种自由主义所包括的内容是：对反拿破仑战争的怀念和当时最开明的爱国者所抱的志向；某些被科尼斯堡这个康德哲学大本营几乎视为独有财产的一般观念；种植谷物的地主和经营谷物出口的滨海城市居民的利益的统一；最后还有各式各样的自由贸易理论，因为普鲁士的这一省份不是工业区，主要靠向英国出售农产品维持生计。

外交大臣施莱尼茨先生以前在1849年就曾经一度担任过外交大臣的职务，他在短短的任期内密切接近了哥达党⁴²¹；这个党一旦得势，就要把德意志劈作两半——北部并入普鲁士，南部并入

奥地利。实际上，由这两个大的敌对的君主国分吞整个德意志，正是哥达党毫不隐讳的目的。如果它真能弄出两个德国，那结果就会引起你死我活的冲突，造成一次新的三十年战争，最后，两个敌对的德国互相厮杀的收场将是半个德意志被俄国拿去，另外半个落到法国手里。

陆军大臣博宁先生，我在前一篇通讯中已经提到过。这里我只想再补充一点：他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⁴²²中任统帅的时候，与其说他的拿手好戏是迫害丹麦人，不如说是迫害在德意志旗帜下作战的民主派志愿军。这场战争，如所周知，是现代外交中的血腥闹剧之一。财政大臣帕托夫先生曾经是康普豪森内阁的成员。几年以前，在下议院，他曾被 Krautjunker〔顽固守旧的容克地主〕指为革命分子。同时他还受到人身侮辱，结果引起了他与普费尔伯爵的决斗。这次决斗使他一度成为柏林公众的红人。如果帕托夫是在英国，那他会成为利物浦财政改革协会会员的。

关于农业大臣皮克列尔伯爵，只有一点可说：他是“亡人遗信”一书的那位失意作者⁴²³的侄子。贝特曼-霍尔威克从前做过波恩大学的学监；学监这种职务实际上就是普鲁士政府在国家学府中普遍设置的大宗教裁判官。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代，他们迫害政治鼓动家；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时代，他们迫害异教徒。贝特曼执行的是后一种任务。在革命前，他实际上属于国王手下的宫廷奸党，只是当这个奸党干得“太过分”的时候，他才离开了它。

司法大臣西蒙斯和贸易大臣海特男爵是曼托伊费尔内阁中留

见本卷第 671 页。——编者注

下来的仅有的两位阁员。这两个人都是莱茵普鲁士人，但又都出生在莱茵河右岸的新教地区。因为新内阁中需要包括一些莱茵普鲁士人，同时又必须把莱茵的自由派排斥在外，于是这两个人便保住了自己的职位。西蒙斯可以拿来夸口的成绩是，他使普鲁士的法庭堕落到连普鲁士王国最坏的时期都没有达到过的地步。海特男爵是爱北斐特的富商。他在 1847 年曾这样议论国王：“这个人时常欺骗我们，以致我们无法再信任他了。”(Dieser Mensch hat uns so oft belogen, da wir ihm nicht länger trauen können.) 1848 年 12 月，他参加了 coup d' état 内阁。目前他是唯一被怀疑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普鲁士内阁大臣。到处都盛传他经常把国家机密供给爱北斐特的海特公司利用。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11 月 9 日
载于 1858 年 11 月 27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492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普鲁士状况

1858年11月16日于柏林

我在以前的一篇通讯中曾经指出过新内阁的折衷调和与成分复杂的性质。“十字报”⁴²⁴就新内阁的这种性质发了一大套嘲讽的议论：

“制度行将改变。但是请问这次改变究竟是怎样一回事？现今被废弃的制度到底怎样，即将采取的新制度又将遵循什么样的原则？代表这个制度的指导思想的是谁？是身为内阁首脑的亲王兼天主教徒呢，还是官居宗教和教育大臣的新教联盟的盟员呢？能够指望曾做过民主派议员的财政大臣同上述人物团结一致吗？此外，旧普鲁士官僚政治的宿将能够以自己的观点迁就帕托夫先生的观点吗？”

11月12日，全王国举行了 Urwahlen（初选）。初选选出的 Wahlmänner（复选人）将在本月23日选举议员。谁也不喜欢自己妻子的适度的贞操或者自己债务人的适度的偿付能力，可是，适度的自由却是在 Urwähler（初选人）中间适度地传布的口号。在普鲁士社会中迄今站在运动前头并且奉行着可以称做 liberalismus vulgaris（庸俗自由主义）的政治信条的那部分人身上，什么品质都有，唯独没有英勇精神。1848年，在那不勒斯、巴黎、维

也纳爆发革命以前，他们一动也不敢动。但是目前，由于各种情况的绝妙安排，这些人的处境要求他们为大陆上的政治运动发出开始的信号。他们由于自己背后有大量的军队监视着，周围有十二月二日的法国、重新统一起来的奥地利、永远虎视眈眈的俄国从三方面包围着，因此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而不能不感到相当犹豫。此外，革命在他们头脑里记忆犹新，并且他们认为，不应该吓唬摄政王，使他不致抛掉他在不久以前得到的立宪主义。于是一个自由派英雄就恳求另一个自由派英雄来给他帮个忙，就像有一个丈夫看到自己的妻子在外面受到一个军官的公开侮辱时对妻子所要求的那样：“拉住我，”——那位好汉高声喊道——“不然我会报复的，那就要发生流血事件。”实际上，这里不可能有任何幻想。普鲁士的运动，在当地所理解的意义上来讲，只存在于极有限的范围内；只要一超出这个范围，它就要或者开倒车，或者变为整个大陆的运动。这后一种可能，会使大资产阶级和摄政王都同样感到可怕。这里有一件事实，可能没有一家报纸会披露，但是我可以担保它的可靠性。摄政王在最近一次视察布勒斯劳时，曾在给这个城市的高级官员举行的招待会上非常郑重其事地宣称：革命的火焰尚未熄灭；欧洲还有新的革命爆发的危险，因此，中等阶级的义务和利益都要求他们团结在王室周围，要紧的是，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严格地保持温和适度，从而根本杜绝无原则的蛊惑家（gesinnungslose Demagogen）可能出头的机会。这跟不久以前一位很有头脑的普鲁士贵族对我说的话完全相符：“你知道是什么东西使国王发疯的吗？”——他说道，——“是赤色共和国的魔影。他的兄弟，尽管这是个没有任何幻想、庸庸碌碌、平凡无奇的迂腐人物，同样也是时时刻刻被这同一个魔影弄得心惊

肉跳。”

总的说来，自由派Wahlmänner〔复选人〕在较大的城市获得了胜利，而臭名昭彰的反动派则在乡村中获得了胜利。选举在乡村里是怎样组织的，可由这样的事实来判断：县长在自己管区内私下对Urwähler（初选人）散发了通知书，要他们选举某人某人。必须指出，在普鲁士，县长占有极特殊的地位。在普鲁士所有各省（只有莱茵普鲁士例外），县长都是大地主，他们的地产，正像英国郡里的治安法官的地产一样，都是在他本人所辖的行政区内。同时他又是官僚政治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由他所在的地方上选出，由王室任命，属Regierung（一种委员制的机构）管辖，这种机构设于较大一级的行政区的一个中心城市里，但是在他的管区（普鲁士人称之为Ressort）内，他是政府的最高代表。可见，这些县长集Krautjunker（猎狐者）⁴²⁶和官僚于一身。他们和大多数政府官吏不同，并不完全靠官薪过活；他们光景最差的也是土地贵族家庭的非长子，每年向国家领取的1200元薪俸，其实父兄叔伯也是能够供给他们的。因此，一般说来，他们的利益，同土地贵族的阶级利益和党派利益比同官僚集团的利益有更密切的关系。刚刚被推倒的内阁的主要支柱就是他们。他们根本不把自己看做中央政府的工具，反倒认为政府是为他们自己的社会利益服务的工具。目前，他们对新内阁进行反抗，新内阁没有敢于撤免他们，这一部分是因为采取这样的坚决步骤会大大推动一切革命倾向，破坏普鲁士的行政常规；一部分是因为县长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用来约束农村居民，从而造成一种对城市的自由派的均势。到

区的行政机关。——编者注

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县长被撤免，即波美拉尼亚的克拉索夫伯爵，因为他在给 Urwähler〔初选人〕的通知书里竟大胆地辱骂内阁。

从 1852 年起，没有公布过任何人口调查的材料；但是由上次人口调查的数字，完全可以大致了解到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对比关系。在 1700 万居民中间，有 1200 万人分散在农村，只有 500 万人集中在城市里，而这些城市绝大部分都只能算做村镇。王国的 984 个城市中，只有 12 个主要城市可以夸耀它们的居民共达 100 万，而 500 多个城市居民各不满 2500 人。工业人口在普鲁士省占 11%，在波美拉尼亚占 15%，在波兹南占 18%，在西里西亚占 23%，在威斯特伐里亚占 26%，在萨克森占 28%，在莱茵普鲁士占 25%，在勃兰登堡占 37%。不过在这最后一个省份里，几乎全部工业人口都集中在柏林。王国全部人口的 60% 都完全从事农业，平均每 263 人中间有一人是贵族。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11 月 16 日
载于 1858 年 12 月 3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497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 法国调整粮食价格的方案

法兰西皇帝刚刚着手实现自己得意的方案，即在全帝国调整粮食价格的方案。关于这种调整价格的主意，他还在 1854 年由于对俄国宣战而向立法团所做的一次演说中就已经明确地谈到过了。当时他对这个问题所做的声明值得再提一下，现在我们把它重述如下：

“我特别建议你们注意巴黎市目前所采用的制度，因为如果这个制度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在全法国推行，那末，今后就能防止谷物价格的急剧波动。这种波动在产品丰富时，使得农业由于小麦价格低廉而停滞不前，在荒年则由于小麦价格高昂使贫苦阶级遭受沉重的苦难。这个制度就是在所有的大居民点建立叫面包业银行 (Caisse de la boulangerie) 的信用机关。在产品缺乏的年代，这些银行就能供应居民比官方市场价格低得多的粮食，而在产品丰富的年代，粮食价格则稍高于市场价格。因为丰收年成一般总是比歉收年成多，所以很明白，补偿降低的价格是并不困难的。此外，由于有了信用组织还会有极大的好处，这些组织不是力图靠提高粮食的价格来得利，而是和所有的人一样关心粮食价格低廉，因为情况一反前此，这些组织将在丰收的年代获得收益，而在价格高昂的年代遭受亏损。”

这段话所表明的一个原则就是，在歉收年代出售粮食要比市场价格低“得多”，在丰收年代则仅仅“稍”高于市场价格，其中关于可望的有利的补偿费是推测丰收的年代比歉收的年代多得多

而得出来的。还在 1853 年 12 月根据皇帝的诏书建立起巴黎的面包业银行的时候，一个 4 磅重的面包的最高价格规定为 40 生丁。面包房老板有权要求银行补偿自己的损失，银行也发行了由巴黎市政厅担保的债券来建立这种必要的基金，而巴黎市政厅这方面则靠新公债和提高巴黎各关卡征收的消费税的办法也建立了保证金。此外，还有一部分款子是直接由政府从国库资金中拨付的。到 1854 年年底，巴黎市政厅的这些债务以及由政府拨付的款项总数已达 8000 万法郎。于是政府不得不食言，把一个面包的最高价格先提高到 45 生丁，后来又提高到了 60 生丁。这样巴黎居民通过提高了的消费税必须部分地付出他们在面包价格上节约下来的钱。而法国其他地方就必须在政府直接资助巴黎市政厅的形式下缴纳接济首都的普遍的慈善捐。但是这个试验却完全失败了：在 1855—1857 年的歉收年代，巴黎的面包价格高于官方的最高价格，而在 1857 年和 1858 年的丰收时期却又低于官方的最高价格。

路易·拿破仑对这次较小规模的试验的失败丝毫不感到难堪，现在他又根据他自己的指示在全帝国着手组织面包业和粮食贸易。几星期以前他办的一张巴黎报纸试图使人们相信，所有的大城市都必须筹设“谷物储备”。并且断定在最坏的歉收年代，谷物缺少的最大数字等于全体居民二十八天的需要量，而平均的连续不断的歉收年数是三年。由这些前提得出一个结论：“足够的三个月的储备，——这就是人的预见性所能做到的。”如果这个措施只在至少有 10 万居民的城市中推行，全法国这样的城市人口（巴黎不算在内）就有 377 万人，那末，在每人三个月的平均需要量为 45 公斤小麦，而现在小麦的价格每百公升大约是 14 法郎的情况下来推算，这种储备将值 3100 万法郎到 3200 万法郎！所以 11

月 18 日的“通报”公布了如下的法令：

“第一条：在面包业受各项法令和命令约束的城市中，面包房老板的粮食储备根据各面包房在三个月期间每天烤面包所需要的谷物或面粉量来规定。

第二条：自本日起的一个月内，各省省长向各地方自治机关了解情况以后，应该决定储备物是面粉还是谷物，并且规定应该完成储备的期限和确定可以交给公共仓库保管的那一部分储备的数量。”

这个法令还附有一份“面包业受约束”，因而必须建立储备的城市的名单。除了巴黎和里昂（这两个城市已经有了储备，因而不受这个法令的支配）以外，法国所有比较重要的城市都列入了这个名单。整个名单包括的城市不下 161 个；其中有马赛、圣昆廷、木兰、卡昂、昂古列姆、第戎、布尔日、伯桑松、埃夫勒、沙特尔、布勒斯特、尼姆、土鲁斯、波尔多、蒙彼利埃、勒恩、图尔、格勒诺布尔、圣亚田、南特、奥尔良、翁热、里姆、夏龙、麦茨、利尔、杜埃、瓦朗西恩、博韦、阿拉斯、圣奥梅尔、加来、梅尔河岸布伦、斯特拉斯堡、牟罗兹、卢昂、哈佛尔、马康、勒芒、亚眠、阿勃维尔、土伦等。根据最近的统计这 161 个城市的全部居民目前大约有 800 万人！因而粮食储备整个说来应该是 550 万公升，其价值是 7000 万—8000 万法郎。农商大臣在将法令送发各省省长时通知他们：虽然他们“不应强迫面包房老板立即完成此项法令给予面包房老板的义务”，但是他们应当“规定完成这种义务的合理期限”。他容许各省省长根据各地的条件自行决定储备谷物或者储备面粉。然后他又补充说，上述措施推行得不管如何广泛，将来还要更加扩大推行。

“省长先生，政府没有夸大我所说明的这一措施的重要性。政府知道，法令涉及到的只是小部分居民，因此现在政府在研究扩大这一法令的有效范围的可能性。许多村、镇的居民都是自己烤面包，并且从自己的收获中留出供他们一家全年所需的一定数量的小麦。政府干预他们的经济是徒劳无益的和

不可能的。但是，在许多省的主要城市和更多的专区首府及县城，甚至在一些人烟稠密的乡村里，食用的面包有相当一部分是由面包房老板做出来的，而他们不是任何规定的对象，也没有任何储备的义务。不能使这些地方的面包房老板也服从这个制度，使他们也遵守这个有预见性的有益法规吗？政府似乎觉得，它对这一点的规定是不会遇到任何严重的反对的。”

可是，当上述法令在法国所有其他的地方（不包括一些小村庄在内）实行以前，大臣就要各省长同那些还不受该法令约束的那些地方的地方自治机关共同商讨问题。然后，大臣通知各省长应该如何进行储备：

“面包房老板必须尽可能地利用他们店铺里的零星房屋，因为更便于对它们进行 surveillance [看管]。但是，你们应当建议地方自治机关设立一些公用仓库给面包房老板使用，以便按一定的收费价目接受他们自己无法储存的储备。我不怀疑，地方当局的开明的协作会更有助于这一工作的完成。”

然后，大臣谈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从哪里取得钱来贯彻这个法令：

“说到必要的资金的问题，我相信面包房老板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取得他们所需的数额，这种投资前提供营业上的利益，能获得的合法利润是这么多，以致面包房老板要想获得贷款未必会有什么困难，特别是在目前贷款利息这么低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希望所有各市镇的富人都协助面包房老板，那末，我们是否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好意呢？难道他们不能在建立起来的储备中为他们垫出来的款项找到可靠的保证，并且是保证增值而不是在价格中贬值吗？如果你们在这方面的努力获得成功，那末我就很幸运了。我问自己，如果需要，难道地方自治机关不能效法 Caisse de Paris 筹措现金贷给面包房老板吗？为了鼓励和便于获得这种贷款，并使它通过流通增多起来，可以赋予指定储备粮食的谷仓以海关仓库 (magasins généraux) 的性质，这样就可以使它们能够发行一些使我们的金融机关特别是法兰西银行愿意接受的提货单。”

大臣在通告中最后指示，各省长应于二十天内向他报告，他

们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实现法令中的第二条；应于一个月内汇报，不受该法令约束的城乡地方自治机关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目前我们不打算研究公共谷仓问题；但是这个经济上的 coup d' état 的巨大意义是无需详细论述的。大家知道，目前法国的谷物价格极其低廉，因此在农民中间出现了一些不满的迹象。拿破仑试图通过建立三个月的粮食储备造成人为的需求，来人为地提高价格，从而把法国这一农业国的嘴封起来。另一方面，他把自己说成似乎是城市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先知，虽然他扮演这一角色并没有得到特别成功，因为他的法令的最显著的效果将是工人们为自己的面包不得不付出比以前更贵的价钱。“财产的救主”向资产阶级表明，甚至不必通过他那讽刺性的立法机构的正式干预，只要他个人一道简单的命令就可以自由掌握资产阶级的钱袋，支配地方自治机关的财产，违反贸易进程，使资产阶级的金融业务服从于他个人的妄想。

最后，问题还必须从纯粹波拿巴主义的观点来加以考察。在整个法国将会需要作为公共谷仓的大量的建筑物；这里将为投机和盗窃开辟多么新的活动场所！粮食贸易也得到意外的流转。多么大的利润将落到 Cr édit M obilier²⁸和皇帝陛下的其他投机公司！总之，我们相信，戴皇冠的社会主义者在提高粮价上比他在试图降低粮价上会获得更大的成就。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11 月 19 日

原文是英文

左右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12 月 15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507 号

卡·马克思 普鲁士状况

1858年11月23日于柏林

今天是选举日。复选人(人数决不能算多)规规矩矩地聚集起来,作为扰攘不休的大众的代理人履行了选举手续。从一度可能成为潘多拉的盒子⁴²⁶的选票箱里跳出来的,是一种最温和的自由主义,穿上官僚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自我否定的自由主义。本市当选者的头衔本身就足以证明他们不可能怀有恶意。他们当中有一个 Generalstenerdirektor(税务督办),一个 Oberbürgermeister(市长),一个内阁大臣,一个前内阁大臣,一个 Gerichtspräsident(高等审判厅厅长),一个 Geheimer Archivrat(皇家档案官),一个 Geheimer Rat(枢密官)。选出来辅助这一群官僚和“枢密”大员的是两个资产者:一个是莱麦尔先生,保守派兼御用出版商;另一个是费特博士,也是出版商,是由于信奉犹太教而被金融界推选出来的,因为这里的金融界,也和任何地方的金融界一样,绝大部分是属于犹太血统。然而,可以肯定地说,1848年的资产阶级激进分子雅科比、翁鲁、瓦尔德克、洛贝尔图斯、施泰因、埃尔斯纳等人,——总之,就是大约一个月以前我在通讯中

对你们说过很可能在大城市当选的那些人，——的确在初选人集会上起了主导作用，许多竞选纲领都是他们草拟的，而且在布勒斯劳、科足斯堡、马格德堡、埃尔宾，这些地方的省议会里都给他们准备好了议席。这种突然的 *changement de décoration*〔改换场景〕是从何而来的呢？他们谦虚地谢绝了给他们准备的这一切荣誉。有些人这样做完全不是出于自愿，只是在同 *Polizeidirector*〔警察厅长〕进行了一番令人不快的而且远非自愿的谈话以后才决定割爱的。其他人则是屈服于目前支配着一切的、心情焦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但是，警察厅长、候选人、选民，全都是在突然改变了的情势的强烈影响下行动的，或者毋宁说，情势并没有改变，而是笼罩着这些人的幻想的云雾被一阵雷雨冲散了。如法国人所说，*la situation s' était dessinée*〔情况明朗化了〕。政府充满了恐惧，而这种恐惧心理本身驱使它不顾一切地蛮干起来。内务大臣弗洛特韦尔先生发出了一封通知书，这样的通知书在任何一种文字中也没有见过：文理不通、措词混乱、论据荒谬，然而还是充分明显地表达出了怒气。你们当然知道，在法国对报纸提出官方警告是什么意思。那末，弗洛特韦尔的通知书就是对选民的一个普遍警告，而且还有发给警察的密令做后盾。这封通知书直截了当地提到那些曾任 1848 年国民议会议员的激进分子的竞选演说、竞选纲领和告选民书。由于大资产阶级想以温和适度来攻克堡垒，而比较倾向于民主的人民大多数懂得，目前政治主动权操在大资产阶级手里，所以内阁的这一暗示立即生了效，再度中兴的 *grands airs*〔奢华场景〕被丢开了，选举被套进了政府的框框。然而，当你被人粗暴地从美梦中推回到现实里来的时候，你是不会感到快意的。受到关照的那些人、演说和纲领，在其最大胆的翱翔中都极严格地恪守了“实

际理智的界限”，所以连心情焦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也对政府的焦躁表现感到恼怒。政府借以推行这套新的自由制度的方式显得相当粗暴，因此在广大公众中发出了隐隐的失望的怨声，而旧宫廷奸党的报刊则开始纷纷嘲讽新内阁，说它终于表现出了《Selbstbesinnung》〔“明智”〕。那时倒霉的弗洛特韦尔就把他在几个星期以前秘密发给县长们的另一封通知书公布了，这封通知书警告他们不得支持任何持极端意见的候选人。为了给这种不合时宜的做法捧场，内阁的喉舌“普鲁士报”⁴²⁷对这个过去的指示做了如下的评论：

“目前选举有一个特点非常令人欣慰：所有各党派都在君主立宪的基础上取得了一致的观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他们的各种政治纲领的分歧。政府所采取的进步的但是坚定而又温和的政治路线，将以达到这种团结为其主要宗旨。政府决不容许自己由于过分的希望和要求而放弃自己的既自由又温和的原则。另一方面，政府也不能容许一个并不想无条件承认宪法的基础、而只是在宪章符合其本身利益的限度内承认宪章的合法性的党独占‘保皇党人’的称号。政府认为，说大多数土地所有者属于那个党是不正确的”云云。

其实，内阁在这里是枉费心机。亲王在 Staatsrat（国务院）中介绍他儿子时发表了一篇反动的演说，在共济会会员大会上发表了另一篇反动的演说，向 Treubund（一种普鲁士的奥伦治会组织）⁴²⁸发出了反动的号召，他并没有因此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但是他由于在内阁治理下事态的发展而大发雷霆，这却把内阁吓坏了。弗洛特韦尔的第一封通知书是对资产阶级的一个善意警告，要他们切记不可使亲王刚到手的立宪主义受到考验。当内阁大臣们由于这个步骤而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牢靠的时候，他们就打电报给普鲁士亲王夫人，亲王夫人立即从科布伦茨赶到柏林，coup de

baguette〔魔杖一挥〕就使事情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上一年，亲王夫人在魏玛、卡尔斯卢厄、科布伦茨这三个地方轮换居住。只是在决定摄政问题的时候，她到柏林去了一次。由于所有当时给国王看病的医生都不肯明确表示国王的疾病能否治好，王后通过克莱斯特·雷措夫先生找到了一位名叫贝格尔的军医，要他签署了一项表明国王能够恢复健康的文件。于是亲王夫人就假装生病，把这同一位医生找来，要他诊治，以赞誉和优礼迷惑他，当她觉得他已经上了套以后，就直截了当地问他：难道像他这样一个学问高超、心地纯正的人，真的相信他自己所做的关于国王健康状况的声明吗？愚蠢的贝格尔承认说，纯粹是王后的眼泪迫使他做出这个声明的。亲王夫人听后立即一摇铃，立刻跑进来两名侍从，这位军医迫于服从当然的尊长，只好把刚才被套出来的供状不仅口头重复一遍，而且还亲笔写了下来。当亲王夫人这样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后，她被逐出了柏林。在她丈夫立为摄政王以后，她自愿继续留在科布伦茨。威廉亲王也像其他庸碌之辈一样，以夫人才智超过自己而苦恼，虽然他需要人牵引，但又不喜欢看到牵引者的手。所以他的妻子只好以转弯抹角的方式来影响他。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极其冷淡和正式的。威廉亲王在年轻的时候曾热恋布罗克豪斯女士，并且想要娶她。但是由于他父亲的阻挠，这位女士在巴黎衔恨而死。霍亨索伦家族的这个性情倔强的后裔被迫娶了魏玛公主；他为了报复，在婚后的头几年里毫不隐讳他对弗××克女士的深情。可见亲王和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决不是亲密和睦的，亲王夫人为了要在柏林建立自己的内阁，最好的办法就是她本人躲在科布伦茨。

同时，王后也玩弄了一下 Oeil de boeuf 纪事⁴²⁹的读者所熟悉

的那种诡计。你们或许已经在报纸上读到，国王和王后离开柏林的时候，王后的皮包在莱比锡被偷了；无所不能的德国警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未能抓到窃贼。不知什么原因，这个皮包忽然出现在摄政王的写字台上。在皮包里发现了他的妻子亲王夫人同各式各样的政治人物的大批来往信件。有写给拉提博尔 Gerichts - präsi dent (高等审判厅厅长)温采尔的信，他是在柏林刚刚当选的一位议员，是曼托伊费尔当政时期下议院中的反对派成员之一；还有写给普鲁士天主教反对派首脑赖辛施佩格的信以及写给其他人的信，——这些信中全都充满着矫揉造作的自由主义和统一德国的渴望。大家都知道，亲王本来已经被赤色共和国的魔影弄得心神不安，现在又由于发现他自己的妻子同革命家关系如此亲密，就更加心惊胆战了。此外还使用了其他种种手段。我之所以记述这一段 *chronique scandaleuse* (丑闻)——我可以担保这件事的真实性——是因为在君主国家里，往往在革命还没有采取民众骚动的形式以前，王朝的腐败就已宣布它的来临。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11 月 23 日
载于 1858 年 12 月 13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5505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 一八五八年的欧洲

1858年下半年,欧洲的政治生活显得特别活跃。从1851年12月2日到今年年中,就政治方面来说,欧洲大陆好像裹上了一件尸衣。统治者由于依靠自己的军队在巨大的革命冲突中取得了胜利,就有可能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地颁布和取消法令,遵守或者破坏法令。各地的代议机关都变成了空架子,几乎任何地方的议会反对派都不能存在下去,报刊堵上了嘴。如果不是突然爆发的此起彼伏的骚动:米兰起义、萨累诺登陆⁴³⁰、夏龙叛乱、谋杀路易-拿破仑,如果没有翁热等地的某些政治审判案(在审判中,以往的革命精神短时间地、付出很大代价地表现出来,威胁地宣布它的存在),那末可以认为,1848年的经验使欧洲大陆放弃了涉及政治的任何念头,到处都认为军事专制和君主专制制度是唯一适当的政体。甚至在英国,政治改革气氛也日益低落。英国议会全神贯注于法律、贸易和行政的立法,而后者必然趋向于集中。复活群众政治运动的企图终于完全破灭,争取改革的资产阶级政党,在1857年帕麦斯顿的普选中遭到彻底失败以后就无声无息了,而宪章运动也处于完全破产的境地。

见本卷第436—440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417—422页。——编者注

在欧洲各国中,俄国第一个从这种政治昏睡状态中苏醒过来。虽然在克里木战争结束时领土没有多大的损失,就东方来说甚至也无损于威望,但是毕竟伤了俄国的自尊心。第一次迫使它放弃了无论如何决不让出兼并的领土的原则。它的最有组织的部门——军事部门的一切行政制度彻底地破产和崩溃了。尼古拉二十五年来夜以继日地苦心经营的事业被埋葬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堡的废墟中。就国内当前的政治条件来说,除了实行霸权的和极端官僚化的制度外,是不可能实行别的行政制度的。为了给一个比较适当的制度奠定基础,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重新求助于解放农奴的主张。他不得不和两个凶恶的敌人——贵族和官僚制度本身进行斗争,他打算违背这个制度本身的意愿来改革它,而这个制度又应该成为实现他的计划的工具。除了到至今连考虑自己政治地位的权利都被剥夺的俄国农奴、商人这些死气沉沉的群众的消极的传统奴隶性中寻找支持以外,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支持。为了使他们的支持成为现实,他必须制造一种社会舆论,至少应该创办报刊之类的东西。为此放松了检查,容许展开文雅的、善意的、有礼貌的讨论,甚至允许对官员们的行为进行轻微的客气的批评。对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来说(法国除外),现在俄国容许自由议论的程度是可笑的和微不足道的,但是了解尼古拉俄国的人们却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农奴制的废除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困难,但与此同时,俄国社会上比较有学识的人士觉醒起来参加政治生活又完全是一种吉兆。

普鲁士的政治生活也活跃起来了。国王暂时退位不管国事之后不久就表明:他的精神失常已不可救药,他的兄弟迟早要被任命为掌握全权的摄政王。无人任位的这个间隙时期为展开鼓动奠

定了基础；这个借要求确定摄政为名的鼓动，事实上是反对当时不得人心的内阁的。两个月以前，终于确定了摄政，撤换了内阁成员，选出了新的议院，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政治运动一下子为自己扫清了道路，几乎一个不留地从立法部门赶走了原有的大部分人员。普鲁士社会生活目前的这种活跃状态最终会导致什么结果，这个问题本报已作了分析，这里我们仅仅指出政治活跃已经开始这一事实。

德国其他地方已不能不觉察到这个运动的存在。的确，在那些小邦中它已使人有所感觉：随着这个运动在普鲁士采取更为明确的形式，在这些邦中，内阁的改组、各政党力量对比的变化、政治上的动荡也无疑地加剧了。这个运动不仅在德意志的一群小君主国中、而且在奥地利也日益成为极易感觉得到的了。现在奥地利立宪党不可能使政府做第二次设立代表机关的试验，因此，把这个问题诉诸舆论的唯一手段就是赞扬在普鲁士“恢复了健全的立宪政体”。普鲁士在奥地利和德国南部突然享有这样大的声望，简直是奇怪的事情。然而，不管这个运动采取什么形式，重要的是这个运动甚至在奥地利也已经发生了。

意大利是激起运动的另一策源地。在同俄国缔结和约之后比较平静下来的政治狂热病，由于波拿巴主义阴谋的助长而不可避免地笼罩了这个易于激动的民族。在伦巴第，旧的反对烟草垄断的运动重新又展开了。帕尔马公爵夫人不顾在皮阿琴察有奥地利的驻防军，竟允许里斯托丽扮演一个鼓吹同亚述大进行神圣战争的犹滴，来鼓动反对奥地利人⁴³¹。法国占领军在罗马的处境就变得

见本卷第 643—647、648—660、671—684、690—694 页。——编者注

像教皇政府的处境一样困难。甚至那不勒斯也在准备起义，而且，撒丁的维克多·艾曼努尔也指示他的将军们做好准备，因为可能在春天的时候他们又不得不嗅到火药味了。

甚至在法国也弥漫着这种新的潮流。蒙塔郎贝尔反对波拿巴主义的文章⁴³²，就是法国资产阶级重新积极起来的明显表现。现在已经知道，不仅蒙塔郎贝尔又写了另外一篇论文，而且路易·拿破仑的前大臣法卢先生也准备发表激烈的文章来反对现存制度。蒙塔郎贝尔的审判案已经成为法国议会著名议员对统治制度的庄严抗议，成为他们仍然力求恢复议会体制的声明。布洛利、奥迪隆·巴罗、维尔曼以及其他许多这类人物都出席了法庭审判，贝利耶代表他们全体发了言，由于律师在法庭辩护时在某种程度上享有不受侵犯的权利，他慷慨激昂地说：

“不，我们任何时候也不会因为任何代价而背弃我们的过去。你们对我国的估计太低了。先生们，你们认为我们国家是易变的和不稳定的。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又确信这个国家并不希望有一天会回到它所喜爱的、并且实行了半世纪的那种体制呢？是的，我们由于进行长期的斗争、受到艰苦的考验、忍受失望的痛苦而过多地消耗了我们的力量，尽管如此，一旦祖国向我们召唤，我们就一定会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我们会像往日那样热情、顽强和无私地把自己献给祖国，而在临死前我们要高呼：‘自由和法兰西！’”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法庭外面强大的道义力量的支持，发言者决不敢这样向当前法国的整个政治制度公开地宣战。最后，我们看到，甚至在英国，主张改革的鼓动也重新展开了。而且，归根到底是这样：只要议会还没有通过这样一种改革来大大改变各政党的力量对比，从而破坏尊严的但是软弱无力的不列颠宪法的基础，这个问题就一直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向议会提出。

但是，在这个几乎在欧洲各国都是相同的、到目前为止始终

非常和谐地展开的运动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呢？当 1848 年的火山爆发突然在惊慌失措的欧洲自由资产阶级眼前喷出一个为争取自身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武装工人阶级的巨大怪影的时候，把安全地握有自己的资本看得比直接掌握政权重要得多的资产阶级，宁可牺牲它过去所争取的这个政权和一切自由，以便万无一失地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承认自己政治上不成熟和没有能力管理国家事务，甘心屈从于军事官僚专制制度。于是，开始了工厂、矿山、铁路和轮船的忙乱建设，开始了有名无实的股份公司、欺骗和证券投机的 *Crédit Mobilier*²⁸ 的时代，也是欧洲资产阶级竭力用经济上的胜利来弥补自己政治上的失败、以个人的富裕来弥补他们集体的衰弱的时代。但是，随着资产阶级财富的增加，它的社会实力增大了，它的利益也相应地扩大了；资产阶级又开始感到了加在它身上的政治桎梏。目前在欧洲展开的这个运动，正是这种感觉的自然结果和表现。由于十年来工业的发展没有受到任何破坏，每个资产者重新恢复起来的统治工人的信心，加强了资产阶级的这种感觉。1858 年的情况在很多方面同 1846 年相似，1846 年欧洲大部分国家在政治上也开始活跃了起来，也出现了许多拥护改革的执政者，而在两年之后，他们束手无策地被自己为之开辟道路的革命洪流冲击到一边。

弗·恩格斯写于 1858 年 11 月底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12 月 23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51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 普鲁士状况

1858年12月4日于柏林

在前一篇通讯中 我告诉过你们,弗洛特韦尔先生对资产阶级发出的不要把“再度中兴”这场戏演得太过分的秘密警告,使大选发生了多么突然的变化。由于这个缘故,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完全绝迹了。另一方面,下层阶级则无需任何警告,因为他们都自愿地而且相当轻蔑地拒绝了行使那令人啼笑皆非的投票权。由于选举法的规定,只要头等选民和二等选民像目前这样采取共同行动,下层阶级投的选票是丝毫不起作用的。诚然,有少数几个地方,例如柏林,工人阶级的一小部分纳税人参加了选举,但是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是按照雇主的 *mot d'ordre*(命令)行动的。连伦敦“泰晤士报”的“本报通讯员”(他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 *couleur de rose*[玫瑰色的])也不得不在英国的这家大报上承认:广大群众所抱的消极态度,在他刚强的心里也引起了沉重的忧虑。所以,这次选举总的说来是带有内阁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性质的。“十字报”的那一班人好像魔杖一挥都不见了。其中有两个大头子甚至不得不重新回到他们往常发号施令的法院里去,而有些人得以当选,完全是由于

他们的对手的宽宏大量。他们的行列受到多大的损失，单从这样一个事实就可以看出：在 77 名县长当中只有 27 名重新当选。总之，这一班人将只能作为决不是很重要的少数重新登台。

但是普鲁士的立宪主义本性脆弱，以致它为自己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吓倒了。因为选举所产生的两院代表着内阁的自由主义，那末很显然，内阁也就代表着新选出的两院的自由主义，并且由于这个简单的过程而在实际上变成为党派内阁，议会内阁，也就是恰恰变成为那种不应该有的讨厌东西。因此，内阁大臣们不得不立刻在“国家通报”上抗议给他们造成的这种新处境。他们这些由亲王挑选的谋臣，忽然间好像变成了民选的国家执行机构，要靠人民赋予的权力来治理国家。他们在抗议中——“国家通报”上刊登的他们那篇原则性的声明只能叫做抗议——以冠冕堂皇的词句断言，议会内阁或党派政府在普鲁士是根本行不通的；国王，按照上帝的意旨，应该永远是唯一的权力的源泉；内阁大臣们不能事奉二主；人民按照内阁的意旨进行了选举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现在不应该是人民要大臣们听从两院的领导，而应该是内阁要两院服服帖帖地跟着政府走。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内阁是议会政府，同时又不是议会政府。它通过选举排挤掉了王后手下的宫廷奸党，但它已迫不及待地要毁掉自己借以爬上台去的阶梯。由于国王还活着，由于王后还在玩弄计谋，而且在他们的旗帜后面还隐藏着强大的有组织的集团，所以亲王只有选择一个自由主义的内阁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这个内阁又只有求诸普选才能站稳脚跟。由于选民附和了自上而下地对他们所唱的调子，内阁成了党派内阁，而亲王就成了资产阶级的独裁者。可是，忽然间，一心想做禀承天命的普鲁士王位

继承者的亲王，意识到事态使他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处境；他在气恼而又无能为力 的情况下，竟以为用几句话就能够把事实勾销，用些半训诫半威吓的词句就能够改变他执掌政权的实际条件，选举的把戏一结束，他就能重新摆出普鲁士国王的传统姿态。他和他手下的那班人幻想能够哄骗国民，其实只是暴露出他们自己居心不良，串演着 *malade malgré é lui* 的荒谬绝伦的滑稽戏。他们极力要扼止政治上的活跃，其实这样做只是使政治上的活跃摆脱他们的控制。亲王在国务院所做的演说，也应该认为是对内阁抗议书的一个补充，这篇演说全文发表了，因为王后手下的宫廷奸党曾抓住其中某些个别字句不肯放松。

可以说，亲王和内阁大臣们一样，也是在最尖锐的内在矛盾当中转圈子。他选择了一个新内阁，因为他认为解散旧内阁不是什么真正的变化。他想要点新东西，但这新东西必须只是旧东西的翻版。他谴责上届政府强加于这个国家的市政法，因为它把城市自治消灭得一干二净；但是 he 不想改变它，因为这种改变在目前人们头脑发热的情况下可能引起危险的后果。他建议只用和平方法来扩大普鲁士的势力，因此认为必须扩大那本来已经是致命累赘的军队。他承认，要扩军就需要钱；虽然自从革命以后曾举借过一笔国债，但国库却仍然毫不理会对它提出的要求。他宣布增立新税，同时痛斥近十年来普鲁士债务的大量增长。正像他的内阁大臣们不愿做合乎选民理想的内阁大臣但却希望有合乎自己尺度的选民一样，他这位摄政王需要钱来养兵，但是对有钱的人连听也不要听。他的演说中可以认为是明确反对前届政府的唯一

地方，就是他对宗教虚伪所进行的攻击。这是他有意图王后为难，但是为了不致使公众也胆大妄为起来，他这位信奉新教的亲王同时命令警察驱散了柏林的自由天主教徒的一次集会。

你们会同意，这样一种模糊不清的、自相矛盾的、自杀性质的政策，即使在一般情况下也是够危险的；而目前的情况又决不是一般的情况。在法国有爆发革命的危险，为了抵住法国的革命，普鲁士政府在国内必须无后顾之忧才行。延缓法国革命的唯一指望就是爆发一场欧洲大战。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俄国、法国、撒丁将结成一伙反对奥地利。那时，普鲁士为了不致成为大伙的替罪羊，就必须准备好进行一场解放战争，即争取德意志独立的战争，因为如果它敢于同本国臣民作战，它将会像在 1806 年一样，被一拳打倒⁴³³。普鲁士政府完全意识到，法国革命或欧洲大战会使它陷入什么样的困难境地。它也知道，欧洲目前正在这两个路口上徘徊。但是，另一方面，它知道，如果完全听任人民运动自由发展，那末这样从外部防止了的那种危险就会从内部发生。纸面上对人民让步，而在实际上把它们化为乌有——这是耍把戏，一种跟德国人民玩起来可能很危险，而可怜的普鲁士政府连尝试一下的胆量都没有的把戏。为什么不可以，譬如说，让大资产阶级欣然以为由摄政王提名的内阁事后是经过他们选举的呢？因为就连对人民大众让步的表象也是有损王朝尊严的。对内政策是如此，对外政策也是如此。再没有哪个国家比普鲁士更害怕欧洲大战的了。然而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一次小战争，譬如，为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而同丹麦打一仗，或者为了争夺德意志的霸权而同奥地利刀枪往来一番，可能是一种极为巧妙的消遣，并且能够用抛洒一点民众鲜血的低廉代价为政府树立威望。但是在这里，所

希望的又不是同时能够做到的。在丹麦问题的背后站着俄国，而奥地利本身则无异于欧洲的地位 quo〔现状〕。可见，正如在宪法方面的让步会为革命铺平道路一样，一场小冲突会招致欧洲大战。因此，你们可以相信，普鲁士对丹麦发出的好战叫嚣，最终将归结为在“国家通报”上的纸上抗议而已。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12 月 4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8 年 12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517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伊奥尼亚群岛问题

1858年12月17日于伦敦

威廉·赫德逊·格恩赛先生，别名华盛顿·格恩赛，由于从英国殖民部图书馆中盗窃了伊奥尼亚群岛首席专员约翰·杨格爵士致前届帕麦斯顿勋爵政府的两个密件（一个写于1857年6月10日，另一个写于1858年7月18日）而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个案子刚刚由中央刑事法庭在马丁男爵的主持下进行了审理并以宣布被告无罪而结束。这次审判无论从政治观点和法律观点来看都是饶有趣味的。应该注意的是，荷马专家格莱斯顿先生刚刚离开伦敦去完成他所负的奠定伊奥尼亚群岛和平的特别使命时⁴³⁴，在“每日新闻”上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放出的斯基台人的箭一样，出现了约翰·杨格爵士的密件。约翰·杨格爵士在密件上建议放弃对该群岛的保护权，将该群岛交给希腊，然而预先要割下它最好的一块地（科尔富岛）并将它并入大不列颠的殖民地。人们无不大为惊讶。仇视秘密外交的那部分伦敦报刊，对得比勋爵内阁揭露外交阴谋内幕的大胆措施表示祝贺，而天真热情的“晨星报”甚至宣称联合王国开始了国际政治的新纪元。然而，动听的赞扬声立即被尖锐而愤恨的批评声压倒了。反内阁的报刊狠狠地抓住了这一“故意铸成的大错”（这是它们对这一措施的称呼）。它们说，

这个措施的目的不是别的，首先是想取消格莱斯顿先生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并使他从议会舞台上暂时引退；而同时，它们说，这是用完全不择手段的无耻奸诈伎俩，使得格莱斯顿先生自己的手下人不得不以公布一个立刻使他无论对行将举行的外交谈判的对方，还是对英国舆论和欧洲国际法都处于尴尬境地的文件，来阻碍他完成所负的使命。“泰晤士报”、“地球报”、“观察家报”和反内阁的小报写道，得比内阁为了毁灭过于轻信的敌手，毅然做出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无异于背叛的鲁莽事情。当伊奥尼亚人不仅知道了不列颠早已事先做出决定，而且有威望的伊奥尼亚爱国人士已经由于他们同意支解七个岛屿的计划这一事实被泄露而被弄得声名狼籍时，格莱斯顿先生怎么能进行谈判呢？当欧洲一定会对这种破坏维也纳条约的行为（按照维也纳条约，英国决不是科尔富岛的所有者，而只不过是七个岛屿的保护者，而且该条约已把欧洲地域区划图永远固定下来）提出抗议时，他怎么能进行谈判呢？这些报纸文章出现以后，俄国和法国的确提出了抗议。

En passant〔顺便〕指出，维也纳条约，这部唯一在欧洲得到承认的国际法法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突出的 *fictiones juris publici*〔国际法假象〕之一。这个条约的第一条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永远推翻波拿巴王朝的法兰西王位；然而现在高踞法兰西王位的是第二帝国的奠基人路易·拿破仑，欧洲所有君主都承认了他，同他称兄道弟，他受到了欧洲君主的厚待和膜拜。另一条规定，比利时永久被赏赐给荷兰；可是十八年来，比利时与荷兰分立不仅是 *fait accompli*〔即成的事实〕，而且是法定的事实。其次，维也纳条约规定，让 1846 年并入奥地利的克拉科夫永远成为独立共和国；条约最后的、然而同样重要的一个条款，是被尼古拉并入俄

罗斯帝国的波兰应该成为只是通过罗曼诺夫王朝同俄国保持君合关系的独立的立宪王国。这样，这部欧洲 *jus publicum*（国际法）的圣书便一页一页地被撕掉了，只有在一方的利益和另一方的软弱决定有必要时，它才被引为根据。

得比内阁对于它是应该接受一部分报刊给它的不应得的赞扬，还是应该反驳另一部分报刊给它的不应受的诽谤，显然犹豫不决。然而经过一星期的犹豫之后，内阁决定采取后者，并且正式宣布约翰·杨格爵士的密件是在内阁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发表的，目前正在对这一犯罪行为的肇事人进行调查。终于发现肇事人是威廉·赫德逊·格恩赛先生；他被中央刑事法庭审讯，罪状是盗窃密件。结果得比内阁成为斗争的胜利者，此后这一诉讼案件也就失去它的政治趣味了。然而由于这一诉讼案件，大不列颠和伊奥尼亚群岛之间的关系又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但是约翰·杨格爵士的计划并不是他个人幻想的产物，关于这一点，他的前任亨利·华德爵士 1850 年 4 月 13 日致伊奥尼亚议会的公开信的如下一段就可令人信服地证明：

“我并未受权代表不列颠国王来谈论那在祝词中只是模模糊糊说到其前景的遥远未来，即希腊民族的彼此隔离的人们又能取得欧洲列强的同意而联合成一个强大帝国。但是我不难说出我自己的意见。他在代表不列颠国王说话，如果这种事情是人力所及的，那末英国的君主和议会都将同样赞助伊奥尼亚人重新取得将在世界政治中占有应得地位的新的强国的成员资格。”

就在这时，大不列颠对群岛所抱的人道感情，却表现为亨利·华德爵士以真正奥地利式的残酷性镇压了当时群岛上所发生的起义。20 万居民中有 8000 人被处绞刑，被判受鞭笞、监禁和放逐；妇女和儿童被鞭打得皮开肉绽。为了不使人疑心我夸大其词，我

来引证一家英国报纸，即“纪事晨报”于1850年4月25日发表的一段话：

“战地法庭按照首席专员大人的命令所使用的骇人听闻的刑罚，使我们不寒而栗。在许多情况下，倒霉的犯人不经任何审理即被判处死刑、流放和体刑，而在其他情况下，则根据战时法律用速审方法判刑。21个人被判死刑，很多人遭到其他刑罚。”

然而英国人夸口说他们用自由的宪法使伊奥尼亚人得到了幸福，使他们的物质资源发展到使希腊本土的悲惨经济状况相形见绌的水平。说起宪法，那末格雷勋爵当他受托从事整个大不列颠殖民帝国的宪法交易时，曾认为不便于不给伊奥尼亚群岛以宪法；但他只不过把英国许多年以前用欺骗手段从伊奥尼亚群岛夺走的东西还给了他们而已⁴³⁵。

依照卡波第斯特里亚伯爵起草的、俄国1815年在巴黎签字的条约，对伊奥尼亚群岛的保护权交给了大不列颠，但明文规定大不列颠应恪守俄国于1803年给予该群岛的宪法。可是第一个英国首席专员托马斯·梅特兰爵士就废除了这一宪法，而代之以另一部使他享有无限权力的宪法。1839年，伊奥尼亚人穆斯托克西迪斯骑士在他的按照下院决定于1840年6月22日出版的《Promemoria》中肯定说：

“伊奥尼亚人没有希腊乡镇甚至在土耳其暴政时期通常享有过的特权，即选举他们自己的官员的特权和实行自治的权利，而是服从警察派给他们的官员。他们被剥夺了每个岛上的地方自治团体所保有的极为有限的自行支配自己收入的权利，为了使他们更加处于从属地位，这些收入被移交给国库管理。”

至于开发物质资源，那末指出下面一个情况就够了：英国，这个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竟恬不知耻地给伊奥尼亚人加上出口税

的负担，——这是似乎只有在土耳其的财政法典上才可能有的野蛮手段。例如，群岛的主要贸易产品葡萄干就被课以 $22\frac{1}{4}\%$ 的出口税。

一个伊奥尼亚人说道：“可以说是各岛之间主要通道的海峡，如今被关卡封锁了，因为在每个港口对各岛彼此间交换的一切种类的货物都要课过境税。”

但还不止于此。在英国统治的头二十三年当中，捐税增加了两倍，而支出则增加了四倍。后来对捐税有所缩减，可是以后于1850年形成了赤字，其数值等于以前全部捐税的一半，这从下表中可以看出：

年份	每年捐税额	支出
	(单位：英镑)	
1815	68459	48500
1817	108997	87420
1850	147482	170000

总之，对他们自己的产品课出口税，在各岛之间课过境税，捐税增加和开支多得无力负担——这就是约翰牛赏赐给伊奥尼亚人的经济福利。按照他的在印刷所广场⁴³⁶上的神托的说法，约翰牛侵占殖民地的唯一目的，是用国民自由的原则来教育它们；但是，如果我们看看事实，我们就会看到，伊奥尼亚群岛的例子，就和印度和爱尔兰一样，仅能证明：约翰牛要自己国里自由，就得到国外去奴役别国人民。因此，就在他义愤填膺地痛斥巴黎的波拿巴间谍制度的同时，他自己却在都柏林采用这个制度。

英国保护的头一年。

这一诉讼案在法律上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这样一点：格恩赛的辩护律师承认了盗窃十份密件副本的事实，但是以格恩赛并没有把它们用于个人目的的意图，证明当事人无罪。如果偷窃罪只能根据非法侵占他人财产的意图来定罪，那末刑事法在这方面就会走入绝路。坐在陪审席上的尊敬的公民们未必打算在财产法中实行这种革命；他们的裁决只是想表明：公众的文件是财产，但不是政府的，而是公众的财产。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12 月 17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9 年 1 月 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526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爱尔兰的惶恐

1858年12月24日于伦敦

目前的英国内阁是由一个已经瓦解的政党组成的，像这样的政府，要抛弃自己旧日的原则，总是要比断绝自己旧日的联系更为容易。得比勋爵在搬进唐宁街之后，对于过去曾使他的名字在爱尔兰成为街谈巷议资料的错误，无疑已下了决心要加以改正；至于他那以反复无常闻名的爱尔兰首席检察官怀特塞德先生，一定已毫不犹豫地否认了把自己和奥伦治会分会结合在一起的誓言⁴³⁷。但是问题在于：得比勋爵的上台同时就是向统治阶级的某一集团发出信号——赶紧扑向前去夺取由于另一集团被迫下台而刚刚腾出的职位。得比组阁的意思就是，全部政府职位应由杂七杂八的这样一伙人去分，这伙人还由一个已失去任何意义的政党名称结合在一起，还照旧打着一面破烂不堪的共同的旗帜，尽管在事实上，他们除了对往事的回忆，派系的倾轧，而主要的是坚决要求分享新职位所提供的尘世福利的决心以外，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样一来，埃格林顿勋爵，这位渴望在唯利是图的英国复活骑士精神的唐·吉诃德，便应该在都柏林堡就任爱尔兰总督的崇高职位，而以狂热拥护爱尔兰地主制度闻名的纳斯勋爵，则应该成为他的内阁总理。不言而喻，这可尊敬的一对，

arcadesambo ,在离开伦敦时 ,曾得到他们的上司的坚决劝告 ,要他们抛弃自己的怪癖 ,讲究礼貌 ,不要用任何出人意外的狂妄举动惊扰自己的主人。我们并不怀疑 ,埃格林顿勋爵越过海峡的道路铺满着善良的愿望 ,并且他曾以对总督佩带的小饰物的幻想安慰他的孩童般的头脑 ;而纳斯勋爵在到达都柏林堡时 ,也是一心只想看到大规模的清扫领地、焚烧农舍和将农舍的可怜住户予以无情驱逐的工作在以应有的速度进行而已。但是 ,既然党的关系迫使得比勋爵把不合适的人安插到了不合适的位置上 ,这同一种党的关系立即又使这些人陷入了尴尬的处境 ,不管他们的个人愿望如何。在这以前 ,奥伦治会由于自己的令人厌烦的忠诚曾受到官方的谴责 ;政府本身曾不得不公开承认这个组织是非法的 ,并且极不客气地向这个组织宣称 ,世界上谁也不再需要它 ,它应该完全消逝。但是 ,托利党内阁一上台 ,声名狼籍的埃格林顿和纳斯一搬进都柏林堡 ,这些本来感到垂头丧气的奥伦治会会员又充满希望了。太阳又开始为这些“真正的托利党人”照耀了 ;他们觉得 ,他们又将像在卡斯尔里时期那样在国内为所欲为 ,他们复仇的日子已经大大临近了。他们一步一步地迫使唐宁街的那些昏庸、软弱、因而也是冒失莽撞的代表从一个尴尬的境地进到另一个尴尬的境地 ,终于在一天早上 ,世界为总督发表的公告所震撼了 ;这个公告宣布爱尔兰处于所谓戒严状态 ,并用 100 英镑和 50 英镑的悬赏办法把间谍、告密人、伪证人和挑衅者的职业变成为绿色艾林 的最赢利的职业。悬赏破获秘密社团的告示刚一贴出 ,就有一个名叫奥沙利文的恶棍 ,基拉尼的一个药房学徒 ,告发了自己的父亲和基拉尼、肯梅尔、班特

一丘之貉(味吉尔“牧歌”)。——编者注
爱尔兰的旧称。——编者注

里和斯基别林等地的几个青年人,说他们是一个大阴谋的参加者,同活跃于大西洋彼岸的海盗暗中勾结,像布莱特先生那样,不仅想“使英国机关美国化”,而且要把爱尔兰并入模范共和国。于是,克黎郡和科克郡的密探就忙碌起来了,开始夜间捕人,进行秘密调查;对阴谋分子的搜捕从西南扩展到东北;在莫纳根郡演了不少滑稽剧,拜尔法斯特的惊慌不安的居民亲眼看到几十个教员、职员和店员被押着从大街走过,被关进了监狱。由于诉讼程序蒙上了神秘的色彩,事情被弄得更糟了。被捕者没有一个得到保释,夜间搜捕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全部侦查都严守秘密,据以进行逮捕的证件通常谁也未曾见到过,法官奔忙于自己的法庭和都柏林堡的接待室之间。拜尔法斯特市的被告辩护人雷先生曾经这样谈到拜尔法斯特的情形:“我觉得,最近一周来,英国宪法已经离弃了拜尔法斯特城。”这句话对于整个爱尔兰也完全适用。

但是从这一切叫嚷和这一切神秘色彩下面愈来愈明显地透露出政府的不安来。政府对来自它那些轻信的爱尔兰代理人的压力做了让步,而这些代理人原来又只不过是奥伦治会会员手中的玩物,现在政府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荒唐的处境而不致同时丧失自己的名誉和地位了。起初政府宣布,从西南到东北密布在整个爱尔兰境内的危险阴谋来自企图使爱尔兰美国化的凤凰俱乐部⁴³⁸。后来,阴谋似乎变成了里本运动⁴³⁹的复兴;而现在这又是某种完全新的、完全无人知晓的、因而还要更可怕的东西了。政府被迫运用了什么样的诡计,可以从政府机关报都柏林“每日快报”⁴⁴⁰所使用的手法看出来;这家报纸每天都要编造各种关于谋杀、武装抢劫和夜间集会的谣言以飨读者。但使这家报纸感到莫大遗憾的是,被杀死的人竟常常从坟墓中爬出来,并且就在这家报纸上抗议编

辑部这样摆布他们。

可能确有凤凰俱乐部这样的组织存在，但无论如何，既然政府认为可以把这只凤凰扼杀在它自己的灰烬里，它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至于里本运动，那末这个运动从来没有依靠过阴谋分子。当在十八世纪末，信奉新教的“黎明伙伴”联合起来反对爱尔兰北部的天主教徒时，与之相对立产生了“护教派”的团体⁴⁴¹。当1791年，“黎明伙伴”溶合于奥伦治会会员中时，“护教派”便变成了里本派。最后，在我们的时代，由于英国政府已公开同奥伦治会决裂，使里本派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里本派的团体已自行解体了。的确，埃格林顿勋爵所采取的非常措施可能使里本运动复活，就同目前都柏林的奥伦治会会员想安置英国军官去领导爱尔兰警察并用自己的拥护者去充实爱尔兰警察的企图也会使里本运动复活一样。目前，在爱尔兰，除了农业地区的社团外，没有任何秘密社团存在。但是，谴责爱尔兰产生出这种社团并不比谴责森林长出蘑菇更合逻辑。爱尔兰的地主们已联合起来残酷无情地反对贫穷的佃户，或如他们所说的，进行经济上的实验——清除国内的多余人口。他们打算像有的女仆消灭害虫那样毫不客气地消灭爱尔兰的小佃农。这些被弄得走投无路的不幸的人们想要进行微弱的反抗，才组成了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只能进行个人复仇行动的秘密社团。

但是，如果说政府想要在爱尔兰揭露的阴谋只是奥伦治会会员的纯粹虚构，那末，由于政府所悬的赏金，这个幻想的果实可能取得极为具体的形式。比较起来，募兵人员的先令和杜松子酒所具有的引诱王国平民参加皇家军队的力量，还不如为揭发爱尔兰秘密社团而悬的赏金所具有的建立那些所要加以揭发的社团的

力量。每个郡内都立即出现了一批叛徒，他们冒充革命代表在农业地区四处游荡，招募革命党，要他们宣誓，然后告发这些受骗者，把他们送上绞架，并把沾满鲜血的钱放进腰包。为了使读者对这一帮告密人和政府赏金对他们的影响得到一个概念，只要把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下院发表的一篇演说中的这样一段话摘引在下面就够了：

“当我担任爱尔兰事务大臣的时候，在休尔河畔的卡里克和克郎梅尔间的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件谋杀案。有位××先生对××先生怀有不共戴天之仇，他用每人两基尼的代价雇了四个人去杀死他。休尔河两岸都有由卡里克通往克郎梅尔的道路；他在每条路上布置了两个人，因此他的受害者是逃脱不掉的。这样，那个不幸的人就遭到了暗杀，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震惊了全国，以致政府悬赏 500 英镑来捉拿每一个凶手。你们信不信，竟是这个收买四个凶手的恶棍亲自出来告发了他们，后来凶手被处决了，而我在都柏林堡的我的办公室里亲手把 2000 英镑交给了这个人面野兽。”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12 月 29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9 年 1 月 11 日“纽约每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论坛报”第 5530 号

卡·马克思 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 (一)

1858年12月29日于柏林

俄国革命的伟大“首倡者”(用马志尼的说法)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又向前跨出了一步。11月13日,掌管废除农奴制事务的御前总委员会⁴⁴²终于签署了一封给皇帝的奏折,其中陈述了建议据以实行农奴解放的基本办法。这封奏折的基本原则如下:

第一篇,农民立即停止为农奴,而进入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的状态。这种状态应延续十二年,在此期间,他们享有帝国所有其他纳税臣民所享有的一切人身权和财产权。农奴的依附关系及其一切后果,永远被废除,对过去的主人不付任何赔偿,因为如奏折中所说,农奴的依附关系是沙皇波利斯·戈东诺夫任意推行的,

这种说法决不正确。波利斯·戈东诺夫(1601年11月2日敕谕)剥夺了农民在帝国土地上自由迁徙的权利,把他们固定在他们由于出生或居所隶属的领地上。在他几位继承者的统治下,贵族对农民的权力迅速扩大,不久所有的农民便真正成为农奴。但是这仍然只是贵族方面非法的越权行为,到1723年彼得大帝才使它合法化。农民没有摆脱把他们束缚在领地上的羁绊,现在又被变成贵族地主的个人财产;地主获得权利把他们单个地或成批地,随着土地或不随着土地出售,由于这个缘故,他本人便开始向政府对农民及其赋税负

后来由于滥用职权才成为普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既然是由君主的意志产生的，也就可以由君主的意志废除。至于为废除它而偿付赎金的问题，用奏折中的话来说，这种用缴钱换取权利的办法，会构成俄国历史上真正可耻的一页，因为这些权利是农民天赋的，根本不应该予以剥夺的。

第二篇，农民在负有暂时义务的十二年当中，仍然继续固定在领地上；但是如果地主不能供给他至少 5 俄亩土地自己耕种，他可以自由离开领地。如果他能找到人耕种他的份地，并替他向官府完纳赋税，他也可以同样自由离去。

第三篇和第四篇，每个村社得保有社员的住房及其庭院、畜舍、菜园等等，但每年须向地主缴纳这些财产估价的 3% 的租金。村社有权迫使地主接受由两个地主和两个农民组成的混合委员会对这些财产进行估价。只要村社愿意，它可以付清估价，把自己的家园赎回归自己所有。

第五篇，地主应该给予农民的份地是这样规定的：在固定于领地上的每个农奴平均有 6 俄亩以上的地方，每个成年男性农民可分得 9 俄亩耕地；在土地较少的地方，把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二分给农民；在固定于领地上的农民太多，这三分之二的土地不能使每个成年男性农民至少分得 5 俄亩的地方，把土地划分成 5 俄亩一块的份地，而那些抽签没有抽到份地的农民，可向村政府领取身分证，随意到他们愿意去的地方去。至于柴草，地主应该按

责。后来，叶卡特林娜二世大笔一挥又把新得到的西部和南部各省中的四五百万比较自由的农民变成了农奴。但是，在俄国的官方文件中是不便提到有关彼得一世和叶卡特林娜二世的这种事实的，于是倒霉的波利斯·戈东诺夫来为他的所有继承者的罪孽负责。

照事先规定的价钱由自己的树林子里向农民提供。

第六篇，为了这些利益，农民应该给地主服以下的徭役：为领到的每一俄亩份地，要给地主做 10 天用马的工和 10 天不用马的工（如果领到 9 俄亩份地，一年就得出 180 天工）。按照这个标准，每个地方行政区（省）的农民徭役的价值可以用货币定出来，因为一天徭役的价值只等于自由工人一天劳动的价值的三分之一。在过了头七年以后，这种徭役的七分之一，此后每过一年又有七分之一，可以折成谷物代役租。

第七篇，家务农奴，即那些不是固定于一定领地，而是固定于地主宅邸或服侍地主本人的农奴，必须为他们的服务十年，但是领取薪资。不过他们可以随时赎买自己的自由，男子须缴 300 卢布，女子须缴 120 卢布。

第九篇，地主仍然是村社的首脑，有权否决村社的决议，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准许向由贵族和农民组成的混合委员会提出申诉。

这个重要文件的内容就是这样，它间接地反映出了亚历山大二世对俄国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问题的观点。我省略了专门谈村社组织的第八篇，以及只不过说明有关这种改革的官方文件应该采取的法定形式的第十篇。只要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这封奏折实质上只不过是总委员会今年春天向帝国各地各种贵族会议提出的纲领的继续和发展。那个纲领——它的十条完全相当于奏折中的十篇，——实际上只是一个纲要，草拟它的目的在于向贵族指出行动的方向，并指望他们对它加以补充。但是，贵族愈深入这个问题，他们的反感就愈大；极有意义的是，八个月以后，政府不得不自己来充实这个纲要，制定出那个本来是设想为贵族的自发行动的计划。

关于上述文件的来历就谈到这里为止；现在来看它的内容。

如果说，俄国贵族认为他们的“8月4日”（1789年）还没有来到，因而他们还没有必要将自己的特权献上祖国的祭坛，那末俄国政府的步伐就要快得多：它已经达到了“人权宣言”⁴⁴³。的确，请设想一下，亚历山大二世竟宣布了“农民天赋的、根本不应该予以剥夺的权利”！这真是不平凡的时代啊！1846年，罗马教皇发起了自由主义运动⁴⁴⁴；1858年，俄国的专制君主，道地的 *samoder-jetz vserossiiski*，又宣布了人权！我们还会看到，沙皇的这个宣言将像罗马教皇的自由主义一样得到全世界同样广泛的反应，并且归根到底将比教皇的自由主义产生远为更大的影响。

这封奏折中所涉及的头一个当事人就是贵族。如果贵族不肯庆祝自己的8月4日，那末政府十分坦率地告诉了他们，他们将被迫这样做。奏折的每一篇对于贵族说来都包含着痛心的物质损失。贵族运用他们的活人资本的方式之一，就是把农奴租出去，或者让他们出门随意谋生而缴纳一定的年金（*obrok*）。这种做法再好不过地既满足贵族的腰包，又符合俄国农奴的漂泊生活方式。这是贵族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第一篇就规定要毫无补偿地取消它。不仅如此。根据第二篇，地主不能分给5俄亩耕地的每个农奴，可以自由行使权利，去他所想去的地方。根据第三篇至第五篇，地主对他的大约三分之二的土地失去自由处理的权利，而被迫把它分配给农民。的确，农民现在也占有着这些土地，但是还是处在地主的控制之下，并且必须执行完全由地主所规定的各项徭役。可

“全俄罗斯独裁者”，这个词是马克思按照俄语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的。——编者注

“代役租”，这个词是马克思按照俄语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的。——编者注

是今后土地实际上应该属于农民,他们成为土地的永久持有者,他们获得完全赎买自己家园的权利,他们的徭役虽然规定得很多,但毕竟是要由法律加以严格限定的;更糟的是,农民可以按照(对他们)很有利的价格通过赎买来摆脱这些徭役。甚至 *dvorovye*, 即地主家中的仆役,也应当领取工钱,并且如果愿意,可以赎买自己的自由。还要更糟糕的是,农奴应该获得与所有其他公民一样的权利,这就是说,他们将有他们至今从来不知道的控告主人和在法庭上作证反对主人的权利;虽然地主在其领地上仍然是农民的首脑,对他们保有一定的司法权利,可是使大部分俄国贵族得以积蓄金钱去供养巴黎时髦女郎和在德国温泉疗养地肆意赌博的横征暴敛将要大大地缩减。然而,为了判断这种收入的缩减可能对俄国贵族发生的影响,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财政状况吧。俄国所有土地贵族向各信用银行(由国家设立)借了共计4亿银卢布的债款,为此给这些银行抵押了大约1300万名农奴。俄国农奴总数(不包括国有农奴)为2375万人(按1857年人口调查)。显然,银行的主要债务人是较小的农奴主,而较大的农奴主则很少负债。1857年的人口调查表明,大约有1300万名农奴属于拥有1000名农奴以下的地主,而其余的1075万名农奴则属于拥有1000名农奴以上的地主。由此可见,后者大致是俄国贵族中不负债的,而前者则是负债的。这种算法也许不十分精确,但是一般说来可以认为是相当正确的。

按照1857年的人口调查,拥有1个到999个农奴的地主是105540人,而拥有1000个农奴以上的贵族则不超过4015人。这

“家务农奴”,这个词是马克思按照俄语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的。——编者注

样，可见按照最低的估计，俄国全部贵族中有十分之九都对信用银行，也就是说对国家负有大量债务。但是，大家知道，俄国贵族此外还欠了私人、银行家、商人、犹太人和高利贷者许多的债，并且大多数贵族负债都非常沉重，以致对他们的地产只保有名义上的所有权。那些还在与破产进行挣扎的贵族，被最近这场战争的沉重牺牲完全拖垮了，因为他们在这场战争中不仅要担负沉重的捐税，出人出钱出徭役，而且还无处销售他们的产品，于是不得不按极端苛刻的条件去借债。而如今要他们毫无补偿地把大部分收入完全放弃，并且对剩下的部分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加以处理，即不仅要缩减它，而且今后还要把它继续保持在缩减的限度以内。

对于像俄国这样的贵族说来，这种情况的后果是很容易预料到的。除非他们愿意看到他们阶层中的大多数人完全垮台或立即破产，而在将来溶化在那个完全仰赖政府来决定等级和地位的官僚贵族阶级中，他们就一定要对这个解放农民的企图进行反抗。他们的确也在进行这种反抗；显然，如果他们目前的合法的反抗对君主的意志无能为力，他们将不得不诉诸别的更有效的手段。

(二)

1858年12月31日于柏林

俄国贵族对沙皇解放农民计划的抗拒，已经开始以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亚历山大二世在巡游省时亲自向贵族发表演说，有时用温和口吻呼吁以仁爱为怀，有时用劝说方式多方开导，有时则声色俱厉地威胁命令，但是这些演说的效果如何呢？贵族像奴隶那样俯首帖耳地聆听这些演说，然而他们的内心感觉是：这位特地来向他们大声疾呼、哄骗劝导、说服告诫、威胁命令的皇帝，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位能为所欲为的全能的沙皇了。因此，他们便敢于根本不做任何答复，不附和沙皇的意见，并且在他们的各种委员会中采取最简单的办法，即一再拖延，也就是说，做出在实质上是是否定的答复。他们使皇帝无路可走，只好像罗马教会那样：*compelle intrare*〔强迫进门〕。但是这种单调沉闷的、执拗的缄默终于被圣彼得堡的贵族委员会大胆地冲破了，该委员会采纳了委员普拉东诺夫先生所起草的一个实际上等于“权利请愿书”⁴⁴⁵的文件。贵族公然要求召开贵族议会，来与政府共同解决不仅是这一个巨大的迫切问题，而且要共同解决所有一切政治问题。尽管内务大臣兰斯科伊先生拒不接受这个文件，他把它退回给贵族，并且愤怒地向他们指出集会呈递请愿书不是贵族份内的事情，他们只应该限于讨论政府给他们提出的问题；但是这并没有什么效果。舒瓦洛夫将军以委员会名义转入进攻，威胁要亲自把文件呈交皇帝，从而迫使兰斯科伊先生收下了它。这样，

1858年的俄国贵族就正如1788年的法国贵族一样,宣布了 *Assemblée des États Généraux* [三级会议] 的口号,或者用俄国人的话来说,宣布了 *Semski Sabor* 或 *Semskaja Duma* 的口号。这样,贵族在为了私利而企图完整地保存金字塔的陈旧社会基础的同时,自己攻击了它的政治重心。此外, *esprit de vertige* [谬误精神]——年老的法国侨民这样称呼时代精神——如此强烈地感染了他们,以致大部分贵族都被卷入资产阶级开办联合股份公司的狂热中,而在西部各省,小部分贵族还尽力表明自己在领导和保护时髦的文字宣传。为了使读者对这些大胆的倾向有个大致的概念,只需要指出这么两点:在1858年,发行的日报已经增加到180种,可是还有109种新报纸宣布将于1859年出版。另一方面,在1857年创办了16个公司,其资本为303900000卢布,而在1858年从1月到8月又增添了21个新公司,其资本为36175000卢布。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亚历山大二世打算实行的改革的另一面。不应该忘记,俄国政府曾经多次在农民眼前造成自由的 *fata morgana* [幻景]。亚历山大一世在他统治初期,曾号召贵族解放农民,但是没有成功。在1812年号召农民参加 *oplchenie* (民兵)时,曾允许他们以废除农奴依附身分来酬答他们的爱国行为,这个许诺虽是非正式的,但是得到了皇帝的默许;当时曾说,对于保卫住神圣俄罗斯的人,决不应再以奴隶视之。甚至在尼古拉统治时期,也曾有一系列敕谕限制贵族对农奴的权利:允许农奴(1842年的敕谕)与其主人签订有关服役期限的契约(这便间接地允许农奴起

“国民代表会议”、“国民杜马”,这两个词是马克思按照俄语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的。——编者注

“义勇军”,这个词是马克思按照俄语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的。——编者注

诉控告主人) ;以政府名义(1844年)保证农民履行契约所规定的义务 ;保证农奴(1846年)在他们所依附的领地需要拍卖时有权赎买自由 ;允许依附于这种领地上的农民(1847年)在该领地一出售时立即把它全部买下来。使政府和贵族都大为吃惊的是 ,突然发觉 ,农奴对此很有准备 ,真的接二连三地买起领地来了 ;不仅如此 ,在许多情况下 ,地主只是虚有其名的所有者 ,因为他自己的农奴出钱帮他摆脱了债务 ,这些农奴当然采取了各种预防办法来为自己确实保证自由和领地的所有权。当这些情况一经发现 ,被农奴这种机灵和干练的表现以及西欧 1848 年的革命爆发吓得魂不附体的政府 ,不得不寻找补救办法来阻止实行那势必逐渐把贵族撵出领地的法令。但是要废止敕谕已经为时太晚 ,因此另一道敕谕(1848年 3 月 15 日)便把以前只属于村社的购买权扩大到每一个个别的农奴。这个措施不仅破坏了一个个村子的以及一县境内数个村子之间的那种在此以前使农奴能够为购买领地筹集资本的联合 ,而且 ,它还附了一些特别的条件。农奴可以购买土地 ,但是不能购买依附于土地之上的人 ,换句话说 ,农奴在购买他们所附属的领地时 ,并没有购买他们自己的自由。恰恰相反 ,他们仍然是农奴 ,而且全部交易只有得到原来地主的同意才能有效 除此以外 ,有许多所谓按照自己农奴的信托而持有地产的贵族 ,由于那同一道敕谕 ,得到权利并且受到鼓励去破坏这种信托关系 ,收回对地产的全部所有权 ;同时还无条件禁止了农奴在法庭上进行任何诉讼。从那时起 ,农奴除小学以外都不得进其他任何学校 ,对解放的一切希望似乎都破灭了 ,但是上一次战争又迫使尼古拉采取普遍武装农奴的措施 ,并且像往常一样 ,以使他们摆脱农奴依附身分的诺言来推行这项措施 ,——政府委托自己的下级官吏在农民中广泛散布了这些诺言。

十分自然,在这一切之后,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认真着手解放农民。他努力的结果,他的计划要点,既然已经成熟,现在公布出来了。十二年的考验将伴随着沉重的徭役,而以后会进入何种状态连政府也不敢详细描写,对于这样的考验,农民会说些什么呢?对于组织村社管理机构、法庭和警察来消除俄国每个村社自古固有的全部民主自治机关,以便仿照 1808—1809 年的普鲁士乡村立法建立一套地主世袭政权的体系⁴⁴⁶,——这种体系是那全部生活都由村社管理、毫无个人土地私有观念、认为村社就是自己赖以生存的所有的土地的所有者的俄国农民所极端厌恶的,——农民会说些什么呢?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自从 1842 年以来,农奴反对地主及管家的起义已经变成一种流行的现象,甚至按照内务部的官方统计,每年大约有 60 名贵族死于农民之手,在上次战争期间,起义有很大的发展,而在西部各省起义的锋芒主要是针对政府(那里曾经策划密谋,一俟外国敌人——英法军队逼近国境,就开始起义!),那就未必可以怀疑,即使贵族不反对解放农民,企图实现委员会的建议也会成为在俄国农村居民中爆发大规模起义的信号。但是,贵族必定要反对;皇帝在国家大计和权宜办法之间、在对贵族的畏惧和对愤怒的农民的畏惧之间彷徨,必然会踌躇不前;而由于怀着巨大期望而愤激到极点的农奴,认为沙皇是在他们一边,但是被贵族束住了手脚,这时必然要开始起义。如果发生这种情形,俄国的 1793 年就会来到,这些半亚洲式农奴的恐怖统治将是历史上空前的现象,然而它将是俄国徬历史上的第二个转折点,最终将以真正的普遍的文明来代替彼得大帝所推行的虚假的文明。

卡·马克思写于 1858 年 12 月 29 日和 31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9 年 1 月 17 日“纽约每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论坛报”第 5535 号

卡·马克思 普鲁士状况

1859年1月11日于柏林

你们当然知道德国有句谚语：“如果周围空无一物，皇帝也失去自己的权力。”（《Wo nichts ist, hat der Kaiser sein Recht verloren》）既然连皇帝这样的大人物都受这条空无一物的规律的支配，本报通讯员当然更无法逃避这条规律了。如果没有事件，就没有什么可说的。这就是那迫使我好几个星期停止从“精神之都”、从这个即使不是世界力量的中心至少也是《Weltgeist》（“世界精神”）的中心寄发通讯的极重要的原因。普鲁士运动的第一阶段以大选告终，第二阶段以议会明天开幕开始。同时，我在前几篇通讯中就这个国家的状况所做的估计（我从寄给我的一批美国出版的德文报纸上看到，许多美国的条顿子孙剽窃了我的这些看法，而对他们的高见的来源未做应有的说明），已经完全为拖着懒散步伐进展的局势所证实了；说到这局势，我简直不能说它是在进展，而是最好像人们永远记得的那位迂腐的约翰逊博士在这种情况下所会说的那样，说它是用腹部贴地，不用脚，而像虫子一样地蠕动。德国的里比任何其他国家的都长；但德国人用以计程的步子却短

得多。正因为如此，德国人在他们的神奇故事里总是幻想有这样的宝靴：它能使穿着它的幸运儿一步跨出一里远。

人们对这个国家过去十年的历史的评论一向是很片面的（这是德国人最爱用的字眼，他们都像布利丹的烦琐动物一样，为了面面俱到，以致总是停步不前），所以我们不妨谈一些一般的看法。当那位缺乏头脑的国王初登宝座的时候，他满脑袋都是浪漫派的幻想。他想既当禀承天命的国王，同时又当人民的国王；既维持万能的官僚政治，又在自己周围拥有一批独立的贵族；既当和平的使者，又当兵营的统帅；既提倡中世纪式的民权，又抵制现代自由主义的一切热望；既复兴宗教信仰，又夸耀他的臣民智力高度发展，——总而言之，他想既扮演中世纪的国王，同时又作为普鲁士国王这样一个十八世纪的怪胎来行事。但是从1840年到1848年，所有一切都与此背道而驰。Landjunker〔容克地主们〕本来寄厚望于“政治周刊”的戴王冠的撰稿人⁴⁴⁷（“政治周刊”当时天天鼓吹必须给普鲁士那种借助教书先生、军曹、警察、税吏和饱学官僚来实行的平凡无奇的政治制度中加进富有诗意的贵族统治），但是只得满足于国王的暗中同情，而得不到他的实际让步。资产阶级还太软弱，不敢进行积极的活动，只得跟随在黑格尔门徒所领导的向旧世界的宗教、思想、政治开火的理论家大军后面。在以前任何时期，哲学批判都没有像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位的头八年中那样大胆、有力和盛行；威廉四世想用中世纪神秘主义代替弗里德里希二世搬运到普鲁士来的“肤浅的”唯理论。这一时期的哲学之所以强大有力，完全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实际上的软弱；他们既然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向过时的制度进攻，就必须让那些在思想领域进攻这种制度的大胆的理想主义者占先。最后，那

位浪漫派国王本人毕竟和他所有的前人一样，实际上只不过是枉费心机企图用过去时代的美妙情感加以点缀的那个最平庸的官僚政府的工具而已。

革命，或者毋宁说是它所产生的反革命，把整个局面彻底改变了。Landjunker 从国王个人的奇怪想法中取得了实际利益，把政府不只抛回到了 1848 年以前，1815 年以前，而且甚至抛回到了 1807 年以前所处的状况。羞怯的、浪漫主义的想望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普鲁士上议院；死手权⁴⁴⁸恢复了；地主裁判权在庄园里空前盛行；免税又重新成为贵族的标志；警察和政府官员在贵族面前要毕恭毕敬；一切高官要职都奉献给土地贵族和阀阅名门的苗裔；旧派的开明官吏都被扫光，而代之以俯首听从食利者和地主的奴才；革命所争得的一切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宪制代议权——虽然保留下来了，但只是作为贵族阶级的特权保留下来。另一方面，如果说在过去的时期资产阶级扶植了哲学运动，那末现在贵族已把它连根铲除而代之以虔诚主义。凡是开明的教授都被赶出大学校门；viri obscuri（蒙昧主义者）、亨格施坦堡、施塔尔 tutti quanti（之流）掌握了普鲁士所有的教育机构，从乡村小学校起直到柏林的高级师范学院为止。警察和行政机构不是被摧毁了，而是变成了统治阶级的简单工具。连工业自由也遭到攻击；由于专利权制度变成了一种庇护、恫吓、贿赂的强有力的手段，所以大城市的手工业者又被重新赶进行帮、行会以及其他各式各样属于过去时代的陈旧形式之中。这样，国王在他专制统治的头八年里梦寐以求而不得实现的那些最大胆的幻想，由于革命而全部实现了，并且在 1850—1857 年这八年期间，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可以感觉得出的现实。

但是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革命打破了资产阶级的思想错觉，反革命打消了他们的政治要求。这样，资产阶级就被赶回去干他们唯一在行的事情——商业和工业，而且我认为，在最近十年当中，相对地说，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在这方面都没有获得德国人特别是普鲁士人那样巨大的进步。如果你十年以前到过柏林，现在你会认不出它来了。它已经从一个严肃的阅兵场变成了喧闹的德国机器制造业中心。如果你乘车到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公国去走一遭，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郎卡郡和约克郡。普鲁士虽然还抬不出一个伊萨克·贝列拉来自夸，但它却有成百成千个梅维森，他们控制着各种各样的 *Crédits Mobiliers*²⁸，这种银行在普鲁士比德意志联邦议会中的王公数目还要多。

拚命追逐财富、向前进取、开发新矿山、建设新工厂、修筑新铁路，尤其是向股份公司投资和做股票投机生意，这样一股狂潮盛极一时，社会上所有各个阶级，从农民起直到一度位列 *reichsun-mittelbarer Fürst*⁴⁴⁹ 的头戴王冠的国君，都沾染上了这种风气。所以，你们看到，资产阶级为自己所处的巴比伦俘虏的境遇而哭泣、而垂头丧气的时候，正是他们变为国内的实际力量，而高傲的贵族从骨子里变成唯利是图的、做金钱生意的股票投机家的时候。如果你需要一个表明思辨哲学如何变成商业投机的例证，那就请看 1857 年的汉堡。难道这些善于思辨的德国人那时没有表现为讹诈舞弊的能手吗？可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这种上升运动（它是靠物价的普遍上涨，因此也是靠官僚统治者固定收入的普遍下跌而加强的），自然伴随着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和工人阶级

原文为 *speculative*，这个词还含有“投机”的意思。——译者注

的集聚。过去八年里，小资产阶级的破产是在全欧洲到处可以看到的普遍现象，但没有一个地方像德国这样突出。这个现象还需要什么解释吗？我可以简单地回答：看一看那些昨天还是穷光蛋今天却是百万富翁的人吧。如果一个囊空如洗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百万富翁，那必然要有一千个拥有一千元的人在一日之内沦为乞丐。这种变化，神奇的交易所转瞬之间就能办到，完全不用依赖现代工业的缓慢集中财富的方式。所以，小资产阶级的不满和工人阶级的集聚，在普鲁士最近十年当中是跟资产阶级的成长同时发展起来的。

虽然我还没有结束我的 Rundschau〔综合观察〕（“新普鲁士报”这样称呼这种回顾式的评论），可是这篇通讯现在就该寄出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1 月 11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9 年 2 月 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548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的遗稿

导 言

导 言

(摘自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⁴⁵⁰

· 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

1. 生 产

(a) 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是一种十八世纪鲁滨逊式故事的毫无想像力的虚构，这种鲁滨逊式的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设想的那样，仅是对极度文明的反动和想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 *contrat social* [社会契约论]⁴⁵¹，也不是奠定在这种自然主义的基础上的。这是错觉，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式故事的美学的错觉。这倒是对于十六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而在十八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后者在过去历史时代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十八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十八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

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一种理想,它的存在是过去的事;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类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斯图亚特在许多方面同十八世纪对立,作为贵族比较多地站在历史的见地上,从而避免了这种局限性。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 $\tilde{\sigma}\nu\ \sigma\lambda\tau\% \acute{\omicron}$, 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在这方面无需多说。十八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本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等人又把这种看法郑重其事地引进最新的经济学中来,这一点本来可以完全不提。蒲鲁东等人自然乐于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么这种观念对亚当或普罗

米修斯已经是现成的，后来它就被付诸实行等等。再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 *locus communis*〔陈词滥调〕更加枯燥乏味的了。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如果说最发达语言的有些规律和规定也是最不发达语言所有的，但是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那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见到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就忘记本质的差别。而忘记这种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例如，他们说，没有生产工具，哪怕这种生产工具不过是手，任何生产都不可能。没有过去的、积累下来的劳动，哪怕这种劳动不过是由于反复操作而积聚在野蛮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产都不可能。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下来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的话。因此，生产关系的全部历史，例如在

凯里看来,就表现为历代政府的恶意篡改。

如果没有生产一般,那末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或者是它们的总体。可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要留到别处(后面)再说。

最后,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也还不是这里所要说的。生产一般。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总体。

现在时髦的做法,是在经济学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论部分——就是标题为“生产”的那部分(如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⁴⁵²),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

这个总论部分包括或者好像应当包括:

(1) 进行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这实际上不过是要说明一切生产的基本要素。可是,我们将会知道,实际上归纳起来不过是几个十分简单的规定,却扩展成浅薄的同义反复。

(2) 或多或少促进生产的条件,如像亚当·斯密所说的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状态。要把这些在斯密那里作为 aperç u [提示] 而具有价值的东西提到科学意义上来,就得研究各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生产率程度不同的各个时期——这种研究超出本题应有的范围,但就属于本题范围来说,在叙述竞争、积累等等时是要谈到的。照一般的提法,答案总是这样一个一般的说法: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它的生产高峰。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它还不是以既得利益 [Gewinn] 为要务,而是以争取利益 [Gewinnen] 为要务的时候。

在这一点上，美国人胜过英国人。或者是这样的说法：例如，某一些种族、素质、气候、自然条件如离海远近、土地肥沃程度等等，比另外一些更有利于生产。这又是同义反复，即财富的主客观因素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备，财富就越容易创造。

但是，经济学家在这个总论部分所真正要谈的并不是这一切。相反，照他们的意见，生产不同于分配等等（参看穆勒的著作⁴⁵³），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脱离历史而独立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做社会 in abstracto [一般] 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反之，在分配上，好像人们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即使根本不谈生产和分配的这种粗暴割裂与生产和分配的现实关系，下面这一点总应该是一开始就明白的：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上分配如何不同，总是可以像在生产中那样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可以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和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例如，奴隶、农奴、雇佣工人都得到一定量的食物，使他们能够作为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来生存。靠贡赋生活的征服者、靠租税生活的官吏、靠地租生活的土地占有者、靠施舍生活的僧侣，或者靠什一税生活的教士，都得到一份社会产品，而决定这一份产品的规律不同于决定奴隶等等那一份产品的规律。一切经济学家在这个项目下提出的两个要点是：（1）所有制，（2）司法、警察等等对所有制的保护，对此要极简单地答复一下：

ad [关于]（1）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制（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反复。但是，可笑的是从这里一步就跳到所有制的一定形式，如私有制。（而且还把对立的形式

即无所有作为条件。)历史却表明,公有制是原始形式(如印度人、斯拉夫人、古克尔特人等等),这种形式在公社所有制形式下还长期起着显著的作用。至于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所有制形式下能更好地发展的问题,还根本不是这里所要谈的。可是,如果说在任何所有制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谈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谈不到任何社会,那末,这是同义反复。什么也不据为己有的占有,是 *contradictio in subjecto* [自相矛盾]。

ad [关于](2)对既得物的保护等等。如果把这些滥调还原为它们的实际内容,它们所表示的就比它们的说教者所知道的还多。就是说,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等等。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射联系中的东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模糊地感到,在现代警察制度下,比在例如强权下能更好地进行生产,他们只是忘记了,强权也是一种法权,而且强者的法权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他们的“法治国家”中。

当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应的社会状态刚刚产生或者已经衰亡的时候,自然会出现生产上的紊乱,虽然程度和影响有所不同。

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同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2. 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

在进一步分析生产之前,必须观察一下经济学家拿来与生产并列的几个项目。

肤浅的表象是：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生产创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后，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被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因而，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这中间环节又是二重的，因为分配被规定为从社会出发的要素，交换被规定为从个人出发的要素。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人中，物主体化；在分配中，社会以一般的、居于支配地位的规定的形式，担任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媒介；在交换中，生产和消费由偶然的个人的规定性来媒介。

分配决定产品归个人的比例（分量）；交换决定个人对于分配给自己的一份所要求的产品。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因此形成一个正规的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这当然是一种联系，然而是一种肤浅的联系。生产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分配决定于社会的偶然情况，因此它能够或多或少地对生产起促进作用；交换作为形式上的社会运动介于两者之间；而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行为，除了它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

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人们，——不论这些反对者是不是他们的同行，——责备他们把联系着的东西粗野地割裂了，这些反对者

或者是同他们站在同一个见地上,或者是在他们之下。最庸俗不过的责备就是,说政治经济学家过于重视生产,把它当做目的本身。说分配也是同样重要的。这种责备的立足点恰恰是那种把分配当做与生产并列的独立自主的领域的经济见解。或者是这样的责备,说没有把这些要素放在其统一中来理解。好像这种割裂不是从现实进到教科书中去的,而相反地是从教科书进到现实中去的,好像这里的问题是要把概念作辩证的平衡,而不是解释现实的关系!

(a) [生产和消费]

生产直接也是消费。双重的消费,主体的和客体的:个人在生产当中发展自己的能力,也在生产行为中支出和消耗这种能力,同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的一种消耗完全一样。第二,生产资料的消费,生产资料被使用、被消耗、一部分(如在燃烧中)重新分解为一般元素。原料的消费也是这样,原料不再保持自己的自然形状和特性,这种自然形状和特性倒是消耗掉了。因此,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不过,这一点是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他们把直接与消费同一的生产,直接与生产合一的消费,称做生产的消费。生产和消费的这种同一性,归结起来是斯宾诺莎的命题:《determinatio est negatio》⁴⁵⁴。但是,提出生产的消费这个规定,只是为了把与生产同一的消费跟原来意义上的消费区别开来,后面这种消费被理解为起消灭作用的与生产相对的对立面,我们且观察一下这个原来意义上的消费。

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自然界中的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例如,吃喝是消费形式之一,人吃喝就生产自己的身体,这是明显的事。而对于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某一方

面来生产人的其他任何消费形式也都可以这样说。消费的生产。可是，经济学却说，这种与消费同一的生产是第二种生产，是靠消灭第一种生产的产品引起的。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在第二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因此，这种消费的生产——虽然它是生产和消费的直接统一——是与原来意义上的生产根本不同的。生产同消费合而为一和消费同生产合而为一的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的直接两立。

可见，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 finish（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 *uv áje*（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

(1) 因为只是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 finishing stroke（最后完成），因为产品之所以是产品，不是它作为物化了的的活动，而只是作为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

(2) 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

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末，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

与此相应，就生产方面来说：

(1) 它为消费提供材料，对象。消费而无对象，不成其为消费；因而，生产在这方面创造出、生产出消费。

(2) 但是，生产为消费创造的不只是对象。它也给予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使消费得以完成。正如消费使产品得以完成其为产品一样，生产使消费得以完成。首先，对象不是一般的对象，而是一定的对象，是必须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产本身所媒介的方式来消费的。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客体方面，而且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

(3) 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在消费脱离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陋状态和直接状态之后，——如果停留在这种状态，那也是生产停滞在自然粗陋状态的结果，——消费本身作为动力是靠对象作媒介的。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

因此，生产生产着消费：(1) 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 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 是由于生产靠它起初当做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

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同样，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

因此，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同一性表现在三方面：

(1) 直接的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生产。生产的消费。政治经济学家把两者都称为生产的消费，可是还作了一个区别。前者表现为再生产；后者表现为生产的消费。关于前者的一切研究是关于生产的劳动或非生产的劳动的研究；关于后者的研究是关于生产的消费或非生产的消费的研究。

(2) 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这在经济学中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

(3) 生产不仅直接是消费，消费也不仅直接是生产；而且生产不仅是消费的手段，消费不仅是生产的目的，——就是说，每一方都为对方提供对象，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消费为生产提供想像的对象；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就是对方，不仅媒介着对方，而且，两者的每一方当自己实现时也就创造对方，把自己当做对方创造出来。消费完成生产行为，只是在消费使产品最后完成其为产品的时候，在消费把它消灭，把它的独立的物体形式毁掉的时候；在消费使得在最初生产行为中发展起来的素质通过反复的需要达到完美的程度的时候；所以，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最后行为，而且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最后行为。另一方面，生产生产出消费，是在生产创造出消费的一定方式的时候，然后是在生产

把消费的动力、消费能力本身当做需要创造出来的时候。这第三项所说的这个最后的同一性,经济学在论述需求和供给、对象和需要、社会创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的关系时,曾多次加以解释。

这样看来,对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把生产和消费同一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不仅社会主义美文学家⁴⁵⁵这样做过,而且平庸的经济学家也这样做过,萨伊就是个例子;他的说法是,就一个民族来说,它的生产也就是它的消费。或者,就人类 in abstracto〔一般〕来说,也是这样。施托尔希指出过萨伊的错误⁴⁵⁶,因为例如一个民族不是把自己的产品全部消费掉,还要创造生产资料等等、固定资本等等。而且把社会当做一个单独的主体来观察,是把它作不正确的观察,思辨式的观察。就一个主体来说,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这里要强调的主要之点是:如果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做一个主体的或者许多单个人的活动,它们无论如何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因消费了它而再回到自己身上,然而,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把自己再生产的个人。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

但是,在社会中,产品一经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产品回到主体,取决于主体对其他个人的关系。他不是直接获得产品。如果说他是在社会中生产,那末直接占有产品也不是他的目的。在产品和生产者之间插进了分配,分配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额,因而插在生产和消费之间。

那末，分配是否作为独立的领域，处于生产之旁和生产之外呢？

(b) [生产和分配]

如果看看普通的经济学著作，首先令人注目的是，在这些著作里什么都被提出两次。举例来说，在分配上出现的是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而在生产上作为生产要素出现的是土地、劳动、资本。说到资本，一看就清楚，它被提出了两次：(1) 当做生产要素；(2) 当做收入源泉，当做决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东西。利息和利润，就它们作为资本增殖和扩大的形式，因而作为资本自身的生产的要素来说，本身也出现在生产中。利息和利润作为分配形式，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它们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分配方式。它们又是资本的再生产方式。

同样，工资也是在另一个项目中被考察的雇佣劳动：在一处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所具有的规定性，在另一处表现为分配的规定。如果劳动不是规定为雇佣劳动，那末，它参与产品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现为工资，如在奴隶制度下就是这样。最后，地租——我们直接来看地产参与产品分配的最发达形式——的前提，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大地产(其实是大农业)，而不是通常的土地，就像工资的前提不是通常的劳动一样。所以，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把土地放

在生产上来谈,把地租放在分配上来谈,等等,简直是幻觉。

因此,像李嘉图那样的经济学家,最受责备的就是他们眼中只有生产,他们却专门把分配规定为经济学的对象,因为他们本能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会中的生产要素得以确定的最确切的表现。

在单个的个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现为一种社会规律,这种规律决定他在生产中——指他在其中进行生产的那个生产——的地位,因而分配先于生产。这个个人一开始就没有资本,也没有地产。他一出生就由社会分配指定专作雇佣劳动。但是这种指定本身是资本和地产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存在的结果。

就整个社会来看,从一方面说,分配似乎先于生产,并且决定生产,似乎是先经济的事实。一个征服者民族在征服者之间分配土地,因而造成了地产的一定的分配和形式,由此决定了生产。或者,它使被征服的民族成为奴隶,于是使奴隶劳动成为生产的基础。或者,一个民族经过革命把大地产粉碎成小块,从而通过这种新的分配使生产有了一种新的性质。或者,立法使地产永久属于一定的家庭,或者,把劳动[当做]世袭的特权来分配,因而把它像等级一样地固定下来。在所有这些历史上有过的情况下,似乎不是生产安排和决定分配,而相反地是分配安排和决定生产。

照最浅薄的理解,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因此它仿佛离开生产很远,对生产是独立的。但是,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

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反过来说，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正因为如此，力求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来理解现代生产并且 *par excellence*〔主要〕是研究生产的经济学家李嘉图，不是把生产而是把分配说成现代经济学的本题。从这里，又一次显出了那些把生产当做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诞无稽。

这种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产处于怎样的关系，这显然是属于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如果有人说，既然生产必须从生产工具的一定的分配出发，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分配先于生产，成为生产的前提，那末就应该答复他说，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了，如果它们对于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另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了。它们在生产内部被不断地改变。例如，机器的应用既改变了生产工具的分配，也改变了产品的分配。现代大土地所有制本身既是现代商业和现代工业的结果，也是现代工业在农业上应用的结果。

上面提出的一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上是怎样起作用的，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显然属于对生产本身的讨论和分析。

然而，这些问题即使照上面那样平庸的提法，也可以同样给予简短的回答。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例如，本世纪英国人在爱尔兰所做的，部分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

己满足于征收贡赋(如土耳其人和罗马人);或者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就是这样)。在所有的情况下,生产方式,不论是征服民族的,被征服民族的,还是两者混合形成的,总是决定新出现的分配。因此,虽然这种分配对于新的生产时期表现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产的产物,不仅是一般历史生产的产物,而且是一定历史生产的产物。

例如,蒙古人把俄罗斯弄成一片荒凉,这样做是适合于他们的生产、畜牧的,大片无人居住的地带是畜牧的主要条件。在日耳曼蛮族,用农奴耕作是传统的生产,过的是乡村的孤独生活,他们能够非常容易地让罗马各省服从这些条件,因为那里发生的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已经完全推翻了旧的农业关系。

有一种传统的观念,认为在某些时期人们只靠劫掠生活。但是要能够劫掠,就要有可以劫掠的东西,因此就要有生产。而劫掠方式本身又决定于生产方式。例如,劫掠一个 stock-jobbing nation〔从事证券投机的民族〕就不能同劫掠一个游牧民族一样。

奴隶直接被剥夺了生产工具。但是奴隶受到剥夺的国家的生产必须安排得容许奴隶劳动,或者必须建立一种适于使用奴隶的生产方式(如在南美等)。

法律可以使一种生产资料,例如土地,永远属于一定家庭。这些法律,只有当大土地所有权适合于社会生产的时候,如像在英国那样,才有经济意义。在法国,尽管有大土地所有权,但经营的是小规模农业,因而大土地所有权就被革命摧毁了。但是,土地析分的状态是否例如通过法律永远固定下来了呢?尽管有这种法律,土地所有权却又集中起来了。法律在巩固分配关系方面的影响和它们由此对生产发生的作用,要专门加以确定。

(c) 最后，交换和流通

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从总体上看交换。

既然交换只是生产以及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和消费一方之间的媒介要素，而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交换当然也就当做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

首先很明显，在生产本身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直接属于生产，并且从本质上组成生产。第二、这同样适用于产品交换，只要产品交换是用来制造供直接消费的成品的手段。在这个限度内，交换本身是包含在生产之中的行为。第三、所谓企业家之间的交换，从它的组织方面看，既完全决定于生产，而且本身也是生产行为。只有在最后阶段上，当产品直接为了消费而交换的时候，交换才表现为独立于生产之外，与生产漠不相干。但是，(1)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历史的成果，也就没有交换；(2)私的交换以私的生产为前提；(3)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例如，城乡之间的交换，乡村中的交换，城市中的交换等等。可见，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生产的对立规定上的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那是自明之理。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

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集中,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3.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当我们从政治经济学方面观察某一国家的时候,我们从该国的人口、人口的阶级划分、人口在城乡海洋的分布、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分布,输出和输入,全年的生产和消费,商品价格等等开始。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末这是整体的一个浑沌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整体的浑沌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例如,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

始 ;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 ,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 ,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后一种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 ,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 ,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 ,表现为结果 ,而不是表现为起点 ,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 ,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 ,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 ;在第二条道路上 ,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因而黑格尔陷入幻觉 ,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 ,其实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举例来说 ,最简单的经济范畴 ,如交换价值 ,是以人口、以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 ;也是以某种形式的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它只能作为一个既与的、具体的、生动的总体的抽象片面的关系而存在。相反 ,作为范畴 ,交换价值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 ,在意识看来——而哲学意识就是被这样规定的 :在它看来 ,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 ,因而 ,被理解了的那样的世界才是现实的世界——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只可惜它从外界取得一种推动) ,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 ;这——不过又是一个同义反复——只有在下面这个限度内才是正确的 :具体总体作为思维总体、作为思维具体 ,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 ;但是 ,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 ,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 ,当它

在头脑中作为思维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一定要经常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但是,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 *ad depend* (要看情况而定)。比如,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即占有开始的,这是对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得多的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相反,如果说有这样的家庭和氏族,它们还只是占有,而没有所有权,这倒是对的。所以,这种比较简单的范畴,表现为简单的家庭的或氏族的公社在所有权方面的关系。它在比较高级的社会中表现为一个发达的组织的比较简单的关系。但是那个以占有为关系的具体的基础总是前提。可以设想有一个孤独的野人占有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并不是法的关系。说占有在历史上发展为家庭,是错误的。占有倒总是以这个“比较具体的法的范畴”为前提的。但是,不管怎样总可以说,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和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做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等等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可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可以表现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后面这些

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可以说,有一些十分发展的、但在历史上还不成熟的社会形式,其中有最高级的经济形式,如协作、发达的分工等等,却不存在任何货币,秘鲁就是一个例子。就在斯拉夫公社中,货币以及作为货币的条件的交换,也不是或者很少是出现在个别公社内部,而是出现在它的边界上,出现在与其他公社的交往中,因此,把同一公社内部的交换当做原始构成因素,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地,与其说它起初发生在同一公社内部的成员间,不如说它发生在不同公社的相互关系中。其次,虽然货币很早就全面地发生作用,但是在古代它只是在片面发展的民族即商业民族中才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因素。甚至在最文明的古代,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货币的充分发展——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这是前提——只是在他们解体的时期。因此,这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它决没有历尽一切经济关系。例如,在罗马帝国,在它最发达的时期,实物税和实物租仍然是基础。那里,货币制度原来只是在军队中得到充分发展。它也从来没有掌握劳动的整个领域。

可见,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的充分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

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作为劳动一般——上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

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例如，货币主义把财富看成还是完全客观的东西，看成存在于货币中的物 [als Sache au er sich im Geld]。同这个观点相比，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他们仍然只是局限地把这种活动本身理解为取得货币的活动。同这个学派相对立的重农学派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做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做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做产品一般，看做劳动的一般成果了。这种产品还与活动的局限性相应而仍然被看做自然规定的产品——农业的产品，par excellence [主要是] 土地的产品。

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作为过去的、物化的劳动。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远，只要看看连亚当·斯密本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学派的观点上去，就可想见了。这会造成一种看法，好像由此只是替人——不论在何种社会形式下——作为生产者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关系找到了一个抽象表现。从一方面看来这是对的。从另一方面看来就不是这样。

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一个十分发达的实在劳动种类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种类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

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具体的劳动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是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在一种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sans phrase〔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范畴，才在这种抽象性上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人们也许会说，在美国表现为历史产物的东西——对任何劳动同样看待——在俄罗斯人那里，比如说，就表现为天生的素质了。但是，首先，是野蛮人具有适应于一切的素质还是文明人自动去适应一切，是大有区别的。并且，在俄罗斯人那里，实际上同对任何种类劳动同样看待这一点相适应的，是传统地固定在一中十分确定的劳动上的状态，他们只是由于外来的影响才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劳动这个例子确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

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

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复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

其次,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抗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漫画式的形式出现。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因此,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包含着一种适用于一切其他社会形式的真理这种说法是对的,那末,这也只能 *cum grano salis* 来理解。这些范畴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然而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所谓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所谓 *uv âue*〔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

直译是“带一点盐”,转义是“在一定意义上”。——编者注

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在资产阶级经济没有把自己神话化而同过去完全等同起来时，它对于前一个社会，即它还须与之直接斗争的封建社会的批判，是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

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与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的、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做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例如，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它是同土地结合着的，而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并且它又是同农业结合着的，而农业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方式。但是，这是最错误不过的了。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以畜牧民族为例（纯粹的渔猎民族还处于真正发展的起点之外），在他们中间出现一定形式的，即偶然的耕作。土地所有制由此决定了。它是公有的，这种形式依这些民族保持传统的多少而或多或少地遗留下来，斯拉夫人中的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在从事定居耕作——这种定居已是一大进步——的民族那里，像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耕作居于支配地位，那里连工业、工业的组织以及与工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或者像在古

代罗马人中那样工业完全附属于耕作 ;或者像中世纪那样工业在城市中和在城市的各种关系上模仿着乡村的组织。在中世纪 ,甚至资本——只要不是纯粹的货币资本——作为传统的手工工具等等 ,也带着这种土地所有制的性质。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情况则相反。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 ,完全由资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制居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 ,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 ,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 ,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分别考察了两者之后 ,必须考察它们的相互关系。

因此 ,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 ,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 ,这种关系同看来是它们的合乎自然的次序或者同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 ,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古代世界中商业民族——腓尼基人、迦太基人——表现的单纯性(抽象规定性) ,正是由农业民族占优势这种情况决定的。作为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资本 ,在资本还没有成为社会的支配因素的地方 ,正是在这种抽象中表现出来。伦巴第人和犹太人对于经营农业的中世纪社会 ,也是处于这种地位。

还有一个例子 ,说明同一些范畴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

地位，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新形式之一 joint-stock companies (股份公司)。但是，它还在资产阶级社会初期就曾以特权的、有垄断权的大商业公司的形式出现。

国民财富这个概念，在十七世纪经济学家看来，无形中是说财富的创造仅仅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实力是与这种财富成比例的，——这种观念在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部分地保留着。这是一种还不自觉的伪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被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现代国家被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

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 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分析过的意义上。(2) 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 (私的)。(3) 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的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4) 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 世界市场和危机。

4 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

注意：应该在这里提到而不该忘记的各点：

(1) 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某些经济关系，如雇佣劳动、机

器等等，怎样在战争和军队等等中比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发展得早。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在军队中也特别显著。

(2) 历来的观念的历史编纂法同现实的历史编纂法的关系。特别是所谓文化史，旧时的宗教史和政治史。(顺便也可以说一下历来的历史编纂法的各种不同方式。所谓客观的。主观的(伦理的等等)。哲学的。)

(3) 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

(4) 对这种见解中的唯物主义的种种非难；同自然唯物主义的关系。

(5) 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

(6) 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理解。现代艺术等等。这种不平衡在理解上还不是像在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那样如此重要和如此困难。例如教育。美国同欧洲的关系。可是，这里要说明的真正困难之点是：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例如罗马私法(在刑法和公法中这种情形较少)同现代生产的关系。

(7) 这种见解表现为必然的发展。但承认偶然。怎样。(对自由等也是如此。)(交通工具的影响。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8) 出发点当然是自然规定性；主观地和客观地。部落、种族等。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

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末，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

我们先拿希腊艺术同现代的关系作例子，然后再说莎士比亚同现代的关系。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 [神话] 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必特又在哪里？在 *Crédit Mobilier*⁴⁵⁷ 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一切神话都是在想像中和通过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因此，随着自然力在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⁴⁵⁸ 还成什么？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不是对自然（这里指一切对象，包括社会在内）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但是无论如何总得是一种神话。因此，决不是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这种发展排斥一切

神话地对待自然的态度和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并因而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无关的幻想。

从另一方面看：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弹丸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

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7 年 8 月底至
9 月中旬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 1902—1903 年“新时代”
第 23—25 期（第 1 卷）

注 释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注 释

注 释

- 1 马克思被邀请作为伦敦的外国流亡革命人士的正式代表，出席 1856 年 4 月 14 日为纪念宪章派报纸“人民报”（《People's Paper》）创刊四周年而举行的宴会。他利用请他第一个讲话的机会，作了关于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的演说。马克思参加“人民报”的创刊纪念会这件事明显地说明了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同英国宪章派保持着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力想在思想上影响英国无产阶级并且帮助宪章运动的领袖，以使英国工人运动在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复兴起来。

“人民报”是宪章派的周报，1852 年 5 月由革命的宪章运动的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琼斯在伦敦创办。1852 年 10 月至 1856 年 12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常为该报撰稿，同时还对该报的编辑工作给以帮助。该报除了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专为它撰写的文章外，还从“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上转载他们的重要文章。在这个时期，该报始终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琼斯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接近，曾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为“人民报”撰稿并使他们和琼斯的关系一度破裂。1858 年 6 月该报转到了资产阶级实业家的手中。——第 3 页。

- 2 好人儿罗宾是英国民间故事中庇护人们和为人们帮忙的幻想人物，是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第 4 页。
- 3 1793 年约克公爵被任命为第一次反法同盟的英军总司令，并奉英国政府之命前往弗兰德攻占敦克尔克。在对敦克尔克进行软弱无效的围攻之后，1793 年 9 月 6—8 日，联军在冈德斯霍特战役中被法国革命军击败。英军仅仅由于约克公爵在法军进攻时没有应战，仓皇退却，才免于全军复没。

在第二次反法同盟成立后，在 1799 年，约克公爵作为英俄联军总司令被派往荷兰（当时的巴达维亚共和国），英、俄联军中的英国军团在这年 8 月底在赫耳德登陆。由于公爵指挥无能，联军在 10 月被法国人击溃。——第 7 页。

- 4 马克思在这里引的是科贝特的文章“科克伦·约翰斯顿先生”（《Mr. - Cochrane Johnstone》），载于 1806 年 7 月 5 日“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第 10 卷第 1 期。马克思在写关于约克公爵的文章时还利用了科贝特的其他文章。

“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Cobbett's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是从 1802—1835 年在伦敦出版的激进派周报。——第 7 页。
- 5 阿尔克马降约是 1799 年 10 月 18 日在约克公爵指挥的第二次反法同盟的军队在荷兰失败后签字的（见注 3）。除了规定释放八千名法国和荷兰战俘以外，联军还必须撤出自己在荷兰的军队。——第 8 页。
- 6 阿德里安堡和约是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中俄国获胜后两国于 1829 年 9 月缔结的和约。——第 9 页。
- 7 福克斯集团（Coterie Fox'）——这是马克思对以查理·詹姆斯·福克斯为首的、人数不多的辉格党贵族“左”派的称呼。这个派别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由于辉格党分裂而形成的。福克斯的拥护者代表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反雅各宾战争，拥护英国议会改革。——第 10 页。
- 8 出售军官官衔证书的制度是十七世纪末叶在英国产生的，后来得到国王批准。1719—1720 年正式规定了军衔价格，这种价格后来曾几次审查和调整。这一制度一直存在到 1871 年，它保障了英国贵族在军队中的垄断地位。——第 10 页。
- 9 “国王之友”是十八世纪下半叶人们对国王乔治三世的政策的拥护者的称呼。乔治三世力图加强国王的特权，把政治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把辉格党排除在国家管理之外。国王为此利用了辉格党中由于工商业资本的利益同地主寡头政体的利益发生冲突而产生的危机。“国王之友”曾多次

夺取了政权。——第 10 页。

- 10 指匿名小册子“内阁和反对派对约克公爵殿下的行为实录”1808 年伦敦版（《A Plain Statement of the Conduct of the Ministry and the Opposition, towards His Royal Highness the Duke of York》·London, 1808）。——第 10 页。
- 11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是英国资产阶级的第一家日报，1770 年到 1862 年在伦敦出版；是辉格党的机关报，五十年代初是皮尔派的机关报，后来是保守党的机关报。——第 11 页。
- 12 马克思引用的是威廉·科贝特的文章“约克公爵”（《Duke of York》），载于 1808 年 8 月 20 日“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第 14 卷第 8 期。——第 11 页。
- 13 白厅（White Hall）是伦敦中心的一条街，在那里有许多政府机关，其中有英军总司令部、海军部和其他的部（财政部、外交部等等）。——第 13 页。
- 14 卡列班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中半人半怪的角色。——第 16 页。
- 15 “撒丁”这篇论文是马克思为“人民报”撰写并且同时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论文之一。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1924 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纳从四十年代末起是该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于 1851 年 8 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 1862 年 3 月，继续了十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恩格斯的文章先从曼彻斯特寄到伦敦，马克思通常在它们上面注上寄往纽约的日期；因此，文章上面的日期有时与它们的写作日期不符。马克思在有些文章上还注上巴黎或柏林等字样。马克思和恩

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的文章，涉及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的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从 1855 年年中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文章在该报发表时都没有署名。有时编辑部竟然还删改文章的内容。编辑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 1857 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编辑部向马克思提出减少写稿的数量。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奴隶占有制各州妥协的人势力加强和报纸离开了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卷所包括的这段时期中所写的文章，遭到“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大肆篡改以致歪曲原意的，本卷没有收入。——第 17 页。

- 16 教皇党人和保皇党人 是十二世纪至十五世纪罗马教皇和德国皇帝进行斗争期间在意大利成立的两个政党。教皇党人是教皇的拥护者，是意大利城市中的商业手工业阶层的上层。保皇党人主要是拥护皇帝的封建贵族的代表人物。

法国和奥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 是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1701—1714）和争夺奥地利王位继承权的战争（1741—1748）。头一次战争的结果，萨瓦公国得到了西西里岛、蒙费拉托以及米兰公国的一部分土地；萨瓦大公于 1713 年取得了国王的称号。1718 年，西西里被西班牙人夺去，但是萨瓦公国于 1720 年获得了撒丁作为赔偿；同年，在萨瓦、皮蒙特、撒丁的领土上建立了撒丁王国（或称皮蒙特王国），撒丁王朝的代表成了国王。由于争夺奥地利王位继承权的战争，撒丁王国从奥地利那里得到了帕维亚公国的大部分以及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部分领地。——第 17 页。

- 17 指皮蒙特的首相兼外交大臣卡富尔伯爵为 1856 年巴黎会议起草的一份备忘录，其内容是关于在奥法占领各省和那不勒斯王国（双西西里王国）境内的意大利人民的贫困状态。卡富尔未能在会议上宣读这份备忘录，他于 4 月 8 日发表严厉谴责奥地利在亚平宁半岛上的统治的演说时，向会议参加者叙述了它的内容。皮蒙特的代表在 1856 年 3 月 27 日和 4 月 16 日致会议主席法国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伯爵的照会中，提出了削弱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影响、消除奥地利对意大利领土的占领、停止在那不勒斯王国实行反动和恐怖政策的问题。尽管法、英、俄三国代表赞同皮蒙特的备忘录，但是意大利问题在巴黎会议上并未得到实际解决。——第 17 页。
- 18 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英国辉格党政府（当时帕麦斯顿勋爵任外交大臣）口头上支持在意大利（包括皮蒙特）实行温和的自由主义的改革，但是无论在 1848 年或者 1849 年，都没有帮助皮蒙特反对奥地利统治北部意大利的斗争。——第 17 页。
- 19 1849 年 4 月，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把远征军开往意大利，目的是干涉罗马共和国和恢复教皇的世俗权力。在残酷的搏斗以后，法国军队于 1849 年 7 月 3 日进入罗马，在那里一直驻留到 1870 年。——第 19 页。
- 20 马克思把路易·波拿巴称为凯恩、拉姆别萨和贝耳岛的狱卒，是指波拿巴在执掌法国政权之后就开始大批逮捕和放逐共和派和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 凯恩是法属圭亚那（南美）的城市，是政治犯服苦役和流放的地方，因苦役制度和折磨人的热带气候而常常造成大批死亡，故有“不流血的断头台”之称。
- 拉姆别萨（拉姆别兹）是在北非一个古罗马城市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法国的感化移民区，1851—1860 年是流放政治犯的地方。
- 贝耳岛是比斯开湾的一个岛，1849—1857 年是监禁政治犯的地方；参加 1848 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工人也被囚禁在这里。——第 19、439 页。
- 21 关于奥地利蒙受的损失，是马克思的讽刺话。在 1856 年的巴黎会议上，

- 虽然法英两国代表赞同皮蒙特的备忘录（见注 17），但是这两个国家并不想稍微认真地阻止奥地利在意大利和巴尔干所实行的政策。对这点的证明，是奥地利、法国、英国于 1856 年 4 月 15 日在巴黎共同签订了关于保证奥斯曼帝国不受侵犯的协定。——第 20 页。
- 22 在 1848—1849 年的奥意战争当中，撒丁国王查理 - 阿尔伯特于 1849 年 3 月 23 日在诺瓦拉（意大利北部）战役中一败涂地。查理 - 阿尔伯特害怕人民的愤怒，当即在战场上把王位让给儿子维克多 - 艾曼努尔，并逃出意大利。维克多 - 艾曼努尔二世于 1849 年 3 月 26 日同奥地利人签订了停战协定，而于 8 月 6 日缔结了和约。——第 20 页。
- 23 大概是指路易·波拿巴为他的堂弟拿破仑亲王所筹划的与撒丁国王维克多 - 艾曼努尔二世的女儿克洛蒂尔达缔结婚姻一事。婚礼于 1859 年举行。——第 20 页。
- 24 古希腊德尔斐城阿波罗神庙里的德尔斐神谕以预卜希腊各城邦的内外政策而驰名，并对这种政策起很大的影响（卜辞由女巫宣布，但是编写卜辞的是洞悉希腊事态的祭司）。更古老的所谓特罗芬尼神谕未曾享有这种威信。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英国议员们的发言不仅对于确定英国的对外政策不起决定性作用，而且也没有独创性，只不过反映了帕麦斯顿强迫议会接受的政策而已。——第 20 页。
- 25 马克思引证的是皮蒙特的代表 1856 年 4 月 16 日的照会（见注 17）。——第 21 页。
- 26 “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保守派最大的日报，1785 年创刊于伦敦。——第 23 页。
- 27 马克思指的是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租税的原理”（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第一版于 1817 年在伦敦出版。——第 23 页。
- 28 Cr 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全称 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 édit 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贝列拉兄弟创办并为 1852 年 11 月 18 日的法令所批准。Cr édit Mobilier 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

介和滥设企业(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银行广泛地参加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在交易所进行投机。Crédit Mobilier 用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得来的资金收买各种公司的股票, Crédit Mobilier 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作担保,而各种公司的股票则是以它们本身的财产价值作担保的。因此,同一项实际财产产生了两倍的虚拟资本:一种形式是该企业的股票,一种形式是拨款给该企业并收买其股票的 Crédit Mobilier 的股票。该银行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并受它的保护。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停业。Crédit Mobilier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由反动时代的特征所引起的,在这个时代里,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其他许多国家也仿照法国的 Crédit Mobilier 建立了类似的机关。——第 24、218、257、313、379、464、521、541、689、699、729 页。

- 29 小拿破仑 是维克多·雨果在 1851 年法国立法议会的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中给路易·波拿巴起的绰号;1852 年,雨果的抨击性小册子“小拿破仑”(《Napoléon le Petit》)问世以后,这一绰号得到了广泛的流传。——第 27 页。
- 30 十二月十日会(Dix Décembre)是波拿巴派的秘密会社,成立于 1849 年,主要由堕落分子、政治冒险家、军阀的代表人物等组成;它的成员帮助了路易·波拿巴于 1848 年 12 月 10 日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该会因此而得名)。后来,该会成员是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73—176 页)中对十二月十日会作了详尽的评述。——第 30 页。
- 31 弗伦特运动 是 1648—1653 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贵族资产阶级运动。运动的贵族首领依靠自己的侍从和外国军队,利用这一时期发生的农民起义和城市的民主运动来为自己谋利益。——第 30 页。
- 32 “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政治和文

- 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简称，1789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该报反映了反革命资产阶级，即所谓秩序党的观点。1851年政变以后，是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第31页。
- 33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是法国的日报，1789—1901年在巴黎出版；从1799—1869年是政府的正式机关报。——第32页。
- 34 马克思指的是傅立叶的著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初版于1808年在巴黎出版。——第38页。
- 35 为了使英格兰银行不致破产，英国皮特政府颁布了特别法令，规定银行券的官定行市，并准许该行停止银行券兑换黄金。银行券兑换黄金在1819年才恢复。——第40页。
- 36 文章中指的是1856年夏季马德里的革命事变。1854—1856年的西班牙第四次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以这些事变结束的。1856年7月，西班牙的反动派和教权派把埃斯帕特罗的进步派内阁弄下了台，组成了奥当奈尔将军的保守派内阁。反动势力的这次进攻引起了一场新的革命，革命遭到奥当奈尔的残酷镇压。——第41页。
- 37 指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举行的政变。第二帝国的波拿巴政体即由此肇始。——第42页。
- 38 1843年，温和派领袖之一纳尔瓦艾斯将军利用了人们对军事独裁者、王国摄政埃斯帕特罗领导的进步派内阁的普遍不满，同孔查将军等人一起举行了反革命兵变。在把埃斯帕特罗赶下台以后，纳尔瓦艾斯组成了一个新内阁，随后担任了新内阁首脑，西班牙的十年反动统治时期从此开始。——第42页。
- 39 艾阿库袭派（Ayacucho）——1824年12月西班牙军队在秘鲁的艾阿库袭平原会战失败以后，人们给镇压美洲西班牙殖民地起义者的战争的参加者埃斯帕特罗及其他西班牙将军起的绰号。在埃斯帕特罗摄政时期

(1841—1843),他所领导的受到英国支持的军人集团的成员也被称为艾阿库表派。——第 42 页。

- 40 指英国和法国围绕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二世及其妹玛丽-路易莎-费南达公主的婚姻问题而进行的外交斗争。英国最初打算让伊萨伯拉嫁给同英国宫廷关系密切的科堡亲王列奥波特,让她的妹妹嫁给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的幼子蒙潘西埃公爵;可是过了一些时候,英国又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而坚持让玛丽-路易莎-费南达嫁给列奥波特亲王,让伊萨伯拉嫁给西班牙波旁家族的代表人物——唐·恩利科。由于憎恨后者同进步党有联系,伊萨伯拉女王的母亲玛丽-克里斯亭娜(马克思称她为蒙尼奥斯夫人,因为她同奥古斯丁·费南多·蒙尼奥斯公爵有门户悬殊的夫妇关系)同路易-菲力浦联合了起来,结果在 1846 年 10 月,不顾英国提出的外交要求,伊萨伯拉同唐·恩利科的哥哥唐·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订了婚,玛丽-路易莎-费南达同蒙潘西埃公爵订了婚。——第 42 页。
- 41 马克思指的是 1820—1823 年西班牙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事件。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期望在 1822 年 7 月 7 日拿下革命的马德里的企图失败以后,秘密请求神圣同盟帮助他镇压革命。按照神圣同盟的维罗那会议决定,由法国给斐迪南以援助。法国远征军于 1823 年进入西班牙,在这个国家恢复了专制制度;法国军队在西班牙留驻到 1828 年。——第 44 页。
- 42 Moderados (温和派) 是西班牙的君主立宪党。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利益。这个党派是由于自由党分裂而产生的;1820—1823 年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时自由党分裂为右翼和左翼,右翼是温和派,左翼是激进派,主张最大限度地限制王权。
Progresistas (进步派) 是西班牙的资产阶级自由党,形成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进步派依靠的是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军官,他们的基本要求是有限的君主制。——第 44 页。
- 43 指的是 1854 年 6—7 月马德里所发生的事件。1854—1856 年西班牙第四次资产阶级革命即从此开始。1854 年 7 月 17 日,死硬的保皇派和保

- 守派里奥斯·伊·罗萨斯进入里瓦斯公爵领导的新内阁,引起了一场新的大起义。结果,伊萨伯拉女王被迫于7月19日撤销了因镇压起义而有“榴霰弹内阁”之称的里瓦斯内阁。7月31日,埃斯帕特罗受命主持新内阁。——第44页。
- 44 “日报”(《Gaceta》)是西班牙的报纸“马德里日报”(《Gaceta de Madrid》)的简称。该报创刊于1661年,从1762年起为政府的正式的机关报。——第44页。
- 45 大概是暗示这样两件事:一件是埃斯帕特罗曾因为同卡洛斯派斗争有功而获得卢恰纳伯爵的封号;另一件是他曾得到一个与他不相称的“革命之剑”的绰号,这个绰号从1843年政变(见注38),即埃斯帕特罗的进步派内阁被所谓温和派的反动内阁代替的时候起在人民中间流行。——第46页。
- 46 “新闻报”(《La Presse》)是1836年起在巴黎出版的法国资产阶级日报,在五十年代反对第二帝国的政体。——第46页。
- 47 指埃斯帕特罗在1856年7月14日奥当奈尔举行政变以后所采取的两面派的叛卖立场。埃斯帕特罗在政变的第一天就发表宣言,呼吁人们停止斗争并支持奥当奈尔的政策,同时他又到马德里的街头号召起义者批抗反动势力。可是由于他既不站在政变派一边,又不站在起义者一边,结果无论在自己的拥护者当中还是在首都革命群众当中都完全失去了政治信任和威望。——第48页。
- 48 “马德里报”(《Journal de Madrid》)是西班牙的报纸,1855—1856年在马德里出版。——第48页。
- 49 马克思把支持斐迪南七世的弟弟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的反动潮流称为卡洛斯派。卡洛斯派依靠反动的贵族、教权派和巴斯克、纳瓦腊、旧加斯梯里亚、阿腊贡、卡塔卢尼亚某些地区的落后农民的支持,在1833—1840年发动了长期浴血内战。唐·卡洛斯在1833年以西班牙王位归属者自居而争夺国王之女伊萨伯拉二世的王位,发动兵变反对伊萨伯拉二世之母、女摄政王玛丽·克里斯蒂娜。女摄政王不得已而寻求

自由派的支持,对他们许以一系列的让步。卡洛斯派战争实际上变成了封建的卡洛斯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的斗争。这场战争于 1840 年也是以卡洛斯派的失败而告终。——第 49 页。

- 50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是英国一家具有保守倾向的日报,1780—1869 年在伦敦出版。——第 49 页。
- 51 指 1848 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和 1849 年 5 月德勒斯顿的街垒战。——第 50 页。
- 52 指 1808—1814 年西班牙人民反对法国占领者的民族解放斗争。这场民族解放斗争是同比利牛斯半岛上的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同时展开的。反对外国掠夺者的战争提出必须在西班牙实行资产阶级改革作为迫切任务,因此动员了西班牙社会的一切阶层,并同西班牙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结合了起来。这场斗争的主要动力是农民,他们用游击战顽强地反抗侵略者,同时还为取得土地而斗争。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软弱而夺取了运动领导权的自由派贵族,仅限于在 1812 年通过了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宪法(即所谓加迪斯宪法,这个宪法是由议会在加迪斯市开会通过的,故以该市命名)。宪法对王权加以限制,宣布最高权力属于国民,把立法权转交给由普选(家庭佣工不能参加)产生的一院制议会。议会获得了国内外政策方面的广泛权利。宪法规定实行地方自治、累进税、普遍兵役制;各省都成立地方国民军,改组整个司法系统。宪法在西班牙国内事务方面实行民主化,同时却保留了西班牙对殖民地的统治。西班牙人民的斗争在打垮拿破仑第一的政治军事计划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拿破仑第一于 1812 年在俄国被击败以后,被迫从西班牙撤出自己的军队。马克思把西班牙人民的斗争叫做“具有民族性质和王朝性质”的运动,意思是指,这一斗争既为了反抗外国的占领,同时也为了打击国王查理四世的宫廷奸党。查理四世被迫于 1808 年 3 月让位于其子斐迪南七世。斐迪南七世的统治权得到了议会附有某些限制条件的承认。——第 51 页。
- 53 指 1820—1823 年的西班牙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的口号是:召开议会,取消宗教裁判,承认在 1814 年斐迪南七世从法国回到西班牙以

后被废除的 1812 年宪法。但是运动仅限于实行了一系列反教权的以及某些其他的改革。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民群众的退出。资产阶级没有向他们保证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第 51 页。

54 1808 年 5 月 2 日在马德里爆发了反对法国占领者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遭到驻西班牙法军总司令缪拉特的残酷镇压。有一千多名西班牙人被屠杀。——第 52 页。

55 在十九世纪，西班牙及其殖民地划为十七个军区。每个军区的长官叫做镇守司令(因此而有镇守司令区的名称)。镇守司令作为国王的代表而在自己的军区总揽全部军政大权。——第 52 页。

56 指 1814 年 3 月斐迪南七世从法国回到西班牙以后开始的残酷的封建专制反动时期。反动时期的特点是，军事密谋层出不穷，西班牙政府软弱而不稳定。1814 年至 1819 年期间西班牙更换了二十四个内阁。

1833 年到 1840 年的王朝战争——见注 49。——第 52 页。

57 为个人本身利益而蓄谋推翻圣路易斯专政的奥当奈尔将军和杜耳塞将军，利用国内经济困难、政府的反动政策和宫廷奸党的统治所引起的普遍不满，于 1854 年 6 月 28 日在马德里卫戍部队中发动了兵变，并战胜了政府军。但是奥当奈尔深知只靠纯粹的宫廷革命是不可能得到西班牙城市居民支持的，不得已而于 7 月 7 日在曼萨那累斯发表了被称为“曼萨那累斯纲领”的宣言。这个纲领包括了人民的某些要求：消灭宫廷奸党，召集已被解散的议会，减低赋税，成立国民军等等。人民群众被吸引加入斗争，便造成了西班牙第四次资产阶级革命(1854—1856)。在这次革命中，以埃斯帕特罗为首的进步党于 1854 年上台执政。——第 52 页。

58 克罗地亚兵主要是从克罗地亚人和某些其他斯拉夫人以及匈牙利人中募集来的。克罗地亚兵是拉德茨基将军率领的奥地利军队中的一部分队伍。拉德茨基的军队参与了对 1848—1849 年意大利革命的镇压。

马克思把朱阿夫兵叫做波拿巴的非洲军队。朱阿夫兵是由阿尔及利亚人和一部分欧洲人编成的法国殖民军。朱阿夫兵在法国人于 1830 年发动的、断断续续历时四十年之久的阿尔及利亚掠夺战争中以残暴闻

名。

弗兰格尔将军指挥下的军队曾于 1848 年 11 月参与柏林的反革命政变和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行动。马克思把他们叫做“波美拉尼亚军队”，看来是指 1848 年被任命为勃兰登堡军区总司令的弗兰格尔出生于波美拉尼亚而言。——第 53 页。

- 59 马克思讽刺地暗指路易·波拿巴和波拿巴集团在准备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用来在军官在士兵当中招募拥护者的方法。路易·波拿巴在圣摩尔、萨托里等地以共和国总统的身分举行招待会和阅兵式的时候，大摆酒筵，用腊肠、冷盘禽肉、香槟酒等等款待军官和士兵。送钱也是收买军队所使用的办法之一。——第 53 页。
- 60 麦克格雷哥尔最著名的统计学著作有：“各国资源和统计” 1835 年伦敦版（《The Resources and Statistics of Nations》·London, 1835）和“欧美若干国家的商业税则、条例、资源和贸易” 1841—1850 年伦敦版（《Commercical Tariffs and Regulations, Resources, and Trade, of the Several States of Europe and America》·London, 1841—1850）。——第 56 页。
- 61 大法官法庭，或称正义法院，是英国的最高法院之一，在 1873 年司法改革后成为最高法院的分院。这个法院由大法官领导，具权限是审理有关继承、契约义务、股份公司等方面的案件。这个法院的权限在许多场合下同其他高等法院的权限分不清。同其他法院所应用的英国普通法相反，大法官法庭的诉讼程序是根据所谓“正义法”进行的。——第 57 页。
- 62 指 1847 年 7 月—1848 年 1 月法国选举改革的宴会运动，这一运动是 1848 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

宗得崩德是瑞士经济落后的七个天主教州在 1843 年缔结的单独联盟，目的是要反抗在瑞士实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耶稣会教徒的特权。宗得崩德的反动企图遭到了四十年代中在大部分的州和瑞士议会里取得优势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反对。1847 年 7 月瑞士联邦议会关于解散宗得崩德的决议成了宗得崩德 11 月初向其他的

州开始采取军事行动的导火线。1847年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

联合会议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获得向国外借款的保证以摆脱财政困难，于1847年4月在柏林召集的普鲁士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会议。联合会议是在1847年4月11日召开的。由于国王拒绝满足议会资产阶级多数派的最微薄的政治要求，议会拒绝为借款作保证。国王为了进行报复于同年6月解散了联合会议，这样就加重了国内的反抗情绪，加速了德国的革命。

西班牙的婚姻——见注40。

马克思把当时统治着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这两个德意志公国的丹麦同德意志联邦之间的长期斗争叫做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纠纷。1848年革命前夕，在这两个公国的德意志居民间发生了反对丹麦和这两个公国实行统一宪法的运动，宪法草案是1848年1月28日颁布的。这个运动就其目的来说，是分立运动，没有超出温和自由派对立场的范围，是为了在德意志北方再建立一个德意志邦——反动普鲁士的卫星国。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情况起了变化。在德意志的革命事件的影响下，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民族运动具有革命的、解放的性质。争取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从丹麦分离出来的斗争成了德意志一切进步力量争取德意志国家的民族统一的斗争的组成部分。——第60页。

- 63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15—1870年在巴黎出版；在四十年代是奥尔良党人温和派的机关报；它在1848年革命时期反映了聚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十二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61页。
- 64 “国民议会报”(《L'Assemblée nationale》)是法国正统君主派的日报，1848—1857年在巴黎出版。——第62页。
- 65 法国1830年的七月资产阶级革命对德国的社会政治生活起了相当大的影响，推动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运动的发展。德意志的许多邦(不伦瑞克、萨克森、库尔黑森等)宣布了宪法。但是，正像法国的新宪法

（“一八三一年宪章”）是资产阶级上层——金融贵族同土地贵族的妥协一样，德意志邦的宪法也是资产阶级同君主制和贵族的妥协。——第 62 页。

- 66 针线街是伦敦的一条街，英格兰银行的所在地。——第 65 页。
- 67 1856 年春天罗尼河和卢瓦尔河盆地水灾期间，拿破仑第三为了追求声望，曾到受灾的省份，乘坐小船经过一些被淹的城市和乡村，并且对灾害的损失给以资助。当时拿破仑第三在给公共工程大臣的一封信中提出了各种措施，在他看来，这些措施能够阻止类似的自然灾害再次发生。——第 66 页。
- 68 马克思讽刺地把欧洲国家为和平调解普鲁士和瑞士在 1856 年秋发生的所谓纽沙特尔冲突问题的会议方案称为第二次巴黎会议。在 1707—1806 年，纽沙特尔公国及其领地瓦兰壬（德国叫法是诺恩堡和瓦连迪斯）是普鲁士所属的一个小邦。1806 年，拿破仑战争期间，纽沙特尔并入法国。1815 年，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它参加了瑞士联邦，成为它的第二十一州，但同时保持对普鲁士的藩属关系。1848 年 2 月 29 日，纽沙特尔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结束了普鲁士的统治，宣布成立共和国。但是根据英法俄 1852 年 5 月 24 日签订的协定，普鲁士王对纽沙特尔的权利重新得到承认。1856 年 9 月，公国爆发了保皇党人的起义，起义者为瑞士政府逮捕。普鲁士王要求释放被捕者。瑞士在答复这一点时要求普鲁士王放弃对纽沙特尔的权利。欧洲国家关于纽沙特尔会议预定在 1857 年 3 月在巴黎召开（于 3 月 5 日召开）。这个建议是法国政府提出的，因为这一冲突有在法国边境引起战争的危险。

那不勒斯问题是由皮蒙特的代表在 1856 年的巴黎会议上为使会议的参加者注意那不勒斯王国（双西西里王国）实行的恐怖政策而提出来的。法国和英国在会上谴责那不勒斯王国政府对内政策的办法，它们担心，统治着王国的极端的反动会引起爆发革命运动。它们在 1856 年 5 月给那不勒斯政府的照会中要求改变它的政策，但是得到了否定的回答。10 月，法国和英国从那不勒斯召回了自己的大使，并使自己的舰队——法国在土伦的舰队和英国在马尔他群岛的舰队做好了战斗

准备。但是英国和拿破仑第三发生了意见分歧,拿破仑第三企图在那不勒斯王国复辟波拿巴王朝,所以那不勒斯的远征没有实行。——第 69 页。

- 69 马克思把 1856 年巴黎会议上和会议后围绕着在土耳其最高当局统治下的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多瑙河公国合并的问题展开的外交斗争叫做多瑙河问题。法国想以波拿巴王朝的代表人物来领导这两个公国,建议把它们合并成一个罗马尼亚国家,由一个属于在欧洲居统治地位的王朝之一的外国亲王统治。支持法国的有俄国、普鲁士和撒丁。土耳其由于害怕罗马尼亚国家会力图推翻奥斯曼帝国的压迫,因而反对两个公国合并,支持土耳其的有奥地利和英国。会议仅仅认为必须弄清楚(通过在公国举行御前会议的选举)罗马尼亚居民自己对合并问题的态度。选举举行了,但是由于作弊,反对合并的人被选入了莫尔达维亚的御前会议;这引起了法国、俄国、普鲁士和撒丁的反对,它们要求宣布选举无效。因为土耳其迟迟不作答复,这些国家就在 1857 年 8 月同它断绝了外交关系。这次冲突在拿破仑第三的调停下解决了,他说服英国政府不要阻挠法国的计划,这些计划对英国也是同样有利的。公国的选举被宣布无效,但是新的选举的举行并没有解决公国合并的问题。这个问题到 1859 年才由罗马尼亚人自己解决了。

贝萨拉比亚问题——马克思指的是 1856 年巴黎条约签订以后的外交斗争,这一斗争是由于确定条约未明确划定的俄土在贝萨拉比亚(它的一部分从俄国划归土耳其)的边界以及确定多瑙河三角洲和河口的岛屿之一的所有权而造成的纠纷所引起的。奥地利借口由于重新划定在贝萨拉比亚的边界而发生的困难,拖延从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撤走自己的军队,这就阻挠了关于这两个公国的合并问题的解决。

关于那不勒斯问题和关于新的巴黎会议,见注 68。——第 71 页。

- 70 指从 1810 年延续到 1826 年的西班牙在拉美和墨西哥的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由于这次战争,西班牙失去了墨西哥和自己的南美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成了独立的共和国。——第 72 页。
- 71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于 1600 年创立,是英国在印度推行殖民政策的工具。

在十九世纪中叶最后完成的对印度的占领,是英国资本家以公司的名义进行的,这个公司一开始就拥有同印度和中国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公司还得到了它在印度侵占的领土的管理权、民政机关的人事任命权和收税权。它的贸易和行政特权由英国议会定期续发的公司特许状规定。在十九世纪,公司的贸易活动逐渐失去其意义。1813年的特许状取消了它同印度贸易的垄断权;它只保留有茶叶贸易的垄断权和同中国贸易的垄断权。根据1833年的特许状,公司失去了一切贸易特权,包括同中国贸易的垄断权在内。英国人在印度占有的领土的管理权,公司一直保持到1858年,当时公司已经被最后撤销,管理印度的权力直接转归王国。——第73页。

- 72 1851年在中国爆发了一个强大的农民战争性质的反封建的解放运动。这个运动从南方的广西省开始,后来扩展到华中各省,几乎席卷了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1851年1月,起义者建立了以南京为中心的太平天国,于是整个运动就叫做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杀死统治中国的满族封建主,取消捐税,消灭大封建主所有制。这次起义还具有农民运动特别是东方农民运动特有的宗教色彩,打击支持满清王朝的佛教僧侣和寺院。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国人民反对封建制度和异族侵略者的广泛斗争开了一个头,但是它并没有消灭中国的封建生产方式。在太平天国内部形成了同统治阶级妥协的封建上层,这是运动遭到失败的原因之一。革命遭到的主要打击是英美法三国的公开干涉(最初这几个强国打着“中立”的幌子援助满清王朝),它们的武装力量协同中国封建主们的军队,于1864年把太平军起义镇压下去了。——第74页。
- 73 马克思讽刺地暗指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领袖马志尼在1848—1849年革命失败以后为了唤起意大利人民举行起义来反对奥地利的和其他的压迫者以及争取统一意大利而写的许多宣言。马志尼的“世界主义新天主教思想”的宣言,正如马克思所评述的,没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自己的理论观点的模糊、矛盾和资产阶级局限性,远离人民群众的马志尼看不到在意大利所必须依靠的真正革命力量。由于他不了解意大利被压迫的农民就是这种力量,他在自己的宣言中把整个的人民当做抽象的范畴来号召,而没有考虑到组成人民的那些阶级的实际要求和利益。三十

至五十年代在马志尼领导下组织的一切密谋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都失败了。——第 76 页。

- 74 指 1856—1857 年的英国—波斯战争,这场战争是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在亚洲实行侵略性的殖民政策的一个阶段。英国和波斯之间的外交关系在 1855 年末破裂,表面上的原因是英国驻德黑兰公使与波斯的萨德拉萨姆(首相)由于一个波斯臣民——英国使节的秘书而发生了争执。波斯统治者要想侵占赫拉特公国的企图成为挑起战争的口实。这个公国的主要城市,即作为通商要道的枢纽和重要战略据点的赫拉特,在十九世纪中叶曾经是波斯和阿富汗之间发生纷争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前者有俄国扶助,后者有英国撑腰。波斯军队在 1856 年 10 月攻占了赫拉特,英国殖民者利用这一点进行武装干涉,其目的是奴役阿富汗和波斯。他们在 11 月 1 日向波斯宣战以后,就把军队开往赫拉特。但是 1857—1859 年在印度爆发的民族解放起义,使英国不得不赶紧与波斯缔结和约。按照在巴黎签订的和约,波斯于 1857 年 3 月放弃了自己对赫拉特的一切要求。1863 年赫拉特被并入阿富汗的艾米尔的领地。

延迟了两个月才发表马克思这篇文章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文章中补充了有关战争的事实以及文章写成后所发生的事实。——第 77 页。

- 75 指英国在波斯湾强占领土。——第 78 页。
- 76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是英国经济、政治方面的周刊,1843 年创办于伦敦;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 80 页。
- 77 “铁路、矿山和公共工程问题报”(《Journal des Chemins de Fer, des Mines et des Travaux Publics》)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1842 年起在巴黎出版。——第 82 页。
- 78 法国临时政府于 1848 年 3 月 16 日批准对各种直接税每法郎追加 45 生丁,使主要纳税者——农民大为不满。资产阶级共和派实行这一政策的结果,使农民离开了革命,在 1848 年 12 月 10 日的总统选举中投票选举路易·波拿巴。

国家工厂是 1848 年二月革命结束后立即根据法国临时政府的指示建立起来的。建立国家工厂的目的是要使路易·布朗组织劳动的思想在工人中丧失信用,另外是想利用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工厂的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因为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挑拨性的计划没有成功,而国家工厂的工人反而更加受到革命的感情的熏陶,资产阶级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取消国家工厂(如减少工人人数,把他们派到外省去从事公共工程的工作等)。这种做法引起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义的原因之一。起义被镇压后,卡芬雅克政府于 1848 年 7 月 3 日下令解散国家工厂。——第 84 页。

- 79 马克思大概是指与 1856 年 1 月 7 日在巴黎举行的法国著名共和派雕塑家大卫·丹热的葬礼有关的事件。当时人们都在传抄据说是诗人贝朗热所写的一首革命歌曲的歌词。参加葬礼的学生们在人群中看到了贝朗热,就高呼“自由万岁!”向他致意。法国青年反波拿巴情绪的这一公开表现,在葬礼结束后引起了一系列捕人事件,并且还成了政府在以后进行迫害的原因。——第 85 页。
- 80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是资产阶级日报,1831 年在布鲁塞尔创刊;它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 88 页。
- 81 “纽约每日论坛报”在下面又附加了这样一段话:“还有一点,我们在这里,在美国可以完全相信,即当这座欺诈大厦轰隆一声倒塌的时候,它会把我们也埋葬在它的瓦砾之下。我们夸耀我们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是建筑在沙土上的。我们不过是欧洲的一个殖民地和附属国。只要拿破仑下台,这一事件就不仅会从华尔街证券投机商人的柜子里、尤其会从美国劳动者工作的工厂和家庭里,使人深刻地感觉得到。”——第 89 页。
- 82 康波福米奥和约是 1797 年 10 月 17 日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签订的。它结束了开始于 1792 年的、法兰西共和国对参加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奥地利的战争。按照和约,由于法军胜利而退出该同盟的奥地利,在亚得利亚海岸上获得威尼斯共和国的六部分领土(连同威尼斯市在内)和属于威尼斯共和国的伊斯的利亚半岛和达尔马威亚的部分地区;伊奥尼亚群岛

和威尼斯共和国在阿尔巴尼亚的海岸上的领地划归法国。

重申了康波福米奥和约条件的吕内维尔和约,是在第二次反法同盟的军队战败以后,法国和奥地利于1801年2月9日签订的。——第90页。

- 83 按照1805年12月26日法国和奥地利签订的普勒斯堡和约,奥地利承认法国对部分意大利领土(皮蒙特、热那亚、帕尔马、皮阿琴察等等)的强占,并将其在亚得利亚海岸的领地——威尼斯、伊斯的利亚半岛和达尔马威亚让给意大利王国(也就是让给做了意大利国王的拿破仑第一),奥地利只保留的里雅斯特。

按照法国和奥地利于1809年10月14日在维也纳签订的、名为雪恩布龙和约的一项条约(签字地点在维也纳的雪恩布龙要塞),奥地利把的里雅斯特和克莱纳、克伦地亚部分地区、克罗地亚部分地区、阜姆、伊斯的利亚半岛及其所属岛屿、还有奥地利在沙瓦河右岸到波斯尼亚边界的所有领地,让给法国。因此,亚得利亚海的达尔马威亚沿岸所有地区都从奥地利转入法国之手。——第90页。

- 84 按照1815年英、法、俄、普、奥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在滑铁卢之战前数日在维也纳会议上签订的条约,伦巴第、威尼斯以及某些意大利的公国又再次划归奥地利。——第90页。

- 85 马克思把1833年在的里雅斯特成立的轮船公司称为奥地利的劳埃德。劳埃德原是伦敦的一个咖啡馆的老板,英国第一家海船保险公司就是在这家咖啡馆里组织起来的(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后来,欧洲各国很多保险轮船公司也都用劳埃德的名号。——第91页。

- 86 斯特拉本“地方志”第3卷。——第99页。

- 87 乌斯考克人(塞尔维亚文是逃亡者的意思)是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在十五世纪后半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被土耳其人占领后逃到亚得利亚海的达尔马威亚海岸。乌斯考克人组成了特殊的秘密武装团体——义勇队,于十五至十六世纪间同土耳其人进行了斗争,他们在当地居民支援下,在陆地和海上袭击土耳其人。乌斯考克人在亚得利亚海地区的活动也破坏了威尼斯的海外贸易。乌斯考克人的斗争是被征服的人民对侵

- 略者和本地地主进行的民族的、宗教的和阶级的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至今在巴尔干半岛西部人民的民歌里还保存着对乌斯克考人的英勇善战及其丰功伟绩的记忆。——第 100 页。
- 88 马克思指的是沙·弗·博丹-博普雷所写的“关于威尼斯湾东岸停泊场、港口和锚地的报告”(《Rapports sur les rades, ports et mouillages de la côte orientale du golfe de Venise》)。这篇报告发表于 1849 年巴黎出版的“水文年鉴”第 2 卷(《Annales hydrographiques》T. 2, Paris, 1849)。——第 101 页。
- 89 纽沙特尔问题——见注 68。——第 104 页。
- 90 指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于 1476 年 3 月 2 日在格兰桑(瓦得州)、1476 年 6 月 22 日在穆尔顿(夫赖堡州)同瑞士人会战的多次失利,以及 1477 年 1 月 5 日在南锡城(法国东北)会战中的失利,大胆查理的军队在该地被瑞士人、洛林人、亚尔萨斯人和德意志人的军队击溃。——第 105 页。
- 91 按照 1815 年的维也纳条约,波美拉尼亚的一部分——所谓瑞典波美拉尼亚划归普鲁士。——第 106 页。
- 92 康斯坦茨宗教会议(1414—1418)是在德意志皇帝西吉兹蒙特积极推动下召开的,其目的是为了在宗教改革运动开始的情况下巩固天主教会的已经动摇的地位。——第 108 页。
- 93 胡斯派是 1419—1434 年期间捷克人民反对德国封建主和天主教会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参加者。胡斯派运动的思想上的鼓舞者是捷克的伟大爱国者、学者和捷克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杨·胡斯(约 1369—1415),这个运动就是因他而得名。在这次战争期间,以农民和平民的部队为主力的胡斯派的军队,击退了由教皇和德国皇帝组织的五次反对捷克的十字军征讨。只是由于捷克的贵族和市民阶级分子同国外的封建反动势力实行叛变性的妥协,人民起义才遭到失败。胡斯派的运动对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 109 页。
- 94 塔波尔派(以运动中心塔波尔城而得名)是捷克胡斯派的民族解放运动

- 和宗教改革运动（见注 93）中的革命的、民主的一翼。塔波尔派的要求反映了农民群众和城市平民要消灭整个封建制度的意向。——第 109 页。
- 95 施马尔卡尔登联盟（以其缔结联盟地点普鲁士城市施马尔卡尔登而得名）是若干新教诸侯和许多帝国城市的联盟。产生于 1531 年初，其目的是要保卫宗教改革事业，反抗以皇帝查理五世为首的天主教诸侯。1546—1548 年，皇帝和联盟之间进行了战争，结果是查理五世胜利，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瓦解。1555 年新教徒才战胜了查理五世。——第 109 页。
- 96 1618—1648 年的三十年战争是第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它是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斗争而引起的。在捷克发生的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制度的压迫和天主教反动进攻的起义是这场战争的开端。后来，参战的欧洲各国形成了两个阵营。罗马教皇、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德意志的天主教诸侯联合在天主教旗帜下反对新教国家：捷克、丹麦、瑞典、荷兰共和国以及若干接受了宗教改革的德意志邦。新教各国受到法国国王——哈布斯堡王朝的敌人的支持。德国是这次斗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的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战争在第一阶段带有反抗欧洲封建专制反动势力的性质，但后来，特别是从 1635 年起变成了相互竞争的外国掠夺者对德意志的一系列的入侵。战争于 1648 年以签订使德国在政治上分散性更加巩固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而告终。——第 109 页。
- 97 三十年战争期间，勃兰登堡选帝侯乔治·威廉于 1631 年同瑞典结成联盟，但是作战很勉强。由于害怕波美拉尼亚会被自己的姻亲、领导新教国家联盟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夺去，乔治·威廉不久就拒绝援助他。1635 年，他背弃了瑞典，而同德国皇帝缔结了和约。——第 109 页。
- 98 1701—1714 年，为了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以法国、西班牙为一方，以英国、荷兰、奥地利、普鲁士及以德意志皇帝为首的其他若干德意志邦为另一方，进行了战争。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开始时是西

班牙王位的各种追求者之间的王朝战争,后来实际上变成了瓜分西班牙领土的战争,变成了法国和英国为争夺海上和殖民地的霸权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战争的结果是西班牙帝国部分地被瓜分了:它在尼德兰和意大利的领地割给了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直布罗陀和梅诺尔卡岛割给了英国等等。由于这场战争,法国的海上和殖民地势力被削弱了。法国在北美的领地也转到了英国的手里。英国在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中获利最大。——第 110 页。

- 99 普鲁士参加了北方战争,站在俄国一边,反对瑞典,1720 年同瑞典签订了和约。按照和约,普鲁士取得了瑞典波美拉尼亚的一部、波莫瑞湾中的乌泽多姆岛和沃林岛。

波兰(波兰贵族共和国)曾于 1772、1793、1795 年三次被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瓜分。俄国分得了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普鲁士和奥地利分得了波兰本土和乌克兰西部。

在 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上(这个会议确定了战胜拿破仑的各国对欧洲的瓜分),普鲁士取得了北萨克森、波兹南、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俄国取得了波兰王国,包括一部分以前算作普鲁士领地的波兰土地。——第 110 页。

- 100 英国人是在 1856 年 10 月挑起了同广州的中国当局的冲突。英国领事巴夏礼制造冲突的借口是:中国地方当局逮捕了中国走私船“亚罗号”的船员,而这艘船悬挂的是英国国旗。这次冲突发生后,英国驻华全权公使约翰·包令野蛮地下令炮轰广州,而事先并未警告。这就揭开了 1856—1858 年第二次对华鸦片战争的序幕。——第 112 页。

- 101 指 1843 年 10 月 8 日签订的英中条约。这个条约是 1842 年 8 月 29 日英中两国签订的南京条约的补充。不平等的掠夺性的南京条约是英国殖民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结束后强加于中国的。这次战争使落后的封建的中国开始变为半殖民地国家。条约规定开放厦门、宁波、广州、福州和上海等五个中国港口同英国通商。在这些港口,外国商人有无限的贸易权利、居住自由等等。条约还规定中国要付出巨额赔款,把香港永久割让给英国,并实行对英国人有利的新关税。按照 1843

年的善后补充条约,英国人又设法使中国做出了新的让步:在开放的通商港口设置特殊的侨民居住区(租界)的权利;治外法权,即外国侨民不受中国法庭审判;中国承认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即其他强国从中国方面获得的特权也自然为英国所享有。

这里指的是善后补充条约的第九款。按照这一条款的规定,同英国人有联系的中国人不受中国当局的审判(见本卷第149页)。——第112页。

- 102 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以后,英国人同中国政府的主要争执问题是英国商人要求给他们以在广州城内贸易和居住的权利,因为南京条约第二款没有明文规定把这种权利给予外国人。英国人的这种强求同下面这一情况也有联系,即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列强还无法在北京设置外交代表,以致一切对华外交事务都只有通过广州这一个城市来办理。由于中国居民反对让外国人进入广州城,这个问题曾几次被提出。1846年4月,英国同中国当局达成了协议,广州被宣布为对外国人开放的城市。但是由于当地居民的强烈抗议运动,此事未做最后决定。1847年,英国人使用威胁手段,迫使中国当局答应两年以后开放广州。但是当1849年香港总督文翰要求实现这一条件时,却由于害怕人民起义,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要求。——第115页。
- 103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一个美国过去的奴隶主威廉·沃克进行了一系列冒险远征活动,企图征服中美洲各国。1855,在尼加拉瓜共和国发生内乱的时期,沃克在混战一方支持下占领了共和国的主要城市——格拉纳达,不久即自封为尼加拉瓜总统,在那里进行独裁统治,并企图恢复奴隶占有制。沃克在对洪都拉斯进行冒险远征时被俘,于1860年被枪决。沃克是夺取尼加拉瓜政权的美国大财阀万德比尔特和摩尔根的工具。他们打算通过这个国家的领土开凿一条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联结起来的运河。——第116页。
- 104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是英国的自由派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从1846年至1930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117页。

- 105 第一次对华鸦片战争(1839—1842)的借口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对英国鸦片走私贸易采取了严禁措施。林则徐要求在广州的英国商人把鸦片存货交出,并下令将这批鸦片投入海中。英国人就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军事行动。——第117页。
- 106 马克思指的是1857年初,位于长江中游的中国最富饶的中原地区被太平军占领这一情况(见注72)。——第117页。
- 107 这里讲的是所谓纽沙特尔冲突(见注68)。——第118页。
- 108 1386年6月9日,瑞士人同奥地利公爵列奥波特三世的军队交战于森帕赫(琉森州)。结果瑞士军队战胜。
1315年11月15日,瑞士民军同列奥波特·哈布斯堡的军队会战于莫尔加顿,瑞士人战胜。
穆尔顿和格兰桑——见注90。——第118页。
- 109 1798年法国执政内阁的军队占领了瑞士,在此宣布成立完全依附于法国的海尔维第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根据1798年4月12日通过的宪法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加剧了已经发展资产阶级关系的进步各州同社会经济关系落后的所谓旧森林州的斗争。恩格斯所说旧森林州的三次起义,是指这些州在1798年4月、5月和8月反抗法军的行动。由于瑞士人在这几次起义中都遭到了失败,各旧州被迫投降并加入了海尔维第共和国。
在以吕内维尔和约(见注82)告终的法国对第二次反法同盟的战争(1798—1801)期间,瑞士成为主要战场之一。——第122页。
- 110 指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法国殖民者为了征服阿尔及利亚而在这个国家进行的殖民侵略战争。法军入侵阿尔及利亚引起了阿拉伯居民长期的顽强的反抗。法国人以极其残酷的手段进行战争。到1847年,阿尔及利亚基本上被占领了,但是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并未停止。——第124页。
- 111 提罗耳起义——提罗耳(奥地利西部)农民对法国军队进行的游击战争,爆发于1809年4月。由于没有得到奥地利军队的充分支持,起义

于 1810 年被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镇压下去。

西班牙游击战——见注 52。

巴斯克的卡洛斯派暴动——见注 49。

十九世纪二十年未开始的北高加索山区人反对沙皇俄国的战争，是由沙皇政府的殖民政策和当地封建主在沙皇政府支持下实行的压迫所引起的。山区人进行的基本上属于解放斗争性质的运动，同时也具有某些反动的性质。运动的首领一般都是穆里德派信徒。这是伊斯兰教的反动教派中最狂信和好战的一派。依靠伊斯兰教僧侣和利用山区人的不满，穆里德派信徒纠集了相当可观的反对沙皇军队的力量。三十年代中，他们在达格斯坦和彻岑建成了一个以沙米尔为首的宗教性的军事国家组织。土耳其和英国就企图利用沙米尔所领导的运动来达到它们的侵略目的——使高加索脱离俄国。同盘踞在山区城堡中的沙米尔斗争非常困难，这个斗争延续了几十年。在克里木战争结束的时候，俄国军队才陆续击败沙米尔的力量，于 1859 年 8 月拿下他们的最后退守地——古尼布堡垒。促使沙米尔失败的，是在穆里德派中形成了新的封建贵族，开始脱离沙米尔的农民受到了他们的压迫。——第 125 页。

112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的手稿加的。——第 127 页。

113 锡克教派是十六世纪旁遮普地区产生的宗教派别。锡克教徒关于人类平等的教义(旨在调和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成了从十七世纪末叶展开的农民反对印度封建主和阿富汗掠夺者的斗争的思想体系。后来，锡克教徒中分化出封建的上层，它的代表领导着这个在十九世纪初包括整个旁遮普和一系列邻近地区的锡克教徒国家。——第 127 页。

114 古利斯坦条约是 1813 年 10 月 24 日(俄历 12 日)签订的。这个条约结束了 1804—1813 年俄国和波斯战争。条约正式规定把下列各地区划入俄罗斯帝国：达格斯坦、格鲁吉亚连同舒拉格别省、依麦列梯亚、古里亚、明格列里亚和阿布哈兹，此外还有卡拉巴赫、干扎、舍金、希尔万、杰尔宾特、库宾、巴库等诸汗国以及塔雷什汗国的北部。俄国享有在里海保持舰队的特殊权利；条约还规定双方商人可以进行自由贸

- 易。——第 128 页。
- 115 土库曼彻条约是 1828 年 2 月 22 日(俄历 10 日)在土库曼彻村签订的。这个条约结束了波斯的沙赫为夺取外高加索的俄国土地而引起的 1826—1828 年的俄波战争。条约规定了俄国和波斯的新的国境线,基本上是以阿腊克斯河为界。埃里温汗国(跨阿腊克斯河两岸)和纳希切万汗国的领土划归俄国。规定俄国商船可以自由航行千里海和俄国有在里海拥有舰队的特殊权利。俄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以及同波斯贸易往来方面的一系列优惠条件。——第 128 页。
- 116 在波斯王位的继承人阿巴斯·米尔扎于 1833 年 10 月死去以后,他的儿子、已被任命为阿捷尔拜疆统治者的穆罕默德·米尔扎被宣布为他的继承者。在穆罕默德的年迈的祖父费特赫·阿里·沙赫于 1834 年 10 月死去以后,有好几个人出来争夺王位。英国公使坎伯尔想使新的沙赫依靠英国,于是供给穆罕默德从塔夫利兹向德黑兰进军所需的军费,帮助他登上王位。穆罕默德·沙赫的军队是由英国军官林赛指挥的。——第 128 页。
- 117 指 1838—1842 年英国人为了对阿富汗进行殖民奴役而发动的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1839 年 8 月喀布尔被占领,但是由于该地在 1841 年 11 月爆发了起义,英国人被迫于 1842 年 1 月开始向印度撤退,后来变为仓惶溃退。4500 名英国兵和 12000 名随军服务人员中只有一人逃到了印度边界。——第 132 页。
- 118 关于赫拉特,见注 74。——第 133 页。
- 119 指 1839 年 11 月奥连堡军事总督瓦·阿·彼罗夫斯基将军率领远征队进攻希瓦汗国一事。这支由五千人组成的、带有若干大炮和粮秣车队的远征队对于冬天穿越荒原的困难是没有准备的;人员由于大批患病而折损达半数,彼罗夫斯基未到希瓦即被迫返回奥连堡。——第 136 页。
- 120 英军和法军于 1854 年 11 月 5 日(俄历 10 月 24 日)在因克尔芒附近击败俄军。俄军的失利,原因在于指挥上的一系列错误:零散地使用兵力,

哥尔查科夫将军所部在战事正酣之际停止作战，总司令缅施科夫公爵领导不坚强。

西帕依——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法国、英国、葡萄牙殖民者在印度本地人中间招募的雇佣兵。英印军中的西帕依被英国人用来征服印度和维持在被征服地区建立起的政权。——第 138 页。

- 121 在马克思的 1857 年的笔记本中，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路易斯的预算”。这篇文章的草稿有两部分，马克思把其中一部分标作“乔·路易斯爵士的预算”，另一部分标作“直接税和间接税”。——第 140 页。
- 122 “爱丁堡评论”（《The Edinburgh Review》）是英国自由派的政治刊物，发行于 1802 年至 1929 年，在五十年代每三个月出版一次，该刊物有自由主义倾向。——第 140 页。
- 123 自由贸易派主张自由贸易和国家不干涉国内的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那里形成了所谓曼彻斯特学派，即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中的一派。领导自由贸易派运动的是 1838 年组织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以后加入了英国自由党。——第 141 页。
- 124 指克里木战争结束以后于 1856 年 3 月签订和约。——第 142 页。
- 125 联合内阁即阿伯丁内阁（1852—1855），参加该内阁的有辉格党人、皮尔派和急进派的代表，因此有人讽刺它，把它叫做“群贤内阁”。——第 143 页。
- 126 皮尔派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联合在罗·皮尔周围的一些温和的托利党人，他们支持皮尔在保持大土地占有者和大金融家的政治统治的前提下在经济方面向工商业资产阶级让步的政策。1846 年，皮尔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废除了谷物法，结果引起了托利党保护关税派的强烈不满并导致托利党的分裂和皮尔派的孤立。1850 年皮尔死后，皮尔派便成为一个没有明确纲领的政治集团。皮尔派参加了阿伯丁的联合内阁（1852—1855）。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皮尔派加入了自由

党。

1852年2月,皮尔派支持帕麦斯顿修改政府的民军法案,从而促使罗素勋爵政府的垮台。同年12月,他们反对得比的预算,迫使得比政府辞职。1855年2月,当激进派罗巴克恢复成立塞瓦斯托波尔陆军生活状况调查委员会,迫使阿伯丁倒阁以后,皮尔派便襄助帕麦斯顿上台执政,并表示同意加入他的内阁。但是不久以后,皮尔派的领袖们——格莱斯顿、悉尼·赫伯特和詹姆斯·格莱安(他们已经是内阁的阁员),对于帕麦斯顿未能阻挠罗巴克的委员会的成立感到不满,便提出辞呈,这时帕麦斯顿就立即撤换了他们,并任用了辉格党的代表。——第145页。

- 127 习艺所是英国于十八世纪开办的;根据1834年通过的新的“济贫法”,习艺所就变成了济贫的唯一形式;习艺所具有苦役监狱式的特点,人民给它起了一个绰号叫做“穷人的巴士底狱”。——第147页。
- 128 马克思把英国人于1856年10月对广州的轰击称为广州屠杀(见注100)。——第149页。
- 129 “中华之友”(《The Friend of China》)是1842—1859年在维多利亚(香港)出版的英国官方报纸“大陆上中华之友”(《The Overland Friend of China》)的简称。——第150页。
- 130 “最大多数人们的最大利益”或“最大多数人们的最大幸福”,是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功利主义理论家边沁在其一系列著作中所阐述的主要原理。功利主义(主张“利益”或“效益”是唯一道德基础的学说)的纯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伦理学,力图证明在被矛盾弄得四分五裂的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中,有可能达到普遍的“幸福”与“和谐”。——第150页。
- 131 和平协会是教友会派于1816年在伦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协会得到自由贸易派的积极支持。自由贸易派认为,在和平条件下,英国通过自由贸易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自己在工业上的优势进而达到经济上政治上的统治。——第150页。

132 指英国第二次选举改革，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了为争取第二次选举改革的议会斗争。——第 153 页。

133 马克思是指英军于 1855 年 6 月 18 日（俄历 6 日）和 9 月 8 日（俄历 8 月 27 日）两次突袭塞瓦斯托波尔工事的第三号棱堡（即所谓大凸角堡）未成而言。马克思暗指下面这一事实：在突袭凸角堡的时候，英国军队对自己的最高指挥失去了信心，害怕俄军的霰弹火力，所以有很多次不是在进攻中不肯前进，就是临阵逃脱。

1855 年 11 月，曾参与固守土耳其卡尔斯要塞并负责领导其防务的英军，在经过长久围困以后，把它拱手交给了穆拉维约夫将军指挥下的俄军。——第 155 页。

134 马克思指的是 1855 年底英国和美国因在中美洲互相竞争而发生的冲突。冲突的起因之一，是英国企图在对克里木战争保守中立的美国招募志愿兵补充自己的军队。两国的关系还在更早的时候就由于对克雷顿 - 布尔韦尔条约的解释发生分歧而紧张起来了。克雷顿 - 布尔韦尔条约是英美两国在 1850 年为了确定对原拟在尼加拉瓜境内开凿的连结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运河的管理办法而签订的。1855 年，美国政府为了对付英国想在中美洲莫斯科托海岸扎根立足的企图，而对同年 5 月拿下尼加拉瓜并自封为该共和国总统的美国冒险家威廉·沃克给以支持。英国方面提出了强硬抗议，美国以威胁断绝外交关系作为回答。然而这个冲突在 1856 年 10 月以这样一种方式解决了：即美国政府对沃克的冒险活动给以事后的谴责，而英国政府由于考虑到英国资产阶级同美国的密切经济联系，放弃对莫斯科托海岸的领土要求。

远征那不勒斯——见注 68。

和波拿巴的表面争吵——马克思说的是 1856 年巴黎会议以后英国和法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分歧。英法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是这一时期法国同俄国有所接近。但是英法的分歧性质并不严重，也不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因为英国政府正忙于镇压 1857 年爆发的印度民族解放起义。

对波斯的侵犯——见注 74。

在中国的大屠杀——马克思说的是 1856 年 10 月英军炮轰广州的

暴行（见注 100）。——第 155 页。

- 135 老贝利是伦敦新门监狱的中心堡的名称。中央刑事法庭设于此处。——第 155、481 页。
- 136 邦迪埃拉兄弟是意大利人，是奥地利军队中的军官和争取意大利摆脱奥地利压迫的斗士。他们在 1844 年 6 月前往卡拉利里亚发动反对那不勒斯波旁家族和奥地利统治的起义，但是由于被人出卖而被处死。詹姆斯·格莱安此时正任英国内务大臣，他有命令给英国邮政主管机关：把意大利流亡革命者的信件交由警察机关拆阅，以便将其内容转告奥地利政府。英国广大民主阶层对此行为深感愤怒，认为邦迪埃拉兄弟就是因此牺牲的，因为这两个人是“青年意大利”社的成员，同流亡在英国的马志尼保持着联系。——第 157 页。
- 137 在马克思 1857 年的笔记本里，本文的标题是“帕麦斯顿和普选”。——第 161 页。
- 138 “尸首贩子”是对在英国偷掘死尸售与解剖所的人的称呼。在这种做法特别流行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爱丁堡市人威廉·伯克一案是非常出名的。伯克为了出售死尸，想出了一个办法把人憋死而不露任何犯罪的痕迹。——第 161 页。
- 139 唐宁街是伦敦中心的一条街，英国首相和其他某些内阁大臣的官邸所在地；英国政府的同义语。——第 162 页。
- 140 “笨拙”（《Punch》）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的简称，1841 年起在伦敦出版。
- 大科夫塔是在十八世纪以招摇撞骗出名的卡利奥斯特罗伯爵（朱泽培·巴尔扎莫）臆造出来的一个埃及祭司的名字。卡利奥斯特罗说这个埃及祭司是一个什么共济会“埃及分会”的首领，而他则是该行会的创建者和活动家。他对人说，当他在埃及旅行的时候，发现了埃及人智慧的秘密，并且他在自己的行动中以他身上所体现的全能全知的大科夫塔的精神作为准绳。——第 163 页。

- 141 蓝皮书 (Blue Books) 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这里所说的蓝皮书,标题为“关于在中国发生的侮辱事件的函件。1857年奉女王陛下之命提交下院”,1857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Insults in China Presented to the House of Commons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1857》· [London] 1857)。——第163页。
- 142 1851年11月4日,路易·波拿巴以一项咨文提交国民议会,咨文中提出了在国内恢复普选权的蛊惑性要求。在国民议会否决了波拿巴内阁为此而提出的法律草案以后,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实行了政变。——第165页。
- 143 1817年,利物浦领导的托利政府(卡斯尔里任外交大臣,西德默任内务大臣,帕麦斯顿任掌管军事财政的军务大臣(不在内阁大臣之列))为了制止争取选举改革和反对谷物法的群众性民主运动,停止实行人身保护法,并慌忙地实行了所谓“禁口法”(Gagging act)。按照此项法律,集会权受到限制,激进派的俱乐部被封闭,市政府官员有权禁止激进主义的小册子出版和流传。

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 Act)是1679年由英国议会通过的。按照此项法律,每一逮捕令必须有理由,被捕者应该在短期(三天至二十天)内由法庭审讯,否则应该予以释放。人身保护法不适用于叛国罪案件,而且根据议会的决定可以暂时停止生效。

曼彻斯特大屠杀——马克思说的是1819年8月16日英国军队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大会参加者实行的血腥镇压。这次争取选举改革和反对谷物法的群众大会是在曼彻斯特附近圣彼得广场举行的。当时的人们仿照滑铁卢会战的叫法,把这一事件叫做彼得卢大惨案。

英国在1815年实行的谷物法对谷物规定了高额的进口税,而且在国内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的情况下禁止谷物入口。谷物法非常严重地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对于工业资产阶级也是不利的,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缩小国内市场的容量,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经过大地主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长期斗争而于1846年废除。——第

- 165 页。
- 144 指太平军起义（见注 72）。——第 167 页。
- 145 马克思指的是路易·波拿巴在准备和实行 1851 年政变时期所采用的蛊惑手段（参看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六、七两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91—227 页）。——第 169 页。
- 146 指英国议会于 1832 年 6 月实行的选举法改革。这次改革是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并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议会打开通路。争取改革的斗争的主要力量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被自由资产阶级所欺骗，没有获得选举权。——第 169 页。
- 147 正统派是法国于 1792 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关系的拥护者。在 1830 年，该王朝第二次颠覆以后，正统派就结成了政党。
- 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拥护在 1830 年七月革命到 1848 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的幼系，奥尔良公爵。在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1），他们与正统派联合起来，组成所谓秩序党。——第 170 页。
- 148 马克思摘引的是伦敦“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上的一篇文章。——第 171 页。
- 149 暗指关于安泰的神话。——第 171 页。
- 150 指罗素参加了根据奥地利的倡议于 1854 年 12 月在维也纳召开的、有俄国、奥地利、法国、英国、土耳其代表参加的会议。1855 年 3 月，会议变成了国际性的代表会议，它一直开到 1855 年 6 月。维也纳代表会议的目的，就是制定一项准备据以开始克里木战争参战国之间的和平谈判的协定。罗素曾打算促使奥地利赋予他那关于限制俄国黑海海军的提议以最后通牒的形式，但未得伦敦内阁的赞同。俄国拒绝了西方各国的这项要求，因此谈判遭到失败。结果罗素只好退职，帕麦斯顿从而实现了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破坏他的对手的威信。——第 172 页。

- 151 宣誓法 (Test Act) 公布于 1673 年, 它要求一切公职人员承认英国国教会的信条。它于 1828 年废除。

市镇机关法 (Corporation Act) 是于 1661 年通过的, 它要求担任各选职 (主要指市政机关中的选职) 的人承认英国国教会的信条。它于 1828 年废除。

议会改革法案——见注 146。

苏格兰市政法 (1833 年) 和英格兰市政改革法 (1835 年) 给各大城市 (除伦敦以外) 规定了城市自治的统一系统。市政机关在苏格兰是由年收入不少于十英镑的房主选举的, 在英格兰是由全体纳税人选举的。由于这些法律, 辉格党的资产阶级在许多大城市中获得了政权。

教会什一税是爱尔兰当地信奉天主教的居民从十六世纪起被迫向英国国教会缴纳的税, 它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 由 1838 年的法律予以废除。但是这种“废除”只涉及到它的征收形式: 取消实物租以后, 教会靠增加爱尔兰农民的租金, 继续以特殊的货币租的形式得到收入。

非国教徒是在某种程度上不遵奉国教教会信条的英国各宗教教派的教徒。允许非国教徒在他们自己的教会里举行结婚仪式的非国教徒法案, 是由罗素于 1834 年提交下院的。——第 172 页。

- 152 印花税 (stamp duty) 和广告税 (advertisement duty) 是英国于 1712 年施行的对报刊征收的两种捐税, 其目的是增加国家收入并与反对派的刊物进行斗争。印花税和广告税使报刊价格极为昂贵, 限制报刊的销路, 使它们不能与广大群众见面。这些捐税逐渐增加, 以致成为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的主要障碍, 议会在他们的压力下只好在 1836 年降低印花税, 而在 1855 年予以废除。广告税是在 1853 年废除的。对于少数高价刊物说来, 废除这些捐税是不利的, 因为这些捐税的废除引起大量廉价刊物的出现, 这就造成了与旧报刊的竞争并且减少了它们的收入。——第 173 页。

- 153 反谷物法同盟是曼彻斯特的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 1838 年创立的。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 废除谷物法 (见注 143), 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工资, 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

- 的、有着自己政治见解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在谷物法问题上的斗争，由于 1846 年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的通过而告结束。——第 173 页。
- 154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附加了这样一段话：“为了同中国保持基督教和贸易的联系，最好是我们避免参与这一冲突，使中国人不致觉得所有西方国家都暗中串通起来侵害他们。”——第 178 页。
- 155 “佩斯劳埃德氏报”（《Pester Lloyd》）是匈牙利的自由派的报纸，匈牙利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1853 年 1944 年在布达佩斯用德文每天出版两次。——第 179 页。
- 156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772 年至 1937 年在伦敦出版，在十九世纪中叶是纠集在帕麦斯顿周围的辉格党右翼分子的机关报。——第 181 页。
- 157 马克思在阐述曼彻斯特选举结果这个问题时，利用了恩格斯在 1857 年 3 月 11 日、20 日、特别是 31 日的信件。——第 181 页。
- 158 1857 年 3 月 18 日科布顿在曼彻斯特的选民大会上坚持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尖锐地批评了帕麦斯顿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特别是他对中国和波斯的侵略政策。同时，科布顿对鲍勃·娄以及其他受到政府支持的议会候选人作了否定的评价。——第 182 页。
- 159 马克思暗指伊索寓言“乌鸦和狐狸”。——第 182 页。
- 160 约翰·福斯泰夫是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和“亨利四世”中的人物，是吹牛、贪吃、酗酒、淫荡的典型。——第 183 页。
- 161 廉价报刊的议会教父们是马克思对那些在议会内外积极参加争取取消印花税和广告税（见注 152）的宣传的曼彻斯特资产阶级激进派（包括布莱特）的称呼。——第 184 页。
- 162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国资产阶级报纸，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后来是自由党的机关报，1821 年在曼彻斯特创办。——第 184 页。

- 163 布莱特作为英国自由贸易论者的领袖,反对英国参加克里木战争。自由贸易论者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一样,认为英国不必采用战争手段,只要通过自由贸易就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工业优势取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霸权。——第 184 页。
- 164 长期议会的余党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形成的独立党的拥护者,新教教會的信徒。1648 年底长老会信徒被赶出下院以后,他们仍留在下院中,但是已经没有任何实权了。1653 年 4 月 20 日,克伦威尔驱散了长期议会的余党。——第 184 页。
- 165 真正英国大臣是罗素勋爵在 1850 年 6 月 25 日下院会议上对帕麦斯顿的称呼。帕麦斯顿在这次会议上在发言中引用了一句很傲慢的话:《*civis romanus sum*》(“我是罗马公民”),受到了英国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帕麦斯顿认为派英国海军去希腊保护一个原籍葡萄牙的英国臣民——商人唐·帕西菲科(他的住宅在雅典被焚毁)是正当的。帕麦斯顿宣称,正如罗马公民的公式《*civis romanus sum*》保证了古罗马公民的威信和尊严一样,英国国籍也应当保证任何一个地方的英国臣民安全无恙。——第 185 页。
- 166 恩格斯指的是 1839—1842 年的第一次对华鸦片战争(见注 101)。英国军舰于 1839 年 9 月就来到广州,但是在 1840 年 6 月英国舰队开到中国之前,军事行动只是一些个别的规模接触。——第 186 页。
- 167 指 1842 年的南京条约(见注 101)。——第 190 页。
- 168 这里讲的是中国的太平军起义(见注 72)。1851 年太平军建立的“太平天国”的元首是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他被太平军立为“天王”。1853 年 3 月,太平军攻克南京,即以南京作为天国首都。——第 191 页。
- 169 “新闻报”(《The Press》)是英国的一家周报,托利党机关报,1853 年至 1866 年在伦敦出版。——第 192 页。
- 170 “观察家”(《The Examiner》)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1808 年至 1881 年在伦敦出版。——第 192 页。

- 171 群贤内阁——见注 125。——第 193 页。
- 172 指克里木战争中的事件。1854 年 4 月,英法航空中队轰炸了敖德萨,但是这种军事行动更多地带有示威性质,城市很少受到损害。当时执政的皮尔派受到议会反对派和英国报纸的严厉批评,被指责在作战时优柔寡断。——第 195 页。
- 173 “太阳报”(《The Sun》)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从 1798 年至 1876 年在伦敦出版。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 年在伦敦创刊,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激进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 195 页。
- 174 关于罗素在维也纳的外交使命——见注 150。——第 195 页。
- 175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做的截至 1856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报告”1857 年伦敦版(《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6》·London, 1857)。——第 197 页。
- 176 正义法院——见注 61。——第 197 页。
- 177 1856 年 10 月英国人炮轰广州(见注 100),英国海军一共只损失三人。——第 198 页。
- 178 马克思引证的是 1852 年 11 月奈斯密斯工程师写给工厂视察员莱·霍纳的信,这封信曾发表在:《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6》·London, 1857。——第 205 页。
- 179 禁止在棉纺织厂、毛纺织厂、亚麻纺织厂和丝织厂雇用 9 岁以下童工的法律,由议会于 1833 年通过。——第 208 页。
- 180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 1857 年的笔记本加的。——第 209 页。

- 181 “无俸法官”（《Great Unpaid》）是英国对担任调解法官之职，官衔虽高但不领一文薪俸的人的谑称。——第 213 页。
- 182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 1857 年的笔记本加的。——第 218 页。
- 183 在马克思 1857 年的笔记本里，本文的标题是“中国—波斯（之战）”。——第 228 页。
- 184 这里讲的是 1856—1857 年英国对波斯的战争（见注 74）和 1856—1858 年的第二次对华鸦片战争。这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是英国代表同广州中国当局发生冲突（见注 100）。在中国的战争断断续续地进行到 1858 年 6 月，以掠夺性的天津条约告终。——第 228 页。
- 185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是尼古拉一世借口支持信奉基督教的希腊人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民族运动而挑起的。由欧洲教官进行过部分改编的、武器精良的土耳其军队，起初对集中在多瑙河地区（锡利斯特里亚、苏姆拉、瓦尔那等地附近）的未受充分训练的俄国军队进行了有力的抗击。但是，1829 年 6 月 11 日（俄历 5 月 30 日）的胜利进攻把土耳其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土耳其同意了俄国提出的全部条件，签订了阿德里安堡和约。——第 228 页。
- 186 路·爱·诺兰“骑兵之历史与战术”（L. E. Nolan. 《Cavalry ;its History and Tactics》）。该书在 1851 年出第一版。——第 229 页。
- 187 1806—1812 年俄土战争的导火线是法国利用土耳其违反过去俄土条约的某些条款而挑起的俄土冲突。在几年之中交战双方各有胜败。1811 年米·伊·库图佐夫被任命为多瑙河军团总司令。在此以后，战局发生了对俄国有利的变化。俄土两国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第 229 页。
- 188 阿尔纳乌特人是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叫法。——第 230 页。
- 189 1853 年 11 月 4 日（俄历 10 月 23 日），俄军由于丹年别尔格将军指挥无方，在沃耳特尼察（多瑙河左岸的一个村庄）为土耳其人战败。
1854 年 1 月 6 日（俄历 1853 年 12 月 25 日）在切塔特村的一场血

战中，俄军把土军赶至卡拉法特，而自己也蒙受了很大损失。

在长久围困土耳其要塞卡尔斯的时期（1855年6—11月），俄军于9月29日（俄历17日）对要塞进行了突袭。这次突袭由于围攻者力量不足以及被围者事先得知准备突袭的消息，结果没有成功。要塞的守军到11月24日（俄历12日）才向俄军投降。

1855年11月6日（俄历10月25日），俄军在印古耳河一战中遇到了优势的土耳其军队，遭受了巨大损失，撤出了明格列里亚。——第230页。

- 190 土耳其称苏丹治下原信基督教后改信伊斯兰教的臣民为“背教者”。——第230页。
- 191 指太平军起义（见注72）。——第233页。
- 192 Polacos（波拉科斯派）是从1850年至1854年在西班牙当政的一个政治集团。波拉科斯派所借以维系的，与其说是政治信仰，倒不如说是亲属关系。波拉科斯派这个名称也用于1854—1856年西班牙革命以前同政府首脑萨尔托里乌斯在一起的那一班人。——第235页。
- 193 指法国立法团1857年5月28日通过的法令。——第241页。
- 194 Bureaux（委员会）是为了对问题进行初步讨论而由法国立法团的主席从立法团代表中组成的。通常有几个委员会，其成员定期地更换。——第243页。
- 195 指1856—1857年的英国—波斯战争（见注74）。——第249页。
- 196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1857年的笔记本加的。——第251页。
- 197 1843年英国殖民者占领了印度西北部同阿富汗接壤的信德省。在英国阿富汗战争（1838—1842）时期（见注117），东印度公司用威胁和暴力的手段使信德的封建统治者同意英国军队通过他们的领地。英国人利用这个机会，于1843年要求当地封建主自认是东印度公司的藩属，并在摧残了起义的俾路支各部族（信德的土著居民）后宣布整个信德地区并入英属印度。

旁遮普（印度西北部）是经过英国人同锡克教徒的战争（1845—1846年、1848—1849年）而被征服的。1845年，英国殖民者利用锡克贵族叛变分子挑起了同锡克教徒的冲突，于1846年使锡克国变成了自己的藩属。1848年锡克教徒举行起义，可是于1849年被完全征服。旁遮普被占领后，整个印度就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第251页。

- 198 1856年，英国驻印当局不顾签订过的条约，宣布废黜奥德（印度北部的一个公国）的土著执政者，而将其领土并入东印度公司直接管辖地区之内（见本卷第502—507页）。——第251页。
- 199 这里讲的是1857—1859年的起义，即印度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英国统治而举行的一次最大的起义。在起义以前已经发生过一连串武装反抗英国殖民者的事件，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印度所有各阶层居民普遍痛恨残酷的殖民剥削方法：赋税高到难以置信的程度，以致印度农民被掠夺一光，某些封建领主阶层被剥夺了领地，对尚保持独立的印度地区实行吞并政策；在收税时使用刑罚，殖民当局采取恐怖手段；殖民者粗暴地破坏自古以来的传统的风俗。起义是1857年春季在隶属孟加拉军、驻扎在印度北部的所谓西帕依部队（见注120）中爆发的（从1856年年中起就已开始准备）。孟加拉军的西帕依部队掌握着这一地区的最重要的战略据点，掌握着大部分的大炮，于是成了起义的军事核心。主要是从印度教徒高级种姓（婆罗门、拉吉普特人等等）和伊斯兰教徒中募集来的西帕依军队，总的说来反映着西帕依士兵的父老兄弟——印度农民的不满，同时也反映着印度北部（特别是奥德）同西帕依军官们有密切关系的某些封建贵族的不满。这次以推翻外国统治为目的的人民起义规模巨大，席卷印度北部、中部的最大地区，其中主要的有德里、勒克瑙、康波尔、罗希尔汉、中印度和班得尔汗。起义的主要动力是农民和城市贫穷手工业者；但是领导权却掌握在封建主的手里。这些封建主绝大多数在1858年殖民当局保证绝不侵犯他们的领地以后出卖了起义。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起义者缺乏统一的领导和共同的行动计划，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印度的封建割据局面、居民种族复杂以及印度人的宗教和种姓界限所造成的。英国人在同起义斗争时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点，大多数印度封建主教积极地帮助他们镇压起义。此

外，英国人在军事技术上占有相当的优势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尽管 1857—1859 年的印度起义没有直接触及这个国家的某些地区（英国人设法使旁遮普、孟加拉和印度南部没有发生起义），但它震撼了全印度，迫使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行政制度上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印度起义同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密切关系，它削弱了英国殖民者在那里的阵地，就中把他们对阿富汗、波斯以及其他许多亚洲国家的侵略计划推迟了几十年。——第 252 页。

- 200 莫卧儿是十六世纪初从中亚细亚东部侵入印度的突厥侵略者，1526 年他们在印度北部建立大莫卧儿帝国。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自称赫蒂沙赫，大莫卧儿是欧洲人给他们的称号。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莫卧儿帝国的创始人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侵略者的直系后裔，这就是“莫卧儿”一词的由来（《Моrоlлa》与《MoHлoллa》〔蒙古人〕谐音。——译者注），这个名称成了对印度北部伊斯兰教徒的习惯叫法。莫卧儿帝国的势力扩展得很大，在十七世纪中叶征服了印度大部分和阿富汗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农民起义和印度各民族对伊斯兰教侵略者的反抗的加强，以及他们经常的内讧和封建割据趋势的日益加强，大莫卧儿帝国便衰落下去，到十八世纪的上半世纪实际上已完全瓦解。

这里指的是亚格伯二世的儿子大莫卧儿巴哈杜尔 - 沙赫二世。——第 253 页。

- 201 指的是威廉堡。这是加尔各答的一个英国城堡，建于 1696 年，为纪念当时英国国王奥伦治的威廉三世而命名。英国人在 1757 年征服孟加拉以后，把政府机关设在这个城堡里，城堡的名字被用来指“孟加拉管区政府”，后来就指“印度英政府”。——第 253 页。
- 202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 1857 年的笔记本加的。——第 255 页。
- 203 马克思提到不久前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风潮时，指的是 1856 年西班牙的革命（见本卷第 41—53 页）和 1857 年意大利发生的反对奥地利压迫和某些意大利公国的封建君主制政府的革命浪潮。——第 258 页。
- 204 拉吉普特人是印度的高级种姓之一，也是印度的一个民族，主要居住在拉吉普坦纳（现名腊贾斯坦）。孟加拉管区也有很多拉吉普特人，主要

居住在比哈尔。拉吉普特人被认为是属于刹帝利武士等级的。在莫卧儿帝国,拉吉普特人作为军人很受重视,因为他们具有民族团结性,而在雇佣的莫卧儿军队中通常是缺乏这种团结性的。从阶级方面看,他们一般都属于“殷实”农民这一中间阶层。英国人很乐意接受拉吉普特人加入孟加拉军的西帕依部队。

婆罗门在古印度被认为是僧侣等级。从种姓制度形成的时候起,婆罗门就在种姓等级中占据最高地位,是印度四个最古老的种姓之一;后来,像其他印度种姓一样,除僧侣之外,还包括各种不同职业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连沦为贫民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也包括在内。

孟加拉的西帕依军队(与孟买和马德拉斯的西帕依军队不同)招募的主要是属于高级种姓的印度教徒,所以在孟加拉军中有很多婆罗门和拉吉普特人。——第 260 页。

- 205 驻扎官官邸是英籍驻扎官(印度公国的政治顾问)的驻在地,此处专指奥德驻扎官的驻在地。——第 261 页。
- 206 指 1808—1814 年西班牙人民反抗法国占领的独立战争。——第 261 页。
- 207 马克思大概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即英国下院议员在议会夏季会议期间,常不履行其议员职责,而去作各种消遣和料理私事。因此演说者时常不得不在几乎空洞的会场上发表演说。——第 263 页。
- 208 指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Considé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des Romains et de leur décadence*》),爱·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亡史”(E·Gibbon·《*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前者第一版作者匿名,于 1734 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后者第一版于 1776—1788 年在伦敦出版。——第 264 页。
- 209 指托利党,即英国大土地贵族和大金融贵族的党。托利党于十七世纪成立后,一贯是反动的对内政策的捍卫者,坚决维护英国国家制度中的保守和腐败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它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它的议会垄断权。托利党的议会垄断

权所受到的第一次打击是 1832 年的改革,这次改革让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 年由于废除对土地所有者有利的谷物法,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党内的分裂。五十年代中叶托利党党内在其阶级成分方面发生了分化和改变的过程(这反映了土地贵族与资本巨头结合的过程),因此,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第 264 页。

- 210 1773 年以前,东印度公司在其印度的领地内有三个省督,分别驻在加尔各答(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每一省督下面设一由公司职位较高的职员组成的参事会。按照 1773 年“改进东印度公司行政管理法令”,加尔各答省督(已称为孟加拉总督)下面设立由四人组成的参事会。总督和参事会的参事已经不是由公司任命,而通常是由英国政府指名委任,任期五年;任期届满以前只能按公司参事会提名由国王免职。参事会内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如果其参事的票数各半,则总督的一票具有决定意义。总督应该对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实行民政和军事管理,同时对现在归他管的马德拉斯省和孟买省,在有关进行战争和签订和约问题上享有最高监督权。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后几省才能独立行事。按照 1784 年法案,孟加拉参事会的参事减至三人,其中包括总司令。根据 1786 年的补充法案,总督获得在特殊情况下行动不受参事会限制的权利以及担任总司令职务的权利。按照 1833 年的法案,孟加拉总督成为印度总督,同时仍然是孟加拉省督;其下所设参事会的成员重新增至四人,同时可把总司令加进去作为参事会的第五个成员。总督及其参事会获得对整个不列颠治下的印度颁布法律的权利。孟买和马德拉斯政府则失去这一权利;其省督下面的参事会应由两人组成。按 1853 年法案,除了组成具有执行机关职能的所谓小参事会的四个参事之外,规定设立具有立法职能的扩大参事会,其中应包括总督、总司令、孟加拉主审法官和最高法院中的一名法官。印度总督下设参事会的这一情况一直保持到 1858 年。——第 265 页。
- 211 札吉达尔是大莫卧儿帝国的伊斯兰教封建贵族的代表。他们曾得到暂时使用的大片领地(札吉),因此,他们必须服兵役和提供一定名额的军队。札吉达尔为自己的利益从居住在其札吉上的农民身上征收土地

税,并利用他们的徭役劳动。在大莫卧儿帝国瓦解时期,札吉达尔变成了世袭的封建领主。

伊纳达尔是特殊封建赏赐(伊纳)的所有者。伊纳主要分给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神职人员以及宗教和慈善机关。在印度南部,村社的上层代表人物有时也获得伊纳。伊纳完全或部分地免纳税赋,并且可以世袭。在英国人统治时期,伊纳达尔是指免纳土地税的土地所有者。

自由农是英国小土地所有者的一种,这个名称起源于中世纪的“自由所有者”。自由农向贵族缴纳少量固定的货币地租,并且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第 266 页。

- 212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 1857 年的笔记本加的。——第 269 页。
- 213 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是根据 1784 年的“改进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在印度领地的行政管理”法令成立的。督察委员会由国王委派枢密院的六个委员组成。督察委员会主席由内阁大臣担任,实质上他是印度事务大臣和印度的最高统治者。督察委员会设在伦敦,它的决议通过由东印度公司三个董事组成的秘密委员会传达到印度。因此,由于 1784 年的法令,设立了一套通过督察委员会(英国政府)和董事会(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的双重性制度。督察委员会于 1858 年撤销。——第 269 页。
- 214 锡克教徒——见注 113。——第 270 页。
- 215 1854 年 10 月初,巴黎谣传联军攻下了塞瓦斯托波尔。这个谣言上了法国、英国、比利时、德国的官方报刊。可是过了几天以后,法国报纸就不得不进行辟谣。——第 273 页。
- 216 “孟买时报”(《The Bombay Times》)是孟买出版的英文日报,1838 年创刊。——第 273 页。
- 217 “国家报”(《Le Pays》)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49 年于巴黎创办。在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 年)是拿破仑第三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该报有一个小标题“帝国报”(《Journal de l'Empire》)。——第 275 页。

- 218 见注 69。——第 277 页。
- 219 1848—1850 年，在德意志广大社会阶层普遍要求统一的影响下，甚至反动的普鲁士内阁也采取了某些改组软弱无力的德意志联邦的措施，企图在同奥地利争夺对德意志各邦的领导权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尼古拉一世不顾看到普鲁士战胜奥地利而强大起来，于 1850 年 10 月把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堡大公和普鲁士首相勃兰登堡伯爵邀到华沙。在这次称作华沙会议的会晤中（参加会晤的还有普鲁士国王威廉以及奥地利国王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尼古拉一世坦率地表明，他最坚决地支持奥地利反对普鲁士。——第 278 页。
- 220 “多瑙河之星”（《L'Étoile du Danube》）是罗马尼亚自由派纸，1856 年至 1857 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第 279 页。
- 221 指 1857 年 8 月 20 日的下院的会议。——第 287 页。
- 222 多瑙河地区的纠纷——见注 69。——第 289 页。
- 223 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这两个德意志公国百年以来是在丹麦国王统治之下的。1852 年 5 月 8 日，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瑞典诸国，同丹麦的代表共同签订的有关丹麦君主国完整的伦敦议定书，承认这两个公国有自治权，但仍处于丹麦国王的最高统治之下。可是，丹麦政府不顾伦敦议定书，于 1855 年颁布了宪法，宪法取消了在丹麦治下的这两个德意志公国的独立和自治。为此，德意志国会于 1857 年 2 月发表公告，抗议在这两个公国里实行丹麦宪法，但公告上却误写为霍尔施坦和劳恩堡（另一个在丹麦统治下的德意志公国），而没有提什列斯维希。丹麦政府利用这一点，准备把什列斯维希并入自己的领土。结果不仅招致了不愿同霍尔施坦人分离的什列斯维希人的抗议，而且也引起了普鲁士、奥地利和英国的抗议，它们认为丹麦的行动破坏了伦敦议定书。——第 290 页。
- 224 文中所讲的不确切。1852 年 5 月 8 日签订的伦敦议定书，承认格留克斯堡的克里斯提安（后来的国王克里斯提安九世）为无子女的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者。——第 290 页。

- 225 “印度刑罚的调查”一文在马克思 1857 年的笔记本上注明是他在 8 月 28 日写成的,但不知为何原因,“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却把它发表在编辑部在本文中谈到的马克思写于 9 月 4 日的“印度起义”(见本卷第 308—312 页)一文之后。——第 291 页。
- 226 “东印度(刑罚)”1855—1857 年伦敦版(《East India (torture)》·London, 1855—1857)。——第 291 页。
- 227 “马德拉斯用刑事实调查委员会的报告”,1855 年伦敦版(《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Alleged Cases of Torture at Madras》·London, 1855)。——第 291 页。
- 228 收税官是英国在印度的官员。他握有无限权力,一身兼任地方总收税官、行政长官和首席法官之职。作为收税官, he 可以把欠税者送交法庭;作为法官, he 可以对欠税者作出判决;作为行政当局的代表, he 可以执行判决。——第 291 页。
- 229 莱特即印度农民;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实行新的土地税收法以前,在英国殖民者没有破坏印度村社以前,是享有充分权利的村社农民。在从 1793 年起实行所谓柴明达尔制的地区(最初在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实行,后来以稍有改变的形式在联合省和中央省以及马德拉斯省部分地区实行),莱特成了柴明达尔(地主)的佃农。在十九世纪初孟买和马德拉斯两管区实行“莱特瓦尔”土地税收制后,莱特成为国有土地的持有者,而按印度的英国政府随意规定的数额缴纳地租税。根据“莱特瓦尔”制,莱特同时被宣布为他们所租佃的土地的所有者。由于实行这一在法律上自相矛盾的土地税收制,为农民规定了高得无力缴纳的地税;由于欠税日增,农民的土地逐渐转到包买商和高利贷者手里。——第 292、308、590 页。
- 230 阿格拉曼特——摩尔国皇帝,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一个人物。阿格拉曼特在同查理大帝打仗时围困了巴黎,把自己的一大部分人马集结在巴黎城下。但是不久在围城的军营内就发生了争执与纠纷,这成了表示内讧的典故。马克思把德里的英国军营同阿格拉曼特的军营相比,就是指这一步而言。——第 298 页。

- 231 “乡下佬”(《The Mofussilite》)是自由派的日报。从1845年起在印度用英文出版,最初在米拉特,后来在阿格拉和安巴拉发行。——第301页。
- 232 指1853年关于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法律。根据该法律,公司在印度的垄断权受到某些削减。在印度公司的统治权越来越多地被划归英国国王。公司董事们被剥夺了任命官员的权利,董事人数由24人减到18人,其中6人由国王任命;督察委员会主席(见注213)时的地位与印度事务大臣的地位相当。然而公司的股东却可以靠印度的捐税取得固定的红利。——第304页。
- 233 关于孟买和马德拉斯参事会,见注210。——第306页。
- 234 也许指的是1852年的英緬战争,由于这次战争,緬甸的勃固省被并入东印度公司的领地。——第307页。
- 235 在万第(法国西部一省份),法国保皇党人利用落后的农民,于1793年发动了反革命变乱。这次变乱为共和国军队平息。共和国军的士兵被称为“蓝制服”(一般对于所有的国民公会拥护者也都是这样称呼)。

西班牙游击队——见注52。

拉亚契奇和耶拉契奇的军队中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参加过对匈牙利和奥地利的革命运动的镇压。资产阶级化的匈牙利贵族拒绝了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民族独立要求,结果使得奥地利反动势力能够为了本身的利益利用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部队来镇压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的起义。

别动队是根据法国临时政府1848年2月25日命令,为对付具有革命情绪的人民群众而成立的。这支主要由流氓无产者组成的队伍被利用来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卡芬雅克将军是陆军部长,他亲自领导了对工人的镇压。

波拿巴的秘密组织——十二月十日会(见注30)的会员是对共和派,尤其是对1848年革命参加者进行大规模镇压的积极组织者。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以后和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在法国都实行过这种镇压。——第308页。

- 236 柴明达尔——在大莫卧儿帝国时代是指主要来自被征服的印度教徒中间的封建领主。他们的世袭土地持有权被保留了下来,条件是从自己向被压迫农民征收的租税中抽出一定份额交给政府。“柴明达尔”这个名词还被用来指孟加拉的土地税大包税主。1793年英国政府用“永久柴明达尔”法把柴明达尔(包税主)变成了私有土地的地主,以他们作为英国殖民当局的阶级支柱。随着英国人对印度的步步征服,柴明达尔制略经改变后也在印度某些其他地区实行起来。——第310、412页。
- 237 在1845年镇压阿尔及利亚起义时期,佩利西埃将军(后来升为法国元帅)下令把藏在山洞里的一千个起义的阿拉伯人用烟熏死。——第310页。
- 238 这里是指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的著作“高卢战记”(《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此处所叙述的事情见第八册,这一册是凯撒的朋友、曾在他手下任执政官的奥·希尔提乌斯写的(他为凯撒续写了关于高卢战争的纪事)。——第311页。
- 239 马克思指的是德意志帝国国会于1532年在累根斯堡通过的查理五世刑律(Constitutio criminalis Carolina)。刑律的特点是惩罚极端残酷。
威·布莱克斯顿“英国法律释义”第1—4卷(W·Blackstone《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Vol. I—IV)。初版于1765—1769年在伦敦出版。——第311页。
- 240 札格纳特(印度的叫法是札干纳特)是印度教的大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祭祀札格纳特的著名的地方是卡塔克城(印度东部)附近普里小镇上的一座庙。这座庙的祭司们在东印度公司的庇护下,从群众的朝圣活动(他们借此机会怂恿住在庙里的妇女卖淫)以及为纪念札格纳特而举行的盛大庆典中获得大笔收入。拉特雅德拉节招徕的朝拜者特别多。届时,札格纳特的神像被放在一辆庞大的车上拉着游行,狂热的信徒往往如疯似狂地投身于车轮之下。——第311页。
- 241 莫扎特的歌剧“后宫诱逃”第三幕第六场奥斯明的咏叹调。——第311页。

- 242 这句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指的是该报常任通讯员匈牙利作家兼记者弗朗茨·普尔斯基。他在 1848 年匈牙利革命失败以后流亡美国。他给该报写的主要是国际问题的述评。——第 318 页。
- 243 廓尔喀人(或称廓尔克赫人)是构成尼泊尔居民主要成分的民族。一部分廓尔喀人住在印度——北方邦(过去的英属印度时代的联合省)和同尼泊尔毗邻的西孟加拉各区。——第 319 页。
- 244 马克思指的显然是“加尔各答日报”(《The Calcutta Gazette》)——自 1784 年在孟加拉出版的一家英文报纸,它是英国政府在印度的官方喉舌。——第 319 页。
- 245 穆哈莱姆是伊斯兰教的阴历正月;这个月的最初十天被认为是哀悼忌期,纪念传说中的教主侯赛因的殉难。在此期间,人们举行通常带有自我折磨性质的宗教礼仪。穆哈莱姆节的第一天就是新年元旦。——第 320 页。
- 246 马拉提人是印度境内居住在德干西北部地区的一个民族。从十七世纪中叶起,这个民族开始了武装斗争,反对莫卧儿封建主的异族统治,他们沉重地打击了大莫卧儿帝国并加速了它的崩溃。在这一斗争进程中建立了一个马拉提人的独立邦,这个邦的封建上层人物不久就走上了侵略战争的道路。十七世纪末,马拉提邦被封建内讧所削弱,但是在十八世纪初,又形成了一个以最高统治者——派施华为首的诸马拉提王国的强大联盟。马拉提封建主为了称霸印度而与阿窟汗人进行斗争,1761 年遭到惨重的失败。由于参加称霸印度的斗争和马拉提封建主的内部纠纷而弄得精疲力尽的诸马拉提王国,在 1803—1805 年英国—马拉提战争中被东印度公司征服。
- 这里指的是马拉提王公土卡吉二世霍尔卡尔和阿里·扎·吉阿吉·辛迪亚。——第 321 页。
- 247 阿富汗惨剧——见注 117。——第 322 页。
- 248 马克思写这篇文章时利用了恩格斯在 1857 年 9 月 24 日的信中向他提供的有关印度起义经过的材料。——第 323 页。

- 249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本文开始处附加了这样一句话：“昨天我们收到了10月7日以前的一批伦敦报纸。”——第327页。
- 250 达普（两河流域）——此处指的是印度恒河和朱木拿河之间的地区。——第331页。
- 251 桑塔尔人是印度的一个民族，祖先是德拉维达人。桑塔尔人居住在西孟加拉、比哈尔和北奥里萨等地的山区。——第331页。
- 252 “印度之友”（《The Friend of India》）是英国报纸，1818年创刊于塞腊姆普尔（孟加拉）；在五十年代，每周出版一次，该报具有资产阶级自由派倾向。——第333页。
- 253 “军事旁观者”（《Military Spectator》）是英国的军事周报，从1857年至1858年在伦敦出版。——第333页。
- 254 “孟买信使报”（《The Bombay Courier》）是英国政府的报纸，东印度公司的机关报；1790年创刊。——第335页。
- 255 马克思做的这个表，大概是与本文一起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但编辑部却把它单独排在同一号报纸的第6页上。——第336页。
- 256 在马克思的1857年的笔记本中，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英国的金融危机。皮尔法暂停生效”。——第345页。
- 257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附加了这样一句话：“‘富尔顿号’带来的消息，即我们通过电报收到并于今晨发表在本报上的消息，证实了这种看法。”——第345页。
- 258 “地球报”（《The Globe》）是一家英国报纸“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ler》）的简称，1803年在伦敦出版，辉格党机关报，在该党执政时期是政府的官方报纸；1866年起成为保守党的机关报。——第348页。
- 259 明辛街（Mincing Lane）是伦敦的一条街，是殖民地商品批发交易的中心地。
“旗帜报”（《The Standard》）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827年创办

- 于伦敦。——第 349 页。
- 260 “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1855 年至 1865 年由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发行于伦敦。——第 350 页。
- 261 确立了共同关税线的德国各邦于 1834 年成立了关税同盟。这个同盟是由于必须建立全德市场而产生的，它逐渐地包括了除奥地利和某些小邦以外的德国各邦。普鲁士在同盟中起着领导作用。——第 351 页。
- 262 马克思指的是拿破仑第三于 1857 年 11 月 10 日签署了一项法令，废除了 1856 年 9 月 8 日和 1857 年 8 月 22 日的关于禁止谷物、面粉以及其他食品出口的法律。——第 351 页。
- 263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附加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我们没有弄错，在我国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有些哲学家像我们的‘泰晤士报’和‘独立报’的同仁那样，认为只要人民假装高兴并三呼万岁，灾难就能避免。”——第 351 页。
- 264 因克尔芒——见注 120。——第 352 页。
- 265 1854 年 10 月 25 日（俄历 13 日），俄军和英法联军于巴拉克拉瓦附近会战；在这次会战中，英军尽管处于有利的地势，但是由于指挥失误，英军遭到很大损失，英军的轻骑兵全部复没。——第 353 页。
- 266 “孟买日报”（《The Bombay Gazette》）是英国在印度出版的报纸；创办于 1791 年。——第 354 页。
- 267 “北不列颠每日邮报”（《North British Daily Mail》）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1847 年创办于格拉斯哥；它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 362 页。
- 268 马克思指的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托·图克所写的总称为“价格史”的一系列著作：“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1793—1837 年”年 1838 年伦敦版第 1—2 卷（《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Circulation, from 1793 to 1837》. Vol. 1. —, London, 1838）、“价格

- 史和货币流通状况,1838年、1839年”1840年伦敦版(《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in 1838 and 1839》. London, 1840)、“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1839—1847年”1848年伦敦版(《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839 to 1847 inclusive》. London, 1848)以及托·图克和威·纽马奇合写的“1848—1846年九年中的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1857年伦敦版第5-6卷(《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during the Nine Years 1848—1856》. Vol. 1. —, London, 1857)。——第363页。
- 269 伦巴特街是伦敦的一条街名,大银行和贴现设在这里,伦敦金融市场的同义语。英格兰银行只贴现各家银行的第一流期票,而伦巴特街则贴现一切期票,并且这里的贴现率,即所谓的市场贴现率,一向高于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第372页。
- 270 马克思引用恩格斯1857年12月17日的信(未用原话),文中还利用了信中的其他事实。——第373页。
- 271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1857年的笔记本加的。——第375页。
- 272 “舆论报”(《Opinione》)是意大利的一家日报,1848年创办于都灵,是卡富尔的自由保皇派的机关报。——第378页。
- 273 *Crédit Foncier* (土地信用公司)是法国的一家股份银行。它是1852年在前巴黎土地银行的基础上建立的。*Crédit Foncier* 发放以不动产作抵押并支付一定利息的短期和长期贷款(期限为五十年)。*Crédit Foncier* 得到政府的大量津贴。
- Comptoir National d'Escompte de Paris* (巴黎全国贴现局)成立于1848年。起初它贴现有两个背书的期票并发放以存放在公共仓库中的商品作抵押的贷款。在拿破仑第三时代成了股份公司(从1853年起)并取得发放以法国无期证券、工业股份公司或信用股份公司的股票或债券作抵押的贷款的特权。——第379页。
- 274 军人餐厅(Mess House)是勒克瑙城驻防部队用作军官俱乐部和食堂

的处所。——第 381 页。

- 275 阿尔马河会战——俄军同法军、英军遇于阿尔马河，时间是在 1854 年 9 月 20 日（俄历 8 日）。这次会战获胜的是联军，因为他们人数多并且在军事上占着相当的优势，此外还因为俄军指挥不当。——第 386 页。
- 276 乌古蒙寨和拉埃桑特庄是滑铁卢村的外围据点，在 1815 年 6 月 18 日滑铁卢会战中是联军的良好天然壁垒。这两个阵地的守军尽管人数很少（乌古蒙只有七个连和一个营，拉埃桑特只有一个营），却表现了堪称典范的顽强死守的精神。结果法军没有能够拿下乌古蒙寨，只是经过长时间的苦战，他们才攻下了拉埃桑特。——第 387 页。
- 277 1812 年 9 月 7 日（俄历 8 月 26 日）博罗迪诺会战时，拿破仑的军队损失一半左右，库图佐夫的军队损失三分之一以上。——第 387 页。
- 278 1832 年 10 月，英、法以及一部分比利时军队封锁了荷兰的港口，围困了安特卫普城堡，企图迫使尼德兰履行 1831 年伦敦条约关于承认比利时独立和把安特卫普割让给比利时的条款。荷兰人守卫城堡表现得很坚定顽强，只是在城堡仅剩下一片瓦砾以后，才在 1832 年 12 月底把它交出。
- 在围困 1848 年 3 月起义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威尼斯时，海瑙将军指挥下的奥地利军队的主要打击目标是马尔格腊堡垒。堡垒的守军奋力防守，抵御了长期的围困，只是在 1849 年 5 月堡垒内部所有工事被破坏，大部分大炮被摧毁以后，才将堡垒交出。——第 405 页。
- 279 1813 年初第六次反法同盟的德俄军队包围了法军占领的但泽城，但是在该城外围遇到组织得异常坚强的抵御。该城被围十一个半月。在此期间，法军在拉普将军指挥下抵住了三次正规的围攻。法军折损计 19000 人，联军折损计 10000 人。——第 405 页。
- 280 这里指的是克里木战争中的事件。在联军 1855 年 6 月 18 日（俄历 6 日）对塞瓦斯托波尔阵地第三号棱堡（所谓大凸角堡）的未成功的突袭当中，温德姆指挥英军一个旅，但是行动非常迟缓，而且在战事正酣的时候曾两次极其可疑地跑到后方去，据说是为了请求援军（见本卷第

- 411—416 页)。——第 406 页。
- 281 1833 年的议会法案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停止了它作为贸易组织的活动。议会只给该公司保留了行政职能,把它的特许状的有效期限延长到 1853 年。——第 408 页。
- 282 “凤凰”(《The Phoenix》)是在印度的英国政府报纸,发行于加尔各答。——第 410 页。
- 283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 1858 年的笔记本加的。——第 411 页。
- 284 英军总司令腊格伦公爵在 1854 年 10 月 25 日(俄历 13 日)的巴拉克拉瓦会战中,命令军队骑马冲击俄军炮台,致使英军轻骑兵复没。这件事在英国曾轰动一时。事后,腊格伦公爵企图为自己辩解,硬说这应当归咎于诺伦上尉,因为他好像误传了腊格伦公爵的命令。可是要查明这件事却十分困难,因为诺伦在命令下达后几分钟就阵亡了。——第 415 页。
- 285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 1858 年的笔记本加的。——第 417 页。
- 286 指路易·波拿巴在 1840 年 8 月 6 日企图实行政变。他利用波拿巴主义情绪在法国相当活跃的情况,同一小撮密谋分子在布伦登陆,以图在当地驻军中发动兵变。这一企图终于全部失败。波拿巴被判处无期徒刑,但于 1846 年逃往英国。——第 417 页。
- 287 “旁观者”(《Le Spectateur》)是法国“国民议会报”(见注 64)1857 年 9 月至 1858 年 1 月在巴黎出版的报纸。
“卢瓦尔河上的灯塔”(《Le Phare de la Loir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从 1815 年起在南特出版。——第 420 页。
- 288 “纽约每日论坛报”在马克思文章中的这段话的后面附加了这样一段:
“又如现在在巴黎的一位美国知名人士在一封由‘阿非利加号’轮船寄来的信中写道:‘法国人自己的心里都有一种可怕的预感。前些日子,我曾和一个朋友谈话,她是一个非常严肃认真、头脑清楚的女人,她 sotto voce [低声] 告诉我,她接触到的人没有一个不在心惊胆战地担心着即将发生的事情,担心着不堪设想的复仇之日的到来。她告诉我, mont

- de- pié[当铺]的收入大大减少,事实越来越明显:人民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当卖了。在她和她的朋友们看来,这肯定是最终灾难临近的征兆。”——第 420 页。
- 289 指一项称为嫌疑犯处治法 (loi des suspects) 的社会治安法律。该法律于 1858 年 2 月 19 日由立法团通过。它使政府和皇帝有无限的权力把一切有敌视第二帝国体制嫌疑的分子,流放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任何地方,甚至驱逐出法国领土。——第 420 页。
- 230 指所谓的十二月十日会(见注 30)。——第 421 页。
- 291 在古罗马,皇帝私人警卫部队的军人称为御用军人,享有特权地位。马克思把拿破仑第三所依靠的那些法国军阀叫做御用军人(见本卷第 428—431 页)。——第 421 页。
- 292 把法兰西帝国全境划为五个军区的命令是 1858 年 1 月 27 日颁布的。这些军区的行政中心是:巴黎、南锡、里昂、土鲁斯和图尔。被任命为各军区长官的是:马尼扬、巴拉盖·狄利埃、博斯凯、卡斯特朗和康罗贝尔等五名元帅。马克思称这些军区为帕沙辖区,是借用了早在 1850 年共和派报纸给军区取的别名;这个别名的用意是强调当时任各军区长官的反动将领的无限权力无异于土耳其帕沙的独裁大权。1858 年任命佩利西埃为主帅统辖所有军区一事,只是拟议,并未付诸实行。——第 421 页。
- 293 马克思在这里援引的是曾经流行一时的约翰·班扬的小说“天路历程”。——第 421 页。
- 294 指路易·波拿巴曾于 1836 年 10 月 30 日企图实行政变。为此,他曾在斯特拉斯堡市警备团中组织了密谋活动。结果密谋全部失败。波拿巴被逮捕并流放到美国。——第 421、444 页。
- 295 1855 年 3 月,路易·拿破仑曾打算前往克里木加强军事行动,加速攻占塞瓦斯托波尔,以平息军队和本国所发生的不满情绪。但此行并未实现。——第 422 页。
- 296 外侨管理法案(又名取缔阴谋活动法案)是帕麦斯顿在法国政府的压力

- 下于 1858 年 2 月 8 日向议院提出的(帕麦斯顿表示自己打算提出此项法案是在 2 月 5 日)。按照这一法案,凡居住在联合王国内者,不论英国人或外国侨民,如组织或参与旨在刺杀英国人或其他国家任何人的密谋活动,应交由英国法庭审判并予严惩。在广大群众抗议的压力下,下院否决了这一法案,帕麦斯顿亦被迫辞职。——第 422 页。
- 297 埃斯潘纳斯将军按照法国统帅部的命令,于 1854 年 7—8 月率领远征军侵伐占据着土耳其属地多布鲁甲(位于顿河下游和黑海之间的地区)的俄军。但是,埃斯潘纳斯未与俄军交战,却因军中发生霍乱时疫,全军死亡一半以上,而使这次侵伐以狼狈的退却告终。——第 428 页。
- 298 马克思把路易·波拿巴称做萨托里英雄。1850 年 10 月 10 日,当时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路易·波拿巴,在凡尔赛附近的萨托里平原举行总阅兵,并为此在那里大摆酒宴。路易·波拿巴当时准备实行政变,企图从而收买军队;他设法争取到骑兵队在检阅时向他高呼“皇帝万岁!”——第 428、545 页。
- 299 热月九日(1794 年 7 月 27—28 日)在法国发生了反革命政变,结果推翻雅各宾政府,建立起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第 429 页。
- 300 皇宫(Palais Royal)是巴黎的一座宫殿,自 1643 年起为路易十四的宫邸,自 1692 年成为波旁王朝奥尔良系的财产。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作为拿破仑第三的叔叔,前威斯特伐里亚国王日罗姆·波拿巴和他的儿子约瑟夫·波拿巴(拿破仑第三的儿子出生以前,曾立为法国皇太子)的王府。
这里暗指日罗姆·波拿巴和路易·波拿巴之间的紧张关系。——第 430 页。
- 301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 1858 年的笔记本加的。——第 432 页。
- 302 指 1856 年 10 月英国代表和中国广州地方当局之间发生的冲突。在这次冲突中,中国方面的主要人物是总督叶名琛,他反对英国人的非法要求。这一冲突成为帕麦斯顿政府在中国发动第二次掠夺性的鸦片战争的借口。政府的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很受贪求新的销售市场的英国资产

阶级的欢迎，这就使得英国贵族寡头政治的代表人物帕麦斯顿能够在将近十年（1855—1858年和1859—1865年）的时间内操纵了资产阶级英国的国内外政策。

烧炭党人是意大利的一个秘密政治团体的参加者。这个政治团体产生于十九世纪初，它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开端。烧炭党人所抱的目的是驱逐外国掠夺者和限制专制政治。

关于帕麦斯顿的辞职，见注 309 和 296。——第 432 页。

- 303 在英国议会里，按照久已形成的传统，执政党的内阁阁员坐在下院议长（主席）右边的席位上，而身为反对党的前内阁阁员则坐在对面，即议长左边的席位上。——第 432 页。
- 304 天主教徒的解放是指 1829 年英国议会取消了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限制。天主教徒大部分是爱尔兰人，他们获得了被选入议会的权利和担任某些政府职务的权利；同时，选民的财产资格却被提高了四倍。英国统治阶级指望用这个手段把爱尔兰资产阶级和信天主教的土地占有者的上层拉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分裂爱尔兰的民族运动。——第 433 页。
- 305 指争取选举法改革的斗争。1832 年英国议会进行了选举法改革（见注 146）。——第 433 页。
- 306 凯普莱脱族和蒙太玖族是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两个敌对的家族。——第 433 页。
- 307 指 1845 年科布顿进行的反谷物法的宣传鼓动。他的宣传鼓动促使皮尔的托利内阁下台。受命组织新内阁的辉格党领袖约翰·罗素勋爵请科布顿担任贸易副大臣，科布顿拒绝了 this 提议。由于辉格党的内部矛盾，罗素未能组阁。1845 年 12 月 20 日，托利党人重新上台执政。——第 433 页。
- 308 多布 (Dowbiggin 的简称) 是一个参加过克里木战争的年轻军官、英国陆军大臣潘缪尔勋爵的侄子的名字。潘缪尔在发给克里木的英国司令部的一封电报中写过“请照顾一下多布”这句话，这句话被作为陆军大

臣不关心国家军务的证明而在英国盛传开来。——第 433 页。

- 309 在意大利革命家奥尔西尼谋杀路易·拿破仑以后，法国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伯爵于 1858 年 1 月 20 日向英国政府发出紧急照会，他在照会中代表法国政府以强硬的口吻对英国准许法国政治流亡者避难表示不满。瓦列夫斯基在照会中公然示意必须对此采取适当对策。瓦列夫斯基的照会使帕麦斯顿借此向下院提出了取缔阴谋活动法案（见注 296）。——第 435 页。
- 310 自由派议员米尔纳·基卜生于 1858 年 2 月二读取缔阴谋活动法案过程中提出的修正案，责备帕麦斯顿政府对瓦列夫斯基的强硬照会未给以应有的回答。修正案实际上是对政府投下的不信任票；下院以多数票通过修正案以后，否决了这个法案，结果迫使帕麦斯顿政府辞职。——第 435 页。
- 311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附加了以下这段话：“这样一来，欧洲一切国家的首都都松了一口气；每一个自由党人都充满信心地感到，现在距离人民胜利地站起来的日子，要比一个月以前近得多了。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来引证英国一位杰出的演说家、英国最有前途的国家活动家之一、很久以来一直是罗伯特·皮尔爵士的密友、牛津大学的代表人物格莱斯顿先生的一段话。在导致帕麦斯顿内阁倒台的历时很长的辩论中，格莱斯顿说：
- ‘我们的时代是争取自由的艰苦时代。我们生活在十九世纪。我们谈论着进步；我们相信我们正在前进；然而，细心观察过近几年的欧洲事变进程的人不能不注意到，虽然也确实存在着运动，但这是走下坡路的、开倒车的运动。有少数地方还存在着和盛行着我们所赞同的制度；但这些都是占次要地位的地方，就其物质意义而论，真可以说是欧洲的穷乡僻壤，当然我相信它们的精神意义能保证这些地方长期繁荣和幸福。而今天落在英国肩上的责任空前重大。如果确实要让英国和它的原则、它的法律、它的执政者来担负起这种责任，那末我要说，作为自由的主要支柱的下院所批准的任何法案，倘若想在我们同那些企图用镇压手段巩固自己地位的人之间建立起道义上的合作，则对于世界所有

国家的神圣的自由事业将是一个打击,并将把这种事业置于困难境地。(暴风雨般的掌声)'

应该注意的是:得比勋爵坚持邀请格莱斯顿先生在他的内阁中担任要职,最近以前不曾有过、不久的将来也不会有不愿意让格莱斯顿先生分担一部分最重大的责任的首相。”——第 435 页。

- 312 指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侵略战争期间,法国殖民主义者对阿拉伯民族的兽行(见注 110)。——第 436 页。
- 313 “皇帝拿破仑第三和英国”1858 年巴黎版(《L'Empereur Napoléon et l'Angleterre》·Paris, 1858)。这本抨击性的小册子是路·埃·拉·格隆尼埃尔写的,并且是匿名出版的。——第 436 页。
- 314 指 1847 年初在比桑歇城(法国中部安德尔省)发生的政府军队镇压袭击了投机商的粮仓的饥饿工人(四围乡村的居民)的事件。比桑歇事件引起了政府的残酷镇压:有几个直接参加事件的人被处死,其他许多人被判服苦役。——第 436 页。
- 315 1847 年 8 月,法国元帅普拉兰公爵杀害了自己的妻子。这位显要人物的罪行引起了法国社会各界的忿怒。公爵在妻子安葬几天以后,突然死亡,法国报界认为这是自杀。——第 436 页。
- 316 “祖国报”(《La Patri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41 年创刊。1850 年该报反映联合保皇派即所谓秩序党的利益;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 440 页。
- 317 “有思想的军队”(《baïonnettes intelligentes》)一语,被认为是法国保皇党将军尚加尔涅的说法。1849 年,法国制宪议会主席、资产阶级共和派马拉斯特预感到来自波拿巴分子的威胁,请求尚加尔涅派兵保护议会,尚加尔涅拒绝了,并且声明他不喜欢有思想的军队。他以此使人明白,军队不应该根据政治的动机来行动。马克思在这里是暗中讽刺具有波拿巴主义情绪的法国军队,这支军队实际上在第二帝国的政治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第 440 页。
- 318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利用了恩格斯 1858 年 3 月 17 日的信。——第

- 441 页。
- 319 指所谓外侨管理法案（见注 296）于 1858 年 2 月被英国下院否决，以及接着而来的从道义上支持拿破仑第三的制度并且赞同第二帝国的对外政策的帕麦斯顿政府的辞职。——第 444 页。
- 320 指法国和比利时于 1856 年 9 月 22 日签订、10 月 11 日批准的协定。协定限制了比利时对被控图谋杀害或杀害外国皇帝或皇族的政治流亡者给以避难的权利。——第 444 页。
- 321 暗指 1839 年在巴黎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拿破仑观念”(Napoléon-Louis Bonaparte 《D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Paris, 1839) 一书。书中颂扬拿破仑政治的原则、拿破仑第一的帝国秩序，并把皇帝本人写成一个理想人物。——第 444 页。
- 322 “大陆评论”(《The Continental Review》)是英国的资产阶级周刊，1858 至 1859 年在伦敦出版。——第 444 页。
- 323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现代军队的大炮史”1848 年巴黎版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Histoire du canon dans les armées modernes》·Paris, 1848)。——第 446 页。
- 324 1848 年 12 月 10 日路易·波拿巴被选为第二共和国的总统。——第 446 页。
- 325 “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学世界报”(《L'Univers religieux, philosophique, politique, scientifique et littéraire》)是法国教权派报纸，1833 年创办于巴黎；该报在五十年代支持波拿巴的政策。——第 447 页。
- 326 指阿基里斯。根据希腊神话，只有他一个人能治好他使海格立斯儿子泰列夫遭受到的创伤。——第 448 页。
- 327 古罗马集会上一个地方叫做 Lacus Curtius(库尔威乌斯谷)。据传说，这里由于地震而塌陷成一个坑，只是当一个罗马青年库尔威乌斯牺牲自己，跳进坑去以后，这个坑才闭合起来。——第 448 页。

- 328 指路易·波拿巴曾参加英国政府为镇压宪章派而征募的特别巡警（警察）队。这些巡警队在破坏 1848 年 4 月 10 日宪章派为向议会递交第三封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而举行的游行示威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第 448 页。
- 329 朱·马志尼“致路易·拿破仑”1858 年伦敦版（J. Mazzini: 《To Louis Napoléon》·London, 1858）。——第 450 页。
- 330 马克思指 1849 年罗马共和国三执政（马志尼、萨菲、阿尔美里尼）的政策温和的、不彻底的性质。他们对农民采取的措施，虽然也带有进步的意义，但是实际上并未改变农村的土地关系，也没有使意大利农民的困难处境真正得到改善。——第 450 页。
- 331 指杜罗·德·拉·马尔的“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 年巴黎版第 1—2 卷（Dureau de la Malle·《Economie politique des Romains》·T. — , Paris, 1840）和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Considé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des Romains et de leur décadence》）。第一版作者匿名于 1734 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第 450 页。
- 332 约·列列韦尔“论昔日波兰的政治状况及其人民的历史”[1844 年巴黎版]（J. Lelewel·《Considérations sur l'état politique de l'ancienne Pologne et sur l'histoire de son peuple》[Paris, 1844]）。——第 451 页。
- 333 Marianne（玛丽安娜）是法国一个秘密的共和组织的名称，成立于 1850 年；该组织以反对拿破仑第三为目的。——第 452 页。
- 334 路易·波拿巴为了取得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信任，参加了在教皇庇护八世死后所组织的反对罗马教皇世俗权力的密谋。1831 年初在摩地那、罗曼尼亚、帕尔马由此而爆发的起义，被奥地利的军队和意大利各国政府的武装力量镇压下去。——第 454 页。
- 335 关于雨果的小册子，见注 29。——第 456 页。

- 336 “诚实的不列颠人报”(《The True Briton》)是1792年在伦敦创办的英国日报;它在十九世纪初同政界有密切联系。——第460页。
- 337 皇家法院是英国的高等法院之一,1873年改革后成为高等法院的分院。皇家法院审理刑事的和民事的案件,它有权重新审理下级法院的判决。——第460页。
- 338 “汉堡记者”(《Hamburger Korrespondent》)是德国报纸“汉堡公正记者和学术日报”(《Staats und Gelehrte Zeitung des Hamburgischen unparteiischen Korrespondenten》)的简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该报每天出版,倾向于反动的君主专制。——第463页。
- 339 暗指法国实行路易·拿破仑所倡议的野战炮兵新体制。按照这个体制,各种炮均代之以轻型的十二磅炮,即所谓路易·拿破仑的榴弹炮,这种炮可以发射不大的炮弹。——第464页。
- 340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1858年的笔记本加的。——第469页。
- 341 指1838—1842年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见注117)。——第470页。
- 342 B. Disraeli. 《The Young Duke》·V11. — , London, 1831. ——第476页。
- 343 指的是财政大臣格莱斯顿于1853年4月提出并由下院通过的有关预算的提案。——第478页。
- 344 理查·普莱斯“评继承支付、孀老赡养金方案、人寿保险金算法以及国债”1771年伦敦版(R·Price《Observations on Reversionary Payments; on Schemes for Providing Annuities for Widows, and for Persons in Old Age; on the Method of Calculating the Values of Assurances on Lives; and on the National Debt》·London, 1771)。——第479页。
- 345 指“通报”上发表的法国陆军上校们为庆贺拿破仑第三于1858年1月14日被刺遇救而写的祝词。祝词中充满了对英国的威胁。——第481页。

- 346 “权力报”（《Le Pouvoir》）是法国波拿巴派的报纸，1849年创办于巴黎，从1850年至1851年用这个名称发行。——第482页。
- 347 “纽约先驱报”（《The New-York Herald》）是美国的日报，共和党的机关报，在1835年至1924年发行于纽约。——第483页。
- 348 布伦远征（Expédition de Boulogne）——见注286。——第483页。
- 349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做的截至1857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报告”1857年伦敦版（《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7》·London, 1857）。——第488页。
- 350 恩格斯指的是缅甸人所广泛采取的一种用于城市和营垒周围的最古老的防御工事。——第497页。
- 350 法国所占领的西班牙要塞巴达霍斯和圣塞瓦斯田先后被威灵顿所统率的英军于1812年4月6日和1813年8月31日攻下。——第499页。
- 352 指印度总督坎宁勋爵于1858年3月3日的公告。根据此项公告，奥德王国的全部土地，包括参加印度起义的塔鲁克达尔（大封建地主）的土地，均由英国当局予以没收，归英国政府所有。但是英国政府为了笼络塔鲁克达尔，改变了坎宁公告的意思，允许塔鲁克达尔的地产不受丝毫侵犯。在此以后，塔鲁克达尔们就背叛了起义，投靠了英国当局。
- 马克思在“奥德的兼并”和“坎宁的公告和印度的土地占有问题”（见本卷第502—507页和第516—519页）等文中详细地评论了这一公告。——第499页。
- 353 虽然英勇而顽强地同英军作战的锡克军队有良好的组织，但锡克人却于1845年12月18日在菲罗兹普尔附近的穆得克村，于1845年12月21日在菲鲁兹沙赫尔，于1846年1月28日在卢迪阿纳附近的阿利瓦尔村被英军战败。由于这几次败仗，1845—1846年的第一次英锡战争，锡克人打输了。锡克人战败的原因是其最高指挥部的叛卖行为。——第500页。

- 354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 1858 年的笔记本加的。——第 502 页。
- 355 马克思援引的是印度总督坎宁勋爵 1858 年 3 月 3 日的公告。——第 502 页。
- 356 奥德原属莫卧儿帝国,但在十八世纪中叶,奥德的莫卧儿总督实际上已经成为独立的统治者。自 1765 年起,英国人把奥德变成一个附属的(臣服于英国人的)公国,奥德的实际政权遂落入英国驻扎官的手中。然而为了掩饰这种局面,英国人常常称奥德的统治者为国王。——第 503 页。
- 357 根据 1801 年东印度公司同奥德的纳瓦布所签订的条约,印度总督威尔斯里借口纳瓦布未偿债务,兼并了他的一半领地,其中包括果腊克普尔、罗希尔汗和恒河、朱木拿河两河之间的某些地区。——第 503 页。
- 358 英印总督及其参事会——见注 210。——第 506 页。
- 359 马克思文章中的这一句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编辑部指的是 1858 年 6 月 5 日该报所发表的印度总督坎宁和奥德首席专员乌特列姆之间就坎宁关于奥德的公告的来往信件。——第 516 页。
- 360 十九世纪中叶,几乎整个印度均处于英国统治之下。与东印度公司有从属关系的有克什米尔公国、拉吉普坦纳公国、海德拉巴公国一部分、迈索尔公国和其他一些较小的公国。——第 516 页。
- 361 柴明达尔——见注 236。
塔鲁克达尔——见注 352。
谢尔达尔——锡克大封建主。——第 516 页。
- 362 指 1793 年印度总督康沃利斯所公布的“永久柴明达尔”法。根据这一法律,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的几乎全部土地均被宣布为柴明达尔所有(见注 236)。——第 517 页。
- 363 督察委员会主席埃伦伯勒勋爵在其 1858 年 4 月 19 日的电报中对印度总督坎宁勋爵关于奥德的公告持有不同意见(见注 352)。
埃伦伯勒勋爵由于他的电报没有取得英国政界的赞同,而被迫辞

- 职。——第 519 页。
- 364 “财产的救主”是 1849 年 7 月法国各城市市政委员会给路易·波拿巴的祝词中对他的称呼。——第 520 页。
- 365 “世纪报”(《Le siècle》)是 1836 年至 1939 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国日报,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该报反映了一部分只要求温和的宪政改革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在五十年代该报是温和的共和派的报纸。——第 521 页。
- 366 “费加罗报”(《Figaro》)是法国保守派的报纸,1826 年在巴黎断断续续地出版,在五十年代该报具有波拿巴主义倾向。——第 522 页。
- 367 暗指英国首相同时兼任财政大臣。——第 538 页。
- 368 包括了宪章派各项要求的人民宪章,是 1838 年 5 月 8 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法律草案公布的。宪章包括了以下六点,普选权(赋予年满 21 岁的男子),议会每年选举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宪章派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遭到议会的拒绝。
- 对英国下院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于 1858 年由议会废除。——第 538 页。
- 369 这里是指 1846 年在奥地利的加里西亚省发生的乌克兰农民反对波兰地主的反封建运动。当时,奥地利当局散播了挑拨性的流言蜚语,说奥皇本来打算废除徭役制而波兰地主(在加里西亚基本上是统治阶级)却反对这样做,利用了农民与当时准备进行反奥暴动的波兰贵族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奥地利政府在头几天听任农民去攻打和消灭波兰地主,可是后来残酷地镇压了农民起义。——第 540 页。
- 370 “同盟报”(《L'Union》)是法国教权主义君主派的日报。从 1848 年至 1869 年以这个名称在巴黎出版。——第 540 页。
- 371 这里说的是 1858 年 3 月由得比内阁提交议会、同年 7 月由议会通过的法案。该法案名为“改进印度的行政管理法令”。根据这一法令,印度转归国王统治,而东印度公司则予解散,以 300 万英镑作为对股东的补偿。撤销的督察委员会主席由印度事务大臣取而代之,印度事务大臣下

面设一咨询机关——印度事务参事会。印度总督改称副王,其实只是在伦敦的印度事务大臣意志的执行者。

马克思在“关于印度的法案”这篇论文中对该法案做了批评性的分析(见本卷第558—561页)。——第547页。

372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1858年的笔记本加的。——第553页。

373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1858年的笔记本加的。——第558页。

374 指1773年的“改进东印度公司行政管理法令”。该法令缩减了参加决定公司事务和选举董事会的股东的人数。根据该法令,参加股东大会(股东会)而有表决权者只限于持有股票一千英镑以上的人。第一届印度总督及其参事会成员任期各五年,期满以前只能经公司董事会提名由国王免职。后来总督及其参事会则应由公司任命。根据1773年的法令,在加尔各答设立最高法院,其中包括一名最高法官在三名助理。——第558页。

375 印度事务大臣及其参事会——见注371。——第559页。

376 《Civis romanus sum》——帕麦斯顿在下院就商人帕西菲科一案发言后所得的译名(见注165)。——第561页。

377 “索美塞特报”(《Somerset Gazette》)是英国周刊“索美塞特郡报”(《Somerset County Gazette》)的简称,1836年创办于汤顿。——第562页。

378 马克思指的显然是他在1858年7月16日写的第一篇有关布尔韦尔-利顿夫人的文章,但该文没有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第563页。

379 埃克塞特会堂(Exeter Hall)是伦敦斯特伦街上一座建筑物。1831年至1907年英国国教会福普派的中心组织就设在这里。——第565页。

380 “心理学医学和精神病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Medicine and Mental Pathology》)是由福布斯·温斯劳医师自1848年

- 至 1883 年在伦敦出版的杂志，其间曾中断过一个时期。——第 566 页。
- 381 “精神病委员会委员向大法官呈递的年度报告” 1852、1854、1857 年 [1853—1858 年伦敦版] (《Annual Reports of the Commissioners in Lunacy to the Lord Chancellor》·1852, 1854, 1857. [London, 1853—1858])。——第 568 页。
- 382 “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疯人病院状况的报告” 1857—1858 年伦敦版 (《Return of Lunatic Asylums in England and Wales》·London, 1857—1858)。——第 570 页。
- 383 “特别委员会关于银行法的报告” 第 1—2 册 1857 年 [伦敦版]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Bank Acts》·P. — , [London] 1857)。——第 574 页。
- 384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 1858 年的笔记本加的。——第 584 页。
- 385 指 1858 年 6 月英、法、俄、美在天津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结束了 1856—1858 年同中国进行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条约为外国在长江、满洲、古湾和海南岛上开放了新的通商口岸，还开放了天津港口；准许在北京派设常驻的外国外交代表，外国人有权在中国自由行动和在内河航行；保障传教士的安全。——第 584 页。
- 386 马丁，罗·蒙哥马利“论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 1847 年伦敦版第 2 卷 (Martin, R·Montgomery. 《China; Political, Commercial and Social》·Vo1·2, London, 1847)。——第 585 页。
- 387 “商人杂志” (《The Merchant's Magazine》) 是弗·汉特创办的“商人杂志和商业评论” (《The Merchant's Magazine and Commercial Review》) 的简称。1839 年至 1850 年用该名称在纽约出版。——第 585 页。
- 388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 1858 年的笔记本加的。——第 588 页。
- 389 “君士坦丁堡报” (《Journal de Constantinople》) 是一家土耳其报纸，从

- 1846年起用法文出版,由土耳其政府给予津贴,是一个半官方报纸,同时也是法国影响在土耳其的传播者。每月出版六次。——第596页。
- 390 指中国的太平军起义(见注72)。——第604页。
- 391 锡克国是印度的一个封建国家,十八世纪末诞生于旁遮普境内。十九世纪初在朗吉特·辛格治理下达到了极盛时期。朗吉特·辛格征服了旁遮普所有的小邦以及一系列邻近地区。在他统治时,锡克国的版图从萨特里日河延伸到开伯尔山口,北起小西藏,南到信德边界线。朗吉特·辛格在国内建立了强有力的军事组织。锡克军队被认为是印度最好的军队。十九世纪中叶,经过两次英锡战争(1845—1846、1848—1849),锡克国丧失了独立;旁遮普被英国人兼并。——第614页。
- 392 指天津条约(见注385)。——第621页。
- 393 马克思指的是这本书:约·麦克格雷哥尔“欧美若干国家的商业税则、条例、资源和贸易”1841—1850年伦敦版(J Mac- Gregor. 《Commercial Tariffs and Regulations, Resources, and trade, of the Several States of Europe and America》. London, 1841—1850)。——第623页。
- 394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56年至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624页。
- 395 “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是1855年在伦敦创办的一家英国日报;该报在五十年代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第625页。
- 396 1857年1月3日亚历山大二世成立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由奥尔洛夫大公担任主席,从1858年1月起该委员会改称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秘密委员会的任务是筹备农奴制的改革,康斯坦丁大公只是该委员会的委员。——第627页。
- 397 马克思指的是亚历山大一世于1803年2月20日颁布的法令:“地主释放农民必经双方同意并缔结合同”,以及尼古拉一世于1842年、1844年、1846年、1847年颁布的各项指令(见本卷第723—724页)。——第629页。

- 398 1848年3月18日在柏林,正当王宫前广场上的示威群众被驱散时,军队突然开了两枪。普鲁士军事当局的这种挑衅行为遂成了全城进行武装街垒斗争的导火线,这场斗争以王室军队的失败而结束。在同军队进行巷战中,柏林居民有四百多人被打死,一千多人被打伤。起义的人民接管了王宫的警备事宜以后,在3月19日早晨强迫国王出来在阳台上对牺牲的战斗者的尸体脱帽行礼。——第632页。
- 399 根据希腊神话,狄奥尼苏斯由于忒拜国王班突士不承认他是神,要对班突士进行报复,就把忒拜居民中所有的妇女都带到塞塔隆山上去,她们在那里被灌醉以后,跳起了酒神节的狂舞。这些酒醉发狂的女人乱撕乱扯地杀死了班突士。——第632页。
- 400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竭力想恢复反动的封建王朝的气派,于1843年颁布法令重建天鹅骑士团——中世纪的宗教骑士团。这种团体创于1443年,在宗教改革时期衰落下去。但是,普鲁士国王的这种打算始终未能如愿。——第634页。
- 401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1858年的笔记本加的。从马克思在1858年10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也在11月24日的“自由新闻”(《Free Press》)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只是文章的首尾有所改动。——第636页。
- 402 指瓦·亚·彼罗夫斯基在1839年组织的旨在征服希瓦但终告失败的一次远征(见注119)以及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见注117)。恩格斯在讲到英国军队的种种失败时,看来是指英印军队在进军喀布尔时所遭遇的困难。——第636页。
- 403 普鲁士亲王是最仇视人民的反动宫廷奸党头子之一;在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的日子里曾逃往英国。在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任镇压起义的普鲁士军队总司令。——第644页。
- 404 Seehandlung(海外贸易公司)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部门的经纪人的作用,1904年正式改为普鲁士的国家银行。——第645页。

- 405 《Chambre introuvable》（“无双议院”）是 1815 年至 1816 年由极端反动分子组成的法国众议院。——第 646 页。
- 406 在 1850 年 10 日举行的所谓华沙会议（见注 219）期间，尼古拉同普鲁士代表首相勃兰登堡伯爵谈话时声色俱厉，语含威胁。勃兰登堡伯爵从华沙回来后即暴卒。人们认为他的死因是由于受到了沙皇的侮辱以及因普鲁士国家地位低落而焦虑不安所致。——第 650 页。
- 407 摩拏法典是古印度的一部诫律集成，规定每个印度人按照婆罗门教义应尽的义务。在印度传统上，认为这些戒律是出自神话中的人类始祖摩拏之手。——第 652 页。
- 408 “人民报”（《Volks- Zeitung》）是德国的民主派日报，1853 年起在柏林出版。
“国民报”（《National- Zeitung》）是德国的资产阶级日报，从 1848 年至 1915 年以此名称在柏林出版；在五十年代倾向于自由派。——第 657 页。
- 409 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公元前六世纪）据说是古罗马社会制度的改革者。这次改革结束了氏族制度，完成了向奴隶占有制国家的过渡。根据这次改革，能携带武器、过去分为贵族和平民的罗马居民，按财产多寡划分为五个基本等级。每一个等级有一定数量的军事单位——百人团。百人团同时也是政治单位。百人团会议具有特殊意义。每个等级有多少个百人团，在会议上就分得多少票。这个制度使最富有的等级在决定最重大的政治问题时占优势地位。以前罗马人分成部落特里布斯（每一特里布斯包括一百个氏族），这时改为按地区分的特里布斯了。——第 660 页。
- 410 格拉克列亚半岛即所谓克里木半岛上西自因克尔芒到巴拉克拉瓦的那一部分；格拉克列亚半岛是因塞瓦斯托波尔被围而开辟的重要作战地区之一。马克思在提到从俄国夺走的那一块不大的土地时，是指俄国按照 1856 年的巴黎和约被迫放弃的贝萨拉比亚部分。——第 661 页。
- 411 1853 年 1 月 9 日尼古拉一世在同英国驻彼得堡公使汉·西摩尔会晤时这样称呼土耳其，尼古拉一世曾建议俄英瓜分土耳其帝国。不愿意俄

- 国富强而只关心保护弱小的奥斯曼帝国的英国，拒绝了 this 建议。——第 661 页。
- 412 乔·温·库克“中国：1857—1858 年‘泰晤士报’特约中国通讯”1858 年伦敦版第 278 页 (G·W·Cooke 《China: beina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58》·London, 1858, p. 273)。——第 663 页。
- 413 “记者”(《Le Correspondant》)是法国天主教月刊；从 1829 年起在巴黎出版；在五十年代是奥尔良派的机关刊物。——第 667 页。
- 414 英国自十六世纪设置的国务会议(后来的枢密院)议长,作为荣誉职保留在内阁之中,类似不管大臣;任此职者对于国政不起任何作用。——第 672 页。
- 415 “国家通报”(《Staats- Anzeiger》)是德国日报“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 Preu ischer Staats- Anzeiger》)的简称。该报是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纸,于 1851 年至 1871 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发行。——第 672 页。
- 416 菩提树街(Unter den Linden)是柏林市的主要大街之一。——第 673 页。
- 417 “伊利亚特”是著名的古希腊史诗,据说是传说中的古希腊诗人荷马所写。
“艾达”是一部收有七至十三世纪时期冰岛神话和英雄诗歌的集子,是世界史诗中最伟大的遗产之一。——第 673 页。
- 418 古迪布腊斯是英国诗人巴特勒的同名讽刺长诗中的主人公,他的特点是喜好无意义的谈论和争辩,并善于用不切实际的一般性论断“证明”最荒谬的论点。——第 677 页。
- 419 《Le tiers- état c' est tout》(“第三等级就是一切”)——这里是套用艾·约·西哀士于 1789 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发表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Qu' est- ce que le tiers- état ?》)中的“什么是第三等级?——一切”一语。——第 677 页。

- 420 大卫·汉泽曼“普鲁士与法兰西”（D. Hansemann. 《Preußen und Frankreich》）。第一版于1833年出版。——第677页。
- 421 哥达党成立于1849年6月。它的成员是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即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国民议会给他加冕和国民议会左翼多数派通过关于实行全国摄政的决议之后退出法兰克福议会的右翼自由主义者。这个党由于害怕革命的胜利，力求把整个德国统一在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并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第678页。
- 422 指普鲁士于1848—1850年对丹麦进行的战争。普鲁士战败，被迫同丹麦缔结和约（1850年）。按照和约的条件，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仍旧完全归丹麦统治。——第679页。
- 423 指德国作家皮克列尔·穆斯考。1831年他在斯图加特出版了“亡人遗信”（《Briefe eines Verstorbenen》）一书。——第679页。
- 424 “十字报”（《Kreuz-Zeitung》）是反动透顶的德国日报“新普鲁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的通行的名称，该报从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喉舌。“新普鲁士报”在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第681页。
- 425 马克思把德文 Krautjunker（顽固守旧的容克地主）译作英文 fox-hunter（猎狐狸者），是因为猎狐狸是英国地主的传统消遣方式。——第683页。
- 426 潘多拉的盒子是装满罪恶和纠纷的盒子。这是一个文学典故，源出于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故事。潘多拉由于好奇，打开了装着各种各样祸害的盒子，并把这些祸害散布出来。——第690页。
- 427 “普鲁士报”（《Preussische Zeitung》）是德国日报“普鲁士总汇报”（《Allgemeine Preussische Zeitung》）的简称。该报是政府的机关报，1853年至1859年用此名称在柏林出版。——第692页。
- 428 Treubund（忠实者联盟）是1848年底普鲁士保皇派在柏林建立的反动沙文主义组织。

奥伦治会是反动的恐怖组织,是1795年爱尔兰的大地主和新教僧侣为了反对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而成立的。它纠集了社会上一切阶层的反动透顶的爱尔兰人和英国人,有计划地挑唆新教徒反对爱尔兰天主教徒,在新教徒聚居的北爱尔兰影响特别大。它的命名是为了纪念镇压过1688—1689年爱尔兰起义的奥伦治的威廉三世。——第692页。

- 429 马克思指的是杜沙尔-拉弗斯的作品“客厅纪事”(《Chroniques de l'Oeil-de-Boeuf》)。该书于1829—1833年在巴黎分八卷出版。Oeil de boeuf直译是:公牛的眼睛。凡尔赛宫中法国国王寝室前面的大客厅即以此命名。——第693页。

- 430 米兰起义(1853年2月6日)是意大利革命者马志尼的拥护者发动的,并得到匈牙利革命流亡者的支持。起义者大多数是意大利的爱国工人,以推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为目的。但是,起义是根据密谋策略组织的,并没有考虑到现实状况,很快就遭到了失败。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中对这次起义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93—594、599—602、624—626页)。

萨普里(萨累诺省)登陆是意大利革命民主主义者卡·皮萨康率领下准备在意大利南部举行起义的一支不大的队伍在1857年6月底举行的。这支军队没有能够与农民群众建立联系,没得到他们的支持,被那不勒斯军队歼灭了。——第695页。

- 431 恩格斯指的是著名意大利悲剧女演员里斯托丽在意大利的演出,她在贾科美蒂编的“犹滴”一剧中扮演圣经上的女英雄犹滴。据圣经上的传说,为了拯救自己的人民,犹滴杀死了和罗孚尼——亚述人的统帅,使犹太人能把敌人逐出国境。剧终时里斯托丽唱了一支圣歌,歌中有这样一句话:“让他们知道,要是外国人威胁祖国,战争是神圣的。”意大利的爱国者以人声沸腾的、显然是反对奥地利占领者的游行示威来响应这支圣歌。当女演员在帕尔马巡回演出的时候,帕尔马公爵夫人说帕尔马没有外国人,准许演唱整个这支圣歌。这个剧引起了观众的狂喜;此后,无论里斯托丽演什么剧,群众都要求她演唱“犹滴”中的这支圣歌,

每次演唱都激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第 697 页。

432 指蒙塔郎贝尔的论文“英国议会关于印度问题的辩论”(《Undbat sur l'Inde au Parlement anglais》), 这篇文章曾载于 1858 年 10 月 25 日“记者”(《LeCorrespondant》)杂志, 新合订本第 9 卷。——第 698 页。

433 指 1806 年 10 月 14 日普鲁士军队在耶拿附近被击溃, 结果普鲁士向拿破仑法国投降。这次败绩彻底暴露出霍亨索伦封建君主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腐朽性。——第 703 页。

434 在从 1815 年起受英国保护的伊奥尼亚群岛, 和在希腊本土一样, 争取与希腊合并的民族运动在五十年代逐渐高涨。1858 年 11 月, 格莱斯顿带着特别使命被派往伊奥尼亚群岛。虽然科尔富岛(伊奥尼亚群岛的主岛)立法议会一致表示赞成与希腊合并, 英国政府仍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拖延了许多年。只是在 1864 年伊奥尼亚群岛才被移交给希腊。

马克思所以称呼格莱斯顿为“荷马专家”, 大概是因为格莱斯顿是当时刚出版的“荷马与荷马时代的研究”(《Studies on Homer and the Homeric Age》·Oxford, 1858)一书的作者。——第 705 页。

435 1799 年俄国海军上将费·费·乌沙可夫的舰队从法国人手里解放了伊奥尼亚群岛。乌沙可夫宣布群岛成立共和国并制定了宪法, 该宪法给予伊奥尼亚群岛以广泛自治。1807 年群岛重新交由法国统治, 而拿破仑实际上废除了这部宪法。1815 年群岛转交给英国; 英国确定了对群岛的保护制度, 在那里制定了新宪法, 该宪法授予驻该群岛的英国代表——首席专员以无限权力。由于群岛对外国统治不满的日益加深, 英国政府(当时格雷在政府中担任陆军和殖民大臣职务)被迫于 1849 年在那里进行了改革, 稍微扩大了地方自治和伊奥尼亚人的选举权。——第 708 页。

436 印刷所广场是伦敦的一个广场, “泰晤士报”总编辑部所在地。——第 709 页。

437 马克思暗示得比于 1830—1833 年任爱尔兰事务大臣期间, 曾对爱尔兰

人民采取高压政策的事。根据 1833 年得比通过议会实行的暂停行使宪法保障法令 (Coercion act), 爱尔兰禁止自由集会, 宣布戒严, 设立军事法庭, 并暂停实行人身保护法 (Habeas Corpus Act)。

奥伦治会分会——见注 428。——第 711 页。

- 438 凤凰俱乐部是爱尔兰的秘密社团, 由 1848 年后被粉碎的爱尔兰革命俱乐部产生的; 它的主要成员是小职员、店员和工人。该社团同侨居美国的爱尔兰革命者有关系。1858 年, 由于芬尼亚社领袖斯蒂芬斯的宣传, 俱乐部的大多数成员都加入了秘密的芬尼亚兄弟会。——第 713 页。
- 439 里本运动 (来自英文 ribbon——带子) 是十八世纪末在北爱尔兰产生的爱尔兰农民运动。爱尔兰农民结成秘密组织, 并以佩带绿布条作为参加这些组织的标志。里本运动是人民对英国大地主的专横和暴力驱逐佃农的一种反抗形式。里本派袭击地主庄园, 谋杀他们最仇恨的大地主和管理人。但是, 里本派的活动没有任何共同的行动纲领, 纯粹是地方性的, 分散的。——第 713 页。
- 440 “每日快报” (《The Daily Express》) 是英国政府的日报, 从 1815 年在都柏林发行。——第 713 页。
- 441 “黎明伙伴” (Peep- o' - Day boys) 是反动的新教 (长老会的) 组织成员的名称,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在北爱尔兰产生, 目的是反对天主教徒。这些组织的成员, 得到大地主的公开支持; 为自身利益而挑拨和鼓励爱尔兰人宗教摩擦的英国政府也在暗中支持他们。他们通常在黎明时分 (“黎明伙伴” 由此得名) 闯进天主教徒家中, 借口搜查武器而进行捣毁。当时根据法律, 天主教徒是禁止持有武器的。
- “护教派” (《Defenders》) 是爱尔兰天主教徒组织成员的名称, 产生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 其目的是抵抗 “黎明伙伴”。——第 714 页。
- 442 指的是农民事务总委员会 (见注 396)。——第 716 页。
- 443 马克思提到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事件。1789 年 8 月 3 日夜, 法国立宪会议在汹涌澎湃的农民运动的压力下, 庄严地宣布废除一系列当时实际上已被起义农民取消了的封建义务。但是随后颁布的法

律只无偿地废除了个人徭役。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法国立宪会议于 1789 年 8 月 20 日通过的。宣言的主要一点就是宣布自由、财产等等是人的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第 719 页。

- 444 罗马教皇庇护九世为了防止人民运动的发展,在 1846 年当选以后,随即出面倡导了一系列自由主义改革(特赦部分政治犯,废除书报预检制度,等等)。——第 719 页。
- 445 马克思指的是“圣彼得堡省世袭领地地主农奴管理条例,圣彼得堡贵族委员会拟订”。马克思把这份大约于 1857 年 12 月 5 日出现的文件比做 1628 年 5 月 28 日英国议会向国王查理一世呈递的“权利请愿书”,其内容是要求大人限制国王的权力。——第 722 页。
- 446 1807 年在普鲁士曾实行一次改革,它废除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但保留一切义务和地主对农民的法庭和警察权力。尽管这次改革很不彻底,但是地主们竭力阻挠它的实现,百般反对在农村中实行自治的改革。在 1808 年,他们获得了占有农民土地的权利。虽然在 1811 年曾允许农民有权赎买封建义务,实际上农民由于苛刻的赎买条件并不总能利用这种权利。在普鲁士,农民摆脱农奴依附身份的过程拖延了许多年。——第 725 页。
- 447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柏林政治周刊”(《Berliner politisches Wochenblatt》)是极端反动的报纸,出版于 1831 年至 1841 年;该报受到皇太子弗里德里希-威廉(1840 年即位为德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支持和庇护。——第 727 页。
- 448 死手权是中世纪的封建主在农奴死收其财产的权利。由于在实际上农奴所占用的土地和财产在他死后留在他的继承人手中,所以继承人应以实物或现金向封建主缴纳一笔极沉重的贡赋,即所谓死手(main-morte)。——第 728 页。
- 449 Reichsunmittelbarer Fürst(帝国直隶诸侯)是中世纪日耳曼民族的神

圣罗马帝国存在时期直接隶属于皇帝的德意志邦君。当时普鲁士国王也属于这类邦君。——第 729 页。

- 450 本文是马克思 1857—1858 年的经济学手稿的开头部分。这批手稿到现在为止只是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 1939 年用原文发表过一次。编者在发表时加上了这样一个标题：《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

马克思在 1857 年 8 月底至 9 月中所写的“导言”是一篇没有完成的“总导言”草稿，“总导言”是为他计划中的一部经济学巨著而作的。马克思打算在这部经济学著作中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问题，同时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这一巨著计划的要点，马克思在“导言”里已经提出来了。在继续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多次改变自己的原定计划，并按照一再修改的方案写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上述的 1857—1858 年手稿就像是这两部著作的草稿。“导言”是 1902 年在马克思的文稿中发现的。1903 年在柏林由“新时代”杂志（《Neue Zeit》）用德文发表；1922 年彼得格勒出版的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第一次用俄文刊载了这一著作。——第 733 页。

- 451 指卢梭关于人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市民状态的相互关系的理论。这个理论见让·雅·卢梭“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1762 年阿姆斯特丹版（J. J. Rousseau: 《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Amsterdam, 1762）。——第 733 页。
- 452 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 年伦敦版第 1 卷第 1 分册“生产”（J. S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Vo1. I, London, 1848. Book I, 《Production》）。——第 736 页。
- 453 J. S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Vo1. I, London, 1848. Book I, 《Production》。——第 737 页。
- 454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规定即否定。马克思此处援引的斯宾诺莎的这一命题是采用黑格尔的有名的解释。斯宾诺莎自己用这个说法来表示“限制即否定”（见巴·斯宾诺莎“通信集”第 50 封信）。——第

740 页。

- 455 这里特别是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卡·格律恩。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他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方面的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610—614页）——第744页。
- 456 亨·施托尔希“论国民收入的性质”1824年巴黎版第144—159页（H. Storch: 《Considérations sur la nature du revenu national》·Paris, 1824, p. 144—159）。——第744页。
- 457 Cr édit Mobilier——见注28。——第761页。
- 458 法玛是罗马人对希腊的传闻女神俄萨的称呼，象征传播迅速的流言。——第761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56年4月—1859年1月)

1856

- 4月14日 马克思应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编辑部的邀请,参加了该报创刊四周年纪念会。他被邀请第一个讲话,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的演说。马克思指出1848—1849年革命没有最后完成,他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必然导致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胜利。4月19日“人民报”发表了马克思的演说记录。马克思曾继续以写文章和提意见来经常帮助该报编辑琼斯。
- 1856年4月下半月—
1857年3月 马克思继续进行他在1856年2月开始的关于十八世纪英俄关系的研究工作。他从英文、德文和法文的外交文件和历史文献中做了摘要,特别是摘录了莫特利、赛居尔、博伊尔等人的著作。
- 4月16日 马克思在研究德国产生新的革命高潮的前景时,进一步发挥了工人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思想。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去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寄给恩格斯一批资料,其中包括“伊戈尔远征记”。
- 4月25日左右 马克思就上院关于将约克公爵纪念伦敦滑铁卢广场迁走问题进行的辩论写了一篇文章。文章以公爵的生平

- 活动为例抨击了英国上层贵族社会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文章标题是“上院和约克公爵的纪念像”，载于4月26日“人民报”。
- 4月26日 马克思把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翰·米凯尔从德国的来信转寄给恩格斯。米凯尔在信中请马克思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对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谈谈他的看法；同时米凯尔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即无产阶级应该避免使用一切可能吓退资产阶级的手段。
- 5月初 马克思收到阿道夫·哈马赫尔从科伦写来的一封信，信中以科伦、爱北斐特和佐林根的工人的名义向马克思致意。由于科伦和杜塞尔多夫的工人组织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哈马赫尔请求马克思从伦敦派一位代表去就地商讨莱茵省的工人运动问题。马克思打算给科伦方面写信，并且为了保密起见，预备通过自己的夫人转寄。
- 5月5日至15日之间 马克思把有关科苏特的材料寄给了丹第城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伊曼特。伊曼特在他发表于某些地方报纸上的文章中利用了这部分材料。
- 5月中旬 恩格斯到爱尔兰旅行。他游历了都柏林、高尔威、里美黎克、特勒利以及其他一些城市；他指出，由于英国人进行的掠夺性战争和他们对爱尔兰施行的殖民政策，爱尔兰人民到处陷于破产和贫困。
- 5月16日左右 马克思写了一篇关于撒丁王国的国内外政策的文章。文章标题是“撒丁”，发表于5月17日“人民报”和5月31日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
- 约自5月18日至6月3日 马克思患重病，有时不能工作，医生劝他到伦敦以外的地方去休养。

- 5月23日 恩格斯从爱尔兰回到曼彻斯特,写信给马克思。信中深刻地描述了爱尔兰的状况,称爱尔兰为“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
- 6月 马克思研究了法国股份银行 *Crédit Mobilier* 的活动,并写了三篇论文。第一篇论文的标题是“法国的 *Crédit Mobilier*”,发表于6月7日“人民报”。全部文章后来以同一标题载于6月21日、24日和7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6月—9月 恩格斯读了法国军事作家巴赞库尔以波拿巴主义的观点撰写的新书“塞瓦斯托波尔尔陷落前的克里木战局”,并做了摘录,标题是:“圣阿尔诺”。
- 6月7日左右—7月中旬 马克思同皮佩尔一起离伦敦赴赫尔,又从赫尔到曼彻斯特去看恩格斯。
- 6月28日—8月2日 “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The Sheffield Free Press》)和伦敦“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这两家报纸以“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为题刊登了马克思搜集的并附以说明和注释的外交信件和文件。马克思计划撰写一本有关十八世纪英俄关系的书,本来预备以这些文件的发表作为开端。但马克思后来停止发表“内幕”,因为编辑部对文稿加以歪曲和任意删节。
- 约7月初 马克思事先同恩格斯和威·沃尔弗作了研究,然后在给米凯尔的信中详细地论述了德国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性质和动力问题。马克思说明,在未来的革命中,农民是工人阶级唯一的同盟军。他坚持必须同资产阶级进行无情的斗争。米凯尔在自己的朋友和同志们中间传阅了马克思的信。
- 7月25日—8月初 由于马德里发生了七月革命事件,马克思写了两篇描述和评价1856年西班牙革命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论载

- 于 8 月 8 日和 1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8 月初 恩格斯的表兄弟埃·布兰克建议为因参加 1848—1849 年革命而在德国被通缉的恩格斯向普鲁士当局申请赦免，恩格斯予以回绝。
- 8 月下半月 恩格斯到伦敦探望在英国小住的母亲。
- 1856 年 8 月 16 日—
1857 年 4 月 1 日 伦敦报纸“自由新闻”以“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为题，发表了马克思为计划撰写的关于十八世纪英俄关系一书所做的长达五个印张的序言。同第一次在“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和“自由新闻”上发表的“内幕”不同，这次刊登得比较完全。序言的很大部分包括外交信件、文件和历史论文。马克思计划用二十个印张的篇幅撰写的这本著作没有完成。
- 8 月 31 日左右 马克思从威·沃尔弗那里得知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德国无产阶级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在哈瓦那逝世的消息。
- 9 月 8 日左右—12 月 马克思因夫人患病和迁移新居而忙于家务，这占去马克思很多时间，所以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少。
- 9 月中旬 马克思收到德纳退回来的恩格斯关于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十五篇和马克思本人所写的关于多瑙河各公国的文章三篇。这些文章因“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该报编者、泛斯拉夫主义者古罗夫斯基的影响下未予发表。
- 9 月 22 日 马克思同美国普特南出版公司的代表奥姆斯特德会见。会见时在座的有德国诗人、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斐·弗莱里格拉特，马克思在伦敦与弗莱里格拉特经常往来。奥姆斯特德请马克思针对巴赞康尔的那本书撰文论述克里木战争，并写一些关于“攻堡战舰”以及

- 其他军事题目的文章。此外他还请马克思撰写关于不久前逝世的亨·海涅的文章。
- 9月26日左右—
10月17日左右 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开始发生危机，马克思最初就这个题目写了四篇文章。其中三篇作为社论发表于10月9日、27日和11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一篇作为通讯以“欧洲的金融危机”为题于10月15日发表。
- 9月26日 恩格斯告诉马克思，他打算为格奥尔格·维尔特写一篇追悼文，交给一家柏林报纸发表。他谈到自己对日益临近的经济危机的征兆和前景的感想，推测危机将在1857年夏天爆发。
- 10月 鉴于经济危机日益临近，马克思重新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特别着重研究了白银问题。
- 10月初 马克思迁往伦敦比较适合于健康的地区居住。住址是：汉普斯泰德路，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花园，格拉弗顿坊9号。
- 10月3日以后 马克思收到德国流亡者理·莱茵哈特从巴黎寄来的Crédit Mobilier的年度报告，并在写文章时加以利用。
- 1856年10月下半月—
1857年3月 马克思研究了波兰的历史，对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革命中的波兰问题特别注意，他得出结论说，从1789年起，所有革命的强烈程度和生命力，都可以根据它们对待波兰的态度相当准确地衡量出来；他读了梅洛斯拉夫斯基的“波兰在欧洲均势中的作用”一书和列列韦尔的“波兰史”第1卷、“论昔日波兰的政治状况及其人民的历史”。
- 10月30日左右 恩格斯写完了论巴赞库尔那本书的文章，文章标题是“圣阿尔诺”。马克思对这篇文章评价很高，并把它投给纽约杂志“普特南氏月刊”（《Putnam's Monthly》）

- 编辑部；但是文章未予发表。
- 10月30日 鉴于英国政府准备出兵远征波斯湾，夺取哈腊克(哈尔格)岛，马克思写了一篇关于波斯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揭露了英国在亚洲的侵略性的对外政策。“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文章大加删节，直到1857年1月7日才作为社论刊登出来。
- 11月7日左右和
11月21日左右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两篇关于欧洲金融和贸易危机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论于11月22日和12月6日在该报发表。
- 11月下半月 恩格斯为了准备给“普特南氏月刊”写一组文章而研究了有关海军方面的文献，读了威·詹姆斯的“英国海军史”一书，这主要是为了写“攻堡战舰”这个题目。
- 11月17日 恩格斯告诉马克思一系列事实，这些事实证明欧洲金融危机的尖锐化，法国危机的迫近，拿破仑第三的冒险政策和正在法国形成的有利于发动革命的条件，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策略。
- 11月底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两篇关于奥地利的经济论文。文章标题是“奥地利的海外贸易”，于1857年1月9日和8月4日先后发表。
- 12月2日左右 鉴于普鲁士同瑞士之间因纽沙特尔问题发生了冲突，马克思研究了普鲁士的历史。他把自己对普鲁士历史的许多批评意见告诉了恩格斯，并就这方面的问题写了一篇文章，文章标题是“霍亨索伦王朝的神权”，发表于1856年12月13日“人民报”和1857年1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1857

- 1月—2月 马克思写文章(没有写完)批驳布鲁诺·鲍威尔所写的

- 关于俄国和英国的小册子。同时马克思还研究了俄国的历史,并做了 973 年至 1676 年的俄国历史事件一览表,读了拉勒斯泰德的“斯堪的那维亚,它的忧患和希望”一书。
- 1 月—3 月 恩格斯为营业所的工作所累,差不多根本没有时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文章。
马克思研究了雷尼奥的“多瑙河各公国政治社会史”,并做了摘录。
- 1 月 7 日 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寄去一篇关于英中在广州发生冲突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详细地分析了作为在中国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的中国走私船“亚罗号”事件。文章作为社论于 1 月 23 日在该报发表。
- 1 月 10 日左右 恩格斯就纽沙特尔问题所引起的普鲁士和瑞士的冲突,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山地战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论于 1 月 27 日在该报发表。
- 1 月下半月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第二篇关于山地战的文章。马克思写了一篇金融论文。两篇文章都没有发表。
- 1 月 20 日 马克思告诉恩格斯,“纽约每日论坛报”约有三个星期没有刊登他和恩格斯所写的文章。
- 1 月 27 日左右—2 月初 鉴于英国和波斯发生战争,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英国对波斯的侵略计划的文章,恩格斯写了一篇展望英波战争的文章;两篇文章都作为社论于 2 月 14 日和 19 日在该报发表。
- 2 月 5 日 马克思收到米凯尔的信,信中约请他为汉堡杂志“世纪”(《Das Jahrhundert》)撰稿。但马克思因该杂志具有小资产阶级倾向而予以谢绝。

- 2月6日 马克思写信给德纳,要求解释“纽约每日论坛报”很少刊登他的文章的原因,并表示打算脱离该报。
- 2月中旬—7月初 马克思继续研究经济方面的文献,特别是图克的刚刚问世的“价格史”第5卷和第6卷、麦克劳德的“银行业务的理论与实践”,并从这些著作中做了摘录。
- 2月20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题为“英国的新预算”的文章。文章于3月9日在该报发表。
- 2月27日 马克思写了“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一文。文章载于3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3月—7月 马克思由于夫人健康状况大大恶化以及物质生活条件极端困窘,只能勉强从事工作。由于没有钱而付不出房租。4月间马克思自己也病了。
- 3月6日—4月7日 由于英国进行新的议会选举,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五篇文章:“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英国即将到来选举”、“英国的选举”、“科布顿、布莱特和基卜生的失败”和“选举的结果”。文章于3月25日、31日,4月6日、17日、22日在该报发表。
- 3月18日左右 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俄国对华贸易的文章。文章于4月7日作为社论发表。
- 3月21日 马克思接到德纳于3月5日的来信。德纳在信中请马克思不要脱离“纽约每日论坛报”,他答应马克思每周只照付一篇文章的稿酬,不论它发表与否;其余的文章则发表后才付稿酬。这样,该报编辑部就把马克思的稿酬折掉了一半。马克思由于物质生活状况困难,被迫同意这些条件。
- 3月22日左右 马克思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英中在广州发生冲突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论于4月10日在该报发表。

- 4月初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文章,论述英国人因英中冲突而派兵征讨中国的可能性;他在文章中阐释了在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起因和过程。文章作为社论于4月17日在该报发表。
- 4月7日和10日 由于公布了1856年度英国工厂视察员的报告,马克思写了“工厂工人状况”和“英国工厂制度”两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揭露了英国工厂主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文章载于4月22日和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4月14日和28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新选出的下院的文章,其中谈到曼彻斯特学派、辉格党和托利党,还写了一篇关于奥地利的文章。两篇文章都没有发表。
- 4月16日左右 恩格斯应病中的马克思的请求,写了一篇关于克里木战争结束后俄国军队实行改革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论发表于5月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4月21日 马克思接到德纳于4月6日的来信。德纳在信中约请马克思为他所筹划的一部百科辞典——“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要马克思撰写军事方面以及某些其他方面的条目。马克思先同恩格斯研究以后,复信表示同意。
- 4月底—10月 恩格斯由于长久患重病,因此对于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军事评论文章不能给予经常的帮助。
- 5月 马克思学习瑞典文和丹麦文。
- 5月1、12和15日 马克思写了三篇金融论文,论述英国皇家银行的投机活动和法国的股份银行Crédit Mobilier。其中一篇以“英国的金融舞弊”为题,作为通讯发表于5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另外两篇则作为社论于5月30日和6月1日发表。

- 5月20日左右 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波斯和中国”一文。文章于6月5日在该报发表。
- 5月23日 马克思收到德纳在5月8日的来信。信中附有“美国新百科全书”第1卷《A》字头的军事条目单子,并请马克思特别注意“军队”和“炮兵”这两条;德纳还要马克思以英美读者易于接受的方式撰写有关美学的条目。他询问马克思是否同意供给关于欧洲工商界名人的稿子。马克思向恩格斯了解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
- 5月26日 马克思写了对奥当奈尔在西班牙参议院就西班牙1854年革命时期的事件所做的演说的批评意见。马克思的这些批评意见以“有趣的揭露”为题,载于6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5月28日 恩格斯把他要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A》字头军事条目单子寄给马克思。
- 5月底—6月 由于德纳要求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关于美学的条目,马克思研究了弗·费舍、E·弥勒等人的著作。
- 1857年6月—
1858年2月 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同时,马克思为了给“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稿,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里进行了许多搜集资料的工作。他研究了古代的(埃及和亚述的、古希腊罗马的)军事史,并从威金逊、克劳塞维茨、施洛塞尔、缪弗林等人的著作中做了札记和摘录。
- 6月上半月 恩格斯到伦敦。
- 6月2日和12日 马克思写了一篇关于新的法兰西银行法的文章;由于英国和波斯的战争结束,他又写了一篇关于3月4日在巴黎签订的英波和约的文章。前一篇作为社论,后一篇以“与波斯签订的条约”为题作为通讯,载于6月20日和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 6月19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文章。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注明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英国的伪善”。文章没有发表。
- 约6月27日 马克思收到德纳寄来的“美国新百科全书”《B》字头所需条目的单子。
- 6月29日 马克思把德纳于6月11日的来信转寄给恩格斯。德纳在信中不主张写“关于堡垒和战舰”的文章，因为“普特南氏月刊”的新编辑部不保证刊登这种文章。德纳还退回了恩格斯就巴赞库尔那本书所写的、未被编辑部采用的文章“圣阿尔诺”。
- 6月30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印度军队起义的文章。从这篇文章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一大组文章论述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这篇文章作为社论于7月15日发表。
- 7月 马克思撰写一篇经济论文，反驳庸俗经济学家、主张阶级利益和谐的“理论家”巴师夏和凯里。论文没有完成。
- 1857年7月—
1858年3月 为了给“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稿，恩格斯研究了吕斯托夫、凯、若米尼、克劳塞维茨以及其他人的著作，并做了摘录。
- 7月10日 马克思写了一篇关于欧洲局势的文章。文中特别阐释了法国财政状况的问题。文章作为社论发表于7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7月10日左右—24日 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第一批《A》字头条目。马克思于7月24日将它们寄往纽约。这些条目于1858年发表。
- 7月14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对他的健康状况恶化表示非常担心，劝恩格斯立即放下营业所的工作，到海滨去

- 疗养，还劝他停止为百科全书撰稿。
- 7月17日—8月14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五篇关于印度起义的文章。这些文章都作为通讯于8月4日、14日、18日和29日发表。标题是：“印度起义”、“印度问题”、“印度起义的现状”、“印度起义”；其中一篇无标题。
- 7月24日—28日 马克思为了给“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稿而搜集有关西班牙舰队的资料；关于这个问题他做了大量的摘录，并把这些摘录寄给恩格斯。
- 7月28日—11月6日 恩格斯在利物浦附近的滑铁卢、威特岛和泽稷岛等地海滨疗养。
- 8月 恩格斯着手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军队”条。
- 8月上半月 马克思因恩格斯患病而研究了法、英、德等国的最新医学文献资料，以寻求对恩格斯所患病症的说明和治疗方法。
- 8月7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印度起义”一文。文章没有发表。
- 8月10日左右 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完“阿富汗”和“攻击”两个大条目以及差不多所有其余的《A》字头条目；所有这些条目都寄给了马克思，以便寄往纽约。这些条目于1858年发表。
- 8月11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文论述欧洲列强围绕着莫尔达维亚的选举问题所进行的外交斗争。文章标题是“东方问题”，于8月27日发表。
- 8月中旬 从美国回来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康拉德·施拉姆拜访了马克思。
- 8月21日 马克思就帕麦斯顿在下院的演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欧洲政治形势述评。述评作为社论于9月5

- 日发表。
- 8月26日 马克思把德纳拟出的“美国新百科全书”《B》字头所需条目的单子寄给了恩格斯。
- 8月28日—10月30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八篇文章,论述印度起义、英国驻印当局对印度人民实行的压迫政策和东印度公司。其中七篇作为社论于9月15日、17日、21日,10月3日、13日、23日和11月14日发表;一篇作为通讯,以“印度起义”为题,于9月16日发表。
- 8月底—9月中旬 马克思着手写作他的经济学巨著,草拟了这一著作的“导言”。“导言”简要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法的关系、家庭关系以及其他等等关系之间的辩证联系问题。马克思在“导言”中还简单地说明了自己对经济现象的研究方法的实质。他在“导言”的末尾拟出了他的整个经济学著作计划的基本要点。“导言”没有写完。
- 9月—10月 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了不下十八个条目,其中包括“阿尔及利亚”条;马克思也在同时给百科全书写完了“舰队”条和九篇军事活动家的传记以及革命家罗·勃鲁姆和约·贝姆的传记;所有这些条目差不多都是同恩格斯合写的。条目于1858年发表。
- 9月8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法国的银行Crédit Mobilier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论于9月26日在该报发表。
- 9月15日—10月23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两篇关于印度起义的文章和五篇关于波拿巴的财政政策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没有发表。
- 9月21日左右 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完“交战”这一大条目。

- 该条于 1858 年发表。
- 9月24日左右 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完“军队”条。在这一条以及其他军事条目中，恩格斯第一个从唯物主义立场阐释了军事学术的全部历史，远起上古时代，近至与他同时的资产阶级军队。该条于 1858 年发表。
- 9月25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对他所写的“军队”条给予很高的评价，同时提醒恩格斯注意某些在条目中没有阐明的问題。
- 1857年10月—
1858年2月底 马克思详细地研究了普遍的经济危机的发展，搜集了大量有关英、美、德、法以及其他国家的危机过程的材料。马克思做了摘录、剪报，在报刊文章中标划重点，同时准备了专题笔记本，记录这些国家的危机所引起的主要过程和现象；他同恩格斯在通信中讨论了危机问题，恩格斯向他提供了许多有关曼彻斯特的危机发生过程及其后果的材料。
- 10月 马克思写了“货币”这一章，揭露了蒲鲁东关于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实行“劳动货币”制的思想的空想性质，阐释了自己的价值理论和货币学说的基本原理。
- 10月初 马克思到圣黑利厄尔（在泽稷岛）去看恩格斯，并探望正在患结核病的康拉德·施拉姆，这时施拉姆的经济极为困难。马克思答应介绍他为美国报刊写通讯稿。
- 10月6日 恩格斯把“美国新百科全书”的《C》字头所需条目的单子寄给马克思。
- 10月6日—29日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屡次谈到哈尼在泽稷的生活情况和康拉德·施拉姆的健康状况。恩格斯在圣黑利厄尔居住时常常同他们见面。
- 10月26日 马克思收到德纳于 10 月 13 日的来信。信中说，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解聘了除马

- 克思和布·泰勒以外的所有欧洲通讯员；要求马克思每周只写一篇文章，同时最近时期主要写关于印度战争和关于危机的稿子。
- 1857年11月—
1858年1月初 马克思在报纸上非常注意厄·琼斯的政治活动。琼斯由于希望在议会中获得席位，越来越向资产阶级激进派让步。马克思打算去拜访琼斯，向他敲一下警钟，但是，由于他继续发表机会主义的言论，马克思放弃了自己的打算。
- 1857年11月—
1858年6月 马克思写了内容广博的“资本”这一章，在其中相当详细地分析了资本的一系列的重要问题，并粗略地阐释了他的剩余价值学说的原理。在“资本”这一章的开头，马克思草拟了他的经济学著作的计划，他准备在这部著作中考察如下几个问题：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
- 11月6日 恩格斯经过长时间的海滨疗养以后回到曼彻斯特。
- 11月6、13和27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三篇关于英国经济危机的文章。两篇作为社论于11月21日和12月15日在该报发表，一篇作为通讯，以“英国贸易的震荡”为题于11月30日发表。
- 11月15日 恩格斯把自己对于经济危机发展过程的观察告诉了马克思，他谈到经济危机在英国的表现、危机对人民群众的革命化的影响，他说革命已经在望，因此正在加紧研究军事。
- 11月16日 应马克思的请求，恩格斯写了一篇关于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主要中心之一——德里城被英军攻占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论发表于12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11月24日以后 马克思从伊曼特那里得到消息说，在科伦审判案中被判处监禁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贝克尔和赖夫获释

- 出狱，消息又说毕尔格尔斯、诺特容克和勒泽尔还要在狱中监禁一年。
- 11月26日左右 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完关于炮兵史的一个大条目。这一条以“炮兵”为题于1858年发表。
- 12月4、18和25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三篇关于欧洲危机的文章。这些文章作为社论于1857年12月22日和1858年1月5日、12日在该报发表。
- 12月11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英国的生产和在英国日益临近的工业危机的文章。文章没有发表。
- 12月18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表示想同恩格斯合写一本论危机的小册子，计划到1858年春天用德文出版。
- 12月21日 马克思接到维也纳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新闻报”（《Die presse》）编辑麦克斯·弗里德兰德通过拉萨尔转来的约稿信。弗里德兰德约请马克思从伦敦给该报寄发通讯。由于该报赞同帕麦斯顿的政策，马克思没有答应写政论文章。
- 12月25日 马克思把自己关于法国危机发展的结论写信告诉恩格斯。

1858

- 1月上半月 马克思在探讨利润问题时，重新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表示，如果有时间，他“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常人的理智都能够理解”。
- 1月4日和14日 恩格斯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两篇关于印度起义第二个大中心——勒克瑙的围困和强攻的文章。前一篇

-
- 作为社论,后一篇以“勒克瑙的解救”为题,作为通讯于1月30日和2月1日在该报发表。
- 1月7日左右 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英国的贸易”一文,文章于2月3日发表。
- 1月7日 恩格斯写完了“美国新百科全书”的《C》字头所需的第一批条目。这些条目于1859年发表。
- 1月8日—28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了约十一个条目。这些条目于1858—1859年发表。
- 1月22日 马克思写了“即将发行的印度公债”一文。该文发表于2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1月23日 马克思告诉恩格斯:德纳要求给百科全书写一篇关于印度起义历史的小条目。但是由于缺乏资料,马克思不主张恩格斯写这一条;恩格斯在回信中建议以后再写这个条目。
- 1月29日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请他解释各种企业中资本周转的问题和资本周转对利润和价格的影响问题。
- 1月29日—5月 马克思读了拉萨尔的“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并在给恩格斯和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予以批评;认为这本书是用老黑格尔主义的精神写的,是“非常幼稚的粗糙的作品”。
- 2月2日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英国温德姆将军在印度战败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论于2月20日在该报发表。
- 2月5日—26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四篇文章,论述拿破仑第三的国内政策、波拿巴政府的财政措施和法国的经济危机、英法联盟。三篇文章作为社论于2月22日、3月12日和15日发表,一篇作为通讯,以“御用军人

- 的统治”为题于3月12日发表。
- 2月10日 马克思收到弗莱里格拉特转交来的一位参加过1848—1849年革命、住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弗里德里希·康姆从纽约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在纽约建立了一个由三十人联合组成的德国共产主义协会。康姆寄来一份协会的章程,并向马克思询问欧洲共产党,特别是德国共产党的状况,同时还向马克思索寄最近五年中发表的共产主义文献和若干份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马克思准备在未从恩格斯、沃尔弗、弗莱里格拉特和伊曼特那里把康姆了解清楚以前,不作答复。
- 2月22日 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托他打听有无可能在柏林出版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马克思打算分别出版自己的论著,因为他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来写成整整一部书;马克思把自己写作的总计划告诉了拉萨尔,同时还告诉他,同意每星期为维也纳的“新闻报”写一篇关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金融和贸易的文章。
- 3月初 马克思为了探讨工业再生产的周期而研究机器磨损问题,特别是阅读了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工业的经济”,请恩格斯说明机器设备更新的间隔时间平均有多久。
- 3月2日 马克思提醒恩格斯注意他们的信件被警察偷看。
- 3月4日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详细地解释了生产过程中机器设备的折旧问题。
- 3月9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迪斯累里在下院的演说的文章;文章没有发表。
- 3月11日—4月22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七篇关于拿破仑第三的国内政策和关于英法联盟的文章。文章标题是:“时代的表征”、“波拿巴目前的状况”、“佩利西埃在英国的使命”、“马志尼和拿破仑”、“伦敦的法国人审判案”、

-
- “英法联盟”,这些文章先后于3月30日,4月1日、15日、27日,5月8日、11日发表;还有一篇没有标题的文章,于4月30日发表。
- 3月下半月—4月 马克思的肝炎发作,因此不能够从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述。
- 3月29日 马克思得到拉萨尔的通知说,柏林出版商敦克尔答应印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头两分册。
- 4月2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明了他的经济学著作的详细计划。著作将包括六册:“(1)资本;(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
一、资本共分四篇:(a)资本一般(这是第一分册的题目)。(b)竞争……(c)信用……(d)股份资本……”第一册第一篇“资本一般”将包括三章:1.价值、2.货币、3.资本。
- 4月15日和5月8日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两篇关于英国军队攻占勒克瑙的群情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论于4月30日和5月25日在该报发表。
- 4月20日和30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迪斯累里先生的预算”和“几份重要的英国文件”两篇文章,文章于5月7日和20日在该报发表。
- 4月29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强调在俄国开展的农奴解放运动的重要意义。
- 5月6日—24日左右 马克思到曼彻斯特与恩格斯同住。马克思为了恢复健康而从事体育锻炼和骑马活动;他同时也从事“资本”这一章的写作。
- 5月14日和25日 由于印度总督坎宁勋爵宣布没收参加印度起义的奥德土地所有者的土地,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

- 两篇论述奥德王国的被兼并和印度土地占有制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论于5月28日和6月7日在该报发表。
- 5月27日 马克思写了一篇论述波拿巴的财政手腕和法国加强军事专制的文章；文章未加标题载于6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5月底—7月6日 恩格斯写了三篇关于印度起义的文章。这些文章都作为社论发表于6月15日、26日和7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5月31日 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托拉萨尔告诉出版商敦克尔，他由于患病，延期交出他的经济学著作的第一分册的稿子，他保证将加紧进行工作；在同一封信里，马克思还谈了他对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的意见，指出该书的重要缺点。
- 6月—8月初 马克思因夫人和女儿爱琳娜患病，非常需要钱。经过弗莱里格拉特帮忙，用恩格斯出面的期票弄到一笔钱以后，立即送夫人到兰兹格特去疗养和休息几个星期。
- 6月上半月 马克思为他在1857年8月和1858年6月之间所写的经济学文稿编制索引。
- 6月8、11和18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三篇关于英国的文章。两篇作为通讯，以“英国的贸易状况”和“英国政府和奴隶贸易”为题，于6月21日和7月2日发表，一篇作为社论于6月24日发表。
- 6月21日左右 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完“骑兵”这一大条目。这个条目于1859年发表。
- 6月23日 马克思就布莱特在下院的演说写了一篇关于印度税收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论发表于7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 6月底左右 马克思在弗莱里格拉特的住所同匈牙利革命家克拉普卡会见。
- 7月2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魏德迈从美国写来的信。魏德迈向马克思介绍纽约的阿尔勃莱希特·康普，还述说了美国工人运动的状况以及在美国成立无产阶级常设机构的困难。
- 马克思同时也收到了康普从纽约写来的信。康普向马克思介绍了他和弗里德里希·康姆共同创立的德国共产主义协会。康普请求把在美国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所必需用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这一著作，以及若干份“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寄给他，并要求同协会保持经常的联系。
- 7月9日 马克思写了一篇文章，论述下院通过的关于取消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最高权力的法案。文章作为社论发表于7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7月14日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把自己研究比较生理学、物理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情况告诉马克思。恩格斯得出结论说，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越来越证明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的研究自然界是正确的。恩格斯在以后几年仍继续研究自然科学。
- 8月初—11月中旬 马克思从事自己的经济学著作第一分册的写作，他重新写了货币这一章。为了写这一章，他读了麦克拉伦的刚刚问世的著作“货币流通史大纲”。
- 8月6日和10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两篇关于1844年罗伯特·皮尔的银行法。文章作为社论于8月23日和28日在该报发表。
- 8月17日和20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两篇关于中国和关于

- 古巴奴隶买卖的文章；文章没有发表。
- 8月31日—9月28日 马克思写了四篇关于对华鸦片贸易史和关于天津和约的文章。三篇文章作为社论，另外一篇以“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为题作为通讯，先后载于9月20日和25日，10月5日和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9月14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英国的贸易和金融”一文。文章于10月4日在该报发表。
- 9月17日左右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印度起义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论于10月1日在该报发表。
- 9月20日和21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论述对华条约的文章和一篇批评马志尼的新宣言的文章。前一篇没有发表。马克思批评宣言的那一篇以“马志尼的新宣言”为题载于10月1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10月1日、12月29日和31日 马克思写了三篇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问题的文章。一篇作为社论，其他两篇以“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为题，作为通讯，载于1858年10月19日和1859年1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10月2日—12月4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十篇关于普鲁士国内政策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普鲁士国王的疯癫症”、“普鲁士的摄政”、“普鲁士状况”、“新内阁”，先后于10月23日、27日，11月3日、8日、24日、27日和12月3日、13日、27日发表。
- 10月7日 恩格斯就琼斯走上同资产阶级自由派密切合作的道路一事，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揭示了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根源。恩格斯把英国工人运动中宪章运动的低落和机会主义的暂时胜利，直接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同英国占有广大殖民地联系起来。

- 10月8日—21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相互通信中讨论大陆上无产阶级运动的前景。
- 11月2日左右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对蒙塔郎贝尔的起诉”一文。文章于11月24日在该报发表。
- 1858年11月中旬—
1859年1月21日 马克思写了新的一章：“商品”，修改了货币这一章，对全部手稿进行整理和最终定稿；他给这批稿子加上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一册。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然后寄交柏林出版商敦克尔。第一分册从原定的五六个印张扩充为十二个印张，并且不像预计的那样包括三章，而是两章：“商品”和“货币或简单流通”。第三章“资本一般”，马克思决定在第二分册里发表。
- 11月19日左右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法国波拿巴政府的粮食价格调整计划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论于12月15日在该报发表。
- 11月底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文章，对1858年欧洲的社会政治运动做了总结；同时他指明了欧洲的普遍政治觉醒的征兆。文章作为社论于12月23日在该报发表。
- 12月14日和21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英中和约的文章和一篇关于布坎南的信件的文章。两篇文章都没有发表。
- 1858年12月17、29日
和1859年1月11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下面几篇文章：“伊奥尼亚群岛问题”、“爱尔兰的惶恐”和“普鲁士状况”，这些文章先后于1859年1月6日、11日和2月1日在该报发表。

人名索引

三 画

小皮特, 威廉 (Pitt the Younger William 1759—1806) ——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 曾任首相 (1783—1801、1804—1806)。——第 7、9、432、435、457、480、559 页。

大卫·丹热, 比埃尔·让 (David d'Angers, Pierre Jean 1788—1856) —— 著名的法国雕塑家, 左派共和主义者, 1830 年和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逐出法国。——第 85 页。

大胆查理 (Karl der Kühne 1433—1477) —— 勃艮第公爵 (1467—1477)。——第 105 页。

大莫卧儿——见巴哈杜尔·沙赫二世。

大莫卧儿王朝 (Great Moguls) —— 印度钵诃沙赫的王朝 (1526—1858)。——第 127、259 页。

土孔尼 (Tukony) (又名塞里姆·阿加 Selim-aga) —— 在土耳其的匈牙利流亡者。——第 594、597 页。

四 画

文翰, 赛米尔·乔治 (Bonham, Samuel George 1803—1863) —— 英国殖民官员, 1847—1852 年任香港总督, 同时负责处理对华外交事务并监督对华贸易。

——第 115、177 页。

丹纳尔, 路易莎·克里斯蒂娜 (Danner, Luise Christine 1815—1874) —— 女伯爵, 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门悬殊的配偶。——第 290 页。

邓达斯, 亨利 (Dundas, Henry 1742—1811) —— 英国国家活动家, 曾任苏格兰检察长 (1775—1783), 内务大臣 (1791—1794), 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 (1793—1801), 陆军大臣 (1794—1801), 海军首席大臣 (1804—1805)。——第 7 页。

扎莫伊斯基, 弗拉基斯拉夫 (Zamojski, Wladislaw) —— 伯爵, 波兰大地主, 曾参加 1830—1831 年起义; 起义被镇压后成为在巴黎的波兰君主主义保守派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 克里木战争时企图组织波兰军团参加反对俄国的战争。——第 512、515 页。

孔查, 曼努埃尔·古蒂埃雷斯·德·拉 (Concha Manuel Gutiérrez de la 1808—1874) —— 西班牙将军, 属于温和派; 1843 年反埃斯帕特罗密谋的参加者, 镇压 1854—1856 年资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之一。——第 42、50 页。

比埃里, 朱泽培·安得列阿 (Pieri, Giuseppe Andrea 1808—1858) —— 意大利革命家, 因与奥尔西尼共同谋刺拿破仑第三而被处死。——第 442 页。

- 比埃特里, 比埃尔·玛丽 (Pietri, Pierre Marie 1809—1864) —— 法国政治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巴黎警察局长 (1852—1858)。——第 419、438 页。
- 日拉丹, 艾米尔·德 (Girardin, Emile de 1806—1881) —— 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在三十至六十年代断续担任“新闻报”编辑; 在政治上毫无原则。——第 81 页。
- 日罗姆——见波拿巴, 日罗姆。
- 日罗姆·拿破仑——见波拿巴, 日罗姆。
- 戈东诺夫, 波利斯 (Годунов, Борис 1551 左右—1605) —— 俄国沙皇 (1598—1605)。——第 716、717 页。
- 戈登, 亚历山大 (Gordon, Alexander) —— 英国上校, 阿伯丁勋爵之子。——第 9 页。
- 戈登, 阿瑟·查理·汉密尔顿 (Gordon, Arthur Charles Hamilton 1829—1912) —— 英国国家活动家, 皮尔派, 后为自由党人; 1854—1857 年为议会议员; 1861 年至 1890 年历任英国各殖民地总督; 阿伯丁勋爵之子。——第 194 页。
- 戈登, 詹姆斯·威洛比 (Gordon, James Willoughby 1773—1851) —— 英国上校, 1804—1809 年为约克公爵的军务秘书。——第 9 页。
- 戈登, 约翰 (Gordon, John) —— 英国少校, 1801 年在多米尼加岛驻军中供职。——第 9 页。戈登, 罗伯特 (Gordon, Robert 1791—1847) —— 英国外交家, 曾任驻君士坦丁堡 (1828—1831) 和驻维也纳 (1841—1846) 的特派大使。——第 9 页。
- 巴哈杜尔·沙赫二世 (Bahadur-Shah 1767—1862) —— 印度大莫卧儿王朝最后一个钵谟沙赫 (1837—1858); 从 1849 年起靠英国人供养, 实际上被剥夺了政权; 1857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被起义者重新立为皇帝; 1857 年 9 月德里陷落后被英军逮捕并流放到缅甸 (1858)。——第 259、323、334 页。
- 巴师夏, 弗雷德里克 (Bastiat, Frédéric 1801—1850) —— 法国庸俗经济学家, 资本主义的热心辩护者。——第 734 页。
- 巴罗, 阿道夫 (Barrot, Adolphe 1803—1870) —— 法国外交家, 1845 年任驻埃及总领事。——第 249 页。
- 巴罗, 奥迪隆 (Barrot, Odilon 1791—1873) —— 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1848 年 2 月以前是自由主义王朝反对派首领; 1848 年 12 月至 1849 年 10 月领导为各个君主专制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内阁。——第 256、698 页。
- 巴罗什, 比埃尔·茹尔 (Baroche, Pierre Jules 1802—1870) —— 法国政治活动家, 法学家,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波拿巴主义者; 1851 年政变前后曾数度入阁。——第 421 页。
- 巴纳德, 亨利·威廉 (Barnard, Henry William 1799—1857) —— 英国将军, 1854—1855 年参加克里木战争; 1857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指挥一支围攻德里的英国军队。——第 269、273—276、283、284、286、297—299、328 页。
- 巴夏礼, 斯密斯 (Parkes, Harry Smith 1828—1885) —— 英国外交家; 任驻广州领事时制造了成为第二次对华鸦片战争 (1856—1858) 序幕的英中冲突; 驻广州的三个欧洲监察员之一 (1858—1859、1860—1861), 驻上海领事

- (1864—1865)、驻日公使(1865—1883)。——第112—114、149、150、164、176—177页。
- 巴尔贝斯,阿尔芒(Barbès, Armand 1809—1870)——法国革命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法国1848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第3页。
- 巴拉盖·狄利埃,阿希尔(Baraguayd' Hilliers Achille 1795—1878)——法国元帅,拿破仑第一各次征伐的参加者,后来转向波旁王朝;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会议成员,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430页。
- ## 五 画
- 瓦扬,让·巴蒂斯特·菲利贝尔(Vaillant, Jean Baptiste Philibert 1790—1872)——法国元帅,波拿巴主义者,曾任陆军大臣(1854—1859)。——第429页。
- 瓦吉德·阿利·沙赫(Wajid Ali-shah)——奥德国王(1847—1856)。——第503页。
- 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弗兰茨·利奥(Waldeck, Benedictus Franz Leo 1802—1870)——德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职业是律师;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和左派领导人之一;后为进步党人。——第652、690页。
- 瓦尔德斯(Valdez)——西班牙将军,1854—1856年革命的参加者。——第45、46、545页。
- 瓦列夫斯基伯爵,亚历山大·弗洛里安·约瑟夫·科伦纳(Walewski, Alexandre Florian Joseph Coloma 1810—1868)——法国外交家和国家活动家,拿破仑第一和波兰的瓦列夫斯卡娅伯爵夫人的儿子;曾参加1830—1831年波兰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曾任外交大臣(1855—1860);主持过巴黎会议(1856)。——第19、435页。
- 包令,约翰(Bowring, John 1792—1872)——英国政治活动家,边沁的信徒,自由贸易派,高级殖民官员 1847—1852年任驻广州领事,1854—1857年任香港的总督、总司令和海军副司令,同时负责处理对华外交事务并监督对华贸易;促成1856—1858年第二次对华鸦片战争的爆发。——第113、149—153、157、159、164、176、310页。
- 边沁,耶利米(Bentham, Jeremy 1748—1832)——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功利主义理论家。——第150页。
- 白金汉公爵,亨利·斯泰福(Buckingham, Henry StJohn 1454左右—1483)——英国封建主,曾助理查三世登上王位,后叛变被处死。——第161页。
- 汉利,约瑟夫·沃讷(Henley, Joseph Warner 1793—1884)——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贸易大臣(1852、1858—1859)。——第663页。
- 汉特,弗里曼(Hunt, Freeman 1804—1858)——美国政论家,“商人杂志和商业评论”的出版者。——第585页。
- 汉泽曼,大卫(Hansemann, David 1790—1864)——德国大资本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1848年3—9月任普鲁士财政大臣,实施同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第677、678页。
- 加内特,耶利米(Garnett, Jeremiah 1793—1870)——英国记者,“曼彻斯特卫报”

- 的创办人之一, 1844年至1861年任该报编辑。——第184页。
- 加尔涅-帕热斯, 路易·安都昂 (Garnier - Pagès, Louis Antoine 1803—1878) ——法国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1848年为临时政府委员。——第264页。
- 加尔涅-帕热斯, 埃蒂耶纳·约瑟夫·路易 (Garnier - Pagès, Etienne Joseph Louis 1801—1841) ——法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30年革命后领导共和党反对派; 众议院议员 (1831—1834、1835—1841)。——第264页。
- 叶名琛 (卒于1859年) ——中国国家活动家, 曾任两广总督 (1852—1857)。——第112—117、159、177、662页。
- 叶卡特林娜二世 (Екатерина 1729—1796) ——俄国女皇 (1762—1796)。——第110、167、651、717页。
- 古列阿, 伊格纳西奥 (Gurrea, Ignacio) ——西班牙将军, 进步派。——第46页。
- 古斯塔夫二世奥道夫 (Gustav Adolf 1594—1632) ——瑞典国王 (1611—1632)。——第109页。
- 卡杜达尔, 若尔日 (Gadoudal, Georges 1771—1804) ——法国政治活动家, 保皇党人, 1793年万第的反革命暴动的参加者, 朱安党人的首领; 多次试图在法国发动保皇暴动; 1804年因在巴黎策划保皇政变而被处死。——第459、460页。
- 卡龙赫-伊-费诺勒特, 埃乌谢比奥 (Calonge y Fenollet, Eusebio 1814—1874) ——西班牙将军; 曾参加卡洛斯派战争, 站在女王伊萨伯拉二世方面; 1854年为潘普洛纳镇守司令。——第235页。
- 卡耳马尔 (Kalmár) ——在土耳其的匈牙利流亡者。——第594、597页。
- 卡尔-路德维希-约翰 (Karl-Ludwig-Johann 1771—1847) ——奥地利大公, 元帅和军事作家; 在历次对法战争 (1796、1799、1805和1809) 中任总司令; 曾任陆军大臣 (1805—1809)。——第124页。
- 卡尔斯从男爵, 威廉——见威廉斯, 威廉·芬威克。
- 卡芬雅克, 路易·欧仁 (Cavaignac, Louis Eugène 1802—1857) ——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 侵略阿尔及利亚的参加者 (1831—1848); 1848年5月起为陆军部长, 极端残酷地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 曾任政府首脑 (1848年6—12月); 在第二共和国时期和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第256、308、429页。
- 卡洛斯, 唐 (Carlos, Don 1788—1855) ——斐迪南七世之弟, 西班牙王位追求者; 曾领导反动的封建教权派发动内战 (1833—1840)。——第49、51、52页。
- 卡德威尔, 爱德华 (Cardwell, Edward 1813—1886) ——英国国家活动家, 最初归属托利党, 继而成为反党派领袖之一, 后来是自由党人; 曾任贸易大臣 (1852—1861), 爱尔兰事务大臣 (1859—1861), 殖民大臣 (1864—1866) 和陆军大臣 (1868—1874)。——第194、575页。
- 卡斯尔里子爵, 罗伯特·斯图亚特 (Castlereagh, Robert Stewart 1769—1822)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 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1805—1806、1807—1809),外交大臣(1812—1822);以自杀终,——第60、165、435、457、712页。
- 卡斯特朗,艾斯普里·维克多·伊丽莎白·博尼法斯(Castellane, Esprit Victor-Isabèth Boniface 1788—1862)——法国元帅,1850年起任里昂卫戍司令,1859—1862年任里昂军区司令。——第430、440页。
- 卡桑尼亚克——贝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阿道夫。
- 卡波第斯特里亚,约翰(Kapodistrias, Ioannes 1776—1831)——伯爵,希腊国家活动家,1809—1822年在俄国任职,1814—1815年参加维也纳会议的工作;1815—1822年任俄国外交副大臣,1827—1831年任希腊总统。——第708页。
- 印范泰,法孔多(Infante, Facundo 1786—1873)——西班牙将军,进步派;曾任议会议长(1854—1856),陆军大臣(1860—1863、1865—1868)。——第44页。
- 兰斯唐侯爵,亨利·配第-菲茨莫里斯(Lansdowne, Henry Petty-Fitzmaurice 1780—1863)——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财政大臣(1806—1807),枢密院院长(1830—1841、1846—1852),不管部大臣(1852—1863)。——第6、10、16页。
- 兰斯科伊,谢尔盖·斯切潘诺维奇(Ланской, Сергей Степанович 1787—1862)——伯爵,俄国国家活动家,保守派;曾任内务大臣(1855—1861),参加过1861年农民改革的工作。——第722页。
- 尼耳,詹姆斯·乔治·史密斯(Neill, James George Smith 1810—1857)——英国将军,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在康波尔大肆进行残暴活动。——第331页。
- 尼布尔,巴托尔德·格奥尔格(Niebuhr, Barthold Georg 1776—1881)——德国杰出的古代史专家。——第650页。
- 尼布尔,马尔摩斯·卡尔斯顿·尼古劳斯(Niebuhr, Markus Carsten Niko-Laus 1817—1860)——普鲁士官吏,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亲信;曾任枢密院秘书(1851—1857);巴托尔德·格奥尔格·尼布尔之子。——第650页。
-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第128、211、625、628、629、637、650、671、696、706、723、724页。
- 尼科尔森,约翰(Nicholson, John 1821—1857)——英国将军,1842年参加第一次英国对阿富汗的战争,1848—1849年参加第二次英国对锡克人的战争,1857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期在攻打德里时指挥一支英国军队。——第323、328、333页。
-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和派(因他的名字而被称为皮尔派)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首相(1834—1835和1841—1846);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第140、141、143、157、193、339—343、349、350、432、433、544、574—578、606、715页。
- 皮克列尔,埃尔德曼(Pückler, Erdmann 生于1792年)——1858年起任普鲁士

- 农业大臣。——第 679 页。
- 卢兰, 古斯塔夫(Rouland, Gustave 1806—1878)——法国国家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国民教育和宗教事务大臣(1856—1863), 国务会议议长(1863—1864), 法兰西银行董事长(1864—1878)。——第 431 页。
- 卢梭, 让·雅克(Rousseau, Jean Jacques 1712—1778)——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者, 民主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第 733 页。
- 卢森堡王朝(Luxemburger)——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王朝(1308—1437 年断续在位), 1310—1437 年兼领捷克王位, 1387—1437 年兼领匈牙利王位。——第 108 页。
- 圣西门, 昂利(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31 页。
- 圣茹斯特, 路易·安都昂(Saint-Just, Louis Antoine 1767—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 雅各宾派领袖之一。——第 31 页。
- 圣莱昂纳兹——见萨格登, 爱德华。
- 弗格森, 罗纳德·克罗斯福德(Ferguson, Ronald Craufurd 1773—1841)——英国将军, 议会议员, 曾在下院抨击约克公爵的舞弊行为。——第 15 页。
-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Joseph 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第 279、634、644 页。
- 弗兰格尔,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Wrangel, Friedrich Heinrich Ernst 1784—1877)——普鲁士将军, 反动军阀的著名代表人物; 1848 年 11 月参加柏林的反革命政变和解散普鲁士国民议会。——第 53 页。
- 弗兰克斯, 托马斯·哈特(Franks, Thomas Harte 1808—1862)——英国将军, 参加过第二次英国对锡克人的战争(1848—1849)和对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镇压。——第 470—473、475 页。
- 弗洛特韦尔, 爱德华·亨利希(Flottwell, Eduard Heinrich 1786—1865)——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曾任财政大臣(1844—1846), 内务大臣(1858—1859)。——第 648、671、691、692、700 页。
- 弗里德里希第一(Friedrich 1371—1440)——1389 年起为纽伦堡军政长官; 1415—1440 年为勃兰登堡选帝侯; 霍亨索伦王朝的创建人。——第 108、109 页。
- 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 1657—1713)——1688 年起为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第三, 后为普鲁士国王(1701—1713)。——第 105、110、649 页。
-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der Große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第 107、121、651、655、727 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Friedrich-Wilhelm 1688—1740)——普鲁士国王(1713—1740)。——第 649、651 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ch-Wilhelm 1744—1797)——普鲁士国王(1786—1797)。——第 649、651 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第 649—651、671、677、679 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Wilhelm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第 540、632—635、643—646、648—650、653、675、679、693、696、701、728 页。
- 弗雷德里克七世 (Frdrerick 1808—1863)——丹麦国王(1848—1863)。——第 290 页。
- 弗雷德里克·斐迪南 (Frederick-Ferdinand 1792—1863)——丹麦亲王。——第 290 页。
- 布朗, 汉弗利 (Brown, Humphry)——英国企业家, 议会议员, 英国皇家银行董事之一(1853—1856), 因舞弊被判罪。——第 56、213—217 页。
- 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 (Blanqui, Louis 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 空想共产主义者, 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 1830 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1848 年革命时期站在法国无产阶级民主运动极左翼的立场, 曾多次被判处徒刑。——第 3 页。
- 布腊沃, 穆里洛, 璜 (Bravo, Murillo Juan 1803—1873)——西班牙政治活动家, 属于温和派; 政府首脑(1851—1852)。——第 236 页。
- 布洛利, 阿尔伯 (Broglie, Albert 1821—1901)——公爵, 法国政治活动家, 政论家和历史学家, 曾为天主教杂志“记者”撰稿, 后历任部长职务。——第 667 页。
- 布洛利, 阿希尔·沙尔·莱昂·维克多 (Broglie, Achille Charlens Léonce Victor 1785—1870)——公爵, 法国国家活动家, 内阁首相(1835—1836), 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 奥尔良派, 阿尔伯·布洛利之父。——第 667、698 页。
- 布鲁姆, 亨利·彼得 (Brougham, Henry Peter 1778—1868)——男爵, 英国法学家和文学家; 二十至三十年代为辉格党的著名活动家, 1830—1834 年任大法官, 曾促进 1832 年选举改革的实施。——第 433、544 页。
- 布律恩, 吉约姆·玛丽·安 (Brune, Guillaume Marie Anne 1763—1815)——法国元帅, 拿破仑第一各次征伐的参加者; 1799 年指挥驻荷兰的法国军队。——第 8 页。
- 布莱特, 约翰 (Bright, John 1811—1899)——英国厂主,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 从六十年代初为自由党左翼领袖; 曾多次担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第 173、181—185、539、547—549、552、713 页。
- 布阿泰尔, 散伏里安 (Baittelle, Symphorien 约生于 1814 年)——法国上校, 曾任巴黎警察局长(1858—1866)。——第 444、446—447 页。
- 布尔韦尔·利顿, 爱德华·乔治·利顿 (Bulwer-Lytton, Edward George Lytton 1803—1873)——英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早年为辉格党人, 1852 年起为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 曾任殖民大臣(1858—1859)。——第 148、157、539、562—567 页。
- 布尔韦尔·利顿, 罗西娜 (Bulwer-Lytton, Rosina 1802—1882)——英国小说家, 爱德华·乔治·利顿·布尔韦尔·利顿之妻。——第 562—567、570 页。
- 布尔韦尔·利顿, 爱德华·罗伯特 (Bulwer-Lytton, Edward Robert 1831—1891)——英国外交家和诗人; 曾任印

- 度总督(1876—1880), 驻巴黎大使(1887—1891); 爱德华·乔治·利顿·布尔韦尔·利顿之子。——第562、564—566页。
- 布里尔顿(Brereton)——驻印度的英国官吏, 旁遮普卢迪阿纳区专员(1855)。——第294、295页。
- 布里格斯, 约翰(Briggs, John 1785—1875)——英国将军, 1801—1835年在东印度公司任职; 自由贸易派, 关于印度和波斯译著甚多。——第550页。
- 布罗费里奥, 安吉洛(Brofferio, Angelo 1802—1866)——意大利政治活动家, 诗人和政论家; 1848年起为皮蒙特众议院议员; 民主反对派的领袖; 加里波第的拥护者。——第20页。
- 布莱克斯顿, 威廉(Blackstone, William 1723—1780)——英国法学家 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辩护人。——第311页。
- ## 六 画
- 米涅, 克劳德·埃蒂耶纳(Minié, Claudette 1804—1879)——法国军官和军事发明家, 曾创制一种新型步枪。——第415页。
- 米洛, 莫伊斯(Millaud, Moïse 1813—1871)——法国银行家和记者, 曾创办许多家报纸和银行。——第467页。
- 米尔纳·基卜生——见基卜生, 托马斯·米尔纳。
- 米勒斯, 茹尔·伊萨克(Mirès, Jules Isaac 1809—1871)——法国银行家, “立宪主义者报”等报纸的所有人。——第431页。
- 达来朗·贝里戈尔, 沙尔·莫里斯(Talleyrand - Périgord, Charles Maurice 1754—1838)——公爵, 著名的法国外交家, 曾任外交部长(1797—1799、1799—1807、1814—1815), 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1814—1815); 以自私和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第171、454、457、458、463页。
- 达尔豪西侯爵, 詹姆斯·安得鲁·拉姆西(Dalhousie, James Andrew Ramsay 1812—1860)——英国国家活动家, 曾任印度总督(1848—1856), 执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第292、295、503、506、507、551、560页。
- 迈奥尔, 爱德华(Miall, Edward 1809—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议会议员(1852—1857、1869—1874)。——第181页。
- 列奥波特一世(Leopold 1640—1705)——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657—1705)。——第110页。
- 列列韦尔, 约阿希姆(Lelewel, Joachim 1786—1861)——杰出的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家, 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波兰流亡者民主派领袖之一。——第451页。
- 多德, 乔治(Dodd, George 1808—1881)——英国政论家, 编著甚多, 主要是关于工业问题; 曾为各种参考性出版物撰稿。——第213页。
- 多斯特·穆罕默德(Dost - Muhammad 1793—1863)——阿富汗的艾米尔(1826—1863)。——第132页。
- 成吉思汗(1155左右—1227)——著名的蒙古族征服者, 蒙古帝国的创建者。——第528页。
- 艾克罗伊德, 爱德华(Akroyd, Edward)——英国厂主, 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第183页。
- 吉本, 爱德华(Gibbon, Edward 1737—

- 1794)——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著有卷次繁多的“罗马帝国的衰亡史”。——第264页。
- 吉兹公爵——见洛林的昂利第二。
- 乔治三世(George 1738—1820)——英国国王(1760—1820)。——第10、11、632页。
- 乔治四世(George 1762—1830)——英国摄政王(1811—1820),英国国王(1820—1830)。——第15、649页。
- 乔治·威廉(Georg Wilhelm 1595—1640)——勃兰登堡选帝侯(1619—1640)。——第109页。
- 伍德,查理(Wood, Charles 1800—1885)——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1846—1852年任财政大臣,1852—1855年任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5—1858年任海军首席大臣,1859—1866年任印度事务大臣,1870—1874年任掌玺大臣。——第342、575页。
- 伍德伯恩(Woodburn)——英国将军,1857年参加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271页。
- 伏恩,约翰·路德(Vaughan, John Luther 生于1820年)——英国将军,曾参加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272页。
- 伏尔泰,弗朗斯瓦·玛丽(Voltaire, Francois Marie 1694—1778)(真姓为阿鲁埃 Arouet)——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讽刺作家,历史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卓越代表;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263页。
-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公元前384—322)——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在哲学上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第264、734页。
-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第110、128、628、629、651、723页。
- 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第627、629、630、637、650、696、716、718、719、722、723、725页。
- 安森,乔治(Anson)——英国将军,曾任驻印英军总司令(1856—1857)。——第259页。
- 安凡丹,巴特利米·普罗斯比尔(Enfantin, Barthelemy Prosper 1976—1864)——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亲信门徒之一;在圣西门死后为圣西门学派之领袖。——第31页。
- 安得列,厄内斯特(André, Erneste)——法国股份银行Crédit Mobilier的董事之一。——第316页。
- 安得列奥西,安都昂·弗朗斯瓦(Andréossi, Antoine Francois 1761—1828)——法国将军和外交家,拿破仑第一各次征伐的参加者;曾任驻伦敦大使(1802),驻维也纳大使(1806—1809)和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12—1814);原系意大利人。——第457、461页。
- 伊安(Hyenne)——法国军官,因与法国记者昂利·潘恩决斗而出名。——第522页。
- 伊文思,乔治·德·雷希(Evans, George de Lacy 1787—1870)——英国将军,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自由派政治家,议会议员。——第283、287、288、447页。
- 伊丽莎白(Elisabeth 1801—1873)——普鲁士王后,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之妻。——第632—635、645、648、672、

- Spencer Horatio 1806—1898)——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52、1858—1859、1866—1867)。——第567页。
- 沃德尔,圭利阿姆·劳埃德(Wardle, Gwyl-lym Lloyd 1762左右—1833)——英国上校,议会议员,1809年曾在下院揭发约克公爵的舞弊行为。——第12、13、15页。
- 沃德豪斯,约翰(Wodehouse, John 1826—1902)——英国国家活动家,曾任驻彼得堡公使(1856—1858),爱尔兰总督(1864—1866),掌玺大臣(1868—1870),殖民大臣(1870—1874、1880—1882)。——第544页。
- 沃龙佐夫,米哈伊尔·谢明诺维奇(Воронцов, Михаил Семенович 1872—1856)——公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元帅;1844—1854年为高加索驻军总司令和高加索总督。——第195页。
- 沃戈里德斯(博戈里迪),亚历山大(Vogorides, Alexandros 1823左右—1910)(常被称为阿列科·帕沙)——土耳其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原系保加利亚人,1856—1861年任驻伦敦大使馆参赞,1876—1878年任驻维也纳大使,1879—1884年任东鲁美利亚总督。——第279、281页。
- 沃戈里德斯,尼古拉(Vogorides, Nikolas 1821—1863)——1857—1859年为莫尔达维亚的卡马康(代理国君),原系保加利亚人;亚历山大·沃戈里德斯之兄。——第277—281页。
- 沃戈里德斯,斯蒂凡(博戈罗夫,斯托伊科)(Vogorides, Stefanaki (Bogorow, Stoiko) 1775—1859)——1821—1822年为莫尔达维亚的卡马康(代理国君),原系保加利亚人;亚历山大·沃戈里德斯和尼古拉·沃戈里德斯之父。——第279页。
- 克莱,威廉(Clay, William 1791—1869)——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1832—1857)。——第140页。
- 克莱斯特-雷措夫,汉斯·胡果(Kleist-Retzow, Hans Hugo 1814—1892)——普鲁士政治活动家,保守党极右派的首领,“新普鲁士报”的创办人之一。——第693页。
- 克美蒂,迪约尔吉(Kmetz, Gyorgy 1810—1865)——土耳其将军,原系匈牙利人,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并加入土耳其国籍;克里木战争期间先在多瑙河(1853—1854),后在高加索(1854—1855)任土耳其军队指挥官。——第411页。
- 克拉克,乔治(Clerk或Clark, George 1787—1867)——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派,曾任财政部秘书长(1834—1835、1841—1845)、贸易副大臣和造币厂厂长(1845—1846)。——第194页。
- 克拉索夫,卡尔·莱茵霍尔特·阿道夫(Krassow, Karl Reinhold Adolf 1812—1892)——伯爵,普鲁士的县长,议会议员(1849—1850、1850—1851、1851—1852),属于右派,1852—1868年任施特拉尔宗德行政区长官。——第684页。
- 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韦利尔斯(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1800—1870)——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爱尔兰总督(1847—1852),残

- 酷地镇压1848年爱尔兰起义;外交大臣(1853—1858、1865—1866、1868—1870)。——第19、159、175、195、546页。
- 克里斯亭娜——见玛丽·克里斯亭娜。
- 克兰沃斯男爵,罗伯特·蒙西·罗尔夫(Cranworth, Robert Monsey Rolfe 1790—1868)——英国国家活动家和法学家,辉格党人,曾任大法官(1852—1858和1865—1886)。——第148页。
- 克兰里卡德侯爵,乌利克·约翰·德·巴勒(Clanricarde, Ulick John de Burgh 1802—1874)——英国外交家和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38—1841),掌玺大臣(1857—1858)。——第6、16、434、562页。
- 里德,托马斯(Reed, Thomas 1796—1883)——英国将军,参加过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298、299、328页。
- 里奥斯-伊-罗萨斯,安东尼奥(Ryos y Rosas, Antonio 1812—1873)——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属于温和派,议会议员,曾任内务大臣(1856)。——第44页。
- 里子公爵,托马斯·奥斯本,1689年起受封为卡马登侯爵,1694年起受封为里子公爵(Leeds, Thomas Osborne 1631—1712)——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首相(1674—1679和1690—1695),1695年议会控告他有贪污罪行。——第558页。
- 里斯托丽,阿黛拉伊德(Ristori, Adelaide 1822—1906)——著名的意大利女演员——第697页。
- 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753—1840)——俄国将军,1799年任驻瑞士的俄国军队指挥官;1830年起为国家参议院议员。——第122页。
- 怀特塞德,詹姆斯(Whiteside, James 1804—1876)——爱尔兰法学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首席检察官(1858—1859、1866)。——第157、711页。
- 肖尔,约翰·廷马斯(Shore, John Teignmouth 1751—1834)——印度的英国总督(1793—1798)。——第503页。
- 杜班,安得列·玛丽·让·雅克(Dupin, André Marie Jean Jacques 1783—1865)——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派,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和立法议会议长(1849—1851);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666页。
- 杜罗·德·拉·马尔,阿道夫·茹尔·塞扎尔·奥古斯特(Dureau de la Malle, Adolphe Jules César Auguste 1777—1857)——法国诗人和历史学家。——第450页。
- 杜耳塞-伊-加腊伊,多敏古(Dulce y Garay, Domingo 1808—1869)——侯爵,西班牙将军,属于温和派,曾领导1854年马德里的武装暴动,这次暴动是1854—1856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1856年镇压过群众的革命行动。——第50页。
- 杜尔哥侯爵,路易·费里克斯·埃蒂耶纳(Turgot, Louis F. àx Etienne 1796—1866)——法国外交家,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参加者;曾任外交部长(1851—1852),驻西班牙大使(1853)。——第42页。
- 亨利五世——见尚博尔,昂利·沙尔。

- 亨格施坦堡, 恩斯特·威廉 (Hengstenberg, Ernst Wilhelm 1802—1869)——德国神学家, 反动分子, 柏林大学教授。——第728页。
- 辛普森, 詹姆斯 (Simpson, James 1792—1868)——英国将军, 1855年任克里木驻军参谋长(2—6月), 后任总司令(6—11月)。——第411页。
- 辛迪亚, 阿里·扎·吉阿吉 (巴吉拉特·拉奥) (Sindhia, Ali Jah Jaijaji (Bagirat Rao) 约生于1835年)——马拉提人, 1853年起为印度瓜廖尔公国的国君; 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站在英国人一边。——第321、613页。
- 李比希, 尤斯图斯 (Liebig, Justus 1803—1873)——杰出的德国学者, 农业化学的创始人之一。——第231页。
- 李嘉图, 大卫 (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之一。——第23、733、746、747页。
- 李斯特, 赛米尔·康利弗 (Lister, Samuel Cunliffe 1815—1906)——英国工业家和发明家。——第206页。
- 邦迪埃拉兄弟, 阿提利奥 (1810—1844) 和埃米利奥 (1819—1844 (Bandiera, Attilio ed Emilio)——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青年意大利”社的成员, 奥地利舰队的军官, 因企图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被处死 (1844)。——第157页。
- 贝多, 玛丽·阿尔丰斯 (Bedeau, Marie Alphonse 1804—1863)——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副议长;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 1859年回国。——第440页。
- 贝林, 弗兰西斯 (Baring, Francis 1796—1866)——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议会议员; 1839—1841年任财政大臣, 1849—1852年任海军首席大臣。——第575页。
- 贝尔纳, 西蒙·弗朗斯瓦 (Bernard, Simon Francois 生于1817年)——法国政治活动家, 共和派; 曾流亡英国; 1858年被法国政府控为奥尔西尼行刺拿破仑第三的同伙犯, 但被英国中央刑事法庭宣布无罪。——第481、482页。
- 贝尔蒂埃, 路易·亚历山大 (Berthier, Louis Alexandre 1753—1815)——法国元帅, 曾在拿破仑第一的军队中任参谋长 (1799、1805—1807、1812—1814); 拿破仑帝国倒台 (1814年) 以后转向波旁王朝。——第430页。
- 贝尔蒂埃, 让·加布里埃尔 (Peltier, Jean Gabriel 1765左右—1825)——法国政论家, 保皇党人; 1792年八月十日革命后流亡伦敦, 在伦敦出版过多种期刊; 激烈地反对拿破仑第一, 因此受到刑事究办。——第458、460、462页。
- 贝列拉, 艾米尔 (Péire, Emile 1800—1875)——法国银行家, 波拿巴主义者, 立法团代表; 1852年与其弟伊萨克·贝列拉一起创办股份银行 Crédit Mobilier。——第31、38、220、221、226、227、258、316、465页。
- 贝列拉, 伊萨克 (Péire, Isaac 1806—1880)——法国银行家, 波拿巴主义者, 立法团代表; 1852年与其兄艾米尔·贝列拉一起创办股份银行 Crédit Mobilier。——第27、31—33、38、65、218—221、223—227、315、316、465、729页。
- 贝利, 亨利·詹姆斯 (Baillie, Henry James)——英国政府官员, 印度事务督

- 察委员会秘书。——第505页。
- 贝利耶, 比埃尔·安都昂 (Berryer, Pierre Antoine 1790—1868) —— 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正统主义者。——第438、698页。
- 贝瑟耳, 理查, 威斯特柏立男爵 (Bethell, Richard, Baron Wesbury 1800—1873) —— 英国国家活动家, 自由党人; 曾任副首席检察官 (1852—1856)、首席检察官 (1856—1858、1860—1861)、大法官 (1861—1865)。——第157页。
- 贝特曼·霍尔威克, 摩里茨·奥古斯特 (Bethmann - Hollweg, Moritz August 1795—1877) —— 普鲁士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保守党领袖之一, 普鲁士议会第一议院议员, 后为第二议院议员 (1848—1855); 曾任宗教、教育和卫生大臣 (1858—1862)。——第671、679页。
- 麦克尼耳, 约翰 (McNeill, John 1795—1883) —— 英国外交家, 曾任驻德黑兰公使 (1836—1842)。——第131页。
- 麦克马洪, 玛丽·埃德姆·巴特里斯·莫里斯 (Mac-Mahon, Marie Edme Patrice Maurice 1808—1893) —— 法国反动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曾任阿尔及利亚总督 (1864—1870); 1870年率10万法军在色当投降; 领导过对巴黎公社的凶恶镇压; 1873—1879年为第三共和国总统。——第440页。
- 麦克格莱哥尔, 约翰 (MacGregor, John 1797—1857) —— 英国统计学家, 自由贸易派, 议会议员, 英国皇家银行的创办人, 并为该行董事之一 (1849—1856), 在统计学方面著作甚多。——第56、623页。
- 麦克唐纳, 雅克·埃蒂耶纳·约瑟夫·亚历山大 (Macdonald, Jacques-tienne Joseph Alexandre 1765—1840) —— 法国元帅; 拿破仑第一各次征伐的参加者; 在征讨意大利和瑞士时任法军总司令; 在拿破仑退位后为波旁王朝效力; 1816年至1830年历任宫廷要职。——第122页。
- 劳伦斯 (Lawrence) —— 印度的一个英国军官。——第273页。
- 劳伦斯, 弗伦奇 (Lawrence, French 1757—1809) —— 英国法学家, 1796年起为议会议员。——第460页。
- 劳伦斯, 亨利·蒙哥马利 (Lawrence, Henry Montgomery 1806—1857) —— 英国军官; 曾任尼泊尔驻札官 (1843—1846), 旁遮普英国当局首脑 (1849—1853), 奥德首席专员 (1857), 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期任勒克瑙英军指挥官。——第253、271、303、325、400、401页。
- 劳伦斯, 约翰·勒阿尔德·麦阿尔 (Lawrence, John Laird Mair 1811—1879) —— 英国负责殖民事务的高级官员; 曾任旁遮普首席专员 (1853—1857)、印度总督 (1864—1869)。——第309、328、330、471、613页。
- 劳伦斯, 乔治·圣帕特里克 (Lawrence, George Saint - Patrick 1804—1884) —— 英国将军, 参加过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 曾任拉吉普坦纳驻札官 (1857—1864)。——第336页。
- 苏尔特, 尼古拉·让 (Soult, Nicolas Jean 1769—1851) —— 法国元帅和国家活动家, 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 曾任首相 (1832—1834、1839—1840 和 1840—

- 1847)。——第242页。
- 苏沃洛夫, 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 (Суво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730—1800) ——伟大的俄国统帅。——第122、123页。
- 坎宁, 乔治 (Canning, George 1770—1827)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 曾任外交大臣 (1807—1809、1822—1827), 首相 (1827)。——第433、602页。
- 坎宁, 查理·约翰 (Canning, Charles John 1812—1862) ——伯爵 (1859年受封),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派; 曾任邮政大臣 (1853—1855), 印度总督 (1856—1862); 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组织者。——第499、502、503、516、518、519页。
- 坎贝尔 (Campbell) ——英国军官, 曾参加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474页。
- 坎贝尔, 乔治 (Campbell, George 1824—1892) ——1843—1874年断续担任英国驻印度的殖民官员, 后为议会议员 (1875—1892); 自由党人, 关于印度著述甚多。——第551页。
- 坎贝尔, 科林·克莱德男爵 (Campbell, Colin, Baron Clyde 1792—1863) ——英国将军, 后升元帅, 1848—1849年参加第二次英国对锡克人的战争, 1854—1855年参加克里木战争; 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期任英军总司令。——第332、381—386、398—400、405、406、411、412、414、416、469—474、495、497、498、500、524、527—529、553—556、611页。
- Locke 1811—1885) ——英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后为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第539页。
- 欧文 (Owen, W. D.) ——英国皇家银行董事之一 (1849—1854、1855—1856), 因舞弊被判罪。——第56页。
- 欧斯曼, 若尔日·欧仁 (Hausmann, Georges Eugène 1809—1891) ——法国政治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参加者, 塞纳省省长 (1853—1870)。——第468页。
- 雨果, 维克多 (Hugo, Victor 1802—1885) ——伟大的法国作家。——第456页。
- 帖木儿 (1836—1405) ——中亚细亚的统帅和征服者, 统治毛危兰纳赫尔、花刺子模和霍拉桑的帖木儿王朝 (1370—1507) 的创建者。——第528页。
- 孟德斯鸠, 沙尔 (Montesquieu, Charles 1689—1755) ——杰出的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 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 君主立宪制的理论家。——第264、450页。
- 舍伐利埃, 米歇尔 (Chevalier, Michel 1806—1879) ——法国工程师, 经济学家和政论底, 圣西门的追随者;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积极支持并宣传拿破仑第三的经济政策, 曾长期为“辩论日报”撰稿。——第31页。
- 舍夫茨别利伯爵, 安东尼·艾释黎·库伯 (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1801—1885) ——英国政治活动家; 四十年代时在议会中领导托利党慈善家集团; 1847年起为辉格党人。——第161、565页。
- 尚博尔, 昂利·沙尔 (Chambord, Henri Charles 1820—1883) ——伯爵, 波旁王

八 画

金, 彼得·约翰·洛克 (King, Peter John

- 室长系的最后代表,查理十世之孙,法国王位追求者,自封亨利五世。——第430页。
- 尚加尔涅,尼古拉·安·德奥杜尔(Changarnier, Nicolas Anne Thédoule 1793—1877)——法国将军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保皇派;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逮捕和驱逐,1859年回国。——第440、444页。
- 法卢,阿尔弗勒德(Falloux, Alfred 1811—188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1848年解散国家工厂的发起者和镇压巴黎六月起义的鼓吹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曾任教育和宗教部长(1848—1849)。——第698页。
- 法夫尔,茹尔(Faure, Jules 1809—188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从五十年代末起是资产阶级共和反对派领袖之一;1858年曾为奥尔西尼做辩护人;1870—1871年任“国防政府”的外交部长;同梯也尔一起领导了反对巴黎公社的斗争。——第437、438、441页。
- 法尔孔,安东尼奥(Falcon, Antonio)——西班牙将军,1854—1856年西班牙革命的参加者。——第41、48页。
- 阿尔古伯爵,安都昂·莫里斯·阿波利奈尔(Argout, Antoine Maurice Apollinaire 1782—1858)——法国国家活动家,1830—1834年历任内阁大臣,1834—1857年任法兰西银行董事长。——第241、242页。
- 阿尔巴,扎科博·路易斯(Alba, Jacobo Luis 1821—1881)——公爵,西班牙贵族,欧仁妮·蒙蒂霍的姐妹之夫。——第43页。
- 阿尔勃莱希特第三(Albrecht 1350左右—1395)——奥地利大公(1365—1395)。——第118页。
- 阿尔勃莱希特第三阿基里斯(Albrecht Achilles 1414—1486)——勃兰登堡选帝侯(1470—1486)。——第107页。
- 阿尔勃莱希特·弗里德里希(Albrecht-Friedrich 1553—1618)——普鲁士公爵(1568—1618)。——第110页。
- 阿伯丁伯爵,乔治·戈登(Aberdeen, George Gordon 1784—1860)——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从1850年起为皮尔派领袖;曾任外交大臣(1828—1830、1841—1846)和联合内阁首相(1852—1855)。——第6、9、16、145、159、193、543页。
- 阿格索侯爵,昂利·卡尔丹·让·巴蒂斯特(Aguesseau, Henri Cardin Jean Baptiste 1746—1826)——法国外交家,1803—1805年任驻哥本哈根公使。——第463页。
- 阿米塔季,埃耳卡纳(Armitage, Elkanah)——英国议会议员,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第181页。
- 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Алексе́й Михаи́лович 1629—1676)——俄国沙皇(1645—1676)。——第625页。
- 阿希伯纳姆,托马斯(Ashburnham, Thomas 1807—1872)——英国将军,1857年奉命率兵侵华;由于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爆发,被调往印度。——第254页。
- 阿罕默德·沙赫·杜兰尼(Ahmed- Shah Durani 1724—1773)——阿富汗的沙赫(1747—1773),阿富汗国家和杜兰尼王朝的创建者。——第127页。
- 阿森西奥(Assensio)——西班牙政治活动

- 家,议会议员,1854—1856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第46页。
- 阿马尔·辛格 (Armar Singh) —— 库埃尔·辛格之兄弟;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期在库埃尔·辛格(死于1858年4月)死后领导奥德的起义者。——第612页。
- 杰科布,乔治·勒·格兰德 (Jacob, George le Grand 1805—1881) —— 英国上校,后升将军;1857年参加英国对波斯战争,参加过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287页。
-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 (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70—19) —— 杰出的罗马诗人。——第451页。
- 林则徐 (1785—1850) —— 中国国家活动家;1839年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和负责查禁鸦片贸易的钦差大臣。——第590页。
- 林德赫斯特男爵,约翰·辛格顿·柯普利 (Lyndhurst, John Singleton Copley 1772—1863) —— 英国国家活动家,法学家,托利党人,曾任大法官(1827—1830、1834—1835、1841—1846)。——第148、151、152页。
- 拉普,让 (Rapp, Jean 1772—1821) —— 法国将军,拿破仑第一各次征伐的参加者;1813年1月至1814年1月担任处于俄、普军包围下的但泽守军的指挥官。——第405页。
- 拉欣顿,查理·曼纳斯 (Lushington, Charles Manners) —— 英国政治活动家,皮尔派,议会议员(1854—1857)。——第194页。
- 拉品斯基,泰奥菲尔 (Lapinski, Theophil 1827—1886) —— 波兰上校,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改名泰菲克·贝伊投入土耳其军队供职,1857—1858年在切尔克西亚同俄国作战。——第593—599页。
- 拉布谢尔,亨利 (Labouhere, Henry 1798—1869) —— 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贸易大臣(1839—1841、1847—1852),殖民大臣(1855—1858)。——第164页。
- 拉特兰德公爵,查理·谢西尔·约翰·曼纳斯 (Ruthland, Charles Cecil John Manners 1815—1888) —— 英国贵族,托利党人。——第538页。
- 拉德茨基,约瑟夫 (Radetzky, Joseph 1766—1858) —— 奥地利元帥,1831年起任意大利北部的奥地利军队的指挥官,1848—1849年残酷镇压意大利的革命民族解放运动;1850—1856年任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总督。——第20、53页。
- 拉斯拜尔,弗朗斯瓦 (Raspail, Francois 1794—1878) —— 卓越的法国学者,自然科学家,政论家和社会主义者,靠近革命无产阶级;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制宪议会议员;1855年后转向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第3页。
- 罗,约翰 (Law, John 1671—1729) ——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曾在法国担任财政大臣(1719—1720);以发行纸币进行投机活动,结果惨败,因此而出名。——第31、36、40、315页。
- 罗素,威廉·霍华德 (Russell, William Howard 1820—1907) —— 英国记者,“泰晤士报”的军事通讯员。——第495、497、526、527页。
- 罗素,约翰 (Russell, John 1792—1878) —— 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任首相(1846—1852和1865—

- 1866), 外交大臣 (1852—1853 和 1859—1865), 枢密院院长 (1854—1855); 1855 年为出席维也纳会议的英国代表。——第 6、145、147、148、155、157—159、170—173、195、342、432—434、560 页。
- 罗斯, 休·亨利 (Rose, Hugh Henry 1801—1885) —— 英国将军, 后升元帅,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镇压者之一; 曾任驻印军队司令 (1860—1865), 驻爱尔兰武装部队司令 (1865—1870)。——第 471、474、529、555、556 页。
- 罗斯·德·奥兰诺, 安东尼奥 (Ros de Olano, Antonio 1808—1886) —— 西班牙将军, 属于温和派, 1854—1856 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第 43 页。
- 罗林森, 亨利·克雷斯基 (Rawlinson, Henry Creswicke 1810—1895) —— 英国历史学家, 东方学家, 在波斯做过军官; 曾任印度事务参事会参事 (1858—1859、1868—1895), 驻德黑兰公使 (1859—1860)。——第 247 页。
- 罗宾逊, 史密斯 (Robinson, Smith P.) —— 反谷物法同盟名誉书记。——第 184 页。
- 罗巴克, 约翰·阿瑟 (Roebuck, John Arthur 1801—1879) ——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议会议员。——第 157、170 页。
- 罗伯茨, 亨利 (Roberts, Henry 1800—1860) —— 英国将军, 曾参加镇压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 612、613 页。
- 罗伯逊 (Robertson) —— 英国驻上海领事 (1856)。——第 74 页。
- 罗伯斯比尔, 马克西米利安 (Robespierre, Maximilien 1758—1794) ——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 雅各宾派领袖, 革命政府首脑 (1793—1794)。——第 453 页。
- 罗曼诺夫王朝 (Романовы) —— 俄国沙皇和皇帝的王朝 (1613—1917)。——第 19、707 页。
- 帕麦尔, 约翰·霍尔斯莱 (Palmer, John Horsley 1779—1858) —— 英国金融家, 1830—1832 年任英格兰银行经理, 后在财政机关担任各种职务。——第 32 页。
- 帕麦尔, 朗德尔 (Palmer, Roundel 1812—1812—1895) —— 英国国家活动家, 早期依附于托利党, 继而成为皮尔派, 后来是自由党人, 曾任大法官 (1872—1874、1880—1885)。——第 194 页。
- 帕麦尔, 威廉 (Palmer, William 1824—1856) —— 英国医生, 为谋取保险赔偿费而毒死自己的妻子、兄弟和朋友, 被判处绞刑。——第 586 页。
- 帕麦斯顿子爵, 亨利·约翰·坦普尔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1784—1865) —— 英国国家活动家, 初为托利党人, 1830 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之一, 依靠该党右派; 曾任外交大臣 (1830—1834、1835—1841 和 1846—1851), 内务大臣 (1852—1855) 和首相 (1855—1858 和 1859—1865)。——第 17、20、131、140、144—147、152、153、154—159、161—166、169—176、181—183、185、192—195、246、247、263、279、284、286—289、342、422、432—435、447、476、480、483、484、499、505、506、538、543、544、560、561—565、621、625、637、705 页。
- 帕托夫, 艾拉兹穆斯·罗伯特 (Patow, Erasmus Robert 1804—1890) —— 男

- 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曾任商业、工业和公共工程大臣(1848年4—6月),财政大臣(1858—1862)。——第672、679页。
- 帕金顿,约翰·索美塞特(Pakington, John Somerset 1799—1880)——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人;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1852),海军首席大臣(1856—1859和1866—1867),陆军大臣(1867—1868)。——第157、434页。
- 帕尔马公爵夫人——见波旁的路易莎,玛丽亚-泰莉莎。
- 帕兰杜尔·辛格(Parandur Singh)——印度的拉扎。——第336页。
- 帕拉福克斯-伊-梅耳西,霍赛(Palafox y Melci, José 1776—1847)——西班牙将军,1808—1814年独立战争的参加者,领导过萨拉哥沙保卫战(1808—1809)。——第46页。
- 奈斯密斯,詹姆斯(Nasmith, James 1808—1890)——英国工程师和发明家。——第205页。
- 奈穆尔公爵夫人——见奥尔良的玛丽。
- 彼拉多,本丢(Pilatus, Pontius 约卒于公元37年)——犹太的罗马总督(26—36)。——第61页。
- 彼得一世(Петр 1672—1725)——1682年起为俄国沙皇,1721年起为俄国皇帝。——第110、128、279、637、638、716、717、725页。
- 彼罗夫斯基,瓦西里·阿列克谢也维奇(Перо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795—1857)——俄国将军,奥连堡军事总督(1833—1842、1851—1857);1839—1840年率军远征希瓦。——第136、638—640页。
- 波立特,威廉·约翰·弗雷德里克(Powlett, William John Frederick)——英国政治活动家,皮尔派,议会议员。——第194页。
- 波特尔,约翰(Potter, John)——英国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三度任曼彻斯特市长。——第183页。
-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一。
-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 波拿巴,日罗姆(Bonaparte, Jérôme 1784—1860)——拿破仑第一之弟,威斯特伐里亚国王(1807—1813)。——第421、430页。
- 波拿巴,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Bonaparte, Joseph Charles Paul, le Prince Napoléon 1822—1891)——日罗姆·波拿巴之子,拿破仑第三之堂弟。——第42、438页。
- 波拿巴王朝(Bonaparte)——法兰西帝国王朝(1804—1814、1815、1852—1870)。——第71、84、278、674、706页。
- 波旁王朝(Bourbon)——法国的王朝(1589—1792、1814—1815和1815—1830)。——第666页。
- 波旁的路易莎,玛丽亚-泰莉莎(Louise de Bourbon, Marie-Thérèse 1819—1864)——帕尔马公爵夫人,帕尔马公国摄政(1854—1859)。——第697页。
- 佩蒂(Petit)——巴黎检察长的助手(1856)。——第88页。
- 佩顿,约翰·斯泰福(Paton, John Stafford 1821—1889)——英国军官,后升将军;曾参加第一次和第二次英国对锡克人的战争(1845—1846和1848—1849),参加过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328页。
- 佩利西埃,让·雅克(Pellissier, Jean

- Jacques 1794—1864)——法国元帅;三十年代初参加了征服阿尔及利亚,以极端残酷出名;1855年5月—1856年7月任克里木驻军总司令;因攻克马拉霍夫冈而受封为马拉霍夫公爵;曾任驻英大使(1858—1859)。——第421、430、440、446—448、481页。
- 图克,托马斯(Tooke, Thomas 1774—185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倾向于古典学派,曾抨击李嘉图的货币论。——第363页。
- 图尔,伊什特万(Tűr, István 1825—1908)(又名阿罕默德·基阿米耳·贝伊)——流亡土耳其的匈牙利军官;曾参加克里木战争,站在联军一边;参加过切尔克斯人反对俄国的战争。——第593、594、596—598页。
- 图尔内桑,奥古斯特(Thurneyssen, Auguste)——法国股份银行Crédit Mobilier的董事之一。——第314—316页。
- 图温奈尔,爱德华·安都昂(Thouvenel, Edouard Antoine 1818—1866)——法国外交家,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5—1860),外交大臣(1860—1862)。——第277、278、597页。
- ## 九 画
- 娄,罗伯特(Lowe, Robert 1811—1892)——英国国家活动家和政治家,“泰晤士报”的撰稿人,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贸易副大臣(1855—1858),财政大臣(1868—1873),内务大臣(1873—1874)。——第164、182页。
- 品得(Pindar 约公元前522—442)——古希腊抒情诗人;曾写了许多庄严的颂诗。——第161页。
- 咸丰(1831—1861)——中国皇帝(1850—1861)。——第590页。
- 施,威廉(Shee William 1804—1868)——爱尔兰法学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第157页。
- 施塔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Stahl, Friedrich Julius 1802—1861)——德国极端反动的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40年起任柏林大学教授,——第728页。
- 施泰因,马克西米利安(Stein, Maximilian 1811—1860)——奥地利军官,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时任革命军参谋长;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改名费哈尔特·帕沙;曾在切尔克斯西亚同俄国作战(1857—1858)。——第515、593页。
- 施泰因,尤利乌斯(Stein, Julius 1813—1889)——西西里亚的教员,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第690页。
- 施托尔希,安得列依·卡尔洛维奇(亨利希)(Шторх, Андрей Карлович (Генрих) 1766—1835)——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古典派的摹仿者。——第744页。
- 施莱尼茨,亚历山大(Schleinitz, Alexander 1807—1885)——伯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大臣(1848年6月、1849—1850、1858—1861)。——第671、678页。
- 施瓦尔岑堡,费里克斯(Schwarzenberg, Felix 1800—1852)——公爵,奥地利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1848年10月维也纳起义被镇压后担任首相和外交

- 大臣。——第671页。
- 约翰·西吉兹蒙特 (Johann - Sigismund 1572—1619) —— 勃兰登堡选帝侯 (1608—1619)。——第110页。
- 约翰·西塞罗 (Johann Cicero 1455—1499) —— 勃兰登堡选帝侯 (1486—1499)。——第107页。
- 约翰斯顿, 安得鲁·詹姆斯·科克伦 (Johnstone, Andrew James Cochran 生于 1767年) —— 英国上校, 曾任多米尼加岛总督 (1797—1803)。——第7—10页。
- 约克公爵, 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 (York, Frederick - August 1763—1827) —— 英王乔治三世之次子, 1795年起为元帅; 曾任英国军队总司令 (1798—1809, 1811—1827)。——第6—16、649页。
- 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 (Joachim - Friedrich 1546—1608) —— 勃兰登堡选帝侯 (1598—1608)。——第110页。
- 约阿希姆第一·奈斯托尔 (Joachim Nestor 1484—1535) —— 勃兰登堡选帝侯 (1499—1535)。——第107、109页。
- 约阿希姆第二·赫克脱 (Joachim Hector 1505—1571) —— 勃兰登堡选帝侯 (1535—1571)。——第107、109页。
- 查理一世 (Charles 1600—1649) —— 英国国王 (1625—1649),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653页。
- 查理二世 (Charles 1630—1685) —— 英国国王 (1660—1685)。——第653页。
- 查理五世 (Karl 1500—1558) —— 西班牙国王 (1516—1556), 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519—1556)。——第109、311页。
- 查理十世 (Charles X 1757—1836) —— 法国国王 (1824—1830)。——第290页。
- 查理-阿尔伯特 (Carlo Alberto 1798—1849) —— 撒丁国王 (1831—1849)。——第20页。
- 科布顿, 理查 (Cobden, Richard 1804—1865) —— 英国厂主,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 反谷物法同盟的创立者之一, 会议员。——第148、152、157、162、170、171、173、181—184、194、433页。
- 科德林顿, 威廉·约翰 (Codrington, William John 1804—1884) —— 英国将军, 曾任克里木英国驻军总司令 (1855—1856)。——第411页。
- 科堡家族 (Coburg) —— 德国的一个公爵家族, 比利时、葡萄牙、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王朝或属于这个家族, 或和这个家族有关系。——第674页。
- 科尔萨科夫 —— 见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科苏特, 拉约什 (路德维希) (Kossuth, Lajos (Ludwig) 1802—1894) —— 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在1848—1849年革命中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 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 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第179、593、597页。
- 科贝特, 威廉 (Cobbett, William 1762—1835) ——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卓越代表人物, 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进行斗争; 从1802年起办“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第1、12、311页。
- 派西沃, 斯宾塞 (Perceval, Spencer 1762—1812) ——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 1802—1806年任首席检察官, 1807—1809年任财政大臣, 1809—1812年任首相。——第15、432、457、648页。
- 洛克·金——见金, 彼得·约翰·洛克。
- 洛贝尔图渐, 约翰·卡尔 (Rodbertus, Johann Karl 1805—1875) ——德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代表; 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温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 普鲁士国民议会中间派左翼的领袖, 后来成为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第652、653、690页。
- 洛林的昂利第二, 吉兹公爵 (Henri de Lorraine, duc de Guise 1614—1664) ——法国的弗伦特党活动家之一。——第30页。
- 哈丁, 亨利 (Hardinge, Henry 1785—1856) ——子爵, 英国元帅和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印度总督 (1844—1848年1月), 英军总司令 (1852—1856)。——第507页。
- 哈维, 阿弗里德 (Harvey, Alfred) ——英国政治活动家, 皮尔派, 议会议员。——第194页。
- 哈德逊, 乔治 (Hudson, George 1800—1871) ——英国企业家, 最大的铁路业主, 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第213、677页。
- 哈蒙德, 艾德蒙 (Hammond, Edmund 1802—1890) ——英国外交家, 曾任外交副大臣 (1854—1873)。——第159、458页。
- 哈尔科特, 弗兰西斯·维农 (Harcourt, Francis Vernon) ——英国政治活动家, 皮尔派, 议会议员。——第194页。
- 哈弗洛克, 亨利 (Havelock, Henry 1795—1857) ——英国将军, 第一次英国对阿富汗的战争 (1838—1842) 和第一次英国对锡克人的战争 (1845—1846) 的参加者; 1857年参加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302、303、318、319、323、325、326、330、331、353、382、385、528、556页。
- 威勒尔 (Wheeler) ——东印度公司的副董事长 (1773—1780)。——第586页。
- 威勒尔, 休·马希 (Wheeler, Hugh Massy 1789—1857) ——英国将军, 1838—1839年参加第一次英国对阿富汗的战争; 参加过英国对锡克人的战争 (1845—1846和1848—1849), 曾任康波儿驻防军指挥官 (1856—1857), 参加过镇压 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302、325、404、406页。
- 威尔逊, 阿奇戴尔 (Wilson, Archdale 1803—1874) ——英国将军, 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期在围困和强攻德里时 (1857) 任指挥官, 在围困勒克瑙时 (1858) 任炮兵指挥官。——第323、328、354、359、528页。
- 威尔逊, 詹姆斯 (Wilson, James 1805—1860)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派, “经济学家”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 议会议员, 1853—1858年任财政部秘书长。——第147、483、484、575页。
- 威尔逊, 乔治 (Wilson, George 1808—1870) ——英国厂主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派, 反谷物法同盟主席 (1841—1846)。——第184页。
- 威尔逊 (Wilson, N. 死于1857年) ——英国上校, 参加过镇压 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415、416页。

- 威尔斯里侯爵, 理查·科利 (Wellesley, Richard Colley 1760—1842) —— 英国国家活动家, 曾任印度总督 (1798—1805), 外交大臣 (1809—1812), 爱尔兰总督 (1821—1828、1833—1884)。——第503、504页。
- 威廉一世 (Wilhelm 1797—1888) —— 普鲁士亲王, 摄政王 (1858—1861), 普鲁士国王 (1861—1888)。——第540、635、643—645、648—653、657—659、682、692—694、696、702、703页。
- 威廉四世 (William 1765—1837) —— 英国国王 (1830—1837)。——第505页。
- 威廉斯, 威廉·芬威克, 卡尔斯从男爵 (Williams, William Fenwick, Baronet of Kars 1800—1883) —— 英国将军, 1855年克里木战争时期领导过卡尔斯的防御战; 议会议员 (1856—1859), 曾任乌里治守军指挥官 (1856—1859)。——第157、411页。
- 威斯特华伦, 斐迪南 (Westphalen, Ferdinand 1799—1876) —— 普鲁士反动的国家活动家, 曾任内务大臣 (1850—1868)。——第648、678页。
- 威灵顿公爵, 阿瑟·威尔斯里 (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1769—1852) —— 英国元帅, 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首相 (1828—1830), 外交大臣 (1834—1835)。——第432页。
- 勃兰登堡, 弗里德里希·威廉 (Brandenburg, Friedrich Wilhelm 1792—1850) —— 伯爵, 普鲁士将军, 普鲁士反动内阁的首脑 (1848—1850)。——第650页。
- 迪斯累里, 本杰明, 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1871年受封)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 ——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 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 曾任财政大臣 (1852、1858—1859、1868—1868), 内阁首相 (1868和1874—1880)。——第140、141、146、147、156、157、170、192、195、263—267、288、289、433、476—480、538、539、575页。
- 英格利斯, 约翰·艾尔德利·威尔莫特 (Ingليس, John Eardley Wilmot 1814—1862) —— 英国将军, 曾参加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400、401、403—405页。
- 范科特兰特, 亨利·查理 (Van Cortlandt, Henry Charles 1815—1888) —— 英国将军, 1832年至1839年在锡克军队中供职, 曾站在英军方面参加第一次和第二次英国对锡克人的战争 (1845—1846、1848—1849); 参加过镇压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286、301、318、330页。
- 范斯特罗本齐, 查理·托马斯 (Van Straubenzee, Charles Thomas 1812—1892) —— 英国将军, 1855—1856年在克里木战争中担任英军一个旅的指挥官, 1857—1858年在第二次对华鸦片战争中担任英军指挥官。——第623页。

十 画

- 海涅, 亨利希 (Heine, Heinrich 1797—1856) —— 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第45页。
- 海特男爵, 奥古斯特 (Heydt, August 1801—1874) —— 普鲁士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 曾任商业、工业和公共工程大臣 (1848年12月—1862年)。——第672、

- 679、680页。
- 席勒, 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 ——伟大的德国作家。——第559、673页。
- 夏龙-奥伦治世家 (Châlons - Oranien) ——始于十四世纪的伯爵家族。——第105页。
- 爱里斯, 亨利 (Ellis, Henry 1777—1855) ——英国外交家, 曾任驻德黑兰公使 (1814—1815), 后任大使 (1835—1836)。——第131页。
- 埃尔尔斯纳, 卡尔·弗里德里希·摩里茨 (Elsner, Karl Friedrich Moritz 1809—1894) ——西里西亚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激进派; 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会议员, 属于左派; 五十年代时是“新奥得报”编辑之一。——第690页。
- 埃利奥特, 威廉 (Elliot, William) ——英国政治活动家, 议会议员 (1802)。——第457页。
- 埃伦伯勒男爵, 爱德华·罗 (Ellenborough, Edward Law 1750—1818) ——英国法学家, 辉格党人, 后为托利党人, 曾任首席检察官 (1801—1802), 皇家法庭首席法官 (1802—1818)。——第462页。
- 埃伦伯勒伯爵, 爱德华·罗 (Ellenborough, Edward Law 1790—1871)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 曾任印度总督 (1842—1844); 1846年任海军首席大臣, 1858年任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 埃伦伯勒男爵之子。——第276、433、499、503、519、560、561页。
- 埃梅里奥, 莫里斯·茹利安 (Emeriau Maurice Julien 1762—1845) ——法国海军上将, 地中海舰队指挥官 (1811—1814)。——第100页。
- 埃格林顿伯爵, 阿契波德·威廉·蒙哥马利 (Eglington, Archibald William Montgomerie 1812—1861)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爱尔兰总督 (1852、1858—1859)。——第711、712、714页。
- 埃斯科苏拉-伊-莫罗格, 帕特里西奥·德·拉 (Escosura y Morogh, Patricio de la 1807—1878) ——西班牙作家和国家活动家, 1856年任埃斯科苏拉内阁的内务大臣。——第45页。
- 埃斯科帕特罗, 巴尔多梅罗, 维多利亚公爵 (Espartero, Baldomero, duque de la Victoria 1793—1879) ——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进步派领袖, 1841—1843年任西班牙摄政, 1854—1856年任政府首脑。——第42、44—46、53、235页。
- 埃斯潘纳斯, 沙尔·玛丽·埃斯普里 (Espinasse, Charles Marie Esprit 1815—1859) ——法国将军, 波拿巴主义者,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1854年率兵远征多布鲁甲; 1855年参加克里木战争; 任内务和公安大臣时 (1858) 实行恐怖统治。——第428、440、444、446、465、501页。
- 俾斯麦, 奥托·冯·申豪森 (Bismarck, Otto von Schönhausen 1815—1898) ——公爵, 普鲁士和德意志国家活动家, 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表人物; 曾任驻彼得堡大使 (1859—1862) 和驻巴黎大使 (1862), 普鲁士首相 (1862—1871), 德意志帝国首相 (1871—1890); 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统一; 工人运动的死敌, 曾制订反社会主义者特别法 (1878)。——第653页。
- 班迪亚, 亚诺什 (Bangya, János 1817—

- 1868)——匈牙利新闻记者和军官,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成为科苏特的国外密使,同时也是秘密警探;后来改名穆罕默德·贝伊,到土耳其军队中供职;在切尔克斯人对俄战争时作为土耳其奸细在高加索进行活动(1855—1858)。——第179、508、509、513、514、592—597页。
- 格林,乔治·格伦费耳(Glyn George Grenfell 1824—1887)——英国银行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财政部秘书长(1868—1873)。——第479页。
- 格雷,亨利·乔治(Grey, Henry George 1802—1894)——伯爵,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军务大臣(1835—1839),陆军和殖民大臣(1846—1852),查理·格雷之子。——第152、158、538、543、546、708页。
- 格雷,查理(Grey, Charles 1764—1845)——伯爵;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之一,曾任首相(1830—1834)。——第432页。
- 格兰安,詹姆斯·罗伯特·乔治(Graham, James Robert George 1792—1861)——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皮尔派;曾任内务大臣(1841—1846),海军首席大臣(1830—1834、1852—1855)。——第157、170—173、194页。
- 格兰特,詹姆斯·霍普(Grant, James Hope 1808—1875)——英国将军,1840—1842年参加第一次对华鸦片战争;1845—1846年和1848—1849年参加英国对锡克人的战争;参加过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416、470、473、474、554、611页。
- 格兰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阿道夫(Granier de Cassagnac, Adolphe 1806—1880)——法国记者,无原则的政客;1848年革命前是奥尔良派,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代表(1852—1870),立场极右;为“立宪主义者报”撰稿。——第431、454页。
- 格伦维尔,威廉(Grenville, William 1759—1834)——男爵,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外交大臣(1791—1801),内阁首相(1806—1807)。——第10、456、461页。
- 格尔拉赫,列奥波特(Gerlach, Leopold 1790—1861)——普鲁士将军,四十年代时是反动宫廷奸党的首领;1850年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将军侍卫长。——第650、672页。
- 格兰维耳伯爵,乔治·鲁森-高尔(Granville, George Leveson-Gower 1815—1891)——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的领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1851—1852、1870—1874、1880—1885),枢密院院长(1852—1854、1855—1858、1859—1866),殖民大臣(1868—1870、1886)。——第159、262页。
- 格劳修斯,胡果(Grotius, Hugo 1583—1645)——荷兰学者,法学家,资产阶级自然法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第248页。
-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派,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第140、141、144—147、157、159、170、194、195、477、547、561、575、705、706页。

- 库克, 乔治·温格罗夫 (Cooke, George Wingrove 1814—1865) —— 英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和记者, 1857年为“泰晤士报”驻中国通讯员。——第601、603、604、663页。
- 库埃尔·辛格 (Kuer Singh 死于1858年) —— 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奥德的起义者领袖之一。——第336页。
- 哥尔查科夫, 米哈伊尔·德米特利也维奇 (Горчаков, Михаил Дмитриевич 1793—1861) —— 公爵, 俄国将军, 曾任多瑙河俄军司令 (1853—1854), 克里木驻军总司令 (1855年2—12月), 波兰王国总督 (1856—1861)。——第210页。
- 朗比尔·辛格 (Ranbir Singh——出生于克什米尔的印度拉扎; 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期站在英国人一边。——第333页。
- 朗格维尔世家 (Longueville) —— 法国的公爵家族 (1505—1672)。——第105页。
- 特纳, 詹姆斯·阿斯皮纳耳 (Turner, James A spinall 1797—1867) —— 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 曼彻斯特商会主席。——第183页。
- 泰特, 威廉 (Tite, William 1798—1813) —— 英国建筑学家, 自由党人, 1855年起为议会议员。——第567页。
- 翁鲁, 汉斯·维克多 (Unruh, Hans Victor 1806—1886) —— 普鲁土工程师,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1848年是普鲁土国民议会中间派领导人之一, 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 属于左派; 以后是进步主义者政党的创始人之一, 后来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653、690页。
- 索菲娅, 奥地利大公夫人 (Sophie, Erzherzogin von Österreich 1805—1872) —— 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之母。——第634页。
- 乌沙尔, 让·尼古拉 (Houhard, Jean Nicolas 1740—1793) —— 法国将军, 1793年指挥法国北方军团击溃约克公爵的英国军队。——第7页。
- 乌特勒姆, 詹姆斯 (Outram, James 1803—1863) —— 英国将军, 1854—1856年任勒克瑙驻札官; 1857年英国对波斯战争时期曾担任英军指挥官; 1857—1858年任奥德首席专员; 参加过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330、400、406、469、470、472、473、518、519页。
- 纳那·萨希布 (Nana Sahib 约生于1825年) —— 印度的封建主, 最后一个派施华巴吉·拉奥二世 (马拉提国的统治者) 的养子, 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领袖之一。——第302、303、330、524页。
- 纳斯, 理查·萨斯威尔·伯克, 美奥伯爵 (Naas, Richard Southwell Bourke, Earl of Mayo 1822—1872) —— 英国国家活动家, 保守党人; 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 (1852、1858—1859、1866—1868), 印度总督 (1869—1872)。——第711、712页。
- 纳迪尔·沙赫 (Nadir - Shah 1688—1747) —— 波斯的沙赫 (1736—1747), 大军阀, 1738—1739年对印度进行掠夺性的征伐。——第127页。
- 纳集尔·埃德·丁 (Nazir - ed - Din 死于1837年) —— 奥德国王 (1827—1837)。——第505页。
- 纳皮尔, 查理·詹姆斯 (Napier, Charles

- James 1782—1853) —— 英国将军, 参加过反拿破仑第一的战争, 1842—1843年指挥驻印军队攻占信德, 1843—1847年为信德执政者。——第138、270、284、382、411页。
- 纳尔瓦艾斯, 拉蒙·马利阿, 瓦伦西亚公爵 (Navárez, Ramón María, duque de Valencia 1800—1868) —— 西班牙将军和反动的国家活动家, 温和派的领袖, 政府首脑 (1844—1846、1847—1851、1856—1857、1864—1865、1866—1868), 残酷镇压群众的革命活动。——第42—44、235、236、240页。
- 纽卡斯尔公爵, 亨利·佩勒姆·费恩斯·佩勒姆·克林顿 (Newcastle, Henry Pelham Fiennes Pelham Clinton 1811—1864) —— 英国国家活动家, 皮尔派, 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 (1852—1854), 陆军大臣 (1854—1855), 殖民大臣 (1859—1864)。——第159页。
-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 —— 法国皇帝 (1804—1814和1815)。——第31、42、90、92、98—102、121、123、125、311、323、324、405、430、435、436、449、456—463、602、628、637、674、678页。
- 拿破仑第二——见雷希施塔特公爵, 约瑟夫·弗朗斯瓦·沙尔·波拿巴。
- 拿破仑第三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Napoléon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 —— 拿破仑第一的侄子, 第二共和国总统 (1848—1851), 法国皇帝 (1852—1870)。——第19、20、26、30、31、32—36、38、40、42、43、53、55、60—62、65、66、69、71、79、82、84、88、155、165、166、169、170、195、218、221、226、227、242—244、249、256—258、278、279、289、308、315、351、375—377、379、417—423、428—432、434、435、437、438、440—444、446—448、450、451—456、460、465—468、481—487、499、502、520—522、540、541、545、546、644、666—670、674、686、689、695、698、706、709页。
- 拿破仑亲王——见波拿巴, 约瑟夫·沙尔·保尔。
- 马丁, 詹姆斯 (Martin, James 1815—1886) —— 男爵, 英国法学家; 1857年任首席检察官, 1858年主持中央刑事法庭。——第705页。
- 马丁, 罗伯特·蒙哥马利 (Martin, Robert Montgomery 1803左右—1868) —— 英国历史学家和统计学家, 著名的东方旅行家。——第584、585页。
- 马尼扬, 贝尔纳·比埃尔 (Magnan, Bernard Pierre 1791—1865) —— 法国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第430页。
- 马志尼, 朱泽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 —— 意大利革命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 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 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第61、450—455、616、716页。
- 马多斯, 帕斯库阿耳 (Madoz, Pascual 1806—1870) —— 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进步派; 1854年任议会议长, 1855年任财政大臣, 参加过1854—1856年革命。——第45页。
- 马森纳, 安得列 (Masséna, André 1756—1817) —— 法国元帅, 拿破仑第一各次征伐的参加者之一, 1814年转向波旁王朝。——第122页。

马扎里尼, 朱利奥·雷蒙多 (Mazzarini, Giulio Raymond 1602—1661) —— 法国国家活动家, 红衣主教; 1643年起任首席大臣, 在路易十四成年以前实际上是法国的统治者; 执行巩固法国专制制度的政策。——第648页。

马尔波罗公爵, 约翰·丘吉尔 (Marlborough, John Churchill 1651—1722) —— 英国统帅, 1702—1711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战争中任英军总司令。——第121、411页。

马尔格累夫伯爵, 乔治·奥加斯特斯·菲普斯 (Mulgrave, George Augustus Phipps 1819—1890) ——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议会议员; 曾任皇室司库 (1853—1858), 后历任英国殖民地总督。——第164页。

马尔科姆, 约翰 (Malcolm, John 1769—1833) —— 英国外交家, 东印度公司官员, 曾任驻德黑兰公使 (1799—1801、1808—1809、1810), 孟买省督 (1826—1830), 关于印度著述甚多。——第77、页。

马拉霍夫公爵——见佩利西埃, 让·雅克。

马姆兹伯里伯爵, 詹姆斯·霍华德·哈里斯 (Malmesbury, James Howard Harris 1807—1889) ——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的著名活动家; 曾任外交大臣 (1852和1858—1859), 掌玺大臣 (1866—1868、1874—1876)。——第6、159、435、542—545页。

“铁人”弗里德里希第二 (Friedrich ,der 《Eiserne》 1813—1871) —— 勃兰登堡选帝侯 (1840—1871)。——第108页。

十一画

曼·辛格 (Man Singh) —— 奥德王国的大封建地主, 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做了英国殖民者的帮凶。——第611、613页。

曼·辛格 (Man Singh) —— 印度的拉扎, 1858年8月依附起义者, 但在1859年初背叛了起义, 出卖了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著名领袖唐蒂亚·托庇。——第613页。

曼涅, 比埃尔 (Magne, Pierre 1806—1879) —— 法国国家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财政大臣 (1855—1860、1867—1869、1870、1873—1874)。——第69、465页。

曼托伊费尔, 奥托·泰奥多尔 (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 —— 男爵, 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贵族官僚的代表, 曾任内务大臣 (1848—1850) 和首相 (1850—1858)。——第632、648、649、658、672、679、694页。

康德, 伊曼努尔 (Kant, Immanuel 1724—1804) —— 杰出的德国哲学家,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创始人。——第678页。

康诺利, 阿瑟 (Conolly, Arthur 1807—1842) —— 英国军官, 1840年任驻希瓦公使, 在布哈拉被逮捕和杀死。——第638页。

康斯坦丁, 尼古拉也维奇 (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7—1892) —— 俄国大公, 尼古拉一世之子, 海军元帅, 领导海军系统 (1853—1881) 和舰队 (1855—1881); 1858—1861年作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委员参加1861年农民改革的准备和实行; 1862—1863年任波兰王国总

- 督。——第627页。
- 康沃利斯,查理(Cornwallis, Charles 1738—1805)——侯爵,英国反动的政治活动家,曾任印度总督(1786—1793、1805);任爱尔兰总督期间(1798—1801)镇压了1798年爱尔兰起义。——第517页。
- 康罗贝尔,弗朗斯瓦·塞尔坦(Carrobert, Francois Certain 1809—1895)——法国元帅,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克里木战争时期任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1854年9月—1855年5月)。——第430、447页。
- 康普豪森,卢道夫(Camphausen, Ludolf 1803—1890)——德国银行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1848年3—6月任普鲁士首相,奉行与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第632、645、654、676、677、679页。
- 章格·巴哈杜尔(Jang Bahdur 1816—1877)——1846年起为尼泊尔的执政者;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期站在英国人一边,参加镇压起义。——第319、471页。
-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cois Pierre Guillaume 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1840年至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31、431、442页。
- 基卜生,托马斯·米尔纳(Gibson, Thomas Milner 1806—1884)——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后成为自由党人,曾任贸易大臣(1859—1865、1865—1866)。——第173、181—183、435页。
- 基尔希曼,尤利乌斯(Kirchmann, Julius 1802—1884)——德国法学家和哲学家,激进主义者;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国派左翼。——第653页。
- 清朝——中国满清王朝(1644—1911)。——第233页。
- 许乃济——中国国家活动家,1834年任广东按察使,1836年提出过一项查禁鸦片走私的计划。——第589页。
- 勒奈,朗贝尔·阿梅德(Renée, Lambert Amédée 1808—1859)——法国政论家,波拿巴主义者,1856年起为“立宪主义者报”和“国家报”的发行负责人。——第481页。
- 勒诺(Renaud 死于1857年)——英国军官,参加过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302页。
- 勒库尔布,克劳德·雅克(Lecourbe, Claude Jacques 1759—1815)——法国将军,十八世纪末的革命战争和拿破仑第一各次征伐的参加者。——第123页。
- 张伯伦,尼维尔·博尔兹(Chamberlain, Neville Bowles 1820—1902)——英国将军,后升元帅,第一次英国对阿富汗的战争(1838—1842)和第二次英国对锡克人的战争(1848—1849)的参加者,指挥过旁遮普的非正规军(1854—1858),镇压过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1876—1881年任马德拉斯军队司令。——第298、328、471、474页。
-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伟大的英国作家。——第6、10、152、161、217、458、761页。
- 得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密斯·

- 斯坦利 (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ery Smith Stanley 1799—1869)——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袖,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之一;曾任首相(1852、1858—1859、1866—1868)。——第145、148—152、155、159、164、193、388、432—435、478、482、518、558、559、563、705—707、711、712页。
- 理查三世 (Richard 1452—1485)——英国国王(1483—1485)。——第161页。
- 培尔西尼,让·日尔贝尔·维克多 (Per-signy, Jean Gilbert Victor 1808—1872)——伯爵,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立法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曾任内务大臣(1852—1854、1860—1863)、驻伦敦大使(1855—1858、1859—1860)。——第33、421、446页。
- 莫尔尼伯爵,沙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 (Morny, Charles Auguste Louis Joseph 1811—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拿破仑第三之同母异父兄弟;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曾任内务部长(1851年12月—1852年1月),立法团议长(1854—1856、1857—1865)驻俄大使(1856—1857)。——第38、220、421、435、443、444页。
- 莫卧儿——见大莫卧儿。
- 莫里哀,让·巴蒂斯特 (Molière, Jean Baptiste 1622—1673) (真姓为波克兰 Poque-lin)——伟大的法国剧作家。——第311、702页。
- 莫扎特,沃尔夫干格·亚马多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伟大的奥地利作曲家。——第311页。
- 敏托伯爵,吉伯特·埃利奥特 (Minto, Gilbert Elliot 1751—1814)——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驻维也纳公使(1799—1801),印度总督(1807—1813)。——第17、461页。
- 梅里,安东尼 (Mery, Anthony)——英国外交家,1802年任驻巴黎公使。——第457、458页。
- 梅森,乔治·亨利·蒙克 (Mason, George Henry Monk 1825—1857)——英国军官,周德普尔驻札官,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被击毙。——第336页。
- 梅特兰,托马斯 (Maitland, Thomas 1759左右—1824)——英国将军,曾任马尔他总督(1813—1824),伊奥尼亚群岛首席专员和地中海英国武装部队司令(1815—1824)。——第708页。
- 梅维森,古斯塔夫 (Mevissen, Gustav 1815—1899)——德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曾创办许多大股份信贷银行和工业股份公司。——第729页。

十二画

- 莱麦尔,格奥尔格·恩斯特 (Reimer, Georg Ernst 1804—1885)——德国出版商,保守派,普鲁士议会议员。——第690页。
-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ro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代表,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探讨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第727、751、752页。
- 博丹-博普雷,沙尔·弗朗斯瓦 (Beau-temps - Beupr é, Charles Franc ois

- 1766—1854)——法国工程师,水文地理学家。——第101页。
- 博宁,爱德华(Bonin, Edward 1793—1865)——普鲁士将军和国家活动家,曾任陆军大臣(1852—1854、1858—1859)。——第671、679页。
- 博斯凯,比埃尔·约瑟夫·弗朗斯瓦(Bosquet, Pierre Joseph Francois 1810—1861)——法国元帅,资产阶级共和派,后来成为波拿巴主义者;曾参加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第430页。
- 琼斯,约翰(Jones, John 1811—1878)——英国军官,在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期指挥一个旅。——第554页。
- 琼斯,哈福德·布莱杰斯(Jones, Harford Brydges 1764—1847)——英国外交家,曾任驻德黑兰公使(1807—1811)。——第78页。
- 凯里,亨利·查理(Carey, Henry Charles 1793—1879)——美国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本主义的辩护人,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一致的反动理论创始者。——第734、736页。
- 凯伦,约翰·康拉德(Kern, Johann Conrad 1808—1888)——瑞士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驻巴黎公使(1857—1883)。——第444页。
- 凯撒(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C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100左右—44)——著名的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99、311页。
- 凯麦隆,休·英内斯(Cameron, Hugh Innes)——英国皇家银行经理(1849—1855),曾因舞弊被判罪。——第56、57、214—216页。
- 腊格伦男爵,菲茨罗伊·詹姆斯·亨利·索美塞特(Raglan, Fitzroy James Henry Somerset 1788—1855)——英国元帅,1854—1855年任克里木驻军司令。——第411页。
- 普切塔——见蒙尼奥斯·木纳温特·霍赛。
- 普莱斯,理查德(Price, Richard 1723—1791)——英国激进派政论家,经济学家和道德论哲学家。——第479、480页。
- 普拉兰,沙尔,舒阿泽尔公爵(Praslin, Charles, duc de Choiseul 1805—1847)——法国贵族,因杀妻而出名,被捕后服毒自杀。——第436页。
- 普鲁士亲王——见威廉一世。
- 普鲁士亲王夫人——见奥古斯塔·玛丽-路易莎·卡塔雅娜。
- 普鲁士王后——见伊丽莎白。
- 普鲁士的阿尔勃莱希特——见阿尔勃莱希特·弗里德里希。
- 普罗克希·奥斯顿,安东(Prokesch-Osten, Anton 1795—1876)——伯爵,奥地利外交家,曾任驻瑞士坦丁堡使臣(公使)(1855—1867),后为大使(1867—1871)。——第279页。
- 普拉斯,昂利(Place, Henri)——法国金融家,股份银行Crédit Mobilier的董事之一。——第31、315页。
- 普拉东诺夫,亚历山大·普拉东诺维奇(Плато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Платонович)——俄国少校,县贵族协会会长;1858年在准备1861年农民改革的彼得堡贵族委员会中担任副主席。——第722页。斯密,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之一。——第733、736、

- 754页。
- 斯密斯, 约翰·马克·弗雷德里克 (Smith, John Mark Frederick 1790—1874)——英国将军, 军事工程师, 议会议员。——第289页。
- 斯密斯, 罗伯特·维农 (Smith, Robert Vernon 1800—1873)——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议会议员, 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 (1855—1858)。——第269、271、433页。
- 斯利曼, 威廉·亨利 (Sleeman, William Henry 1788—1856)——英国殖民官员, 军官, 后升将军, 1843—1849年在瓜廖尔, 1849—1854年在勒克瑙任驻札官。——第507页。
- 斯迈思, 约翰·乔治 (Smythe, John George)——英国政治活动家, 上校, 皮尔派, 议会议员。——第194页。
- 斯坦利, 爱德华·亨利, 得比伯爵 (1869年受封) (Stanley, Edward Henry Earl of Derby 1826—1893)——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六十至七十年代是保守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曾任殖民大臣 (1858、1882—1885), 印度事务大臣 (1858—1859), 外交大臣 (1866—1868、1874—1878), 爱德华·得比之子。——第433、434页。
- 斯托克, 弗朗契舍克 (Stock, Franciszek)——波兰流亡者, 土耳其军队中的军官。——第509、593、595页。
- 斯托达特, 查理 (Stoddart, Charles 1806—1842)——英国外交家和军官, 1838年被任命为驻布哈拉公使, 在布哈拉被逮捕和杀死。——第638页。
- 斯图亚特, 詹姆斯 (Steuart, James 1712—1780)——英国经济学家, 重商主义著名理论家之一。——第736页。
- 斯图亚特, 唐纳德·马丁 (Stewart, Donald Martin 1824—1900)——英国军官, 后升元帅, 参加过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 参加过第二次英国对阿富汗的战争 (1878—1880), 曾任驻印度武装部队总司令 (1881—1885), 印度事务参事会参事 (1885—1900)。——第321页。
- 斯宾诺莎, 巴鲁赫 (别涅狄克特) (Spinoza, Baruch (Benedictus) 1632—1677)——杰出的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 无神论者。——第740页。
- 斯蒂凡尼-路易莎-阿德里安娜, 父姓博阿尔奈 (Stéphanie- Louise- Adrienne, geb. Beauharnais 1789—1860)——1811年起为巴登大公夫人。——第674页。
- 斯特拉博 (Strabon 约公元前63—公元前20)——右希腊最大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第99页。
- 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 斯特服特弗德·坎宁 (Stratford de Redcliffe, Stratford Canning 1780—1880)——英国外交家, 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公使 (1810—1812、1825—1828), 后为大使 (1841—1858)。——第246页。
- 斯特罗本齐——见范斯特罗本齐, 查理·托马斯。
- 惠特洛克, 乔治·柯尔尼希 (Whitlock, George Cornish 1798—1868)——英国将军, 1818年起在东印度公司供职, 参加过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529、555页。
- 惠特沃斯, 查理 (Whitworth, Charles 1752—1825)——英国外交家, 曾任驻巴黎大使 (1802—1803), 爱尔兰总督 (1813—1817)。——第461—463页。

- 温采尔, 奥古斯特 (Wenzel, August 1799—1860) —— 普鲁士司法官员, 议会议员 (1849—1859), 属于左派。——第694页。
- 温德姆, 威廉 (Windham, William 1750—1810) ——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后为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 曾任陆军大臣 (1794—1801)。——第456、461页。
- 温德姆, 查理·阿什 (Windham, Charles Ash 1810—1870) —— 英国将军, 1854—1856年参加克里木战争; 曾任驻拉合尔英军指挥官 (1857—1861), 镇压过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406、411—416、469页。
- 温斯劳, 福布斯 (Winslow, Forbes) —— 英国医生和记者, “心理学医学和精神病学杂志” 编辑。——第566页。
- 费边 (昆图斯·费边·马克西姆) (Quintus Fabius Maximus 公元前 275 左右—203) —— 古罗马统帅, 因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采取观望战术, 避免进行决战而有缓进者之称。——第7页。
- 费特, 摩里茨 (Veit, Moritz 1808—1864) —— 德国出版商, 自由派, 普鲁士议会议员。——第690页。
- 费特赫·阿利·沙赫 (Feth- Ali- Shah 1762—1834) —— 波斯的沙赫 (1797—1834)。——第78页。
- 费鲁赫汗 (Ferukh Khan) —— 波斯外交家, 1857年英波条约的签字人; 曾任驻伦敦公使 (1857)。——第246、248页。费兹帕特里克, 理查 (Fitzpatrick, Richard 1747—1813) —— 英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 议会议员; 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 (1782), 陆军大臣 (1783、1806—1807)。——第10页。
- 雅科比, 卡尔·维干德·马克西米利安 (Jacobi, Karl Wigand Maximilian 1775—1858) —— 德国精神病医师。——第632页。
- 雅科比, 约翰 (Jacoby, Johann 1805—1877) —— 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左派的领导人之一; 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 属于极左派; 七十年代归属社会民主党。——第652、690页。
- 舒瓦洛夫, 彼得·巴甫洛维奇 (Шувалов, Петр Павлович 生于1824年) —— 彼得堡省贵族会会长, 准备1861年农民改革的彼得堡贵族委员会主席。——第722页。
- 富尔德, 阿希尔 (Fould, Achille 1800—1867) —— 法国银行家和国家活动家, 奥尔良派, 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 1849—1867年曾多次任财政部长, 1852—1860年任皇廷事务大臣。——第220、421、430页。
- 傅立叶, 沙尔 (Fourier, Charles 1772—1837) —— 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38页。
- 斐迪南二世 (Ferdinand 1810—1859) —— 那不勒斯国王 (1830—1859), 由于1848年炮击墨西拿而得到“炮弹国王”的译号。——第19页。
- 斐迪南七世 (Ferdinand 1784—1833) —— 西班牙国王 (1808和1814—1833)。——第43、51、52页。
- 斐迪南亲王——见弗雷德里克·斐迪南。
- 菲力浦, 奥尔良公爵 (Philippe, duc d'Orléans 1674—1723) —— 法国的摄政王 (1715—1723)。——第40、315、453页。
- 菲力浦逊, 格里哥里·伊万诺维奇

- (Филлисон, 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1809—1883)——俄国将军,参加过征服高加索。——第508、595页。
- 菲利莫尔, 约翰·乔治 (Phillimore, John George 1808—1865)——英国法学家, 自由派政治活动家, 皮尔派, 议会议员 (1852—1857)。——第194页。
- 菲利莫尔, 罗伯特·约瑟夫 (Phillimore, Robert Joseph 1810—1885)——英国法学家, 辉格党人, 后为皮尔派; 议会议员 (1852—1857); 约翰·乔治·菲利莫尔之弟。——第194页。
- 菲茨罗伊, 亨利 (Fitzroy, Henry 1807—1859)——英国政治活动家, 皮尔派, 后为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曾任内务副大臣 (1852—1855)。——第567页。
- ### 十三画
- 雷, 约翰 (Rea, John 1822—1881)——爱尔兰政治活动家, “青年爱尔兰”社的成员。——第713页。
- 雷希·伊文思——见伊文思, 乔治·德·雷希。
- 雷希施塔特公爵, 约瑟夫·弗朗斯瓦·沙尔·波拿巴 (Reichstadt, Joseph Francois Charles Bonaparte 1811—1832)——拿破仑第一和玛丽亚·路易莎之子; 曾被波拿巴派提为法国王位继承人。——第446页。
- 雷纳尔, 沙尔·弗雷德里克 (Reinhard, Charles Frédéric 1761—1837)——伯爵, 法国外交家, 1802年任驻下萨克森公使, 原系德国人。——第463页。
- 塔索, 托尔克瓦托 (Tasso, Torquato 1544—1595)——著名的意大利诗人, “解放了的耶路撒冷”——诗的作者。——第441页。
- 塔尔迈尔 (Thalmayr) (又名艾敏·阿加 Emin-aga)——在土耳其的匈牙利流亡者。——第594页。
- 道光——中国皇帝 (1821—1850)。——第190页。
- 蒙蒂霍, 欧仁妮 (Montijo, Eugénie 1826—1920)——法国皇后, 拿破仑第三之妻。——第421页。
- 蒙尼奥斯夫人——见玛丽·克里斯蒂娜。
- 蒙尼奥斯·本纳温特, 霍赛 (普切塔) (Muñoz Benavente, José (Pucheta) 1820—1856)——西班牙斗牛士, 1854—1856年资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马德里人民群众的领导者之一, 1856年六月事件中领导马德里的工人武装队伍; 在战斗中牺牲。——第45、50页。
- 蒙克里夫, 詹姆斯 (Moncreiff, James 1811—1895)——英国法学家, 议会议员; 曾任苏格兰检察长 (1851—1852、1852—1858、1859—1866、1868—1869)。——第157页。
- 蒙塔郎贝尔, 沙尔 (Montalembert, Charles 1810—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奥尔良派, 天主教党的首领;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支持路易·波拿巴, 但不久又成为他的反对者。——第35、36、666—669、698页。
- 摄政王——见威廉一世。
- 塞西杰尔, 弗雷德里克, 切耳姆斯福德男爵 (Thesiger, Frederick, Baron Chelmsford 1794—1878)——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40年起为议会议员, 曾任首席检察官 (1845—1846、1852), 大法官 (1858—1859、1866—1868)。——

- 第157页。
- 塞万提斯·德·萨维德拉, 米格尔 (Cervantes de Saavedra, Miguel 1547—1616) ——伟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第479页。
- 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 (Servius Tullius 公元前578—534) ——罗马第六个皇帝。——第660页。
- 塞拉诺-伊-多敏格斯, 弗朗西斯科 (Serano y Domínguez, Francisco 1810—1885) ——西班牙将军和国家活动家, 陆军大臣 (1843), 1856年政变的参加者, 外交大臣 (1862—1863), 政府首脑 (1868—1869, 1871, 1874), 王国摄政 (1869—1871)。——第42、238页。
- 塞费尔-帕沙 (Sefer- Pasha) ——切尔克西亚王公; 听命于土耳其, 曾参加俄土战争 (1826—1828); 1855—1859年领导了切尔克斯山民同俄国作战。——第508、513、514、593、694、597页。
- 塞巴斯提昂尼, 奥拉斯 (Sebastiani, Horace 1772—1851) ——伯爵, 法国元帅, 外交家; 1801—1802年在土耳其、埃及和叙利亚任拿破仑第一的外交使节; 曾任外交大臣 (1830—1832), 驻伦敦大使 (1835—1840)。——第461页。
- 福克斯, 威廉·约翰逊 (Fox, William Johnson 1786—1864) ——英国政治活动家, 传教士, 政论家, 自由贸易派, 后来属于自由党, 议会议员。——第181页。
- 福克斯, 查理·詹姆斯 (Fox, Charles James 1749—1806)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领袖之一, 曾任外交大臣 (1782、1783、1806)。——第10、432页。
- 杨格, 约翰 (Young, John 1807—1876)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 (1852—1855), 伊奥尼亚群岛首席专员 (1855—1859)。——第705、707页。
- 詹姆斯, 爱得文·约翰 (James, Edwin John 1812—1882) ——英国律师, 议会议员, 曾做过贝尔纳的辩护人。——第482页。
- 詹姆斯一世 (James 1566—1625) ——英国国王 (1603—1625)。——第653页。
- 詹姆斯二世 (James 1633—1701) ——英国国王 (1685—1688)。——第458、653页。
- 瑟美列, 贝尔塔兰 (Szemere, Bertalan 1812—1869) ——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曾任内务部长 (1848) 和革命政府首脑 (1849); 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第180页。
- 路易十三 (Louis XIII 1601—1643) ——法国国王 (1610—1643)。——第648页。
- 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38—1715) ——法国国王 (1643—1715)。——第62、78、453、458页。
- 路易十八 (Louis XVIII 1755—1824) ——法国国王 (1814—1815 和 1815—1824)。——第43、427、646页。
-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菲利浦 (Louis- Philippe 1773—1850) ——奥尔良公爵, 法国国王 (1830—1848)。——第33、40、42、43、241、243、256、264、375、429、430、436、453、465、502、659、666页。
- 路易斯, 乔治·康瓦尔 (Lewis, George Cornwall 1806—1863)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财政部秘书长 (1850—1852), 1852年至1855年为“爱丁堡评

- 论"的出版者和编辑;财政大臣(1855—1858),内务大臣(1859—1861),陆军大臣(1861—1863)。——第140、141、144—146、434、477、479、575页。
- 路加德,爱德华(Lugard, Edward 1810—1898)——英国将军;在英国对波斯战争期间(1856—1857)任参谋长;参加过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473、555页。
- 路特希尔德,詹姆斯(Rothschild, James 1792—1868)——巴黎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第31页。
- 路特希尔德家族(Rothschilds)——金融世家,在欧洲许多国家设有银行。——第70、243、380、645页。
- 奥托,路易·吉约姆(Otto, Louis Guillaume 1754—1817)——法国外交家,曾任驻伦敦公使(1800—1802),驻维也纳大使(1809—1813)。——第457、458、460页。
- 奥克兰伯爵,乔治·伊登(Auckland, George Eden 1784—1849)——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多次担任内阁大臣,1836—1842年任印度总督。——第131、505、507页。
- 奥尔良王朝(Orléans)——法国王朝(1830—1848)。——第443、444、499、502、521页。
- 奥尔良公爵——见路易·菲利浦。
- 奥尔良的玛丽,奈穆尔公爵夫人(Marie d'Orléans, duchesse de Nemours 1625—1707)——胡格维尔公爵昂利第二之女。——第105页。
- 奥尔洛夫,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Орлов, Алексей Федорович 1786—1861)——公爵,俄国军事和国家活动家,外交家;1856年率领俄国代表团出席巴黎会议;国家参议院和大臣委员会主席(1856);1858年任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主席,反对废除农奴制。——第17页。
- 奥尔西尼,费利切(Orsini, Felice 1819—1858)——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争取意大利民族解放和统一的斗争的杰出活动家之一;因行刺拿破仑第三被处死。——第432、436—439、441、442、444页。
- 奥尔棱普子爵,约翰·查理·斯宾塞(Althorp, John Charles Spencer 1782—1845)——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1830—1834年任财政大臣。——第15页。
- 奥尔斯瓦特,普道夫(Auerswald, Rudolf 1795—1866)——普鲁士国家活动家,与资产阶级相接近的自由派贵族的代表;曾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48年6—9月),不管部大臣(1858—1862)。——第672、676—678页。
- 奥尔德利的斯坦利男爵,爱德华·约翰·斯坦利(Stanley of Alderley, Edward John Stanley 1802—1869)——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曾任贸易大臣(1855—1858),邮政大臣(1860—1866)。——第388、389、391页。
- 奥当斯·博阿尔奈(Hortense Beauharnais 1783—1837)——拿破仑第三之母,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之妻。——第456、644页。
- 奥当奈尔,列奥波多,吕逊纳伯爵(O'Donnell, Leopoldo, Conde de Lucena 1809—1867)——西班牙将军和反动的国家活动家,温和派的领袖之一;古巴总督(1843—1848),1854年利用国内革命危机建立了军事专政;曾以陆军大臣

- 身分领导了镇压1854—1856年资产阶级革命；历任政府首脑（1856、1858—1863、1865—1866）。——第41—46、49、50、52、53、235、236、240页。
- 奥当奈尔，恩利克·霍赛，比斯巴尔伯爵（O'Donnell, Enrique José, Conde de la Bisbal 1769—1834）——西班牙将军，1808—1814年独立战争的参加者；以毫无原则著称；在反动时期（1814—1820）同自由派保持联系，向政府出卖过革命者。——第43页。
- 奥古斯塔·玛丽·路易莎·卡塔琳娜（Augusta - Marie - Louise - Katharina 1811—1890）——普鲁士亲王威廉之妻。
——第635、671、674、692—694页。
- 奥地利的阿尔勃莱希特——见阿尔勃莱希特第三。
- 奥伦治的威廉三世（William of Orange 1650—1702）——尼德兰总督（1672—1702），英国国王（1689—1702）。——第105页。
- 奥维尔斯顿男爵，赛米尔·琼斯·劳埃德（Overstone, Samuel Jones Loyd 1796—1883）——英国银行家，辉格党人，对罗伯特·皮尔的财政政策，特别是皮尔的1844年英格兰银行法，起主要影响。——第339、369、574、575页。
- ### 十四画
- 豪弗，威廉（Hauff, Wilhelm 1802—1827）——德国小说家。——第631页。
- 玛丽·克里斯蒂娜（Maria - Christina 1806—1878）——西班牙王后（1829—1833），斐迪南七世之妻，王国摄政（1833—1840）。——第42、43、52、126、235页。
- 玛蒂尔达，波拿巴公主（Mathilde, Bonaparte 1820—1904）——日罗姆·波拿巴之女，拿破仑第三之堂妹。——第438页。
- 歌德，约翰·沃尔弗干格（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645、673、675页。
-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 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第31、724、758页。
- 赫伯特，悉尼（Herbert, Sidney 1810—1861）——英国国家活动家，初期是托利党人，后为皮尔派；曾任海军部秘书长（1841—1845），军务大臣（1845—1846和1852—1855）和陆军大臣（1859—1860）。——第157、194、195页。
- 维尔曼，阿贝尔·弗朗斯瓦（Villemain, Abel Francois 1790—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自由派，曾任国民教育大臣（1839—1840、1840—1844）。——第431、698页。
- 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Victor - Emmanuel 1820—1878）——撒丁国王（1849—1861），意大利国王（1861—1878）。——第20、380、698页。
- 维莱什（Verres）——在土耳其的匈牙利流亡者。——第597页。
- 维伊奥，路易·弗朗斯瓦（Veillot, Louis Francois 1813—1883）——法国记者，天主教的狂热支持者，“世界报”的主编（1848—1860）。——第447页。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第493页。

十五画

潘缪尔男爵,福克斯·莫尔(Panmure, Fox Maule 1801—1874)——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军务大臣(1846—1852),陆军大臣(1855—1858)。——第433页。

墨尔本子爵,威廉·拉姆(Melbourne, William Lamb 1779—1848)——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30—1834)和首相(1834、1835—1841)。——第432页。

缅施科夫,亚历山大·谢尔盖也维奇(Менш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87—1869)——公爵,俄国军事和国家活动家,1853年任驻君士坦丁堡特命全权大使,曾任俄国克里木陆海军总司令(1853—1855)。——第277、447页。

德朗格尔,克劳德·阿尔丰斯(Delangle, Claude Alphonse 1797—1869)——法国法学家和反动的政治活动家,1847年至1848年二月革命以前任检察长;帝国法庭庭长,1858—1859年任内务大臣。——第437页。

十六画

默西,德(Mercy, de)——法国军官,1858年因凶杀本团的一名军官而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第522页。

默里,查理·奥加斯特斯(Murray, Charles Augustus 1806—1895)——英国外交家,曾任驻埃及总领事(1846—1853),驻德黑兰公使(1854—1859)。——第249、287页。

霍格,詹姆斯·威尔(Hogg, James Weir 1790—1876)——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派;议会议员;1846—1847年和1852—1853年是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印度事务参事会参事(1858—1872)。——第175、194页。

霍策,弗里德里希(Hotze, Friedrich 1739—1799)——奥地利元帅。——第122页。

霍纳,莱易纳德(Harner, Leonard 1785—1864)——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工厂视察员(1833—1856),维护工人利益。——第198页。

霍姆斯,约翰(Holmes, John 1808—1878)——英国上校,后升将军,参加过第一次英国对阿富汗的战争(1838—1842)和对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镇压。——第612页。

霍尔卡尔,图卡吉(Holkar, Tukadjji 约生于1836年)——马拉提人,印度印多尔公国的国君,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期站在英国人一边。——第321页。

霍亨索伦王朝(Hohenzollern)——勃兰登堡选帝侯(1415—1701)、普鲁士国王(1701—1918)和德国皇帝(1871—1918)的王朝。——第104、105、107、111、644、649、650、656、674、693页。

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卡尔-安东(Hohenzollern-Sigmaringen, Karl-Anton 1811—1885)——亲王,普鲁士将军,曾任首相(1858—1862)。——第671、674、675页。

霍克斯柏里,罗伯特·班克斯·詹金森(Hawkesbury, Robert Banks Jenkinson 1770—1828)——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外交大臣(1801—1803、

- 1809), 内务大臣 (1804—1806、1807—1809), 首相 (1812—1827)。——第457、458、460、461页。
- 鲍切尔, 乔治 (Bourchier, George 1821—1898) ——英国军官, 曾参加镇压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328页。
- 璞鼎查, 亨利 (Pottinger, Henry 1789—1856) ——英国外交家和将军, 1841—1842年任驻华公使, 1842年第一次对华鸦片战争时任英军司令, 1843年任香港总督, 1847—1854年任马德拉斯总督。——第189、600页。
- 诺兰, 路易斯·爱德华 (Nolan, Lewis Edward 1820左右—1854) ——英国军官, 在印度服役, 曾参加克里木战争, 著有骑兵方面的书籍甚多。——第229页。
- 诺思科特, 斯泰福·亨利 (Northcote, Stafford Henry 1818—1887) ——英国国家活动家, 皮尔派, 后属保守党, 议会议员 (1855—1857、1858—1885) 历任内阁大臣。——第194页。
- 诺塞达尔, 康迪多 (Nocedal, Cándido 1821—1885) ——西班牙政论家, 属于温和派, 议会议员; 曾任内务大臣 (1856—1857)。——第236页。
- 穆勒, 约翰·斯图亚特 (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 政治经济学古典派的摹仿者。——第577、736、737页。
- 穆苏卢斯-帕沙 (康斯坦丁) (Musurus-Pasha (Konstantin) 1807—1891) ——土耳其外交家, 曾任驻伦敦公使, 后为大使 (1851—1885); 原系希腊人。——第279、280页。
- 穆罕默德·阿利·沙赫 (Mohammed Ali-Shah) ——奥德国王 (1837—1842)。——第505页。
- 穆斯托克西迪斯, 安得列阿斯 (Moustoxydes, Andreas 1785—1860) ——希腊学者和政治活动家, 从事伊奥尼亚群岛历史的研究。——第708页。
- 赖辛施佩格, 奥古斯特 (Reichensperger, August 1808—1895) ——德国法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从1852年起为普鲁士议会中的天主教议员的领袖。——第694页。
- 赖德律-洛兰,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Ledru - Rollin, Alexandre Auguste 1807—1874) ——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袖之一, “改革报”编辑; 1848年是临时政府委员, 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 1849年6月13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第33页。

十七画

缪拉特·约阿希姆 (Murat, Joachim 1767—1815) ——法国元帅, 拿破仑第一各次征伐的参加者, 1808年任驻西班牙的法军指挥官; 那不勒斯国王 (1808—1815)。——第52、674页。

十八画

额尔金伯爵, 詹姆斯·布鲁斯 (Elgin, James Bruce 1811—1863) ——英国外交家, 1857—1858年和1860—1861年作为特命全权代表出使中国; 曾任印度总督 (1862—1868)。——第254、663页。

魏格林, 托马斯 (Wegelin, Thomas) ——英国商业家, 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 1857年是英格兰银行经理。——第580页。
- 萨西, 赛米尔·西尔韦斯特·德 (Sacy, Samuel Silvestre de 1801—1879) ——法国政论家, 1828年起参加“辩论日报”编辑部。——第431页。
- 萨伊, 让·巴蒂斯特 (Say, Jean Baptiste 1767—1832) ——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746页。
- 萨顿, 约翰·亨利·曼纳斯 (Sutton, John Henry Manners) ——英国政治活动家, 皮尔派, 议会议员 (1847—1857)。——第194页。
- 萨格登, 爱德华·圣莱昂纳兹男爵 (Sugden, Edward, Baron, St Leonards 1781—1875) ——英国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52年任大法官。——第433页。
- 萨德勒, 约翰 (Sadleir, John 1814—1856) ——爱尔兰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议会中爱尔兰集团的领袖之一, 梯培雷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董事; 1853年任财政副大臣, 因梯培雷里银行在1856年破产自杀。——第32、55页。
- 萨瓦王朝 (Savoyen) ——意大利的王朝之一, 从1720年至1861年统治撒丁王国, 从1861年至1946年统治意大利联合王国。——第17—21页。
- 萨瓦亲王奥伊根 (Eugen, Prinz von Savoyen 1663—1736) ——奥地利统帅和外交家。——第121页。
- 萨尔托里乌斯, 费南多·路易斯·霍赛, 圣路易斯伯爵 (Sartorius, Fernando Luis José, conde de San Luis 1820—1871) ——西班牙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政论家, 温和派领袖之一, 曾任内务大臣 (1847—1851), 政府首脑 (1853—1854)。——第235、236页。

十九画

- 庞培 (格奈尤斯·庞培·马格努斯) (Gnaeus Pompeius Magnus 公元前106—48) ——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99页。

期 刊 索 引

二 画

- “人民报”(《Volks-Zeitung》)——柏林出版。——第657页。
- “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第3页。
- “十字报”(《Kreuz-Zeitung》)——见“新普鲁士报”。

三 画

- “上帝和人民”(《Dio e Popolo》)——热烈亚出版。——第616页。
- “大陆评论”(《The Continental Review》)——伦敦出版。——第444页。
- “大陆上中华之友”(《The Overland Friend of China》)——香港出版。——第150、585页。
- “乡下佬”(《The M ofussilite》)——米拉特、阿格拉、安巴拉出版。——第301页。

四 画

- “凤凰”(《The Phoenix》)——加尔各答出版。——第410页。
- “太阳报”(《The Sun》)——伦敦出版。——第195页。
- “中华之友”(《Friend of China》)——见“大陆上中华之友”。
-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布鲁塞尔出版。——第88

页。

- “心理学医学和精神病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Medicine and Mental Pathology》)——伦敦出版。——第566页。

五 画

- “东方新闻报”(《La Presse d'Orient》)——君士坦丁堡出版。——第593—597页。
- “北不列颠每日邮报”(《Noth British Daily Mail》)——格拉斯哥出版。——第362页。
-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巴黎出版。——第61、431、442、481、482、540页。
- “加尔各答日报”(《The Calcutta Gazette》)——第319页。
- “世纪报”(《Le Siècle》)——巴黎出版。——第521页。
- “世界报”(《Univers》)——见“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学世界报”。
- “汉堡记者”(《Hamburger Korrespondent》)——见“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
- “卢瓦尔河上的灯塔”(《Le Phare de la Loire》)——南特出版。——第420页。
- “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Staats und Gelehrte Zeitung des Hamburgischen unpart

eischen Korrespondenten)》——第463页。

六 画

“权力报”(《Le Pouvoir》)——巴黎出版,——第482页。

“同盟报”(《L' Union》)——巴黎出版。——第540页。

“印度之友”(《The Friend of India》)——塞腊姆普尔出版,——第333、335页。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伦敦出版。——第49、348页。

“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伦敦出版。——第350、594页。

“多瑙河之星”(《L' Etoile du Danube》)——布鲁塞尔出版。——第279、280页。

“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 - ler》)——伦敦出版。——第348、407、706页。

七 画

“每日快报”(《The Daily Express》)——都柏林出版。——第713页。

“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伦敦出版。——第625页。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伦敦出版。——第117、298、300、331、348、482、705页。

“君士坦丁堡报”(《Journal de Constantinople》)——第596页。

八 画

“邮报”(《Post》)——见“晨邮报”。

“国民报”(《National- Zeitung》)——柏林出版。——第657、658页。

“国家报”(《Le Pays》)——巴黎出版。——第275页。

“国家通报”(《Staats- Anzeiger》)——见“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

“国民议会报”(《L' Assemblée nationale》)——巴黎出版,——第62页。

“孟买日报”(《The Bombay Gazette》)——第354页。

“孟买时报”(《The Bombay Times》)——第273、274页。

“孟买信使报”(《The Bombay Courier》)——第335页。

“孟加拉日报”(《The Bengal Gazette》)——见“加尔各答日报”。

“佩斯劳埃德氏报”(《Pester Lloyd》)——布达佩斯出版。——第179页。

“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学世界报”(《L' Univers religieux , philosophique , politique , scientifique et littéraire》)——巴黎出版。——第447、481、482、521、540页。

九 画

“祖国报”(《La Patrie》)——巴黎出版。——第439、482、483、487、540页。

“观察家”(《The Examiner》)——伦敦出版。——第192页。

“观察家报”(《The Observer》)——伦敦出版。——第706页。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伦敦出版。——第11、348、708页。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巴黎出版。——第32、41、42、65、66、83、221、226、418—421、430、436、439、440、442、447、456、459—466、468、482、687页。

“军事旁观者”(《Military Spectator》)——伦敦出版。——第333页。

“思想和行动”(《Pensiero ed

- A zione) —— 伦敦出版。—— 第616页。
- “政治周刊” (《Politisches Wochenblatt》) —— 见“柏林政治周刊”。
- “柏林政治周刊” (《Berliner politisches Wochenblatt》) —— 第727页。
-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 (《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 巴黎出版。—— 第31、43、45、78、420、431页。
- “政治纪事报” (《Political Register》) —— 见“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
- “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 (《Cobbett's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 —— 第11、12页。

十 画

- “记者” (《Le Correspondant》) —— 巴黎出版。—— 第667页。
- “旁观者” (《Le Spectateur》) —— 巴黎出版。—— 第420页。
- “泰晤士报” (《The Times》) —— 伦敦出版。—— 第23、24、59、78、112、116、153、158、163、182、192、247、255、260、269、289、298—300、310、311、324、341、361、372、389、391、407、409、414、420、476、495、499、500、502、526、539、540、562、563、601、626、664、700、706页。
- “爱丁堡评论” (《The Edinburgh Review》) —— 第140、433页。
- “纽约先驱报” (《The New-York Herald》) —— 第483页。
- “纽约每日论坛报” (《New-York Daily Tribune》) —— 第148、279、592—594页。
- “马德里报” (《Journal de Madrid》) ——

- 第48页。
- “马德里日报” (《Gaceta de Madrid》) —— 第44页。
- “索美塞特郡报” (《Somerset County Gazette》) —— 伦敦出版。—— 第562页。
- “通报” (《Le Moniteur》) —— 见“总汇通报”。
- “铁路、矿山和公共工程问题报” (《Journal des Chemins de Fer, des Mines et des Travaux Publics》) —— 巴黎出版。—— 第82页。

十一 画

- “晨报” (《The Morning Advertiser》) —— 伦敦出版，—— 第195、330、562页。
- “晨邮报” (《The Morning Post》) —— 伦敦出版。—— 第181、192、195、284、349、562页。
- “晨星报” (《The Morning Star》) —— 伦敦出版。—— 第624、705页。
- “曼彻斯特卫报”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 第184页。
- “笨拙，或伦敦喧声” (《Punch, of the London Charivari》) —— 第163、436页。
- “商人杂志和商业评论” (《The Merchant's Magazine and Commercial Review》) —— 纽约出版。—— 第585页。

十二 画

- “普鲁士报” (《Preussische Zeitung》) —— 见“普鲁士总汇报”。
- “普鲁士总汇报” (《Allgemeine Preussische Zeitung》) —— 柏林出版。—— 第692页。
- “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 (《Königlich-Preussischer Staats-Anzeiger》) —— 柏林出版。—— 第672、701、704页。
- “费加罗报” (《Figaro》) —— 巴黎出

版。——第522页。

十三画

“新闻报”（《La Presse》）——巴黎出版。——第46、81页。

“新闻报”（《The Press》）——伦敦出版。——第192、275页。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 ische Zeitung》）——柏林出版。——第681、700、731页。

“诚实的不列颠人报”（《The True Briton》）——伦敦出版。——第460页。

十四画

“旗帜报”（《The Standard》）——伦敦出版。——第349页。

十五画

“论坛报”（《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伦敦出版。——第80、350、468、483—487、536、600、601、603、604、622页。

十七画

“舆论报”（《Opinione》）——都灵、佛罗伦萨、罗马出版。——第378页。

二十一画

“辩论日报”（《Debats》）——见“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

地名索引

三 画

- 土伦——第687页。
 土鲁斯——第42、82、687页。
 土尔盖河——第135页。
 土尔克斯坦——第134、135、139、637、638、640、642、665页。
 上海——第74、189、233、601、603、604、624、625、663页。
 下新城(高尔基)——第168页。
 大西洋——第713页。
 小亚细亚——第93页。
 千岛群岛——第168页。
 广东——第233、623页。
 广西——第233页。
 广州——第112、114—117、146、153、158、159、162—164、176、177、194、233、310、432、502、589、590、601、623—625、662、663页。
 士麦那(伊斯密尔)——第91、96页。

四 画

- 巴黎——第20、21、25、35、42、43、59、60、65、67、69、71、78、81、85、88、170、241、243、246、287、290、376、377、428、432、437、439、440、442、457、460、461、468、

- 508、522、540、594、597、667、682、686、687、693、708、709、720页。
 巴登——第674页。
 巴希——德里郊区。——第300页。
 巴库——第135、136页。
 巴耳赫(伐齐腊巴德)——第134、135、137、641页。
 巴伊亚——第374页。
 巴格达——第246页。
 巴特那——第303页。
 巴士拉——第77、247页。
 巴雷利——第300、524、529、553、554页。
 巴达霍斯——第499页。
 巴塞罗纳——第41、45、48—51、82页。
 巴拉克拉瓦——第353、386、411、415页。
 巴腊克普尔——第252、417页。
 巴腊特普尔——第302页。
 巴斯克地区(巴斯克)——第48、49页。
 比哈尔——印度的州。——第319、331、555页。
 比都尔——第302、319、330、415页。
 比桑歇——第436页。
 比达索阿河——第42页。
 比利牛斯山——第42、82页。
 比利牛斯牛岛——第42、261页。
 木兰——第687页。

* 括弧中是现代地图上的名称,在正文中看不出所在地点的地名,则加有简短的说明。——编者注

木尔坦——第336页。
 木尔西亚——第41、48页。
 木尔西亚——西班牙的一个省。——第48页。
 木尔加布河——第134页。
 太平洋——第73、636页。
 切塔特——第230页。
 切尔西——第9页。
 切尔克西亚——第179、180、508—514、592—598页。
 牙买加岛——第542页。
 文迪亚山脉——印度的山。——第301、555页。
 牛津——第14页。
 戈壁——沙漠。——第665页。
 中亚细亚——第134、636、637、665页。
 韦斯卡——第49页。
 什列斯维希——第60、290、650、679、703页。
 厄尔谢朗施——第380页。
 厄尔布尔士山脉——第133页。

五 画

布伦——第687页。
 布什尔——第77、133、137、139、229、231、246、248、249、253、287页。
 布尔日——第687页。
 布拉格——第650页。
 布哈拉——第134、135、137、638页。
 布来洛夫(布来拉)——第96页。
 布达佩斯——第351页。
 布克萨尔——第554页。
 布勒斯特——第687页。
 布鲁塞尔——第279、435页。
 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625、682、691页。
 布伦特弗德——第564、566页。

布加勒斯特——第278、280页。
 卡易——第687页。
 卡耳皮——第330、469、471、529、553、555页。
 卡尔斯——第155、230页。
 卡拉奇——第336页。
 卡赖尔——第171、173页。
 卡塔罗(科托尔)——第99页。
 卡尔纳耳——第300页。
 卡利亚里——撒丁岛上的居民点。——第323页。
 卡迪博纳——山口。——第121页。
 卡塔黑纳——第48页。
 卡尔尼奥拉(克腊伊纳)——第102页。
 卡尔斯卢厄——第693页。
 卡腊布拉克——第639页。
 卡塔卢尼亚——第41、48、49页。
 汉堡——第103、351、366—369、373、374、378、423、463、650、730页。
 汉威耳——在伦敦近郊。——第565、570页。
 加来——第687页。
 加迪斯——第48页。
 加兹尼——第134、137页。
 加拉兹——第96、103页。
 加尔各答——第78、138、252、253、260、270、275、286、306、307、326、329、330、335、338、381、409、503、524、559、591、612、614页。
 加利西亚——第49页。
 加济普尔——第320页。
 加利福尼亚——第67、71、395、534、578页。
 加斯梯里亚——第42、48页。
 旧加斯梯里亚——第49页。
 圣亚田——第376、687页。
 圣昆廷——第687页。

圣哥达——山口。——第122页。
 圣奥梅尔——第687页。
 圣多明各(海地)岛——第311页。
 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第435、563、584、626、627、637、638、640、650页。
 圣塞瓦斯田——第499页。
 尼姆——第687页。
 尼泊尔——第262、319、326、503、554页。
 尼马奇——第300、301页。
 北京——第166、168、189、191、233、588、615、625、662、664、665页。
 北希尔兹——第363页。
 古巴——岛。——第178、545页。
 古姆提河——第381、470、473页。
 古扎拉特——第303页。
 弗兰德——第7、9、11页。
 瓦兰壬——第104、105页。
 瓦尔那——第96、230页。
 瓦拉几亚——第280、281、533、598页。
 瓦朗西恩——第687页。
 瓦伦西亚——第41、48页。
 瓦伦西亚——西班牙的一个省。——第48页。
 瓦瑞克郡——英国的郡。——第203页。
 东印度——第291、343、369、370、531页。
 东普鲁士省——第676、678页。
 卢昂——第83、376、687页。
 卢迪阿纳——第294、297、301页。
 卢瓦尔河——第66页。
 皮劳尔——第260、297页。
 皮蒙特——第17—22、277、278、698、703页。
 皮腊诺——第96页。
 皮阿琴察——第20、697页。
 生河——第319页。
 白沙瓦——居民点和公国。——第127、

137、139、262、285、303、309、328、641页。
 瓜州——第190页。
 瓜廖尔——居民点和公国。——第261、289、331、555、557、612、613页。
 印度河——第133、134、138、309、641、642页。
 印度洋——第93、96、97页。
 印多尔——第285、300、301、320、331页。
 印古耳河——在高加索。——第230页。
 印度斯坦——第382、385、471、500、517、613页。
 丘克斯贝里——第56、213、214页。
 幼发拉底河——第247页。

六 画

达翁——爱尔兰的郡。——第203页。
 达普——恒河和朱木拿河两河流域。——第300、331、412、524、554、555页。
 达乌尔山——第234页。
 达尔马威亚——第100—103页。
 伊朗——高原。——第134、139页。
 伊宗察河——第98页。
 伊利里亚——第99、101页。
 伊皮罗斯——第96、99页。
 伊斯法罕——第134页。
 伊尔吉兹——炮台。——第639页。
 伊尔库茨克——第167页。
 伊奥尼亚群岛——第535、705—709页。
 伊斯的利亚半岛——第91、99、101—103页。
 安巴拉——第252、260、297页。
 安特林——爱尔兰的郡。——第203页。
 安特卫普——第98、405页。
 安达鲁西亚——第48、238页。
 亚眠——第456、462、687页。

亚琛——第467、677页。
 亚平宁半岛——第18页。
 亚平宁山脉——第20页。
 亚历山大里亚——第93、96页。
 亚得利亚海——第20、90—93、95、96、98—103页。
 亚克萨尔特——见锡尔河。
 西藏——第663页。
 西莱丁——第373页。
 西诺普——第96页。
 西里西亚——第107、651、675、684页。西伯利亚——第163、167、615、636、642、665页。
 西北各省——第262、301、331、550页。
 多瑙河——第93、103、123、467、640、662页。
 多瑙河各公国——见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
 多米尼加岛——第9页。
 多布鲁甲——第428、440页。
 多耳普尔——第336页。
 多尔塞特郡——英国的郡。——第203页。
 米兰——第19、695页。
 米拉特——第252、253、271、274、297、300、310、323、471页。
 米尔扎普尔——第303、320、331页。
 朱木拿河——第253、300、320、329—331、334、469、471、474、554、555页。
 朱利恩阿尔卑斯山脉——第123页。
 休斯特尔(休希特尔)——第134、137页。
 托列迈达——第96页。
 华沙——第460、502、650页。
 匈牙利——第62页。
 好望角——第93、286、560页。
 艾兹卢艾尔特——第565页。
 舟山岛——第186、189页。

汕头——第663页。
 地中海——第25、96页。
 伏尔加河——第136、638页。
 伍斯特——第373页。
 因克尔芒——第138、352、353、386、447页。
 迈索尔——第303、310页。
 吉尔吉斯草原——第637、638、642、665页。
 考文垂——第203页。
 牟罗兹——第83、88、376、687页。
 牟尔豪森——见牟罗兹。
 刘伊斯——第433页。
 兴都库什山脉——第133、640页。
 长江——第189、191、663页。

七 画

贝云——第43、82、237页。
 贝鲁特——第96页。
 贝耳岛——在比斯开湾。——第19页。
 贝腊尔——印度的州。——第266页。
 贝汉普尔——第252、320页。
 贝阿伐尔——第336页。
 贝拿勒斯——第270、302、303、310、319、320、331页。
 贝加尔湖——第167、625页。
 里姆——第687页。
 里昂——第83、376、430、440、687页。
 里海——第128、133—137、250、641页。
 里士满——第565页。
 里巴瓦(里巴亚)——第168页。
 里格港——第77页。
 里斯本——第93页。
 里约热内卢——第374页。
 苏格兰——第345、349、361、364、608页。
 苏黎世——第122页。

苏耳坦普尔——第471、472页。
 苏伊士运河——第93、96页。
 苏伊土地峡——第560页。
 克黎——爱尔兰的郡。——第713页。
 克里木——第9、210、354、386、411、640页。
 克什米尔——第331页。
 克拉科夫——第706页。
 克伦地亚——第102页。
 克里特岛——第661页。
 克拉克曼楠——英国的郡。——第203页。
 克里斯提阿纳（奥斯陆）——第289页。
 杜埃——第687页。
 杜塞尔多夫——第674、675页。
 坎大哈——居民点和公国。——第127、134、135、137页。
 坎纳腊——第295页。
 坎德什——第321页。
 坎特伯雷——第9页。
 那不勒斯——第17、19、682、698页。
 那格普尔——居民点和印度的州。——第303、320、321、529页。
 希瓦——第134—137、638、640、641页。
 希梅——第380页。
 希卡普尔——第336页。
 利尔——第376、687页。
 利木赞——第8页。
 利物浦——第161、162、173、184、345、348、608页。
 但泽——第368、369、405页。
 伯尔尼——第105页。
 伯里克——第363页。
 伯桑松——第687页。
 沙特尔——第687页。
 沙捞越——第232页。
 夏洛顿堡——第633页。

麦茨——第687页。
 麦克尔士菲尔德——第350页。
 沃耳特尼察——第230页。
 伶仃岛——第588页。
 怀布里奇——第13页。
 吕内维尔——第90、98页。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第93、96、246、248、277、508—512、514、515、592—599、665页。

八 画

阿仁——第82页。
 阿腊——第319、320页。
 阿马——爱尔兰的郡。——第203页。
 阿姆河——第134、137、636、639—641页。
 阿拉斯——第687页。
 阿拉伯——第77页。
 阿瓦赫——第336页。
 阿克顿——第565页。
 阿格拉——第252、273、300—302、318、321、325、329、470页。
 阿腊贡——第49页。
 阿纳帕——第509、511、597页。
 阿尔马河——第386、411页。
 阿利瓦尔——第500页。
 阿利康特——第49页。
 阿利普尔——第299页。
 阿尔托纳——第367、463页。
 阿耳尼克——第363页。
 阿耳西拉——第49页。
 阿勃维尔——第687页。
 阿迪斯康——第305页。
 阿得雷德——第343页。
 阿速夫海——第68页。
 阿腊克斯河——第135页。
 阿尔巴尼亚——第96页。

- 阿尔明尼亚——第136页。
阿尔及利亚——第124页。
阿拉哈巴德——第252、302、310、326、331、416、470、612页。
阿卡浦尔科——第72页。
阿扎姆加尔——第470页。
阿斯土里亚——第49页。
阿斯特拉罕——第135—138页。
阿斯特拉巴德——第134—139、641页。
阿尔卑斯山脉——第123页。
阿克麦吉特(彼罗夫斯克)——第640、641页。
阿腊耳斯克炮台——第639页。
阿希佩拉哥群岛——在爱琴海。——第96页。
拉合尔——第253、273、300、335、336页。
拉纳克——英国的郡。——第202页。
拉费尔——第446页。
拉曼彻——第48页。
拉埃桑特——第387页。
拉忠克腊——第41页。
拉姆别萨(拉姆别兹)——第19页。
拉吉普坦纳——第260、261、529、557、612页。
拉科鲁尼亚——第49页。
拉芒什海峡——第256、483页。
波拉(普拉)——第101—103页。
波河——第20、123页。
波兰——第100、107、110、210、211、629、651、665、707页。
波兹甫——第107、675、684页。
波斯湾——第77、131、133、134、137、138、287、641页。
波尔多——第43、95、376、687页。
波茨坦——第634、650页。
波罗的海——第106、367页。
波斯尼亚——第661页。
波美拉尼亚——第106、107、651、684页。
罗马——第19、99、439、446、450、697页。
罗马尼亚——第278页。
罗曼尼亚——第96页。
罗文尼奥(罗文尼)——第96页。
罗希尔汗——第289、300、329、335、471、473、474、500、523、528、529、554、555、557、611、613页。
罗契得尔——第181页。
直布罗陀——第535、536页。
直布罗陀海峡——第93页。
法夫——英国的郡。——第203页。
法特普尔——第302、319、330页。
法扎巴德——第330页。
法提哈巴德——第301页。
佩斯——今布达佩斯东岸地区。——第94页。
佩斯里——第203页。
佩囊布库——第374页。
孟买——第253、261、262、269、285、306、307、321、331、335、524、550页。
孟加拉——印度的管区。——第252、259、267、271、285、303、320、331、406、517、525、550、551、590页。
孟买管区——第261、267、271、285、303、320页。
吴淞——第189页。
吴淞江——第189页。
昂茹——第541页。
昂科纳——第20、102页。
昂古列姆——第687页。
阜姆(里耶卡)——第90、96页。
杰卢姆——第303页。
果腊克普尔——第471、523、524、555页。
冈德斯霍特(昂德斯科特)——第7页。
周德普尔——第336页。

帕尔马——第20页。
 昌巴耳河——第336页。
 易北河(拉巴河)——第106页。
 肯梅尔——第712、713页。
 的里雅斯特——第90—96、102、103、233、378页。
 门的内哥罗——第661页。
 图尔——第687页。

九 画

南京——第189—191、233页。
 南特——第95、376、687页。
 南希尔兹——第363页。
 南安普顿——第76页。
 哈安——第48、238页。
 哈卡——第49页。
 哈马丹——第137页。
 哈佛尔——第95、376、687页。
 哈特福——第564页。
 哈腊克(哈尔格)岛——第77—79、131页。
 哈得兹菲尔德——第181页。
 科克——爱尔兰的郡。——第713页。
 科伦——第632、652页。
 科列龙河——第294页。
 科尔富岛——第705、706页。科摩林角——第331页。
 科拉普尔——第320页。
 科布伦茨——第692、693页。
 科尼斯堡(加里宁格勒)——第652、678、691页。
 威尔士——第57、203、491、568、569页。
 威尼斯——第17、90—93、96、98、100—102、393、405页。
 威尔特郡——英国的郡。——第194、203页。
 威斯特伐里亚——第107、368、421、430、

675、684、729页。
 勃良第——第105、118页。
 勃兰登堡——第106—108、110、111、684页。
 施特廷(兹杰辛)——第368、369页。
 施梯里亚——第102页。
 香港——第112、149、158、159、163、176、186、231、233、536、603、621、623页。
 信德——第251、320、335、336、382页。
 恒河——第289、302、319、320、326、330、331、412、470、471、524、554页。
 柏林——第59、60、104、368、435、632—635、643、652、673、676、684、692—694、700、703、728、729页。
 红海——第93、96页。
 威海——第135、137、639、642页。
 品迪——第309页。
 恰克图——第167、168、623、663—665页。
 约克郡——英国的郡。——第202、203、567、570、729页。
 郎卡郡——英国的郡。——第198、200、202、203、373、729页。
 耶兹德——第134页。
 济克堡——第632页。
 拜尔法斯特——第713页。

十 画

马康——第687页。
 马赛——第94、95、283、376、378、687页。
 马拉加——第48页。
 马尔瓦——第321页。
 马德里——第41—45、48—50、53、351、435、466页。
 马里恩堡——第380页。

- 马格德堡——第691页。
马尔他岛——第91、535、536页。
马德拉斯——第273、293、306、307、524、550页。
马德拉斯管区——第261、285、291、292、303页。
马拉巴尔海岸——第295页。
马尔格腊堡垒——第405页。
特鲁韦耳——第49页。
特拉比曾德(特拉布松)——第96、514页。
埃及——第91、93、94、249、286、461、532、534页。
埃夫勒——第687页。
埃布罗河——第25页。
埃尔宾(埃尔布隆克)——第691页。
埃尔斯伦(埃尔祖鲁姆)——第131页。
埃斯特勒马杜腊——第49页。
海利贝里——第305页。
海德拉巴——印度的公国。——第320、321页。
海德拉巴——海德拉巴公国的一个居民点。——第303页。
海德拉巴——信德的一个居民点。——第336页。
乌古蒙——第387页。
乌里治——第411页。
乌代普尔——第612页。
乌拉尔河——第135、638、639页。
乌拉尔山脉——第72页。
格兰桑——第118页。
格拉斯哥——第56、202、343、349、608页。
格拉纳达——第48页。
格劳宾登——第122页。
格腊西阿——巴塞罗纳城郊。——第50页。
格罗斯特郡——英国的郡。——第203页。
格勒诺布尔——第687页。
格拉克列亚半岛——第661页。
纽约——第423、451、583页。
纽沙特尔——第104、105、110、111页。
纳瓦腊——第42、48、49页。
纳哥德——第336页。
纳西腊巴德——第301、336页。
爱尔兰——第19、172、203、349、478、503、709、711—715、747页。
爱丁堡——第350页。
爱北斐特——第680页。
伦敦——第55、56、59、64、70、80、104、144、147、172、173、233、273、279—281、305、343、345、346、348、363、368、369、372、374、377、423、447、456、457、460、461、505、508、563、564、566、573、582、592、601、608、616、705、712页。
伦巴第——第17、21、100、697页。
伦弗鲁——英国的郡。——第202页。
哥本哈根——第290、374、463页。
哥格拉河——第529页。
班达——第336、529页。
班特里——第713页。
班加罗尔——第310页。
班得尔汗——第285、289、474、500、523、529、613页。
班诺尼亚——第101页。
索里亚——第41页。
索尔福——第181页。
索恩河——第436、439页。
索恩河岸夏龙——第436、439、442、687、695页。
索美塞特(索美塞特郡)——英国的郡。——第203页。

夏冈季——第611页。
 夏哈巴德——印度的州。——第320页。
 夏贾汉普尔——第300、554页。
 库希斯坦——第134页。
 桑苏西——第632、633页。
 敖德萨——第92、195页。
 旁遮普——第251、253、260、261、267、
 271、285、295、297—299、303、320、
 328、330、335、336、471、501、550、
 615页。柴郡——第203页。
 珠江——第112、149、190、588页。
 高加索——第126、128、136、212页。
 恩巴河——第135页。
 热那亚——第393页。
 翁热——第35、687、695页。
 俾路支——第135页。

十一 画

基拉尼——第712页。
 基台尔明斯特——第164页。
 莫斯科——第138、637页。
 莫纳根——爱尔兰的郡。——第713页。
 莫尔加顿——第118页。
 莫尔珀思——第363页。
 莫尔达维亚(莫尔多瓦)——第277、279—
 281、289、533页。
 康波尔——第289、301—303、318、319、
 325、326、330、402、404、406、412、
 416、469—472、503、529、555页。
 康瓦尔——英国的郡。——第203页。
 康帕尼亚——第450页。
 康波福米奥——第90、98页。
 勒恩——第687页。
 勒芒——第687页。
 勒克瑙——第252、261、271、301、303、
 318、319、323、325、326、330、331、
 381、398、400、412、469—475、495、

496、499、500、503、507、523、524、
 526—528、553、554、556、614页。
 密西西比河——第136页。
 密多塞克斯——英国的郡。——第569页。
 第戎——第687页。
 第纳普尔——第303、320、330、331、554、
 555页。
 章普尔——第470页。
 得比郡——英国的郡。——第203页。
 梯维尔顿——第447页。
 果翁岛——第49页。
 曼彻斯特——第165、171、181—185、343、
 363、373页。
 崇明岛——第189页。
 悉尼——第343、491页。
 设刺子——第134、139、247页。
 威利(策列)——第94页。
 盖提夫——第77页。

十二 画

黄海——第189页。
 黄埔岛——第586、588页。
 斯基别林——第713页。
 斯特拉斯堡——第421、444、687页。
 斯堪的那维亚——第258、289页。
 斯德哥尔摩——第367、368、374页。
 普伦贝尔——第42页。
 普勒斯堡(布拉的斯拉发)——第90、99页。
 莱比锡——第694页。
 莱茵河——第62、122、368、632、651、680
 页。
 莱茵省——第87、107、632、675、676、678、
 680、683、684、729页。
 莱茵普鲁士——见莱茵省。
 莱斯河——在瑞士。——第123页。
 喀布尔——居民点和公国。——第127、
 134、135、137、636、641页。

喀布尔河——第138、642页。
 喀琅施塔得——第168页。
 提朗——爱尔兰的郡。——第203页。
 提罗耳——第122、643页。
 都灵——第435页。
 都柏林——第709页。
 博韦——第687页。
 博罗迪诺——第387页。
 博洛尼亚——第20页。
 博洛塔格(克孜拉尔特)山隘——第640页。
 博斯普鲁斯海峡——第512、514页。
 菲盖腊斯——第49页。
 菲律宾群岛——第72页。
 菲罗兹普尔——第253、328页。
 菲鲁兹沙赫尔——第500页。
 厦门——第186、624页。
 雅西——第279页。
 黑海——第68、93、96、100、378页。
 黑龙江——第168、234、625、626、641、662、665页。
 黑龙江沿岸地区——第641、664页。
 森帕赫——第118页。
 须德海——第7页。
 喜萨尔——第301、330页。
 喜马拉雅山脉——第555页。
 温德海——见波罗的海。
 费拉拉——第20页。
 凯恩——第19、281、439、464页。
 散德兰——第363页。
 腊万纳——第98页。
 腊古扎(杜布罗夫尼克)——第96页。
 异他海峡——第93页。
 堪察加——第168页。
 温顿——第164页。
 敦克尔克——第7页。

十三画

奥德——第251、252、261、266、289、302、303、319、325、329、405、406、469—473、497、500、502—507、516—519、523、529、554、555、561、611—614页。
 奥尔丹——第181页。
 奥尔良——第687页。
 奥连堡——第136、137、638—639页。
 奥克斯斯——见阿姆河。
 奥维耶多——第49页。
 奥得河——第106页。
 奥郎加巴德——第271、285、320、321页。
 奥斯特利茨(斯拉夫科夫)——第101页。
 塞纳——法国的省。——第468页。
 塞维尔——第41、48页。
 塞尔维亚——第661页。
 塞美林山隘——第103页。
 塞浦路斯岛——第93页。
 塞贝尼科(希贝尼克)——第103页。
 塞瓦斯托波尔——第273、275、283、352、353、359、405、421、422、447、661、696页。
 贾普尔——第612页。
 贾郎达尔——第297页。
 贾巴耳普尔——第336页。
 贾格迪斯普尔——第554、555页。
 雷瓦——第336页。
 雷乌斯——第49页。
 塔布——第82页。
 塔耳瓦腊——德里郊区。——第334页。
 塔夫利兹(大不里士)——第137页。
 新堡——第363页。
 新加坡——第163、232、535、536页。
 新奥尔良——第136页。
 滑铁卢——第60、387、448页。

詹西——第285、286、529页。
 瑟堡——第670页。
 滨海阿尔卑斯山脉——第121页。

十四画

维也纳——第59、90、94、99、123、172、
 195、435、439、563、582页。
 维尔腾堡——第674页。
 维阿马拉——阿尔卑斯山的山口。——第
 123页。
 维卡耳瓦罗——第53、237、238页。
 赫尔（哈尔）——第140页。
 赫耳德——第7、8页。
 赫拉特——居民点和公国。——第78、
 127、131—139、246、248、262、287、
 641页。
 赫罗纳——第41、49页。
 赫克谢姆——第363页。
 蒙古——第167页。
 蒙德马松——第82页。
 蒙默思（蒙默思郡）——英国的郡。——第
 203页。
 蒙彼利埃——第42、687页。
 福州——第624页。
 满洲——第234、665页。

十五画

德干——第321页。
 德里——第253、254、259、260、269、270、
 273—276、283—286、288、289、297—
 302、310、311、318—321、323—330、
 332—335、352—354、357、406、416、
 469、471、474、499、500、523、526、
 528、553、555、556、613、614页。
 德勒穆——第363页。
 德黑兰——第78、79、131、134、137、248、
 249、665页。

德腊-伊斯马伊耳汗——第613页。
 撒丁——见皮蒙特。
 撒马尔汗——第134、137、641页。
 鲁贝——第376页。
 摩里亚（伯罗奔尼撒）半岛——第93页。
 潘普洛纳——第41、235页。
 墨尔本——第343、491页。
 缅甸——第261、497页。
 鞑靼海峡——第625页。

十六画

霍尔施坦——第60、290、650、679、703
 页。
 霍德仁特——第641页。
 霍拉桑——第133、134、136、138页。
 诺瓦拉——第20、502页。
 诺里奇——第572页。
 诺定昂——第203页。
 诺定昂郡——英国的郡。——第203页。
 锡兰岛——第158、254、286、337、338、
 392、397、535页。
 锡尔河——第133—135、639—641页。
 锡尔萨——第286、301页。
 锡塔普尔——第474页。
 锡亚耳科特——第303页。
 穆尔顿——第118页。
 穆得克——第500页。
 穆特拉——第329页。
 穆罕默腊（侯腊姆夏赫尔）——第229、
 231、246、247页。
 泽稷岛——诺曼底群岛之一。——第
 459—461页。
 鲍里要塞——第613页。
 澳门——第586、588页。
 默豪——第285、301、320、321页。

十七画

戴文郡——英国的郡。——第203页。

十八画

- 萨拉(萨达尔)——第96页。
萨克森——第107、651、684页。
萨加尔——第285、303、331、471页。
萨西亚——第301页。
萨塔腊——印度的居民点和公国。——第266、303页。
萨累诺——第695页。
萨尔特——法国的省。——第85页。

- 萨拉哥沙——第25、41、45、49、289页。
萨尔鲁伊——第635页。
萨罗尼加——第96页。
萨特里日河——第260页。
镇江——第189、190页。
谟拉达巴德——第300页。
魏玛——第693页。

十九画

- 庞达普尔——第303页。

译后记

本卷“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一文，是在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所出“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中文版两卷集的基础上校订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十二篇文章，是在人民出版社1961年所出“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文集的基础上校订的，其中七篇的标题，是根据全集俄文第二版译出的，因此与旧题不同：“鸦片贸易史”两篇文章，旧题为“贸易还是鸦片？”和“鸦片贸易”，现在是根据马克思在1858年的笔记本中的标题改正的，“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一文，旧题为“中英条约”，现在采用了马克思原来所用的标题。此外，“英中冲突”一文旧题为“划艇亚罗号事件”，“英中条约”一文旧题为“贸易与条约”，“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旧题为“俄国与中国”，“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旧译为“英人对华的新侵略”，现在的标题都是俄文第二版编者所加的。

马克思的遗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是在徐坚的译文的基础上根据1961年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所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十三卷校订的。原译者徐坚也参加了校订工作。

参加本卷翻译工作的有冯世嘉、孙家衡，参加本卷校订工作的有杜章智、吴达琼。部分地参加了译校工作的有张企、孙岷、毕克、杨兴锐、周亮勋、张钟朴、王锡君、罗焚、麦明尧、于华、陈立敬、蔡恺民、郑原安、董荣卿、钱文干、周裕昶等。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